[美] 白桂思—— 著　　付 马—— 译

Christopher I. Beckwith

丝绸之路上的帝国

青铜时代至今的中央欧亚史

EMPIRES OF THE SILK ROAD

A History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

中信出版集团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美] 白桂思—— 著　付 马—— 译
Christopher I. Beckwith

丝绸之路上的帝国

青铜时代至今的中央欧亚史

EMPIRES OF THE SILK ROAD

A History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

中信出版集团

[美] 白桂思—— 著　付 马—— 译

Christopher I. Beckwith

丝绸之路上的帝国

青铜时代至今的中央欧亚史

EMPIRES OF THE SILK ROAD

A History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前言

致谢

缩略语表

导论

序章　英雄和他的朋友们

第一章 驾双轮车的武士

第二章 贵种斯基泰人

第三章 在罗马和汉朝的大军之间

第四章 匈人阿提拉的时代

第五章 突厥帝国

第六章 丝绸之路、王朝更迭与秩序崩溃

第七章 维京人与契丹人

第八章 成吉思汗与蒙古征服

第九章 从中央欧亚的马上贸易到欧洲人的海上贸易

第十章 丝绸之路断绝

第十一章 失重的欧亚

第十二章 中央欧亚重生

尾声

附录一 原始印欧人及其离散

附录二 中央欧亚古族名考

注释

参考文献

版权页

前言

本书将以一个新视角介绍中央欧亚以及其他与之有直接关联的地区的历史。起初，笔者计划写一部能够涵盖中央欧亚史主要问题的通论，而并不着意于按年代顺序平铺直叙。法国学界在专业写作上有一种传统，追求用最少的注释为具备一定知识的普通读者提供内容专业但又具有可读性的作品。这种传统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以至于曾为本书设想出一个法语书名“中央欧亚史纲”（*Esquisse d'une histoire de l'Eurasie centrale*）。但真正动笔以后，人物和事件还是一个个按照其在历史中的出场顺序先后出现在笔者的叙述中。不知不觉中，笔者还是写出了一部以欧亚大陆整体为背景的中央欧亚政治、文化通史。书中时有详细的注释，偶尔会涉及对原始史料的重新研究。[1]

然而，笔者未尝忘记自己的初衷：厘清那些中央欧亚史中迄今未被正确阐释的基本问题，其中一些问题甚至从未被论及。如果不厘清这些问题，那么欧亚大陆历史上的波澜起伏将依然不能被理解；在大多数的历史记载中，这种现象被简单地归为不解之谜。不解之谜固然令人着迷，而其中一些也注定无解，但是，对于中央欧亚历史上的多数“未解之谜”，现在已有足够的材料来破解，而不必再依靠“猜想”了。

有一种说法流传甚广，即有关中央欧亚史的材料现存极少，因此几乎没有多少讨论的余地。此说甚谬。有关中央欧亚的史料实则汗牛充栋，尤其是有关其与周边文明联系交往的史料。[2]由于这段历史纵贯4000年，相关具体问题的研究著作浩如烟海，出版一套大部头著作或许方能穷尽。这项工作只可能依靠一个学术团队协力完成，而不可能由一人独立写就，因为个人的知识、能力、精力和时间毕竟有限。一位学者若想以如此宏大的题目完成专著，唯有从具体问题抽身，以宏观视角观察之，而这正是笔者感兴趣并采用的方式。

因此，总体而言，本书并不聚焦于某个具体的话题、人物、政治集团、时段或文化（甚至包括中央欧亚文化系统，它本身就值得写一本书），除非是笔者特别感兴趣的内容。本书也不会面面俱到地述说所有历史大事、人物和年代，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笔者会尽量提供重要事件和人物的基本信息，其中一些信息的搜索曾令笔者颇费周折。最后，

本书不是基于原始史料的研究成果，也不是一部全面的研究目录。近年来，关于中央欧亚的一些最重要的民族、地区、历史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著作，均带有完备的注释和索引，感兴趣的读者可自行参阅。

笔者所做的工作则是重新审视学界对于中央欧亚民族和中央欧亚历史几乎已经达成一致的普遍认知，并尝试对这种认知做出修正。因此，本书的注脚主要加在一些笔者认为值得深入讨论和研究的地方。笔者在论说中加入的细节都是笔者眼中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史实，因此不吝笔墨。这同时也意味着另外有一些重要的史实被本书略过，因为笔者认为它们并非当时最关键的事件。笔者原打算尽量少添加注释，以保证立论的紧凑，但如读者所见，成稿中的注释数目仍颇为可观。常年的写作习惯是难以控制的，笔者确实喜欢在注释中对有趣的话题进行更深入的讨论。一些长注释主要面向专家学者，若置于正文中可能造成篇幅冗长，因此统一置于正文最后以注释的形式出现。

当然，笔者也不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将本书写成一种历史理论著作。笔者也无意在书中宣扬任何理论。这类著作近年来大量涌现，但本书绝不属于此类。在过去数十年中，关于中央欧亚的国家形成（state formation）出现了许多种理论，或者说，一种流行理论的许多种变体。笔者也不打算详细地讨论这些理论，但会在《尾声》一章中予以概述。本书所用的解释方式和术语均非取自这些理论性著作。笔者追求在阐述和分析相关事实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史论。这种尝试未必能成功，但笔者仍尽量避免在书中提及世界史理论。笔者对多数理论都所知甚少。

下面有必要谈谈笔者在史料处理和历史书写方面所采取的方法。近年来，“后现代主义”方法被应用到历史、艺术等领域。后现代主义要求，老的必须不断地被新的取代，于是便有永久的革命。[3]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顺理成章的下一阶段。后现代主义反对的是实证主义，即通过特定的、一致的标准来评估和判断事物的非现代主义的做法。后现代主义认为，所有的评判都是相对的。“在后现代，我们已经不能再依赖‘客观性’的神话”，后现代主义者如是说。[4]“产生怀疑是合理的，因为这个领域中最权威的专家之间也存在着分歧。”[5]历史只是一种意见，因此，没什么是非判断是绝对的。我们不可能知道曾经发生了什么，也无法知道其原因；我们只能猜测诸如一个民族现代的“认同建

构”、反智主义者和非学者的民族主义争论等行为的现代动因。所有手稿的价值都是相同的，因此，校勘就是浪费时间。有人甚至认为手稿的价值主要在于其所反映的有关书写人的信息及其所处的文化背景，因此校勘工作反而会使不同手稿所带的这类信息流失。另外，因为我们无法真正了解作者的本意，所以我们也不用去费力探寻原始文本的面貌。[6]人们愿意称什么是艺术，什么就是艺术。艺术已经没有高低好坏之分，因为那只是一种意见而已。因此，艺术在理论上是无法被提高的；它只能被改变。悲哀的是，强制性地不断改变和对所有标准的摒弃实际带来的是停滞——真正的改变从未发生。雷同的剧情也发生在政治上。现代的“民主”体系只制造表面上的改变，并没有带来任何实质上的变化。因为人类无法做出有效的评判，人类所有的评判都只是意见，所以，所有的意见都是平等的。（照此逻辑，后现代主义者对此的评判也应当是无效的，但后现代主义者似乎并不热衷于批判他们自己所奉行的后现代主义教条）。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人只有两条路可走：或是如信教一般相信一切，或是做一个纯粹的怀疑论者。这两条道路的逻辑极端都是思考的终止，至少是批判性思维的完全丧失。[7]普通大众通常只能走第一条路，如果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也选了这条路，则全民抛弃理性，那么结局将是一个迷信、压迫和恐怖时代的到来，足以使先前所有时代的文明蒙羞。笔者不认为这是“善”，这应是一种“恶”。笔者反对现代主义及其变体——后现代主义。它们是一股反智浪潮，在人类文明几乎所有的领域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愿未来一代青年能够觉醒，迎击这股浪潮，终有一天艺术的新纪元会曙光重现。

古生物学是历史学的一种，实际上属于自然科学，因此后现代主义学者的反智主义在这个领域中无法兴风作浪。[8]尽管笔者对恐龙很感兴趣，但本书还是以人类历史为中心。以笔者管见，研究人类历史的逻辑和古生物学是一样的，后现代主义也不应在这里有立足之地。笔者不认为自己对世界的体验是一种毫无意义的错觉：不能仅因为这是我个人的体验，就将其视为完全主观的经验。诚然，在某种程度上，一切都有其不确定性，包括科学；对于此点，科学家非常清楚。所有的学者都必须将不确定性和主观性纳入考量。笔者不认为“历史”在现代英美语言中是一种科学，但笔者认为它也应当采用和科学一样的研究方法，一如其他所有学术领域。因为后现代主义不但要摒弃科学，还要摒弃理性，笔者决不能接受任何学者或知识分子将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

笔者还认为，找到人类动机背后的力量很重要，尤其是与社会政治

组织、战争以及上述人类活动的概念化、艺术等领域有关的动机。尽管本书并非一部动物行为学或人类学著作，但在进行如此宏大历史书写的过程中，笔者意识到人类行为似乎有着特别的持续性。这并不是说历史本身在重复，而是说人总是倾向于做同样的事；另一方面，真正的巧合在历史上很少见。人们也倾向于模仿他人。譬如，车具和轮子应当只被发明了一次。从没有轮子的“车”逐渐发展演变，经历了很长时间才最终变成真正的车具。但当它发展成形之后，便迅速被周边民族借鉴模仿。人类行为在如此广袤的时空中展示出一致性，显然是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起源。从欧亚历史的视野纵览过去的4000年，人类的社会政治结构与其他灵长类的社会政治结构在笔者看来并没有明显的不同。雄性社群首领等级制（Alpha Male Hierarchy）就是我们的体制，只不过我们用各种名目去掩饰它。换言之，笔者认为，现代政治体制实际就是一种被伪装的灵长类等级制，后者与人类可以想到的任何一种政治体制没有本质的不同。如果正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那么认识到这个问题所花费的时间实则良久。为此问题找到解决方案，抑或控制其进一步恶化，任重而道远。

通过上文，读者已经可以大致了解笔者在本书中所取的方法，但笔者仍想在此做一明确的陈述：笔者的目标是现实地、客观地书写中央欧亚和中央欧亚民族的历史，避免因循当下流行的观点或其他任何后现代主义元史学的（metahistorical）或反历史的观点。[9]

本书缘起于20年前。笔者当时正着手写关于“蛮族”（barbarian）观念的论文（参看《尾声》），萌生了写一部中央欧亚全史的念头。数年前与安雅·金（Anya King）的一次谈话再度使笔者燃起了对这一题目的热情。她提到了中央欧亚游牧民族广泛使用丝织品的现象。受此启发，笔者做了一番统计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奢侈品贸易在中央欧亚内部的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后来，笔者在讲授中央欧亚史的过程中注意到，丝绸之路贸易的兴起、盛衰和消亡皆与中央欧亚帝国的兴衰同步，于是开始认真地重新思考自己有关丝绸之路和游牧帝国历史的观点，以及自己对作为整体的中央欧亚史的看法。2004年6月3日，在柏林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丝绸之路研讨会上，笔者报告了论文《丝绸之路与游牧帝国》（“The Silk Road and the Nomad Empires”），是为笔者重新阐释中央欧亚史的第一次公开发表。

在本书成稿的过程中，笔者的观点依然在持续发生变化。事实上，

最终的定稿已经与最初的设想相去甚远。随着写作的进行，笔者不但修正着具体细节，也在调整着整体的思路，而思路的改变又迫使笔者在更多的细节处做出改变。只要笔者愿意，这种不断的修正和重写可能会一直进行下去，但因为其他的研究兴趣，本书的写作终须了结。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稿反映的是笔者在2007年初几近完成全稿时的观点。

笔者在书中特别关注了构成中央欧亚文化系统的基本文化因子，它们对理解历史事件的原因、经过及其对中央欧亚历史的影响有着重要作用。在书中涉及现代史的部分，笔者用较多篇幅讨论了现代主义这一现象。它是导致20世纪中央欧亚在政治和艺术领域遭遇文化破坏的罪魁祸首，至今阴魂不散。笔者希望书中提出的一些观点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现代主义，读者或可从中找到改善人类今日处境的方法。

如前所述，本书涵盖中央欧亚整体的全部历史时期。由于涉及的时空范围极广，内容必有轻重详略之别。即使笔者对中央欧亚研究的所有领域都能有所涉猎，也没有办法搜集到各个领域（包括历史学、语言学、人类学、艺术、文学、音乐等等）产出的浩如烟海的研究成果。世界的其他地区，尤其是西欧和北美，已经受到学界过分的关注，而中央欧亚研究中多数重要的题目仍被忽视，其中一些甚至完全没有被触及。一些重要的史料迄今没有学术校勘本和现代语言的译注本，譬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记》。

事实上，许多题目连一部专著或论文都没有，遑论优秀的研究。就以诗歌研究为例，每年关于《江格尔》（*Janghar*，卡尔梅克的民族史诗）、鲁达基（Rudaki，新波斯语文学的第一位伟大诗人）或李白的新书有几本呢？过去几十年在英语世界中，仅有一部关于李白的书问世，而前两者则无学者问津。关于阿瓦尔、突厥或准噶尔汗国史的著作呢？关于卡尔梅克语、巴克特里亚语或吉尔吉斯语的语言学研究呢？上述题目无一不是中央欧亚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但相关论文很少见。当然，在过去10年中，在中央欧亚历史领域有一批杰出的著作问世，其中多数已被列入本书参考文献；即使在语言学领域，也不乏有分量的著作，其中的代表便是克拉克关于土库曼语的著作（Clark，1998）。但是，这些题目只是中央欧亚研究的重要题目中很少的一部分，包括艺术、建筑、历史、语言及语言学、文学、音乐、哲学在内的许多领域中的大多数问题几乎都没有被研究到。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每年会有几百部关于乔叟、莎士比亚等早

期英语作家的新书问世，关于现代英语作家的新书则每年还能再多出成千上万种。关于英美历史、英语语言学以及与英美有关的一切题目每年都有大量新书出版。这些书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而言已经足够多了。

简而言之，与其在那些已经被充分研究的题目上过分细致地深耕，不如将资源投入中央欧亚研究中许许多多未被开发的领域中。一篇论文或一本小书都可能成为这个领域开拓式的成果。其中一些问题在本书中也有简略涉及。

总之，不论以何种方法研究中央欧亚的历史，学界都有很长的路要走。笔者衷心祝愿各位的努力能够填补这一学科中的许多空白。

---

[1]关于近代以前的“原始史料”的含义，见文末注释1。——作者注（如无特殊说明，全书脚注均为作者注）

[2]中央欧亚与印度次大陆的交流史（也包括前伊斯兰时代的波斯和南部中亚的历史）在晚近以前都缺乏系统的记载。基于这样的事实，也由于我个人学力所限（比如南亚就非我兴趣所在），我在这个问题上着力较少。好在眼下有许多关于从莫卧儿时代到19世纪印度次大陆历史的重要且有趣的研究陆续完成，而且关于其早期历史的知识也会很快增加。

[3]参看本书第十一、十二章关于现代主义及相关话题的讨论。

[4]Bryant（2001）。类似的观点在其他领域也有反映，譬如考古界，“后现代主义披着后过程主义（post-processualism）的外衣在考古学中施加着影响。这种思潮认为，对于文本（包括考古材料）的每一次解读，都是一次创造，因为所有真相都是主观的”（Bryant 2001:236）。在比较了出自权威学者和民族主义政治家的不同观点之后，布莱恩特（Bryant　2001:298-310）总结道，很难分清这些观点究竟是基于扎实的学术还是其他。关于其对此话题的讨论，参看附录一。

[5]Bryant（1999:79）；参看附录一。

[6]当然，愿意去探寻原始文本的人还可以继续去做。校勘本的意义在于建立一种最为接近原始文本的范本，剔除不属于原始文本的内容，尽量揭示作者的真实意图。校勘被斥为“实证的”，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而后现代主义者将一切科学视为“实证主义”。

[7]这种结局早为怀疑论者（Skeptic）所知，他们就致力于此。他们的目标就是消灭因为过度的批判性思考而产生的痛苦，由此到达幸福。

[8]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现代主义的一种极端类型）的信徒甚至反对古生物学的研究成果。

[9]学界亟须一部关于中央欧亚历史的学术性百科全书式著作，参看注释2。

致谢

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笔者先后获得以下项目的资助：2004年印第安纳大学暑期教员奖金（Indiana University Summer Faculty Fellowship）；2004-2005年度富布赖特-海思教员海外研究项目（Fulbright-Hays Faculty Research Abroad Fellowship）资助我赴日本东京从事研究；2004-2005年度古根海姆奖金（Guggenheim Foundation Fellowship）资助我于2005-2006年先后在布鲁明顿（Bloomington）和西班牙德尼亚（Dénia）从事研究。在德尼亚，笔者完成了本书的初稿。其后又完全重写一稿，是为最终定稿的主体。笔者谨对上述机构的慷慨支持致以谢忱。

在笔者申请资助的过程中，曾得到来自各方的建议、推荐和助力，在此向他们表示感谢。笔者尤其受惠于以下诸位：马萨诸塞大学战国工作组（Warring States Working Group）的E.布鲁斯·布鲁克斯（E.Bruce Brooks）、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的狄宇宙（Nicola Di Cosmo）、印第安纳大学的丹尼斯·塞诺（Denis Sinor）、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的中见立夫，以及印第安纳大学的罗克珊娜·马·纽曼（Roxana Ma Newman）、托伊沃·劳恩（Toivo Raun）和罗斯·冯德拉谢克（Rose Vondrasek）。没有他们的支持，笔者就不会有时间来完成这部书稿。笔者还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包括高级编辑罗布·滕皮奥（Rob Tempio）、产品编辑萨拉·勒纳（Sara Lerner）、绘图师克里斯·布里斯特（Chris Brest）、插图设计季米特里·卡列特尼科夫（Dimitri Karetnikov）、封面设计特雷西·鲍德温（Tracy Baldwin）、印刷编辑布赖恩·麦克唐纳（Brian MacDonald），以及所有为本书出版付出辛劳的朋友，正是他们的努力使本书能够顺利出版。

老师、学生和朋友们的帮助使笔者避免了许许多多的错误。笔者要特别感谢彼得·戈尔登（Peter Golden）和辛西娅·金（Cynthia King），他们不但仔细地校读书稿，提出了大量的修改意见，还为笔者提供了大量切实的建议以改进书稿，并花费许多时间与笔者讨论书中的问题。笔者还受惠于恩斯特·克里斯蒂（Ernest Krysty），他帮助我抄写了第四章开头的古英文和第六章开头的吐火罗文。此外，笔者还要感谢下列各位

的慷慨相助：艾騭德（Christopher Atwood）、布赖恩·鲍曼（Brian Baumann）、沃尔夫冈·贝尔（Wolfgang Behr）、鲍文德（Gardner Bovingdon）、德文·德维西（Devin DeWeese）、詹妮弗·杜比安斯基（Jennifer Dubeansky）、克里斯蒂安·法乔那托（Christian Faggionato）、罗恩·费尔德斯坦（Ron Feldstein）、维多利亚·丁-博·辉（Victoria Tin-bor Hui）、乔治·卡拉（György Kara）、安雅·金、清濑义三郎则府（Gisaburo N.Kiyose）、约翰·R.克鲁格（John R.Krueger）、恩斯特·克里斯蒂、爱德华·拉泽里尼（Edward Lazzerini）、刘雯玲（Wen-Ling Liu）、布鲁斯·麦克拉伦（Bruce MacLaren）、梅维恒（Victor Mair）、那体慧（Jan Nattier）、倪德卫（David Nivison）、古尔班·尼亚孜（Kurban Niyaz）、班大为（David Pankenier）、尤锐·派恩斯（Yuri Pines）、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许临君（Eric Schluessel）、米哈利·塞格迪-马赛克（Mihály Szegedy-Maszák）、凯文·范·布拉德尔（Kevin Van Bladel）和迈克尔·瓦尔特（Michael Walter）。上述各位有的通读了本稿全文或部分章节，有的与笔者讨论了书中所涉及的各种问题，抑或就笔者提出的具体问题给出意见或解答。他们提出的宝贵建议笔者并未全盘接受，可能这并不明智。除此之外，笔者在具体事实和对事实的理解上一定还存在其他的错误或疏漏，诚请诸位方家不吝赐教，以期未来再版时能精进。书稿中存在的任何错误最终都由笔者一人承担。笔者特别要说一点，因为本书旨在修正关于中央欧亚和中央欧亚民族的既成观点，所以笔者常常要指摘许多学者著作中的谬误之处（笔者也自认曾一度遵循这些现在看来是错误的观点），但这不代表笔者不尊重这些学者的学问。中央欧亚史领域的专家产出了大量优秀的学术著作。没有这些学者的贡献，本书中所讨论的所有话题都将言之无物。谨向他们之前做出的贡献致敬。[1]

笔者最想感谢的是笔者的夫人因娜（Inna），感谢她的支持与鼓励。笔者将本书献给她。

---

[1]本书终稿于2007年写就，并被出版商接受。此后，我陆续读到许多之前忽视的或未能获得的新老研究成果。有些研究成果刊布了新的史料，使笔者感到必须对书稿做出修正。笔者得以在2008年春季刊印之前完成少量的增订。但对于这些研究成果中的大多数，笔者终没有能够在书稿中参引。因此，一些直接相关的新出论著，譬如戴维·W.安东尼（David W.Anthony）的专著《马、车轮和语言：青铜时代欧亚草原的骑马民族是如何塑造现代世界的》（The Horse，the Wheel,and Language:How Bronze-Age Riders from the Eurasian Steppes Shaped the Modern World，Princeton，2007）就没有在本书中被提及。对此，笔者深表遗憾。

缩略语表

Bax.William H.Baxter.*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Berlin:Mouton de Gruyter,1992.

CAH I.E.S.Edwards,C.J.Gadd,and N.G.L.Hammond,eds.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Vol.I,part 2:Early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3r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

CUP Henricus Denifle.Chartularium Universitatis Parisiensis.Paris,1899.Reprint,Brussels:Culture et Civilisation,1964.

E.I.2 H.A.R.Gibb et al.,eds.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New ed.Leiden:Brill,1960-2002.

EIEC J.P.Mallory and D.Q.Adams,eds.Encyclopedia of Indo-European Culture.London:Fitzroy Dearborn,1997.

GSE Great Soviet Encyclopedia:A Translation of the Third Edition.New York:Macmillan,1973-1983.

Pok.Julius Pokorny.*Indogermanisches etymologisches Wörterbuc*.I.Band.Bern:Francke Verlag,1959.

Pul.Edwin G.Pulleyblank.*Lexicon of Reconstructed Pronunciation in Early Middle Chinese,Late Middle Chinese,and Early Mandarin*.Vancouver:UBC Press,1991. Sta.Sergei A.Starostin.Реконструкция древнекитайской фонопогическо системы.Moscow:Nauka,1989.

Tak.高田时雄《敦煌资料による中国语史の研究：九·十世纪の河西方言》，东京：创文社，1988年。

Wat.Calvert Watkins.*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Indo-European Roots*.2nd ed.Boston:Houghton Mifflin,2000.

*（在词前）表示此词为语言学重构形式。

☆（在词前）表示此词按汉语“反切”重构。

导论

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1]地处欧洲、中东、南亚、东亚以及寒带、亚寒带针叶林-苔原地带之间，是一片幅员辽阔的内陆地区。它是构成欧亚大陆的六大地理板块之一。

地理上的界线往往随着人类文化和政治的变迁而变化。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央欧亚的范围也几经变化。从上古时代盛期（High Antiquity）到恺撒建立起罗马帝国，再从罗马帝国衰亡直到中世纪早期的结束，在上述时段中，中央欧亚的范围甚至覆盖了地中海以北欧洲的大部。从文化上讲，中央欧亚是一条水平延展开的带状地区；它西起大西洋东岸，东抵太平洋之滨，南以更温暖的周边地区（peripheral regions）为邻，北临北极圈。在中世纪早期结束以后，中央欧亚登上其历史的顶峰，其地理范围也达到最大。当时，整个欧亚大陆仅有下列地区没有被纳入中央欧亚的范围：多瑙河以西之欧洲、近东（或中东，包括：黎凡特、美索不达米亚、安纳托利亚、伊朗高原西部和南部、高加索地区）、南亚、东南亚、东亚（日本、朝鲜半岛和中国的中原地区），以及欧亚大陆北部的寒带、亚寒带地区。当然，上述所有地区之间本没有固定的界线，各地区间的边界都曾悄然推移反复，但是，各周边地区的核心地带都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清楚地显示了它们的非中央欧亚性。在中世纪，西部草原地区的斯拉夫人完成了欧洲化[2]，而在19、20世纪间，大批汉人进入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定居。这两个历史过程缩小了传统意义上的中央欧亚的地理范围。

所谓“传统意义上的中央欧亚”，是指在中世纪早期以后，大抵相当于西起多瑙河下游，东临鸭绿江，南依喜马拉雅山脉，北抵亚寒带针叶林带[3]的这一片温带大陆性气候区。它包括：西部草原和北高加索草原（即今日之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4]；中部草原和中亚西部，二者亦可合称为西突厥斯坦（即今日之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中亚南部（即今日之阿富汗和伊朗东北）；中国新疆[5]；中国西藏；东部草原（即今日之蒙古国及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中国东北。如今，西部草原的大部、内蒙古和中国东北在文化上已经不再属于中央欧亚的范畴了。

中央欧亚民族在世界文明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不理解中央欧亚民族与其周边民族的关系，就无法理解欧亚大陆的历史。因此，一部关于中央欧亚的历史也应当在一定程度上涉及欧亚大陆各大周边文明（peripheral civilization）的历史——欧洲、中东、南亚和东亚，它们都曾是中央欧亚历史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传统意义上的中央欧亚与丝绸之路共生共灭。丝绸之路是人们对古代欧亚大陆内部经济及其国际贸易系统的一种失之偏颇的抽象概括。人们常将它与沿海地区的海路贸易网络区分开来。其实，沿海贸易的某些形式早在史前时期就已出现；历经上古时代和中世纪，其重要性一直在逐渐增加。但在史料中，我们完全看不出当时的海上贸易与丝绸之路之间有本质的不同。陆上贸易和海上贸易同属一个统一的国际贸易体系。该体系的重心则是欧亚大陆的陆上经济。陆上经济依赖欧亚大陆上的强大政权来经营维持，而这些政权无一例外都将中央欧亚视为其战略的中心，而非海上。直到西欧人建立起欧洲与南亚、东南亚以及东亚之间稳定的远洋贸易，海上贸易才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体系（详见第十章）；直到丝绸之路终结，它才完全与丝绸之路分离。

地理上的中央欧亚必须与中央欧亚民族以及中央欧亚诸语言相区分。本书的主题是中央欧亚历史，实则与中央欧亚民族关系最大。因此，笔者自然会写到那些已经迁徙离开中央欧亚故地的中央欧亚民族的历史。他们将中央欧亚的语言和中央欧亚文化系统（详见《序章》）一并带到了其他地区。作为整体的欧亚大陆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中央欧亚与周边地区连续互动的历史：从原初及至今日，不断有中央欧亚民族和中央欧亚文化进入周边地区，而周边地区的民族和他们的文化也在不断地流入中央欧亚。

对于早先的一些有关中央欧亚和中央欧亚民族的错误观念，现代学者已经给出了有力的批驳。关于中央欧亚和中央欧亚民族的信息也越来越多地被揭示出来。不幸的是，这些意见尚未被多数历史学家采纳。许多最基本的观点甚至都没有被注意到，遑论被接受。关于中央欧亚民族及其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即使是在专攻中央欧亚的学者的著作中也可见长篇累牍的误解和偏见。在这些谬误中，有一些始于晚近，一些则承袭自文艺复兴时期的观念，甚至还有一些观念可以远溯至上古时代——比如将中央欧亚民族视为“蛮族”的观念。笔者将会在《尾声》中一一辨析这些观念，在此先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现代历史学家大都毫无保留地接受周边民族在史书和其他文献中对中央欧亚民族的负面书写。虽然在周边民族的文献中也有对中央欧亚民族的正面书写，但现代历史学家们对此却不甚重视；至于中央欧亚民族对周边民族的看法，他们更是视若无物。中央欧亚民族在中世纪时才开始用本民族语言记事，之前的历史则只能依靠周边民族留下的文字材料了解。尽管如此，周边民族的记载却不似现代历史学家所说的那般片面。周边民族的史家和旅行家们同样注意到了中央欧亚民族对周边民族的反感，譬如，斯基泰人（也译“西徐亚人”）深恶希腊人和波斯人，匈奴人深恶汉人，突厥人深恶汉人和希腊人。这种态度在中央欧亚本民族所写的材料中也有所反映。另外，希罗多德等早期史家对中央欧亚民族夸张失实的描述早就该被纠正，因为在希腊人、汉人和其他周边民族所留下的文字中都有对中央欧亚民族的积极评价。

人们对前现代中央欧亚的普遍印象基本上来源于对中央欧亚的一种社会形态——游牧社会的误解。中央欧亚民族被看作“纯粹的”游牧民族，其社会形态则被认为与定居社会截然不同。事实并非如此。第一，在中央欧亚民族中，本就有一部分处于定居的社会形态中。第二，无论从历史学还是从考古学的角度看，我们都不能将游牧民族与城居的、从事农业的民族截然区分。[6]上述两点笔者按下不表，先列出现代人对中央欧亚游牧民族的几点误解，再一一批驳：[7]

1.中央欧亚游牧民族是尚武的民族，他们天生好勇斗狠，能征善战。这是因为他们生长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活艰辛。他们骑术高明，又善使弓箭狩猎，助长了其作战之能。

2.中央欧亚游牧民族一概贫穷。这是因为他们的生产方式无法产出足够的生活必需品。因此，他们常劫掠周边富裕的农耕民族。基于这种“饥饿的游牧民”理论衍生出“强取豪夺”模式及“贪婪的蛮族”模式，以之解释中央欧亚民族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3.因为中央欧亚民族天生尚武，又不停迁徙，所以他们很难被打败。他们常年攻击周边民族，是周边民族挥之不去的梦魇。在现代化之前，中央欧亚民族是冷兵器时代欧亚大陆绝对的王者。

尽管在史料中的确有一些评论能支持上述观点，但仔细阅读这些史料本身，我们会发现这些观点其实不值一哂。只要稍微检视客观的历史事实即可发现这些观点的荒谬之处。这些观点其实都是从古希腊-罗

马“蛮族”观念直接演变而来的，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中央欧亚的游牧民族并非天生尚武好战，正如城居民族并非天生擅长行商坐贾，农耕民族也并非天生擅长种地。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和定居民族建立的国家都是复杂而非单一的社会。在游牧民族所建国家中，从事游牧活动之人大都弓马娴熟。此事当然为非游牧民族所惊叹，以致他们反复评说。但在人口、财富都远为庞大的周边定居社会中则有人数甚众的职业军人专门为作战而受训，这使得这些民族在与中央欧亚民族的冲突中屡屡占据上风。

游牧民族一点儿也不贫穷。确切地说，游牧社会中有人富贵，有人贫穷，但大多数人处在贫富之间，与其他社会的情况大同小异。但是，游牧社会中的平民百姓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比周边农耕区的平民百姓要幸福得多；农耕区的百姓则基本处于农奴或比农奴稍好一点儿的状态。游牧民族确实热衷于与近邻进行贸易；当他们受到攻击和侮辱时，一般也会以暴易暴，这和其他民族的行为并无二致。说中央欧亚民族是周边国家的心腹大患则更是无中生有。总之，无论是中央欧亚，还是中央欧亚史，都与“蛮族”毫不相干。

中央欧亚的历史关涉采用不同生活方式的许多不同的民族。每种中央欧亚文化之下生活着无数的个体，每一个都有血有肉，有独特个性，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别无二致。如同生活在其他任何地区、任何文化中的人类一样，中央欧亚民族中也有强有弱，有贤有愚，有名不见经传的芸芸众生。中央欧亚民族所具有的一切也都见于欧亚大陆其他民族中。我们理应本着客观中立之心去书写他们的历史。

既然历史已经告诉我们，中央欧亚民族并非蛮族，那么他们的真实面目又是怎样的呢？他们是富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一个群体。中央欧亚是印欧人的家园故地，印欧人从这里走向整个欧亚大陆，直到大海之滨。他们奠定了今日世界文明的基础。在中世纪，中亚是世界经济、文化和学术的中心。当时中亚人的成就点燃了现代科学、技术和艺术的火种。历史记载明确显示，中央欧亚民族在历史上不断地遭受周边民族无情的入侵。他们历尽凶险，顽强地守卫着自己的家园，保护着各自的亲人，维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与势不可当的来敌抗争到底。最后，中央欧亚民族几乎输掉了一切，但他们从未放弃斗争。本书实际要叙述的正是这样一部贯穿整个欧亚大陆的斗争史——中央欧亚民族与周边民族[8]的斗争。这场斗争以周边民族获胜、中央欧亚政权全部覆灭而告终。中

央欧亚人民由此陷入赤贫的境地，一步步走向灭绝的边缘。所幸天佑中央欧亚，在20世纪末叶，它终于迎来了奇迹般的重生。

读者或许还要发问：这些游牧或半游牧政权所主导的中央欧亚历史，其过程和结局在人类历史上难道不是独一无二的吗？非也。在中央欧亚各政权抵抗周边政权入侵的同时，美洲的印第安人各部族也在美洲大陆殊死抵抗欧洲殖民者的入侵。欧洲殖民者对美洲大陆多数的世居民族都采取或明或暗的种族灭绝政策。在北美洲，印第安人为保卫他们的领土、民族和家人而浴血奋战，却无力回天。他们的玉米地被焚毁，家人惨遭屠戮；幸存者则被押运至不毛之地，任其自生自灭。仅仅数十年之前，印第安人还被这些双手沾满鲜血的胜利者蔑称为“野蛮人”。最后，在印第安人亡族灭种之际，胜利者中终于有一些人良心发现，幡然醒悟：历史上真正的野蛮人恰恰就是他们自己！同理，中央欧亚民族奋勇抵抗周边民族的压迫长达2000多年的事实也早就该被正视。中央欧亚的勇士岂是蛮族？！他们是英雄，他们不朽的英名至今仍在他们民族的史诗中回荡！

---

[1]关于“中央欧亚”的其他称谓，以及“中亚”（Central Asia）一词在今日的含义和用法，参看注释3。

[2]参看Rolle（1989:16-17）。

[3]这片地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北欧亚”（Northern Eurasia）。但很不幸，一些学者却常用此词指中央欧亚。——作者注　中文语境中，一些学者将“北亚”和“中央欧亚”概念混同，与作者所说情况雷同。——译者注

[4]西部草原即黑海草原；北高加索草原又称南俄草原。——译者注

[5]北疆英文作Jungharia；南疆又作中亚东部或塔里木盆地。——译者注

[6]同样应当被摒弃的观点还有“城居的粟特人是‘天生的商人’”。学界最近的研究已经揭示了粟特人之能征善战绝不逊于中央欧亚的其他任何民族（Grenet，2005；Moribe，2005；de la Vaissière,2005a）。

[7]下列各条虽早已被一些当代学者准确指摘，却仍然大行其道。

[8]二分法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适用的。狄宇宙（Di Cosmo 2002a）等人讨论了一些重要的例外情况。在欧亚大陆漫长的历史中，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是，中央欧亚民族的领土缩小了，中央欧亚人民失去了权力和财富，甚至无数生命。

序章　英雄和他的朋友们

在很久很久以前，

人世间出了一位英雄。[1]

他是塔黑勒·珠拉汗的后裔，

唐苏克·本巴汗的嫡孙，

乌仲·阿拉德尔汗的儿子，

一代无双[2]的江格尔。

在他年仅两岁的时候，

凶狠暴戾的恶龙[3]，

侵占了他的家园，

他从此变成了孤儿。

在他三岁那年，

跨上神驹阿仁赞，

攻破了三道大关，

征服了凶狠的巨龙。

——《江格尔》

最初的故事

天神与水神之女交合，一个男婴奇迹般地诞生。

邪恶的国王杀害男婴之父，掳走其母。男婴一出生便被弃于荒野。

在荒野中，野兽没有伤害男婴，反而精心呵护他。他茁壮成长，智勇双全。

这个神奇的男孩后来被带入王宫。国王将他收养，视如己出。

他长成一个勇士，弓马娴熟。

尽管他天赋异禀，但还是被发配到马厩中做活。在敌人入侵的紧急关头，这个喂马少年用他的强弓击退来犯之敌，因此名扬四方。

国王及其诸子心有忌惮。诸子说服国王设计构陷少年。但少年及时得到消息，奇迹般地逃脱。

一群英勇的年轻武士愿意追随他。他们攻杀邪恶的国王，解救出他们的女人，建立起一个正义、繁荣的国家。

英雄的事迹被诗人们颂唱传扬，在英雄的宫廷，也在其他国王的宫廷；在当时，也在后世……他们的美名代代流传。

中央欧亚的民族起源神话

在神话和传说中，许多中央欧亚大国的建国都遵循着上述模式，从史前和历史时期早期的政权算起，包括青铜时代的赫梯[4]和中国的周代，古典时代的斯基泰人、罗马人、乌孙人、高句丽人，中世纪的突厥人和蒙古人，以及文艺复兴晚期和启蒙时代的准噶尔部[5]和满族。

在商代[6]，出身姜姓[7]的姜嫄献祭求子。[8]不久，她踏入天帝的足印而有孕，生下后稷。

后稷被遗弃在一条窄道中，但是路过的牛羊呵护他。他又被扔到森林中，伐木人又救下他。他被弃置于刺骨寒冰上，但是飞鸟以羽翼护佑他。当飞鸟离去时，后稷开始啼哭。其母方知后稷神奇，于是将其带回家抚养。

后稷成人以后，仕于尧。尧任命其为司马之官。他还种豆、谷、瓜，皆获丰收。[9]他是周人的始祖，周人后来推翻了商纣王的统治。[10]

天神之子[11]在第聂伯河伯之女的土地上放牧。他放马吃草，自己悠然睡去。河伯之女趁机盗走他的马匹，要他与自己共寝，然后才会放还马匹。后来，河伯之女诞下三子。

在三子长大成人以后，其母遵照其父的意愿，取出他的神弓。能开此弓者将成王。三子轮番尝试，只有幼子可开此弓。

三件神奇的金器从天而降：一副轭和犁，一柄剑，还有一口杯。三子先后去取金器。长子靠近时，三件金器燃起烈焰，使他无法下手。次子靠近时也遇到同样的麻烦。幼子竟顺利取得金器，毫无阻碍。

名叫斯基泰（Scythês）[12]的幼子于是顺理成章登上王位。他的人民从此因其名自称“斯基泰人”。

后来，斯基泰人受到马萨格泰人（Massagetae）的攻击，渡过阿拉斯河逃向辛梅里亚（今克里米亚），并在那里建立新的家园。凭着精湛的骑射本领，斯基泰人的国家渐渐壮大。

努米托（Numitor）和阿穆留斯（Amulius）兄弟二人是率领特洛伊遗民逃亡意大利的埃涅阿斯的后代。努米托本是国王，被阿穆留斯废黜。阿穆留斯又迫使努米托之女雷亚·西尔维娅成为维斯塔贞女，终身禁欲，不能为努米托传宗接代。然而，一天夜里，战神马尔斯前来强暴了雷亚·西尔维娅。后来，她诞下一对漂亮的双胞胎男孩，罗穆路斯和雷穆斯。阿穆留斯闻讯后将雷亚·西尔维娅囚禁，并下令除掉这对双胞胎。

奉令来拿这对双胞胎的仆人不忍下手，他把两婴孩放在摇篮中置于台伯河岸边。河水漫涨，漂起摇篮，顺流而下直到一处安全的地点。这对婴孩在那里受到一只母狼的照料，又有飞禽[13]喂食，直到他们被一位牧人发现，并带回家中。牧人夫妇抚养两婴孩长大，视如己出。

后来，兄弟二人生得身强力壮、英气勃发，擅于打猎和牧羊。他们被带到阿穆留斯的王宫中。阿穆留斯欲杀二人，但被他们逃脱。最终，他们带领受压迫的牧民及其他民众攻杀僭主阿穆留斯，助他们的外祖父努米托复辟为王。

兄弟二人于是带领他们的追随者离开，去建立一座新的城市。但他们因城市的选址而起争端，并因此开战。此战中，罗穆路斯率其骑兵卫队（Celeres）300人斩杀雷穆斯。后来，罗穆路斯建起圆形的罗马城。[14]

匈奴[15]人的第一位强大的单于[16]头曼[17]在东部草原建立起强大的政权。头曼先有子名冒顿[18]，立为世子。后来，其宠妃又生一幼子。头曼欲除冒顿，而立其幼子为储。他与月氏[19]人议和，并按照习俗，送冒顿入月氏为质。冒顿到达月氏以后，头曼即出兵攻月氏。月氏人以其毁约，欲杀冒顿，但冒顿盗月氏善马逃回匈奴。[20]头曼嘉其英勇，令他统领一万骑兵。

冒顿制作一种鸣镝，以此训练其麾下骑兵。他严令部下听从他的号令，曰："鸣镝所射而不悉射者斩。"他们出猎时，有不发箭射鸣镝所射之猎物者即被斩首。后来，冒顿以鸣镝射其善马，左右扈从或有不敢出箭者，立即被斩首。再后来，他又射其爱妻，左右扈从或有惊恐不敢出箭者，又被斩首。他率众再度出猎，以鸣镝射单于的爱马，其麾下众人即发箭齐射之。冒顿感到时机已经成熟。他随父王头曼单于出猎，以鸣镝射其父。鸣镝一出，他麾下众人引弓齐射，乱箭射杀头曼。冒顿又尽诛王公贵族中不听从者，自立为单于。[21]

乌孙和月氏两国都驻牧在祁连山（意为“天山”，在今甘肃中部）、敦煌之间。[22]乌孙是小国。月氏攻乌孙，杀其王，夺其土地。乌孙部众于是逃向匈奴。新生的乌孙王子昆莫被带走置于草中。[23]一只母狼以乳汁哺育他，另有一只乌鸦衔肉在旁边盘旋，[24]于是他被当成神，被送到匈奴单于那里。单于很喜爱这个婴孩，将他收养。

等到昆莫长大后，单于令他统领乌孙部众，并任其为将。昆莫为匈奴数立战功。此时，月氏已经被匈奴击败，向西迁徙，并在那里击败塞人。塞人被迫远徙南方，其地为月氏所有。昆莫已经足够强大，他请求匈奴单于准许他为父报仇。他率军西进，在公元前133-公元前132年击溃月氏[25]。月氏人向西、南逃散，进入大夏领地内。昆莫率其民众留在了月氏人走后空出的塞人故地，他的军队也日益壮大。匈奴单于死后，昆莫拒不臣服于新单于。匈奴于是发精兵征讨昆莫，却不能取胜。匈奴人愈加认为昆莫是神，从此敬而远之。[26]

在北方的索离（*Saklai）[27]国，一位王子神奇地降生。尽管其父为日神，其母为河伯之女，此国的国王[28]仍然将这婴孩带走，弃于野兽之中。但荒野中的猪、马以及飞禽来为婴孩保暖，使他没有被冻死。

国王见无法杀死这个婴孩，只好允许他的母亲继续抚养他。婴孩长大以后，奉命为国王牧马。他是一位神射手，并得名“朱蒙”（Tüme）[29]。

国王的诸子进言：朱蒙包藏祸心，或许会篡夺王位。于是他们设计欲杀朱蒙，但朱蒙得到其母的及时报信，向南方逃去。

其逃路为一条大河所阻，水急而不能涉。于是朱蒙以其弓击水，大喊道：“我是日神之子，河伯外孙，今日逃走，追兵垂及，如何得济？”河中所有鳄鱼[30]、软甲龟等爬虫悉数浮出水面，排列成桥。待朱蒙过河，众爬虫四散而去，追兵乃不得渡河。

他立牙帐建都，创建一个新的国家。他的国土分为四个部分，四个方向各有一王（*ka）统领。[31]

波斯正处在帕提亚（安息）末代昏君阿尔达万（阿尔达班五世）的治下。法尔斯省总督巴巴克（Pâbag）雇来一位名叫萨珊（Sâsân，也译“萨桑”）的牧人为他牧马放牛。巴巴克并不知道萨珊乃是王中之王大流士的后裔。一天夜里，他梦见阳光从萨珊的头上开始闪耀，渐次照亮

整个世界。于是，他把自己的女儿许给了萨珊。后来，她为萨珊生下一子，取名阿尔达希尔。巴巴克亲自抚养他长大。

阿尔达希尔尚在少年时，他的睿智和精湛的骑术就引起了国王阿尔达万的注意。他召阿尔达希尔入宫，让他在宫中与诸位王子一起生活。阿尔达希尔的骑术和射术均高过诸位王子。有一次，他一箭击毙一头野驴。国王向众人问起此事，阿尔达希尔回答说此事是他所为。但太子要在国王面前争功，称此事为自己所做。阿尔达希尔怒不可遏，当场与太子争辩。此事引起国王不悦，他下放阿尔达希尔去马厩喂马和其他牲口。从此国王不再像对待其诸子一样对待阿尔达希尔。

后来，阿尔达希尔遇到了国王的宠妃，并与之私通。他们一番计议之后，一起骑马逃出了阿尔达万的王宫。国王亲自领兵追赶，但阿尔达希尔赶在国王之前到达了海边，得以逃出生天。[32]国王于是撤军回宫，给阿尔达希尔留下了喘息之机。后来，他召集起一支军队，攻杀国王阿尔达万。他娶阿尔达万之女为妻，并自立为王，开创萨珊王朝伟业。[33]

突厥人的先祖在孩提时被弃诸荒野，奄奄一息。但一只母狼救下了这个男孩，并悉心照料他。后来，母狼与他交合受孕，为躲避敌人追杀逃过西海，到达吐火罗人的诸城之一高昌以北的一个山中洞穴里。[34]第一批突厥人后来移居到阿尔泰山，并以善冶铁而闻名。以前斯基泰人也曾以此闻名。[35]

在6世纪中叶，土门[36]领导下的突厥人尚臣属于柔然（阿瓦尔人）[37]。柔然人的族源不明，当时他们的游牧王国雄霸东部草原。土门一部的势力也逐渐壮大，并开始与中原的拓跋魏（北魏）建立起外交和商贸上的联系。

在外敌铁勒进攻柔然之际，土门率部出击铁勒。他击溃并收服铁勒诸部。[38]这场大捷给了土门向柔然邀功的底气，他向柔然可汗提亲，欲娶柔然公主。

柔然可汗阿那瓌不允。他遣使面斥土门道：“尔乃我锻奴，何敢发是言耶？”土门于是怒斩来使。他与柔然决裂，反向中原王朝（西魏）求亲成功。次年，土门出兵攻灭柔然，毕其功于一役。阿那瓌于552年春自杀身死，其子往南逃入中原地区。[39]土门随后自称可汗。

虽然土门在不久后离世，但他的后人们仍然在欧亚大陆上四处追剿不肯臣服的柔然（阿瓦尔）余部，从东边的中原地区直到西边的君士坦丁堡。[40]他们终于在整个草原地区铸成霸业。

蒙古人是天生一只苍狼和一头白色母鹿的后代。苍狼、白鹿跨越一片大泽到达安全的陆地，在群山环绕的山谷中，它们产下蒙古人的祖先。

在12世纪的东部草原，一个男婴降生在蒙古部首领也速该的家中。这个男婴是合不勒汗（Khabul　Khan）的曾孙。合不勒汗被金人的盟友塔塔儿部擒杀。也速该取其曾经擒获的塔塔儿部首领铁木真（意为“铁匠”）之名，为其新生之子命名。铁木真尚年幼之时，也速该被塔塔儿人毒杀。也速该的部众被同族的泰赤乌兼并，他的遗孀和孩子被遗弃在草原上。

孤儿寡母尝尽人间疾苦。铁木真与诸弟在斡难河中捕鱼，其母则在漫漫草原上寻找着野葱、野果以及一切可以果腹之物。他们就这样顽强地生存下来，孩子们一天天长大。

铁木真长大后逐渐显露出过人的领导才能，有四位勇士愿意追随他左右。后来，他统一了东部草原各部，被尊为成吉思汗（意为“世界统治者”）[41]。他先灭塔塔儿部，再灭金朝，最终平定天下。

没人可以轻易否定上述英雄史诗的真实性。无论是中国的周朝、罗马帝国、乌孙王国、匈奴帝国，还是高句丽、突厥、蒙古以及其他民族，都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政权。它们建国的真实过程早已湮没于历史的迷雾中，几乎所有的记载都杂糅着传说故事和史实。即使是年代相对较晚，或可算作史实的蒙古建国叙述中也包含传说或神话的因素，它们与真实的历史事件一同被讲述。当然，这并非重点。故事的重点在于，压迫人民、剥夺人民财富的邪恶统治者最终都被推翻，带领人民翻身做主的领袖被尊为民族英雄。

上述故事都有相同的桥段。被压迫的民族都曾在异族的邪恶统治下生活，作为属部，他们要为统治民族出战。在与统治民族并肩出战的过程中，他们渐渐习得草原武士的生活方式。同时，他们也从统治民族那里学到了“最初的故事”中的英雄的形象，因为各种版本的“最初的故事”在国境之内被反复传唱，在一处又一处营火的上空回荡。与之一起被

传唱的还有其他英雄史诗，讲述着同样古老且主题雷同的故事。

当属部民众充分掌握了他们宗主的草原生活方式、军事技能、政治文化和神话之后，他们终于奋起反抗。一旦成功，他们会遵循着“最初的故事”中的经典模式获得自由，并取代他们的宗主成为草原的霸主。

在建立霸权的过程中，这些曾经的属部、如今的强部不可避免地也要去征服其他部族。那些被征服的部族会为他们效力，向他们学习。其中的某一部族最终也会用同样的方式推翻他们的统治。这种霸权兴替的模式至迟在公元前17世纪的赫梯帝国已经出现，而在中央欧亚地区，这种模式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草原地区出现的第一个大型国家斯基泰帝国，并一直延续到近代初期的准噶尔汗国和清朝，前后有2000多年的历史。

上述各民族的英雄史诗几乎都被各自民族视为真实的历史。这或可证明，中央欧亚的一个又一个民族都深受“最初的故事”影响，曾试图遵循故事中的情节来建立自己的国家。

各民族不同版本的“最初的故事”在具体细节上大同小异，其核心的要素可以概括如下：

一个少女与神灵交合而受孕。

国王遭废黜，其王位被篡夺。

少女诞下一男婴，天生异象。

僭主下令将此男婴弃诸荒野。

男婴受到野兽的哺育、呵护，得以在野外幸存。

男婴被人在荒野中发现，得救。

他后来长大成人，骑术精湛，能百步穿杨。

他被带入宫中朝觐，成为僭主的仆从。

僭主预谋杀他，他侥幸得逃。

一群勇士愿誓死追随他。

他终于推翻僭主的统治，在国中重建正义。

他建立起一个新城市/开创一个新王朝。

当“最初的故事”被提炼如上，它显然更像一个条理分明的民间故事，而非真实的历史。今日的历史学家及其他学者或许难以相信，生活在公元前2千纪早期的人们会将这样的故事当作真实的或理想化的历史。但请不要忘记，人类社会有时甚至会被宗教信仰或意识形态主导，比如在中世纪，又比如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今天。“最初的故事”信仰属于中央欧亚历史上各民族所共享的一整套文化系统。这一套共同文化系统最早可追溯到原始印欧人时代，本书称其为“中央欧亚文化系统”。

私兵

中央欧亚文化系统的早期形式中最核心的要素是“英雄与私兵（comitatus）”的社会政治-宗教理想：本民族首领是一位英雄，他手下有誓死为他效忠的一班弟兄——他的私兵。私兵的主要特征及其誓约最早在斯基泰时代就有记录。私兵有时与结义弟兄如出一辙。上到古代对斯基泰人的记载，下到中世纪的《蒙古秘史》，一系列史料都体现了此点。琉善（Lucian，也译“卢奇安”，公元前2世纪）笔下的斯基泰人物托克萨里（Toxaris）说道：

我们的友谊不同于你们的友谊。我们从来不在酒桌上交朋友，也不会在乎对方的年龄或其住得远近。我们会耐心地等待，直到有一位勇士出现。只要他是个敢作敢为的真英雄，我们便会对他刮目相看。我们结交朋友一如你们追求爱人：如果一次没有成功的话，我们不会因为被拒绝而感到羞耻。相反，我们会放平心态，继续锲而不舍地追求。最后，友谊终被接受，我们将以最庄重的誓言来约定这份情谊：“寝则同床，食则同器，兄弟一诺，死而后已。”誓言将被信守：众兄弟将指血滴入同一只杯中，先各以剑尖点杯中血，再一同尽饮杯中血。礼毕，则从此兄弟同心，不可分离。[42]

私兵的骨干成员是一群为数不多的武士，他们被（首领）称为朋友、兄弟[43]。成吉思汗就有四位骨干私兵：忽必来、者勒蔑、哲别和速不台，他们被札木合称为成吉思汗的四头凶猛的狼或狗（四獒）。将私兵武士比作狼或者其他猛兽的习惯可以上溯至原始印欧人时代。如果首领先于私兵死去，私兵的核心成员——通常是少数男性[44]——将会殉葬。每一个殉葬的私兵都会“全副武装到牙齿”，以备在阴间再战。[45]私兵武士可自愿效忠任何主人，一旦立誓，便与其原来所属的部族或国家断绝了关系。[46]他们与主人之亲近，比家人尚有过之。他们与主人同室而居。主人对他们毫不吝啬，大肆封赏。墓葬中出土的遗物、遗存为私兵制提供了考古学的证据，有关中央欧亚各地文化的历史记载则提供了大量的历史学证据。在早期的文学作品中，也可见对私兵的描写。最著名者当属《梨俱吠陀》中对因陀罗（Indra）神化了的私兵——双轮车武士摩录多（Marut）的赞诗。其中一个生动的例子是因陀罗在杀蛇怪阿悉（Ahi，一说“弗栗多”）时与摩录多的对话：[47]

因陀罗道：

啊，摩录多们！你们让我单枪匹马去杀阿悉，这岂是你们的作风？当然，我令人生畏，法力高强，从没有敌人伤得我分毫。

摩录多道：

在我们的扈从之下，你曾建立卓越的武功。啊，英雄！让我们也同样神勇，让我们也建功立业。啊，盖世英雄因陀罗！

（因陀罗又吹嘘、抱怨数番。诸摩录多则继续赞颂他。略。）

因陀罗道：

摩录多们，你们的赞扬让我心情大悦。你们为我——因陀罗——这个欢乐的英雄所作的光辉的赞歌，就像朋友为朋友所作一样。

主人-私兵制是每一个新兴的中央欧亚部族的核心结构。在中亚，一个普通统治者的全部私兵通常数以千计，需耗费巨资豢养。在中世纪，随着世界宗教的流行，私兵制和统治的观念逐渐发生了改变，因为世界宗教皆反对殉葬、人殉，但这些习俗没有完全消失，仍部分延续下去，直到周边文明征服中央欧亚。理想化的英雄首领及其私兵的故事被诗人们以史诗的形式传唱。这类史诗中，《贝奥武甫》《江格尔》《玛纳斯》《格萨尔王》等以文字或口头文学的形式一直保留至今。即使在那些早先已经迁徙离开中央欧亚故地的民族中，这种文学传统也被保留很久。匈人阿提拉和查理大帝都被各自民族的诗人赞颂，在世时也经常赞助英雄史诗的吟唱表演。

关于私兵制的直接或间接的记载可见于下列有关民族的史料中：赫梯人、阿契美尼德波斯人[48]、斯基泰人、花剌子模人[49]、匈奴人、上古和中世纪早期的日耳曼诸部、萨珊波斯人[50]、匈人[51]、嚈哒人[52]、高句丽人、古坟时代的日本人[53]、突厥语族各部（至少包括突厥人、可萨人[54]和回鹘人）、粟特人、吐蕃人、斯拉夫人[55]、契丹人[56]、蒙古人[57]，以及其他部族[58]。私兵制也被拜占庭和汉人习得。[59]阿拉伯人则将这种制度伊斯兰化，进一步发扬光大，使其成为伊斯兰文化的固有特征，一直延续到近代初期。[60]

在中央欧亚文化系统的早期形态中，私兵武士会为主人死战到底

——他们不为政府效力，只对主人尽忠。私兵中的骨干是主人义结金兰的兄弟，如果主人先死，他们要么自杀，要么被杀，然后陪葬。周边文明的史料中多有对这种习俗的清楚描述。伊本·法德兰（Ibn Faḍlân）如是记载活跃在伏尔加河一带的维京人［当时他们被称为“罗斯人”（Rus）[61]］：

罗斯王有一个习惯。他在其最骁勇的心腹中选出400名卫士安置在宫中，伴其左右。罗斯王死时，这400名卫士或自杀，或被杀以殉其王。

为何会有人愿做私兵呢？

理由很简单：私兵的忠诚会得到主人丰厚的犒赏，其骨干所获尤其丰厚。主人会视他们如家人，让他们居于宫中，与他们分享一切荣华富贵，并赏赐他们大量财物。私兵武士会获得超乎想象的财富和荣耀。而且这种封赏不止一次，只要他们一直效忠，就能在一生中获得不尽的封赏。[62]他们的衣服以绣有金丝或金布的丝绸制成，装饰有宝石、珍珠或金饰。他们与主人住在同一座宫殿中，享受与主人一样的食物[63]和美酒。无论在主人生前还是死后，他们一直扈从左右。伊本·法德兰如是记载可萨可汗：

当他下葬以后，埋葬他的那些人也被斩首……他的墓被称为“天堂”。他们说：他已进入天堂。所有的墓室中都铺满了织有金丝的丝绸织锦。[64]

对誓死效忠者的奖赏一清二楚。而背叛主人的下场也很明确，且看：

从此，

断绝了你们的黄金和宝剑，

一切赐礼，家园的享受和欢娱。

你们的每一个族人

都将被剥夺地权，

四处流浪，一俟天下王公

听说你们临阵脱逃，无耻的行事。

堂堂须眉，

偷生何如一死！[65]

据《蒙古秘史》记载，克烈部首领被成吉思汗击败，不能再为其私兵提供锦衣美食、荣华富贵。他的一个私兵转而投靠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斥此人卖主求荣，没有资格做那可儿，下令杀之。[66]

从北海到日本海，从亚寒带到喜马拉雅山，在中央欧亚大地的各处，在所有见于史册的中央欧亚民族中，都可以找到关于早期私兵制度或私兵个体的记载。这种现象至迟在赫梯人的时代就已出现，一直延续到中世纪世界宗教开始流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非中央欧亚民族并没有真正的私兵制，他们对中央欧亚私兵制的描述处处流露着惊讶之情。

有关私兵最早的明确记载（同时也是“comitatus”一词首次用来指称“私兵”）见于《日耳曼尼亚志》（成书于公元98年）。塔西佗在书中描述了西部的早期日耳曼各部中的私兵制。关于主人，他写道：“（主人的）地位和权力都取决于他是否有一大队精锐的年轻武士扈从左右。在平时，这是地位的象征；在战时，这是安全的保障。”关于私兵制的结构，他注意到其中有不同的级别。关于私兵，他写道：“在战场上，如果主人失陷，私兵却得以脱逃，那么他将背负骂名，忍辱终身。”他还写道：“他们总是向他们慷慨的主子索要封赏。”[67]塔西佗对日耳曼私兵特点的概括也完全适用于蒙古时代成吉思汗的私兵。成吉思汗的私兵由一支精锐的核心队伍“那可儿”（即他的“朋友”）和常规的私兵队伍“怯薛”组成。在其晚年，怯薛的人数达到1万人。马可·波罗对蒙古的私兵有非常准确的描述，他提到一个细节：忽必烈的私兵由12000名骑兵组成，分为四队，各由一将统领。[68]

在欧洲，私兵制延续到中世纪。在英格兰，最晚在《贝奥武甫》中出现了私兵[69]，包括私兵的盟誓、主人对其私兵的财物奖赏、私兵与主人同住一厅等细节。在斯堪的纳维亚和草原地区，私兵制则延续得更久。[70]

私兵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他们是主人的贴身卫队。私兵日夜不离主人身旁。对于在草原地区当班的私兵来说，若主人身在金帐[71]中，

他们则绝不会踏出帐门。华丽的金帐在斡耳朵（ordo）的中心，而斡耳朵是私兵队大营，是国家的首都。[72]

匈人、突厥人以及其他中央欧亚民族的私兵制度都在史料中留有记载，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为人所知。各民族的私兵每日具体的职责基本相同。在所有前现代草原民族中，有关蒙古人的史料保存最多。成吉思汗亲自颁布敕令，来组织、管理他的私兵队伍。

成吉思汗以十进制组织他的军队，并建立起一支贴身卫队（怯薛）。最初建立之时，卫队有日间侍卫70人、夜间侍卫80人和可以调遣的勇士1000人。怯薛……从他的那可儿[73]中征调……侍卫们既是大汗的贴身护卫，同时也是他的仆人，照顾他的日常生活，看守他的财物。作为仆人，他们有不同的官职，比如管家、厨师、门卫、箭筒士、牧军马者。此外，他们还负责监督女性侍从和其他低级别人员——如负责放骆驼、放牛的官吏——的活动；负责养护大汗的营帐、车舆、兵器、乐器和王位宝器；负责为大汗准备饮食……因为这种护卫/管理制度既为成吉思汗提供了个人的服务，又为他提供了管理新征服的部族、领土和新增的经济事务的官僚系统，因此他走到哪里，他的怯薛就跟随到哪里——无论是远征还是出猎。[74]

由于史料中存有关于蒙古私兵制的细节，人们可以借此推测中央欧亚其他民族中私兵制的运作情况。[75]

散见于古代汉文和希腊文史料中的有关私兵的记载，以及私兵制在整个中央欧亚地区的广泛分布，说明了私兵制是中央欧亚文化系统的一个基本特征。普罗柯比在谈及处在萨珊波斯帝国东北边境的嚈哒人[76]时，如是写道：

此外，富有的居民还有将朋友收作伴当的习俗，有时可达20人或更多。这些伴当会一直陪同他们宴饮，共享他们的财产，可谓有福同享。如果他们去世，他们的伴当们按照习俗将会全部被活埋陪葬。[77]

关于早期的吐蕃帝国，汉文史料中有如下的记载：

其君臣自为友，五六人曰共命。君死，皆自杀以殉，所服玩乘马皆瘗……[78]

上引史料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蒙古秘史》中关于铁木真与他的一

位那可儿誓求共命的记载。私兵制以友谊为纽带，这种现象还可以从不同语言中私兵制的名称上反映出来。比如，斯拉夫语私兵作družina（俄语drug意为“朋友”，družba意为“友谊”）[79]；又如，蒙古语那可儿本意为“朋友”（伴当），后指私兵中之骨干。[80]《马卫集》还记载了漠北汗国时期回鹘可汗的私兵：

他们的国王被称作托古兹可汗，他兵多将广。他有1000名柘羯和400名宫女。卫队侍卫每日可以在其宫中享用三餐，餐后还可获赐美酒三巡。[81]

与古典时代以来的希腊人一样[82]，汉人本没有私兵制的传统，但是那些在中原王朝效力的中央欧亚人却继续实践着这一传统。唐太宗驾崩之后，他生前收服的一些突厥将领请求自杀殉葬。尽管他们的请求被驳回，但仍有一将自杀。粟特、突厥混血将领安禄山[83]在755年起兵反唐，几乎一手将唐朝颠覆。他本人有一支800人的私兵队伍，由出自同罗（突厥语族）、奚和契丹（蒙古语族）等部的勇士组成。他视其手下私兵如养子。[84]

中央欧亚各政权的统治者，无论是出自游牧行国者如突厥可汗，还是出自定居城国者如粟特诸小国国王，一般都拥有成千上万的“柘羯”，即私兵武士。[85]尽管其私兵队伍人数巨大，但应当只是少数骨干成员与统治者结有“共命”之誓约。[86]私兵是否忠诚取决于他们的主人是否能够持续地给他们提供高官厚禄。私兵们所获得最为典型的封赏是珍贵的丝绸衣物和金器，既可以穿戴，又方便转运。在对早期中央欧亚的宫廷的记载中，史家常常提及国王的随从们所穿的华丽丝绸。[87]

7世纪初，唐僧玄奘从中国出发，经中亚到达印度。他撰有详细的行记，其中记西突厥共主统叶护可汗身着绿绫袍，头上裹有帛练。他有达官二百余人，皆身着锦袍。[88]早期拜占庭希腊使者到达西突厥可汗宫廷时，也惊讶于西突厥人所拥有黄金、丝绸之富。[89]

马可·波罗描述了忽必烈汗封赏其手下12000名侍卫锦袍的场景。[90]“大汗赐每名侍卫13袭锦袍，每袭颜色各不相同。袍子皆以珍珠、宝石等装点，价值连城……所赐锦袍总计156000条，价值几乎难以计算。”[91]制作这些锦袍需要大约100万码的精丝，再加上大量黄金珠宝。几乎每个到过蒙元朝廷的外国人都会注意到那里有大量的丝织锦袍，其中许多都绣有金线。[92]

这些丝绸都是从哪里来的呢？有一种错误观念流布甚广：中央欧亚民族常劫掠无辜的汉人、波斯人和希腊人以获得丝绸。（关于这种谬论的深度讨论，参看《尾声》。）至迟从汉代开始，汉人已经必须依靠进口来获得足够的马匹，因为他们自己养的马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满足需求。唐朝也需要进口大量的马匹用作战马，来维持帝国的军事需要。汉文史料中保留了大量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进行绢马贸易的记载。有明确记录的官方交易额巨大，涉及超过2万匹马和超过100万匹生丝。虽然汉文史料中很少给出明确的等价关系，但在一些非官方的记载中还保留有一些有关交易价格的记载。据此可知，中原王朝进口1匹马花费25~38匹生丝。[93]在中世纪早期，绢马贸易是中原王朝经济活动的重要环节[94]，其重要性一直延续到清朝。清朝将整个东部草原地区和其他产良马的地区（如青海）都纳入版图，再无须进口马匹。总而言之，从早期匈奴时代[95]直到清军入关以前，中央欧亚民族所获得的大量丝绸都是通过贸易和税收，而非通过战争和勒索得来的。[96]

人们通常以为，游牧政权只有在一个地区建立起稳定的统治之后，才能为商旅提供保护和交通设施，从而促进远距离贸易的发展。但实际上，游牧政权建立的过程本身就促进了贸易的发生。游牧政权建立的过程需要大量的珍贵金属、宝石以及精致的衣服，因为这些商品是统治阶级建立、扩大和维系统治必不可缺的工具。[97]

在中世纪中央欧亚民族陆续皈依世界宗教之后，骨干私兵自杀或被杀殉葬的行为逐渐消失，但私兵制度仍然在中央欧亚范围内存在[98]，依然需要大量丝绸和其他财物来维系。

伊斯兰化私兵

在阿拉伯帝国扩张到中亚伊始，私兵制就与其他一些中亚文化因素一起被引入了近东地区。第一位率军远征中亚的阿拉伯将领乌拜杜拉·伊本·齐亚德（‘Ubayd Allâh ibn Ziyâd）在班师回巴士拉之时，就带回了一支由2000名布哈拉射手组成的私兵队。[99]继他之后出征中亚的萨义德·伊本·奥斯曼（Sa’îd ibn ‘Uthmân）从撒马尔罕带回50名武士，皆为当地贵族之子。在将这批武士安置在麦地那之后，他没收了他们华丽的锦衣，待他们如奴隶。武士们先杀死萨义德，然后自杀以践私兵之誓。[100]阿拉伯在中亚最知名的统帅屈底波（Qutayba ibn Muslim al-Bâhilî）有一支由中亚射手组成的庞大的私兵队伍。这支私兵多为粟特诸小王国王公之子，他们誓死追随屈底波。715年，屈底波造反事发，其私兵为他死战到底。[101]

阿拉伯的私兵制度来自中亚。当时在中亚，私兵之盛已经广为人知，被阿拉伯和汉地的史家记载。汉文史料记中亚武士道：“募勇健者为柘羯。柘羯，犹中国言战士也。”[102]关于撒马尔罕之私兵，玄奘如是写道：“其王豪勇，邻国承命，兵马强盛，多诸赭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视死如归，战无前敌。”[103]

8世纪中叶中亚地区最著名的统治者之一是史国（Kišš，今沙赫利苏伯兹）和小史国（Nasaf）的国王斯谨提（Al-Iskand），他在阿拉伯入侵中亚时丢掉了王位。他率领一众私兵在中亚地区坚持与阿拉伯军队作战至少10年之久。在汉文史料中，他被称为“拓（柘）羯王”[104]。741年，阿拉伯总督纳赛尔·伊本·赛亚尔（Naṣr ibn Sayyâr）招安了斯谨提及其私兵，许其重回故地。次年，纳赛尔便招纳了1000名柘羯，赐给他们武器和马匹。[105]

762年，阿拉伯帝国的新都“和平之城”在巴格达开始兴建，阿拔斯王朝由中亚人（阿拉伯人所谓“呼罗珊人”）组成的大军进驻巴格达附近。自此，中亚文化开始直接影响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受哈立德·伊本·巴尔马克（Khālid ibn Barmak）的影响，在帕提亚和萨珊波斯时代流行的中亚圆形皇宫-城市布局被拿来当作巴格达城的方案。巴格达城的形制主要模仿两座城市和建筑：一座是位于其东南30千米的萨珊波斯故都泰西

封城；另一座是位于中亚巴尔赫的佛寺纳缚僧伽蓝（Nawbahâr）[106]，这里是哈立德所出巴尔马克家族的故地，该建筑原本是一座萨珊波斯王宫。半个世纪之后，中亚文化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又加深一步。哈里发哈伦·拉希德（Hârûn al-Rashîd）死后，其二子争位。最终，马蒙（al-Ma'mûn）得胜，于是他所在的中亚的都城木鹿暂时成为帝国的首都。10年之后，他率领着一套中亚化的官僚队伍进驻巴格达。他同时带来的还有一支私兵队伍。虽然之前已经有几位阿拉伯的中亚总督带有私兵，但马蒙毕竟是第一位这样做的哈里发。这批来自中亚的柘羯组成了一支全新的宫廷卫队，忠心护卫哈里发。柘羯在阿拉伯语中写作shâkiriyya，后来又被称作马穆鲁克或古拉姆。之前由阿拉伯人组成的卫队被认为既不可靠也不专业，因此被全部解散。马蒙的继任者穆塔西姆（al-Mu'taṣim，833-842年在位）延续了马蒙的中亚私兵制度。这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穆塔西姆是哈伦与其粟特夫人马丽达所生，他在登基成为哈里发之前很久就已经拥有一支由中亚战士组成的私兵队。[107]

与马蒙同时代的哈卡姆一世（Amîr al-Ḥakam ibn Hishâm，796-822年在位）是退守西班牙的倭马亚王朝残部的统治者。他拥有一支由异族战士组成的私兵，名唤al-Ḥaras（卫士）。这队私兵由科尔多瓦当地基督徒的西哥特人首领——西奥杜尔夫（Theodulf）之子、伯爵拉比（Comes Rabî）统领。西哥特人还保留着早期日耳曼人的私兵传统：私兵战士立誓为主人死战到底。[108]

中央欧亚的私兵体制被伊斯兰化之后发展成为马穆鲁克制或古拉姆制，成为传统伊斯兰政权的一种基本特征。这种特征在一些地区甚至一直延续到现代。[109]

私兵与贸易

豢养一名私兵所费巨大。据多种史料记载，主人要为私兵付出金、银、宝石、丝绸、鎏金的铠甲和兵器、马匹等财物。私兵死后下葬，要随葬全套武器装备，外加马匹（最初战场上还使用双轮车之时，还要随葬战车）。主人下葬时还要随葬大批财宝。墓葬之上一般起有巨大的坟冢，其具体形制则各地不同。这类墓葬在传统意义上的中央欧亚地区广泛分布，其中最早的类型是斯基泰人的墓葬。其余还有在阿尔泰–天山地区属于伊朗语族和突厥人以前诸民族的墓葬、匈人墓葬、墨洛温时代法兰克人墓葬、突厥墓葬、吐蕃墓葬、高句丽墓葬和蒙古墓葬。这类墓葬在中央欧亚地区之外也有发现，比如在中国出土的商代墓葬、在日本出土的上古时代墓葬和在欧洲西北部发现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等日耳曼诸族的墓葬。这类墓葬标志着当地曾一度受中央欧亚文化系统影响。

尽管有些财物确是通过战争[110]或纳贡[111]获得——整个欧亚大陆历史上所有的强国都采用过这些手段，概莫能外，但中央欧亚统治者所获的大部分财物还是通过贸易而来的。贸易是拉动中央欧亚内部经济最为强劲的动力。从上古时代到中世纪，在周边文明的文献中不断有关于这点的记录。这里所说的贸易既包括本地的农产品和畜牧产品的贸易，也包括远距离的丝绸、香料和其他商品的贸易。

在中央欧亚，所谓的“乡下人”既包括居住在城市周围土地肥沃的灌溉区的农业人口，也包括生活在草原地区的游牧人口。农业人口主要生产和消费谷物及蔬菜，而游牧人口主要生产和消费肉类、奶、羊毛及其他动物制品。[112]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与中原汉地农业-城市社会内部的经济关系一样。但是在中原汉地，生活在城市及城市周边农村的人口和更加远离城市的纯农业地区的人口之间一般没有族属、语言上的差别。而在中央欧亚地区，远离城市的“乡下人”——游牧人口——与生活在城市及其周边农村的人口在族属和语言上有明显的不同。游牧人口会与他们进行贸易，并主要通过税收对他们施加松散的统治。

因此，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汉地的城市和中亚的城市没有什么区别，都可以开埠进行贸易。根据汉文史料记载，边境地区的汉人其实非常热衷于与游牧民族贸易。然而，当中原王朝强盛时，他们就有能力全

面控制边境地区。这时，他们通常会实施严格的边控，对贸易活动课以重税，或者干脆禁绝。可想而知，边禁自然会引发游牧民族一次一次地入寇劫掠，或者直接发动战争。他们的目的（史料中反复写明）不过是要重新打开通往边境贸易城市的大门，恢复贸易。（其实这些边境贸易城市的所在之处本是游牧民族放牧的草原！）[113]遍览中央欧亚各地的历史，凡游牧政权与周边政权达成和议，必定要促成开埠通商贸易，概莫能外。

简而言之，丝绸之路并非游离于中央欧亚文化之外的一个孤立的事物，相反，它是中央欧亚经济的基础。而且，很难将国际贸易与本地贸易区分开，或者说很难将长距离的文化交流与本地区的文化交流区分开。草原游牧经济、绿洲农业经济以及中亚的城市经济，这一切的一切共同构成了丝绸之路。[114]丝绸之路的源起，以及中央欧亚文化系统的形成，可以一直追溯到4000年前的印欧人大迁徙。

---

[1]原文第二行有“佛宝弘扬的开始，众神崛起的年代”，今不取。此句应是为照顾佛教徒读者的需要而后来加入的。汉译文引自《江格尔》（汉文全译本），黑勒、丁师浩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页。——译者注

[2]汉译本作“一代孤儿”，译者据作者英译改。——译者注

[3]汉译本作“蟒古斯”，译者据作者英译改。——译者注

[4]关于赫梯起源的传说及其与其他民族起源传说的相似之处，参看注释4。赫梯人也有制度化的卫队，似乎就是私兵，详见下文。

[5]准噶尔部的起源神话不见于史料，尽管其下所属的卫拉特各部据悉都有各自的起源神话，但是，史诗《江格尔》的开篇可被视为其民族起源最初的故事。江格尔是准噶尔部及卫拉特各部共同的民族英雄，卫拉特蒙古人中今日最为著名者当属卡尔梅克人。《江格尔》的开篇参看本章开头引文。

[6]周灭商的年代尚有争议，当前西方学界的主流说法在公元前1046年或公元前1045年。

[7]一般认为，“姜”与“羌”有关。羌是商朝的劲敌，擅长用双轮车作战。参看附录二。

[8]根据《史记》记载，姜嫄是五帝之一帝喾高辛的正妃，则其事迹并非发生在商代，作者误。——译者注

[9]关于该民族以农业丰收之神为始祖的更多信息，参看注释5。

[10]本文所叙兼有《史记》和《论衡》中所记的两种故事版本（Legge 1935:465-472；Yamada 1976:146）。

[11]关于希罗多德所记斯基泰神祇，参看注释6。

[12]关于斯基泰人、塞人和其他北伊朗人的名字，参见附录二。

[13]这里特别提到飞禽为一只啄木鸟，详见下文。

[14]本节主要依据普鲁塔克较长的版本（Perrin 1998：第94页起）。此版本中的基本要素与其另外一版以及李维的版本（Foster 1988：第16页起）均没有本质区别。李维提到的罗穆路斯的近卫骑兵，即Celeres（Foster 1988:56-57）起码在初期应当是一支私兵。在普鲁塔克的第

一版（较短的版本）中出现的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僭主的名字为Tarchetius。在希罗多德诸多关于斯基泰人起源的神话中，有一个版本提到斯基泰人的开国之君、传说中的贵种生父名为塔尔吉塔欧斯（Targitaus）。此两名惊人地相似，应当不是巧合。

[15]关于“匈奴”的上古汉语读音，参看注释51、52。

[16]关于匈奴“单于”名号，参看注释7。

[17]关于“头曼”之名复原为*Tumen，参看注释10。

[18]关于“冒顿”一名，参看注释8。这个故事中的英雄人物是冒顿而非头曼（他是事实上的开国之主）。作为“最初的故事”，它具备了除“感应神灵而降生”和“婴儿被弃”之外的所有关键因素。

[19]“月氏”又作“月支”，上古汉语读音可还原为*Tokʷar-（*Togʷar-）kē。参看附录二。本节叙述据《汉书》，参看注释9。

[20]《史记》中关于此事的记载，参看注释9。

[21]引自《汉书》。关于冒顿的私兵以及匈奴的葬俗，参看注释11。

[22]乌孙一名可复原为*Aśvin。关于此名的复原以及乌孙王称号的解读，参看附录二。《史记》中记有关于“祁连”这一非汉文名称的解释。戈尔登（Golden　2006）曾讨论过乌孙的民族起源传说。

[23]本节取自《汉书》版本，应为正确的版本。而《史记》和《论衡》记载的是匈奴攻灭乌孙。匈奴单于以昆莫有神性，于是收养他。《史记》版本与整个故事的上下文不符。参看Benjamin（2003）。

[24]这个故事与罗穆路斯、雷穆斯的故事雷同。关于故事中的鸟类，参看注释12。

[25]Benjamin（2003）。

[26]此节据《汉书·张骞传》中张骞上汉武帝的报告。戈尔登（Golden 2006）讨论了乌孙的起源神话。

[27]关于将“索离”一名还原为*Saklai，以及汉文文献缺少校勘本（critical　edition）的情况，参看注释13。

[28]关于这个故事较晚出的版本，参看注释14。

[29]关于此词的高句丽语词源（或许是一种民间词源），参看注释15。

[30]现存各种版本中均未记有鳄鱼。但是，《古事记》中所记“因幡之白兔”故事也属渡河的主题，其中协助渡河的动物就是鳄鱼。此故事在《竹书纪年》中的平行文本则记有鳄鱼与龟（Beckwith　2007a：30-31）。尽管鳄鱼并不见于朝鲜半岛和日本，但扬子鳄产于中国北方，并曾广泛分布于此（参看注释16）。在这个故事的扶余-高句丽语版本中，不为时人所知的鳄鱼已经被改为时人熟知的鱼。有鳄鱼的版本应当追溯到更早的日本-高句丽共同语时代，当时两族共同的先祖生活的区域至少南至黄河流域，他们熟知扬子鳄。

[31]Beckwith（2007a：29-30）。这个故事传世最早的版本见于王充所撰《论衡》（成书于公元1世纪）。此版本后为《魏略》所承。《魏略》今已佚失，相关内容可从《三国志》（成书于3世纪）中辑出。由高句丽本民族所记最早的版本见于《好太王碑》（立于公元414年）。

[32]文本中并没有解释为何只要阿尔达希尔赶在国王之前到达海边就能够成功脱逃。这个细节应当反映了在各种版本“最初的故事”中多有出现的水这一元素（通常以水神或渡水的形式出现）。关于突厥人和蒙古人“最初的故事”中的“渡水”，参看de Rachewiltz（2004:231-233）。

[33]Horne（1997，VII：225-253），Arkenberg（1998），Grenet（2003），Čunakovskij（1987）。

[34]对突厥人起源神话的详细讨论，参看Golden（2006），Sinor（1982）。突厥人起源传说有数种不同版本。一种版本说第一个突厥人是由一只狼喂养大的。这与罗马起源神话中双胞胎罗穆路斯和雷穆斯在荒野中由狼喂养大的桥段雷同（狼是二人之父战神马尔斯的圣物）。另一种版本说，母狼后来逃走，越过西海，逃到山中洞穴中。在那里，它诞下一代“原始突厥人”。因此，突厥人为狼种（《周书》卷50）。关于突厥和蒙古两种版本的狼生传说，则参看de Rachewiltz（2004:231-233）。突厥人的大旗顶上置有一个金狼头，突厥可汗的私兵则被称为“附离”（突厥语böri，意为“狼”）。在希腊文和汉文史料中，突厥人均被看作塞人的后裔，参看注释52。

[35]参看Rolle（1989:119-121）关于一座斯基泰城市的发掘报告。当时已经存在大规模的冶铁、锻造、武器制造以及对铁、金和其他金属的一般加工活动。当时的铁矿石就采自今日著名的钢铁中心克里沃罗格地区所开采的铁矿。

[36]关于土门一名，在古代突厥碑铭上对应的突厥语是Bumïn，参看注释17。

[37]关于柔然一名，参看注释18。

[38]《周书》卷50。

[39]《周书》卷50。

[40]柔然（阿瓦尔）余部恰在同一时期出现在拜占庭帝国的东部边界，并被拜占庭帝国接纳。尽管不久之后突厥人就抵达君士坦丁堡，并与拜占庭帝国建立起热络的联系，但这批阿瓦尔残部并没有被移交给突厥人。他们后来又在潘诺尼亚（今匈牙利）建立起一个新的汗国。直到791-802年，该汗国才被查理曼的法兰克大军彻底攻灭（Szádeczky-Kardoss 1990:217-219）。

[41]关于“成吉思汗”这一称号，参看注释83。

[42]琉善此节引自Fowler（1905）。Rolle（1989:61-63）加了一件出土的画像，刻画有两个斯基泰人同饮血酒，义结金兰。根据史书记载，早期的日耳曼人也有类似的行为。

[43]蒙古语作nökör（那可儿），复数作nököd。俄语中的表述参看本页脚注5。

[44]整个私兵队伍则是有体系和级别的，具体的安排各地不同。在中亚地区，随葬的人数可能会非常庞大。

[45]考古发现已经非常清楚地揭示此点（Rolle 1989:64页起）。

[46]与此相对的是，常规的军队则是根据国家或氏族组建的。关于此点可以参看弗拉迪米尔索夫（Vladimirtsov）关于蒙古制度的讨论。他在书中用俄语词汇дружинники表示单个“私兵武士”，дружина表示“私兵队伍”；此二词在法语中分别被译作les antrustions和la truste（Vladimirtsov 1948:100页起；2002:382页起）。关于印欧语中的“狼”，参看EIEC 631-636，以及Bruce Lincoln（1991:131-137）极富创见的分析。关于成吉思汗的四“狼”（四獒），参看Vladimirtsov（1948:115-116；2002:386-387）。弗拉迪米尔索夫对此的讨论是其分析蒙古封建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蒙古封建制度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不但在形式上类似，而且在历史上也有渊源。关于蒙古的私兵，参看Allsen（1997:52-55，79，103-104）。

[47]据书1，赞美诗165（Müller 1891:180-181）。笔者对断句有微调。

[48]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者有一支由1万名米底和波斯勇士组成的精英卫队，唤作“不死军”。他们皆身着“以金线装饰的衣服”（Allsen 1997:79）。后来的萨珊王朝也有同样的卫队，只是名字不同（Zakeri 1995:77），另见下文。

[49]公元前38年，花剌子模王法拉斯曼尼斯（Pharasmanes）“在其1500名骑兵的扈从下”前往巴克特里亚见亚历山大大帝（Bosworth 1997:1061）。这些骑兵应当就是他的私兵。有关中世纪花剌子模私兵制的史料也有很多。私兵制在花剌子模至少延续了1000年。

[50]关于萨珊波斯是否有私兵制的问题，参看注释19。

[51]在希腊文史料中，阿提拉的私兵被称为logades，意为“被选任之人”；有时也被称为“伴当”（Thompson 1996:108，109）。他们的职责是“保护阿提拉。每人在每日特定的时间段中持戈披甲贴身保护他。这使得这些‘被选任之人’有机会接近阿提拉，听到他的谈话。尽管他们将这项任务视为‘奴役’，但他们还是能够尽忠职守……而且我们知道在这些‘被选任之人’中还存在等级制度，这反映在他们随同阿提拉宴饮时被安排的座次中：欧内盖修（Onegesius）坐在阿提拉右手边，贝里古（Berichus）坐其左手边……这些‘被选任之人’只对阿提拉一人尽忠。他们尽忠职守，因为没人能比阿提拉给他们更多赏赐”（Thompson 1996:181-182，192）。尽管汤普森（Thompson）对匈人存有偏见，而且他也没有意识到匈人社会中存在私兵制——他根本没有提到私兵，至少在他讨论“被选任之人”时没有提到，但从他的描述中可见，匈人私兵制与中世纪史料中所见的私兵制非常类似。

[52]普罗柯比（Procopius）的著作中有记载，详见下文。

[53]参看本书第四章。

[54]Golden（2001；2002:141；2002-2003；2004；2006）。

[55]Christian（1998:342，358，363-364，390）。

[56]关于契丹和克烈部的私兵制，参看注释20。

[57]即“怯薛”（kešig），常被译作“皇家侍卫”“贴身侍卫”等，详见下文。

[58]例如上文写到的罗马人就有私兵制。

[59]关于拜占庭和汉人的私兵制，参看注释22。

[60]关于私兵制的通论，参看Beckwith（1984a）；关于粟特、突厥私兵制之传入阿拉伯，参看de la Vaissière（2005a，2007）。

[61]Frye（2005:70-71）。该文以阿拉伯语Rusiya表示罗斯。

[62]主人奖赏私兵财富的例子不胜枚举。丝绸、黄金和其他奢侈品是最常见的奖励。参看Allsen（1997）。据塔巴里（al-Ṭabarî）记载，738年，突骑施可汗每月赏赐他手下15000人每人一匹丝绸。当时“一匹丝绸值25迪拉姆（dirham）”（Allsen 1997:55），则突骑施可汗一年内赏给手下的丝绸价值450万迪拉姆。

[63]塔西佗称：“如果主人提供了充足的家常饭菜，那么这些食物就会代替他们的工资。”他还对米塔图斯家族成员不断向他们的主人索要贵重赏赐的事情发表了评论（Mattingly 1970:113）。

[64]转引自Dunlop（1954:112）。参看注释21。

[65]译文出自《贝奥武甫》，冯象译，北京：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2883-2891行，第149页。——译者注

[66]Allsen（1997:53）。

[67]Mattingly（1970:112-113）；参看Hutton（1970:151-152）。

[68]Latham（1958:135）。艾尔森（Allsen 1997）援引了大量材料佐证马可·波罗的说法。狄宇宙（1999b：18）指出：“组建于1203-1204年的怯薛最初仅有80名日间侍卫和70名夜间侍卫。”从最早的赫梯私兵起，各族的私兵都分为日间侍卫和夜间侍卫两队，此事颇有意味，值得深入研究。

[69]私兵在古英语中或作weored（此词还有其他不同拼法），或作gedryht，参看注释24。

[70]关于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私兵的名称及其组织结构，参看Lindow（1976）。

[71]关于中世纪一些统治者著名的金帐，参看第149页脚注4。

[72]关于斡耳朵，参看注释23。

[73]我修改了艾尔森（Allsen）的文本，其文本中有“ba'atud”（蒙古语中“英雄”的复数形式）以及“nokod”（蒙古语中“朋友”的复数形式）。“那可儿”原意“朋友”。

[74]Allsen（1994:343-344）。

[75]专攻赫梯史的学者如果能从这个思路出发重新讨论所谓的“赫梯的皇家侍卫体系结构”文献（Güterbock and van den Hout 1991），必定大有收获。

[76]他称嚈哒人为“嚈哒匈奴人，亦被称作白匈奴人”。但是，嚈哒人应当不是匈奴人的后裔，他们的族属至今不明。他们的城市的波斯语名字为Gorgân（普罗柯比写作Gorgô），意为“狼”。参看前文有关称私兵为“狼”的讨论。

[77]Procopius I，iii（Dewing 1914，I：12-15）。

[78]《新唐书》卷216上：6063；《旧唐书》卷196a：5220；《册府元龟》卷961:15r-15v。参看Pelliot（1971:3，81-82）；Beckwith（1984a：34）。

[79]关于斯拉夫语和日耳曼语中“私兵”一词的词源，参看注释24。

[80]参看de Rachewiltz（2004）；关于日耳曼和斯拉夫的私兵制，参看Lindow（1976）。

[81]Minorsky（1942:18）。

[82]但早期的罗马人确实有私兵，他们称之为Celeres。罗马的第一位王罗穆路斯有一队300人的骑兵扈从，寸步不离其左右。参看本章前文。

[83]参看第六章。据说他本是孤儿，因此关于他族属的说法实际上是根据其养父母的族属推断出的。他的真实族属尚难确定。

[84]关于安禄山私兵队的名字，以及为中原王朝效力的来自中央欧亚的“柘羯”，参看注释25。

[85]粟特民风尚武，其贵族尤甚，参看Grenet（2005）。

[86]《蒙古秘史》虽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但却为人们了解中央欧亚人通过这样的誓约相互联系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这些誓约似乎有好几种不同的类型。

[87]史料中还见中央欧亚政权中的大臣劝诫国人不要贪恋丝绸衣物（比如突厥《暾欲谷碑》所载暾欲谷的劝诫），这从侧面说明了当时丝绸确实在突厥人中风靡。参看Allsen（1997）。

[88]见于《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译者注

[89]Blockley（1985:115）。

[90]他们即大汗之怯薛的成员。怯薛是大汗私兵的主体。这时私兵人数已经较成吉思汗时代更多，并且一直在增长。

[91]Latham（1958:138，140-141）；参看Allsen（1997:19-20）。

[92]Allsen（1997:16-26）给出了许多具体直观的例子。

[93]关于突厥贩给汉人的马匹的质量和价格，参看注释26。

[94]Beckwith（1991）；参看Jagchid and Symons（1989），但此书中关于绢马贸易的讨论有大量史实和理解上的错误。

[95]Hayashi（1984）。

[96]关于蒙古人如何获得、生产和使用丝绸（尤其是织锦等高级织品），详见Allsen（1997）。可知，蒙古人并非如人们所臆测的那般常用劫掠的方式获取丝绸，而是通过税收和贸易的方式得到丝绸。参看注释27和《尾声》一章。

[97]Allsen（1997:104）。

[98]但在西欧，随着日耳曼各族逐渐罗马化（或称“欧洲化”），私兵传统逐渐消失。关于其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情况，参看Lindow（1976）。早期西班牙的穆斯林学习、借鉴了西哥特人的私兵制，参看Beckwith（1984a：40-41，注释52）。

[99]Tabarî ii：170；Beckwith（1984a：36）。

[100]Beckwith（1984a：36）。

[101]Shaban（1970:75）。

[102]《新唐书》卷221（下），6244页。

[103]《大唐西域记》，871页。

[104]《册府元龟》卷964；Chavannes（1903:147）；参看Beckwith（1984a：37页注释34和39）。

[105]Ṭabarî ii：1765；参看Beckwith（1984a：38）。

[106]Nawbahâr是梵文Nava Vihâra的波斯语形式，意为“新寺”。关于其形制的研究，参看注释28。

[107]参看de la Vaissière（2005a：141）。

[108]详见Beckwith（1984a：40-41页注释52）。

[109]参看de la Vaissière（2005b）和Beckwith（1984a）。绝大多数西方学者都没有正确地理解伊斯兰化之后的私兵制。他们称其为“奴隶兵制”，认为其是一种阿拉伯原创体制。对这种观点的批评意见，参看Beckwith（1984a）和de la Vaissière（2005b，2005c，2007）。

[110]为防读者误以为通过战争抢夺战利品是中央欧亚民族独有的行为，这里笔者要举例以澄清。比如，中原王朝或阿拉伯帝国与中央欧亚民族作战得胜后，都会记录斩首敌人（一般只有敌人首领会被活捉再做进一步处理）之数目和所获战利品之数目，包括所获铠甲、牛、马、羊等。相关研究情况参看注释29。

[111]如果是中原王朝或罗马帝国向外国索要财富物资，史家称之为“朝贡”或“税收”。如果是中央欧亚民族这样做，则被称为“勒索”。

[112]参看Noonan（1997）关于可萨人经济的论说。

[113]在东方，水草最优的草原地带从战国时代起已经陆续被中原王朝蚕食。中原王朝在草原地带建起城镇和长城来守卫这些领土。万里长城就是将早期各诸侯国的长城连接起来，并做加固的。与其说修长城是为了保护中原王朝免受中央欧亚民族入侵，不如说是为了守住中原王朝从中央欧亚民族手中夺来的领土（Di Cosmo 2002a：149-158）。换言之，这是进攻工事，而非防御工事。游牧民族的寇边或入侵无疑是为了将中原王朝的势力从草原地区逐出。游牧民族入侵时几乎只取人口、牲畜作为战利品，而无他求，这或可为证（参看Hayashi 1984）。人们普遍将中原王朝看成先遭侵略的受害一方，将中央欧亚民族视为原始落后、垂涎丝绸等汉地物产的蛮夷之邦。这种观念既没有汉文史料的依据——汉文史料的记载恰恰与之相反，也受到考古学证据反证。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解释欧亚大陆其他各地中央欧亚民族与周边民族的边界。详见《尾声》一章的具体论说。

[114]本节言丝绸之路并非一条路过中央欧亚的路，它是中央欧亚经济的产物，由中央欧亚各地活跃的本地贸易串联而成。它的重心并非其各端点的周边文明，而是中央欧亚。——译者

注

第一章　驾双轮车的武士

把那些红色的牝马驾在双轮车上！

把那些淡红色的牝马驾在双轮车上！

把那两匹黄色的快马驾上车轭，

把拉车最好的马系到车轭上拉车。

这疾如闪电的红色战马

只是在这里供你玩赏吗？

不要让它耽搁了你的行程，啊，（让）你战车上的

摩录多们！催它奋蹄！

——《梨俱吠陀》[1]

最初的中央欧亚人

在过去近4000年的历史中，中央欧亚文化系统一直主导着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它生发于原始印欧人之中。现在，人们仅能通过历史语言学的材料来了解原始印欧人。因为他们确切的发源地并不为人所知，文化史各个领域的学者一直尝试通过历史语言学材料来建构印欧人的故地和文化的模型。散布在欧亚大陆各处、相隔万里的印欧语系各民族在语言和文化中仍共有一些同源的词汇。这些词汇的存在表明他们对这些事物的认知继承自他们共同的祖先原始印欧人。根据这些共同词所指的植物、动物及其他事物，结合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材料，原始印欧人的发源地已经被确定在中央欧亚，具体来说是在乌拉尔山、北高加索和黑海之间的草原、森林交错地带。[2]

大约4000年以前，原始印欧人开始从其故地向外迁徙。在公元前2千纪中，他们陆续迁徙到达欧亚大陆的各个角落。通过征服、融合当地民族，他们逐渐分化形成了历史上的印欧语族各民族。

印欧人从中央欧亚地区向外迁徙的过程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波迁徙发生在公元前3千纪的最末，第三波迁徙发生在公元前2千纪的晚期或公元前1千纪的初期，而影响最为深刻的一波迁徙是发生在公元前17世纪的第二波迁徙。在这一波迁徙中，印欧人在欧洲、近东、印度和中国的部分地区以及中央欧亚都建立起了政权。印欧人的迁徙并非有组织的大规模迁徙，而是以氏族为单位，或者更恰当地说，是以武装团体为单位进行的。最初，他们可能是作为佣军为其邻近政权效力；后来慢慢做大，取其政权而代之。印欧人在迁徙之初应当都说相同的语言（原始印欧语）。后来他们迁徙进入不同的地区并定居下来，与当地操非印欧语的女性结合。他们之间所说的克里奥尔语在经过一到两代人之后逐渐固定，形成一种印欧语子语言。

到公元前1千纪之初，欧亚大陆上的大片地区已经印欧化，而其余大部分地区也受到了印欧文化和语言的深刻影响。印欧人持续了1000年的大迁徙完成了中央欧亚民族对欧亚大陆的第一次征服。

印欧人的迁徙

原始印欧语[3]在尚未开始分化之时，必定是在一个范围较小的区域中流行，且几乎没有明显的方言差别。[4]距今约4000年时，第一批印欧民族和印欧语子语言（Indo-European daughter languages）出现了。从语言学角度看，原始印欧语的分化一定就发生在此前不久。传统的观点认为，在6000年或7000年前，原始印欧语经过长期内在的嬗变逐渐分化。这种观点今日仍广为学界所接受。[5]“最早一批印欧语材料显示，当时各印欧语之间的分化已经很明显。因此，原始印欧人的时代至迟应当定在公元前4千纪早期。”[6]这种观点直接使印欧语超然于世界上已知的其他上万种语言之外，实则甚谬。相反，早期的印欧学家认为，印欧语的分化发生在约4000年前[7]。这种观点被现有的资料支持，包括类型学，也与印欧学家提出的几种假说的年代下限相吻合。[8]

在印欧人迁徙离开其故地之时，各不同部族之间似乎只存在细微的方言差别。[9]他们迁徙离开其中央欧亚故地的过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重构。这种重构主要依据他们在迁徙途中新获得的语言文化特征，同时也应当参考：各族史诗传说中所反映的信息，比如古印度语和古伊朗语文献中提到的对异族的征服；古代近东地区的早期史料；中央欧亚及其周边在历史已知时期内民族语言变化的类型学成果。下面笔者将语言学的证据与上述其他方面的证据结合，尝试重构印欧人迁徙的过程。[10]

最初，印欧人从北方某处[11]南下，迁徙来到高加索和黑海北岸地区。此时，当地已有操非印欧语的民族居住。有两支印欧人没有停下脚步，继续向外迁徙。他们就是后来的吐火罗人和安纳托利亚人的祖先，他们的语言属于印欧语A组。[12]这两支印欧人是目前已知的第一批迁徙走出中央欧亚本土的印欧人，属于前文所说的第一波迁徙。吐火罗人的祖先至迟在公元前3千纪末到公元前2千纪初已经出现在塔里木盆地东部，[13]而安纳托利亚人的祖先则在公元前19世纪以前已经出现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原始印欧人以使用车具而闻名。但在第一波迁徙中，他们并没有带来双轮车。可能双轮车在当时还没被发明出来，抑或是印欧人当时尚未将双轮车用于作战。[14]

在一些地区（比如在希腊），印欧人明显是通过武力征服的方式入

居新的领土。而在另一些地区，他们最初并非以征服者的身份进入，相反，他们先是为当地统治者充当佣兵，或是直接归降，接受他们的统治。这些远道迁徙而来的印欧移民以男性为主，不论以上述哪种形式，进入新的地区之后，他们与当地女子通婚，与当地人融合，形成他们独有的克里奥尔语。在这些新形成的印欧语方言中，影响范围最广的一种是原始印度-伊朗语。印度-伊朗人在语言上应受到了一支非印欧民族的影响，并从他们那里借来了一套独特的宗教信仰和实践体系。现在学者们倾向于认为，这种影响来自当时文化上更为先进的、不说印欧语的巴克特里亚-玛尔吉亚那文化（Bactria-Margiana Culture）[15]。该文化的中心地带位于今阿富汗西北部和土库曼斯坦南部。其他各支印欧人也分别受到另外一些非印欧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的影响，发展出不同的印欧语方言和宗教信仰。

在原始印度-伊朗方言和文化成形之后，操希腊方言、意大利方言、日耳曼方言和亚美尼亚方言的各支印欧人以及一部分印度-伊朗人共同受到某种非印欧语的影响。这种语言带有一种明显不同的语音系统，[16]这使上述各印欧语方言具备了与其他印欧语方言明显不同的特征——印欧语B组特征。[17]此外，受这种语言影响的印度-伊朗人具有了明显不同的语言特征，他们的语言分化出来，成为原始印度语；没有受其影响的原始印度-伊朗语则发展成原始伊朗语。[18]经历过一段漫长的演变，B组语言的特征固定成形，印度人和伊朗人则已经成为宿敌。B组印欧人已使用双轮车。他们可能是从其他文明中引入了这种工具，也可能是将已有的类似车具开发成用于作战的双轮车。A组中的赫梯人此时也已经拥有双轮车。在赫梯城邦卡内什（Kanesh）出土有古代近东地区年代最早的双轮车具的考古学（图像学）证据。双轮车使印欧民族在技术上对其周边民族拥有压倒性优势。[19]

伊朗人最终战胜了印度人，并将他们赶到了中央欧亚的边缘。[20]印欧人向草原地区以外的第二波迁徙自此开始。第二波向外迁徙的印欧人包括说B组印欧语方言的几支——古印度人、古希腊人、古意大利人、日耳曼人和亚美尼亚人。这一组印欧人都已使用双轮车。当他们在公元前2千纪中叶前后侵入周边文明的时候，他们引发了当地在文化和民族-语言方面巨大的变化。他们入居新征服的领土，与当地女子通婚。当地人非印欧系统的文化和语言也对他们产生了同样重大的影响，促使新的印欧语克里奥尔语产生。[21]在第二波迁徙中，又有两支印欧人——迁至米坦尼（Mitanni）的古印度人和迈锡尼希腊人正式出现在了

历史记载当中。第二波迁徙对欧亚大陆的影响远较第一波更为深刻。

证据显示，古印度语和迈锡尼希腊语最早都出现在公元前2千纪中叶，分别出现在两河上游地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北部）和希腊爱琴海沿岸。古印度语的材料显示出明显的印度语特征，说明其早已从印度-伊朗语分化出来。恰在此时出现的希腊竖穴式墓葬（Shaft Grave）文化则已被比定为迈锡尼希腊人的遗迹。古印度语与希腊语在B组诸语言中尤为接近。这个现象或可说明在B组其他各支已经分化之时，操古印度语和希腊语的这两支还没有完全分化，直到他们迁徙到达各自最终的目的地，才开始分化[22]。

随着中央欧亚的全部草原地带和中欧的温带地区分别被伊朗语族和日耳曼语族支配，第二波迁徙结束。日耳曼语族在进入中欧以后依然大量保留中央欧亚文化，因此，他们的迁徙实际上扩大了中央欧亚的地理范围。[23]

最后，第三波（或C组）迁徙开始。这一波迁徙中出现的语族有凯尔特语族、波罗的语族、斯拉夫语族、阿尔巴尼亚语族[24]以及伊朗语族。此前，他们一直生活在中央欧亚故地中B组活动范围以外的地区。凯尔特、阿尔巴尼亚、斯拉夫和波罗的四支向正西、西北和正北三个方向迁徙，以躲避伊朗语族的压迫。伊朗语族则继续扩张其势力范围，控制上述民族（对凯尔特人和斯拉夫人的控制尤深）。同时，伊朗人显然也在追逐印度人。印度人在伊朗人的压迫下，一支穿过近东迁徙到黎凡特（地中海东岸地区），一支穿越伊朗高原进入印度次大陆[25]，或许还有一支经新疆进入中原地区。

传统的观点认为，原始印欧语在原始印欧人的故地经过数千年的嬗变分化成目前已知的这些印欧语子语言。这种情形从类型学角度看几无可能。这种观点近年来已经受到了挑战：一种更有说服力的“大爆炸式分化”理论被提出。该理论与后来文献所显示的突厥语与蒙古语分布过程如出一辙。[26]传统理论同样也与一些基本的事实相抵牾：如果印欧语各子语言在印欧人迁徙之前就已经完成分化，那么在伊朗或俄罗斯就应有早期希腊语的痕迹，在印度和意大利就应存在日耳曼语的痕迹，在希腊或伊朗就应有吐火罗语的痕迹。然而，类似的情况并未出现。事实上，安纳托利亚语只出现在安纳托利亚，希腊语只出现在希腊，吐火罗语只出现在新疆，日耳曼语只出现在欧洲西北部，亚美尼亚语只出现在亚美尼亚，等等。唯一一个可能的例外是古印度语。该语言先在美索不达米

亚北部和黎凡特出现，后来又出现在印度次大陆。当然，这可以解释为伊朗人进入伊朗高原迫使印度人向这两个方向迁徙的结果。原始印欧语在印欧人位于中央欧亚的故地流行，而已知的印欧语各子语言在中央欧亚之外的各地流行。印欧人迁徙到中央欧亚以外各地之后，他们的语言很快就变成一种克里奥尔语，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一种印欧语子语言。笔者本节所呈现的印欧人分化的过程与类型学、历史所记载的语言发展传播过程以及各子语言实际所发现的地区都相符。

楼兰的早期居民

关于已知最早的印欧人，目前只有考古和古人类学的资料可供利用。虽然人们单凭考古遗存无法判定这批古人使用何种语言，更不必说是何种方言，但他们的几方面特征极引人注目：他们具有独特的体质人类学和文化特征；在他们生活的年代，尚不知其他人群能完成如此长距离的迁徙；他们在当地的存在一直延续到历史时期。历史学和语言学的证据使学者将他们比定为原始吐火罗人。

这批古人的干尸显示出高加索人种的特征，最早的一批可以定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干尸大量出土于塔里木盆地，具体在罗布泊附近的古代楼兰之地。这里恰位于早期华夏文明地区（pre-Chinese cultural zone）的西边。目前发掘最为充分的遗址是古墓沟（Qäwrigul）遗址。

这群人死后身着以羊毛压制或织成的衣物下葬。下葬时，其头侧放有装满小麦粒的篮子和成束的麻黄。麻黄似乎就是吠陀中的饮料“苏摩”（soma，伊朗语作haoma，也称“豪麻”）的原料，苏摩饮后可致人沉醉。死者的面部通常涂有赭石颜料。墓葬中的动物遗存显示，楼兰人畜养牛、绵羊、山羊、马和骆驼[27]，狩猎盘羊、鹿和鸟类等，并从事捕鱼活动。[28]这种文化组合是早期印欧人的特征。[29]

在上古时代早期，楼兰地区及其周边流行一种吐火罗语或方言。从楼兰地区出土的、属于公元3世纪的佉卢文文书中还可见来自此语言的借词，可知此语在当地流行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据汉文史料记载，楼兰一带曾属月氏人的故地，因此月氏人显然可被比定为吐火罗人。吐火罗语与安纳托利亚语有一些相同的特征，这两种语言构成原始印欧语的A组子语言，是最早分化出的一组子语言，出现在公元前19世纪。综上，楼兰地区的早期居民，即汉文史料中的月氏人，被认为与希腊语文献中的吐火罗人、龟兹人（说西支吐火罗语）和车师人（说东支吐火罗语）属同一民族，是一群说原始吐火罗语的印欧人。[30]

安纳托利亚人

关于安纳托利亚人的起源尚存争议，因为考古发现并没有提供明确的线索来说明这批印欧人具体是从何方进入安纳托利亚的。有关他们语言及历史的最早记录是出现在亚述语商业文书中的一些人名。这批文书出土于卡内什，可定在公元前19世纪。[31]这批印欧人的一支后来形成了历史上第一个印欧民族——赫梯人（Hittites）。大约在公元前1650年[32]，他们取代了操非印欧语的哈梯人（Hatti），在其土地上建立起强大的赫梯王国。他们的族名“赫梯”即来自当地原住民哈梯人之名。[33]现存的赫梯语文献大都写于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3世纪，但其中一些是早期文献的抄本，原件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17世纪。[34]

赫梯人迁徙的过程也并不明朗，目前只能依靠一些间接的信息来推测和重构。有一点可以明确，那就是赫梯人并非通过武力从外部侵入夺得政权。在赫梯人建立政权之前很久，他们就已经来到哈梯人的领土上定居。人们还不清楚赫梯人初到安纳托利亚时是否已经拥有双轮车，但根据赫梯故城卡内什出土的印章[35]可知，他们后来的确拥有了这种工具。这些印章上的双轮车图像是目前近东地区年代最早的关于双轮车的证据。显然，在赫梯人消灭哈梯政权建立帝国的过程中，双轮车肯定派上了用场。我们根据“最初的故事”模型以及从上古时代到中世纪无数雷同的实例可做如下推测：安纳托利亚人中的一个武装商人集团被哈梯王国统治者招引作佣兵，替他们与其他入侵的印欧部族作战。他们因此定居在哈梯王国内，发展壮大。

赫梯早期的统治阶层在文化上类似于哈梯人。由此可知，他们一定受到哈梯人的语言和文化的浸染。但是作为印欧人，他们属于武士-商人的父系文化系统，主要以父系维系身份认同。因此，他们保留了自己的语言，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本民族的信仰和习俗。比如，赫梯国王有一支由12名武士组成的名叫“梅舍敌”（MEŠEDI）的精英卫队。他们日夜拥卫，寸步不离。[36]考虑到卫队人数之少、武士地位之高［其地位与近邻米坦尼王国中操古印度语的马里颜努人（maryannu）类似］，他们应当就是国王的私兵。[37]一方面，赫梯人具有印欧人一贯的英雄主义民风；另一方面，他们寄人篱下，饱受压迫，其牛羊、妇女常被统治者掠夺。这两层因素使赫梯人绝不会甘心永远雌伏。在他们掌

握了足够的知识和技术之后，便会伺机推翻哈梯人的统治。此事发生在公元前1650年前后。赫梯第一位见于真实历史记载的国王哈图西里一世（Hattusili I）在当时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双轮车的帮助下建立起赫梯王国。[38]双轮车也在这一时期传入近东各地。[39]

直到赫梯王国建立以后，赫梯人才真正形成一个民族。他们的母系及母系亲属都出自哈梯。后来，赫梯人的大军横扫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等地，他们与当时近东的其他强国（包括埃及）争战。他们的名字还出现在《圣经》中。

赫梯人本族的文化在其他文化的浸染之下已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们与哈梯人混居融合，并受其他民族影响，尤其受米坦尼人的影响——包括该国中操古印度语的统治阶级马里颜努人和操非印欧语的原住民胡里安人（Hurrian）。米坦尼王国地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北部、赫梯都城哈图沙（Hattusa，也译“哈图萨斯”）的东南，其与赫梯王国常相互攻伐。赫梯人的语言一直沿用了500年左右。但在青铜时代末期、公元前12世纪初的时候，赫梯王国在海上民族（Sea Peoples）的入侵风暴中灭亡。人们至今对海上民族所知甚少，他们当时以疾风骤雨之势扫荡了黎凡特地区（尤其是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攻灭了许多政权；他们还攻入埃及和希腊。[40]虽然赫梯王室的一支在卡赫美士（Carchemish）建立政权，又延续数代之久，但赫梯人作为一个民族却彻底消失在历史中。[41]赫梯王国都城的狮门至今尚在，它伫立在位于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哈图沙遗址[42]的入口处，供后人凭吊怀古。

马里颜努人

在第二波迁徙（B组）的印欧人中，第一支出现在历史记载中的是操古印度语、使用双轮车的马里颜努人。他们成为米坦尼王国的统治阶级。米坦尼王国的中心地区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北部和叙利亚北部，其主体民族是胡里安人。米坦尼统治者的名字都是古印度语人名[43]，而他们崇拜的神祇也都是以古印度语命名的；族名“马里颜努”（maryannu）的词根marya-也是古印度语词汇，意为“驾着双轮车的武士”[44]；许多与他们的文化相关的词汇，如“双轮车”“马”“驯马”等，也都是古印度语。尽管现存米坦尼文献是以当地的非印欧语胡里安语所写，但是至少在立国之初，马里颜努人说古印度语，而非胡里安语。因此，米坦尼王国最初应当是一个由古印度人（马里颜努人）建立的政权。[45]他们是如何建立这个政权的？他们又是如何继续维持古印度语如此之久，以至于在其不再被使用之后还能有人名和借词留在当地的语言中？这些问题的答案尚不得而知，但他们的族源和语言已经确定无疑。早期米坦尼的统治阶层肯定说古印度语，而且他们都是驾双轮车作战的武士，更确切地说，这些操古印度语的统治者拥有一支由双轮车武士组成的庞大的私兵队伍。[46]

此外，他们应当还将双轮车、驾车作战的技术以及关于马的各种知识传入了米坦尼地区。如果当地原住民胡里安人原本就拥有双轮车并掌握了驾车作战的技术，那么他们或许就不会轻易被外来的印欧人征服，而且，米坦尼的文献中就不应当用古印度语词汇来表达这些事物，其统治者的名字也不应当是古印度语，而全都应当用当地的胡里安语，或者近东的其他语言来表达[47]。如果马里颜努人是来到当地以后从胡里安人那里学会驾驶双轮车、驭马等技术的，那么他们不可能在胡里安人的语言和文化中留下前述那些影响。

如果马里颜努人在迁入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北部之前对双轮车、驭马等一无所知，而是在到达当地之后才从胡里安人或其他原住民族处学到这些知识，那么著名的基库里（Kikkuli）的驭马书就应当全以近东当地的胡里安语或亚述语等非印欧语来记录这类词汇。然而基库里文书却都以古印度语词汇来表达与马、车相关的概念，而不见胡里安语或其他近东语言的词汇。[48]因此，认为米坦尼政权为本地起源这一说法根本站

不住脚。[49]

在米坦尼出土的文献中，并没有来自达罗毗荼语、扪达语（Munda）或其他印度次大陆原住民语言的词汇。如果马里颜努人来自印度次大陆，那么他们的语言中应当会有一些来自当地非印欧语的借词，用来表示“马”“双轮车”“牛”“谷物”等之前就已经在印度次大陆出现的事物。但是，在米坦尼和印度发现的古印度语都使用同一套文化词汇，这套词汇是印欧系统的，这说明它们共同的起源都是来自中央欧亚的印欧语。

美索不达米亚印度语亚组并不是从印度次大陆印度语亚组分化而来的，而后者也非从前者分化而来，因此两者应当是从同一种古印度语母语言分化而来的姊妹语言。其故地可能受到伊朗人的入侵：伊朗人南下侵入伊朗高原，古印度人被迫迁徙，一支向东南进入印度，一支向西进入近东，形成两支分立的局面。印度、伊朗神话的比较研究很早就揭示出了上述情形。[50]

米坦尼王国建于公元前16世纪末叶。直到赫梯国王苏比鲁流马（Suppiluliuma）在公元前1340-公元前1325年挥师将其攻灭，米坦尼王国一直保持着独立的地位。其后，他们曾摆脱赫梯人的统治再度独立。但好景不长，他们很快又被亚述人征服。公元前1265年，沙图阿拉二世（Šattuara　II）试图复国，但他随后在公元前1260年被亚述王萨尔玛那萨尔一世（Salmanasar I）击败，并被逐出米坦尼。[51]

北印度

在西北印度迄今没有发现操古印度语民族迁入此地的考古遗存。但毫无疑问，古印度语确是从西北方向进入印度次大陆的。而且，通过古代印度的最早的传说可知，操古印度语的民族最初是从外部闯入的，征服了在人种、语言和文化上都不属于印欧系统的原住民。[52]这些传说见于印度最古老的文献《梨俱吠陀》[53]，也见于后来较晚的一些作品，譬如印度民族史诗《摩诃婆罗多》最古老的一些章节。这群尚武的外来者养牛，驾双轮车作战，以严格的父系结构组织社会。简而言之，他们是一群印欧人。[54]

印欧人对印度的征服没有在吠陀时代就终止。在其后的一个世纪里，操古印度语的民族征服了整个北印度，并继续向外发展势力。与此同时，印度次大陆的原住民族也在深刻地影响着这些外来者。他们混居融合，最终发展出一种全新的混合文化。[55]

迈锡尼

希腊原史时代（protohistorical）唯一的大型考古遗存是断代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的竖穴式墓葬。墓葬中出土大量随葬财物。墓葬遗址出土的武器、随葬金器以及其他手工制品之前完全不见于希腊本土，只能是外来的文化。这些器物都是当年由迈锡尼希腊人带入希腊的。[56]迈锡尼人是已知最早到达希腊爱琴海一带的印欧人，之前，这里一直有操非印欧语的民族生活。语言学证据可以确证此事。迈锡尼希腊语比后来所知的其他古希腊语方言出现得都早。[57]最早一批迈锡尼希腊语文献写成于公元前14世纪中期。其中一些属于克里特岛克诺索斯（也译“诺萨斯”）的宫廷档案，内容是双轮车及其部件的清单，所涉数目巨大。此外，在迈锡尼还出土有双轮车的图像，其年代可定在公元前16世纪-公元前15世纪。[58]毫无疑问，迈锡尼人应是凭借双轮车之利征服希腊的。

黄河流域

双轮车以及其他一些中央欧亚文化因素在公元前12世纪以前就出现在中国。[59]商朝晚期的都城遗址殷墟位于黄河北岸的安阳。殷墟墓葬出土了数量巨大的双轮车和马匹遗存。许多车马旁还有驾车的武士枕戈披甲随葬。[60]古代近东地区的双轮车通常每轮有4条到6条车辐，但殷墟所出马车车轮有更多辐条，这与高加索一带出土的属同一时期的双轮车非常相似。[61]在殷墟还常有草原地区非常典型的“北方型”战刀与马车一起出土。[62]现在学界已普遍接受，双轮车是一种外来物质文化，在商代从北方或西北方面传入中原地区；在此之前，中原地区没有车具。[63]将战车、马匹连同携带兵器的青年男子——驭手和弓手[64]——一起埋葬的行为是中央欧亚文化系统的一种明显的特征，在当时无疑是印欧人所独有的风俗。这种葬俗在商代遗址中非常常见，通常见于高级贵族的墓葬中。[65]如前文所述，从上古时代一直到中世纪的史料多有记载，中央欧亚的贵族死后，其私兵要连人带马，加上武器、财物，为主人殉葬。无独有偶，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也在这一时期出现。尽管现在还没有发现这种文字系统与其他任何已知文字系统有任何联系[66]，但当时将双轮车传入中原地区的这群神秘的印欧人是否也将书写的观念一同传入中原了呢？[67]

中原地区墓葬中出现双轮车和陪葬的私兵必然是中央欧亚民族进入此地的结果。“安阳双轮车墓葬显示了公元前1200年以降商人与邻近的北方民族之间的一次深刻的互动：这既非一场入侵战争，也非边境上的冲突。因为在战场上或许能俘获有限的战车和马匹，却无法获得使用、养护和再生产的技术……这些双轮车的出现是文化接触的明证，值得学界更加深入地研究。”[68]根据现有知识判断，当时所有其他地区的双轮车武士都是印欧人，而且大都属于B组印欧人，将双轮车传入中原的这群人应当也是印欧人。这群外来的印欧人给黄河流域的文化留下了如此重大的影响，想必他们的语言也留下了同样深刻的印记——应不止于用来指称新引入的器物和习俗的借词。他们的语言现在还无法比定或重构，但它很可能是独立于已知各印欧语子语言之外的一支新语言。[69]

周灭殷商

周朝始祖后稷的传说是一个典型的中央欧亚建国神话，与罗马、乌孙和高句丽的建国神话的情节如出一辙。深受后世推崇的周代为何会有这样一个充满异域色彩的建国神话呢？

中国学者通常认为，被后世各代视为典范的周朝本非源自华夏。这种观点听起来颇令人惊奇，却有据可依。周人的祖先源出当时华夏文明的西部边陲。后稷之母姜嫄出于姜姓氏族。普遍认为，姜姓氏族与非华夏族的羌人有关，姜或即羌。当时羌人是商朝的主要敌人。[70]在商代，羌人已经善于驾双轮车作战，他们必然知道“马”“轮子”等相关概念。然而，藏缅语族诸语言中表示“马”的词汇虽然是一个印欧语词汇，却是通过古汉语间接借入的。[71]藏文中表示“轮子”的词汇也属同样情况。[72]因此，早期的羌人或许并非如普遍观点所认为的那样属于藏缅语族，而可能是印欧人，姜嫄所出的氏族或许本是印欧人。这样，有关周人起源的中央欧亚式神话也就不难解释了。

周人的语言以金文的形式留存。它显然是甲骨文上所见商人语言的延续，是现代汉语的直系祖先。传统观点认为，在汉语的连续发展过程中，外来语言没有产生过任何明显的影响。这种观点虽为多数汉语语言学家所公认[73]，但笔者实难苟同。以考古发现为主的大量证据表明，华夏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并非处于隔绝独立的环境中。外来的印欧人带来了双轮车，曾对商文化产生过重大影响，甚至有可能就是他们建立了商朝（公元前1570-公元前1045年）。商朝的疆域覆盖今河南省东部和北部、山西省东南部和山东省西部，仅是黄河流域的一小片土地；[74]拥有双轮车之利的印欧人可以轻易攻灭这种规模的政权。当然，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上述事件确实发生，但是外来的双轮车武士及其对中原物质文化的影响却不容忽视。

殷墟（东亚）出土的双轮车武士形象与希腊（欧洲）、美索不达米亚（近东、西亚）以及西北印度（南亚）等地出现的形象相仿。[75]在东亚以外地区出现的双轮车武士都属于操印欧语的民族，拥有中央欧亚文化背景。而从考古发现看，东亚的双轮车武士似乎具有与其他地区武士相同的文化——中央欧亚文化。因此，他们应当也说一种印欧语。

从语言学角度来说，这批印欧人进入中原地区只会引发两种结果：一是本地的非印欧语在外来的印欧语的影响下演变成甲骨文所表示的早期上古汉语；二是外来的印欧语在本地非印欧语的影响下演变成甲骨文所表示的早期上古汉语。[76]但无论是哪种情况，甲骨文所书写的语言已经是“汉语”了。它之后的发展情况一清二楚——金文所反映的上古汉语、古典汉语、现代汉语各方言一脉相承。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显示，在商代以甲骨文写就的早期上古汉语中有大量的印欧语成分。这些成分究竟来自哪一支印欧语尚无法被确定。这种语言也有可能非常接近于原始印欧语。

据当下的一种理论[77]复原当时的历史场景是这样的：一小股操印欧语的双轮车武士进入黄河流域中部的早期华夏文明地区充当佣兵。他们定居在那里，与当地民族通婚杂居。其后，或是他们的语言被当地语言影响，形成一种印欧语子语言（一如其他印欧语子语言形成的过程）；或是当地语言受他们所说的印欧语影响，产生一定变化。无论哪种情况，最终形成、保留下来的语言就是早期上古汉语。至于早期上古汉语中的印欧语因素到底来自晚期的原始印欧语，还是来自一种已知的印欧语子语言，抑或是来自另一种尚不为人知的印欧语子语言，谜底尚未揭开。

近来有学者指出，广为学界所接受的“汉藏语系理论”——汉语与藏缅语属同源关系——似乎是建立在两者共同继承一套印欧语词汇的基础上的。[78]其中一些词汇可以被证明是作为借词通过汉语传入藏缅语中的。例如，马、车、铁等事物均在公元前2千纪初叶以后才传入东亚地区，而表示这些事物的词汇都已被视为汉藏语系的共同词汇。但在理论上，原始汉藏语的年代比这个年代要早数千年，这就出现了明显的矛盾。而且，藏缅语中出现的这些词在音系形态上都受到了上古汉语明显的影响，不似从原始汉藏语直接继承而来。尽管这些印欧语词汇明显是通过汉语借入藏缅语中的，但藏缅语中的其他印欧语词汇却很难被视为是通过同样的方式进入藏缅语的，因为年代不符。最合理的一种解释是，印欧人不但曾进入黄河流域，将印欧语的因素带入当地，同时也曾进入更加西南的原始藏缅人的故地，将印欧语的因素留在了藏缅人的语言中。[79]

未来更深入的语言学研究或可澄清，早期上古汉语究竟是一种受到本地语言极大影响的印欧语，还是一种受到印欧语极大影响的东亚本地

语言。无论是哪种情况，印欧人及其语言都曾对中原地区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藏缅语族。[80]

伊朗语族征服中央欧亚

伊朗语族征服中央欧亚草原地带、中亚南部（今阿富汗）、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历史过程极不明朗。原始印度-伊朗人的文化被比定为考古学上的安德罗诺夫文化（Andronovo culture）。至迟在B组印欧语与其他印欧语分化（即印欧人第二波迁徙）之前，原始印度-伊朗语已经开始分化成原始印度语和原始伊朗语两支。古印度语属于B组印欧语。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B组印欧语与其他印欧语分化，其中古印度人向南方迁徙。在此之前，古印度语已经与原始伊朗语的主体（Proto-Iranian proper）[81]有明显不同。此时，伊朗人已经击败印度人，迫使其南迁，但不知为何他们很久以后才南下继续追击印度人。

古伊朗人后来将古印度人逐出伊朗。在青铜时代晚期（公元前12世纪）以后，伊朗和近东地区再无任何印度语的痕迹。考古发现显示，中央欧亚草原地带和中亚有河流灌溉的农业地带的早期居民是伊朗语族。这得到了最早的史料和语言学材料的支持。

考古学家普遍认可，位于中部草原地带、年代属于公元前2千纪的安德罗诺夫文化是印度-伊朗人的遗存。但不论这群人多么依赖畜牧，他们尚不是游牧民族。他们住在固定的房屋中，而不像后来的游牧民族般生活在车上或帐中。至迟在公元前16世纪，印度人已经从伊朗人中分化出去，迁徙离开。其后很久，继续留在草原地区生活的伊朗人才发展出骑马的游牧生活方式。[82]伊朗人第一次出现在史料中之前，就已经统治了整个中央欧亚草原地带。公元前835年，波斯人出现在历史记载中；公元前8世纪，米底人（Mede）出现。[83]生活在中央欧亚的伊朗人则直到公元前7世纪才见于史料记载：希腊和近东的史料记载了米底人在公元前7世纪的某个时间被斯基泰人征服以及斯基泰人从东面进入西部草原两事；后者也被考古发现证实。[84]

马、车与印欧人

年代最早的双轮车遗存出土于中央欧亚。其出土遗址是位于乌拉尔-伏尔加河流域草原地带南部的辛塔什塔遗址，年代约在公元前2000年。[85]文字记载双轮车最早在战争中应用则发生在公元前17世纪中叶。当时，赫梯国王哈图西里一世率军以双轮车破敌，在安纳托利亚建国。[86]赫梯东南方面的邻国米坦尼王国拥有一批操印度语的双轮车武士马里颜努人，他们擅长训练拉车之马。而当时在赫梯西面的迈锡尼希腊人是第二支使用文字的印欧人，他们使用双轮车纵横希腊。而此时在东方，一批操古印度语的双轮车武士侵入了西北印度。这一系列历史事件同时发生绝非偶然。

双轮车在当时绝对是一种复杂的工具。成功使用双轮车必备四种独立的要素，缺一不可：双轮车本身、高度受训的家马、驭手和射手。目前已知最早的双轮车武士都是印欧人，因此驾驭双轮车的技术很可能源自中央欧亚。那么，马匹和双轮车起源自哪里呢？

马原产于中央欧亚。野马在更新世曾向南扩散到巴勒斯坦一带，但它们后来被当地的人类灭绝。曾分布在东部草原地带的普氏野马与家马不同种。马被人类驯化的时间约在公元前2000年，至少应当早于它们开始被用于拉车。马应当不是在古代近东地区被驯化的，因为当地最早的马的形象都与战车一起出现。[87]此外，在赫梯人、米坦尼人和迈锡尼人使用马很久以后，古代近东当地的非印欧人政权才开始使用马。例如，在埃及的新王国，双轮车被视为从米坦尼引进之物。[88]对埃及双轮车遗物的研究显示，它们应是埃及人从南高加索引进的。

完全成形的双轮车至迟在公元前12世纪之前已经从西北方传入之前并没有车具的商代中原地区。其传入商朝的时间或许更早，因为最早的一批车具属于公元前13世纪，展现了商代的装饰风格，显然已经经历过本土化的过程。在与商人作战的外族中，也有使用双轮车者。拉车之马一定是随双轮车一起被引入中原的。[89]在商朝王室的墓地中，家马与人、车一起作为陪葬被埋葬。这种葬俗是一种典型的中央欧亚文化，直到公元前2千纪末叶，都为印欧人所特有。

家马可能在公元前2000年前就已经从中央欧亚被引入安纳托利亚和近东本土，但直到公元前17世纪，它们的数量还十分稀少。在公元前17世纪，各支印欧人乘双轮车之利，一举攻下尚未形成文明的中央安纳托利亚（赫梯人）、美索不达米亚北部（马里颜努人）以及希腊爱琴海地区（迈锡尼希腊人）。古代近东当地各语言中表示“马”的词汇几乎都借自一种印度-伊朗语。考虑到这些借词出现的年代均早于伊朗人出现在中央欧亚之外以前，这种语言只能是古印度语。古代近东各非印欧政权的文字资料还清楚地显示，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一种稀罕而昂贵的进口物种；当地人尚不会将马驯化以用作任何实际用途，或只将驯马作为一种竞技娱乐。[90]

最早出现的双轮车形象反映的是一种便于射箭的作战工具，而非王公们的仪仗车驾。坚实的证据表明，无论在何地，双轮车最初都被用作战车，只是在后来才渐被用于仪仗巡游，以示王权。[91]这在文学作品中也有明证。即使是年代较晚的作品如《伊利亚特》也写到，双轮车被用以将战士运往前线，显然是用作军事用途。[92]双轮车无疑也从一开始就被用于狩猎，或是因为驭手和战马可以在狩猎的过程中得到训练，或保持状态。在中央欧亚文化中，狩猎活动（尤其是大型的围猎）是获得食物的重要途径，十分重要。以战车狩猎和作战在操作上别无二致。[93]中央欧亚民族进攻敌人和进攻猎物的行动似乎没有明显的差别。

双轮车主要用于作战一事与双轮车武士被赋予的英雄形象形成互证。如果双轮车只充当仪仗车具，驭车之马夫何来英雄气概？如果双轮车单纯只用作御辇、象征王权，又岂容外人踏足，何况普通将士？后来的双轮车竞速比赛应是自战车训练演变而来。驭手需要训练作战技巧，并保持马匹状态，培养其在战场上不受外界干扰的能力。

双轮车

双轮车为一轻便的双轮载具，通常由两匹马牵引，载驭手一名、射手一名。它既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种复杂机器[94]，又是第一种先进武器。一驾真实的双轮车异常轻便，常人甚至可以单手举起空车。其车轮异常精细，因此双轮车不能长时间站立。在不使用双轮车时，车轴会被架起，以防车轮承重变形；或者直接将车轮卸掉，与车身分开存放。双轮车不能用来拖运沉重之物，[95]它最多能载两人，[96]仅此而已。因此，双轮车实际上只能用于作战、围猎，以及后来的仪仗。

双轮车的设计理念在于速度，其作用是让战士在战场上高速行进，因此只有用马来牵引，才能体现它的价值。设想在没有骑兵的年代，一队战车迎面飞驰冲向敌阵，锐不可当；车上射手万箭齐发，矢如雨下。这阵势足以让使用双轮车的军队所向披靡，让敌人闻风丧胆。双轮车在当时绝对是当之无愧的超级武器。

人类最早的车具比双轮车的出现还要早上数千年。与双轮车相反，早期的车异常沉重，行驶缓慢。它的四轮是树干的实心截面。[97]这种大车只能用成群的牛来拉动，运行的速度甚至慢于常人步行。它唯一的好处在于可以运输沉重、庞大的物件，这也是它能够一直被沿用到现代的原因。[98]

坐或立于车上指挥行进的方向是权力的象征。因此，车具也成为显示王权的一种方式：国王端坐在装饰堂皇的牛车上缓慢地经过他的臣民，接受朝拜。古代近东地区的其他民族[99]很快习得了牛车的制造和使用技术，争相效仿。原始印欧人也不例外。他们本就蓄养有大量的牛，正好派上用场。在整个印欧人的世界中，牛车成为王族御辇，象征王权。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中世纪。双轮车并没有取代牛车的这种功能。当然，有些统治者也以双轮车武士的英雄形象示人，这或是因为他们曾驾驭双轮车东征西讨、攻城略地。

根据考古学、语言学的证据以及其他方面的旁证可知，印欧人发明或完善了双轮车的可能性最大。已知最早的双轮车出土于南高加索地区，恰在赫梯和米坦尼故地之正东方。赫梯王国和米坦尼王国正是最早在战争中使用双轮车的政权。[100]而埃及人直到青铜时代晚期还需要从南高加索地区引进双轮车。双轮车起源于“新月沃地”（Fertile Cresent）某个非印欧古代文明几无可能。究竟是哪些人在哪里驯化了马，发明了双轮车？这个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印欧人是第一个将二者结合、运用到战争中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民族。在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15世纪，他们驾驭着双轮车出现在希腊、近东、印度和中国中原地区。在印欧人到达近东之前，人类利用由马匹牵引的双轮车作战的证据还未被发现。

双轮车武士

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印欧人应当还没有迁徙离开他们在中央欧亚的故地。在迁徙开始之后，他们迁徙的每一步都伴随着与其他民族的互

动。考古发现显示，在所有印欧语子语言流行的地区，之前都有人类定居的遗迹。塔里木盆地是唯一一个例外：在吐火罗人的祖先到来之前，尚未发现此地有人类遗迹。但在他们到达塔里木盆地之前，他们也曾在其故地与塔里木盆地之间的地带停留，那里就有其他民族生活。没有任何一支早期印欧人是在欧亚大陆上语言文化的真空地带迁徙的，他们都不能避免与各地原住民发生互动。

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印欧人曾经以武装进攻的方式侵入欧亚大陆的任何地区。原因很简单：他们并非通过这种方式迁徙进入其他地区。当然，与其他民族一样，他们后来也与周边的民族相互攻伐。在对外战争中，他们使用了一种全新的武器——双轮车，这是人类首次将双轮车投入到战场上。[101]

双轮车是结构复杂、加工精密的器械。制造或购买战车、训练马和驭手以及养护战车的成本极高。操作双轮车的人必须是专家。第二波迁徙的印欧人是历史上第一批养护和使用双轮车的专家，他们成功地将双轮车运用到实战中，所向披靡。各类史料中的记载表明，当第二波迁徙的印欧人已经在近东各地使用双轮车的时候，古代近东的原住的非印欧各民族对家马尚不甚了解，[102]更不必说驾驭双轮车了。[103]

当然，古代近东地区的诸王国在当时均已发展出复杂的国家机器。许多国家已使用文字。面对印欧人的迁徙，他们当然不会大开门户，束手就擒。由于他们既没有双轮车和战马，也没有善于驾驭战车的驭手和能够乘车作战的武士，面对印欧人的双轮车武士，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招纳一批同样会使用双轮车的印欧武士为其所用，“以夷制夷”。这种行为在客观上延长了印欧人对于驭马和使用双轮车等技术的垄断。尽管有关双轮车传入中原地区的证据主要来自考古发现，[104]但其历史经过应当也与上述如出一辙。

后来，古代近东地区的非印欧人最终掌握了养马、驯马以及使用双轮车等技术，但或许仍不能制造双轮车（现存最完好的青铜时代双轮车出土于埃及一处墓葬遗址。其车身材料全部产于南高加索，整车很可能是在当地制成的）。现存对双轮车用于战争的场面最为细致和完整的艺术表现见于一件时代较晚的埃及墙面浮雕。这件浮雕是为纪念公元前1274年拉美西斯二世在叙利亚卡迭什击退赫梯人而作。[105]但无论如何，埃及人已经从异族人那里得到了双轮车，并掌握了使用它的技术。同样，美索不达米亚人也终于克服了对马和双轮车的恐惧，将其用于实

战。这点在历史记载以及亚述人的墙面浮雕等艺术品中都有明证。[106]

终于，双轮车作为一种武器后来也被其他武器淘汰。入侵近东地区的海上民族善使标枪，其步兵在对阵双轮车时，可投掷标枪杀伤马匹和驭手，使双轮车威力尽失。海上民族凭此利器在近东地区摧枯拉朽一般消灭当地政权，结束了近东的青铜时代。[107]但双轮车却并没有从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赛车作为一种竞赛项目流传很久。在战场上，它们不再被用以冲锋陷阵，而成为统帅、名将或其他高级将士的座驾，是地位的象征。再后来，单骑战马几乎完全取代了双轮车的实际用途。但在中央欧亚的一些地区，它仍被用于统治者的祭祀仪式中，一直到中世纪晚期。[108]

---

[1]文本引自：http://www.sacred-texts.com/hin/rvsan/rv05056.htm，书5，赞美诗56。

[2]参看附录一。

[3]参看附录一。

[4]近来对于这点的理解谬误渐多，参看注释30。

[5]例如Lehmann（1993）。Mallory and Adams（2006:106）先给出了“公元前4000年”之说，又给出了“约公元前4500-公元前2500年”之说（2006:449）。两书也都谈到了各地方非印欧语对印欧语的影响。Lehmann（1993:281-283）的论说实际上暗合了前文所提到的“克里奥尔化”（creolization）理论，但他又批评了此说（见下文）。Mallory and Adams（2006:106）直接引述约翰娜·尼科尔斯（Johanna Nichols）的研究而未加讨论。两者都没能认识到原始印欧语与各地土语混合才是其分化形成各子语言的动力。Lehmann（1993:263）明确反对此理论，说：“之前，语言学家和考古学家将方言和语言的改变归结为外来民族的入侵……但现在已经很明确，公元前5千纪时的部族还没有足够的手段和人口去促成这种变化。”关于“克里奥尔化”理论，参看Garrett（1999，2006），Beckwith（2006a，2007c），附录一。

[6]Lehmann（1993:266）。

[7]他们的具体说法是在公元前3千纪末（Lehmann 1993:266）。

[8]Mallory and Adams（1997:297-299）列举并讨论了一些主要的说法。

[9]参看Garrett（2006），Beckwith（2006a）。关于语言中出现土语、社会方言等的历史证据，参看Lehmann（1973），Labov（1982）及其后续研究。

[10]关于印欧人迁徙路线的其他观点，参看Mallory（1989）及Mallory and Adams（1997，2006）。关于印度-伊朗语的问题，参看注释31和附录一。

[11]施罗德（Schrader）早在1890年就提出了伏尔加河中游为印欧人故地之说（Lehmann 1993:279）。参看注释32。

[12]Hock（1999a：13）；参看附录一。

[13]参看附录一、Beckwith（2006a、2007a）、Mair（1998）、Barber（1999）、Mallory and Mair（2000）。塔里木盆地的考古发现亟待进一步的学术研究，是研究原始印欧人和原始汉人考古、历史等方面问题的重要材料。

[14]参看Hock（1999a：12-13）。

[15]印度—伊朗人在其发展的重要阶段受到该文明的影响，参看注释33。

[16]参看附录一。如果未来能有更多的形态音系学的特征（尤其是借词）从B组语言中分离出来，这种非印欧语或许有可能被比定。Witzel（2003）讨论了该语言在印度—伊朗语中的借词。

[17]参看附录一。

[18]关于阿维斯陀语与印度-伊朗语的问题，参看附录一，注释31、33。

[19]参看Hock（1999a：12-13）的论说。

[20]据目前所知，操古印度语民族在伊朗人的压迫之下分成了两支。一支向西迁徙进入近东，另一支向东南迁徙，进入印度次大陆。参看Bryant（2001:134）。阿维斯陀语文献应当就属于这一时期操古代伊朗语民族与操古印度语民族激烈互动的产物，参看附录一。北疆地区的古族乌孙人或许是一支操印度语民族的后裔，参看附录二。

[21]参看附录二。

[22]根据传统的观点，即使在B组分化后，古印度语（吠陀梵语）和阿维斯陀语依然关系紧密，说明该组的形成和分化一定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的，这个问题可能是基于对阿维斯陀语的错误理解产生的，参见附录一。印度语和伊朗语中最古老的文本成文很晚的现实是印度-伊朗语研究中存在的许多重要问题之一,在这一领域中有太多事实不符合理论。

[23]其他几种在第二波迁徙中分化出来的印欧语出现得较晚，有意大利语（公元前1千纪早期）、日耳曼语（公元前1千纪晚期）和亚美尼亚语（公元1千纪初）。

[24]古凯尔特语和古伊朗语最早出现在公元前1千纪，古斯拉夫语至迟出现于公元1千纪中叶，但波罗的语和阿尔巴尼亚语直到公元2千纪后半叶才见于记载。阿尔巴尼亚语的历史发展过程尤其不为人知。

[25]关于所谓“印度-雅利安人迁徙之争”，参看Bryant（2001:134）。此争论的产生有两个原因：一是不懂语言学；二是背后有政治目的。后者跟语言或历史都没有关系。对在印度风头正劲的“本地印度-雅利安人”观念（Bryant 1999，2001）的科学语言学批判，参看Hock（1999a）。

[26]Nichols（1997a，1997b），Garrett（1999，2006），Beckwith（2006a）。

[27]青铜时代晚期生活在西部草原的居民，如斯基泰人之前的辛梅里安人，畜养牛、绵羊、山羊、猪和马。其中，牛是他们最主要的家畜。这是古代印欧人一直保持的传统。这种情况在铁器时代早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此时草原地区居民的主要家畜变成了绵羊和马。而猪在森林和森林-草原混合带被广泛饲养。同时，家猫和驴开始成为家畜（Rolle 1989:100-101）。

[28]Mallory and Mair（2000:138-139）。

[29]对旧石器时代的研究表明，中原地区的小麦、家养绵羊和马的品种都是在公元前2000年之后不久从西方传入的。关于家马的引入，详见注释34。

[30]参看附录二。

[31]CAH I.2:833；EIEC 13。在卡内什（今土耳其灰山）出土的亚述语文书中出现了一些赫梯语词汇。文书可定在公元前19世纪（Bryce 2005:13，21页起）。这证明印欧语在公元前2千纪之初已经在安纳托利亚流行（Melchert 1995:2152）。Bryce（2005:23）还列出了卡内什文书中所出现的“带有安纳托利亚语人名的房屋主人”，如Peruwa、Galulu、Saktanuwa、Suppiahsu等。但是，这些证据并不能说明在公元前19世纪以前印欧人已经到达了安纳托利亚。关于最早出现的印欧人，参看注释35。

[32]Bryce（2005:68）。

[33]EIEC 15。赫梯人原本的族名不明。关于其族名及其语言，参看注释36。

[34]CAH　1.2:831。安纳托利亚语族已知的其他语言［主要有卢维语（Luwian）、帕莱克语（Palaic）、吕底亚语（Lydian）和吕西亚语（Lycian）等］均晚于赫梯语出现。还有学者认为卡内什文书中的人名就是卢维语，但难以服众。

[35]Drews（1988:94）。

[36]参看Bryce（2002:21-23；2005:109）。关于赫梯与斯基泰墓葬习俗的相似之处，参看Rolle（1989:34）。

[37]这一问题有待赫梯学家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阐释。

[38]赫梯语中似乎并没有保留原始印欧语中表示“车”的词汇。这或可说明这批印欧人是在向安纳托利亚迁徙的过程中，或在到达那里之后才拥有了双轮车。参看Hock（1999a：12）。但现存有关赫梯人及赫梯语的信息还十分有限，许多问题尚难有定论。

[39]Drews（1993:106；2004:49）。特洛伊6号（Troy　VI）遗址的居民应当也说安纳托利亚语。他们也使用双轮车。“建立特洛伊6号的这群人将马带到了安纳托利亚西北部。至少在此城尚被使用期间（约公元前1700-公元前1225年），他们不但用马拉车，还吃马肉。”（Drew 2004:55。）因为在中央欧亚以外几乎没有任何民族食用马肉——尤其在古代近东地区更是如此——这或可说明这群人自中央欧亚迁徙而来；参看（Drew 2004:44）。

[40]Bryce（2005:333-340），Drew（1993:8-11），Oren（2000）。

[41]Bryce（2005:347-355）。其他的安纳托利亚民族一直存在到希腊-罗马古典时代，当然他们不如赫梯人有名。

[42]在今土耳其安卡拉东150千米的博阿兹科伊（Boğazköy）村。地图及照片，参看Bryce（2005:43，45，84）。关于此城的详细研究，参看Bryce（2002）。

[43]Burney（2004:204）指出：“米坦尼王国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其中的一支有非胡里安因素。在语言上，他们明显操印度-雅利安语。他们在政治上非常有影响力，在以胡里安人为主体的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米坦尼王族也都出于这一群人，因为他们的名字全是印度-雅利安语。”

[44]关于此词之词源，参看注释37。

[45]Freu（2003）。

[46]在中央欧亚政权中，除君主之外，许多贵族通常也都拥有一支私兵队伍。米坦尼王国这支由驾着双轮车的射手组成的私兵队就是公元前1千纪中央欧亚由骑兵射手组成的私兵队的前身。

[47]Freu（2003:19）。该文指出：“所有的统治者都有吠陀语名，只能用梵语来分析。”

[48]Witzel（2001）也提出了相似观点。

[49]参看Freu（2003）。书中给出了关于米坦尼国王、武士阶层及其亲属所操之古印度语的翔实的论著目录。这种语言以人名和散见的借词的形式在公元前2千纪的黎凡特地区流传。参看EIEC　306。一如东亚的某些学者极力否认或试图淡化早期印欧人侵入该地区的证据，一些研究古代近东的学者也试图忽视上述材料，例如Van de Mieroop（2004:112-117）。

[50]前文已述，从其族名判断，生活在北疆和伊犁河谷地的古族乌孙*Aśvin或许是古印度人在中央欧亚的一支余部。应当将其人名、官称等从印度语言学的角度重新检查一遍。参看附录二。

[51]Freu（2003:221-223）；Van de Mieroop（2004:121）。

[52]普遍认为，古印度语之侵入印度发生在公元前2千纪前半叶西北印度的哈拉帕文明

（Harappan civilization，或称“印度河谷文明”，即Indus Valley civilization）突然衰落之后。而吠陀现在已被认为是在旁遮普地区汇编而成。现在对于这些问题的争论大都带有政治目的，多数论著不可轻信。参看注释38。

[53]传统上认为，《梨俱吠陀》是最古老的印度语文本（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文本的集合）。实际上现存最早的版本仅出现于约1000年前。参看附录一。

[54]参看注释37。Witzel（2001）。

[55]根本没有所谓的“纯”印度-雅利安文化或“纯”土生文化可以保存下来。它们早已互相融合，正是这种混合文化创造了后来的印度文明。

[56]Drews（1988:21-24）。詹姆斯·穆利（转引自Drews 1988:23）指出：“史前希腊文化在公元前7世纪后半叶发生重大转型，这一时期的代表文化即迈锡尼的竖穴式墓葬。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希腊青铜时代中期贫瘠的文化能够突然产生出如此巨大的财富。”

[57]Garrett（1999）。Mallory（1989:66-71）持类似观点：“以我们对希腊语方言现有的认识推测，印欧人可能在公元前2200-公元前1600年进入希腊，成为后来的古希腊人。”用以书写迈锡尼希腊语的文字系统——线形文字被文屈斯（Michael Ventris）于1954年天才地破译。在此基础上，他与查德威克（Chadwick）开始解读迈锡尼文献。参看Chadwich（1958）。迈锡尼文献提及双轮车及部件清单、箭镞以及其他军事设备等。

[58]关于迈锡尼竖穴式墓葬和赫梯故城卡内什出土的双轮车图像的不同意见，参看注释39。

[59]关于最早的“华夏”国家的起源、位置和范围，以及汉语的起源，参看注释40。

[60]Bagley（1999:202页起）。

[61]Bagley（1999:207）。这批双轮车出土于今亚美尼亚的拉夏辛（Lchashen），即高加索山脉西南、塞凡湖畔。战车的年代被定在公元前2千纪中期。李安敦（Barbieri-Low 2000:38）将其与形制惊人类似的商代战车进行比较。目前所知近东地区最早的双轮车和双轮车武士出自赫梯王国和米坦尼王国，它们正在拉夏辛的西侧。李安敦（Barbieri-Low 2000:37-39）认为，近东地区的双轮车起源于草原地区的一种小型战车。这种战车的代表型出土于属于辛塔什塔-彼得罗夫卡（Sintashta-Petrovka）文化的墓葬中，即今哈萨克斯坦西北、俄罗斯南部的乌拉尔山区南部，而殷墟所出较大型的战车与拉夏辛出土的战车同源。

[62]Bagley（1999:207）；Barbieri-Low（2000:42-43）。

[63]Piggott（1992:63），Shaughnessy（1988）。关于“本土发明”说，参看注释41。

[64]李安敦（Barbieri-Low 2000:19页及后文）注意到与战车一起下葬的是“青年男子”。一般多认为随葬者为官员，这就与死者年纪尚轻、随身带武器的事实不相符。

[65]李安敦（Barbieri-Low 2000:22）指出，“多数情况下，每一个车马坑中有1人到3人殉葬……无一例外，都是男子（20~35岁）”，“这些男子（20~35岁）常配备兵器、青铜制缰绳把手、玉制或青铜制马鞭握手等，他们可能就是实际使用马车的驭马官和武士”（Barbieri-Low 2000:32-33）。关于中央欧亚型兵器，参看注释42。

[66]虽然人们普遍认为青铜冶炼技术的重要因素是在公元前2千纪从西北传来的，但一些汉学家认为中国青铜冶炼技术革命性的改变发生在公元前15世纪到公元前14世纪，源于本土铸造技术的提高和生产规模的扩大。（Bagley 1999:136-142页及以下。）

[67]关于汉字的结构及起源，参看注释43。

[68]Bagley（1999:207-208）。

[69]参看Beckwith（2002a，2006c）。

[70]关于“姜”姓与“羌”的关系及其词源，参看注释44和附录二。

[71]关于古汉语“马”的语音重构，参看注释45。

[72]关于古汉语“车”的语音重构，以及古藏文表示“轮子”“车”的单词的语音重构，参看注释46。

[73]对当下主流观点的批评，参看注释47。

[74]Keightley（1999:277）。

[75]所有反对商代进入中原的外来民族为印欧人的观点都忽视了这则事实。很遗憾，现在还没有学者能足够准确地重构上古汉语音系，因此还无法判断外来文化的影响达到何种程度。

[76]所谓“混合语”（mixed　language）的理论已经受到批驳，参看注释48。因此，仅剩余上述两种可能。

[77]Beckwith（2006a；23-36）；参看Nichols（1997a，1997b），Garrett（1999）。

[78]同时，两种语言间缺乏规则的形态音系或句法对应。这一问题也已被指出（Beckwith 1996，2006a）。

[79]这种假说还可以圆满地解释为何汉语中本用来指称印欧人的“羌”后来被用来指称藏缅语族。眼下最为棘手的问题是缺乏原始藏缅语的准确重构。尽管有很多瑕疵，但本笃在著作（Benedict　1972）中给出的“原始文本”是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一次严格基于语言学的材料和方法对原始藏缅语进行重构的尝试。

[80]相关的类型学的问题，参看Beckwith（2006a：1页起；2007b：189）。

[81]即除了阿维斯陀语之外的原始伊朗语，参看附录一。

[82]Di Cosmo（1999a，2002a），Mallory（1989），EIEC 308-311。

[83]EIEC 311。

[84]EIEC 311。

[85]EIEC 311，520-521。

[86]Burney（2004:64-65）。最初，赫梯人一车配一名驭手和一名射手。这与其他最早使用战车的民族的做法一致。但在公元前1274年卡迭什（Kadesh）之战时，赫梯人的一车人员已经增至三人——新增一名盾牌手，负责防御（Bryce　2002:111）。当然，这种说法成立的前提是埃及浮雕所描绘的战争场景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战争。从公元前17世纪开始，战车武士还见于赫梯作战人员的名录中（Burney 2004:64）。

[87]扬森（Jansen）等人基于对家马线粒体DNA（脱氧核糖核酸）的研究认为（Jansen　et al.：2002，10910）：“尽管有观点认为，马早在公元前4500年就在伊比利亚和欧亚草原被人类驯化，但目前最早的确证是在乌拉尔草原辛塔什塔出土的公元前2000年的马车墓葬。”他们在谈及公元前2千纪中叶双轮车在欧亚大陆各处突然出现时指出：“关于马的知识以及最早被驯化的马应当也在同一时期随着双轮车向外传播，种马沿途与当地的母马交配，从而形成我们今日各地马的DNA簇。”关于辛塔什塔出土的战车的相关争论，参看注释49。

[88]Burney（2004:65）。

[89]原始吐火罗人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引进了马，但应当是作为肉畜饲养，见上文。

[90]Drews（2004）。

[91]Contra　Littauer　and　Crouwel（2002）。双轮车最先并非用于王室仪仗的另一个原因是，尖端的技术一定优先用于军事用途，而非其他。

[92]《伊利亚特》对双轮车用途之描述并不符合青铜时代晚期的历史。当时双轮车仍是非

常重要的战争武器。参看Drews（1988:161页起）。

[93]参看Allsen（2006）。

[94]制造一驾双轮车需要许多专门的技艺，最重要的是有关设计和如何使其运转的知识。双轮车使用带有辐条的轮子，它的设计与牛车（oxcart）相反。它与早期的双轮牛车也没有太紧密的联系。双轮牛车有着完全不同的设计，以及与四轮牛车一样的缺点。

[95]参看Littauer and Crouwel（2002）。因此，双轮车在平时无法被用来运输民用物资（Bryce 2002）。

[96]后来，一些双轮车被加大、加固，以装载3人或4人（Lttauer and Crouwel 2002）。如此一来，战车势必变得缓慢、笨重。

[97]最初，人类以整个树干作为轮轴（wheel-axle）。最初的车轮显然由此加工而来。——译者注

[98]佩戈洛蒂（Pegolotti 1936）将其列为蒙古时代晚期丝绸之路商人的运输方式之一。他还记载了每种运输方式可以承载的货物总量及以此种运输方式走完他所记的路程中的某一程所需的时间。

[99]最早的四轮牛车发明于近东。——译者注

[100]考古发现表明，迈锡尼希腊人的竖穴式墓葬遗址与北高加索草原的文化有关联。这正好可以说明为何希腊人很早就有了双轮车；详见前文。

[101]Van de Mieroop（2004:117）。

[102]参看Drews（1988:74页起）所引史料。

[103]中原地区出土的双轮车亦如此。已经有学者（Barbieri-Low 2000:47）指出，用马牵引的双轮车是过于复杂的机器，新手根本无法驾驭，想要仿制成功更是难上加难。

[104]还有语言学的证据，参看注释46。

[105]实际上，双方在卡迭什一战中平分秋色，但后来赫梯人在国王穆瓦塔里（Muwatalli）的率领下最终战胜埃及。关于此役及其后续，参看Bryce（2005:234-241）。

[106]双轮车后来也一直难以被古人割舍。在丧失军事价值之后很久，它仍被用作高级军士的座驾、军队的指挥中枢，抑或将帅甚至王公巡游检阅时的座驾。它还被用于竞速比赛中。

[107]Drews（2004）。

[108]直到近代以前，西藏地区几乎不使用车。但吐蕃赞普下葬之前，都要以车载其遗体巡游（Walter 待刊），正如斯基泰统治者死后的仪式。斯基泰墓葬所出车具照片及研究，参看Rolle（1989:24-25）。波兰人本笃（Benedict the Pole）在1245年曾到访拔都汗的大帐，他见到“一驾双轮车载有可汗的金制雕像，供人们朝拜”。无独有偶，柏朗嘉宾（Carpini）在贵由汗的朝廷也见到类似之物（Allsen 1997:62）。

第二章　贵种斯基泰人

在百流交汇的麦奥提斯（Maeotis）两岸，

亚马孙骑兵已经严阵以待。

他从希腊各地延揽一众豪杰，

驶过危机四伏的汹涌海面，

来夺那绣金的锦袍，

那巾帼女将无袖的短袍：

为夺战神的腰带[1]将有一场恶斗。

——欧里庇得斯，《赫拉克勒斯》[2]

第一个草原帝国与丝绸之路形成

公元前1千纪之初，随着骑马技术的日益完善，马背上的游牧生活方式及与之相关的技术发展成形，[3]游牧的北伊朗人成为中央欧亚的核心地带——草原地区的主人。在公元前1千纪中叶，斯基泰人——有史记载的第一个草原游牧民族——迁徙进入西部草原地区，在那里建立起势力范围。草原上其他的伊朗人则向东迁徙，最远的到达今中国境内。[4]

尽管斯基泰人以其骁勇善战而广为人知，但他们在历史上最大的贡献是创建了一个将希腊、波斯以及东方各地联系起来的贸易体系，他们也因此获得巨额财富。古往今来的史家一概将古代中央欧亚民族写作贪得无厌之人，其实不然。他们热衷于贸易的主要目的是维系其社会政治秩序。中央欧亚政权的核心是统治者加上他的私兵队伍。私兵队伍的人数常常成千上万，以贸易所得的财富赏赐私兵是维持统治的根本途径。斯基泰人、粟特人、匈奴人等早期中央欧亚民族对贸易的热衷直接导致了一条熙熙攘攘的商路在中央欧亚的大地上出现。他们对贸易的兴趣在早期的希腊文和汉文史料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在斯基泰人之前，有些地区间的远途贸易已经存在千年之久，但直到斯基泰时代，远途贸易才真正形成规模。因为中央欧亚民族与周边各民族，包括欧洲、近东、南亚和东亚的许多民族往来贸易，他们客观上促成了周边各文明通过中央欧亚建立起间接的交流。

在斯基泰人极盛之时，其周边的上古时代盛期的城邦文明也达到了它们的顶峰。古代希腊、印度和中国的经典哲学作品几乎在同一时代创作完成，这或许暗示，当时在这些文明之间已经有了文化上的交流。而当时中央欧亚也有哲学家的事实常常被学界遗忘。

斯基泰人在西部草原所建的帝国和贸易网络为后世在中央欧亚陆续建立的国家树立了榜样。中央欧亚民族日益增长的财富和实力，以及他们与周边文明日益频繁的接触，常常招至周边政权的入侵，而周边政权最常用的借口是：中央欧亚民族侵略在先。已知最早的一次入侵发生在公元前979年。当时周朝两次击败鬼方，俘获包括四位首领（皆被斩首）在内的1.3万余人，所获战利品无数。[5]自那时起，中原王朝一有

机会便入侵东部草原地区[6]，一直到近代。阿契美尼德波斯人在大流士治下征服巴克特里亚和粟特，并在公元前514-公元前512年进攻斯基泰人。马其顿人和希腊人在亚历山大大帝的率领下于公元前4世纪末叶进攻中亚。这两波入侵对中亚地区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伊朗语族在中央欧亚和伊朗建立政权

至迟在公元前1600年前后，伊朗语族已经称雄中央欧亚。当时，B组印欧人（在伊朗语族的压迫下）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希腊爱琴海地区、印度次大陆以及中国中原地区。虽然考古学、历史学和语言学的证据都表明，早在公元前3千纪，就有人类因为当地气候不适宜农业，转而采取简单的游牧生活方式，但学界普遍认为，“马背上的”草原游牧生活方式是在公元前1千纪早期由草原地区的伊朗语族首创。[7]伊朗语族未必是最早骑马的人，但他们是第一批将骑马变成日常生活一部分的人，而不再仅仅是一种冒险或杂技活动。[8]除了一些研究古代近东的学者，常人实难相信，印欧人会是最后一批学会骑马的人。他们很可能最早驯化马。据古代近东地区的史料，他们是最早的驯马专家。已知最早的几乎完全采用骑马射箭的方式作战的民族便是生活在中央欧亚的伊朗语族。他们依靠这种方式作战，在数个世纪中罕有敌手。[9]

公元前9世纪的亚述文史料或许就已经提到了波斯人。[10]但对伊朗语族最早的明确记载则是一个世纪以后对米底人和斯基泰人的记载。

在公元前8世纪晚期，伊朗语族的一支——米底人在伊朗高原西北的厄尔布鲁士山区及以东地区建立政权。到公元前7世纪初叶，他们已经是亚述人的头号大敌。就在此时，辛梅里安人（Cimmerian）和斯基泰人攻入米底，迫使米底人称臣纳贡（或直接灭掉了该政权）。[11]

斯基泰人为伊朗语族之北支（或所谓的“东支”）。希罗多德本人曾亲自到访奥尔比亚城（Olbia，在布格河河口附近）等斯基泰人治下之地，[12]据他所记，斯基泰人自称Scoloti，波斯人称其为Saka，亚述人则称其为Iškuzai或Aškuzai。这些名字都可与其希腊语之名Scytha-勘同，可还原成北伊朗语*Skuδa，意为“射手”。[13]“斯基泰”是所有生活在草原地区的北伊朗人各部的总称，他们的势力范围西起希腊，东到华夏文明的边缘。

有关辛梅里安人的史料很少，他们被认为是伊朗人的一支。公元前8世纪后期，他们侵入古代近东地区，先于公元前714年击败乌拉尔图人（Urartu），其后又西向进攻弗里吉亚人（Phrygian），于公元前696

年左右灭其国。后来，亚述国王埃萨尔哈顿（Esarhaddon，公元前681-公元前669年在位）率军击败辛梅里安人，挫其锋芒。公元前652年，辛梅里安人又进攻吕底亚，击杀其国王巨吉斯（Gyges）。但其后不久，约在公元前7世纪30年代，他们即被斯基泰国王马杜厄斯（Madúês）[14]率大军击败。希罗多德写道："（斯基泰人）为追杀辛梅里安人而进入小亚细亚。他们沿途击败了米底人。在斯基泰人到来之前，米底人是小亚细亚的霸主。"[15]这条史料与后世许多中央欧亚民族的立国战争如出一辙，比如匈奴追剿月氏、匈人追逐哥特人以及突厥追杀阿瓦尔人等。

斯基泰人在近东地区四处作战，其军队出现在从安纳托利亚到埃及的各个地区。他们通常（或都是）作为亚述人或其他民族的盟军参战。"在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埃及等地属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初的各处遗址中都可发现斯基泰人的青铜箭镞，在城市的外墙遗址处尤多——其攻城、围城的明证。"在乌拉尔图王国北方的重镇卡尔米尔-布鲁尔（Karmir-Blur，在今埃里温附近）的泥墙中也出土有斯基泰人的箭镞，此城即为斯基泰人所毁。[16]在公元前585年，米底人终于将斯基泰人击败，[17]迫使其残部退回北方。

米底人随后又出兵助巴比伦人进攻亚述得手，亚述帝国覆灭。在公元前585年前不久，米底将其西北方面的乌拉尔图王国残余的势力彻底消灭，扩张其版图至安纳托利亚西部和叙利亚北部。[18]可惜好景不长，在公元前553年或公元前550年，波斯人在居鲁士的率领下攻灭米底王国，吞并其土地，建立起波斯帝国。[19]居鲁士挥师攻下伊朗和安纳托利亚。公元前539年，他又率军攻灭巴比伦王国，将除埃及和阿拉伯以外的整个近东地区纳入版图。其后，波斯大军的兵锋又转向中亚。在公元前530年或公元前529年，居鲁士亲征北伊朗人的一支马萨格泰人失利，兵败被杀。马萨格泰女王按草原民族的传统，将其头骨做成酒杯。[20]

西部草原：斯基泰人和萨尔马特人

据希腊文史料记载，在斯基泰人到来之前，辛梅里安人是黑海草原的主人。关于他们的记载主要见于斯基泰人入侵之前或同时代的近东史料中。斯基泰人被米底人击退以后，败走北高加索草原地区。他们从米底、乌拉尔图、亚述等近东政权获得了大量财富，习得了中央集权的制度和作战的经验。利用这些资源，他们在草原地区征服各部，建立起帝国。斯基泰人很快将整个西部草原纳入其帝国的版图，其势力范围东起高加索西部，西达多瑙河流域。其帝国的西部包含有大片农耕地区，当地居民以色雷斯人为主。

如希罗多德所记，斯基泰人以其草原地区的大本营为中心，经营着一个业已存在的长途贸易网络。他们发现黑海沿岸各希腊殖民城邦以及希腊本土的希腊人都愿意以黄金换谷物，即开始同希腊人进行这项收益颇丰的贸易。[21]他们对奢侈品（尤其是黄金）的需求与日俱增。斯基泰贵族通常以大量做工精美、表现鸟兽形象的金器随葬。有些随葬金器在过去的千百年中躲过了盗墓的浩劫，留存至今，成为俄罗斯和乌克兰各博物馆的顶级藏品。斯基泰本土不产黄金，因此当地所出土的黄金全部是进口所得。考古发现证明，有些黄金的产地甚至远在阿尔泰山区。[22]这条黄金之路是早期东西方大陆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前所述，斯基泰人的社会政治体制包括私兵制。希罗多德曾生动地记录了一场斯基泰私兵的人殉仪式。这种仪式也被考古发现证明。[23]

希罗多德称斯基泰帝国之下有几个不同的部族，他分别记述。他所记的斯基泰民族起源神话或可说明斯基泰人被分为三个部分：[24]

古时候，此国还是一片荒漠。一个男子降临此地。他名唤塔尔吉塔欧斯（Targitaus），他的双亲据说是……宙斯和包律斯铁聂斯河（Borysthenes，即第聂伯河）河伯之女。这就是塔尔吉塔欧斯的身世。他有三子：里波克赛司（Lipoxaïs）、阿尔波克赛司（Arpoxaïs）和斯考洛克赛司（*Skoloxaïs）[25]。在他们统治的时代，有神奇的金器从天而降：一副轭、一副犁、一柄剑，还有一口杯[26]。长子看到金器，便上前去取。当他靠近时，金器燃起烈焰，他无奈作罢。次子靠近时也

遇到同样的麻烦，也只能退后。最后，当幼子去取时，金器上的火焰熄灭，他取得金器，带回自己的家中。至此，他的二位兄长明白了天命所归，将全部的权力交给了他。[27]

据说，里波克赛司正是斯基泰人中奥卡泰伊（Auchatae）这一部的先祖；二子阿尔波克赛司是卡提亚里部（Katiari）和特拉司披耶司部（Traspians）的先祖；幼子（即国王）则是帕辣拉泰伊部（Paralatae）的先祖。各部共同的族名则用国王之名“斯考洛克赛司”；希腊人则称其为“斯基泰”。[28]

根据神话的内容判断，希罗多德对四件金器的解说是错误的。虽然四件金器都为幼子所得，但它们实际上分别对应三子所统领的四部斯基泰人。它们也对应了希罗多德所记的这四部斯基泰人分别所事之业：犁对应的是农耕斯基泰人，轭对应的是畜牧斯基泰人，剑对应贵种斯基泰人，他们将酒杯留给游牧斯基泰人。[29]

希罗多德的《历史》以及其他的史料都记载，贵种斯基泰人是斯基泰各部的统治阶级。这些武士占有大部分财富。他们“是斯基泰各部中人数最多、最善战者，视其他各部如奴隶”。处在贵种斯基泰人之下的是游牧斯基泰人。他们或许只是没有贵族血统，生活方式应当与贵种斯基泰人一致。畜牧斯基泰人被希腊人称为Borysthenites。农耕斯基泰人从事农业生产，耕种谷物，“但并不为自己消费，而是为了出售”。尽管希罗多德有记载，但各部斯基泰人的具体分布情况却并不十分明晰。克里米亚及以西的地区应当主要是农耕斯基泰人生活的区域。这片肥沃的黑土平原至今仍是农业高产之地。而其东边开阔的草原地带应当主要分布着游牧的部族。

此外，希罗多德还记载了生活在斯基泰帝国中的许多其他的部族。他们是斯基泰人，或是半斯基泰人，或是非斯基泰人。比如“卡里披达伊人（Callippedae），他们是斯基泰希腊人。在卡里披达伊人之外则分布有阿拉佐涅斯（Alazones）部落。这两部人种植谷物、洋葱、大蒜、小扁豆和黍，并以这些作物为食。除此以外，他们与斯基泰人没有什么不同。在阿拉佐涅斯部落的上方居住着斯基泰农民。他们种植粮食，但并不为自己食用，而是为了出售。住在他们北方的是涅乌里人（Neuri）。据我们所知，涅乌里人之地再往北便是人迹罕至之地了”。[30]考古学研究表明，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和其他一些生活在斯基泰领土上的居民并非北伊朗人，而是色雷斯人。他们应当说色雷斯语，或其他

非伊朗语。

虽然实际情况更为复杂，但斯基泰社会中的居民在理论上被划分为四类，其上再加一个君主。这是中央欧亚政权理想的组织形态，至少延续到蒙古帝国时代。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统治阶级视其他各部民众为“奴”[31]，这种观念同样被后世其他的中央欧亚民族沿用。

希罗多德将斯基泰人描述为“纯粹的游牧民”[32]：

我对斯基泰人的其他方面不以为意，但有一件事却令人叫绝：凡是入侵斯基泰的敌人一个都别想脱逃。而只要斯基泰人想退，没人能追得上他们。他们没有固定的城市、堡垒，随身带着生活必需品，走马骑射；不依靠种地，而依靠畜牧为生，以大车运载庐帐。[33]这样的一群人怎能不战则所向披靡，退则望尘莫及？他们的这套风俗与当地的地理特点相辅相成。因为当地地势平旷，水草丰盛，河道纵横，在数量上堪比埃及的运河。

希罗多德的记载是现存最早的对中央欧亚游牧民族的描写，但其中已经包含了一些具有误导性的信息，构成了人们对中央欧亚民族根深蒂固的偏见，一直到今日。和同样来自周边文明的同时代的和后世的其他史家一样，希罗多德被游牧的生活方式深深吸引。在斯基泰境内同样存在着广泛的农业生产活动，对此他却没有多着笔墨。他也没有解释为何斯基泰人保有许多城市，比如盖洛诺斯（Gelonus）城。此城位于布迪尼人（Budini）所居的草原北部边境。布迪尼人则是为数众多的斯基泰部族中的又一部。他写道：

布迪尼人为数甚众。其人明眸红发。他们有一座以木材建造的城市，名作盖洛诺斯。城墙每一边长30斯塔迪昂（stadia，即furlong，译作“弗隆”）。城墙高大，纯为木制。他们的房屋、神殿也为木制。有些神殿供奉着希腊的神明，建有希腊风格的神像、祭坛、神龛，皆为木制。他们每两年便有一次节庆狂欢，以祭拜狄奥尼索斯。盖洛诺斯人源出希腊。他们早先离开之前生活的贸易港口，来到布迪尼人之地定居。他们的语言是希腊语和斯基泰语的混合语。布迪尼人的语言和风俗皆与盖洛诺斯人不同，他们是原住的游牧民族，也是这一带唯一食用枞果的部族。盖洛诺斯人是耕耘土地的农民，食用谷物，且有田园。他们的体型和面相皆与布迪尼人大不相同。希腊人也称布迪尼人为盖洛诺斯人，谬矣。（布迪尼）之地密布森林，生长有各种树木。在密林深处有一大

片开阔的湖泊和沼泽，周围长满芦苇。水中可以捕到水獭和河狸。[34]

盖洛诺斯城已被考古学家发掘。其遗址在今别尔斯克（Belsk），正位于草原地带的北边。这是一个面积为40平方千米的聚落。“高大的防御性长墙（长达33千米）[35]和遗址巨大的面积都显示出此地当年的重要地位。此城正当草原地区和森林-草原地区的分界处，当年应是扼守南北贸易交通的门户。而当地出土的手工作坊遗址和为数众多的希腊陶器（年代在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可充分印证这点。”[36]

波斯人和希腊人显然被斯基泰人的富庶吸引，而忽视了他们高超的作战技能，终于决定铤而走险。希罗多德称，大流士为了复仇而出兵讨伐斯基泰。谬矣。大流士征伐斯基泰纯粹是为了抢夺财富。

居鲁士的继任者冈比西斯与其兄弟阋墙，大流士（公元前521-公元前486年在位）趁机夺得王位。他将波斯帝国的版图进一步扩大：在西南吞并埃及，在东南吞并西北印度，在东北则占有中亚。他在北方的扩张受到了草原上的伊朗语族诸部——塞人和斯基泰人[37]——的抵抗，在西方则遭到了希腊人的阻挡。公元前520-公元前519年，大流士击败塞人（所谓“亚洲的斯基泰人”）并擒获塞王斯库卡（Skuka）。之后，他不顾群臣反对，决定出兵斯基泰，意欲吞并之。大流士命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架起浮桥，以便渡海到达色雷斯。他又命令被他征服的爱奥尼亚希腊人航行到多瑙河，并溯河而上，到河口分叉处架桥。

公元前513-公元前512年[38]，大流士亲率大军出征。据希罗多德记载，出征将士超过70万人。波斯大军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征服色雷斯之地，直抵多瑙河畔。[39]大流士于是引军渡过多瑙河，向东进入斯基泰之地，留爱奥尼亚军守桥，保其归路。波斯大军开始在茫茫的草原上追逐斯基泰人，欲毕其功于一役。但斯基泰人采用中央欧亚民族经典的游击战术，避实就虚，以退为进，[40]引诱波斯大军向草原深处行进。在草原深处，波斯人既没有城市可以攻占，也没有物资可以抢夺。大流士恼羞成怒，竟遣使往斯基泰王伊丹图尔索司（Idanthyrsus）处，要他或战或降，莫再窜逃。据希罗多德所记，斯基泰王如是答道：

波斯人，我告诉你：我从未因为惧怕谁而逃跑，我也不是因为怕你而逃跑。我这次的行为与我平日所为并无二致。至于我不和你直接对阵的原因，我也可以告诉你：我们斯基泰人既没有城镇，也没有耕地，从不担心城镇被夺，田地被毁，所以你们来便来，我们也不急着迎战。如

果你们别无所求，偏要一战，那也罢，我们还有祖坟。来找我们的祖坟罢，你有胆刨了我们的祖坟，你便知道我们敢不敢一战！否则我们才不出战！[41]

大流士最终不得不退兵，沿其进军线路留下了一些要塞。这次远征他一无所获，却让斯基泰人善战之名更加响亮。

另一方面，大流士及其后代诸王与希腊人的战争一直延续到亚历山大大帝的时代。在征服黎凡特和埃及之后，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34年剑指波斯帝国。最终，他击败大流士三世（公元前336-公元前331年在位）。公元前330年，大流士三世死于中亚。之后，亚历山大自封波斯皇帝。他征服了波斯帝国的全境，包括巴克特里亚和粟特。为巩固其在中亚的统治，他于公元前327年迎娶了巴克特里亚公主禄山娜（Roxana）。

或出于对斯基泰人武力的忌惮，亚历山大未曾计划进攻斯基泰。他的军队主要由训练精良的马其顿和希腊步兵组成，其马其顿方阵在当时所向披靡，但他的骑兵人数很少。击败一个全面机动的游牧民族的唯一途径是拥有一支正规的游牧民族式的骑兵队伍。而他有限的骑兵根本无法在草原地带与游牧民族的骑兵匹敌。尽管骑兵曾助他在近东各地作战时大杀四方，但进入草原地区和游牧民族对决并非上策——大流士可资殷鉴。

斯基泰人之后兴起的是萨尔马特人。他们也说一种北伊朗语，与斯基泰人的语言相近。萨尔马特人最有名之处是女性在其社会中有很高的地位，其军中有女性战士。据希罗多德记载，这些女性战士在斯基泰语中被称为“男人屠”（Oiorpata）[42]。女性在萨尔马特社会中不同寻常的地位被希罗多德注意到，并被后来的考古发现证实。这与极度重视男权的斯基泰和希腊文化大为不同。希罗多德记载了萨尔马特人的起源传说，称其为斯基泰男子与亚马孙女性的混血后代。这个传说当然绝非信史，但希腊传说中关于亚马孙女战士的桥段或许正来源于真实生活中的萨尔马特女战士。在公元前最后几个世纪中，萨尔马特人与罗马人开始接触，并产生冲突。

东部草原：匈奴

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7世纪，属于中央欧亚文化系统的游牧生活方式成为草原地带东部（即今蒙古国、中国内蒙古和塔里木盆地的东部）的主要生活方式。[43]这与游牧生活方式在西部草原地区确立的时间相仿。考古学家已经为早期铁器时代文化从位于黑海北边的西部草原地区向蒙古高原传播的过程确立了准确的年代，研究结果得到树轮年代学的确证。[44]考古发现也印证了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对东部草原地区早期居民的语言和族属的比定。东部草原西半部（从蒙古高原西部的阿尔泰山往南经罗布泊一带的楼兰地区直到青藏高原的北缘）的主要居民在人种上属高加索人种：分布在其北部的人群操属于北伊朗语的塞语；分布在楼兰一带的人群则说吐火罗语。东部草原东半部（蒙古高原的东部和中部、中国内蒙古和东北的西南部）的主要居民在人种上属蒙古人种，所说语言尚难确定。[45]位于华夏文明圈北部边缘的城市常与北方民族进行贸易，这在汉文史料中多有提及。

在公元前7世纪末、公元前6世纪初，中原王朝曾进攻狄人。此后，汉文史料中再无更多关于中央欧亚民族的消息，直到战国末年赵武灵王兴“胡服骑射”[46]。他率军击败属中央欧亚民族的林胡[47]和楼烦；在阴山脚下修建长城，起于代，止于高阙；又在其地置云中、雁门和代郡。[48]公元前295年，赵灭中山国。之后，赵国沿黄河河曲构筑一圈防线，将河套地区纳入版图。自此，赵国在东部草原的南部建立起统治，包括东部草原水草最丰美的鄂尔多斯。

在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统一中原之前不久，包括鄂尔多斯在内的东部草原各地已被匈奴统一。公元前215年，秦朝大将蒙恬出兵击溃匈奴，将其势力逐出漠南。秦始皇于是下令修长城。他征集几百万民夫，将战国时代列国所修城墙连接起来。长城及其沿线一系列关隘西起甘肃临洮，东到辽东，将整个黄河流域置于翼下，其中也包括匈奴人曾统治过的漠南地区。匈奴人则在其首任首领头曼单于的率领下向北撤入蒙古高原。[49]其子冒顿在公元前209年成功夺位或与头曼败于秦军有关。[50]

尽管在匈奴称霸东部草原与匈人席卷西部草原之间有几个世纪的鸿

沟，且二者之间并无任何直接联系，但仍常有人将二者勘同。[51]许多论断的立足点仅仅是二者名称相近[52]。但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在汉人最初听到匈奴之名的时候，“匈奴”二字的发音肯定与现在大不相同。今日“匈奴”所读之音早已不是当时以“匈奴”所记之音。一种可能是，“匈奴”二字记录的是北伊朗人的族名[53]。北伊朗人的东支——塞人（Saka或Sakla）之名以多种转写形式[54]出现在汉文史料中，它的第一次出现比匈奴晚了一个世纪。[55]在匈奴崛起之前，他们可能役属于一支操伊朗语的游牧民族，并从那里学到了伊朗人的游牧生活方式。如同“最初的故事”，他们后来取而代之。或者还有另一种可能，在他们兴起之初，曾有一部伊朗人融入，因此周边民族就以这支伊朗人的族名指称他们。[56]这种情况也常发生在中央欧亚民族身上，比如吐蕃人。

秦朝是个短命的王朝，在始皇帝驾崩后不久便土崩瓦解。秦末乱世中，被征发到长城一线的戍卒得以脱逃，匈奴人于是趁机重回漠南鄂尔多斯故地。

在汉代，中原王朝对东部草原的认识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在汉武帝治下（公元前141-公元前87年），中原王朝开始了向中央欧亚的长期扩张。

古典时代的文化发展

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丝绸之路和中央欧亚的早期游牧政权出现。与此同时，周边地区上古时代盛期的城邦文明也发展到其顶峰，在古代希腊、印度和中国分别产生了经典的哲学作品。大致在同一时期，希腊涌现出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公元前399年）、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年）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印度涌现出释迦牟尼（活跃于公元前500年前后）、波你尼（约公元前5世纪）[57]和考底利耶（Kauṭilya，活跃于公元前321-约公元前296年）[58]，中国则涌现出孔子（约公元前550-公元前480年）[59]、老子（约公元前5世纪末）以及庄子（约公元前4世纪）。[60]这三大文明之间的交互影响已经基本不在历史学家的讨论范围内，因为现在很难找到它们之间直接交流往来的具体实例。但是，它们之间确实曾有过交流。而且，我们不得不问，为何东亚和爱琴海畔天各一方的不同文明会不约而同地开始争鸣为政之道，叩问存在之谜，讨论逻辑问题，探索人类思维方式呢？他们当时对彼此的了解并不比1000年以前多多少，但他们思考问题的水准与1000年以前相比却判若云泥。1000年前，他们的问题大都集中在一些神鬼莫测之事上，比如王后能不能怀孕，上天对祭品是否满意，出师是吉是凶，等等。而此时，三大文明出现了富有哲学思辨的提问，这些新思想的出现在各自文明内部却找不到原因。

这三大文明当时有着共同的政治特点——国内诸侯林立，没有一家能够睥睨群雄。它们还间接地享受着游牧民族主导的世界贸易增长所带来的利好。商业的发展必然导致商人阶层的扩大和外来观点的传播。如前所述，早期中国和希腊（或印度）之间没有直接的文化交流。这不足为奇，因为这两大文明当时在任何方面都没有直接的联系。那么，古典时代的哲学时期是如何产生的呢？相距遥远的三大文明不约而同地生发出相同的哲学问题，并对许多问题做出相似的回答；如果说这一切皆是偶然，实难令人信服。逻辑上唯一可能的答案就是中央欧亚。

当时，三大文明之间唯一可能的交通路线是陆路。当然，笔者将在本书中反复强调，中央欧亚绝不仅仅是联系东亚和西欧的交通渠道，它本身就是一个经济体，一个由许多区域、民族、国家和文化构成的独立的世界。孔子有云：“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公元前4世纪，

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巴克特里亚，希腊人开始在此地殖民。自此，包括希腊哲学在内的希腊文化传入中亚腹地。近来有研究显示，希腊哲学中的一些因素恰在亚历山大征服中亚后不久出现在汉文文学中。[61]

古典时代早期的希腊、印度和中国相对于当时中央欧亚文化广阔的势力范围而言，还属边陲之地。在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初，整个北部草原地区、南部草原地区的大部以及中亚都是伊朗语族的势力范围。这一时期的中央欧亚至少涌现出了两位伟大的哲人或宗教思想家。一位是斯基泰人安纳卡西斯（Anacharsis）。因其母为希腊人，他可以说希腊语，并以希腊语写作。据第欧根尼·拉尔修记载，安纳卡西斯曾在第47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公元前591-公元前588年）前往希腊，以其禁欲主义的行为和精辟的言论在希腊扬名。[62]他位在古希腊七贤之列，被视为早期犬儒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63]著名的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的祖母系一位富裕的斯基泰妇女，他因此常被称为野蛮人。[64]学界普遍认为，创立瑣罗亚斯德教的瑣罗亚斯德来自花剌子模地区，但他其实也可能出身于中央欧亚其他某个处在游牧的伊朗人势力之下的地区。他生活的年代[65]尚不确定，但他应当是与孔子、释迦牟尼同时代的人。还有其他出身中央欧亚的思想家吗？在周边文明中的经典哲学家的学说中，除了他们本人的观点之外，是否也包含中央欧亚印度-伊朗民族的哲学家的观点呢？据汉文文献记载，孔子认为中央欧亚民族是可以问学的对象，[66]而一些希腊思想家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们为何会产生这样的观点呢？中央欧亚民族的社会、宗教观念，比如重视友谊、私兵制度等，是否反映了他们的哲学观念和旨趣，例如如何获得幸福，或何为完美的状态等？

游牧型的中央欧亚文化系统

丝绸之路是贯穿欧亚大陆的商贸体系的总称。它的兴起、繁荣和消亡在年代上分别与斯基泰人的崛起、中央欧亚诸帝国的繁荣以及准噶尔汗国的灭亡一一对应。在这2000年的历史中，中央欧亚本土的大部分地区都处在以游牧民-武士为统治阶级的政权统治之下。据中央欧亚周边文明的史料记载，这些政权主要依赖贸易积累财富，从而维持其统治。

贸易对非游牧文明也很重要，但它对游牧政权来说则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贸易之所以如此重要，并非如人们臆测的那样，因为游牧民族物质匮乏。[67]与大型的农耕国家中的居民相比，游牧民食物更充裕，谋生更容易，寿命也更长。在历史上，不断有人从中原地区逃亡东部草原地区，并对那里的游牧生活方式赞不绝口。与此类似，许多希腊人和罗马人也加入匈人或其他中央欧亚民族，他们因此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获得比其本国更好的待遇。中央欧亚民族深知，贸易和赋税比劫掠和破坏更有利可图。历史也证明了，劫掠和破坏仅是例外，而绝非常态，它通常只发生在全面战争之后。

贸易对游牧民族如此重要的原因在于，它维持了统治者及其私兵阶层的需要。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证据都印证了这项花销之巨大。从上古时代起，中央欧亚各地统治者赏赐给其私兵巨额财富屡屡见于史料当中。对中央欧亚各政权而言，不论其生产方式如何，维系其统治的基石都是统治者-私兵关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中世纪。若没有私兵，统治者生时坐不稳王位，死后也将无人扈从。从斯基泰时代至蒙古时代，中央欧亚的统治者一贯铺张奢华的墓葬显示了他们对阴间的想象——在身后仍能享受同样的帝王生活。

希腊人希罗多德的《历史》、阿里安的《亚历山大远征记》以及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的报告都提供了对中央欧亚城市相当准确的描述。希罗多德记道，斯基泰的主要城市盖洛诺斯有30平方千米，是斯基泰人商贸网络的枢纽。巴克特拉（Bactra）即日后之巴尔赫，是巴克特里亚最大的城市，也是阿契美尼德王朝总督的治所。[68]亚历山大在公元前329-公元前327年攻取此地。[69]2个世纪之后，此地被吐火罗人（大月氏人）占领。亚历山大还在公元前329年攻取了马拉坎达

（Maracanda，即后世之撒马尔罕，粟特大城），其势力影响到费尔干纳。在公元前139-公元前122年，张骞的足迹遍布西域各地，行经许多城市。这些城市的详情见于他和后来的旅行者的报告。中亚的河流大都源出高山，止于大漠。在这些河流的谷地和冲积平原可以发展灌溉农业，而所有中亚的城市都主要依赖这些灌溉农业。尽管居于城镇，但这里的居民却与游牧民族有着同样的尚武之风，一如游牧民族和他们一样热衷商业。他们的统治阶层也和游牧民族的统治阶层一样拥有私兵。古代中国的旅行者在粟特地区所见是一片密集开垦的农业地区，其间城国密布，各国坐拥大量甲兵。粟特人同其周边的游牧民族一样，也需要通过贸易获得财富以赏赐给私兵。同游牧民族一样，他们培植私兵的主要意图是维持对内的统治。在中世纪初期，养私兵之风在粟特人等定居的中央欧亚民族中更为盛行，比游牧民族尚有过之。而且，粟特人在中央欧亚和周边国家中频繁参战，绝不亚于游牧民族。[70]之前上古时代的情形也应当如此。

---

[1]萨尔马特的女战士（应即神话中亚马孙人的原型）和斯基泰、萨尔马特人的男性战士一样身披重装铁甲腰带作战。早期的希腊战士也如此。参看Rolle（1989）。“绣金的锦袍”也是典型的中央欧亚事物。

[2]希腊文校本参看Gilbert Murray（http://www.perseus.tufts.edu/cgi-bin/ ptext?lookup-Eur.+Her.+408）。

[3]Di Cosmo（2002a：21-24）。

[4]西伯利亚的大部分地区直到蒙古高原，在上古时期盛期还主要分布着欧罗巴人种。公元前1千纪时，蒙古人种逐渐开始占据上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是人种成分变化的关键时期（Rolle 1989:56）；在中亚东部（今新疆地区）则仍旧以操印欧语的欧罗巴人种为主，直到公元1千纪晚期。东部草原地区早期居民的语言和族属尚无法判定（Di Cosmo 2002a）。

[5]Di Cosmo（1999a：919）。

[6]狄宇宙详细论说了中原王朝进攻狄人（分为西部的白狄和东部的赤狄）的战事，指出：“对狄人作战战果最大的当属晋国。他们在公元前594年和公元前593年两次出击，消灭数支狄人，缴获甚多。这次进攻应当是趁狄人内乱发动的，当时狄人正遭饥馑和内部政治纷争。”（Di Cosmo 1999a：947-951。）他注意到《春秋》中记载公元前530年白狄曾有一次入侵（Di Cosmo 2002a：97页起），但其他史料称，狄人在公元前541年时已被晋国征服。狄人后来依然活跃在历史上，曾数次建立独立政权，继续与中原王朝进行斗争，一直到公元前3世纪中叶（Di Cosmo 1999a：948，951）。

[7]Di Cosmo（2002a：21-24）。

[8]参看Drews（2004）精彩的论述。

[9]相反的论点非常值得怀疑。要弄清中央欧亚骑马作战的方式的具体发展过程仍需更多的考古发现。

[10]最早提到伊朗人的史料是“公元前835年亚述国王萨尔玛那萨尔接受Paršuwaš中的27个部落的朝贡。Paršuwaš应指波斯人”（EIEC 311）。最早提及印欧人的史料可能是商代对其与羌

人的战争的记载，以及对周人及其联盟羌人的记载。族名“羌”应是汉文对一个吐火罗语词汇的音译（详见附录二），但它也可能是对善用双轮车作战的异族的统称。这群人出现在中原地区的年代及其善使双轮车的特点说明他们是印欧人，且应是B组印欧人——因此，他们不是伊朗人（伊朗人不属于B组印欧人）。

[11]关于希罗多德笔下的辛梅里安人，参看注释50。

[12]Rolle（1989:12-13）。

[13]此词的词源是原始印欧语*skud-o，意为“射手”（Szemerényi 1980:17，21）。参看附录二。

[14]在希罗多德的记述中，马杜厄斯（约公元前645-公元前615年在位）是帕尔塔图亚（约公元前675-公元前645年在位）之子。

[15]Godley（1972:198-199）；参看Rawlinson（1992:58-59，295）。

[16]Melyukova（1990:100）。史料中留有斯基泰人与亚述人建立一次联军的细节，参看Rolle（1989:71-72）。

[17]Szemerényi（1980:6）。

[18]Van de Mieroop（2004:254-257）。

[19]米底人本身没有文字，也没有使用其他文字记其史事。与米底人不同，波斯人使用帝国阿拉姆语（Imperial Aramaic，一种闪米特书面语）和埃兰语（Elamite，也是近东当地的一种语言）作为书面语。在大流士治下，波斯人又创造出一套楔形文字来书写他们本民族的语言古波斯语，并被用于书写铭文。西支伊朗语（波斯语属西支伊朗语）与学界认为的最早的一种伊朗语阿维斯陀语差别很大。阿维斯陀语流行的具体时间和地域尚难确定，但它却与吠陀梵语（Vedic Sanskrit）惊人地相似。参看附录一。

[20]Rolle（1989:96）。

[21]斯特拉波（Jones 1924:242-243）讨论了斯基泰农民（the Georgi）的粮食生产率以及在大饥荒时期（约公元前360年）运往希腊的总量巨大的谷物。他还提到希腊人从麦奥提斯（今亚速海）进口腌鱼之事。

[22]Rolle（1989:52-53）。

[23]泰勒（Taylor 2003）谈及斯基泰地区一处大墓时写道：“最近的二次发掘和研究显示，围绕坟墩的边缘地带曾举行过复杂的仪式。另有一个墓穴集中埋有马骨，可能与填土封穴的仪式有关。这与希罗多德的记载吻合。”

[24]Godley（1972:202-205）；Rawlinson（1992:296-297）。——作者注 作者大段援引希罗多德《历史》中的片段，其所据为高德利（Godley,1972）英译本，参考罗林森（Rawlinson,1992）的英译本。译者汉译时参考王以铸译本（《希罗多德历史·希腊波斯战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但王译与作者所引英译本细节之处略有不同，且作者对英译本也多有修正，因此译者并未照录王译。——译者注

[25]文本中读作Coloxaïs，笔者还原作Skoloxaïs。参看附录二。

[26]高德利译作“瓶子”。笔者取常见译法“杯”。

[27]参见《导论》中对此传说的讨论。

[28]此节所记信息使斯基泰人的族名和族属更加扑朔迷离。参看附录二。

[29]勒格兰（Legrand）引用本维尼斯特（Benveniste）的话说，“这些东西是伊朗社会三个阶层的象征，酒杯象征祭祀，斧头…象征战士，犁和轭象征农民”（Legrand 1949:50）。罗尔（Rolle 1989:123）说，根据“书面资料”，斯基泰人由三个国王同时统治，以其中一王为尊。然

而，关于斯基泰统治者的历史记载清楚地表明他们的君主是唯一的，不支持罗尔的观点。

[30]Godley（1972:216-219）；Rawlinson（1992:302）。

[31]英语中唯一指称“奴隶”的词“slave”实际上代表了一个复杂的等级制度，这个等级的大多数成员在英语使用者看来都不是奴隶。这个词有早期现代的含义。

[32]Godley（1972:241-242）；参看Rawlinson（1992:314-315）。

[33]斯特拉波（Jones 1924:222-223，242-243）在其后注意到，这些“以大车装载的庐帐是他们居所”，皆以毛毡制成。他们的庐帐数目极多。只有一套庐帐的斯基泰人被视为穷人。富人能有8车大帐。车帐主要用牛来牵引，移动速度缓慢。深入研究以及考古出土的泥塑车帐（tentwagon）模型（当时作为玩具）的照片，参看Rolle（1989:114-115）。斯特拉波还强调，游牧民族以其所蓄养的牲畜的奶、肉和酪为食，“时而逐水草而迁徙”。他明显注意到，尽管游牧民族骁勇善战，但通常和平地生活，只在万不得已之时才出战。参看《尾声》。

[34]Godley（1972:308-309）；参看Rawlinson（1992:339）。高德利原文称布迪尼人头发“微红”（ruddy），今改为“红色”；称布迪尼人“依土地为生”（native to the soil），今改为“原住民族”。

[35]Rolle（1989:119）。

[36]Taylor（2003）；参看Rolle（1989:117-122）关于此城及其他斯基泰城市的讨论。

[37]波斯人称所有北伊朗人为Saka（塞人，参看附录二）。现代学者多以Saka指称分布在东部草原和塔里木盆地的伊朗语族。笔者遵从此道。

[38]Rolle（1989:7）。

[39]这次波斯大军远征的时间和路线尚存争议。梅柳科娃（Melyukova 1990:100）认为，波斯人渡过顿河进入萨尔马特人的领土。但此说与希罗多德的记载不符。

[40]斯基泰人及其他中央欧亚草原民族在作战时皆身披铠甲。这点现已广为人知，在文字资料和考古发现中都有明证。对此的研究及斯基泰人战甲的图片，参看Rolle（1989）。

[41]Godley（1972:326-328）；参看Rawlinson（1992:346-347）。

[42]Godley（1972:310-311）；希罗多德解释道：“在斯基泰语中，男人作‘oior’，杀作‘pata’。”斯基泰语的oior（这种希腊语的转写应当源自斯基泰语原型wior）显然与阿维斯陀语的vîra（男人，人）、梵语的vîrá-（英雄，男人，丈夫）、拉丁语的vir（男人）、古英语的wer（男人，丈夫）以及哥特语的waír（男人）同源，皆源自原始印欧语*wîr-或*wî-ro-（男人）（EIEC 366）。

[43]Di Cosmo（2002a：57，65，71）。

[44]Di Cosmo（2002a：36）。

[45]Di Cosmo（2002a：39，163-166）。

[46]对此事的详细讨论，参看Di Cosmo（2002a：134-138）。然而，除了成功地改穿裤子以外，赵王似乎没能从根本上改善汉人不善骑马作战之弊。

[47]这是汉文史料中对“胡”最早的使用记录之一。“胡”最初应是特定的族名，但很早就变成指称北方和西方之外族的泛称。

[48]Di Cosmo（1999a：961）。

[49]Di Cosmo（2002a：174-176，186-187）。

[50]Yü（1990:120）。头曼单于在被蒙恬击败之后仅6年即被其子冒顿杀死夺位。冒顿夺位成功定然靠其训练有素的私兵助力，但其夺位的真实过程可能并不似《导论》中所记那般传

奇。参看Di Cosmo（2002a：186）。

[51]尽管一些考古发现提供了颇为有价值的线索，但仍无法解决两者之间最为关键的年代差异。

[52]有关匈人起源的争论，以及他们与匈奴之间假定的历史联系，见注释51。

[53]汉人很早便知道匈奴的存在，“匈奴”一词进入汉语的时间应当早于古汉语首辅音*s-变成*x-这一音变发生的时间。详见注释52。

[54]参看附录二。关于中央欧亚东部塞人名字的不同形式，参看注释53。

[55]张骞的报告第一次提到塞人。公元前139-公元前138年，他奉命出使大月氏，在出使和回程途中两次被匈奴擒获滞留。直到公元前126年，他才带其匈奴妻子和随从逃回汉朝。

[56]匈奴人的语言和族属目前尚难有定论。

[57]Coward and Kunjunni Raja（1990:4）。

[58]Bilimoria（1998:220-222）。

[59]这是笔者根据布鲁斯·布鲁克斯对他的年表的讨论做出的估计。

[60]上述各人年代多有争议。笔者直接参引Audi（1999）。他们的著作大都是被后人不断增添的，因此只有一部分内容可能确是名义上的作者所著。

[61]Brooks（1999）。

[62]Hicks（1980，I：104-111）。

[63]Cancik and Schneider（1996:639）。

[64]Rolle（1989:13）。

[65]关于其年代的问题见附录一有关阿维斯陀语的部分。

[66]应指前引“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一句。——译者注

[67]例如，希尔丁格（Hildinger，2001）称：“在历史上，游牧民族长期生活在惊人的贫困中，挣扎在生死线上。只有与定居民族接触，才或可缓解物质上的贫乏。”事实恰恰相反，上古和中世纪的旅行家的行记多有明证。

[68]大量宫廷阿姆美语文书近来在巴克特里亚出土。这批文书的年代在公元前4世纪，将为研究当时巴克特里亚地区的行政和文化提供重要素材（Shaked 2004）。

[69]Hornblower and Spawforth（2003:58）。

[70]Grenet（2005），Moribe（2005），de la Vaissière（2005a）。

第三章　在罗马和汉朝的大军之间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

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旃为墙，

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

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汉细君公主

中央欧亚的第一次区域帝国时代

古典上古时代（Classical Antiquity）中期（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的历史以罗马帝国和汉帝国的发展为主线。这两大帝国皆属于农业文明，但都已部分城市化。它们分别在欧亚大陆的两端扩张，建立起东西并立的两大霸权。两大帝国的势力都已深入到中央欧亚。

在西部草原，继斯基泰人而起的萨尔马特人又将霸主之位让与同属伊朗语族的阿兰人。在中亚西部，吐火罗（大月氏）部落联盟南下巴克特里亚，攻灭当地希腊人所建政权。他们后来在此建立起贵霜帝国，其疆域从中亚一直延展到北印度。与此同时，帕提亚人新建的波斯帝国向西扩张，其势力范围最远可达希腊诸城邦；他们在近东地区与罗马帝国争雄。吐火罗人的宿敌匈奴则继续称霸东部草原地区。后来，匈奴人分裂为南北两部。在汉朝的支持下，南匈奴攻灭北匈奴，使东部草原出现权力真空。属蒙古语族的鲜卑部落联盟从东北地区西部的山区（大兴安岭）进入东部草原，取代匈奴成为那里的新霸主。

通过中央欧亚进行的贸易——丝绸之路贸易——的总量不断攀升，以致向来不屑谈及商贾的罗马和汉朝的作家也在其著作中论及此事。除了贸易以及少数的外交接触，罗马人与汉人之间不论在地理上还是文化上都还相距甚远，彼此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对于各自的近邻都不甚感兴趣，对其近邻以外的世界更是所知甚少。在这一阶段的后期，佛教、基督教信仰等观念沿丝绸之路传播，在中央欧亚和周边文明中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罗马帝国与中央欧亚

虽然在恺撒（卒于公元前44年）的继任者治下，罗马帝国才正式成立，但在此之前的1个世纪，罗马人的领土实际上已经扩张到了帝国的规模。到公元前100年，罗马人已经占有意大利、高卢南部、希腊、安纳托利亚和北非的大部，并正在西班牙攻城略地。攻下凯尔特人所有的阿尔卑斯山南高卢（Cisalpine Gaul）和山外高卢（Transalpine Gaul）标志着罗马帝国已开始进军中央欧亚。这远早于恺撒征服高卢的其余地区（公元前56年以前）。恺撒在公元前55年和公元前54年曾劫掠不列颠，并进攻日耳曼尼亚的日耳曼人。[1]恺撒没有为对上述中央欧亚地区的进攻找任何借口，它们纯属帝国主义扩张。凡遇到抵抗［比如西北高卢威尼第（Veneti）人的抵抗］，“一概血腥镇压，斩其首领，掠其民众贩卖为奴”[2]。

在恺撒以后，罗马人继续征讨位于其北部和东部边境的日耳曼人诸部。日耳曼人中靠近罗马的诸部常被罗马征服，又屡屡伺机起事反抗，这在西罗马帝国后来的岁月中一直反复发生。一些生活在边境的日耳曼部落则陆续内附，被罗马人纳为“盟友”（foederati），并在罗马人征讨其他日耳曼部时出兵助阵。他们逐渐受罗马文明浸染，后来甚至比日益腐化堕落的罗马人更加忠于罗马帝国。

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在公元1世纪写成的《日耳曼尼亚志》是对日耳曼民族最早的详细记载。在写到日耳曼人的文化时，他特别注意到了私兵制，并记下了私兵制所有的核心特点：一大队战士终身依附于一位主人，并死心塌地为他卖命。如果主人在战场上失陷，而私兵却得脱逃，那么此人今生难逃恶名，将为千夫所指。塔西佗还注意到，在私兵队伍中存在着“级别”，而且养一支私兵队伍耗费巨大。私兵“不断向主人索要封赏，不是要一匹令人垂涎的战马，就是要一柄沾满敌人鲜血的长枪”[3]。

私兵制后来仍在日耳曼各族中长期流行，这点颇值得注意。早期法兰克王国就保有这一传统。此外，西班牙的西哥特人将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8世纪。此后，这一传统还在斯堪的纳维亚延续了数个世纪之久。一些中世纪早期的史家认为法兰克人和突厥人有关联，并试图从历史和

语源的角度给出证据，以圆其说。[4]产生这种说法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法兰克人曾与突厥人有接触，并在文化的一些方面颇有共性。[5]

墨洛维（Merovech，456/457年卒）是法兰克王希尔德里克一世（Childeric I,481/482年卒）之父、克洛维（Clovis，481-511年在位）之祖。他曾助罗马大将埃提乌斯（Aetius）在卡塔隆平原一役大战阿提拉。他死后被追认为墨洛温王朝的开国之主。墨洛维的墓葬与多瑙河地区的东日耳曼各部国王的墓葬相似，为一独穴墓室，内有华美的金器随葬，其上垒有占地20米×40米的坟丘。[6]在坟丘周围可见数个葬马坑和人殉坑。然而，法兰克人之前已经在罗马帝国的北疆一线生活了很久，并成为罗马人的“盟友”；希尔德里克本人则是以罗马比利时总督的规格和仪式下葬的。包括私兵制在内的中央欧亚文化系统的一些基本特征都已见于早期法兰克人中。显然，这不是他们从罗马人那里学来的。那么，这是从哪里学来的呢？

塔西佗和其他史家的记载清楚地表明，包括法兰克人的祖先在内的早期的日耳曼人属于中央欧亚文化系统。与阿兰人及其他中亚的伊朗语族一样，他们也从其始祖原始印欧人那里继承并保有这套文化。这说明从日耳曼人迁居日耳曼尼亚开始，这里就属于中央欧亚的范畴，距当时已有1000多年了。[7]

西部草原

到公元1世纪初，与萨尔马特人和斯基泰人同属伊朗语族的阿兰人[8]已经占据了沿顿河一直到亚速海西北的草原地带。据约瑟夫斯（Josephus，37-100年）记载，阿兰人从此地出兵攻略米底。到公元2世纪，他们已经控制整个黑海草原和北高加索地区，称雄西部草原，势力范围直抵罗马帝国的东南边界。[9]

公元107年，罗马皇帝图拉真（98-117年在位）通过血战攻下达契亚（相当于今罗马尼亚之地），开始在当地驻兵、殖民。此后，罗马以达契亚为前哨，从此出兵进攻萨尔马特人的余部和阿兰人。当地达契亚人的遭遇则十分悲惨，“许多人被掠为奴隶，一些人杀身成仁。罗马人大肆屠杀达契亚人以立威，迫使其他行省的属部不敢造次。仅图拉真一朝，就有1万名达契亚男子死在罗马角斗士比赛中”[10]。

罗马帝国将虏获的阿兰人远迁至高卢，甚至远到布列塔尼。他们被送到驻守那里的罗马军中服役。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这批阿兰人一直保持着族群的独立。他们的后代在语言上已被当地居民同化，但仍保有生活在草原地区的伊朗语族的一些传统习俗。学者认为，阿兰人对中世纪欧洲的民间文学也有巨大影响。[11]即使晚至中世纪，弓马娴熟的阿兰武士也以其能征善战名震欧洲。

哥特人操东支日耳曼语。在塔西佗的时代，他们分布在波罗的海沿岸、维斯瓦河入海口一带。在公元3、4世纪间，他们向南，再向东扩张到黑海一带，至少占据了黑海草原的西部。当时他们尚未形成统一的国家，而是各部散居，不相统属。后来，厄尔曼纳里克（Ermanaric）统一各部，建立格鲁通吉部落联盟（Greutungi confederacy），是为后来的东哥特人（Ostrogoths，“日升之哥特人”）。厄尔曼纳里克率部先后征服周边邻近的部族，建立政权，其建国历程与历史悠久的“最初的故事”如出一辙。在370年前——在匈人进攻之前，东哥特王国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权。

匈人第一次见于史乘是在2世纪普林尼的笔下。他们当时分布在黑海草原（萨尔马特）的东部，即亚速海东、顿河以外之地。匈人第二次

见于史乘则因为其后来与阿兰人开战。匈人在首领巴兰比尔（Balamber）的率领下击败阿兰人。其后，匈人又携阿兰人进攻顿河以西草原，大破东哥特人。[12]之前，东哥特王厄尔曼纳里克曾率哥特人进攻匈人。显然，此次匈人对哥特人的进攻以及后续匈人侵入罗马帝国等事件（为追剿哥特等不肯归降的部族）都是此事的直接后果。到375年，匈人已经将萨尔马特人、阿兰人和哥特人在西部草原的势力逐一消灭。以哥特人为主的大批中央欧亚民族涌向东罗马帝国的边境避难。许多部族归降了匈人，并随匈人大军出征。[13]

帕提亚帝国[14]

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公元前323年）死时无嗣[15]，他打下的大片江山被其手下将领瓜分，各自开创王朝。在波斯，塞琉古一世（公元前312-公元前281年）建立塞琉古王朝。他曾在公元前324年应亚历山大大帝之要求，娶一位粟特总督之女阿帕玛（Apame）为妻。塞琉古王朝地跨叙利亚到锡尔河，几乎恢复了波斯帝国的版图。公元前238年，操一种北伊朗语的帕尼人（Parni）在安息（Arsaces，公元前247-公元前217/214年在位）的率领下侵入帕提亚（今伊朗西北部及土库曼斯坦南部），在此地建立安息王朝。[16]公元前129年，帕提亚大军击败塞琉古军，斩杀其王安条克七世。自此，塞琉古王朝在波斯的统治结束。与此同时，塞人受吐火罗人（大月氏人）攻击，被迫迁徙，进犯帕提亚。[17]吐火罗人在战场上攻杀帕提亚王阿尔达万（即阿尔塔巴努斯二世或一世），并攻下巴克特里亚。后来，帕提亚人逐渐恢复了元气。在米特里达悌二世（Mithridates　II，约公元前124/123-公元前87年在位）治下，帕提亚帝国的版图基本确定。

帕提亚王朝虽然并无强大的中央集权，但延续了很久。帕提亚人保持了许多中央欧亚伊朗人的传统。比如，其作战以骑射为主——帕提亚人的回马箭（Parthian　shot）名闻天下[18]；又如，他们的口传史诗也负盛名，可惜后来失传。帕提亚王朝存续4个世纪之久，其间一直与罗马帝国激烈争夺近东，致此地在两国间数次易手。除此以外，他们基本上稳定地控制着伊朗人传统的领地——伊拉克的大部和伊朗。后来，阿尔达希尔建立萨珊波斯王朝，率军攻灭帕提亚王朝，杀其末代君主阿尔达万（约213-224年在位）。

吐火罗人和贵霜王朝

在中亚，贵霜王朝建立。其建国前的一系列史事在西方和东方的史料中皆有记载。此事要从第一拨印欧人向外迁徙说起。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操原始印欧语A组方言的原始吐火罗人的祖先到达甘肃一带，定居在敦煌以西地区，包括罗布泊一带，即后来的楼兰之地。18个世纪之后，吐火罗人仍然生活在此地——他们当时被称为“月氏”，此词的上古汉语读音可复原为*Tokwar，正是“吐火罗”。[19]

公元前2世纪初叶，正当匈奴勃兴之初，月氏人是匈奴西南方面的强邻。公元前176年或公元前175年，匈奴大破月氏，将其逐出河西故地，并收服乌孙（*Aśvin）[20]等周边部族。[21]月氏人中的一部分南逃进南山，与羌人混居，被称为小月氏；其大部主力西迁至北疆地区，被称为大月氏。后来见于高昌的东吐火罗人和见于龟兹、焉耆的西吐火罗人是否就是在这次大月氏的迁徙中进入这些地区的呢？抑或他们此前就已经生活在这些地区了？此问题尚无定论。月氏人将原住的塞人逐出北疆[22]。但仅数年之后，他们又被乌孙人击败，被迫向西南遁走，进入粟特地区。他们正是从此地出兵，进攻帕提亚人，并在公元前124/123年征服巴克特里亚的。其后，他们渐次渡过阿姆河（乌浒水），入主巴克特里亚本土，建立起强大的政权。巴克特里亚因此在后世被称为吐火罗斯坦（Tokhâristân）[23]，意即“吐火罗人（月氏人）之地”。

约在公元前50年，贵霜翕侯丘就却（Kujula Kadphises）收服其他四部翕侯，一统吐火罗斯坦，建立贵霜王朝。他将其势力范围向南扩至印度，最远可达印度河河口，由此获得了进出印度洋的出海口。贵霜王朝控制了连接印度和罗马帝国在埃及的各港之间的海上贸易航线，绕过了陆上的帕提亚，得以避开帕提亚人的抽税。贵霜王朝通过这条贸易线路获利颇丰。他们的势力向东则远达塔里木盆地。操吐火罗语的龟兹人指称其都城的Küsän一名即是贵霜人留下的印记。[24]记载贵霜人在塔里木盆地统治的佉卢文文书最远出土于楼兰一带。在佛教传入帕提亚、中亚和中原汉地的过程中，贵霜王朝居功厥伟。第五代统治者迦腻色伽（Kanishka，活跃在公元150年）一朝为贵霜王朝盛极之时。当时各种宗教在该国流传，迦腻色伽尤宠佛教。

除了出土的钱币和一些考古遗存，贵霜王朝再没有留下更多的材料。因此，贵霜王朝历史的许多细节今已不为世人所知。公元225年，萨珊波斯的开国之君阿尔达希尔一世出兵贵霜，迫使其称臣。

汉帝国与中央欧亚

公元前210-公元前206年，秦朝覆灭，群雄逐鹿。后来西汉一扫六合，在中原地区建立起长久的统治（公元前210-公元6年）。在汉武帝时代，中原王朝再度燃起开疆拓土、远服四夷的雄心。虽然最初几次出征均无功而返，但在公元前127年至公元前119年，汉军终于在与匈奴的战争中取得了几次大捷。在北方，汉军夺取了鄂尔多斯地区（河套平原）。匈奴人再度被中原王朝逐出其在河套平原的故地，被迫远徙漠北。在西面，汉军攻下河西走廊一线。战国时代北方三雄——秦、赵、燕所筑长城在秦统一天下后即被联结加固，横贯敦煌至辽东[25]，用以镇守从匈奴手中所夺土地。此时，长城一线要塞又全为汉朝所踞，成为其防御匈奴的前线，得到修葺加固。武帝还曾派大军远征西域，欲与匈奴争夺当地丝绸之路沿线诸城。在这一时期，汉朝派出的使者、将领们为中原地区带回了大量有关中央欧亚的信息，极大地丰富了中原人士对中央欧亚地理和历史的认识，其中既包括有关东部草原、塔里木盆地、中亚远至伊朗地区精确的第一手信息，也包括有关帕提亚帝国（安息）、罗马帝国（拂林）等更远地区的二手信息。

在这些报告中，张骞的报告无疑是最为重要和生动的一种。他在公元前139年奉命出使月氏，目的是招引月氏重返其在敦煌、祁连间的故地。出使途中，他为匈奴所擒，被迫在匈奴生活10年之久。后来，他逃出匈奴，继续西行，在公元前128年到达巴克特里亚（大夏）。在其回国复命的途中，张骞再度为匈奴擒获羁留。这次他很快脱逃，于公元前122年还朝。公元前115年，张骞再度奉节出使。他在还朝复命两年之后过世。

汉代史料将匈奴人描述为“纯粹”的草原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自幼谙熟骑马射猎，因此是“天生的战士”。[26]这与希罗多德对斯基泰游牧民族的描述如出一辙。这两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完全相同，甚至在细节上都没有出入。考古学等其他方面的证据印证了这一点。

居于北边，随草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无城郭长居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肉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27]

和希罗多德的《历史》一样，《史记》《汉书》中有关匈奴最有价值的信息也并非来自作者直接评述匈奴的段落。汉朝有一个宦者（中行说）降于匈奴，得到了匈奴单于的宠信。他对中央欧亚民族喜好汉地丝绸、美食之事颇有微词：

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疆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28]

汉朝的武力和外交成功地削弱了匈奴的势力，将汉文化传入了草原地区。

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29]

匈奴在与汉朝的军事、外交的交锋中屡受挫折。他们为夺回大漠南庭和西域诸城国，也曾出兵反攻。虽然汉朝在上述两地都击败了匈奴，但匈奴的势力却没有被彻底从塔里木盆地逐出，他们仍能对当地城国施加影响。汉朝对匈奴确曾实行和平、平等的外交政策：

今帝继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饶给之。匈奴自单于[30]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

如果有机会设计匈奴人并将其一网打尽，汉朝也不惜用阴险狠辣之毒计。公元前124年，汉朝在河套东北一带的马邑城设伏诱杀匈奴单于失手，匈奴与汉朝开战：

自是之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然匈奴贪，尚乐关市，嗜汉财物，汉亦尚关市不绝以中之。自马邑军后五年之秋（公元前129年），汉使四将军各万骑击胡关市下。[31]

公元49年，匈奴终分裂为南、北两部。尽管如此，其中更强的北匈奴仍然统治着中亚的大部分地区。他们的势力范围最远可达粟特地区。在那里，匈奴人仍是名义上的宗主。

在汉文正史中，中原与中亚之间遥远的路途常被视为阻碍汉朝在当地建立、维持军事控制的主要障碍。但事实上，汉朝难以在中亚东部各城国建立起稳定统治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中亚各城市的经济的基础是城市和乡村居民之间的贸易关系。这种贸易关系此前已经历数百年的发

展。匈奴人的牧业经济与中央欧亚的农业-城市经济差异并不大，而且活跃的游牧民族对匈奴和塔里木盆地各城国经济和政治的健康都很重要。

匈奴人一直希望在汉朝边境城镇自由贸易，汉朝的一些官员则极力反对向匈奴开埠。但向匈奴开边进行贸易的好处显而易见。每当汉朝开放贸易，汉、匈之间必然相安无事，匈奴人极少“劫掠”边境。不要忘记，所谓的边境其实是汉人深入中央欧亚的土地而建立的。因此，汉朝的边境贸易城市中有很多——或许大部分都是——非汉人居民。即使在匈奴最为强盛之时，他们对汉朝的“劫掠”（并非汉匈之间的全面战争）也仅仅限于内蒙古、东北、山西北部、陕西和甘肃等地。这些地区都仅是匈奴人曾经的领土的外延。[32]

东部草原的鲜卑

在内忧外患之下[33]，草原霸主匈奴逐渐衰落。草原上役属于匈奴的各部族蠢蠢欲动，相继摆脱匈奴的统治，建立政权。其中最重要的一支政权由操原始蒙古语的鲜卑人建立。鲜卑人早先生活在匈奴帝国的东部，即今东北地区西部。他们在匈奴历史上第二位伟大首领冒顿单于时代（公元前209-公元前174年）就已经向匈奴称臣。

北匈奴帝国在83年至87年彻底走向覆灭。87年，鲜卑一战攻灭北匈奴，杀其单于。北匈奴余部在91年西迁进入伊犁河谷地。鲜卑人则进入蒙古高原，取代匈奴人成为草原各部的霸主，其势力范围向西最远可到达乌孙之地。[34]

日本-高句丽的征服

在公元前2世纪早期以前，原始日本-高句丽人已经从其故地向北迁移进入辽西地区（今辽宁省西部、内蒙古东部）。他们在其故地时似以种植稻米和捕鱼为生。日本-高句丽语系原始日本语族中的一部——倭人在公元2世纪时仍然生活在辽西，从事渔猎。他们毫无疑问也从事农业，而非蓄养动物的草原战士。与此相反，同属日本-高句丽语系的高句丽人至迟在公元12年时已经成为马背上的民族，谙熟草原民族的作战方式。这是高句丽人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记载中，当时他们也居住在辽西一带。[35]高句丽人、扶余人以及其他扶余-高句丽民族都已将中央欧亚文化的主要方面一一习得，包括建国传说（参看《导论》）、私兵制度、以大墓葬首领之葬俗以及按天下四方分其国为四部的制度。[36]

一方面因为鲜卑的扩张，一方面因为新莽政权（9-23年）的压迫，一部分扶余-高句丽人开始向辽东迁移。此前至迟在公元前100年，与他们有亲缘关系的秽貉（Yemaek，濊貊）人已经迁入此地。《史记》记载，秽貉人当时分布在辽东、朝鲜（时指东北平原东南部）一带。[37]扶余-高句丽人共建立起三个政权：一是高句丽王国，其地在东北平原南部，其疆域西起辽河，东抵鸭绿江；二是扶余王国[38]，其地在东北平原的中、南部，在高句丽王国之北；三是秽貉王国[39]，其地在朝鲜半岛东岸一线，在南与位于半岛东南角、操朝鲜语的辰韩王国接壤。虽然扶余-高句丽人所建诸政权曾多次被汉、鲜卑攻灭，但该民族却在上述地区扎下了根。

古典中央欧亚

在罗马帝国征服地中海沿岸大部分地区、开始挥师进取欧洲腹地之前，西方世界古典时代的黄金期已经结束。同样，在汉帝国统一中国、建立起幅员辽阔的帝国之时，东方世界古典时代的黄金期也已告终结。古典时代的传统对上述两个帝国都有着强烈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二者都向四方开疆拓土，意欲一统天下。尽管它们基本上实现了其主要目标——极大地拓展了各自的版图，但当时的基础设施条件尚有局限，还不能支持中央政府对超过一定面积的庞大帝国进行有效统治。

起初，古典帝国（罗马、汉帝国）对中央欧亚各政权坚决贯彻“分化-进攻-消灭”的三步式战略，成效显著。罗马帝国成功地沿北海-黑海一线深入西欧腹地，征服了当时主要由日耳曼语族诸部控制的中央欧亚西部地区。面对不能直接吞并的部族，罗马人便设计分化其各部，避免其形成强大统一的整体。汉朝的武功更加卓越。尽管它没能将匈奴的势力彻底逐出中亚（这对中央欧亚的经济来说是一大幸事），但它成功地打通并控制着进出中亚半壁地区的通路。而且，它还成功地将匈奴人分化成敌对的两部：一为南匈奴，基本上完全受汉朝羁縻；一为北匈奴，在南北分裂之后不过数十年便告覆灭。存续时间较长的南匈奴虽日渐为中原王朝控制，但它却成为中原北方的屏障，有效地阻挡了继北匈奴之后称霸东部草原的鲜卑人南下入侵中原。

汉、罗马两帝国积极进取的对外政策最终招致了灾难性的后果。两大帝国边境贸易的部分封闭以及它们对中央欧亚无休止的进攻破坏了当地秩序，使中央欧亚陷入混战。这造成了丝绸之路经济的衰落——中亚城市带的萎缩就是一个明显的表现。丝绸之路经济的衰落正是导致西罗马帝国和东汉王朝（以及其后的西晋）陷入长期的经济衰退的原因之一。这场经济衰退最终将西罗马帝国和西晋王朝推向覆灭。自此，东西方文明的古典时代终结。[40]

---

[1]James（2001:18-22）。后来在公元43年，不列颠的大部被恺撒名义上的曾孙喀劳狄攻取。

[2]James（2001:18）。

[3]Mattingly（1970:113）；参看Hutton（1970:152-153）。

[4]参看Beckwith（待刊a）。

[5]Scherman（1987:102-103）注意到，当多数法兰克人都已留成罗马式的短发时，墨洛温王室的成员仍然保留其传统的披肩长发，并精心护理。突厥等东方的中央欧亚民族也留长发，但却编成辫子。希腊语文献中最早对突厥人的记载是阿伽提亚斯（Agathias）对突厥人头发的恶评："蓬乱、干燥、肮脏，打成一个丑到令人不忍直视的发结。"（Frendo　1975:11。）这与他颇为推崇的法兰克诸王的秀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看来，法国人优雅时尚之风有悠久的传统。

[6]其中出土的掐丝珐琅碎片应是拜占庭风格。墓葬地在今比利时图尔内，1643年被发现，最近被再次发掘（Kazanski 2000）。一处葬马坑的照片可见于http://www.ru.nl/ahc/vg/html/vg 000153.htm。参看Brulet（1997）。

[7]日耳曼人迁入欧洲的时间众说纷纭，却无定论。参看第一章。Adams（EIEC　218-223）有相对审慎、客观的梳理。

[8]关于阿兰人的族名和早期历史，参看Golden（2006）。

[9]Melyukova（1990:113）。

[10]Lehmann（2006）。关于达契亚和罗马对其的征服，参看注释54。

[11]Bachrach（1973）。亚瑟王的传说中的人物兰斯洛特（Lancelot）之名和石中剑的故事等都被认为源自阿兰人。它们在今日高加索地区的奥塞梯人的语言和民间传说中都能找到对应。奥塞梯人即当年的阿兰人的后裔（Anderson 2004:13页起；Colarusso 2002；参看Littleton and Malcor 1994）。

[12]据阿米阿努斯（Ammianus）记载，东哥特王厄尔曼纳里克不肯率众投降匈人，在375年前后杀身成仁。（Burns 1980:35）。

[13]Sinor（1990c）。

[14]即汉文史料中之"安息"。——译者注

[15]他所娶的中亚夫人禄山娜虽在公元前323年8月诞下一子，但他已在6月10日过世。孺子晚出，江山旁落。

[16]Bivar（1983a：28-29，98）。

[17]汉文史料记载，大月氏（*Tok^{w}ar）在公元前160年入侵位于伊塞克湖一带的塞人领土。公元前128年，当张骞到达此地时，吐火罗人（大月氏人）已经移居撒马尔罕（康国）和阿姆河之间，并征服了巴克特里亚（大夏）。帕提亚人在汉文史料中作"安息"，中古汉语读☆ansik（Pul.24，330）。其古汉语的读音通常被复原为*ansək或*arsək（Sta.577，552），但或许复原为*arśək更佳，此即安息王朝帕提亚语名字Aršak（写作'ršk）的转写。

[18]中央欧亚民族在战场上受敌人追击时，惯于在马上回头施射。

[19]参看附录二。

[20]参看附录二。

[21]史料记载，乌孙后来攻入北疆地区，击败生活在当地的月氏人，在此定居。此地最早曾是塞人之地。显然乌孙人是在月氏人迁入北疆地区之后才到来的。

[22]塞人随后开始了他们漫长的迁徙，直到征服北印度，在那里，他们也被称为印度-斯基泰人。

[23]此名在早期阿拉伯语文献中作"Ṭukhâristân"，说明当时此词的第二音节已经由早期的［k^{w}ar］～［χ^{w}ar］演变为［χa:r］。

[24]Küsän为回鹘文中的形式。在古藏文中作Guzan，发音为［küsan］或［küsän］。在库

车和喀什间，还有一城叫Küsen（应指“温宿”）。——作者注Küsän并非龟兹人（即作者所谓“西吐火罗人”）本民族语言吐火罗语词汇，而是一个突厥语词。这种形式出现在9世纪以后的回鹘文文献中。此外，突厥语中还以kuča表示龟兹，最早出现于11世纪的《突厥语大词典》中。龟兹人本民族语言指称龟兹的词汇应为*kuśi，其在原始龟兹语中的形式应为*kuči。——译者注

[25]河西走廊直到敦煌的那一段长城系汉代新修筑，事在武帝朝将匈奴逐出河西、列四郡之后。——译者注

[26]《史记》成书早于《汉书》，但二者所本史源为同样的档案，因此《汉书》并非简单地抄袭《史记》。《史记》之著名，并非仅仅因为它是第一部由标准古汉语（standard Classical Chinese）写就的史书，更因为其本身所具的文学价值。

[27]《汉书》卷九四《匈奴传》。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特别提到了“甲”。

[28]《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中行说还进一步劝说匈奴单于，道：“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汉文正史常鲜少言商，也常疏于记载商贸之于中央欧亚民族的重要意义。这番说辞揭示了当时商贸之重要。在后来突厥第二汗国所立敦欲谷碑碑文中也有类似的言论。它们反映了中央欧亚政权内部保守派的观点。

[29]《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

[30]对匈奴首领称号“单于”的复原尚不明确。参看注释7。

[31]《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

[32]Yü（1986:389）。

[33]Yü（1986:404-405）。

[34]Yü（1986:148-149）。关于鲜卑语以及古代分布在中央欧亚东部和华北地区的其他族群的语言，参看Shimunek（2017）。

[35]据《汉书》卷九九记载，汉人欲发高句丽兵征讨匈奴，高句丽拒不出兵。辽西的长官杀高句丽首领，引起高句丽民众反叛。他们骑马逃往草原地区。从那时起，高句丽人开始向辽东和东北平原南部迁移。这是有关高句丽史事最早的历史记载。还有一条年代更早的史料也曾提到高句丽，将其置于朝鲜半岛附近。但这则材料实际应是在公元1世纪后添加的（Beckwith 2007a：33-34页注释12），目的是彰显汉武帝的武功。——作者注　　《汉书》卷九九记：“先是，莽发高句骊兵，当伐胡，不欲行，郡强迫之，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寇。”——译者注

[36]史料中所记的高句丽精英武士应当就是高句丽王的私兵，但很遗憾，史料中并未明言此点。在朝鲜半岛三国时代，有日本武士参与三国间的战争。其间，他们习得了包括私兵制在内的中央欧亚文化系统。在返回日本之后，他们将这套文化传到了日本。普遍认为，他们是从高句丽人那里习得了这套文化，因此可以推想，高句丽人一定也有私兵制度。

[37]参看《史记》卷一百《匈奴列传》；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38]参看Byington（2003）。

[39]参看Beckwith（2007a，2006e，2005a）。Yemaek是以朝鲜语音读“濊貊”之音。

[40]随后发生的中央欧亚民族的迁徙不但遍布中央欧亚地区，还波及了周边国家的腹地。在罗马帝国，这不但发生在高卢、日耳曼尼亚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达契亚，还发生在斯堪的纳维亚以南几乎整个西欧地区，甚至跨越地中海到达北非。在中国，迁徙不但发生在原属中央欧亚地区的鄂尔多斯、山西、陕西北部和东北南部，还发生在传统上属于中原地区的河套南部以及周、秦、汉朝位于渭河流域关中地区的京畿腹地。

第四章　匈人阿提拉的时代

大厅高高耸立，

张开宽阔的山墙，它在等待

战争的火焰、恐怖的焚烧；

时间尚未到来，当利剑在罗瑟迦翁婿之间

挑起血仇，布下无情的屠宰。

这时，一头逡巡在黑暗之中的恶魔

再也按捺不住了。他无法忍受

鹿厅内日复一日的飨宴，

悦耳的竖琴，嘹亮的歌喉。[1]

——《贝奥武甫》[2]

民族大迁徙

公元2世纪以后，古典时代的大帝国开始瓦解，欧亚大陆北方的民族陆续向南迁徙。这一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被称为“民族大迁徙”，它见证了以日耳曼部落为主的部族向早先属于罗马帝国领土的西半部迁徙，名不见经传的匈尼特（Chionites）、嚈哒等部族向波斯帝国治下的中亚迁徙，以及主要是蒙古语族的诸部向属于中华帝国的中原地区迁徙。这次大迁徙的原因已湮没在历史中无迹可寻，但其对西欧影响甚巨，并最终深刻影响了欧亚大陆乃至整个世界。

其中最大的一次迁徙的主角是突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匈人。他们以草原民族传统的方式从阿兰人和哥特人手中夺取了西部草原。在追击各部落的过程中，匈人逐渐深入欧洲。随着阿兰人、哥特人、匈人等部族突然涌入欧洲，欧洲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切、直观地接触到草原文化。尽管匈人对西部草原和西欧部分地区的统治时间不长，他们的统治在欧洲人的历史记忆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毁誉参半。

民族大迁徙重塑了欧洲的文化，将其纳入了中央欧亚文化系统之中；与此同时，中央欧亚文化系统也影响了日本。这时，中央欧亚文化系统已经覆盖西起不列颠、东到日本列岛的整个欧亚大陆北温带地区。民族大迁徙以后，日耳曼语族和蒙古语族分别在欧亚大陆的东端和西端的大部分地区成为在政治上和语言上占有优势的民族。他们进入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的人口学意义则在于他们从中央欧亚居民的视野重构了国家日常事务的内容：中央欧亚和其周边地区是没有壁垒的；各族群可以在乡村和城市之间自由进退，不必顾及语言、族属和政治的分野。但是，民族大迁徙在东、西方产生的影响不尽相同，这或许和两地不同的人口基数有关。在中国北方有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汉族人，相形之下，罗马帝国的罗马人口则较少。

匈人与西罗马帝国的衰亡

公元200年前后，匈人已经占领亚速海的东北方——西部草原的东端。在此之前，有关匈人的历史、政治、语言等各个方面的任何信息均不见于史乘。[3]370年（或其前后），匈人在首领巴兰比尔（370-376年在位）的率领下进入黑海草原。[4]他们这次西进极有可能是为了报复东哥特国王厄尔曼纳里克之前对他们的进攻，当时厄尔曼纳里克正试图在此地建立东哥特帝国。[5]匈人大军摧枯拉朽般向西挺进，到375年已经横扫阿兰、东哥特诸部。是年，厄尔曼纳里克兵败自尽。376年，西哥特人（自称特尔温吉人）在首领菲力悌根（Fritigern）[6]的率领下一路逃避匈人的追击，向罗马人寻求庇护。罗马人准许他们过多瑙河进入东罗马帝国境内，计划将他们安置在中色雷斯。但在他们到达目的地之前，就已经饱受罗马人的虐待。这当中既有罗马人蓄意而为的因素，也有向帝国内大规模迁移外邦人口的过程本身所产生的矛盾。

大量难民涌入带来的问题本来就很棘手，而利用难民发财的机会又唾手可得，哥特人随身携带的财宝早让罗马人垂涎三尺。这些困难和诱惑考验着罗马人的道德和管理能力。此外，尽管一刻未停，但现有的交通运输设施还是不够将如此大量的难民运过多瑙河。罗马人分批次渡河的计划打破了哥特人的家庭和部族组织。食物供应短缺——这并不一定是罗马人故意为之——也加剧了哥特人的危机。时人记录了哥特人的惨状，痛斥腐败的罗马官员、将领对他们的盘剥。许多哥特人被迫为奴，妻离子散，甚至一些哥特贵族都被迫卖掉子女。[7]

不出意外，菲力悌根在378年率众起义。皇帝瓦伦斯（364-378年在位）亲率罗马大军平叛，在阿德里安堡附近与西哥特人交战。西哥特人击败罗马军队，并杀死皇帝瓦伦斯。2年后，罗马人将潘诺尼亚之地（今匈牙利）让与哥特、阿兰和一些匈人部落，纳其为盟友以羁縻之。382年10月3日，罗马人与哥特人议和并订立盟约。哥特人从388年起就开始在罗马军队中服役，并在协助皇帝狄奥多西一世（379-395年在位）镇压马克西姆（Maximus）叛乱的过程中立下殊功。[8]

从那时算起，匈人被罗马朝廷雇用出战的次数比他们进攻罗马人的次数要多。他们还曾在395年至396年出兵攻打波斯。当时匈人自黑海草

原出兵，越过高加索山区，攻入亚美尼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匈人冒险劳师远袭波斯只是为了劫掠财富，但记载此事的叙利亚史家将其出兵的原因归于一位罗马将官的暴行[9]。这次远征中，匈人甚至试图攻打萨珊波斯的都城泰西封，但被波斯大军打败，退回欧洲境内。前述史家所记的原因应当并不属实——匈人不攻打罗马反而攻打波斯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怀疑。因此，他们这次远袭波斯的原因仍然不清楚。但不论如何，将一位暴戾的罗马将官或者其他某个单一的人、事看作此事的真正原因，都是荒诞不经的。这则记录的价值在于，即使是深受匈人入侵之苦的当地民众，也认为匈人入侵是有原因的，而且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匈人出兵，并非单纯因为他们是残暴的野蛮人，杀掠成性。[10]

在神秘的巴兰比尔之后第一批有名可考的匈人领袖均没能统一匈人各部。因此，罗马人与匈人签订的那些条约实际上都是与当地某一部的匈人领袖签订的。凡有匈人入侵，罗马人便指责匈人背盟弃约，但实际上入侵的这一部匈人与先前订约的那一部可能并不相属，而且他们发兵入侵想来必有其他不为人知的原因。直到卢阿（Ruga，卒于434年）治下，始有中央集权，统一的匈人国家才开始成形。

卢阿死后，其从子布列达、阿提拉兄弟继立。兄布列达治东部领土，弟阿提拉治西部领土。东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于是与匈人订立了新的和约，许诺给“匈人与罗马人平等互市的权利”[11]，并同意向匈人付岁币700罗马磅黄金。和约对双方都有利。“待与罗马人议和之后，阿提拉、布列达即引军横扫斯基泰之地（西部草原），征服诸部。”[12]后来，狄奥多西二世曾一度中断付给匈人的岁币，阿提拉、布列达随即在440年和441年兴师问罪罗马。匈人大军过多瑙河，一路攻城略地，势如破竹，并在君士坦丁堡城下击败罗马军队。此时，狄奥多西二世已经定都在君士坦丁堡。[13]他被迫再度求和，并同意阿提拉提出的全部要求，包括割让更多领土，补交拖欠的岁币，以及将先前的岁币额度提高至2100罗马磅黄金。新增的岁币额度对罗马帝国来说依然是不足挂齿的小数目。[14]

5年后，罗马人再度激起匈人入寇。447年，阿提拉挥师南下，击败前来迎击的罗马军队，直抵温泉关（Thermopylae）。罗马人一面遣使议和，一面暗中策划政治阴谋和暗杀行动。这些活动的一些具体细节见于448年被派往阿提拉牙帐的罗马使者之一普利斯库斯（Priscus）的记

录。公元450年，当双方和谈尚在进行之中，狄奥多西二世去世，马西安（450-457年在位）即位。他终止了给匈人的岁币。

而阿提拉也不再对和谈抱有期望，引兵攻向东罗马帝国问罪。自445年前后布列达死后，阿提拉已经成为匈人帝国的唯一领袖。这时，他又得到一个兴兵西罗马帝国的正当理由。他收到西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425-455年在位）之妹奥诺利亚的来信。她在信中称其兄杀其情夫，将其囚禁，并求阿提拉援救，以随信寄去的戒指为凭。阿提拉将此信视作奥诺利亚求婚之请，即率由匈人、哥特人和阿兰人组成的联军西进，前往营救奥诺利亚，欲夺西罗马帝国之半壁作为聘礼。史载其大军或有30万到70万之众，当然，其真实的数目应当远低于此。

451年，匈人先攻陷并洗劫了在高卢和日耳曼尼亚等地莱茵河一线的西罗马帝国北方诸城，随后挥师挺进高卢中部，直扑向高卢西北部的战略重镇奥尔良。在匈人进攻的同时，罗马大将弗拉维乌斯·埃提乌斯也统率着由罗马人、法兰克人和西哥特人组成的联军向前线赶来。阿提拉暂避其锋芒，蓄力待战。

众所周知，罗马人不善与游牧民族作战。当年匈人能在马背上横扫欧洲，破罗马军想必也似摧枯拉朽。然而，尽管当时匈人仍然控制着黑海草原（阿提拉一子领有黑海沿岸诸部[15]），但在西欧境内几乎没有草场放马。潘诺尼亚相对有限的草场也不能养活中央欧亚游牧民所需的如此大量的牲口。匈人仅能够为一支辅助骑兵部队提供足够的马匹。因此，他们在高卢和意大利几乎全部以步兵对战罗马人。[16]

451年6月20日前后，两军终于对阵于卡塔隆平原。[17]此战惨烈异常，双方均死伤甚众，据史料估计战死者或达20万，甚至30万。因埃提乌斯领军有方，且对匈人的战术了如指掌，他最终得胜此役，但痛失其盟友西哥特王狄奥多里克。埃提乌斯曾在408年斯提里科死后入质于匈人中，得以掌握有关匈人战法的一手信息。[18]罗马尽管得胜，也元气大伤，更兼盟军西哥特部撤走，埃提乌斯遂放弃追击匈人。而阿提拉一方尽管仍有实力，也撤回潘诺尼亚。

452年，匈人没有再次攻向高卢，而是越过阿尔卑斯山直下意大利。他们劫掠了位于意大利北部波河谷等地的城市，之后兵锋南向拉韦纳。拉韦纳时为西罗马帝国首都。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弃拉韦纳城，向南逃至罗马城。一队包括教皇利奥一世在内的罗马使团前往波河会见阿

提拉，教皇欲说服他放弃攻打拉韦纳。

此时退兵正合阿提拉心意。一方面，他的将士正在当地饱受饥馑和瘟疫的折磨，苦不堪言；另一方面，东罗马皇帝马西安正派军偷袭匈人在潘诺尼亚的老巢。阿提拉于是退兵。次年初，在他迎娶美丽的新娘伊尔迪可的大婚之夜，阿提拉不明缘由地死去[19]。匈人以传统的草原葬俗葬之。[20]

阿提拉的三个儿子为了权力互相争斗，但没人能胜出。役属于匈人的日耳曼诸部相继起义。455年，格皮德（Gepid）王阿尔达里克率部在潘诺尼亚击败匈人主力，并大肆屠戮。阿提拉的长子艾拉克也在此役中被杀。匈人残部大都向东南方向逃往黑海沿岸地区，聚集在阿提拉的幼子埃尔纳克的麾下。匈人的帝国此时已告瓦解，但埃尔纳克之兄邓吉西克所统领的一部匈人在东南欧地区仍是一支不容小觑的力量，一直活跃到469年邓吉西克被杀之时；埃尔纳克麾下的匈人则一直是西部草原的主要族群，延续数代之久，最终融入其他民族中。[21]

在朝中有人处处掣肘的情况下，埃提乌斯仍凭一己之力扶西罗马帝国于将倾。但他在454年被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杀害。皇帝本人则在次年被埃提乌斯的支持者刺杀，但这已于事无补。名将埃提乌斯身死以后，西罗马帝国再无可用之人。

到473年东哥特人攻入意大利之时，西罗马帝国已经支离破碎。潘诺尼亚的罗马人奥莱斯特先前曾是阿提拉的左膀右臂。他在475年废黜了罗马皇帝奈波斯，并将自己的幼子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Romulus Augustulus）立为皇帝。这个小皇帝享皇位一年有余。476年，斯基里部（Sciri）[22]首领鄂多亚克（Odoacer）将他废黜，并自立为意大利之王。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路斯是为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鄂多亚克的统治持续到493年。是年，东哥特人狄奥多里克在拜占庭方面的授意之下进攻意大利，将鄂多亚克诱杀。[23]他接过了鄂多亚克的地盘，在那里建立起一个由东哥特人统治的王国，王国的疆域最终囊括亚平宁半岛、西西里、达尔马提亚（Dalmatia）以及北方一些地区。当然，他在名义上仍然遥尊东罗马帝国为宗主，而且他受罗马文化的影响远较鄂多亚克更深。在他的治下，王国安定祥和，罗马和哥特文化同时得到了发展。

西欧地区的早期日耳曼诸国

在西罗马帝国覆亡之前，就开始有大批日耳曼人迁居帝国境内，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

在西北方面，位于不列颠的罗马殖民地在410年时已经被帝国放弃，时任罗马皇帝的霍诺留竟然号召当地被围困的罗马公民自卫。[24]在4世纪到6世纪的民族大迁徙中，爱尔兰人一路迁徙，定居在不列颠岛的西岸，尤其是苏格兰地区。以盎格鲁、撒克逊和朱特三部为主的日耳曼人也横渡英吉利海峡，登陆不列颠，并带来了中央欧亚文化系统当时在大陆地区最新的版本。[25]日耳曼人迅即成为不列颠地区的主导力量。[26]

汪达尔等部则向南方挺进，席卷高卢和西班牙，一路烧杀劫掠，最后渡地中海到达北非。他们在北非建立起以迦太基为中心的王国，一直存续到7世纪中期阿拉伯扩张之时。

西哥特部跟随着汪达尔部的脚步，先迁入高卢的阿基坦地区，后又攻占伊比利亚半岛。法兰克人又在他们身后步步紧逼，迫使他们逐渐放弃在高卢的领土。他们最终在西班牙地区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政权，一直延续到8世纪中期，后为阿拉伯帝国所灭。

其他诸部，譬如勃艮第和伦巴第等，也都建立起了存续颇久的政权，在所占领的土地上留下了本民族文化的印记。但这些政权后来均被更强大的势力吞并。

在西欧地区最为重要的日耳曼部族是法兰克部。他们应当是来自莱茵河东岸。但据记载，法兰克人自己认为本部最早来自潘诺尼亚甚至更东的地方。[27]在早期墨洛温王朝希尔德里克一世及其子克洛维两代君主的治下，法兰克人逐渐将势力扩展到整个高卢。他们在中世纪早期建立起地中海以北欧洲（Europe north of the Mediterranean）的第一个农业-城市帝国（agrarian-urban empire）。[28]法兰克人、哥特人、盎格鲁-撒克逊人以及其他日耳曼部族的入侵使中央欧亚文化系统在原罗马帝国地中海以北欧洲的领土上重新确立。但是罗马人和其他罗马化的人口仍然存在，并且影响很大。属于中央欧亚文化系统的日耳曼人与当地

原有的罗马化人口的文化融合构成了一种崭新文明的基础——日后成形的独特的欧洲文明。

东罗马帝国和萨珊波斯帝国的扩张

西罗马帝国自3世纪以降迅速衰落，在5世纪土崩瓦解。但东罗马帝国的核心地区却没有经历经济和政治上的衰退，反而成功地延续了国运。东罗马（或称拜占庭）帝国在语言上逐渐希腊化，其文化的重心逐渐转向近东地区，其对外政策的重心渐渐固定在波斯方面。

公元224年，阿尔达希尔推翻安息帝国统治者阿尔达万的统治，建立萨珊王朝。他迅速控制了波斯全境——包括伊朗高原和美索不达米亚东部。萨珊波斯也自此开始了与东罗马帝国的争斗，因为东罗马之前就一直在与帕提亚争夺美索不达米亚的控制权。萨珊波斯志在复兴几百年前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全部疆域，包括美索不达米亚西部、安纳托利亚以及近东其他地区的大部，因此与东罗马连年鏖战。两国在美索不达米亚接壤，边界线数次因战事变更。

萨珊波斯也向东方进取，攻打贵霜。它攻下巴克特里亚和河中地区，并使贵霜王朝残存势力臣服。

5世纪时，嚈哒人（或称“白匈人”）开始进攻萨珊帝国治下的中亚，并在483年击败萨珊波斯，迫使其纳贡。嚈哒人自此定居在巴克特里亚和河中地区，在当地称雄1个世纪。他们的势力向东可以影响到塔里木盆地东部的吐鲁番，并曾向北魏派遣使节。[29]

萨珊波斯帝国在库思老一世（531-579年在位）治下达到极盛。561年，库思老一世在一场鏖战中大败东罗马，由此开启了其治下的安定盛世。[30]

汉帝国的崩溃与鲜卑人入主中原

继承西汉（公元前202-公元8年）而立的东汉（25-220年）政权最终也因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覆灭。其后，中华大地三国鼎立，相互攻伐征战半个世纪之久。最终司马氏灭三国，统一天下，创立晋朝（265-420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晋朝都可被视为东汉的延续，但在军事层面上，它远逊前朝。

随着晋朝的衰弱，因汉朝在北方地区的扩张和经营而产生的民族问题经过长时间的积累，终于集中爆发。源出东北地区、曾长年与中原王朝争战的鲜卑人（属蒙古语族）的一支南下中原。[31]此部自称“拓跋”（*Taghbač）[32],意为“大地之主”[33]。他们创立了一个全新的中原式王朝——北魏（386-534/535年；其分裂后形成的东魏和西魏在550-557年先后灭亡），统治中国北方地区近2个世纪之久。

在北朝蓬勃发展的同时，江南地区被数个汉人建立的王朝割据。[34]在前后2个世纪的时间里，东亚汉文化圈一直处在南北分立的局面中。在北方，先后有数个由异族建立的王朝统治着占居多数的汉族民众；在南方，则有数个由汉人建立的王朝统治着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民众。

柔然及新兴的突厥人

在拓跋鲜卑入主中原的同时，柔然（阿瓦尔）[35]统一了东部草原，建立起一个庞大帝国，其势力范围西起塔里木盆地西北部的焉耆，东抵高句丽国边界。[36]柔然人的语言和族属至今仍然不能确定。[37]据汉文史料记载，柔然人的始祖曾在拓跋鲜卑部为奴。[38]诚如所记，柔然人曾役属于鲜卑，则他们理应在此期间逐渐习得中央欧亚文化系统下的作战技艺，遵循着“最初的故事”，逐渐发展壮大，最终推翻鲜卑人的统治。与拓跋珪建立北魏几乎同时，柔然人也在首领社仑的率领下在东部草原和塔里木盆地北部建立起他们的帝国。[39]他们称霸草原地区长达2个世纪之久，其间也数遇危机，包括拓跋鲜卑和其他部族的进攻。柔然人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当年匈奴帝国的版图，将草原各部统一在其麾下，包括突厥人。其后，柔然汗国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动荡和分裂。524年，阿那瓌成为柔然可汗[40]，重新恢复了柔然汗国的强势。

扶余-高句丽人向朝鲜半岛的迁徙

在公元后最初的几个世纪中，扶余-高句丽人建立的政权均在中国东北地区，统治、奴役当地民众。高句丽人曾多次进攻中原王朝最东方的前哨——位于朝鲜半岛北部的乐浪郡。尽管他们的势力曾经数度强盛，但朝鲜半岛北部一直牢牢控制在中原王朝的势力之下。这种局面甚至一直持续到汉朝灭亡以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高句丽人在西面还有一个劲敌——慕容鲜卑。两国间颇有几次大战，慕容鲜卑曾先后两次大败高句丽。

到公元4世纪，高句丽终于攻下乐浪。高句丽人取☆Piarna（在高句丽语中意为“平地”，即“平壤”）作为乐浪的新名称，并迁都于此。此后，扶余-高句丽各部民众陆续迁入朝鲜半岛，逐渐占领半岛的大部。一支扶余人在朝鲜半岛西南部、原马韩之地建立起百济政权。另有一支扶余-高句丽人在半岛的东南端、原辰韩之地建立起新罗王朝，但朝鲜语仍然在当地流行。只有一个地区没有被扶余-高句丽民族控制，当地语言也没有受到高句丽语影响。这便是位于半岛南岸中央地区的原弁韩之地。此地以“加罗”（Kara）或“任那”（Mimana）之名[41]见于史册，在政治上从未能与半岛上其他三国平起平坐。[42]现存关于加罗的史料不多，但可以确定的是，它曾深受日本的影响。即使它不是日本直接控制的殖民地，也至少一度是向日本称臣纳贡的属国。朝鲜半岛在三国时代经历了人口的增长和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伴随着几乎连年不断的战争。

日本列岛的中央欧亚文化系统

在欧亚大陆的远东一隅生活着操原始日本语的倭人，他们显然并不属于中央欧亚文化系统。在弥生时代（约公元前4世纪-公元4世纪）[43]的初期，他们自东亚大陆（辽西地区）[44]迁徙至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南端[45]。在吸收了一部分从朝鲜半岛传来的文化因素的基础上，他们逐渐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文化系统。

倭人在贸易上和政治上都与朝鲜半岛的政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贸易的大宗是铁的进口，因为朝鲜半岛南部是铁的重要产地。随着扶余-高句丽民族南下进入朝鲜半岛，纷纷建立政权，许多倭人也参与到这些政权相互攻伐争斗的混战中。

在倭人出兵朝鲜半岛的经历中，他们曾无数次被属于中央欧亚文化系统的扶余-高句丽武士击败。[46]根据“最初的故事”，那些为扶余-高句丽领主效力的倭人武士想必也从他们的主人那里习得了中央欧亚文化，尤其是那些充任私兵的倭人武士（他们在古代日本语中被称为toneri，即“舍人”[47]）。日本早期的骑射武士（bushi）和后来的“侍”（samurai）一样，都“只是称雄中东和草原地区的亚洲骑射武士的一种；日本历史上最初几个世纪里的各种武士之间的共性远大于他们之间的差异”[48]。早期日本领主的贴身侍卫在主人死后理应自杀陪葬（“殉死”），他们一般都做到了这一点。随着一些倭人武士从朝鲜半岛返回日本，以及一些朝鲜半岛居民的到来，中央欧亚文化系统被传播到了日本，[49]导致了日本地区文化和政治上的革命性变化，是为日本历史上的古坟时代。日本的皇朝也在这一时期产生，并开始其统一日本列岛的进程。[50]此后，这个岛国开始将目光投向大陆，学习那里的先进文化。

民族大迁徙与中央欧亚

中央欧亚民族向古典文明地区迁徙的原因并不清楚。[51]我们唯一清楚的是民族大迁徙这一事实本身。当然，这无疑是影响历史的大事件。但民族迁徙在中央欧亚是经常发生的事件。生活在草原地带的中央欧亚民族多数是游牧或半游牧民——他们在一年之中转换着牧场，他们的牲畜持续地迁移。尽管牧民们知道在一年中的某个时段某处牧场上的水草属于谁家，但牧场与牧场之间一般没有清楚的标记。正因为如此，流动性是中央欧亚地区的显著特征。这里的国家是以各自的民众来区别的，而并非以他们居住的土地来划界。

有史记载以来，欧亚大陆各地，包括中央欧亚的全部地区，被一个又一个民族占据。尽管也有一些政治安排和人口成分变化曾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但通常情况下，争议领土的所有权最终由战争决定。战败一方的统治阶层要么引颈就戮，要么俯首称臣，余下的只有远走他乡，有时他们会逃入周边的帝国，比如罗马或中国，在那里寻求庇护；而战败一方的民众——大多是农民或者牧民，则通常会融入新的国家。在普罗大众的层面并不一定会有变化发生，许多民族在统治民族变更以后仍然可以保留其语言和习俗长达几个世纪之久。这种模式在中央欧亚地区循环往复，自有史记载直至晚近，这与欧洲、中国等周边的城市-农业文明中循环发生的王朝兴替、疆土得失是完全相同的过程。

大凡帝国雄主，无论其出身游牧民族还是农耕民族，无不希望向四面八方开疆拓土。如上文所述，草原地带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而中央欧亚民族又向来不重视疆界边防。如此一来，一旦草原上某一部落在群雄中胜出，乘势壮大，就有可能一路势如破竹，在短时间内席卷整个欧亚草原地带，一直到外围的农耕文明的边界。在中央欧亚的历史上，整个草原地带至少有三次被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斯基泰（或称北伊朗人）时代、突厥时代和蒙古时代。

而在欧亚大陆外围的农耕地带，耕地是国家最根本的微观成分。国与国之间的边界正是耕地与耕地之间的界线的宏观反映。国家内部的政治秩序需要国家机器的强权来维持；边界的进退则通过战争来实现。农牧交错的边境地带吸引着两边的商人到来，汇聚到商贸重镇从事贸易活

动。当边境地带在外围的农耕文明手中时，这些城市往往被严格管控，课以重税。生活在边境地带的中央欧亚民族在文化上受邻近的农耕文明浸染，会在一定程度上罗马化、波斯化或汉化。

一定会引发民族迁徙的具体因素之一是罗马和中国同时出现了经济的衰退。这些大帝国的边境地带比它们的中心地带更容易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因为中心地带往往积蓄有大量的财富，可以缓解经济压力。当边境城镇深陷经济衰退、难以为继，甚至被放弃的时候，原本在这里谋生的外国商人、工匠和劳役的处境可想而知。

外围农耕帝国的经济衰退也会使中央欧亚地区的统治者陷入危机。他们需要源源不断地获得奢侈品或其他财物分赏给私兵和盟友，以维持他们的统治。当边境地区的市场衰落，或因战事被摧毁，亟待进行贸易的一方就不得不越过边境，向内地深入，寻求进行贸易的可能。有两个帝国的例子可以作为这个理论的旁证（这两个帝国内部没有发生严重的经济衰退，因此它们没有被民族大迁徙的浪潮吞噬）。一个是东罗马帝国。它比西罗马更加靠近中央欧亚。虽然它的领土大幅度收缩，但仍然在民族大迁徙的浪潮中幸存。另一个是波斯帝国。它在民族大迁徙中只丢失了中亚的领土，其本土并没有受到影响。

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衰落以后，之前长期封闭的边界门户大开。生活在边境地区，已经一定程度上罗马化或汉化的中央欧亚民族会向帝国内部迁徙，以便获得更加安全、稳定的生存环境。这批移民已经适应了农耕文明的生活方式，他们希望保卫这种生活方式。

在欧洲，他们与罗马人并肩战斗，一起抵抗哥特人、匈人等来自中央欧亚更深处的、更纯粹的游牧民族。而这些入侵的游牧民族也想得到同样的东西，比如匈人就一直试图与罗马人在边境市场进行贸易。他们在这件事上目标明确、执着且热情满满。当边境地区的政治秩序和人口成分发生变化以后，一连串反应被引发，一直传递到中央欧亚的深处。这一系列连锁反应即民族大迁徙。民族大迁徙所引发的根本性变化发生在西欧地区。

欧洲的再度“中央欧亚化”及中世纪的变革

随着西罗马帝国渐渐衰落，北欧、东欧等地区一定程度上罗马化了的中央欧亚民族渐次向西罗马境内迁徙。尽管也有大量移民涌入东罗马帝国，但当地更加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更具活力的经济使得这些移民被当地占多数的希腊居民同化。而在西罗马境内，许多罗马人新建的城市都靠近帝国的北疆。这里曾是日耳曼人或凯尔特人的领土，当地居民在文化上属于中央欧亚文化系统，而并非孕育了罗马帝国的、属于地中海-古代近东文化系统的希腊文化。当西罗马帝国内部开始出现危机，政府不得不将重兵调回帝国中心地区——意大利北部和罗马。尽管边疆地区的居民已经相当程度地罗马化了，但他们骨子里仍然流淌着中央欧亚民族的热血：他们最看重贸易；如果别无他法，他们绝不忌惮动用武力去开辟市场。当西罗马边境地区的贸易城市开始衰落，中央欧亚民族就会向西罗马的中心地区挺进，以寻求新的市场。这势必导致他们与当地罗马居民的冲突，迫使罗马人继续向南节节败退。

因为某些尚未弄清楚的内部原因，当时罗马帝国境内的人口已经锐减。边境地带的居民向西罗马帝国内部的迁徙也带动了原本生活在中央欧亚更深处的部族向西、向南移动。伴随着这一系列迁徙活动，一大批新的政权甚至帝国在中央欧亚和罗马帝国边境地区陆续建立。哥特人、匈人和法兰克人在4-5世纪的活动将大迁徙推向高潮。他们几乎席卷了之前已经罗马化了的整个西欧地区。到5世纪末时，中央欧亚文化系统不但在之前没有罗马化的北欧、中欧和东欧地区根深蒂固，而且还扩展到了之前已经罗马化了的北非、伊比利亚半岛、英格兰、法兰西、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北部、日耳曼尼亚和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

亨利·皮雷纳（Henri Pirenne，也称“皮朗”）认为西欧的中世纪及中世纪文明并非始于“蛮族”的入侵，而是源于伊斯兰世界崛起后控制了地中海交通，导致原属于西罗马帝国境内的各地对外联系中断，使其陷入贫困。[52]这个观点非常著名，但极具误导性，因为其立论的基础有数处硬伤，与宏观和微观的历史事实都不相符。[53]该观点至今仍被大多数治中世纪史的学者们遵从，理由各式各样，但都不正当。正因如此，中世纪欧洲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迄今仍是一个历史之谜，学者们对此的解释林林总总，新说层出不穷。

“蛮族入侵说”是其中最为古老的观点。生活在民族大迁徙同时代的古典作家就已经指出，“蛮族”的入侵是古典时代与中世纪之间的转折点。现在，我们应当从中央欧亚文化系统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这一观点。中央欧亚文化系统以日耳曼文化的形式再度被引入西欧地区，并在当地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社会系统。毫无疑问，我们所谓的“中世纪文化”正是由此逐渐生发而来的。其显著特征包括封建制度、商贸城市的特殊地位以及武士阶级的特殊地位。一些希腊-罗马文明因子继续存在着——最明显的例子是拉丁语一直被用作西欧地区共同的书面用语，而在南欧地区个别偏僻的村落里仍生活有上古时代的遗民。但这些事实都不代表古代地中海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在原西罗马帝国境内的任何一个地方仍然占据主流。当然，这种文明也没有完全消亡。罗马人和罗马化的民族依然生活在新兴的日耳曼人政权下，两种文化背景下的居民开始渐渐融合。罗马化的西欧重新被中央欧亚文化浸染。这次“再中央欧亚化”的过程导致欧洲文化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大转型，这就是之前普遍被认为波澜不惊的中世纪。[54]

---

[1]上引段落为恶魔葛婪代（Grendel）出场前的铺垫。他后被英雄贝奥武甫击败。关于文本的问题，详见注释55。

[2]冯象译《贝奥武甫》，北京：生活·读者·新知 三联书店，1992年，5-6页。——译者注

[3]至今仍常有学者试图将匈人比定为匈奴（比如de la Vaissière 2005d），但这种观点存在很多问题。参看第二章“东部草原：‘匈奴’”一节及注释51、52。

[4]除此以外，史籍中再无任何有关巴兰比尔的记载。

[5]厄尔曼纳里克曾率东哥特大军东征西讨、攻城略地，这点广为人知。因此，在探讨匈人出现的原因时，不应不考虑此事。但现代的历史学家仍然将匈人进攻阿兰人和哥特人看作无缘无故之举。史料中并没有留下匈人进攻的动机，但考虑到东哥特人之前的一系列动作，匈人的进攻可能是对东哥特人的报复。关于厄尔曼纳里克所建的帝国以及哥特人早期的历史，参看Wolfram（1988）。

[6]Wolfram（1988:133）。

[7]Wolfram（1988:119）。

[8]Wolfram（1988:135-136）。

[9]参看Sino（1990c：182-183），文章对此说法表示怀疑。然而，当有关匈人袭击的信息足够充分时，我们看到他们这样做似乎是基于正当的理由。见注释56、57以及《尾声》。

[10]参看Sino（1990c：184）。关于匈人与嚈哒人及其他部族经常混淆的问题，见注释56。

[11]罗马边境将官不端的行径是匈人怨恨罗马人的原因之一。关于这点，参看注释57。

[12]Blockley（1983，II：227）。

[13]“狄奥多西是第一位定都于君士坦丁堡的罗马皇帝……之前的皇帝在各个都城间迁转生活，狄奥多西之后仍有一些皇帝如此。”（Howarth 1994:61。）

[14]这些以黄金付给匈人的岁币虽被时人和今人描述为重负，但实际上只是罗马帝国的一笔微小开支。从另一个角度看，“4000罗马镑黄金相当于富裕阶层的一位长老的年收入”（Wolfram 1988:154）。特里高德（Treadgold 1997:40，145）指出，查士丁尼将罗马金币的纯度改为72%每罗马镑。他估计罗马帝国在450-457年的年预算约为778000枚金币。因为2100罗马镑黄金与151200枚金币等值，则付给匈人的岁币仅为帝国预算的1.9%。君士坦丁堡和富人们因匈人的岁币陷入赤贫的故事纯属虚构。

[15]Blockley（1983，II：275）。

[16]对此问题更详细的讨论，参看Lindner（1981）。

[17]战场的具体位置不明。普遍认为在香槟地区的某处，即今沙隆附近，但并不确定。

[18]此前数年，埃提乌斯还曾入质哥特人中，因此他对于匈人和哥特人战术的了解之详备，想必无人能出其右。

[19]关于其死因流传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据普利斯库斯的说法，阿提拉当晚被鼻血呛死（Blockley 1983，II：316-319）。此“鼻血说”颇为可信。另外的观点则认为阿提拉是被谋杀，这也有可能。但鲍勃科克（Babcock）的观点不可取，他认为阿提拉为其最信任的侍卫埃德科（Edeco）和奥莱斯特（Orestes）所杀（Babcock，2005）。

[20]根据约达尼斯（Jordanes）的记载（Blockley 1983，II：319），那些为阿提拉殉葬的人肯定都是按照仪式被杀死的（参看Sinor 1990c：197），并很可能出自他的私兵。鉴于有人亲眼见证并记录了葬礼的过程且没有被杀死，可知上述杀戮并非为了隐藏墓葬的位置。

[21]西部草原的匈人后来成为多瑙河保加尔人的一部分。这是一支操突厥语的民族。680年，他们在首领阿斯帕鲁克的率领下进入巴尔干地区，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政权，是为保加利亚的前身（Sinor 1990c：198-199）。如同中世纪以前的“斯基泰”一样，“匈人”一词在随后的历史中发展成为一个泛称（常含贬义），指一切草原游牧民族，甚至用以指代一切来犯之敌，而不论其真实的族属为何。

[22]其为东日耳曼诸部之一。——译者注

[23]Wolfram（1988）。

[24]Blair（2003:3）。

[25]凯尔特人在日耳曼人之前登陆不列颠。当时他们为不列颠群岛引入了较早的中央欧亚文化系统，包括双轮车。

[26]Blair（2003:1-6）。

[27]Beckwith（待刊a），Wood（1994:33-35），Ewig（1997）。

[28]Woood（1994:38-42）。

[29]Millward（2007:30-31）。参看注释56。

[30]Frye（1983:153-160）。

[31]作者未提及西晋末年“五胡乱华”“永嘉南渡”等历史过程。拓跋鲜卑南下进取中原的过程实际发生在东晋十六国时期，他们的主要对手并非晋朝。——译者注

[32]此名的读音可构拟为*Taγβač；在古代突厥语中，此词发生语音易位（metathesized），作Taβγač。此名的源语言部分为蒙古语，部分为印度语（Beckwith 2005b；Beckwith,，待刊 a）。

[33]原文作“Lords of the Earth”。据汉文史料记载，拓跋鲜卑自称黄帝之后，而黄帝以土德称王。在北族语言中，“拓”为土，“跋”为后，“拓跋”为土之后人，即黄帝之后。参看《魏书》卷一《帝纪·序纪》。——译者注

[34]原文如此。“永嘉南渡”以来，东晋、南朝各代在江南地区更迭兴替，中国南方并未有政权割据分裂的局面。作者误。——译者注

[35]关于柔然与阿瓦尔的勘同，以及关于阿瓦尔一名的相关问题，参看注释18。

[36]Sinor（1990c：293）。

[37]柔然（阿瓦尔）人很可能不属于蒙古语族，关于其族属的讨论，参看注释58。

[38]Sinor（1990c：293）。

[39]Sinor（1990c：293）指出，关于阿瓦尔人（柔然人）的材料极其有限。其实不然。在汉文史料中有大量关于柔然的记载，足够学者著书立说。

[40]在古代突厥语中，“可汗”（qaγan）一词还有阴性的对应词“可敦”（qatun）。和qaγan一样，qatun从形态学的角度看既不是突厥语也不是蒙古语。可汗这一称号最早见于3世纪中期的鲜卑人中。鲜卑人是蒙古语族，但此词从结构上看却非蒙古语。此词的来源和形态至今不明确。这两个词的共同词根应当是*qa-，是在欧亚大陆东部常见的表示“王”的词汇。最早的例子出现在上古时代晚期的朝鲜半岛，晚期的例子则见于早期的蒙古语材料中（契丹语和中古蒙古语）；参看Beckwith（2007a：43-44，46-47页注释46）。柔然人毫无疑问深受属于蒙古语族的拓跋鲜卑的影响。

[41]外族人称其为“Kara”，这或可说明其本民族的自称为“Mimana”。

[42]参看Beckwith（2006c）。

[43]有关弥生时代的定年，见注释60。

[44]辽西是该民族历史记忆中在亚洲大陆的最后一处住地（Beckwith 2007a）。

[45]关于朝鲜半岛早期居民的语言、族属尚存争议，相关争论参看注释59。

[46]即使在现存有限的史料中也可见有关于倭人惨败于扶余-高句丽武士剑下的数次记载。可想而知，类似的败绩应当不在少数。当然，倭人定然也有获胜之时，只是有关这些战事的记载已经失传。

[47]Toneri（舍人）被译作家臣（Farris 1995:27-28）。至少在一例早期的材料中，舍人被其主人称为奴。在中央欧亚文化系统中，私兵通常被视为主人的奴仆。

[48]Farris（1995:7）。

[49]中央欧亚式的葬俗的引入，以及这一时期的坟冢在规模和华丽程度上的大幅提升，是中央欧亚文化传入的最显著标志（日本史上这一考古-历史时期被称为“古坟时代”正是因为这些独特、巨大的古坟）。另外一个标志则是私兵武士自杀为主人殉死之风。这种传统虽然后来并不被鼓励，但仍然一直被武士阶层沿用，直到近代。有关这一问题的全面研究参看Turnbull（2003）。

[50]一般认为日本皇室源出朝鲜半岛，有人甚至具体指出其出自百济。但这种说法在日文或其他语言的史料中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江上波夫曾于1964年以英文发表其“骑马民族理论”。他提出，一支来自亚洲大陆的阿尔泰语族草原游牧民族征服日本，并建立起日本皇朝。这个独到的观点虽然已经被考古证据否定（Hudson 1999），但毫无疑问，皇朝肯定是由一群从朝鲜半岛习得了中央欧亚文化的武士建立的，他们就是从半岛返回日本的日本武士。现存大量证据可以证明日本皇朝由中央欧亚化的日本人建立，其中一些证据在江上波夫的著作中就已经被列出（Egami　1964）。这与日本皇室朝鲜出身说严重缺乏证据支持的状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参看Beckwith（2007a）。

[51]本节描述的场景只是无数种可能性中的一种。有关民族大迁徙起因的传统的、错误的、毫无根据的理论，参看注释61。

[52]Pirenne（1939）。

[53]此理论曾被广泛讨论。里昂（Lyon，1972）曾全面搜集相关讨论，显示该理论的各个方面都有漏洞，经不起推敲。但是，里昂却出人意料地得出这样的结论：皮雷纳的理论及其对中世纪开始时间的界定一直被广泛接受，这说明其理论定然含有一定合理的成分。对这种观点的具体批评，参看Beckwith（1987a/1993:173页起）。

[54]在中世纪盛期，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引入的知识和技术加速了欧洲文化的发展，这也是促使现代科学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这也没有剔除欧洲文化中的中央欧亚文化因素。这点在大航海时代的历史中反映得尤为明显，见第九章。

第五章　突厥帝国

天马来出月氏窟，

背为虎文龙翼骨。

嘶青云，振绿发，

兰筋权奇走灭没。

腾昆仑，历西极，

……

——李白《天马歌》

欧亚大陆的第二次区域帝国时代

6世纪中叶，波斯（萨珊波斯）帝国与东罗马帝国交战正酣，而东亚和西欧同时深陷封建割据之中。在东部草原，中央欧亚文化系统神秘的兴替规律再度应验，突厥人推翻了他们的领主阿瓦尔人[1]，并追剿其残部直到（中央）欧亚的各个角落。在此过程中，他们通过中亚——（中央）欧亚城市化了的核心地带，将所有的周边文明联系起来。而中亚不但迅速崛起为中央欧亚的商贸-文化中心，也成为欧亚大陆这个整体的中心。突厥人热衷商贸，而他们强大的军事实力也促使其他民族乐于与之贸易。更兼他们直接控制了中亚的大部分地区，这些因素使得中央欧亚的经济——丝绸之路进入了空前的繁荣。

到6世纪末叶，中国由短命的隋王朝重新统一，中原王朝曾再度尝试进取中央欧亚。隋亡后不久，波斯和东罗马帝国接踵而亡。其后，新的帝国在中央欧亚及其边缘地带陆续建立：西欧的法兰克；近东的阿拉伯帝国，其版图最终囊括了印度、中亚西部、伊朗、北非、西班牙，以及阿拉伯本土；中央欧亚东南部的吐蕃帝国；中国的唐王朝，其版图迅速扩张到中央欧亚的东部及其他邻近的地区；在中央欧亚仍然占据着东部草原的突厥帝国，以及可萨王国等由操突厥语民族建立的若干政权；过去的东罗马帝国，现在它又以一个崭新的、更加稳固的帝国形象出现，并以希腊语为官方语言。在欧亚大陆的第二次区域帝国时代，中央欧亚及其繁荣的经济吸引着欧亚大陆所有主要国家的目光。这一时期以中世纪早期之名更为人所知。

所有这些国家都觊觎中央欧亚，都力图至少占领其中与自己毗邻的一隅。因此，这一地区在中世纪早期（约620-840年）的文化繁荣几乎一直伴随着战火。战争中的一些新的特点直接反映出欧亚大陆的主要帝国不再各自为营，大帝国之间开始结盟对抗其他的帝国联盟。中亚地区连绵的战事持续升级，在8世纪中叶的突骑施和帕米尔等战役中达到高潮，最终以阿拉伯帝国[2]和唐朝联盟战胜中央欧亚民族而告终。随后，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相继出现衰退。这表明当时的世界已经在经济上紧密联系，并依赖于中央欧亚的经济——丝绸之路的繁荣。

东部草原的柔然帝国

4世纪末至5世纪初，族源不明、曾役属于鲜卑的阿瓦尔人（即柔然人）称雄北方草原，其势力从塔里木盆地东北部直达朝鲜半岛。与此同时，蒙古语族的鲜卑拓跋部也建立起强大的帝国，囊括中国北方大部和蒙古高原南缘。这两大强权常年交战。直至6世纪初，当时汉化程度已经很深的拓跋鲜卑始与柔然可汗阿那瓌言和。公元545年，北魏东西分裂。东魏继续与柔然联盟，而西魏与突厥首领土门[3]连兵。当时突厥人尚役属于柔然，首领土门称叶护（小王）。

公元546年前后，土门获悉游牧在蒙古高原北部的部落联盟铁勒图谋进攻柔然。他出人意料地率先发兵，一举击溃铁勒。土门借此向柔然可汗阿那瓌邀功，欲娶柔然公主。但阿那瓌羞辱了突厥人，蔑称其为“锻奴”。土门一怒之下转向中原王朝。同年，他求娶于西魏，得娶西魏公主。公元552年，土门攻灭柔然汗国，阿那瓌自尽[4]。突厥人在欧亚大陆上纵横万里追剿柔然残部，不断征服所到之地，直到他们统一整个中央欧亚的草原地带，并与中国、波斯和东罗马诸帝国直接接壤。[5]

阿瓦尔人得到了东罗马帝国的庇佑。部分得益于其与其他民族之间巧妙的联盟关系，他们得以进入潘诺尼亚平原，并驻牧于此地。他们继续称其首领为可汗，始终是突厥人的心腹之患。

突厥霸业

突厥的权力中心至少在理论上是“Ötükän Yish”,即“于都斤山林”（也译“郁督军山”），地望在阿尔泰山中。[6]此处有突厥先祖所居的洞穴，每年都在洞中举办祭祀仪式。[7]不论何人，凡得于都斤山者，便有号令突厥诸部的最高权威。而在实际中，它只意味着东部草原的统治者享有“可汗”这一至尊称号，并在名义上高于其他诸部（于都斤山在东部草原）。突厥人实际驻牧之地是鄂尔浑河流域（今蒙古中北部），这里在历史上一直都是东部草原帝国的中心。

古典拉丁文史料中有关突厥民族最早的历史记录提到突厥人生活在亚速海北面的森林中。[8]突厥民族再次见于史册是在匈人联盟时代，因为联盟中的一些部落名号具有明显的突厥语特征。至迟到6世纪中叶，当突厥人出现在汉文史料中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为草原游牧民族，并且掌握了在草原上作战的技能。他们同样也已掌握了高超的冶铁工艺，并继续以此为业。突厥人使用的柔然头衔表明他们已经从柔然人那里继承了建立和管理草原游牧帝国的一系列制度。

突厥人的宗教信仰的核心是天神腾格里和大地女神乌迈（Umay）。[9]一部分突厥人——以吐火罗斯坦的西突厥人为代表——很早就皈依了佛教。佛教在他们的生活中举足轻重。其他的宗教也有重要影响，尤其以基督教和摩尼教为最。这两种宗教流行于粟特人中，而粟特人善于跨国行商，是突厥人亲密的盟友。尽管粟特人是定居的城市居民，但他们同突厥人颇有性味相投之处：两者都有中央欧亚民族的尚武之风和全民皆兵的传统，而且都热衷于商贸。

土门自称可汗，统领汗国东部，卒于称汗次年。其子科罗即汗位，数月后卒。其后由土门的另一子俟斤继位，称木杆可汗（Bukhan，553-572年在位）。土门之弟室点密为副汗，称“叶护”或“叶护可汗”，治汗国西部，其冬都牙帐在今焉耆附近。汗国西部后来逐渐发展成为实际独立的西突厥汗国。而土门的后代统领（蓝）突厥人，即东突厥汗国，并保有名义上的最高权威。[10]

在追剿阿瓦尔人的过程中，室点密的大军先于555年到达咸海地

区，其后不久又抵伏尔加河下游。公元558年，首批突厥人的使团到达君士坦丁堡。他们奉命前来搜寻尚未臣服的阿瓦尔人余部，并寻求与东罗马帝国建立商贸联盟。

在突厥人扩张的过程中，他们与嚈哒人狭路相逢。到6世纪初叶，嚈哒人已经征服粟特地区，向东进入塔里木盆地，直抵柔然和北魏的西界。因此，嚈哒人是突厥帝国早期在中亚遇到的强劲对手之一。

在室点密的突厥大军到达波斯帝国北境后不久，库思老一世就与突厥人结盟对抗嚈哒。557年至561年，波斯和突厥联军进攻嚈哒，灭其国，并以阿姆河为界二分其地。[11]

在568年以前，突厥人曾派出一队粟特商人出使波斯帝国。使团由粟特人摩尼阿克（Maniakh）率领，希望打通关节，向波斯境内贩卖丝绸。波斯人买下了他们的丝绸，却在他们眼前当众焚毁。针对这种无理行径，突厥人又派出一支使团前往交涉，这次的使者由突厥人充当。但是波斯人不顾“不斩来使”的惯例，将突厥使臣尽数杀害。[12]自此突厥人与波斯人势同水火。

在粟特人的建议下，突厥人打算与东罗马帝国结盟夹击波斯人。569年，东罗马向突厥派出使团。次年，使团满载着一车队的丝绸返回。尽管突厥人通过外交手段确保了其在东罗马一侧的安全，但他们仍然不能攻破波斯人的防线。双方于571年罢兵言和，但由于波斯人仍然不许突厥人往波斯自由贸易，两国关系依旧紧张。

567-571年，西突厥汗国扩张至北高加索（内高加索）草原。576年，其势力到达西部草原。尽管上述两地此前已经有操突厥语的部族驻牧，但是从此时起突厥人才真正控制了整个中央欧亚的草原地带。这是中央欧亚草原历史上第二次被单一的族群统治，而这次统一更是由一支单独的王族（突厥王族阿史那氏）实现的。[13]突厥的政治制度上承自柔然，远承自匈奴，却比两者更为成熟。

随着时间的推移，突厥帝国的东西两部渐行渐远。东突厥汗国控制着东部草原和中国东北的西部，此时木杆可汗已卒，其弟佗钵（Tatpar）可汗[14]（572-581年在位）继立。在西突厥汗国则有室点密之子达头继立（576-603年在位）。583年以前，达头被称为西突厥叶护可汗。他的帝国涵括塔里木盆地北缘、准噶尔盆地、河中地区以及吐

火罗斯坦[15]。

西突厥汗国自身又进一步分裂：其东部是西突厥十箭（On　Oq）部落，驻牧于准噶尔盆地、塔里木盆地北缘以及东部河中地区；统领中亚南部的是吐火罗叶护；630年前后业已成立的可萨汗国，其中心在伏尔加河下游、内高加索草原直到顿河一带；在可萨人西面的是由阿斯帕鲁克于680年创立的多瑙河保加尔汗国，其疆域包括多瑙河下游及其以西地区；还有一部保加尔人在7世纪末叶进入可萨汗国北面的伏尔加河-卡马河流域，建立起伏尔加保加尔王国。

源出东部草原的突厥诸部之间在语言上最初仅有些许方言的差别。学界普遍认为在古代突厥语的早期阶段尚不存在明显的语言分化。但是很快，保加尔人和可萨人就开始说一种特殊的突厥语方言（或者说是一种新语言）。它与其他的突厥语方言差异很大，其他的突厥人很难甚至完全无法听懂。

罗马、波斯间的战争和阿拉伯的崛起

到6世纪末叶，在过去3个世纪里与东罗马帝国攻伐不断的萨珊波斯帝国已经逐渐将势力范围扩展到阿拉伯半岛的南部。598年前后，萨珊波斯灭希木叶尔（Himyarite）王国，并其地为一个行省。[16]萨珊波斯由此开始全面掌控进出印度及其以东地区的海上贸易，并通过印度洋上的岛屿来控制贸易线路。

602年，东罗马皇帝莫里斯（582-602年）被兵变推翻，并惨遭灭门。兵变的领袖福卡斯（602-610年在位）被拥立为帝。然而，不但一些东罗马人不服，就连萨珊波斯皇帝库思老二世也视福卡斯为篡位者。库思老二世本人曾在莫里斯的扶助下重登帝位，并曾割让领土与东罗马媾和。波斯人趁此良机即刻兴兵攻打东罗马，起先仅有小胜，但到了607年，他们攻入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一举夺回其先前让与东罗马的亚美尼亚之大部。608年，黑死病肆虐君士坦丁堡，波斯大军趁机深入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腹地。609年，他们又横扫安纳托利亚，兵锋直抵卡尔西顿，与君士坦丁堡仅有博斯普鲁斯海峡一水之隔。[17]此时，东罗马北非行省总督在迦太基起兵反对福卡斯，叛军攻占埃及。埃及等北非重镇是君士坦丁堡粮谷的命脉。总督之子希拉克略（610-641年在位）统率舰队自阿非利加和埃及行省攻向君士坦丁堡。他擒杀福卡斯，于610年登基称帝。

而波斯方面的进攻一刻也没有停歇。在希拉克略重新恢复帝国中央的权力之前，波斯人已经攻下了首都君士坦丁堡以外的大片区域，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安纳托利亚的一部；614年，他们攻下耶路撒冷，并将真十字架（True Cross）带到了泰西封。与此同时，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正从北方向东罗马帝国挺近。他们攻下了色雷斯的大部以及许多其他的领土。到615年，东罗马帝国仅剩首都地区、安纳托利亚一部、埃及和阿非利加（行省）。617年，明显已与波斯人结盟的阿瓦尔人自北面攻来，大军包围君士坦丁堡。波斯大军于618年攻向埃及，619年夺下亚历山大城，切断了君士坦丁堡的粮道。此时的罗马帝国已经陷入绝境，似乎离亡国的末日不远了。[18]

所幸希拉克略没有束手就擒。公元622年，他先与阿瓦尔人言和，

又将手中可用之兵重新组织，将之前已有的一套在地方驻兵、保证供给的系统发展成封建采邑制度[19]。他率军亲征亚美尼亚，并在那里击败波斯大军。此时，阿瓦尔人撕毁合约进攻南色雷斯的消息传来，他火速回师驰援。与阿瓦尔人再度议和之后，希拉克略在624年再度挥师东征。他于625年击溃波斯大军的主力，攻下了亚美尼亚，将波斯人的势力赶回东方。之后，他并没有立即班师回朝，而是在凡湖侧畔驻军过冬。

为抵挡罗马人的进攻，库思老与阿瓦尔人结盟，派联军攻打君士坦丁堡。但在更加灵通的情报系统的帮助下，希拉克略挫败了波斯人的进攻。尽管阿瓦尔人确实发兵包围了君士坦丁堡，但他们后来也被打退。[20]战局在627年迎来重大转折。是年，希拉克略与雄踞在内高加索草原和伏尔加河下游的可萨汗国结成同盟。这次结盟对东罗马帝国影响深远，贯穿整个中世纪早期。是年秋天，东罗马、可萨联军成功打过阿塞拜疆。尽管可萨军队在冬季撤军，希拉克略却一反冬季罢兵的传统继续出征。他攻入美索不达米亚，于12月在尼尼微击败一支波斯军队。其后，他率军继续向位于泰西封以东达斯塔基德［Dastagird，今达斯卡拉（Daskara）］的皇宫挺近，于628年攻克并洗劫皇宫。不久，库思老二世被其子卡瓦德二世（Kavad II，628年在位）篡位，波斯与东罗马媾和。629年，希拉克略与波斯驻扎在当地的将领达成协议，收回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原属于东罗马的领土。630年，他带着真十字架班师回君士坦丁堡。[21]

而希拉克略一方也没能最终享有这些胜果。在旷日持久的波斯-罗马之战中，生活在阿拉伯半岛的阿拉伯人的处境日益艰难。许多曾经繁荣的城市或被毁弃，或变成游牧民族的营地。阿拉伯半岛西部的商人们（包括麦加的古莱什家族）曾经掌控着一个苦心经营的部落联盟体系，维持着朝圣和通商之路的安全。这条道路起自阿拉伯半岛的西南角，向北至少可以通达位于叙利亚的东罗马边境地区。由此或可再向东北延伸，抵达位于幼发拉底河下游的波斯边境。但是，在半岛北部有波斯和东罗马的激烈争夺；半岛南部则因波斯和阿比西尼亚人之间的战事而满目疮痍。这两方面的战事使半岛对内贸易和对外贸易[22]同时萎缩，部落联盟体系因此危机重重。外国势力对半岛的入侵成为促成阿拉伯社会内部发生剧烈变革的最后一剂催化剂。[23]危机愈演愈烈之际，一位出身古莱什家族的青年——穆罕默德决定用一种激烈的方式解决这一危机：将信仰多种神明的所有阿拉伯人民团结在唯一的神——安拉（真

主）之下，组成一个共同体——乌玛（umma）。穆罕默德的主张在当时被视为一种革命，他因此被迫于622年逃到麦地那。但是他和他的信众“穆斯林”——“顺从（真主的意志）者”不久后即控制了麦地那，并不断地推进着他们统一阿拉伯的计划。[24]

波斯的新王卡维德二世在位不足一年即因染瘟疫而病故。其后继位的多位君主或出于王族，或出身将领，但各自在位的时间都不到一年。终于在632年，库思老二世的孙子伊嗣俟三世（632-651年在位）登基继位，结束了这一段乱象。然而之前连年的对外征战和因争夺王位而生的内乱已使萨珊王朝元气大伤。[25]

同样在632年，穆罕默德去世。刚成形的穆斯林公社一时不知该立何人来继穆罕默德之位。先知本人并无子嗣，此外也没有其他的传统可以效法。最终，穆罕默德最喜爱、最受尊敬的信徒艾卜·伯克尔（632-634年在位）被选为哈里发（意为“继承者”）。由他主持大局之后，在穆罕默德死后发生的叛乱迅速被扑灭。但由于之前的统一战争和平叛战争，整个阿拉伯半岛的贸易几乎全部停滞。633年，在平叛战争中立下头功的穆斯林军第一名将哈立德·伊本·瓦利德率大军开赴东北方萨珊波斯的边境。当地的穆斯林先前其实已经在劫掠萨珊人，哈立德的大军随之跟进。所得财富既缓解了半岛的经济危机，也犒赏了他军中忠诚的将士。[26]

次年，哈里发艾卜·伯克尔派兵远征拜占庭控制下的巴勒斯坦南部。但拜占庭守军组织严整，一时不能攻克。哈里发于是急调哈立德赴前线坐镇。哈立德用5天5夜时间穿越叙利亚沙漠奔赴前线，接手指挥，随后在叙利亚艾季纳代因（Ajnâdayn）的一场大战中击溃拜占庭大军。

到了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伊本·哈塔卜（634-644年在位）治下，之前的叛军也被增补到了远征北方的军队中。但在634年的“桥之战”中，萨珊波斯凭借战象击溃阿拉伯军队；拜占庭也增兵严守其边境。阿拉伯人孤注一掷，将全部有生力量投入前线。637年，在卡迪西亚（在幼发拉底河河畔的库费附近）之役中，阿拉伯大军大败波斯军，取得了一场决定性的胜利。其后，他们攻下泰西封，斩获萨珊王室的御器、珠宝。库思老二世的王冠被移送到克尔白（天房）。[27]

同年，阿拉伯人还在叙利亚南部的雅莫科一役中击退拜占庭军的反扑，迫使拜占庭退出叙利亚。在经历这几次大捷之后，阿拉伯铁骑在近

东地区一路叩关破城，无往不胜。640年，他们先攻下埃及，又顺势连下北非各地。[28]此时距穆罕默德离世尚不到10年，阿拉伯人竟已经夺下东罗马帝国除了东南欧、安纳托利亚和亚美尼亚以外的几乎所有行省。

曾几何时，希拉克略励精图治，在波斯铁骑大军压境之时扶东罗马帝国于将倾，因此深受百姓爱戴。然而此时，他不得不再次面对帝国最富庶的土地落入敌手的残酷现实。而他的老对手萨珊波斯的命运则更为惨烈，帝国全境均被阿拉伯人攻陷。[29]面对危机，希拉克略对内推行“军区”（themes）制，对外与可萨突厥王国结盟。这两项举措成为他的帝国后来得以长久存续的基础。他和他的孙子君士坦斯二世（641-668年在位）在东罗马帝国残存的领土上塑造出一个全新的民族国家[30]——拜占庭帝国。[31]

在637年波斯帝国沦陷之后，伊嗣俟三世率残部向西北逃入呼罗珊。642年，阿拉伯大军在尼哈万德之役中一举歼灭最后一支萨珊波斯的军队。逃向中亚的伊嗣俟三世以梅尔夫为根据地，试图取得当地武装势力的支持。但随着阿拉伯大军步步逼近，梅尔夫的马尔兹班（Marzbân）和巴德吉斯的嚈哒王转而向他发起了进攻，并在651年将其残部击溃。伊嗣俟三世虽然当时得逃，但不久之后还是被杀死在梅尔夫的附近。[32]同年，阿拉伯人先攻下梅尔夫，再取尼沙布尔。

652年，一路阿拉伯军连下吐火罗斯坦北部诸城。其中包括同时是商贸和佛教重镇的缚喝（今巴尔赫）。缚喝在当时的佛教名城中位置最偏西北，城外有著名的圆形结构寺院纳缚僧伽蓝（意为“新寺”）。[33]在628年或630年[34]，唐僧玄奘曾在此处停留一个月有余，随般若羯罗法师研习佛法。先前属于萨珊王朝呼罗珊行省和嚈哒诸王治下的城市居民现在要向阿拉伯人交税，接受他们的驻军，并要在自己家中安置他们。与此同时，另一路阿拉伯军经起儿漫开进锡斯坦（在今阿富汗西南部）。[35]商贸重镇梅尔夫逐渐成为阿拉伯人在中亚用兵的重要基地。阿拉伯人在中亚的进取也曾一度陷入低潮。一场内战在第四任哈里发阿里（656-661年在位）与时任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两方之间爆发。后来阿里身死，穆阿维叶于661年自立为哈里发，创立倭马亚王朝。[36]阿拉伯帝国很快在中亚重新确立权威，并继续扩张。

中国的重新统一及其版图的扩张

589年，南北朝时期（或称六朝时期[37]）终结，隋朝统一中国（581-619）。跟约700年前的秦朝类似，隋朝的统治同样伴随着浩大的工程和繁重的徭役，其中包括修建大运河。大运河的修建为中国南方和北方之间提供了稳定的运输渠道，也联通了中国东部沿海的各省份。此后，中国再没有经历长期分裂的局面。[38]

和秦朝一样，隋朝也在倏忽间暴亡。隋朝灭亡的因素很多，其中最关键者当属隋炀帝（604-618年在位）[39]兴师远征高句丽。战线从辽河一线起，向东直到日本海，向南绵延到朝鲜半岛中部。但隋朝也和秦朝一样，为下一朝建立稳定、强大、持久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唐朝（618-907年）由高祖李渊（618-626年在位）于618年建立。李渊本是隋朝镇守太原的主将，爵袭唐国公。他于617年率领反隋大军攻入隋朝都城。[40]6个月后，李渊登基称帝。李渊一族系出北方，与北周（557-581年）及隋两朝皇族皆有亲戚关系，并与北魏皇族拓跋氏联姻。因此，他们对中央欧亚文化相当熟稔。唐朝的建立还部分得益于高祖李渊与东突厥汗国始毕可汗（609-619年在位）之间的军事结盟。始毕可汗曾借战马和500名突厥勇士以助李渊伐隋。[41]

普遍流行的错误观点认为，这一时期突厥人是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此观点的产生源于突厥人频繁参与到地方割据势力反隋的起兵中，而正是这场混战最终葬送了隋王朝。突厥人曾与数个割据势力结盟，为了支持盟友，他们当然会出兵进入隋朝境内。许多学者认为“东突厥汗国所统北方诸部一直企图南下中原”[42]、“颉利（*Hellig）可汗始终是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43]，因此新兴的唐王朝欲确保安全，就必须攻灭东突厥汗国。这类观点显然是错误的。诚然，在唐朝初立的几年中，突厥人也在支持一些地方割据势力反唐，但和隋末的情形一样，他们出兵中原大都是因为其盟友的邀请，而非主动出击。当时唐朝面对的割据势力也不止在北方边境，而是遍布中国。终高祖一朝，唐军才大致消灭各地割据势力，统一中国。将突厥视为边患显然是唐朝精心编织的谎言，其目的是为出兵北伐突厥及其他势力找到借口。而在史料中，对于突厥人活动的记载非常简略，大约都是“突厥某年某月犯边”之类寥寥数语；这

些活动的原因往往被简单地归结为突厥人本性贪婪、残暴、好战。这是一种典型的标签化行为。如果有更多的历史记载留存，应当可以证明这些行动不都是单纯的劫掠，而每一次行动背后都会有具体的原因。[44]

与之前历代王朝一样，李唐王室想建立一个前无古人的庞大帝国。无独有偶，北方的突厥人同样希望扩张他们的帝国，然而此时，他们南面本属于中央欧亚草原区的地方已经被唐朝占领、驻兵、设防、筑城建墙。而且唐军的目标是继续向前开拓，征服四方之民，直到将整个中央欧亚和中国纳入版图。学界普遍的观点是，“唐朝初年与突厥交往的经历使其清楚地认识到近邻中有如此强大的政权是一个莫大的威胁”。此类观点与史实大相径庭。李唐王朝非常清楚汉朝的武功，他们也曾公开表露效法前朝故事的雄心。据正史记载，汉朝曾击败匈奴，统治西域（塔里木盆地）诸国，收取高丽。当然，这些记载并非全然属实。李唐王朝自视道统远承汉室，不但意图恢复炎汉霸业，更希冀再上层楼，以我为峰。

高祖之子李世民（唐太宗，626-649年在位）在玄武门之变后继位登基。世民的两位亲兄弟在事变中被杀——他本人亲自斩其皇兄李建成首级，高祖李渊不得不让位于世民。[45]

中原王朝对周边敌对政权的传统战略是“分而治之，逐个击破”。以此为矩，唐朝积极煽动东、西突厥汗国内部的纷争，制造不稳定。太宗出兵北击突厥的直接原因是梁师都之乱。梁师都是隋末乱世以来残存的最后一支割据力量，其老巢在鄂尔多斯北部。之前，梁师都曾招引突厥大军助其攻打初立的唐王朝。626年，突厥大军一度兵锋直抵渭水之滨，距离唐朝都城长安约30里。太宗被迫奉上钱财，与颉利可汗议和。

但自此以后，颉利可汗好运不再，迭遭变故。627年，原本臣属于东突厥汗国的回鹘、拔野古和薛延陀等部族同时起事叛乱。同年冬天，天气酷寒，罕见的大雪冻死大量牲畜。对于草原游牧民族来说，这是最为致命的打击。此时，东突厥自顾不暇，更无力保梁师都。唐朝抓住时机，在628年攻破梁师都大营。梁师都气数已尽，为其手下所杀。唐朝还大力支持背叛突厥的部落所立的可汗。[46]629年，颉利可汗请降于唐，太宗不许，派出大军出击。唐军攻破颉利可汗在漠南的大帐，歼灭大量突厥军。630年，颉利可汗被生擒，解付长安。634年，他死于唐朝。

大唐帝国在初唐年间四面扩张，势如破竹，在玄宗朝（712-756年）达到其势力的顶峰。[47]8世纪的上半叶，大唐帝国歌舞升平、国泰民安。西京长安尤为盛世之明珠，其繁荣景象无可匹敌。这番盛世繁荣不但在之前的历史上绝无仅有，而且后来直到12世纪末期为止都未曾在中华大地再次上演。大唐长安是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人口最众、财富最多的都市，独领一时风骚。城中居民或可达到百万之众，其中还包括为数众多的常住或短期逗留的外国人口。玄宗大力支持西来的胡乐、受胡乐影响的诗作以及初唐以来流行于中土的于阗画派艺术。这也是汉语诗歌的黄金时代，许多著名诗人正逢其时，包括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李白和杜甫[48]。李白出生于中亚，在血缘上或许只是半个汉人。他在当时并不融于俗世，并一直保持着一种特立不群的独特形象。这或许是因为他为人处事所流露的胡人风气，抑或是他在诗作中展现出来的非汉人的形象[49]——尤其是其对异域风物的喜爱。

唐朝四面出击，穷兵黩武，在玄宗朝达到鼎盛。后世伟大的史家司马光因此写道："及开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50]无休止的征役和沉重的赋税使当时的中原地区日益凋敝，军民苦不堪言。这种景象一再出现在诗人和史家的笔下，唐朝的统治已然危机四伏。

吐蕃帝国

在历史上，每一个新势力崛起的背后，都有着复杂的经济、文化、外交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发挥作用。绝大多数帝国崛起的内、外因素已经得到充分的认识，但吐蕃帝国是一个例外。吐蕃帝国突然崛起的原因至今仍是未解之谜，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其社会-政治文化中属于中央欧亚文化系统的特点是其中一个因素。[51]

在7世纪初叶，藏区南部的各部首领联合在一起，推选出一个共同的领袖，称其为“赞普”，意为“帝王”。当时藏南各部深受异族统治者森波杰的压迫，他们密谋合力将其推翻。森波杰应当是臣服于象雄王国（羊同）的傀儡。虽然今天人们对象雄王国的历史所知不多，但在当时它是青藏高原最强大的势力，统治着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这些首领最终成功推翻了森波杰的统治。事成之后，赞普大赏诸部，向诸位首领分封领地。他从各部族中选贵族青年作为自己的侍卫、私兵，以加强与各部的联系。这位赞普也被各部称为“悉勃野”（Spurgyal）[52]。这个新兴的政权在其本土藏南地区崛起以后，开始北上扩张。他们击败了藏（Rtsang）、蕃（Bod）地区的统治者，征服了西藏中部地区。从此，他们取古名“蕃”以自称，但在周边的民族中，他们逐渐以吐蕃（Tibet）之名为人所知。[53]

吐蕃人在7世纪上半叶与中原王朝发生第一次[54]正面交锋。这次交锋的背景在史书中有明确的记载。公元634年，唐朝派出一支大军远征青海地区的吐谷浑。吐谷浑是属于蒙古语族的鲜卑人的一支，他们自3世纪起一直占据着青海湖附近的草原地带。[55]他们后来沿着河西走廊，一直扩张到新疆东部，由此控制了连接着中原和西域的丝绸之路南面的一些道路。唐军成功击败吐谷浑，却因此与吐蕃人发生冲突，因为当时吐谷浑是依附于吐蕃的属国。吐蕃赞普松赞干布（618-649在位）曾遣使唐朝（求亲），但被唐朝拒绝。638年，他出兵击退唐朝的进军。之后，唐军又小胜吐蕃军一役，吐蕃于是向唐朝求亲议和。这次，唐太宗准许了吐蕃和亲之请，将唐室的一位公主嫁给松赞干布的儿子或弟弟。[56]唐朝最终也未能彻底征服吐谷浑之地，他们在事实上承认了吐蕃对除河西走廊以外的吐谷浑故地的宗主权。河西走廊是唐朝必争之地，这将成为其进出塔里木盆地的通道。

在确保了其侧翼无忧之后，唐太宗出兵西进塔里木盆地，逐一攻灭盆地中的绿洲城国。640年，唐军先灭位于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国。这是东吐火罗人的主要城市。[57]648年，唐军先后攻灭焉耆、龟兹（库车）。这两国是西吐火罗人的领土，同时也是当时西域商贸重镇和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的中心。在塔里木盆地的西部，塞人（东伊朗人）的主要城国——疏勒（喀什）、朱俱波（叶城）和于阗（和田）[58]在632-635年相继归顺唐朝。太宗力排众议，设置安西都护府（简称“安西”或“安西四镇”）管理塔里木盆地军政事务。649年，安西都护府治所由高昌迁往龟兹。此时，唐朝已经控制了中央欧亚东半部的大部分地区。

649年，唐太宗和松赞干布相继辞世，唐与吐蕃的关系也逐渐降温。

657年，继太宗而立的高宗（649-683年在位）出兵攻灭了西突厥政权。西突厥可汗阿史那贺鲁被活捉后押送至长安。随着唐军在天山南北的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击溃西突厥势力，唐朝对上述地区的名义上的统治开始确立。但西突厥游牧各部并没有完全臣服于唐朝，他们从新的部族中另立一姓可汗，依然是西域地区的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与此同时，吐蕃帝国已经将其版图扩张到了青藏高原西部、象雄王国故地，并继续向西，进入葱岭（帕米尔）。葱岭正当丝绸之路商道，是从塔里木盆地（中亚东部）直接进出吐火罗斯坦（中亚西部）的门户。到661年至663年，吐蕃帝国已经攻占勃律、瓦罕以及疏勒旁近的一地。663年，吐蕃大相禄东赞（噶尔东赞）率军彻底攻灭吐谷浑，并其地，收其民。吐谷浑可汗偕其所尚唐朝公主及数千户贵族逃往唐朝。665年，吐蕃人征服于阗王国。两年以后，西突厥诸部在与唐军连年交战之后，转向吐蕃称臣，接受其名义上的统治。在此后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尽管双方的政权都有更迭，但吐蕃与西突厥一直保持着联盟关系。

668年，吐蕃在吐谷浑故地大非川河畔建起防御工事，以防唐军进攻。在670年初春，吐蕃、于阗联军攻陷拨换城（阿克苏）。此时，唐朝安西四镇只有龟兹、疏勒二镇尚存。唐军节节后退，将西域大片地区拱手让于吐蕃。在稍后的仲春时节，唐朝派出大军进攻吐蕃治下的吐谷浑故地，意图反攻。此时坐镇吐蕃中军的已是禄东赞之子论钦陵（噶尔·钦陵）。他率军在大非川与唐军大战，击退唐军的进攻。其后，唐朝将

安西都护府迁回西州。在随后的20年间，西域地区名义上是在吐蕃帝国的势力范围之下。但具体而言，只有于阗及其西面各地是在吐蕃的直接统治之下，塔里木盆地内大多数的王国还保持着事实上的独立或半独立状态。

阿拉伯（大食）、吐蕃和唐帝国在7世纪80年代都经历着内部的不稳定。中亚各地在名义上处于上述三大帝国的势力范围之内。在7世纪80年代末，吐蕃攻陷唐朝在西域的重镇龟兹，并顺势连下塔里木盆地北缘数城。唐军虽然奋力抵抗，但吐蕃兵锋正盛，一时难挡。正当吐蕃大军在西域高歌猛进之时，两个帝国内部的政治变动却使西域战局发生了逆转。当年，吐蕃少主器弩悉弄幼年登基，军政大权一直把持在噶尔一族手中，其家族世代袭承大相之位。如今器弩悉弄逐渐长大，早对噶尔专权不满，决心清除其势力，夺回大权。而另一方面，武则天（690-705年在位）于690年篡夺李唐皇位，改国号为“周”，[59]并积极准备夺回安西四镇。692年，唐朝遣汉兵、突厥兵组成大军从新夺回的龟兹出击，大破吐蕃，重置安西四镇。尽管吐蕃在西突厥军的协助下，曾试图坚守西域，但最终在694年被唐军彻底击败，其进出中亚的两处战略要地均告失守。

在吐蕃本土，赞普器弩悉弄屠灭噶尔氏全族。[60]后来，他亲率大军东征，出战南诏国（在今四川、云南）。器弩悉弄在704年的一场战役中战死军中。在其身后，吐蕃帝国的大权事实上由摄政皇太后墀玛蕾掌握。她当权的年代与武则天在位的年代大致同时。在此后的数十年光景里，吐蕃帝国未能重新进取西域，在与唐朝的竞争中渐渐趋于守势。

突厥第二汗国的建立

在东部草原，突厥各部对唐朝的威权颇有不满。他们曾数次作乱反唐，但均以失败告终。终于，颉跌利施可汗（682-691年在位）在漠北立帐，将本已一盘散沙的突厥各部重新统一。他本是颉利可汗的旁支后裔，一直为复兴突厥汗国不懈努力。682年，他率突厥各部再度起事，在东部草原成功复辟突厥帝国。颉跌利施之后，其弟默啜继立，称阿波干可汗（691-716年在位），汗国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8世纪伊始，游牧在准噶尔盆地和河中地区东部的西突厥诸部处在一个新兴的部落联盟——突骑施的统治之下。712年，颉跌利施可汗之子阙特勤率东突厥军大败突骑施娑葛可汗。东突厥重新建立起对西突厥失落许久的统治，并取代突骑施，成为费尔干纳、塔什干和粟特大部地区的霸主。

阿拉伯帝国称雄中亚西部

671-673年，中亚呼罗珊地区的叛乱被阿拉伯人再度镇压。673年，穆阿维叶将呼罗珊划为一个单独的总督区，并任命乌拜杜拉·伊本·济亚德为该地区首任总督。674年，乌拜杜拉·伊本·济亚德率军渡过乌浒水（阿姆河），劫掠了安国（布哈拉）的商贸重镇毕国（Baykand）[61]，并迫使安国称臣纳贡。681年穆阿维叶去世，哈里发继承权之争引发了帝国的一场内战（684-692年）。在内战中，呼罗珊地区再度取得实际上的独立地位。内乱平息以后，阿卜杜·马利克（685-705年在位）成为哈里发。他逐渐恢复了阿拉伯帝国对呼罗珊部分地区的统治。695年，他任命阿尔·哈查吉·伊本·优素福出任伊拉克和东方总督区的新任总督，但仍然将呼罗珊和锡斯坦另划作独立的一区。但此起彼伏的叛乱和当地总督的统治不利迫使马利克于697年将锡斯坦和呼罗珊也划给哈查吉管理。自此，哈查吉的势力已经囊括了阿拉伯帝国的半壁江山，一直持续到下一任哈里发瓦利德一世一朝终了。

到7世纪末叶，呼罗珊地区的阿拉伯人已经不仅仅生活在城市中了；一些阿拉伯人获得了土地，渐渐融入了当地人之中，其中一些人甚至失去了阿拉伯人的免税特权，与原住民一样被征税。在木鹿（今梅尔夫），外来的阿拉伯人与原住民的关系较其他地方更为紧密。696年，阿拉伯出兵攻打粟特本土，木鹿的粟特人甚至借钱给阿拉伯总督府助其出兵。[62]在700年前后，木鹿当地商团的两个头领是塔比特和胡拉伊特·伊本·呼图白，他们各自都有私兵柘羯。后来，他们拉着私兵队伍加入了在怛蜜（今泰尔梅兹）起事的阿拉伯叛军首领穆萨·伊本·阿卜杜拉·伊本·卡济姆的队伍。他们与河中地区、吐火罗斯坦的小政权以及巴德吉斯的嚈哒人组成联军，一齐举事反叛倭马亚王朝的统治。后来，联军各部分崩离析，两兄弟被诛。哈查吉又调来穆法达尔·伊本·穆发拉甫坐镇中亚。穆法达尔于704年在怛蜜将穆萨叛军彻底剿灭。后来，哈查吉又任命屈底波·伊本·穆斯林·巴希利（Qutayba ibn Muslim al-Bâhilî）出任呼罗珊总督（705-715年在任）。

屈底波是哈吉查亲手培养的得力干将，深得哈查吉真传。他赴木鹿上任之后，立即重组了呼罗珊总督区的组织结构。他恢复了阿拉伯人在吐火罗斯坦的统治，随后又挥师攻下了交易中国商品的商业重镇毕国。

709年，屈底波终于攻下中亚名城布哈拉。[63]709年至710年，他先挥师连下史国[64]、小史国[65]，又平定了吐火罗斯坦和嚈哒的叛乱，生擒吐火罗斯坦叶护，将其解送到当时阿拉伯帝国的都城大马士革。[66]712年，屈底波又用计巧取花剌子模，并移阿拉伯军民前往驻屯。同年，他又率大军包围康国（撒马尔罕）。康国王急遣使向石国（塔石干）求援。当时石国臣于突厥第二汗国，突厥可汗即命阙特勤领一支劲旅开赴粟特驰援。但屈底波所率阿拉伯大军势不可当，突厥军败走。阿拉伯大军乘胜在康国境内筑城屯兵镇守。[67]

714年，屈底波的大军进一步向河中地区的腹地挺进，兵锋直抵拔汗那（费尔干纳）。此时，屈底波已经组建了一支私兵卫队，称“神箭队”（Archers）。从石国班师以后，屈底波即闻噩耗——对其有知遇之恩的哈查吉去世。同时，哈里发瓦利德一世任命他继为总督。715年，屈底波大军又攻入药杀水（即锡尔河）流域各地。这次，他联合吐蕃，勾结拔汗那王族一支，合力推翻了拔汗那王拔沙克（Bâšak）的统治，另立王族阿了达为新王。

同年，瓦利德一世去世，苏莱曼一世（715-717年在位）继立为哈里发。其时，屈底波正在拔汗那。得悉新任哈里发要将其召回，屈底波欲起兵造反，但他旗下众将皆不听其号令，而攻杀屈底波。只有屈底波的私兵卫队“神箭队”为其死战到底，最后尽遭屠戮。

另一方面，拔汗那王拔沙克被废后逃向唐朝的安西（龟兹）。唐朝大将张孝嵩在当地组织军队，于当年12月携拔沙克远征拔汗那。唐军攻克拔汗那，驱逐僭主阿了达，重立拔沙克。至此，拔汗那在唐朝影响之下。[68]

716年，在从突骑施境内退兵后不久，突厥默啜可汗即在一次出征中被杀。[69]其侄（颉跌利施可汗之子）继立，为毗伽可汗。毗伽可汗在位期间有其弟阙特勤全力相助。而在西突厥故地，黑姓突骑施首领（此前首领为黄姓）苏禄称可汗，成为各部共主。他复兴了突骑施汗国的势力，并迅速扩张其领土，势力范围超过了之前历代突骑施可汗。河中地区和吐火罗斯坦先前本是西突厥汗国的势力范围，如今突骑施汗国欲效法前代故事，从阿拉伯人手中重夺上述二地。因此，他们一面大力支持当地民众反抗阿拉伯人的统治、抵抗伊斯兰化的叛乱，一面与吐蕃帝国结成紧密的联盟。

突骑施与吐蕃的联盟使西域南北的两大势力合兵一处，这对唐朝在西域的统治构成极大威胁。远从汉代凿空西域以来，中原王朝就视西域道路通断为大防。[70]李唐王朝一心效法汉武，自然要打破突骑施-吐蕃联盟对西域的威胁。唐于是与阿拉伯秘密连横，酝酿出攻破突骑施-吐蕃联盟的大计。

唐、新罗灭高句丽

强大的隋朝和唐朝曾先后数次出兵东征高句丽，欲效法汉朝故事，重建中原王朝在东北南部和朝鲜半岛北部的统治。但骁勇顽强的高句丽将士一次次挫败中原王朝的攻势，不让寸土。然而一场内乱却使高句丽陷入危机。642年，高句丽东部大人泉盖苏文（渊盖金）专权，弑其君，屠杀朝中数百大臣。其后他又立一皇子为君，挟少主而乱朝政。虽然有此一变，高句丽仍然在645年抵挡住了唐朝的又一次进攻，而且是太宗的亲征。[71]

在高宗朝（649-683年），唐朝与新罗建立起军事联盟。新罗原在朝鲜半岛东南一隅，通过攻伐周边邻近的政权，其势力不断在半岛南部扩张。唐与新罗分别从水路和陆路同时出兵，夹攻百济。当时百济是朝鲜半岛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其国力仅次于高句丽。尽管高句丽、日本分别从陆路和海路派兵驰援百济，但唐、新罗一方仍然在660年击败百济，并在663年彻底占领百济全境。

666年，泉盖苏文去世。其子泉男生继其位掌高句丽大权。但男生有二弟与其争位，男生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向唐朝求助。唐朝方面怎可错过此等良机，立即出大军直扑高句丽。新罗则从南面出兵，夹击高句丽。高句丽军民虽英勇抵抗，但终于不支，于668年城破亡国。自国王以下约20万高句丽人被迁往中原。670年，高句丽当地余众又起事反唐。4年以后，起义被唐军镇压，义军首领全部就戮，其余人等一概被迁徙到中原内地更远之处。676年，唐朝在高句丽地区的统治机构被迫从平壤退到辽东。其后不到数年光景，新罗已经将唐朝所占百济和高句丽的大部分领土蚕食，在朝鲜半岛独大。原高句丽北部的领土则为另一新兴的政权——渤海国所有。[72]直到8世纪中叶，仍然有一些人在使用高句丽语，但此后不久，高句丽人和他们的语言就彻底消亡了。高句丽语是日语-琉球语诸语言在大陆上目前已知唯一的亲缘语言。[73]

法兰克人

民族大迁徙尘埃落定，西欧的局势趋于平静。这时，统治着高卢北部和日耳曼尼亚西部的是法兰克人。法兰克人得以在西欧称雄，只因其部英主辈出。其中最著名当属克洛维一世（481-511年在位）。他是希尔德里克一世（481年或482年卒）之子、墨洛维（456年或457年卒）之孙。508年，克洛维将法兰克王国的都城定于巴黎。他先后吞并法兰克其他各部，将全部法兰克人统一在自己麾下，在以高卢北部为中心的区域建立起稳定的统治。克洛维的诸子进一步开拓法兰克人的版图。他们先后率部攻取高卢的全部地区、比利时、日耳曼尼亚西部和今日瑞士的一部分地区。但克洛维诸子为势力范围常年相互攻伐厮杀，陷墨洛温王朝于四分五裂的境地。后来，克罗塔尔二世（584-629年在位）重新统一法兰克王国。到了其子达戈贝尔特一世在位时（629-639年），朝中的大权逐渐旁落到宫相丕平手中。此后各朝，丕平家族各支轮流把控朝政，使达戈贝尔特一世之后的各代君主几乎沦为傀儡。[74]因此，达戈贝尔特一世以后的法兰克王国也可被称为前加洛林时代丕平-阿奴尔封家族宫相朝。到了8世纪初，[75]朝中大权已经完全由宫相家族一手掌握。时任宫相的查理·马特（714-741年在位）东征西讨，平定了王国境内各处叛乱。725年，他降服欧多（阿基坦公爵，加斯科涅或巴斯克人），平定阿基坦地区。早在711年，阿拉伯人已经从北非由海路侵入西班牙，并占领该地。欧多则与盘踞在比利牛斯山中的柏柏尔人头领木努扎结盟，南拒阿拉伯人。后来，在新任西班牙总督阿卜杜·拉赫曼（731-733/734年在任）的率领下，阿拉伯大军北上攻入比利牛斯山区，击败木努扎；又乘胜继续北进，侵入高卢南部，在加龙河北岸击败欧多的军队。阿拉伯人随后劫掠了波尔多、普瓦捷，并于733年（或734年）进攻图尔。但他们在图尔却被查理·马特的大军击败。[76]查理及其弟希尔德布兰（尼伯龙之父）又率军平定了之前降于阿拉伯人的纳博讷和普罗旺斯。[77]查理死后，其子丕平三世（又称矮子丕平，或丕平，741-768年在位）顺利继承其宫相之位。丕平继承其父的遗志，继续为法兰克王国开疆拓土。其治下版图南抵西班牙、地中海、意大利，北及萨克森地区，东面则与潘诺尼亚的阿瓦尔王国毗邻。

丝绸之路与中世纪早期的政治观念

遍览整个欧亚大陆各个地区属于中世纪早期的史料可以发现，这类史料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便是对中央欧亚，尤其是中亚格外关注。但这一特征并没有得到后人应有的重视。汉文、古藏文和阿拉伯文史料中充斥着对中亚的种种记载，即使是数量较为有限的希腊文和拉丁文史料也在强调中央欧亚对它们国家的重要性。对中央欧亚如此重视显然不是如现代史家所臆想的那样源于时人对中央欧亚游牧民入侵威胁的担忧，这种想法在当时的史料中并没有反映。当时各政权不约而同将目光投向中央欧亚，似乎更像是因为丝绸之路经济的繁荣，以及当时在欧亚大陆各政权中普遍流行的一种政治观念。这种政治观念是当时战事频仍的原因。

在中世纪早期，欧亚大陆上各个帝国对外扩张的背后，都有这种政治观念推波助澜。它最早体现在突厥帝国的对外征服中。[78]每一个帝国对其本国最高统治者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称号；在任何正式的书写中，他们都不会用这一称号指称任何异国的统治者。[79]各国民众都相信自己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才是天下之主、天命所归。无论是已经臣服的部众，还是未服之众、作乱之“贼”，四夷八方都理应来归服我家君主。对作乱者或拒不臣服者的惩罚自然是武力攻伐。在中世纪早期的欧亚大陆，战事格外频繁，不可避免，一是因为上述这般“天朝上国”的政治观念在各国普遍流行，二是因为史前时代以来，战争就一直是欧亚大陆政治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

因此，各国君主都有称霸宇内的野心，并向四方开疆拓土。在名义上，君主会将本土以外的四方土地分封给他的部下。这种中央欧亚理想化的政治结构被学者巧妙地概括为“汗与四伯制”[80]，颇具代表性的例子在中世纪早期的中央欧亚政权中屡见不鲜，比如扶余和高句丽诸政权。[81]突厥汗国派往拜占庭的使者摩尼阿克向东罗马皇帝介绍突厥帝国时，称他们有四个军区再加上可汗，[82]可汗出自阿史那[83]一族。吐蕃帝国的“四茹”制度也反映了这种理念。[84]唐不但在西域设有安西都护府，还在其他三个方向设有安东、安南和安北都护府。[85]契丹、蒙古帝国及其后继诸汗国亦如此。[86]

部分是因为上述政治观念的影响，所有中世纪早期的帝国都积极向

四面扩张。当然，这与人类历史上其他时代、其他地区的帝国扩张并无本质的不同。但中世纪早期的这一波帝国扩张使得当时的各帝国之间发生了直接的接触、交往，迫使各大帝国认识到其他帝国是与自身等量齐观的存在。这种局面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发生。最初，各大帝国君主均以天朝上国自居，难以接受与他国君主平起平坐的事实。因此，在帝国间的外交中，一种外交策略应运而生，以化解上述尴尬难题。当一国使臣出使异国，他要在异国朝廷参见异国君主，行君臣大礼；在异国的书写中，此事被记作外国遣使入朝归顺求封。当使臣归国，通常要有对方回礼使臣同行。对方回礼使臣则要对本国君主行君臣大礼，本国史书同样要记外国遣使归附云云。[87]

在8世纪初叶，随着欧亚大陆不同文化、各个政权之间的接触更加频繁，碰撞更加激烈，各方都清楚地意识到中央欧亚是群雄必争之地。各国热衷于从他国引进商品、知识和人才。在政治、军事方面，各国合纵结盟，钩心斗角；它们在交往中不断调整着自身的行为和观念，以适应对方或以示区别。尽管连绵不断的战事遍布这一时期的欧亚大陆，但丝绸之路经济却持续繁荣，至少延续到8世纪中叶。在政治上、文化上，尤其在经济上，欧亚大陆各地间的联系空前密切，逐渐形成一个整体。这番景象，当然离不开活跃在欧亚大陆中心舞台的中央欧亚民族的经营。[88]

---

[1]本书作者将汉文史料中的柔然与西方中世纪史料中的阿瓦尔人勘同，因此在述说柔然史事时常记作阿瓦尔。译者在必要时括注说明。——译者注

[2]阿拉伯帝国在唐代汉文史料中作“大食”。为保持行文一致，统一译作“阿拉伯帝国”。——译者注

[3]关于“土门”一名，及其在古代突厥碑铭中的形式“Bumïn”，参看注释10、17。

[4]《周书》卷五〇，909页。

[5]在关于突厥建国的史料中，有一些内容明显带有神话传说的性质。有关这一部分的讨论，参看《导论》中的突厥建国故事及相关注释。

[6]Sinor（1990c：295）。——作者注。于都斤山具体方位尚有争议，但据多数学者观点，此山应当在杭爱山脉中、鄂尔浑河河谷附近。1957年在蒙古高原发现的铁尔痕碑（又称塔里亚特碑）立于8世纪中叶，是漠北回鹘汗国第二任可汗磨延啜的纪功碑，西面第一行有碑文：“ötükän kedin učïnta täz bašïnta örgin……anta yaratï(t) dïm”（在于都斤山的西头、铁兹河的上游，我下令在那儿建立汗庭……）（耿世民2005，207）。据此可知于都斤山在铁兹河之东，断然不会在阿尔泰山脉之中。——译者注

[7]汉文和希腊文史料表明，突厥人确实擅长冶铁。已有学者结合此二事提出，上述洞穴可能是一座铁矿；参看Sinor（1990c：296）。在高句丽起源神话的平行部分中，洞穴（同样位于其国土东部的山中）则是谷神（the grain god）的居所。由此观之，则“铁矿说”可疑。

[8]在公元1世纪中叶，梅拉（Pomponius Mela）曾提到过“Turcae”（突厥人）。他们也曾

在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中出现（Sinor 1990c：285），拼作“Tyrcae”。而自6世纪以降，已不断地有突厥人自东向西迁徙。参见Czeglédy（1983），Golden（1992）。

[9]其信仰既与斯基泰人等草原先民的信仰相似，也与后来的各草原民族的信仰相似。天神腾格里和大地女神乌迈似是中央欧亚文化系统中的重要因子，理应引起宗教史学者们的注意。

[10]族名Türk与英文中的Turk实际上是同一个词。Türk读作［tyrk］，在现代土耳其语和其他的突厥语中仍然这样发音。本文作者遵从学界惯例，只以Türk指称在东部草原地区建立的第一、第二汗国。

[11]Frye（1983:156），Sinor（1990c：299-301）。

[12]Sinor（1990c：301-302）。

[13]斯基泰人（或称“北伊朗人”）曾在突厥之前统一整个欧亚草原地带。在其扩张之初，斯基泰人在文化和语言上也是单一的族群。同后来的突厥人一样，他们也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渐分化成不同的民族。

[14]其名“佗钵”曾被复原为Taspar，参见吉田丰、森安孝夫（1999）及Beckwith（2005b）。

[15]当时的吐火罗斯坦的范围大致相当于今日的阿富汗及其周边。

[16]Frye（1983:158）。

[17]Treadgold（1997:231-241）。

[18]Treadgold（1997:239-241,287-293）。

[19]根据Treadgold（1997:315页起）的说法，希拉克略的孙子君士坦丁二世完成了将帝国划分为军区、设置军事总督的重组，让士兵驻扎在军区保卫领土。但改革的基础早在希拉克略时代就已经奠定，参见Ostrogorsky（1968:96页以下）的讨论。这种封建采邑制度已在欧亚大陆广泛传播，在拜占庭帝国周围的日耳曼人、阿拉伯人和突厥人中，甚至在北非定居的日耳曼人汪达尔部，人们也发现了这种制度。

[20]有关阿瓦尔人和这场战争的更多信息，参见Pohl（1988）。

[21]Treadgold（1997:293-299），Frye（1983:168-170）。

[22]科隆（Crone 1987）重新检讨了之前关于对外贸易与伊斯兰教兴起二者关系的理论。她认为阿拉伯人并没有参与高附加值奢侈品的贸易。但她没有提到麝香贸易，这就是一个可以驳斥其观点的反例。阿拉伯人似乎从前伊斯兰时代起就一直掌控着麝香贸易。关于麝香贸易和麝香本身，参看King（2007）。

[23]Crone（1987:246，250）。

[24]关于贸易在早期伊斯兰教扩张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参看注释62。

[25]Frye（1983:170-171）。

[26]将伊斯兰教、早期穆斯林与对外扩张征服相联系的观点并不可靠。关于这类观点，参看注释63。

[27]人们普遍认为阿拉伯人摧毁了波斯人和希腊人的图书馆。此说甚谬。详见注释64。

[28]Shaban（1971:24-34）。

[29]大伊朗主义的观点认为，流行伊朗语的中亚地区，包括玛尔吉亚那、巴克特里亚和河中地区，都是波斯的领土，当地民众也算波斯人。此说甚谬。详见注释65。

[30]原文此处即用“nation-state”（民族国家）一词。——译者注

[31]在其官方场合拉丁文被弃用。希腊文取代拉丁文成为帝国的官方语言（Ostrogorsky 1968:106）。当然，拜占庭人始终自称“罗马人”，称其国家为“罗马帝国”，一直到1453年帝国灭亡为止。在阿拉伯扩张之后，近东和北非几乎所有的非伊朗语地区都被阿拉伯化。从这一角度看，希拉克略对希腊民族和希腊语言的存续居功厥伟。

[32]Shaban（1970:18-19）。其子卑路斯最终逃到中国。马尔兹班意为“大都督”，是萨珊帝国晚期和阿拉伯帝国早期常用的官号，指地区总督或军队主将（Kramers and Morony 1991）。据传伊嗣俟是被马尔兹班麻忽伊·苏里于634年（伊斯兰历31年）杀害的（Yakubovskii and Bosworth 1991）。

[33]此建筑最初是作为萨珊王朝行省的都城而建。关于其形制，以及“和平之城”巴格达圆城的形制，参看Beckwith（1984b）。

[34]学界普遍认为是630年；Ch’en（1992:42-53）认为是628年，关于他的研究，参看注释66。

[35]653年，当地爆发军人起义。这次起义虽然被成功镇压，但该地区不久之后即再次独立。穆阿维叶自立为哈里发以后，即派出一支大军远征锡斯坦。大军重新夺回扎兰季，并一路攻到喀布尔。但是，这次远征占领的地区大多实际上处于独立的状态。

[36]Shaban（1971:70-78）。关于内战，参看注释67。

[37]原文此处作者作“Sixteen Dynasties”（十六朝），误。——译者注

[38]唐亡（907年）以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五代以后，中国境内先有辽、北宋、西夏鼎立，后有金、南宋、西夏以及蒙古等政权并存的局面。直到1279年蒙古灭南宋，中国全境才再度统一。作者显然没有将辽、西夏、金、蒙古等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看作中国历史上的政权，这与我国史学界流行的观点相悖。——译者注

[39]炀帝杨广为文帝杨坚与皇后独孤伽罗之子。独孤皇后系出北方贵族。

[40]Wechsler（1979a：150-153）。

[41]Wechsler（1979a：159）。

[42]Wechsler（1979a：157）。

[43]Sinor（1990c：308）。

[44]参看《尾声》一章关于此话题的进一步讨论。

[45]Wechsler（1979a：185-186）。——作者注。李世民亲手射死李建成，其部下军士将建成枭首。——译者注

[46]此可汗当为薛延陀部所自立的可汗。——译者注

[47]Dillon（1998:360）。

[48]然而他们并未得到玄宗的青睐。考虑到他是如何对待造反前的安禄山的，以及许多类似的例子，我们只能说：玄宗看人基本不准。

[49]Owen（1981:143）。李白（701-约763年）出生于中亚，长于碎叶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可附近）。在少年时代，李白一家迁居四川，他在那里长大成人。李白可能出身于一个商人之家，人们怀疑他有胡人的血统。参看Eide（1973:388-389）；转引自Owen（1981:112）。尽管李白的诗作影响了其同时代的一些重要诗人——比如杜甫，但他仍然不被大多数同侪认可。

[50]《资治通鉴》卷二一六，6889页。

[51]吐蕃文化中的中央欧亚文化因素包括：王及其英雄般的伙伴——他的私兵，属于社会阶层最顶层；王死后有其私兵、马和生前财宝陪葬，葬于大墓中；热衷于商业。

[52]关于“悉勃野”这一称号，以及当下一些学者对于此称号的误读，参看注释68。

[53]“吐蕃”一名是外族对其的称谓，并非其本民族语言。这个名称与蒙古语词汇“拓跋”（*Taghbač）有关，但却与吐蕃人本民族的自称“蕃”（Bod）没有任何关系。详细讨论参见Beckwith（2005b）。

[54]实际上，吐蕃人在之前的隋代就与中原王朝因为同样的原因发生过摩擦。在当时的汉文史料中，他们的政权被称为“附国”（Beckwith　1993:17-19）。之前的学者已经指出，“附”可能是Spu或Bod的转音，但是不论它实际源自其中哪一个词，这种对音都不是很规则。

[55]Molè（1970：xii）。

[56]Beckwith（1993:23）。关于人们对于这次和亲一直以来的误解，参看注释69。

[57]但是，直到这一时期，他们似乎说的是西吐火罗语。吐火罗语在新疆境内流行的时段和具体地点仍有待学界的最终确定。——作者注作者所谓“东吐火罗人”应指吐鲁番地区的古代居民车师人。到唐灭麹氏高昌国时，当地主要的族群早已是汉人。——译者注

[58]与塔里木盆地北缘的各城不同，于阗是大乘佛教的重镇。

[59]虽然武则天取代了李唐皇室，荣登大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但她没有将其所废的唐朝皇帝们（中宗、睿宗）赶尽杀绝。与王莽代汉一样，武周代唐也被视为篡位。虽然二者都堪称有为之主，但终究没能在历史上获得正统地位。他们所取代的皇室后来都成功复辟，他们在青史中的名分也尘埃落定。

[60]噶尔氏有幸存者逃入唐朝，后来为唐军效力。

[61]汉文史料中又作戍地、伐地，地望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博侬肯特（Poykent）。——译者注

[62]沙班（Shaban　1970:48）认为，粟特人此举是为了减少其故地各邦国的税赋。它们即将被阿拉伯帝国征服，变成“和平之地”（dâr al-salâm），不再是“敌人之地”（dâr al-harb）。

[63]Shaban（1970:66）。

[64]汉文史料中又作乞史、佉沙、羯霜那（译自Kašana），地望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沙赫利苏伯兹（Shakhrisyabz）。——译者注

[65]唐代又作那色波，元代作那黑沙不（译自Nakhshab），地望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卡尔希（Kharshi）。——译者注

[66]Shaban（1970:67）。

[67]Shaban（1970:67-75）。

[68]Beckwith（1993）。

[69]默啜可汗时在蒙古高原北击铁勒拔野古部，于土拉河畔大破之，在得胜回师时因轻敌中伏，被拔野古部勇士斩杀。——译者注

[70]在汉代和唐代的史书中就有关于西域通断利害关系的讨论。尽管时人或后代的史家常常有中国不需要外国朝贡、贸易之说，但事实上当时中国的确需要国际贸易，且极其热衷于此。

[71]Wechsler（1979b：232-233）。

[72]Twitchett and Wechsler（1979:282-284）；Beckwith（2007a：46-49）。

[73]关于高句丽语（或称“扶余-高句丽语”）及其与日语-琉球语诸语言的关系，参看Beckwith（2005a，2006e，2007a）。

[74]Wood（1994:146-147）；Scherman（1987:232-233）。

[75]此处原文作者作“到7世纪初”，误。——译者注

[76]此役即历史上的“普瓦捷之战”。参看Wood（1994:283）。

[77]具体细节及相关问题，参看Wood（1994:273-274，281-284）。

[78]而且这种政治观念一直延续到蒙古时代。在蒙古大汗要求其他政权统治者臣服的信件中充分表现了这种观念。

[79]Beckwith（1993:14-15，19-20）。关于法兰克人和阿瓦尔人的最高统治者的称号问题，参看注释70。

[80]参看Schamiloglu（1984a）。该作主要以此描述蒙古帝国时代及后蒙古时代的政治结构。其实这种结构有史以来就体现在中央欧亚各政权的政治实践中。在中央欧亚大多数地区，这都是一种理想化的政权组织形式。当然，究竟这种理念在实践中具体践行了多少，还需要学者更细致的考察。

[81]汉文史料记载早期的扶余王国时，除记其本土外，还列有其下四大属部，而汉文史料记高句丽时，列有其“五方”（即五部）之名，其中的中部（黄部）为王族（《三国志》卷三〇，843页；《后汉书》卷八五，2813页；Beckwith 2007a：41-42页）。后来汉文史料对契丹（辽）的记载也与此类似。

[82]Blockley（1985:115）。关于突厥王族阿史那氏，参看注释71。

[83]关于族名“阿史那”可能的词源的讨论，参看注释72。

[84]Uray（1960）。

[85]其中安南都护府的“安南”之名用作地名指称越南，一直沿用到晚近。与上述四方相对应的是唐朝都城长安，在理念上代表中央“长治久安”。当然，长安之名古已有之，最初也未必与地理方位有关。此外，“中国”之名最初也应是“中央上国”之意。

[86]Manz（1989:4）指出：“成吉思汗将其帝国的领土四分，即四大兀鲁思，分别封给四子，并分派军队给四子。”蒙古黄金家族所建政权皆有四分其国而治的传统（Schamiloglu 1984a）。

[87]这种自欺欺人的外交策略广泛应用于各个层面的外交实践中，直到9世纪初叶。9世纪初，唐朝和吐蕃帝国签订了第一份帝国间平等的双边条约，在中世纪欧亚大陆为首例（Beckwith 1993）。当然，以天朝上国自居的政治理念并未从此在欧亚大陆消失，比如在13世纪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又如直至晚近的清。

[88]参看de la Vaissière（2005a：186）。

第六章　丝绸之路、王朝更迭与秩序崩溃

他将你夺走

从我身边夺走

他让我尝尽万般苦涩

不留一丝快乐与我

——吐火罗匿名诗人[1]

商业力量·寺院制度·艺术·科学

在8世纪中叶短短的13年间，欧亚大陆的各大帝国均相继经历大规模的叛乱、革命或王朝更迭。这场风暴始于742年——深受粟特人影响的回鹘人推翻了突厥汗国的统治，称雄东部草原。几乎同时，拜占庭帝国国内爆发大规模的起义。其后不久，中亚商业重镇梅尔夫的商人集团领导的阿拔斯革命席卷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建立。法兰克王国则经历了加洛林革命。755年，一场大规模的叛乱在吐蕃帝国爆发。同年稍后，沙陀突厥将领安禄山领导的叛乱撼动大唐帝国。

新王朝建立以后，陆续兴建起精心规划、有着象征意义的文化中心，宣告和平秩序在各地重新建立。阿拉伯人在巴格达建起圆形结构的号称“和平之城”的宫殿-清真寺建筑群。其设计所秉承的是中亚伊朗人的文化理念，其中居民也为中亚徙来之人。圆形布局的桑耶寺在西藏落成。新兴的法兰克王朝则在其都城亚琛建起16面[2]的大教堂。这些新兴的王朝均公开扶持某一种世界宗教（或教派）为国教。

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中，欧亚大陆发生了几个重大的变化：一是欧亚大陆各地的许多民族陆续开始使用文字；二是世界的商业、文化和科学的中心进一步向中亚西部转移；三是贸易路线北移。在西方，阿拉伯帝国与欧洲之间的商路转移到一条北走的路线，即从中亚出发，经伏尔加河流域，到达拉多加湖和波罗的海沿岸。这条新兴的贸易线路极大地带动了北欧经济的发展。在东方，中国和中亚间的贸易线路北移，经过回鹘汗国境内。马蒙曾将阿拉伯帝国的首都置于中亚的梅尔夫达10年之久，当他后来将都城迁回巴格达之时，新的一批中亚人和一波中亚文化随之进入。阿拉伯帝国境内的文化、科学因素因此得以汇聚融合，产生一系列伟大的成就。其中一些成就经西班牙哈里发国传入欧洲，促成了后来欧洲的科学革命。

8世纪中叶的王朝更迭与起义变乱

8世纪中叶，一场浩大的动乱蔓延整个欧亚大陆。其原因尚无定论。考虑到当时欧亚大陆各地之间的密切联系，很可能是737-742年在中亚和东部草原发生的变动触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导致整个大陆的大变局。当然，751年发生的加洛林革命和755年发生在吐蕃境内的叛乱并非因此而发。这些夺权或起义的事件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较为著名的一些变乱皆由商人集团或与商人、国际贸易关系密切的民族发动。下面，笔者先从发生在东部草原的第一场变动说起。

中亚和东部草原的突厥人

中亚的商业城市是丝绸之路商业系统的核心，它们受当时分布在西突厥故地的突骑施人控制。阿拉伯文和汉文史料多次明确提到，突骑施人也为北疆和中亚其他地区的商业活动提供保护和支持。[3]然而唐军和阿拉伯军在8世纪30年代不断出兵进攻突骑施，终于在737-740年攻灭突骑施汗国。[4]此后，中亚出现权力真空，各小政权之间相互攻杀，唐朝和阿拉伯帝国得以将其势力深入中亚各城市。

在阙特勤（731年卒）和毗伽可汗（734年卒）相继离世之后，东部草原的突厥第二汗国一蹶不振。尽管他们兄弟二人在20年间率突厥人南征北战，却始终未能将突厥第二汗国的势力扩展到东部草原之外。742年，回鹘、拔悉密和葛逻禄等铁勒诸部联合推翻突厥汗国的统治。随后，这三家之间又展开混战。三家之中，回鹘人马最多，势力最强。拔悉密最先被打败，随后是葛逻禄。在744年，回鹘汗国建立。葛逻禄人本分布在突骑施之西，此时他们已经进入突骑施人的故地——北疆草原和中部草原的东半部，很快占领这里。他们收纳突骑施余部，但却未能像突骑施汗国一般在此建立起政治-军事霸权。称霸东部草原的回鹘人如之前的东突厥人一样深受粟特人的影响。

拜占庭帝国

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五世（741-775年在位）狂热支持“破坏圣像运动”。他娶可萨汗国公主茨察克（Tzitzak）[5]为后。在741年或742年，他初登大宝即被亚美尼亚总督阿塔瓦斯多斯（Artavasdos）击败，后者

在君士坦丁堡加冕称帝。743年，君士坦丁五世卷土重来，废掉僭主阿塔瓦斯多斯。

阿塔瓦斯多斯是亚美尼亚人，且支持圣像崇拜，因此他受到圣像崇拜者（iconodule）的拥护。史料和现代研究大都聚焦于此。他或许对君士坦丁五世继位心怀不满，但这不似其起兵造反的全部原因。或许，当时亚美尼亚周边地区发生的变动是诱发这次叛乱的原因，比如阿拉伯军在737年攻入可萨汗国腹地之事。[6]

阿拉伯帝国

747年，在当时欧亚大陆最大的商业城市之一梅尔夫，阿拔斯起义爆发。起义由当地阿拉伯和中亚裔商人发动。[7]他们在750年推翻倭马亚王朝，建立阿拔斯王朝。其首任哈里发为阿布·阿拔斯（萨法赫，749/750-754年在位）。

这次起义带有明显的商人和中亚的特征，不容忽视。尽管有学者强调起义的领导者为中亚化的阿拉伯人[8]，而非阿拉伯化的中亚人[9]，但这并不影响下面这些不争的事实：（1）起义主要是在中亚城市由中亚人发动的，起义的目的是保卫和争取中亚人的利益，而这些中亚人既有阿拉伯裔也有非阿拉伯裔；（2）义军在中亚城市梅尔夫宣誓起兵，当地有一个粟特人的集市和一个布哈拉人的聚居区，聚居区内还建有布哈拉王（Bukhâr　Khudâ）的宫殿；[10]（3）一支由中亚人组成的大军呼罗珊尼亚（Khurâsâniyya）攻灭了倭马亚王朝。[11]

法兰克帝国

751年，出身法兰克王国宫相的丕平三世（741-768年）推翻了墨洛温王朝。在之前的数十年中，墨洛温王室其实早已是宫相家的傀儡。丕平三世建立加洛林王朝，并大肆利用政治宣传和书籍文字来确立其统治的合法性。加洛林王室有力地控制了法兰克帝国的政治。他们推翻墨洛温王朝的背景已得到充分研究，基本上属于政权内部的权力斗争。

当然，还有一些因素或许也与这次朝代更迭有关。加洛林家族保护和支持犹太商人，深受其左右。[12]他们还下令以阿拉伯银币为模板铸造银币德涅尔（denier），竭力促进法兰克帝国和伊斯兰世界间的国际贸易。他们还与阿拔斯王朝建立起友好关系。在先后征服位于其东北的萨克森人和其东南潘诺尼亚的阿瓦尔人之后，他们的势力开始影响进出

中央欧亚的商路。[13]

吐蕃帝国

755年，一场大乱撼动了吐蕃帝国。时任赞普赤德祖赞（莫阿聪，712-755年在位）遇刺身亡，太子荣德赞在其后一年的时间内都无法继位。[14]他登基后花了20年的时间才使吐蕃帝国恢复元气。

说这场内乱的原因不明是一种保守的说法。至少有两点是清楚的：一是这场内乱与统治者的合法性有关；二是它与吐蕃败于唐军有关。当时吐蕃节节败退，丢掉大片领土，形势危急。755年，吐蕃东北的藩国（指吐谷浑）归顺唐朝。或许这场由吐蕃大臣领导的政变仅仅是为了扶吐蕃帝国于将倾，免其被唐朝攻灭。[15]

唐帝国

750年，出身高句丽的唐军大将高仙芝出兵葱岭（帕米尔高原），在那里击败吐蕃军。他乘此战之胜，介入拔汗那国（费尔干纳）和石国（塔什干）之间的战争。他与拔汗那王联军攻下石国。尽管石国国王出城投降，但高仙芝却不顾和议，引军在石国奸淫、掳掠、烧杀，并将石国国王解送长安。石国国王被唐玄宗斩杀，石国王子逃往康国（撒马尔罕），向大食（阿拉伯帝国）求救。阿拔斯王朝于是派出一支援军。751年7月，这支军队在怛罗斯（塔拉斯）附近与高仙芝的军队遭遇，两军在阿特拉赫（Atlakh）接战。对战之时，随高仙芝征战的葛逻禄人突然变节，转而与阿拉伯人、中亚人一起进攻唐军。唐军大败，阿拉伯人获得胜利。[16]

尽管有此一败，且国内因连年征战而危机重重，玄宗仍继续对外用兵。到753年，唐军已经将吐蕃在中亚的所有地盘收入囊中，并持续向青藏高原推进。755年，吐蕃帝国又发生内乱，唐朝攻灭吐蕃似乎已成定局。

但就在755年年底，出身沙陀突厥商人[17]的唐朝将领安禄山[18]起兵进攻唐玄宗，几乎攻灭唐朝。他得到了许多粟特集团和突厥化粟特集团的响应，这些集团均是武士-商人集团。[19]与其他的粟特或突厥首领一样，安禄山也有一支私兵队伍，由契丹人等中央欧亚武士组成。[20]

令人吃惊的是，安禄山及其党羽利用遍布中国北方及其邻近的中央欧亚地区的粟特商人网络，花费大约八九年的时间，筹划了这场叛乱。换言之，在阿拉伯帝国的粟特人设计推翻倭马亚王朝的同时，唐帝国内的粟特人也在密谋反唐。安禄山及其党羽在安史之乱以前的所作所为[21]和梅尔夫当地叛军在筹划阿拔斯起义时的所作所为别无二致。起码就这两场叛乱而言，两方面的叛军很可能彼此知情，并通过由粟特人控制的丝绸之路贸易网络保持联络。另外，回鹘人深受粟特人的影响，这点已广为人知。正是回鹘人在东部草原攻灭了突厥汗国，建立霸权。唯有755年吐蕃内乱的内情尚不明朗，这就使人不禁要问：此事是否也和粟特人有关呢？另一个问题是：这一系列与粟特人有关的叛乱背后，是否还有一个中央机构在居中调度呢？

直到757年，唐朝在回鹘大军的援助下，才得以克复两京——长安和洛阳，夺回华北的一些战略要地。但华北地区的东北部，尤其是安史叛军的老巢河北，已经成为半独立地区。唐朝在对外扩张中所获的领土经安史之乱所失甚多，包括吐蕃帝国东部边境和靠近高丽的辽西、辽东。唐朝的军事、经济实力在安史之乱中被严重削弱，因此唐朝手中的西域和漠南地区在安史之乱后不久也相继失陷于吐蕃和回鹘。

变乱过后的宗教和国家

阿拉伯人热衷于贸易，并促进其发展，阿拉伯帝国在阿拔斯时代日益繁荣。第二代哈里发阿布·加法尔·曼苏尔（Abû Ja’far alManṣûr）在底格里斯河畔巴格达老城附近新建一座都城。此地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两河相近之处，在萨珊波斯帝国故都泰西封上游不远处。新都“和平之城”有着标志性的圆形平面设计。这种建筑形制是仿照数个萨珊波斯都城的形制而成的，包括故都泰西封和中亚的佛寺纳缚僧伽蓝（即“新寺”，其最初是作为萨珊王朝的一个行省的都城而在巴尔赫修建）。而萨珊的圆形建筑风格则承袭自帕提亚建筑。帕提亚人是萨珊王朝建立之前波斯的统治者。“和平之城”是哈立德·伊本·巴尔马克的设计杰作。哈立德是纳缚僧伽蓝最后一任住持之子，曾一度官至帝国的维齐尔（vizier）。[22]“和平之城”的中心是哈里发的宫殿，宫殿有穹庐一般宏伟的绿色圆顶。[23]在都城周围，阿布·加法尔置有由中亚人组成的军队——呼罗珊尼亚。

吐蕃的内乱很快被平定，吐蕃帝国不久即重新夺回其失掉的大部分领土。在其后20年的时间内，吐蕃大军纵横天下，所向披靡。他们曾在763年短暂地攻占大唐西京长安[24]，并攻下鄂尔多斯南部及当地长城沿线诸城。[25]此后，新赞普利荣德赞（756-797年在位）方才完全掌控内外局势，宣布佛教为吐蕃国教。他下令在西藏中南部的皇家领地札玛兴建一座大型的圆形寺院桑耶寺。[26]具体的佛教形式是以印度大乘佛教为基础，辅以一切有部的组织制度。藏区中央的法师和译僧几乎来自吐蕃帝国治下的各个地区，包括今尼泊尔、印度、克什米尔、阿富汗、中亚和中原的部分地区，[27]甚至还有人来自其境外更遥远的地区，如朝鲜半岛和斯里兰卡。

回鹘人在763年皈依摩尼教，并将其尊为国教。他们将其都城汗八里［Khanbalïk，喀喇巴拉噶逊（Karabalgasun）］建成一座大都市。汗国的政治中心是一座华丽的金帐。金帐带有圆顶，可汗“坐在帐中的金座之上”[28]。回鹘人的死敌黠戛斯誓夺其金帐。回鹘人有时定居在他们的都城，但直到其汗国覆灭，他们仍然是传统的中央欧亚草原民族，热衷于国际贸易。[29]摩尼教和平的特性没有影响回鹘人的政治。

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查理大帝（768-814年）率领法兰克人控制了欧洲大陆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包括阿瓦尔王国。在占领潘诺尼亚之后，法兰克军攻克了阿瓦尔王国防御森严的首都——阿瓦尔人之环（the Ring of the Avars）。《查理大帝传》的作者艾因哈德称这是查理大帝一生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而另一件则是其对萨克森的征服。这两地正当西欧进出中央欧亚的陆路商道。与墨洛温王室不同，加洛林王室自称纯粹正统的“罗马”天主教徒。在其位于亚琛的新都，查理大帝兴建了16面——几乎就是圆形的——教堂，献给圣母马利亚。教堂有宏伟的圆顶，[30]教堂中央置有王座。加洛林王室还与天主教教皇结成紧密的同盟。教皇先后认可矮子丕平和查理大帝为法兰克帝国正统的统治者，而作为回报他们助教皇打压其对手。教皇还支持加洛林王室管控法兰克教堂。

拜占庭帝国的亲密盟友可萨人显然是在740年尊犹太教为国教的，[31]时在麦尔旺·伊本·穆罕默德（Marwan ibn Muḥammad）率阿拉伯大军攻入可萨汗国3年后。麦尔旺曾用计诓骗可萨使者，以期兵不血刃进军可萨境内。后来他公开了自己的意图，并继续挥师深入可萨领土，然后才释放可萨使者。阿拉伯军杀毁可萨人的马群，虏获大量可萨人及其他部族人口，迫使剩余可萨民众逃亡乌拉尔山区。麦尔旺撤兵的条件是可萨人自其可汗以下全部皈依伊斯兰教。可萨可汗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城下之盟，阿拉伯大军得胜收兵。[32]阿拉伯人刚走，可萨可汗便弃绝伊斯兰教。可以想见，他必对伊斯兰教充满愤懑。此事应当正是可萨人改宗犹太教的直接原因。另外，还应考虑到8世纪中叶的时代背景，当时欧亚大陆的各大政权纷纷皈依不同的世界宗教。可萨人选择犹太教也有其政治上的考虑：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免受阿拉伯哈里发（伊斯兰教领袖）和拜占庭皇帝（东正教领袖）的压迫。[33]

唐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均平息了国内的叛乱，恢复了其统治秩序。但经此一劫，唐朝已经元气大伤。新兴的中央欧亚政权在改朝换代之后都改宗某一世界宗教，以建立其统治的合法性。而唐朝和拜占庭皇帝则依靠本朝前代的荣光，延续着本朝一贯的宗教政策。这种做法很快导致了流血事件的发生。

中原王朝和拜占庭帝国在各自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几乎都奉行着当时当地流行的正统、主流宗教，但唯独在中世纪初期，它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非主流的宗教政策。这点非常值得注意。

唐朝官方尊奉道教，这在中国历史上的其他朝代并不常见。道教常

为组成帝国官僚机构的儒家士大夫所不齿。尽管许多皇帝都信佛教，但唐朝对佛教等其他宗教的打压却越发严厉。

同样，拜占庭帝国在历史上也以严格尊奉正统教义而著称，但它在这一时期却采信各种异端。最著名且历时最久的一次便是“破坏圣像运动”，几乎贯穿整个中世纪初期。拜占庭政府以严刑杀戮来推行其宗教政策，尤以8世纪君士坦丁五世一代最为黑暗。

晚期中央欧亚文化系统

私兵骨干成员立誓永远追随主人，从人世到阴间。正是这种观念导致了私兵自杀或被杀以殉葬的传统。私兵甘愿为主人战死沙场，“视死如归”。[34]他们认为人死之后的世界和生前的世界并无二致，至少私兵还应为主人而战，主人还应赐私兵富贵，这点不会改变。因此，主人死后须以大量财物随葬，一同带往阴间。私兵们死后则以马匹和武器随葬。

在中世纪初期，中央欧亚各民族普遍流行私兵制。在8世纪，中央欧亚的主要民族陆续尊奉某一种世界宗教为国教，他们关于死后世界的观念也因此发生了改变。在主要的世界宗教中，自杀和杀生皆被视为罪过。但私兵制非常重要，不能废止，因此他们只能取消私兵制中的人殉仪式。[35]

私兵的最实际的用途是作为主人的私人卫队——只效忠于主人个人，而非国家。尽管豢养私兵耗费巨大，但私兵制对中央欧亚统治者意义重大，一直被沿用。直到近代初期，中央欧亚各政权丧失独立地位，私兵制才普遍被废止。这一时期，一些私兵制度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

粟特等中亚西部民族的私兵系统最为发达，通常由大批私兵组成。这种私兵制度后来变化不大。随着他们改宗伊斯兰教，其私兵制发展为古拉姆制。本质上，古拉姆制就是不带有人殉仪式的传统私兵制。[36]

在吐蕃帝国奉佛教为国教以后，私兵制又延续了多久？由于史料匮乏，这一问题尚无定论。但有一点很明确，私兵制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一种寺院形式。吐蕃人所奉的佛教部派强调对精神导师的服从。这种关系与私兵对主人的服从差别不大。[37]当一位吐蕃赞普皈依佛教，被尊为“法王”（dharmarâja）或“转轮王”（cakravartin）之后，藏地的佛僧便会甘心受他调遣。难怪在吐蕃帝国末期会有佛僧从军出战。[38]到中世纪早期的末叶，吐蕃帝国境内已经建起大片的寺庙。

在回鹘人和可萨人分别皈依摩尼教和犹太教以后，这两个民族的私兵制的变化情况尚不清楚。但毫无疑问，即使他们皈依了世界宗教，私兵制仍然被沿用了很久。[39]在可萨北方的民族——诺斯人（Norse）

和斯拉夫人中，私兵制没有发生变化。而可萨人正是最终亡于他们之手。回鹘以北和以东诸民族也保留了传统的私兵制，尤以契丹人和蒙古人的私兵最为人所熟知。这两个民族在回鹘之后相继称霸东部草原。这些民族在数个世纪之后仍然保有私兵制。在斯拉夫人的私兵制德鲁日纳（družina）见于史册和文学作品之时，斯拉夫人应当已经皈依基督教。这时的德鲁日纳可能已经转变为或正在转变为一种不带有人殉仪式的卫队制度。

中亚佛教文化与早期伊斯兰文化

在伊斯兰时代最初的一个世纪中，阿拉伯人的都城频繁变换。在8世纪中叶，一支由中亚化的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化的中亚人组成的大军——呼罗珊尼亚（意为“呼罗珊人”或“东方人”）随着新建的阿拔斯王朝开入阿拉伯帝国的腹地。曼苏尔在巴格达兴建新都“和平之城”，将这支大军驻扎在新都周围。其后历代哈里发都将国都定在巴格达，仅有马蒙（808/813-833年在位）例外。马蒙是哈伦·拉希德之子，他将国都移到位于中亚本土的梅尔夫。当时，梅尔夫本地尚流行佛教，伊斯兰文化因此受到当地佛教强烈而深远的影响。当时中亚的知识分子很多是非穆斯林出身，但他们身处的阿拉伯帝国日益具有世界性，因此他们都有展平生所学、舒心中抱负的强烈愿望。

在阿拔斯王朝最初几代哈里发的治下，维齐尔的位置一直由巴尔马克家族把持。第一任维齐尔是出自这一家族的哈立德（781/782年卒）。巴尔马克家族将印度科学引入阿拉伯，他们曾派人进入印度，将当地的书籍和学者带回巴格达。这之中的一些知识被译作阿拉伯语传世。[40]伊斯兰神学和形而上学皆受原子论影响。到9世纪中叶，原子论已成为伊斯兰神学界的主流。其原型并非古希腊的原子论，而应当是一种印度的传统。虽然还无法确切比定其流派，但它肯定是通过中亚佛教直接传入阿拉伯世界的，因为原子理论是中亚佛学的主要特征之一。[41]印度人婆罗摩笈多（Brahmagupta）著于7世纪的伟大天文学著作《婆罗摩修正体系》（*Brāhmasphuṭa-Siddhānta*）被穆罕默德·本·易卜拉欣·法扎里（Muḥammad ibn Ibrâhîm al-Fâzârî）等人译成阿拉伯语《信德欣德》（*Sindhind*）传世。此书奠定了伊斯兰天文学和数学的基础。[42]当时最伟大的科学家当属穆罕默德·本·穆萨·花剌子密（Muḥammad ibn Mûsâ al-Khwârizimî/Algorithmus，活跃于807-847年），其著作多完成于哈里发马蒙统治的时代。他的两部著作奠定了现代数学的基础：一是《算数书》（*The Book of Algorithmus*，直译为《花剌子密书》），一是《代数》（*Algebra*）。前者将源于印度的记位数字和算数法则引入阿拉伯世界；后者则将见于印度天文学著作中的代数运算方法系统总结。[43]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语言学著作也诞生于这一时期。这部详细描述古典阿拉伯语的著作由西巴威赫（Sîbawayh，活跃于8世纪晚期）创

造。作者西巴威赫并非阿拉伯人，他当时在巴士拉学习，或许源出波斯。此书有关音位学的研究路径似乎取自印度语言学传统。[44]现已佚失的《书》（*al-Kitâb*）为西巴威赫的大弟子木贾希（al-Mujâshi'î）所著。他出身中亚巴尔赫。因其观点大有悖于他的老师，他在当时颇受指摘。[45]

中亚学者还以中亚佛教精舍系统（vihâra，寺院学校）为原型创建了伊斯兰高等教育系统。精舍运作的资金来自佛教信徒的捐赠，可免于征税。学生和法师所需费用均由精舍供给。法师住在精舍中，与学生朝夕相处。精舍主要的教学方法是口头讲授和论辩，教学的主要科目是佛法（Dharma）。阿拉伯人全盘接受了这一整套体系。他们甚至还照搬了中亚精舍建筑独特的形制——带有大庭院的正方形平面结构，四面各有供法师和学生居处的侧室，外加四个益万（iwan，半开放式门厅）。而中亚的精舍应当是在八九世纪间被伊斯兰化，成为伊斯兰经学院（madrasa）的。当然，伊斯兰经学院在史料中出现则是更晚的事情了。[46]

在哈里发马蒙治下，译介古希腊科学、哲学著作的活动蓬勃开展：最初从叙利亚文转译，后来直接从希腊文翻译。此后，希腊的影响逐渐盖过了印度的影响。但古典伊斯兰文化许多领域的知识根基仍来自印度传统，包括天文学、语言学、数学、形而上学、冥想神秘主义以及药学的一部分。伊斯兰经学院的教育体系和教育方法同样源自印度传统。751年怛罗斯之战后，阿拉伯人从唐朝的俘虏那里习得造纸术（尽管在新疆出土了大量年代更早的纸文书，但仍无证据显示阿拉伯人在751年以前已经会造纸）。从此，制作书籍更加方便、便宜，图书馆的数量也因此倍增。

文字和知识在欧亚大陆传播

各政权纷纷皈依不同的世界宗教，这促使文字和宗教经典在各地流布。不同的宗教经典体系影响、塑造着各地的文化，使各政权的特点更加鲜明。这奠定了前现代欧亚大陆的民族、语言分布格局。在中世纪初期之前，在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包括几乎整个中央欧亚，传世的文字记录是一片空白。多数地区流行的语言没有文字，其中很多地区甚至也不使用其他语言和文字来记事，因此，当地的历史、文学和其他文化信息都没能通过文字传世。即使在一些已使用文字的地区如伊朗语世界和印度，情况也是如此。当地的历史信息如今主要从钱币学、外国旅行者的记录以及周边邻国的传世史书中获得。到中世纪早期的末叶，除个别偏远地区——寒带、亚寒带地区以及东南亚山地丛林，欧亚大陆各地几乎都产生了本地的文献。当时，不可能人人都受教育、会读写，但欧亚大陆的多数国家中都已具有完整的书写系统，文人可以用某种语言进行创作。

留有传世文献的地区和文明包括：爱尔兰，当地文献以古爱尔兰语或拉丁语创作；英格兰，以古英语或拉丁语创作；威尔士，以古威尔士语或拉丁语创作；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以鲁尼文、古诺斯语创作；西班牙，以阿拉伯语或拉丁语创作；法兰克帝国各地，以拉丁语、古法语和古高地德语创作；基辅罗斯，以古罗斯语创作；拜占庭帝国，以希腊语创作；阿拉伯帝国，以阿拉伯语创作；可萨汗国，以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创作；[47]中亚西部，以阿拉伯语、巴克特里亚语、粟特语和新波斯语创作；中亚东部，以粟特语、西吐火罗语、东吐火罗语、于阗语、古藏语、古突厥语和汉语创作；西藏，以古藏语等语言创作；[48]印度，以梵语、巴利语以及各种梵语俗语和达罗毗荼语创作；东南亚，以巴利语、骠语（Pyu）、古孟语（Mon）、高棉语（Khmer）、占语（Cham）和古爪哇语创作；中原地区，以汉语创作；东部草原地区，以古突厥语和粟特语创作；朝鲜半岛，以汉语创作；日本，以古日语和汉语创作。

这一波新创作的文献多是各民族皈依某种或多种世界宗教的结果。各大世界宗教均以文献为基础，因此，信徒需要能读懂宗教文献的原典，并能够通过抄写复制这些文献以使其在本国流传。如果原典的语言

与本族语言相差甚远，还要将其翻译。大规模的抄经活动在欧亚大陆各地开展。在加洛林王朝治下的西欧，古典拉丁语文献和希腊语文献的拉丁语译本被复制。在伊斯兰世界，梵语、叙利亚语、希腊语和中古波斯语文献被译成阿拉伯语。在吐蕃帝国，梵语和汉语文献被译作藏文。在中亚的突厥人当中，吐火罗语和梵语俗语的文献被译成古突厥语。在日本，汉语文献被抄写复制。这一波文化传递意义深远。这些文献被抄写、翻译，在不同的文化和时空中传播，不但为接下来中世纪盛期的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也直接塑造了前现代作为整体的欧亚文明。

在熟练掌握文字工具、习得上古时期和周边文明的创作手法之后，各地的文人开始以本族语言创作文学作品。文学艺术之前仅见于几大古文明中，此时已遍地开花。日语、汉语、阿拉伯语和英语诗作同在这一时期达到各自历史的巅峰，臻于空前绝后的完美境地。与诗同时得到极大发展的是音乐，因为诗通常被咏唱，而非被简单地朗读。[49]随着一整套中亚乐器被带到长安，中亚的音乐传入中原。中亚音乐不久便完全取代了早期中原的音乐传统，并流传至日本。[50]传播文献需要书写，书写本身就是一种高度发达的艺术形式——书法，因此文献的传播也导致了艺术风格和艺术图案的传播。综上，中世纪早期是诗歌、音乐和图像艺术史上最富创造力的时代。

局势动荡·经济衰落

由于西班牙一直被倭马亚王朝残部控制，阿拔斯王朝的版图在其建立初期并不及当初倭马亚王朝的版图辽阔。但阿拔斯王朝迅速扩张其势力范围，一面深入中亚，一面进军印度，在这两个方向上都与吐蕃帝国接壤。

在8世纪晚期，吐蕃人不但从唐朝手中夺回了之前所失的领土，还继续向外推进。其势力范围向西最远可达喀布尔（高附），向北最远可达北疆，向东北则可到达鄂尔多斯。到790年，唐军的势力基本退出塔里木盆地，这里成为吐蕃和回鹘争雄的战场。双方在此展开拉锯战，一些城市甚至多次易手。到9世纪20年代，吐蕃稳定地控制了塔里木盆地南缘，而回鹘则掌握着北疆和塔里木盆地北缘诸城。[51]

一般认为，这一时期的国际贸易因为中亚地区连绵的战事而受损严重。其实未必。在7世纪和8世纪初叶，中央欧亚也曾战火频仍，比这时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中央欧亚的经济却一片繁荣。这一时期经济萧条持续影响着唐、吐蕃、回鹘以及其他地区的经济，其具体原因尚无定论。但唐朝在平定安史之乱以后大批屠杀粟特人的行为肯定导致了往来中原的国际贸易衰落。在华粟特人中有逃过此劫者，皆隐其出身，融入汉人中。[52]这显然无益于当时的国际贸易体系。

尽管唐朝至少在名义上恢复了其统治秩序，并分别在北方通过回鹘汗国[53]、在东南从广州通过海路参与国际贸易，但其统治阶级和中央政府均因长安的回鹘商人所放的高利贷而债台高筑。9世纪初叶，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中国经济在此之前就一直没能全面货币化，这时反而更加依赖以物易物。政府官员的俸禄以实物发放，而非银钱。无论其根源为何，唐朝人口规模之巨及由此而来的巨大经济规模使得这场经济危机严重地影响了整个欧亚大陆的东半部。

到9世纪30年代，吐蕃与回鹘-唐联盟之间的战争已经难以为继。停战并非因为它们突然渴望和平，而是因为战争所费巨大，三方都没有能力负担。三方在821-822年议和。吐蕃、唐朝共立双语写就的《唐蕃会盟碑》。回鹘一方面通过和亲迎娶一位唐朝公主，巩固双方联盟，另一

面与吐蕃订立和约。[54]终于，中央欧亚和风劲吹，可惜为时晚矣。

中世纪早期世界秩序的崩溃

汉文史料记载，9世纪30年代末气象灾害频发，[55]这使一路走低的中央欧亚经济进一步恶化。在西方，阿拉伯帝国国内的商业也经历着一场明显的萧条。哈伦·拉希德、马蒙两代治下的阿拉伯帝国可谓一派繁荣盛世，当时新铸造了大量的迪拉姆银币。从820年起，新币的数量出现了滑坡，在其后数十年里仅新造了很少的银币。[56]

同在9世纪30年代末，经济形势恶化导致回鹘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争斗。斗争失利的一方有人叛逃至回鹘的死敌黠戛斯的营中。840年，他带领黠戛斯大军绕开回鹘人的防线，突袭回鹘都城。回鹘人被杀得大败，四散奔逃。但黠戛斯人未能（或不愿）占据东部草原，并未建立起一个新的帝国取代之前回鹘汗国的位置。[57]东部草原逐渐被从东面迁徙进入的蒙古语族诸部占领。

一部分回鹘残部逃往汗国的西部。他们以高昌和别失八里为中心建立起小王国。[58]回鹘残部的主力大约有数万人之众，他们在840年末南下移动到河套平原以北唐朝边境，向其盟友求救。唐朝边将上奏朝廷："回鹘溃兵侵逼西城，亘六十里，不见其后。"[59]

唐武宗朝宰相李德裕本欲使回鹘余部退回北方故地，但他们其实已无路可退。不久，李德裕意识到，饥饿、士气低落且危险的回鹘人打算留居唐朝边境。请求进入唐朝境内内附的部族理应向唐朝投降，但回鹘人拒不投降。回鹘可汗反而表现得愈发独立、强硬，或许想借此获得唐朝更多的帮助和让步。然而，他的策略适得其反：他的不驯顺使唐朝深感忧虑，害怕回鹘南下攻唐。唐朝一面给回鹘供应衣食，以避免其因饥馑而寇边，一面加紧北边防御。终于，唐朝采取了一劳永逸的极端措施：843年初，他们出兵进攻回鹘营地，一举歼灭大部回鹘残部。[60]

对唐朝来说，回鹘人既是盟友又是对头。随着回鹘人的势力被彻底剿灭，一股排外情绪在唐朝蔓延开来。在攻灭回鹘残部后的一个月，唐武宗即下令禁断摩尼教。中原内地的摩尼寺（均是之前应回鹘人要求而兴建）全被关闭，寺产一概没收充公，摩尼教僧侣则惨遭屠戮。[61]发现此事有利可图，唐朝政府又开始向佛教徒下手。早在武宗初年，唐朝

政府就已开始迫害佛僧。845年，武宗灭佛运动进入高潮。佛寺财产全部被没收充公，大部分寺院被迫关闭。灭佛运动伴随着流血屠杀，许多僧尼遇难。[62]武宗灭佛事件不但终结了佛教在中原地区的势力，而且也为中国历史上独具一格、气象恢宏的大唐文化敲响了丧钟。尽管此后唐朝还延续了半个多世纪，但它往日的荣光、权力、财富和文化都一去不复返。

查理大帝之子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814-840年在位）继承了皇位。与其英明神武的父亲相反，路易几乎一无是处，但他好歹守住了法兰克帝国的江山。840年，路易驾崩，其三子为皇位开战。这场混战直到843年才停息，三方签订合约，史称“斯特拉斯堡誓约”（the Oaths of Strasbourg）。合约文本以三种语言保存——古法语、古高地德语和拉丁语。其核心内容是，秃头查理（Charles the Bald）分得今日法国之地，日耳曼人路易（Louis the German）分得今日德国之地。虽然合约没有提到洛泰尔（Lothair），但他作为帝国的继承者，所得即为前二者领地之外的帝国领土——帝国的中部，后被称为“罗泰林吉亚”［Lotharingia，今日之洛林（Lorraine）］。当时的罗泰林吉亚南起北意大利、法国东南，北抵北海，境内有帝国都城亚琛。

吐蕃地区新建的佛寺规模愈大、耗资愈剧。但经济不振迫使吐蕃帝国停止资助兴建佛寺。842年，吐蕃帝国统一时代的最后一任赞普赤乌东赞［Khri U’i Dum Brtsan，即朗达玛（Glang Darma，838-842年在位）］被一名修炼密教的僧人拉隆贝吉多杰刺死。[63]其二子争位，吐蕃帝国陷入分裂。后来，吐蕃帝国的统治在中亚的一些地方（尤其是帝国东北部）存续的时间比在西藏本土还长。866年，吐蕃帝国最后一块领地失守，帝国终结。

塞奥菲鲁斯（Theophilos）励精图治，拜占庭帝国被其治理得井井有条。他在842年去世，皇位传给其年仅3岁的儿子酒鬼米哈伊尔三世（Michael III the Drunkard，842-867年在位），而帝国的大权落在其妻西奥多拉（Theodora）手中。她是一位坚定的圣像崇拜者，掌权后立即在帝国全境发动了一场宗教革命，恢复圣像崇拜，无情地打击圣像破坏运动。随着周边民族相继衰落，拜占庭帝国的经济、政治势力渐渐恢复，逐渐开始收复之前东罗马帝国的领土。

中亚西部是阿拉伯帝国最富庶、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哈里发马蒙任命塔希尔·伊本·侯赛因（Ṭâhir ibn al-Ḥusayn）为呼罗珊总督，这标志

着阿拉伯帝国放弃了对中亚西部的直接统治。塔希尔本是马蒙“第二次阿拔斯革命”（second Abbasid revolution）的首功之臣。从此以后，他和他的后继者就代表哈里发成为呼罗珊地区的最高统治者。后来，他们的统治范围还扩大到了伊朗和伊拉克的部分地区。在塔希尔治下，阿拉伯的中亚很快成为半独立地区。他在当地铸币，并将自己的名字打在钱币上。总督的位置此后成为世袭，形成了一个自治的塔希尔王朝。当然，中亚西部伊斯兰化的进程没有改变，并继续深化，部分原因是它被纳入了广阔的伊斯兰世界，但主要原因是中亚当地经济力量——其坚实的基础是当地农业和国内贸易[64]——以及持续的跨大陆贸易。

位于巴格达的中央政府逐渐被伊斯兰化的中亚私兵队柘羯控制。[65]整支私兵队被下一任哈里发继承。自此，这支私兵的势力开始做大。他们的人员越来越多，耗费越来越大，也越来越不听从指挥。最终，阿拉伯帝国的哈里发们成为私兵卫队和世袭的朝臣手中的傀儡。[66]836年，阿拉伯帝国最后一位稍有实权的哈里发穆塔辛（al-Mu‘taṣim）将都城迁至巴格达以北120千米处的萨迈拉（Samarra）。[67]穆塔辛此举表面看是为了避免其私兵队与巴格达当地势力的冲突，实际上很可能是为了让自己从当地的政治谋杀和社会动乱中脱身。穆塔辛死后，其子瓦提克（al-Wâthiq，842-847年在位）嗣位。瓦提克不理朝政，他的实权也早被手下人架空。虽然此后阿拉伯帝国各地还在名义上听奉中央政府的号令，阿拔斯王朝哈里发还继续存在了几个世纪之久，但在842年穆塔辛死后，阿拉伯帝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已经名存实亡了。

---

[1]德藏THT 496号吐火罗语残片（T III.MQ 17.39），参看Sieg et al.（1953:307-308）。全诗完整英译见：Mallory and Mair（2000:273）。

[2]亚琛教堂外部有16面，而内部则有8面，如此可造成从外部看呈圆形、从内部看呈八角形的视觉效果。

[3]参看Beckwith（1993）。另见前文对东突厥人出兵撒马尔罕进攻阿拉伯人之事的讨论。

[4]Beckwith（1993:111-124）。

[5]此为希腊文拼写古突厥语Čičäk（花）。她受洗成为基督徒，获得教名艾琳（Irene）。

[6]对此次叛乱的详细研究（Speck 1981）几乎全都着眼在宗教原因。应当有一位熟悉阿拉伯文史料的拜占庭学家全面研究此事的起因。关于阿拉伯与可萨之间的战事，参看Golden（2006）。

[7]发动起义之人中既有商人，也有伪称商人者。

[8]Shaban（1970）。

[9]Daniel（1979）。

[10]参见de la Vaissière（2005a：282）。

[11]原始史料出于政治目的刻意淡化此次起义的中亚因素，这为现代学者所接受。上述不争的事实已明示其中亚因素。

[12]Bachrach（1977）。

[13]从8世纪中叶欧亚大陆各处政治动荡的共性考虑，上述这些事件值得进一步研究，或许它们影响甚至促成了丕平三世做出推翻墨洛温王朝的决定。

[14]很遗憾，古藏文最主要的史料《吐蕃大事纪年》恰巧在这一段史事处不全，因此当时政变的确切原因和直接后果不明。参看Beckwith（1983；1993:142）。

[15]关于史料中反映的一些蛛丝马迹，参看注释73。

[16]Beckwith（1993:139）。此战以“怛罗斯之战”闻名。此役之后，中国发明的造纸术随被俘虏的唐军传入撒马尔罕的阿拉伯人中。俘虏之中，有人曾一路被带到阿拉伯帝国都城。他就是杜环。后来杜环辗转回归唐朝，著《经行记》一书记其行程。此书后来佚失，但部分片段可从唐代学者杜预所撰《通典》中辑出。杜预与杜环系出同族。

[17]其真实的族属不明。他的养父为粟特人，养母为突厥人（Beckwith 1993:142页注释212；Des Rotours 1962:1-2；参看de la Vaissiére 2005a：215-216；参看Pulleyblank 1955）。

[18]汉文“禄山”是其粟特语名字Roχšan（光明）的转写。此词也是亚历山大大帝所娶的著名的中亚夫人禄山娜（Roxane）其名的词根。

[19]关于安史之乱及在华的粟特武士-商人，参看de la Vaissiére（2005a：217-220）和Moribe（2005）；关于粟特文化中的武士和商人，参看Grenet（2005）。

[20]参看注释25；参看de la Vaissiére（2005a：219；2005b：142-143）。

[21]参见de la Vaissière（2005a：217-220）。

[22]笔者在Beckwith（1984b）中曾讨论过此城的形制。当时笔者尚不知道早期的、帕提亚时代的泰西封城的平面本是圆形。应从本文所说；参看注释28。据说哈立德早先曾是倭马亚王朝一位哈里发的柘羯：“巴尔马克被带到由500柘羯拥卫的希沙姆·本·阿卜杜·马利克（Hishām b.‘A Abd al-Malik）跟前。希沙姆以礼待之，加其官爵。巴尔马克随后成为一名穆斯林。”（Bosworth 1994:274，转引自de la Vaissiére 2005b：146-147；前者将“柘羯”译作“奴隶”，今改之。）

[23]有关城市规划的仪式的记载，参见Beckwith（1984b）。

[24]Beckwith（1993:146）。

[25]Beckwith（1987b）。

[26]一如阿布·加法尔·曼苏尔在巴格达所为，利荣德赞也是在一次盛大的仪式上公布了其象征性建筑桑耶寺的建筑方案。此事有详细的记载（译文参看Beckwith 1984b），几乎和罗穆路斯最初兴建罗马圆城的奠基仪式一模一样。

[27]有关佛教传入中亚的历史地理学问题，参看Walter（待刊）和注释74。

[28]Allsen（1997:65）。与此类似，可萨可汗有一个金色的圆顶大帐（Dunlop 1954:98）。显然，这应是类似回鹘可汗金帐之物。吐蕃赞普也有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金帐，能容纳数百人（Demiéville 1952:202-203；参看Beckwith 1993:168页注释160）。阿拔斯王朝哈里发也有对应的设施——黄金宫（Palace of Gold）的穹顶，其下是他的王位，恰在其圆形都城的核心（Beckwith 198b）。法兰克人的皇帝查理大帝的王座至今仍然保留在亚琛大教堂雄伟的圆顶之下。似乎还没有学者深入研究这些圆顶，以及为何圆顶在这一时期欧亚大陆的各地都如

此重要。克烈汗有一座黄金大帐，中有金器和一柄特别的权杖。成吉思汗击败克烈部后夺得此金帐（Atwood　2004:296）；参看Dunlop（1954：注释38）。Allsen（1997:13-15）详细描述了中世纪晚期蒙古大汗们的金帐。这些金帐都织以金线（“那石失”，写作nasîj）。

[29]参看Beckwith（1991）。

[30]在当时及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它都是西欧最高的圆顶建筑。

[31]关于可萨人皈依犹太教时间的争论，参看注释75。

[32]Dunlop（1954:80-86）。

[33]参看注释75。许多犹太人很早就生活在黑海附近的可萨之地。后来，还有更多的犹太人为躲避拜占庭人的迫害，移居此地。

[34]详见《导论》。

[35]当然，人殉不会在一夜之间全面停止。“10世纪，已经犹太化的可萨人仍然保留着人殉的葬俗——如同伊斯兰化初期的奥斯曼统治者一样。”（Peter Golden，2007）

[36]过去数十年中，学界有关阿拉伯帝国卫队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遗憾的是，一些学者对史料记载的明白无误的事实视而不见，却在论证一些出于现代民族主义或其他政治宣传目的而产生的观点。笔者（Beckwith　1984a）已经指出，在阿拔斯哈里发采用私兵制以前一个多世纪，生活在中亚的阿拉伯人已经将当地流行的私兵制照搬过来。关于私兵制向古拉姆制的转变，魏义天（de la Vaissiére）指出，阿拉伯人最初将中亚的私兵制柘羯制照搬过来，后来经历了一段时间，才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古拉姆制。参看de la Vaissiére（2005b；2007），Golden（2001，2004）。

[37]在吐蕃帝国覆灭后不久，西藏的精神领袖即获得了政治权力，并通过转世制度（sprulsku，在英文中作tulku）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永生。

[38]参看Beckwith（1993:169-170页注释174；1983:11页起）。Uray（1961）。

[39]关于可萨私兵制的讨论，参看Golden（2002:141-144；2006）。

[40]关于这半个世纪印度文化对伊斯兰教的影响，现代学者多有研究，参看注释76。

[41]Fakhry（1983:33-34，213页起）。关于中亚佛教思想对早期伊斯兰教的影响，参看注释77。

[42]Fakhry（1983:7-8），Sezgin（1978:116页起）。

[43]Vernet（1997:1070）。拉丁语“代数”（algebra）取自原书标题的一部分，即阿拉伯语al-jabr，意为“复原”。

[44]学界对于早期阿拉伯语言学的外来渊源颇有争论，参看注释78。

[45]Sezgin（1984:43-54，68）。

[46]10世纪以后，伊斯兰经学院在伊斯兰世界各地迅速流行，并传入西欧，成为学院（college）。参看Makdisi（1981）。当然，此问题尚需更加深入的研究。

[47]可萨人、保加尔人等西部中央欧亚民族当时也使用鲁尼文，但鲁尼文文献尚未被完全解读。参看Kyzlasov（1994）和Shcherbak（2001）。

[48]有些文献是以古藏文书写其他的藏缅语族语言。其中一些文献还相当冗长，比如托马斯（Thomas　1948）所刊布那件。尽管这些文献不难解读，近年来也有学者研究（如山口瑞凤　2002），但这些语言本身还没有被破译或比定。

[49]传统艺术体系已在现代崩溃，详见第十一章。

[50]这种口头传播“新”传统几乎不涉及手抄乐谱，它作为日本古典管弦乐宫廷音乐流传至

今，不过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节奏）。参看Picken（1981，1985-2000）。

[51]Beckwith（1993，1987b）。

[52]De la Vaissiére（2005a：220页起）。

[53]Beckwith（1991）。

[54]Szerb（1983）。

[55]Mackerras（1990:342）。

[56]Noonan（1981/1998:55-56）。“820-849年，数量相对稀少的迪拉姆见于俄罗斯欧洲部分出土的窖藏中，或因为当时伊斯兰世界打制的迪拉姆数量本就稀少。”869年，造新币的速度再度回升。

[57]Drompp（2005:200-201）。

[58]别失八里地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县。还有一部分回鹘人迁入吐蕃帝国的东北方面，定居在那里。他们的命运更好，因为其后代一直延续至今。今天的裕固族（或“黄头回鹘”）是回鹘人的唯一直系后代。

[59]《资治通鉴》唐纪62“开成五年”条。

[60]Dalby（1979:664-665）。

[61]Weinstein（1987:121）。

[62]Weinstein（1987:121-128）。武宗灭佛也称“会昌法难”，因其事发在会昌年间（841-846年）。武宗死后，继位的宣宗立即停止灭佛行为，并惩治了尚在世的主谋人员。尽管宣宗试图复兴佛教，但佛寺系统再也没能在中原地区重新建立。当然，佛教文化和佛学思想此后仍在不断发展。

[63]尽管此事的内核应当是真实的，刺客从姓名看也似一位历史人物，但刺杀朗达玛的故事中含有大量象征性和非历史的内容。目前学界对吐蕃帝国末期的政治史所知极少，其后事更是迷雾重重。这一段历史值得深入研究。关于吐蕃帝国佛教史以及后帝国时代早期的历史，参看Walter（待刊）。

[64]沙班（Shaban　1976）指出，塔希尔王朝“是传统的统治者，其主要利益在于稳固其家族在当地的统治，换言之，他们满足于维持阿拉伯征服时代与各地迪杭（dihqān）制定的人头税制度。‘迪杭’即大地主，由此可知当地经济主要依赖农业”。

[65]在现代研究中，他们常被称为突厥人。实际上，其中有很多粟特等其他中央欧亚民族。参看《导论》、Bechwith（1984a）、de la Vaissière（2007）。

[66]因此，从实用政治的观点来看，私兵制的早期形式似乎更好。

[67]直到892年，萨迈拉一直是正式的首都（Northedge 1995:1039）。

第七章　维京人与契丹人

“啊，我的武士们

和弟兄们！

与其被人俘去，

不如死在战场；

弟兄们，让我们跨上

快捷的战马，

去瞧一瞧

那蓝色的顿河吧。”

——《伊戈尔远征记》节选[1]

列国时代

随着中世纪早期世界秩序的瓦解，一批新兴国家陆续涌现，但是它们在规模上远不如之前的帝国庞大。唯一的例外是拜占庭帝国。它非但没有覆灭，而且还略有扩张，尽管它从未能收复被阿拉伯人夺走的领土。或许是因为这一时期在中央欧亚及其周边地区出现了数量更多的国家，世界经济出现复苏并开始重新增长。这最终促成了整个欧亚大陆的文化复兴。

与中世纪早期大相径庭，这一时期的上层文化主要以宗教性质为主流，这决定了未来发展的趋势。修行制度在欧亚大陆各主要地区均蓬勃发展，促进了文化的普及。与此同时，欧亚大陆各地僧团势力的壮大则反映出严格的正统教义的影响和控制也在进一步加强。

在阿拉伯帝国崩溃以后，伊斯兰世界璀璨的文化却被进一步发扬光大，尤其是在中亚地区。伊斯兰文明古典时期所有的伟大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几乎都是中亚人或有中亚的背景。然而，初兴的伊斯兰知识界却遭到原教旨主义者的挑战。他们推崇神秘主义，反对哲学思辨。最终，教条取代了理性，原教旨主义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中占据了主流。

中部草原地区仍为游牧民族所占据，而在西部草原和东部草原则同时出现了横跨游牧区和非游牧区地理界限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农耕文明逐渐扩散至草原地区。维京-斯拉夫人的罗斯汗国将欧洲的农耕-城市文明推广到西部草原地区，而汉人则在由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治下，将汉地的农耕-城市文明带到东部草原地区。

小型霸权的形成

随着中世纪早期的各大帝国纷纷解体，兼之同期气候明显变冷，中央欧亚北缘的诸民族开始向南迁徙。他们重演了当年民族大迁徙的一幕，但是规模不及从前。

西部草原

可萨汗国在9世纪30年代受到威胁。威胁很可能来自匈牙利人（欧诺古尔人）[2]，他们曾是可萨人的同盟或属部。可萨人于是向拜占庭求援。840-841年，希腊工程师助可萨人在顿河下游筑起一座雄关萨克尔堡（Sarkel）。[3]匈牙利人在839年之前就已经占据西部草原，他们以此为营溯多瑙河而上，在862年劫掠潘诺尼亚，并在870-880年进攻斯拉夫人。[4]

889年[5]，可萨人和古兹人攻入佩切涅格人（汉文史籍中作“比千”）位于中部草原西侧、乌拉尔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领地。佩切涅格人被迫逃向西部草原，击败当地的欧诺古尔人，霸占了他们的地盘。匈牙利人再度从多瑙河流域北上进入潘诺尼亚。892年，在阿尔帕德（Árpád）的率领下，匈牙利人与东法兰克国王阿努尔夫结盟，对抗摩拉维亚国王斯瓦托普鲁克。894年，匈牙利人又入寇潘诺尼亚和摩拉维亚。895年，匈牙利人被保加利亚人击败，而在草原上，佩切涅格人又咄咄逼人。在这种形势下，阿尔帕德率领匈牙利各部，追随着匈人和阿瓦尔人早先的足迹，在潘诺尼亚安营扎寨。以潘诺尼亚为据点，他们屡屡在某个欧洲王公的招引之下入寇中欧和西欧各地，纵横劫掠，曾在899年春天攻入意大利。[6]匈牙利人的侵略又持续了数十年之久。942年，他们的兵锋甚至远抵西班牙。[7]他们一边缔结盟约，一边从败在他们手下的王公诸侯处征敛贡赋——换言之，他们以传统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帝国。另一方面，德意志人奥托一世（卒于973年）正在以与匈牙利人同样的方式创建着自己的霸业。955年8月10日，不可一世的匈牙利人被他们的劲敌奥托一世在奥格斯堡附近的莱西菲尔德击败（即奥格斯堡战役）[8]。经此一役，奥托一世霸业初定，而匈牙利人则败退潘诺尼亚，从此世居此地，后来建立匈牙利王国。在公元1000年基督教圣诞之日，匈牙利大公斯德望（即伊什特万一世）被罗马教皇加冕为匈牙利国

王，匈牙利人从此开始皈依基督教。[9]

可萨人还面临着另一个方面的威胁。尽管法兰克诸王国已经逐渐在文化上转向地中海类型，但斯堪的纳维亚诸民族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中央欧亚文化系统，是该类型文化分布最靠西北的一支。与同属于该文化系统的其他民族一样，尽管维京人以尚武著称，但他们以商贸立国，他们南下前往那些文明国家的目的主要是从事贸易活动。维京人在历史上最为著名的活动是其从北海南下武装入侵不列颠群岛和法兰克王国，并定居在其中的一些地方。但是，他们向东方的活动其实具有更为重大的历史意义。他们在波罗的海向东航行进入芬兰地区，再向东南沿河道航行进入可萨汗国西部的斯拉夫人之地。

在9世纪早期，维京人已经通过俄罗斯境内的河道与近东的伊斯兰世界频繁地往来贸易。这条商路最初由可萨人、犹太人以及穆斯林控制，从那时起，它落入维京人的手中。[10]以留里克为首的3个维京大酋于862年前后在诺夫哥罗德地区创立罗斯汗国。[11]882年前后，留里克的继任者奥列格攻占基辅，以此为中心将罗斯汗国发展成一个北起波罗的海、南临黑海的帝国。[12]由黑海向西航行，罗斯人可以直抵拜占庭东正教诸国，包括已经斯拉夫化了的保加利亚王国以及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拜占庭皇帝之前已经拥有一支由费尔干纳人和可萨人组成的卫队。[13]当皇帝们看到骁勇善战的维京人，便立即招募他们，组成了著名的瓦良格卫队。

沿伏尔加河航行，维京人可以抵达里海及其对岸的伊斯兰地区，但是他们却与控制着伏尔加河下游流域的可萨人发生了摩擦。不久，可萨人与罗斯人之间爆发战争。在965年至968/969年，基辅罗斯国王斯维亚托斯拉夫先攻克可萨人的要塞萨克尔堡，后夷平包括其都城阿的尔（在伏尔加河下游）在内的数座城市，给可萨汗国以毁灭性的打击。此后，尽管罗斯人退回基辅，可萨人作为一个民族仍存续很久，[14]但是可萨汗国自此一蹶不振，霸业一去不返。后来，可萨人的领土日渐萎缩，为周边强邻鲸吞蚕食。可萨一族也最终消融在历史长河中。

中亚西部和南部

随着阿拉伯哈里发帝国的衰落和解体，中亚西部被一系列半独立的地方政权瓜分，包括塔希尔王朝（821-873年）、萨法尔王朝（873-900年）以及萨曼王朝。这些政权的统治者均出自阿拉伯阿拔斯王朝世袭的

总督，仍然遥尊阿拔斯王朝为宗主。他们都是出身中亚的伊朗人。萨曼王朝由伊斯玛仪（893-907年在位）创立，[15]一直受到来自喀喇汗王朝持续的压力。喀喇汗王朝源出突厥葛逻禄部，占据着锡尔河与天山之间广袤的领土；他们在10世纪时皈依伊斯兰教。[16]萨曼王朝在999年被灭，最后一位萨曼统治者在1005年被杀死在卡拉库姆沙漠中。他和王朝的开国之主一样，也叫伊斯玛仪。喀喇汗王朝自此占有河中地区之大部，除了花剌子模。花剌子模一直保有独立的地位，在阿拉伯帝国鼎盛之时亦是如此。

在喀喇汗王朝向中亚西部扩张之时，中亚南部的东半部分落入了阿勒普特勤（意为“阿勒普王子”）的手中。阿勒普特勤出身古拉姆奴隶私兵，后来成为萨曼王朝的一方总督。他在962年前后已经在加兹尼（在今阿富汗东南）一带称雄，但是仍然承认萨曼王朝的宗主权。可能出身于葛逻禄部的塞布克特勤（意为“塞布克王子”，约994-997年在位）本是阿勒普特勤的古拉姆卫士。在他治下，伽色尼王朝已然成为一个帝国。994年，他出兵平定了在萨曼王朝阿姆河以南诸省发生的叛乱，并趁机吞并了这些地方。其子马哈茂德（加兹尼的马哈茂德，997-1030年在位）即位以后不再向萨曼王朝称臣。他于998年吞并萨曼王朝的部分领土，并于1017年攻占花剌子模。伽色尼王朝占领这些地方以后，喀喇汗王朝失去了向西和向南继续扩张的空间。后来，马哈茂德还攻下了西北印度；在其晚年，他又夺取了伊朗北部。[17]马哈茂德死后，伽色尼王朝在许多地方的统治都发生了动摇，尤其是那些远离其腹地的地区。

10世纪末叶，一支土库曼（即突厥蛮）[18]人在塞尔柱克的率领下迁入位于锡尔河三角洲的花剌子模地区。塞尔柱克之父早先曾为可萨可汗效力。他去世之后，塞尔柱克在可萨王宫中长大。塞尔柱克诸子的名字都极像《圣经·旧约全书》中的人物名——穆萨（摩西）、米哈伊尔、以色列，这恰可证明他们的可萨背景。[19]他们到达花剌子模后不久便皈依了伊斯兰教，并时常受雇于河中地区的某个政权，出兵劫掠当地非穆斯林的土库曼和其他民族。11世纪30年代，他们为劲敌所败，开始逐渐向南迁徙至粟特地区。尽管塞尔柱克人在中亚地区是一支新兴的陌生力量，但伽色尼王朝的腐败、贪婪及其政治军事上迅速的衰败促使呼罗珊地区诸城一座接着一座倒向塞尔柱克人一边。马苏德苏丹最终决心与塞尔柱克人决战，但却于1040年在木鹿以西的沙漠中大败而归。两年以后，塞尔柱克人重返花剌子模。他们击败当地的劲敌，任命一位塞尔柱克族总督镇守此地。伽色尼王朝尚保有在加兹尼和西北印度一带的王朝

腹心地区。他们逐渐恢复了一些元气，抵挡住了塞尔柱克人进一步的入侵，逼其暂时退回西北方面。在阿尔普·阿尔斯兰（1063-1072年在位）及其子马里克沙（1072-1092年在位）治下，塞尔柱克人通过与西喀喇汗王朝结盟，保其东部边疆平安无事。喀喇汗王朝在1041/1042年已分裂为东西两部。[20]在西面，塞尔柱克大军横扫伊朗、伊拉克、亚美尼亚，一路深入到安纳托利亚。1071年，阿尔普·阿尔斯兰在曼齐克尔特（今马拉兹吉尔特）大败拜占庭皇帝罗马努斯的军队，声威大震。从此以后，塞尔柱克土库曼人以及不隶属于塞尔柱克王朝的其他乌古斯部族渐次迁入安纳托利亚，这里逐渐突厥化。此前也偶有突厥语族侵入安纳托利亚，但是拜占庭帝国对这里的统治未曾动摇，此地一直通行希腊语和亚美尼亚语。从那时起，突厥语开始在这里扎根。

西藏

10世纪中叶以来，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黑暗时期之后，以寺院佛教的复兴为代表的文化复兴在之前吐蕃帝国的境内兴起。吐蕃帝国以后有关西藏的史料几乎全是宗教内容，皆由僧侣撰写，[21]因此，人们对那些推动佛教复兴的政权了解不多。众所周知，寺院佛教只有在国家的支持下才能广泛发展。最早重新组织佛教僧团的活动就是在西藏西部古格王朝国王意希沃（智光王）的推动下进行的。意希沃后来或许是在出征葛逻禄时被俘，身死囹圄。[22]由此可见，宗教复兴是政治扩张的结果，这与欧亚大陆其他地区的情况完全一致。古格王朝的王室自称源自吐蕃帝国王族一脉。不论是否属实，这都有力地证明了古格王室的主要目标是恢复当年吐蕃帝国的荣光。

佛教的复兴是从中央藏区（卫藏）以外的三个地区开始的：东部（今康区）、东北部（今安多地区）以及西北部的古格王朝（在今阿里地区）。此时在藏区重新流行的佛教教派继承和延续吐蕃帝国时代的佛教学说（“旧派”），主要依赖由生活在藏区边缘地带的僧人勉强保存下来的旧译佛经（“伏藏”）。后来，在伟大的古格大师仁钦桑波（约985-1055年）的影响下，尤其是在印度大师阿底峡入藏以后，一种新的佛教教派开始流行，取代了旧有学说。仁钦桑波本人曾在印度求法。印度大师阿底峡本在印度摩羯陀超戒寺，他于1042年接受绛曲微的邀请入藏来到古格王国。这一派密宗佛教以仁钦桑波和阿底峡等人新译出的怛特罗密续佛经为本。[23]阿底峡后来又移驻卫藏传法，直到圆寂；他移驻卫藏很可能是追随着古格王朝向这一地区的政治扩张。

但是，这一时期西藏地区政治-宗教方面最重要的发展却和另外一个人有关。他就是与阿底峡同时代的卓弥。他早年曾在超戒寺修习8年，后来返回西藏。1043年，他在卫藏的后藏地区建立一座寺庙，从印度请来一位大师收徒传法。在招收的弟子中，包括实力强大的昆氏家族成员。1073年，卓弥创建萨迦寺。萨迦寺的住持由童男充任，终身禁欲。这一位置一直由昆氏家族把持，叔（伯）侄相承。昆氏家族的势力随着萨迦派的发展而壮大。到13世纪初，萨迦派已经成为藏传佛教第一宗派，而昆氏家族也成为当时西藏最强的政治势力。

藏传佛教主要的宗派分化发生在这一时期。多数修行者以从梵文直译过来的佛经为正统，称佛教为“吹”（Chos）[24]，另外一些信徒则称佛教为“苯”（Bon）[25]。前者发展出许多教派。[26]佛教的新宗派在西藏地区迅速传播，取代了其旧有的形式。

北中国和东部草原

起于民变的黄巢（卒于884年）之乱席卷了唐朝大半的领土，甚至殃及远在东南的港口广州。叛军在广州屠杀平民约12万之众，受害者主要是阿拉伯、波斯等外国商人。黄巢之乱以后，唐朝的统治事实上已经终结，[27]中国以南的沿海贸易港口也取代了广州的地位。中国北方和西部地区，包括东部草原的南部和中亚的东缘，此时都被北方少数民族控制。它们按照中原王朝的统治模式建立起半独立的割据政权，其中许多政权最终完全独立。[28]他们的领土均地跨中央欧亚地区和中原地区。这些政权相互攻伐，也与南方的汉人政权竞争。

唐亡以后，各藩镇节度使纷纷自立，建立起一系列地方政权。后唐是最早的汉族-北族混合政权之一，也是第一个大型的混合政权。河套以东的河东地区是其中心地带。它最初是沙陀将领李克用（883-908年在位）治下的半割据的藩镇。李克用在883年击败黄巢叛军，助唐朝收复长安，因此得封河东节度使。913年，李克用之子李存勖（908-926年在位）消灭卢龙（幽州）的割据政权。此地曾是安禄山的老巢，长期为军阀割据。923年，李存勖攻灭地跨唐朝两京的后梁（907-923年）。后梁由曾参加黄巢起义的朱温创立，他曾亲手灭掉唐朝。[29]灭后梁以后，李存勖正式称帝，建立后唐（923-937年）。沙陀人统一了中原地区以及东北地区西部，只剩下黄河以西一河之隔的由党项人控制的鄂尔多斯高原东部。这时，他们不得不在北方和东北方面对曾经的盟友契丹人的挑战。契丹人属蒙古语族，他们建立的辽朝正迅速崛起。继后唐立，沙

陀人先后建立起后晋（936-947年）和后汉（947-950年）两朝。契丹人在10世纪40年代连续向沙陀王朝进攻。[30]

西夏王朝兴起于鄂尔多斯高原，由属于藏缅语族的党项人（弥药人）建立。他们的祖先当年在吐蕃帝国的压力之下，从青藏高原东北部的故地迁来这里。初唐时期，他们已驻牧在鄂尔多斯高原东部一带。到安史之乱时，党项人已经是当地最强的势力。晚唐时，党项王族拓跋部首领拓跋思恭（881-895年在位）率军助唐朝击退黄巢，收复长安。作为封赏，唐朝封思恭为夏州节度使，节度夏、绥、银三州军事。在后来数代君主的经略之下，党项人逐渐向西南往他们的故地青藏高原东北部扩张，向西面往中亚方向扩张。1002年，他们攻下夏州西面的灵州，将其作为他们的第一个国都。次年，改灵州为西平府。1038年，西夏正式建国。随着西夏国势日盛，不断开疆拓土，他们又在黄河西岸新建一座都城[31]。后来，他们渐次攻占甘肃的西半部以及西宁以南远到青唐羌之间的原吐蕃帝国的领土，建立起一个繁荣、稳定的帝国，一直存续至蒙古时代。此间，西夏常与其西南面毗邻的吐蕃等部、东南面毗邻的宋朝（北宋960-1126年；南宋1127-1276年）[32]爆发战争。党项人逐渐控制了中原和中亚之间东西向的贸易通路，这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当年吐谷浑王国的角色。但是，党项人也同时掌控着一些中原和东部草原之间南北方向的贸易道路，因为西夏帝国向东已经扩张到了鄂尔多斯以东，在东面和北面均与契丹接壤。

由汉人、回鹘人和吐蕃人建立的一众地方小政权在甘肃和青海地区先后崛起。这里是原属吐蕃帝国的朵思麻地区的核心地带。这些政权中最重要者当属青海地区的青唐羌。青唐羌为在中亚和宋朝间往来的商旅提供了另外一条通路，并因此繁荣。青唐羌也曾助宋朝夹击西夏。西夏的势力已经扩张到青唐羌的边境，并持续向其施加压力。[33]

契丹人属蒙古语族[34]，其祖先在上古时代晚期出于鲜卑部落联盟中。自初唐以来，契丹人开始称雄于华北平原的东北方面。[35]唐朝覆灭以后，契丹人在耶律阿保机的领导下，将势力扩展到华北地区、东部草原（924年）[36]及东北平原的南部。[37]契丹人的领土地跨华北和中央欧亚，在两种文化带交错地带的东半部，而党项人则占据着这条交错地带的西半部。两国境内既有以汉族居民为主的土地，也有以北方民族居民为主的土地。和一些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一样，契丹人至少到他们初兴的时代依旧保持着拥有私兵的传统；他们的政权明显是围绕“汗与

四伯”的结构进行组织的，体现在一种独特的新形式——五京制中。契丹在东南西北四方和中央各有一都，或斡耳朵。[38]契丹人在东部草原地区保留有很强的势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契丹人中的守旧势力拒斥汉化，想要保持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留在草原地区的契丹人和定居在汉地的契丹人后来都在蒙古人统治中原地区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辽一代，契丹人都与回鹘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39]在1120-1123年，辽朝被其长期以来的劲敌，属于通古斯语族的女真人攻灭。

女真人本是生活在远东地区（今俄罗斯滨海边疆区），说南支通古斯语的林中百姓。与契丹人以及后来的蒙古人不同，他们并非草原游牧民族。但是，在长期役属于契丹人的过程中，他们逐渐熟悉了草原民族的作战方式和政权组织形式。在大败前来入侵的契丹大军之后，女真人于1115年正式建国，国号为金。他们随后开始进攻已经衰落的辽朝，先吞并其在东北地区南部的领土。1117年，北宋欲与金朝结盟夹击辽朝，灭辽后平分其地。北宋希望灭辽以后可以重新恢复当年唐朝在北方的大片疆域。但金人此时国势正盛，不需宋人助力已势如破竹，而宋军却攻辽不利。因此，在1123年双方签订的盟约中，金人只许给宋人一小部分辽朝的领土，且宋人须缴纳岁币白银20万两、丝绸30万匹，以补偿金人在这部分土地上损失的赋税收入。1125年，随着辽朝最后一位皇帝被金人擒获，女真人取代契丹人成为华北地区东北部和东北地区的主人。而宋金关系则日趋紧张。同年，金人开始攻宋，连取今山西、河北等地，渡黄河包围了北宋都城开封。

北宋与金人签订城下之盟，将所失土地让与金人，并赔岁币白银30万两、丝绸30万匹、钱100万贯。1126年，西夏、高丽先后向金朝称臣。金人又以北宋不遵守和约为由再度攻宋，攻陷开封，大肆劫掠。宋钦宗、太上皇宋徽宗（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艺术家和书法家之一）以及大批皇族、后妃、宫女被金人一齐掳走。徽钦二帝被掳，宋人又立康王赵构为帝，但北宋实际上已经灭亡。1127年金人收兵，留给宋人半壁河山。1138年，宋人迁都至更南的杭州。然而宋人之顽强远超金人所料，他们后来又北上收复部分领土。1142年，宋金终于议和。双方以淮河为界，宋人每年向金人缴纳岁币白银25万两、丝绸25万匹。[40]

金朝攻灭辽朝之际，契丹王族耶律大石离开昏庸的辽朝末帝天祚帝，于1124年自立为王。[41]他向北逃入草原地区，在辽朝位于鄂尔浑

河流域的军事重镇可敦城收编当地的军队。1130年，他率领包括契丹人、蒙古人、汉人在内的各族人众，离开可敦城向西北进发。1131年或1132年，[42]在审时度势改向西方行进之后，耶律大石称帝，加全新的尊号古儿汗（意为“世界统治者”）[43]，以汉式的年号“延庆”建元，并重新建立起对于西州回鹘王国的宗主地位。[44]1134年，定都在八剌沙衮（在伊塞克湖附近楚河谷地中）的东喀喇汗王朝向耶律大石求援，请他助力平定境内作乱的葛逻禄和康里部落。耶律大石借机出兵，率军开进八剌沙衮，一路通行无阻。他乘势将东喀喇汗王朝并为藩属，并定都于此地。耶律大石在此新建一座契丹式的牙帐城——虎思斡耳朵，开始向之前喀喇汗王朝治下各地派驻监官税吏。[45]1134年，他出兵伐金不利，损失惨重，从此再无心东进复辟辽朝疆土。与此同时，他在中亚地区继续开疆拓土，向东扩张至喀什、于阗、黠戛斯之地和别失八里。在西线，耶律大石先于1137年5月在苦盏击败西喀喇汗王朝军队，随后又于1141年9月9日在撒马尔罕附近的卡特万之役中大败塞尔柱克苏丹桑贾尔的大军。从此，耶律大石的势力覆盖河中地区，甚至远及花剌子模。花剌子模从1142年开始被迫向西辽缴纳贡赋。[46]耶律大石创建的帝国被称为“喀喇契丹”或“黑契丹”，同时，作为一个汉式王朝，它又被称为西辽。1143年古儿汗耶律大石死后，西辽帝国的对外扩张结束，其疆域在东面包括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远达蒙古高原西部；在西面包括河中地区，远及正在崛起中的花剌子模。

东部草原地区的局势在金灭辽以后发生了变化。金人远比辽或西夏更加深入中原汉地，因此金人的统治中心在中原地区。尽管金人尚保有一些北族的传统，比如辽朝的“五京制”，但他们的汉化程度更深。金人在早期曾短暂驻兵草原地区，但很快就放弃了对这里的直接统治，而是采取羁縻的手段施加影响。这使草原地区出现了权力真空，属于蒙古语族或突厥语族的草原各部皆蠢蠢欲动，图谋霸业。其中最强的一部为塔塔儿部。他们受金人支持，打压正在崛起的蒙古人。金人也曾出兵草原征讨蒙古人，但未尝胜绩，不得不在1146/1147年承认他们的国家。蒙古人的领袖合不勒汗后来在元朝被追谥为功哲皇帝，庙号宣宗。金人册封他为蒙兀国王，以示羁縻，但也须“岁给衣食”厚贿之。[47]尽管蒙古人已经在东部草原发展壮大，但有金人支持的塔塔儿人仍然是这里最强的势力。

中世纪中期的文化繁荣

从中世纪早期结束到蒙古征服以前的这一阶段，欧亚大陆的国家规模都相对较小，这限制了政府和统治者对个人自由的控制。尤其在西欧、伊斯兰世界、西藏和东亚地区，思想家、科学家以及其他各种人才在受到人身威胁的时候可以逃往其他国家。这增加了国际间的人才流动，从而促成了文化的繁荣。

这一时期，伊斯兰世界在科学、数学、哲学和形而上学等方面达到了顶峰。而这些领域中最伟大的人物大多出自中亚，包括法尔伽尼（拉丁文名译作“阿尔弗拉伽努斯”，活跃于833-861年，来自费尔干纳）、法拉比（拉丁文名译作“阿尔法拉比乌斯”或“阿文纳萨尔”，卒于950年，来自法拉布，即讹答剌城）、伊本·西拿（拉丁文名译作“阿维森纳”，980-1037年，来自布哈拉附近的阿夫沙那）、比鲁尼（973-约1050年，来自花剌子模的卡特）、安萨里（拉丁文名译作“阿尔加泽尔”，1058-1111年，来自呼罗珊地区的图斯）等等。历史上第一位苏非派神秘主义大师比斯塔米（卒于875年）来自呼罗珊地区西部的巴斯塔姆。他曾随一位非穆斯林上师辛迪学习印度瑜伽派的修行方法和学说，后将其引入苏非派的修行中。[48]中亚后来成为苏非主义的重镇，许多苏非派教团在此兴起。

许多中亚的名城成为文化、典籍和教育的中心。鲁达基和达恢恢是最早一批以新波斯语写下名篇的诗人，他们均得到了萨曼王朝的支持。而伽色尼王朝同样支持新波斯语文学，其中最著名者当属由菲尔多西（卒于1020年）取材于伊朗口头文学所创造的英雄史诗《列王记》。[49]伟大的诗人内扎米（1141-1209/1213年）也生活在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化活动是在中亚的统治者的支持下，在中亚地区兴起的，而不是在伊朗高原（波斯）。

塞尔柱克帝国在阿尔普·阿尔斯兰及其子马里克沙治下达到顶峰，而当时王朝的实际治理者则是尼扎姆·穆勒克（1017/1019-1092年）。他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有时冷酷无情。他在其最有名的著作《王者之鉴》（也译作《治国策》）中阐述了君主该如何加强中央集权，进行有效统治。他也大力支持教育，修建和资助了大批大型的标准化的伊斯

兰经学院，被称为“尼扎米亚”。从此，经学院高等教育系统在整个近东地区推广开来。尽管他的行为背后有政治目的，但这些经学院的建立直接推动了后来两个世纪近东地区的文化繁荣，并以此为中心影响了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地区。经院论辩在中亚兴起，后来传遍整个伊斯兰世界。它被科尔多瓦的雅兹迪（卒于969年）引入西班牙，[50]并在此流传，由此诞生出伟大的哲学家亚维侯（伊本·鲁世德，卒于1198年）。

中亚的伊斯兰诸城市构成了这一时期欧亚大陆商业和文化的中心，但一波反理性的逆流也在这里的宗教保守势力中产生。反理性运动受到了曾在巴格达的尼扎米亚讲法的中亚著名哲学家和神学家安萨里的大力支持。他拒斥哲学思辨，信奉一种保守的苏非主义。他在尼沙布尔为自己和弟子修建了一座苏非派修院（哈纳卡），晚年在此讲经传道数年。他和其他的保守派运用古希腊和伊斯兰哲学家的方法论来攻击他们的哲学体系，目的是压制教义以外的一切自由思想。他最有名的著作是成于1095年的《哲学家的矛盾》[51]，该书正是为打压哲学而作。他在书中提出，那些顽固支持某些哲学家的人，其心可诛。其后不久，亚维侯撰写《矛盾之矛盾》一书来反驳安萨里，但是此书写于西班牙且为时已晚。尽管亚维侯对欧洲的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但他在伊斯兰世界却没有任何影响力，他的著作在现代以前几乎不为伊斯兰世界所知。[52]亚维侯在其有生之年目睹伊斯兰世界的理性生活被狂热的宗教保守势力彻底扼杀。保守派的目标是扼杀独立思想，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重中之重是打压经院论辩，因为这一派认为一切观点，包括真经正典，都应当接受逻辑分析和辩论。安萨里和保守势力取得了胜利。质疑教理之人要么被处决，要么隐姓埋名，远走他乡。在伊斯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自由思想不但在哲学领域被扼杀，也在包括科学在内的其他领域销声匿迹。[53]

中世纪西欧与西班牙以及巴勒斯坦两地穆斯林的交往直接促成了其知识文化的发展。随着阿拉伯文书籍陆续被译成拉丁文，很多新颖的、令人眼前一亮的又时常相互抵牾的观念被引入欧洲。随着花剌子密[54]的著作《花剌子密书》被译成拉丁文，包括0在内的阿拉伯数字，以及“花剌子密”算法被传入欧洲。他的另一部著作《代数》则将高等代数带入欧洲。这两部著作对西欧人科学思维的形成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亚里士多德的一些哲学、逻辑学著作当时在欧洲业已失传，它们被从阿拉伯语翻译、传入欧洲。随之一同被引入的还有伊斯兰亚里士多德学派的重要著作。这些著作引发了西欧思想体系的重构。至少有一种重要的

机构——学院[55]，是随着这些新知的引入，才应运而生的。1180年，伦敦人乔休斯（Jocius de Londiniis）从圣城耶路撒冷归来以后，[56]在巴黎创立了欧洲第一所学院——十二学者学院（Collège des Dix-huit）。它是后来成为巴黎大学前身的一众学院中最古老的一所。学院保留了其原型——伊斯兰经学院和精舍的核心特征，比如教会为寄宿学生和一名教授提供资助；[57]其建筑的形态或许也是一脉相承。[58]伊斯兰世界的知识、技术和制度向西方的传播由此引发了中世纪盛期知识领域的革命。

在吐蕃帝国崩溃之后的一个世纪里，西藏地区逐渐形成了小邦林立的局面。这些小王国大多不以城市为中心，而是以城堡要塞或是新兴的大型防御式寺院（fortrified monastery）为中心。正是在这些防御式寺院中，中世纪西藏佛教文明逐渐发展成形。许多新的僧团像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各僧团之间所本教义各有不同，导致他们之间常有关于佛教教义、戒律等话题的论战。这些论战有些以口头形式进行，有些则以书面形式进行。书写的传统已经彻底形成，数量很少的一批吐蕃作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创作出一大批文字作品。这些作品以形而上、神怪和宗教仪式题材为主，也兼有历史、医药和其他内容。有关这一时期政治史的材料现存很少。各政权似乎与寺院的势力联系紧密，但双方之间具体的关系尚不清楚。[59]

建立西夏王朝的党项人与藏传佛教关系密切，西夏朝中就有许多吐蕃僧人。尽管党项人应当对藏语不陌生（西夏语与藏语属同一语族），而且藏文拼写系统简单清楚，但他们还是以汉字为基础新创了一套复杂的书写系统。他们翻译汉文经典，并新创作出许多不同题材的文字作品。因为党项人将汉文《大藏经》译成了西夏文，因此现存的许多西夏文文献可以借助汉文文献来解读。[60]契丹人同样以汉字为基础创造出一套文字系统（契丹大字），但实际使用不多。最后，尽管汉文是目前已知金朝主要的书面语言，但其实女真人也和党项人、契丹人一样，以汉文为基础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文字系统，用以书写他们的语言——女真语，即满语的直系祖先。[61]

尽管中原汉地大部分地区都被北宋统一，但中国北方的农牧交错地带却被一些非汉人建立的政权掌握。由于这些政权之间形成了相对均势的局面，谁也无法战胜对手，因此汉人在这一时期的国际交往中不得不采取一些相对平等的方式。不论为哪个政权效力，汉人士大夫心中仍有

传统的排外之心、华夷之辨，但由于当时中国有数个政权并存，这种观念相较大一统时代要淡薄。

宋朝与中亚和草原地区均没有直接的接触，因此宋人与中央欧亚的其他地区更无交集。或许因为这种相对意义上的隔离，宋朝士大夫阶层的眼界逐渐转向。宋代的画师创作了中国艺术史上最伟大的一些画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画作既无英雄形象，也无帝国主题，相反却都强调自然和避世。

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人完善了雕版印刷术，并发明了活字印刷术。[62]书籍和纸钞正式被印刷出来。另一方面，中国人还在五代和宋朝先后发明出了炸药、火箭和枪的前身——火铳。[63]

最后，或许因为中央欧亚在宋代的政治中无足轻重，中国的海上贸易在这一时期空前繁荣。当然，这并非是依靠官方支持实现的。实际上，中国南方地区和当地人士在文化上长期受到歧视，当地海上贸易的蓬勃发展也并非源于宋朝中央的政治决定。因此，是中国南方当地商人的自发行为，而非士大夫精英阶层的决断，促成了中华文化通过海路向外远播。这些商人从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出海远航，进入东南亚、南洋各地，并在当地建立起贸易据点，落脚扎根。

---

[1]选自《伊戈尔远征记》，魏荒弩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2-3页。——译者注

[2]这是由突厥语族和芬兰乌戈尔语族融合而成的混血民族。他们在史料中常被称为“突厥人”。后来，在匈牙利人迁徙到潘诺尼亚时，其中属于芬兰乌戈尔语族的马扎尔人逐渐同化突厥人，马扎尔语最终成为匈牙利人的共同语。普遍认为，“匈牙利人”（Hungarian）一名源出突厥族名“欧诺古尔”（Onogur）。

[3]Zuckerman（1997）。Dunlop（1954:186-187）认为萨克尔堡或许是为防范罗斯人而建。罗斯人入侵可萨的记录并不见于这么早期的史料中（当然，这不代表当时一定没有发生过），但如果来者正是罗斯人，那么顿河下游堪称筑堡防御的最佳地点，因为他们位于可萨的西北，而且他们中的一部源出维京人，最善行船，行商、出战都常走水路。

[4]Sinor（1959:17）。

[5]Sinor（1959:17）。

[6]参看Sinor（1959:21-22）。他指出，赫利巴尔都斯修士曾在圣加仑修道院（位于博登湖南畔，在今瑞士）的编年史中记道：“匈牙利人占领修道院的那段时间是他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7]Schamiloglu（1984b：216）。

[8]Sinor（1959:27-28）。

[9]Sinor（1959:28-36）。

[10]Noonan（1981/1998:53）。

[11]参看Golden（1982）。关于罗斯国王称“可汗”，参看Dunlop（1954:237）。

[12]Christian（1998:334）。

[13]参看《导论》。

[14]Dunlop（1954:254页起）。

[15]Christian（1998:313-319）。

[16]他们的族源显然是葛逻禄。据雅忽比记载，葛逻禄可汗在8世纪末叶或9世纪初叶皈依伊斯兰教（Beckwith　　　1993:127页注释114）。关于喀喇汗王朝起源的另一种观点，参看Kochnev（1996）。

[17]Bosworth（1968:6-8，12），Christian（1998:370）。

[18]他们属于突厥语族乌古斯语支。921-922年，阿拉伯使臣伊本·法德兰在前往伏尔加保加利亚的途中路过北高加索草原附近，见到有土库曼人在此地驻牧（Bosworth　1968:16）。伊本·法德兰精彩的行记现已有数种英文译本，最晚出者为费耐生本（Frye 2005）。

[19]Dunlop（1954:260）。博斯沃思（Bosworth　1968:18）据一些史料的记载提出，塞尔柱克之父效力的突厥人君主可能是花剌子模当地的乌古斯部统治者叶护，这应当是史料将花剌子模叶护与可萨可汗弄混的结果。塞尔柱克人从可萨之地迁徙到锡尔河下游，而当地恰在一位乌古斯部叶护的治下。大量史料明确记载，塞尔柱克之父效力于可萨可汗，而其三个儿子的名字更是其成长于可萨王宫的确凿证据，一如史料记载的那样（参看：Dunlop 1954:260-261）。

[20]东部王朝先以八剌沙衮为都城，后迁都至喀什；西部王朝则先以乌兹根（在费尔干纳盆地东部）为都城，后迁都至撒马尔罕。

[21]而且，仅有的几位研究这些文献的现代学者也几乎只关心其中的宗教内容。

[22]对其出征和身死之事的记载充满宗教色彩，此事普遍被当成信史。史料确实也记载他在一次出征中被俘。

[23]Hoffmann（1961:112-122）。

[24]“吹”在古藏文中有类似“传统信仰“之意，在那时就已经对应梵文的“法”（dharma）。“吹”在藏语中的本意尚存争议，它或许源自动词“创造”。

[25]关于藏语词汇bon的问题，以及苯、苯波等名目，参看注释79。

[26]在“吹”一系的教派中最大的分立是信仰旧译佛经（伏藏）的一派（旧派，后来形成宁玛派）和信奉新译佛经的其他各宗派之间的区别。

[27]唐朝正式灭亡是在907年。但在黄巢之乱以后不久，唐朝的有效统治仅限京畿地区。

[28]对唐末东部草原和北中国的最新综述，参看Drompp（2005:197页起）。

[29]Somers（1979:760-765）。

[30]Franke and Twitchett（1994:6）。

[31]新都城汉文名作兴州，后改称兴庆府（1033年），后再改称中兴府，而在蒙古语中作亦力海牙（Eriqaya）（de Rachewiltz 2004:552，968；参看Dunnell 1994:178）。上述关于党项人的叙述多参引自Dunnell（1994），参看Dunnell（1996）。

[32]Dillion（1998:294）。

[33]有关青唐羌贸易方面最佳的研究当属斯波义信的论文（Shiba　　1983）。在其大作中还有许多有关当时欧亚大陆东部贸易活动的重要信息。关于青唐羌的政治史，参看Petech（1983）。

[34]关于契丹语的分类，参看注释80。

[35]安禄山曾屡次征讨契丹，但鲜有胜绩。他蓄养8000余名契丹等蕃人健儿为假子，称其为“曳落河”（《资治通鉴》卷二一六：6905页）。关于此名，参看注释25。

[36]Biran（2005:15）。

[37]Twitchett and Tietze（1994:60-62）。Drompp（2005:200-201，202-205）指出，在回鹘汗国之后，黠戛斯并没能建立起一个草原帝国。

[38]关于这一问题以及其他与契丹有关的问题，参看魏特夫与冯家昇的经典著作（Wittfogel and Fêng，1949）。契丹将燕京城（今北京）定为其“五京”之一（南京）。燕京成为辽朝管理其治下农业定居地区的行政中心。从此，燕京城开始崛起为重要的政治中心城市（Franke and Twitchett 1994:16）。约翰尼斯·雷克尔（转引自Di Cosmo 1999:10页注释29）认为契丹人的“五京制”继承自另一个征服王朝渤海国（其地跨东北地区东南部和朝鲜半岛北部），而渤海国则部分地继承了高句丽的遗产。

[39]即使在辽朝灭亡以后，西辽依然维持着这种关系直到蒙古入侵的前夜。

[40]以上关于金朝以及金辽、金宋之战的记述参引自Franke（1994）。

[41]Biran（2005:25-26）。

[42]Biran（2005:36）。

[43]关于此称号的讨论，参看注释83；参看Biran（2005:39页注释146）。

[44]Biran（2005:32-38）。

[45]Biran（2005:39）。

[46]Biran（2005）。

[47]Franke（1994:238）。

[48]对早期神秘主义苏非派（理应与其他类型的早期苏非主义严格区分）最为全面的诠释当属Fakhry（1983:241），但是西方学界长期以来将其中的印度元素比定为印度教的传统颇值得商榷。这主要是因为早期的欧洲学者对除了南传佛教以外的其他佛教派别缺乏了解。到穆罕默德时代，南传佛教已经与其他佛教派别明显不同。学界长期以来一直需要一位兼通伊斯兰学和佛学的学者来研究这一问题。比斯塔米的故乡呼罗珊附近地区在伊斯兰化以前曾流行佛教长达数个世纪之久，而且伊斯兰化的过程相当缓慢。比斯塔米受到印度思想的影响不足为奇。参看注释77。

[49]马哈茂德曾迫害菲尔多西，于是菲尔多西赋诗一首报复，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

[50]Makdisi（1981:131）。

[51]书名也被译作《哲学家的毁灭》或《哲学家的崩溃》。参看Fakhry（1983：尤其是第222页起）的深入讨论。

[52]Bergh（1954）。

[53]参看Makdisi（1981:136-139）。但他却将打压经院论辩的原因归结为当时辩论已经失控，甚至有参与者受伤。伊斯兰世界理性的衰落在蒙古入侵之前就已经发生，更不必说欧洲人到来之时。关于这一话题最近的反历史的观点，参看注释81。

[54]参看第六章。

[55]学院（college）这一概念应与大学（University）相区分。过去，前者是受资助的宗教学术机构，学生和教师的费用都由机构承担。后者则是一种自治组织，为欧洲本土产物。

[56]Makdisi（1981:226，228）指出：“尽管耶路撒冷没有伊斯兰经学院，但是在1180年

以前，其周边地区已有大量经学院存在。”最初的特许状（CUP　I：49）明确记载伦敦人乔休斯是从耶路撒冷回来的，但是他显然需要经过那些“周边地区”才能到达耶路撒冷。在近东伊斯兰世界中，经学院无处不在。乔休斯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很难连一所经学院都没遇到。他一定知道经学院是什么，或许他还在某座经学院中过了一夜。

[57]虽然在十二学者学院简短的特许状中并未提到教师的存在，但在随后的13世纪初叶，巴黎的诸学院的组织架构都是“由一名导师管理一群学生”（Rashdall，摘引自Makdisi 1981:236）。可以推想作为标杆的第一座学院理应也是按照同样的架构组建的。

[58]这基于笔者对牛津的一些古老回廊（cloister）结构的日常观察。此外一定还有更多的具有类似设计的建筑。此观点尚待系统的学术研究来论证或驳斥。

[59]或许Wylie（1964）仍是关于此问题迄今最有洞见的研究。

[60]关于西夏文字系统，参看注释82。

[61]与西夏文、契丹大字不同，女真文在语言上更成体系。女真语也与西夏语、契丹语不同，其后代语言满语在前现代和现代留有大量的资料。因此，女真语是有可能准确复原的。参看Kiyose（1977）。

[62]Gernet（1996:335）。由于汉字数量太多，因此雕版印刷在印刷汉字时更加便宜、高效。直到现代，活字印刷才取代雕版印刷。

[63]Gernet（1996:311）。火药早在唐代就被中国的炼丹术士发明出来。

第八章　成吉思汗与蒙古征服

忽必烈汗在上都曾经

下令造一座堂皇的安乐殿堂：

这地方有圣河亚佛流奔，

穿过深不可测的洞门，

直流入不见阳光的海洋。

——萨缪尔·柯勒律治，《忽必烈汗》

蒙古和平

合不勒汗曾得到女真人的认可，成为东部草原各部的共主。但在他死后，尚在萌芽中的蒙古人的国家即告分崩离析。蒙古各部之间常年混战，直到合不勒汗的曾孙——铁木真的时代。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加尊号“成吉思汗”。他率领蒙古大军在一系列闪击中先后统一了中央欧亚的大部及部分周边地区。其诸子在其身后继续开疆拓土。在蒙古帝国极盛之时，疆域西起东欧，东到中国东部沿海，北至西伯利亚，南临波斯湾。蒙古人征服了整个中央欧亚和周边部分沿海地区，包括欧亚大草原、俄罗斯、波斯、中亚、青藏高原和中原汉地。通过这一征服过程，蒙古人重新统一了中央欧亚，并进一步扩大了它的范围。蒙古帝国是世界历史中第一个陆上超级霸权。

尽管成吉思汗的后人们不久即开始内斗，但他们还是成功地将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整合在同一个贸易圈内。这为蒙古人以及其他参与商贸活动的民族带来了令人咋舌的巨额财富。但在14世纪，黑死病肆虐整个欧亚大陆，摧毁了许多地方，尤其是西欧，而蒙古各汗国之间又冲突不断，虚耗国力。天灾人祸之下，蒙古和平终结。

中亚地区蒙古诸汗国的孱弱给了帖木儿崛起的机会。这位杰出的蒙古裔军事家在14世纪末叶建立起西起中东、东到印度、北起俄罗斯、南到波斯湾的庞大帝国。尽管帝国在帖木儿死后迅速解体，但帝国的核心地区——中亚西部却在帖木儿及其后人治下的帖木儿王朝中迎来了最后一次文化的盛世。

蒙古征服

蒙古帝国的开端要从金灭辽以后东部草原上各部的争斗说起。与契丹人不同，属于通古斯语族的女真人并非草原民族，他们没有直接驻兵控制草原地区。相反，他们支持当时草原上最强的部族——塔塔儿部。东部草原各部当时四分五裂，有强大的塔塔儿部存在，任何一部都很难脱颖而出，统一各部。后来，出自孛儿只斤家族的首领合不勒汗成功地将蒙古各部联合。金人眼见无力除掉合不勒汗，只能接受其作为蒙古各部共主（1146/1147年）的事实，但在名义上仍以属部待之。合不勒汗死后，其从弟俺巴孩即位。俺巴孩汗后为塔塔儿人所擒，解送金朝，并被金人杀害。蒙古人推选合不勒汗的四子忽图剌（Khutula）继任为汗，这引起了俺巴孩汗后人的不满。忽图剌汗曾举兵攻塔塔儿部，鲜有胜绩；他本人的结局也不见于史传。忽图剌汗身后，早期向着统一的蒙古人的国家发展的趋势开始演变成内部的战争，并愈演愈烈。合不勒汗之孙也速该（卒于1175年或1176年）曾试图重新建立由孛儿只斤家族领导的各部联盟，但他被塔塔儿人杀害，其部众、牲畜也为俺巴孩汗的后人迁走，仅留下他的妻儿。自此以后，蒙古各部完全陷入内部纷争之中。

蒙古人在东部草原的兴起适逢在西方与其毗邻的同属蒙古语族的西辽的衰落。西辽在末代古儿汗耶律直鲁古（1177/1178-1211年在位）[1]治下积弱不堪，根本无力阻止花剌子模帝国的扩张，尤其是在面对其最为咄咄逼人的统治者——花剌子模沙赫（苏丹）摩诃末（1200-1220年在位）[2]的时候。摩诃末在1210-1212年吞并了西辽的河中地区，尽管当时花剌子模还是西辽名义上的属国。随着西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急剧衰落，其他属国也纷纷脱离它的控制。

在东部草原，也速该的长子铁木真（1162-1227年）与其母、诸弟在荒野中相依为命，居无定所。[3]后来，铁木真成长为一个有勇有谋的强健青年，其破散的家族部众也慢慢地重新聚集在他的麾下。终于，也有其他部族加入他的阵营，他拥有了强大的盟友。1196年，铁木真同克烈部首领一起与金人结盟。此前，金人已经与塔塔儿人决裂。他们联兵击败了塔塔儿人。作为回报，金人赐克烈部首领“王罕”（Ong Khan）称号，[4]也赐了铁木真一个低一级的称号。1202年，铁木真再度引军攻

打塔塔儿人，一举攻灭其部，将其成年男子尽数斩杀，以报塔塔儿人杀其父及数位先祖的世仇。[5]

铁木真击败了他的最后一个劲敌——札木合。他与铁木真亦敌亦友，曾在1201年加尊号“古儿汗”（世界统治者）。统一东部草原各部之后，铁木真在1206年蒙古各部首领参加的忽里台大会上被推为“成吉思汗”（天下之主）。[6]他和其诸子深信，他将凭借长生天赋予的神力征服四方尚未臣服的民众。

成吉思汗没有立即发兵攻打当时仍然很强大的金朝。金朝的大部分领土在陌生的中原汉地。相反，他在1209年首先发兵攻打在南方和东南方与金毗邻的党项人。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王朝不但控制着从东部草原的西半通往中亚和中原地区的南北走向的商路，也扼守着中原和中亚之间东西走向的商业干道的要冲。尽管蒙古人围攻西夏都城不克，但是西夏国主向成吉思汗纳女求和，愿归顺蒙古，并接受蒙古人从西夏征兵的要求。蒙古随后从西夏撤军。

在成吉思汗崛起的时代，党项人西面的主要强国是西辽帝国。尽管当时西辽在花剌子模的进攻下已经国力大衰，它在其中心地区河中地区东部仍然有雄厚的实力。乃蛮部[7]王子屈出律从铁木真崛起之时就与之为敌，顽抗到底。他西逃到西辽境内，在1208年被西辽纳降。在取得西辽皇帝耶律直鲁古的信任以后，他借机发动兵变，在1211年夺取政权。[8]

此时，塔里木盆地北缘的畏兀儿国[9]同哈剌鲁部一起主动归顺成吉思汗。畏兀儿和哈剌鲁均曾是西辽的附庸，[10]在西辽内外交困之际，转而投靠蒙古寻求庇护。蒙古由此获得进取中亚东部的通路，并间接地控制了其中部分地区。

同年，成吉思汗终于发兵攻金。但是，他这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尽管蒙古大军可以在战场上轻松击败金兵，但当他们面对中原城市的坚壁高垒时，却一筹莫展。然而，蒙古人很快就在中原地区找到了帮手——自辽朝以来世居于中原的契丹人。[11]在军中的契丹人、汉人和畏兀儿人的帮助下，蒙古人掌握了运用攻城机攻城的技术。当成吉思汗得悉金朝迁都汴京（开封）之后，他下令攻打在先前的进军中就已经逼近的金中都（北京）。1215年5月31日，金中都失陷。[12]

在12世纪和13世纪初，花剌子模历代君主先后征服中亚、伊朗高原直至伊拉克的广袤土地，建立起庞大的帝国。花剌子模在其新征服的领土上均有大军镇守。到1215年，当时在位的花剌子模沙赫摩诃末已经掌握伊朗和几乎整个中亚的西部和南部。只是中亚西部尚有一部分土地在其名义上的领主西辽手中。在扩张的过程中，他将都城从花剌子模迁往更加中心的城市撒马尔罕。他的大军兵强马壮，久经沙场。当时，他已经是伊斯兰世界中最强大的君主，而且他的帝国仍然在不断扩张。其主要目标是在政治上复兴巴格达哈里发国。巴格达哈里发国的统治者是早期阿拔斯王朝的直接继承者，因此他可以授予伊斯兰世界统治者统治的合法性。当然，摩诃末同时也觊觎着日渐衰落的西辽。1215年，在得悉东部草原新近被蒙古人统一的消息之后，他向蒙古派出了使团。

1216年，成吉思汗派大将哲别西征，追杀屈出律。哲别击败前来迎击的西辽军队，攻克数座城池。屈出律先前皈依了佛教，迫害穆斯林，因此当地以穆斯林为主体的民众深恨之。听闻哲别要采取与屈出律相反的宗教政策，当地穆斯林欢欣鼓舞，一齐倒向哲别一方。屈出律被迫逃亡。[13]哲别的大军追赶屈出律至巴达赫尚（在今阿富汗东北），于1218年斩杀屈出律。[14]蒙古人自此在中亚西部站稳了脚跟。

同年，成吉思汗遣使花剌子模。使团到达后数日，双方即修约交好。其后不久，蒙古派出的一队由约450名穆斯林商人组成的庞大商团抵达讹答剌城。但花剌子模的总督扣押了商团。他声称这些商人是蒙古的细作，没收了商队的财物，并下令将商人尽数处决。其中一个商人侥幸脱逃，回到蒙古。成吉思汗于是再遣使往花剌子模交涉，为被害的商人索要赔偿金，并要求惩办那位涉事的总督。花剌子模沙赫既没有答应成吉思汗的要求，也没有回派使节继续沟通，而是羞辱了蒙古人并杀害来使。

于是，成吉思汗暂时放下灭金大业，剑指花剌子模。1219年，蒙古大军兵分三路杀进花剌子模。花剌子模沙赫的军队都分散驻守在他新征服的领土上。他没有调集部队迎击蒙古大军，仍令各军在其驻防的城市就地坚守。这样，蒙古大军轻而易举地将这些城市各个击破。到1223年，蒙古大军彻底击溃了数目庞大、能征惯战的花剌子模军队，占领了中亚西部和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尽管蒙古人一路追杀花剌子模沙赫未果，[15]但他们还是征服了整个花剌子模帝国。他们保留那些归顺蒙古的当地统治者，并留下蒙古税监收税。有些城市后来起事，杀死蒙古税

监。蒙古大军再度攻城，并按照他们传统的战争惯例血腥屠城。[16]

1223年，成吉思汗班师回蒙古。此时，他打算向党项人兴师问罪。党项人归附蒙古时承诺接受蒙古的征兵，但是在1218年成吉思汗征兵攻打花剌子模时，他们却没有出兵助力。后来在1222年蒙古用兵金朝时，党项人又临阵撤军。[17]成吉思汗遣使要求他们遵守承诺，又遭蛮横拒绝。尽管成吉思汗在出征西夏的过程中去世，但蒙古大军还是在1227年攻灭西夏。西夏的领土被完全并入蒙古帝国版图，成为最为重要的封地之一。这块封地为蒙古统治者所重视，是因为之前的西夏王朝在这里创造了堪可比肩中原汉地的先进文化。这种文化有很多借鉴汉文化的地方，但绝不同于汉文化（也不同于女真人的金文化）。尽管蒙古人不得不依靠汉人来帮助他们治理中原汉地，但他们大体上还是猜忌、厌恶汉人，而更加亲近同是来自中央欧亚地区的其他民族，在涉及宗教和政治的重大问题上更是如此。

成吉思汗有四子，其中三个死在他身后。三子窝阔台（1229-1241年在位）继承了他的大汗之位。蒙古人继续伐金，于1234年攻灭金朝。与此同时，窝阔台又发动大军西征。之前，在征讨花剌子模的西征中，蒙古大军曾经经过南俄[18]。而这次西征，蒙古人打算彻底征服这片土地，将其作为术赤之子拔都的封地。术赤是成吉思汗长子，已于1227年死于成吉思汗之前。[19]此次与拔都同时出征的主将还有窝阔台之子贵由、拖雷之子蒙哥，以及蒙古第一名将速不台。蒙古大军先于1236年扫平伏尔加-卡马河流域的芬兰-乌戈尔语族和突厥语族诸部，后又击败位于其西北的罗斯人，于1238年拔得弗拉基米尔（在今莫斯科东），于1240年拔得基辅。1241年，蒙古大军征服南俄全境。速不台继续引兵向西，剑指波兰和德意志东部。他在利格尼茨大败由西里西亚的亨利大公所率的波兰、日耳曼联军之后，又挥师南下，先后破匈牙利、奥地利。其后，他回师匈牙利越冬。[20]但是，蒙古大汗窝阔台于是年12月驾崩，蒙古大军闻讯后立即撤军。

拔都率本部兵马留在了西方。他在伏尔加河下游的萨莱建都，以此为中心控制着自黑海草原、北高加索起，北到莫斯科大公国，东面覆盖伏尔加-卡马河流域的整个西部中央欧亚地区。其所率领的军队大部分驻扎在喀山，离保加尔人的旧城不远。因为在这批蒙古大军中有很多钦察人，所以钦察突厥语很快成为他们通用的语言。这群人后来被称为鞑靼人。拔都的封地后来被称为“金帐汗国”。虽然他的封地很快就享有事实

上的独立，但拔都仍然维护着其祖成吉思汗创下的蒙古世界帝国的大一统，全面参与帝国的治理和军事行动。[21]

在窝阔台之子贵由（1246-1248年在位）的短暂统治之后，蒙古帝国发生了汗位之争。最后，拖雷之子蒙哥（1251-1259年在位）胜出，继立为大汗。[22]他也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西征，使蒙古人牢固地掌握了中亚和中东，并将蒙古帝国的边界推向西方日落之地。蒙哥之弟旭烈兀统帅帝国大军于1253年出征。1256年，他们攻破木剌夷国。木剌夷国实际是伊斯兰教伊斯玛仪派的一个教团，他们盘踞在伊朗北部厄尔布鲁士山区，常年组织暗杀活动，使整个伊斯兰世界都闻之色变。到1257年，蒙古大军已经攻下其要塞阿剌模忒堡，其教主也被蒙哥汗亲自下令处决。大军随后向伊拉克挺近，于1258年攻报达（巴格达）。尽管蒙古人威逼利诱，哈里发仍然坚决抵抗。蒙古大军重兵围城，最终破城。蒙古军大肆劫掠，城中约20万军民遭屠戮，哈里发本人也被杀害。[23]

蒙古大军继续西进，攻入马穆鲁克叙利亚，势不可当。这时，蒙哥汗的死讯传来，旭烈兀引大部主力回师。马穆鲁克王朝进攻蒙古军余部，于1260年9月6日在加利利大败蒙古军，史称“艾因札鲁特战役”。[24]这也是蒙古大军在西亚吃到的第一场败仗。

然而，旭烈兀旋即卷土重来，成功地占领了近东地区的大部分土地。蒙古人最后将牙帐设在伊朗西北靠近大不里士的地方，那里有丰饶的草场。旭烈兀创立了伊利汗国，地跨伊拉克、伊朗及一些邻近地区。伊利汗国不时与北方的金帐汗国和中亚的察合台汗国（成吉思汗次子察合台后人的封地）爆发冲突，其势力范围最远可达今西藏。

忽必烈汗、西藏和元朝

拖雷的封地包括原西夏国的领土。窝阔台汗在位时，其次子阔端（卒于1253年或1260年）获封此地。阔端在和平收服西藏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1240年，阔端派道尔达达尔罕（多达那波）率小股部队进藏。西藏各寺皆奋起抵抗。有两寺被蒙古军攻下并毁掉，据说有一些喇嘛被杀。[25]蒙古人后来得知应当先与西藏的宗教领袖萨迦班智达接触，于是撤军。1244年，阔端致信萨迦班智达，诏其往蒙古大营。在先派出自己的两个侄子八思巴（罗卓坚赞，1235-1280年）[26]和恰那多吉（卒于1267年）之后，年事已高的萨迦班智达于1246年抵达凉州。1247年，西藏归顺蒙古。蒙古朝廷任命萨迦班智达总领西藏僧俗事务，将阔端之女嫁于恰那多吉。1251年，萨迦班智达圆寂。随后，蒙古派阔里台（Khoridai）领兵再次进军西藏，在1252-1253年恢复了对卫藏的控制。[27]此时，阔端已经病逝。他生前体弱多病，曾受萨迦班智达的治疗，也因此不得不将储位让与其兄贵由。[28]

忽必烈（1215年9月23日生，1260/1272-1294年2月18日在位）是拖雷的诸子之一。其正室察必是一个狂热的佛教徒。1240年，他们的长子诞生，他们为其取了一个藏传佛教徒的名字朵儿只（源自藏文rdorje，意为“金刚”）。至迟在1242年，忽必烈就已经在其河北邢州的封地内召集汉地和藏地的佛教高僧。[29]随着1251年其兄蒙哥继立为大汗，忽必烈成为汗位的直接继承人。蒙哥汗又将中原地区的几个地方赐给忽必烈作封地，这极大地增强了忽必烈的实力，也使他真正成为这片富庶、人口稠密的地区的蒙古统治者。1253年，忽必烈传令召见八思巴兄弟。他们受到了这位蒙古王爷的热情款待。不久，忽必烈奉命领兵出征大理国（在今云南省境内），这也是从侧翼进攻强大的宋朝的第一步。宋朝当时对蒙古威胁很大，曾多次出兵北上进攻蒙古。

在厉兵秣马一年以后，忽必烈的大军以速不台之子兀良合台为主帅，于1253年底开拔前线。在发动进攻前夕，忽必烈曾遣使向大理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投降，并保证其投降以后的安全。但大理斩杀了蒙古使者。蒙古大军发起进攻，势如破竹，最后将大理残军围困在其都城中。蒙古大军昭示投降者免死，于是大理军民举城投降。忽必烈以最小的代价攻占大理。大将兀良合台继续率蒙古军在西南地区征讨，捷报频

传。到1257年，蒙古大军已经向东南挺近至安南地区（今越南北部，《元史》作交趾），在此地，蒙古军士饱受湿热和蚊虫的困扰。交趾国主愿向蒙古称臣纳贡，兀良合台于是退兵。

忽必烈在平定大理之后即回到自己的封地。1256年，他着手兴建夏都开平府（后于1263年改称上都）。其地在中都（北京）以北约十日程，宜耕宜牧。[30]1258年，蒙哥汗发四路大军攻宋，任命忽必烈为其中一路的主帅。在此之前，忽必烈曾觐见蒙哥，化解了一场针对他的弹劾。1258年，蒙古大举攻宋，蒙哥亲率大军攻四川，忽必烈则在东部率军从其封地南下。

1259年8月11日，蒙哥汗在高烧中病逝于重庆郊外，[31]蒙古伐宋暂告一段落。蒙哥的幼弟阿里不哥时在蒙古本部哈剌和林留守，他闻讯后即召集兵马着手夺位。正在叙利亚西征的旭烈兀火速回师蒙古，欲在忽里台大会上支持忽必烈。而阿里不哥方面也有大批追随者，他率先发兵进攻忽必烈的封地。后来忽必烈回到其都城开平府，立即于1260年5月召开忽里台大会，他本人于会上当选为大汗。阿里不哥拒不承认这一结果，他背后有强大势力的支持，包括拔都的继任者别儿哥和中亚察合台汗国的阿鲁忽。1260年6月，阿里不哥一派举阿里不哥为大汗，蒙古汗国内战爆发。尽管阿里不哥从者甚众，但忽必烈始终棋高一着，占据先机。1262年，阿鲁忽与阿里不哥决裂。次年，阿里不哥向忽必烈投降。[32]内战自此结束。1266年，忽必烈在金中都故城东北不远处（今北京城址）着手兴建一座新的冬都——“大都”[33]，借此将蒙古汗国的权力中心进一步向中原地区移动，并巩固其在中原地区的统治。

忽必烈花费数年时间处理汗国内部事务，解决了后顾之忧，于是重新着手解决对宋的问题。他先向宋朝遣使（1260年5月）谋求和解。但是，南宋宰相扣押了来使，并出兵进攻蒙古（1260年8月）。1261年初，忽必烈出兵报复。之后，宋军在1262年又发动了3次进攻。宋人也拒不释放忽必烈的使臣。终于，蒙古发兵大举攻宋，先是在1265年初于四川大破宋军，接着在1268年全面进攻南宋。蒙古灭宋的过程殊为不易，直至1276年才获得胜利。是年，南宋太皇太后出降蒙古，献出传国玉玺和龙袍。1279年，南宋最后的抵抗势力被消灭。

新兴的中原王朝元朝于1272年1月18日农历中国新年这天正式开始。[34]除了王朝建立以来所遵循的一系列礼法程序和大部分的行政结构以外，这个新建立的政府是蒙古式的。不同于在他们之前入主中原的

女真人，蒙古人一般不信任汉人。忽必烈本人确实有许多重要的汉人谋臣，但他之后的皇帝们却只将蒙古人、中亚的穆斯林、吐蕃人、党项人或其他的非汉族人士置于行政要职。蒙古汗国继续存在，汗国重要的组成部分蒙古和西藏并不被视为汉地。尽管元朝的中原地区在很多方面都已经融入蒙古帝国之中，但蒙古汗国仍然是更大一级的单位。元朝和蒙古汗国还不能完全等同。

在这一时期还发生了堪称蒙古人历史上最重要的大事之一。早期的蒙古人即已受到了多种世界宗教的影响，而且蒙古人中的一些部族至少在理论上已经皈依了某一种宗教。例如，乃蛮部和克烈部至少从表面上看已经皈依了聂斯脱利派基督教（景教）；忽必烈那一代的蒙古人正在回鹘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的影响下成为佛教徒。但是，蒙古人在整体上还保持着其原始宗教的信仰，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一切系统宗教持怀疑态度。早期欧洲旅行家的行记记载了蒙古人在各种事件上如何依赖他们的萨满。但是，到了马可·波罗的时代，汗国的蒙古人已经非正式但热情十足地信仰了佛教，主要是藏传佛教。[35]藏传佛教的法王思想为忽必烈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藏传佛教也为蒙古人提供了一个汉文化以外的同样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体系。

忽必烈决定为蒙古帝国内的各种语言创制统一的蒙古文字。他将这个任务交给了西藏的政教领袖，同时也是忽必烈的国师的八思巴。[36]新字以藏文字母为基础（但像汉文和回鹘式蒙文一样竖写），于1269年昭告天下成为官方文字。这种文字今天被称为八思巴文，它堪称世界上第一个多语转写系统。在现存的八思巴文材料中可见当时在蒙古帝国内外使用的数种语言，包括汉语[37]，而且有人认为八思巴文还影响了后来朝鲜语谚文文字系统的创制。八思巴本人还负责其他的文化工程，包括编纂汉文大藏经和藏文大藏经的对勘目录以及从梵文翻译佛经。

黑死病

1331年，中原地区瘟疫横行，十室九空。[38]这标志着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瘟疫——黑死病的首次大流行的开端。在波斯，最后一位伊利汗不赛因汗感染瘟疫。他于1335年去世，显然是因疫病不治。[39]1338-1339年，中亚伊塞克湖附近的一个景教商人聚落被腺鼠疫摧毁。[40]1346年，一支蒙古军队正在围攻黑海岸边的克里米亚港口城市卡法。瘟疫先在蒙古军队中爆发，再被传播到卡法城中，后来又随着从卡法驶向地中海的船只如野火燎原一般传入欧洲。至少三分之一的欧洲人被这种前所未见的疾病夺走生命。后来人们才知道，这场瘟疫是腺鼠疫。[41]

现在普遍认为瘟疫爆发的原因是蒙古人的远征。这种意见认为疫情来源于东北平原和戈壁沙漠，正是蒙古人无意中从这里携带病菌一路往西、往南传播。但是，蒙古帝国扩张的末期和中原地区出现疫情之间有接近一个世纪的巨大时间差，这清楚地说明蒙古人的远征本身和瘟疫的传播没有直接的关系。[42]当然，蒙古和平时期的中央欧亚联系着东亚、西亚以及南亚等地区，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地区相互之间的直接交流，这也为携带有病原体的老鼠和跳蚤向欧亚大陆各个角落甚至更远的地方传播提供了便利的通路。黑死病不论对于蒙古人的政权，还是对于当时的其他政权，都是灾难性的。

蒙古的政治遗产

14世纪，史无前例的瘟疫、饥馑、洪涝和其他灾害令人类饱受折磨。世界上许多地区深受其苦，以致民变和王朝覆灭在各地频发。尽管都曾尽力应对这些天灾，但伊朗的伊利汗国和中国的元朝这两个蒙古人的王朝还是双双覆灭，可叹时运不济，天不假年。

在中国，反抗蒙古人的起义爆发，蒙古人被斥为邪恶的异族统治者。1368年，元大都被朱元璋的军队攻克，朱元璋建立了明朝（1368-1644年）。元顺帝妥懽帖睦尔（1333-1370年在位）是最后一位大汗兼元朝皇帝，他带着大部分朝臣骑马逃向蒙古。他在那里继续统治着已经收缩至东部草原一隅的大汗国，直到1370年去世。[43]

在中部草原和西部草原，金帐汗国的国祚则多延续了2个世纪。与此相反，随着最后一位伊利汗不赛因汗于1335年去世，伊利汗国在部族和派系的内斗中四分五裂。

在中亚，察合台汗国很早就分化成为几个敌对的部分，相互间常年攻伐不断。在答儿麻失里汗（1331-1334年在位）死后，察合台汗国分裂为东西两汗国。西部汗国以河中地区为中心，并保有察合台汗国之名；东部汗国则拥有更多的游牧人口，后来以蒙兀儿斯坦闻名。西察合台汗国大约在这一时期也夺取了阿姆河以南的一些重要城市，包括巴尔赫和赫拉特。

黄金家族的身份是在中亚地区建立合法统治的要素。但察合台系王室没能在这里建立起稳固的统治，这导致了黄金家族后裔在这里统治的终结。哈剌兀纳人的异密加兹罕（1346/1347-1357/1358年在位）在1346/1347年杀死最后一位察合台汗合赞算端。尽管加兹罕和他的继承者们继续挟察合台王室之名进行统治，并拥立傀儡来维持统治的合法性，但是他们已是事实上的统治者。

帖木儿与帖木儿王朝

帖木儿（跛子帖木儿）于14世纪20年代或30年代生于渴石（今沙赫利苏伯兹）。渴石坐落在中亚西部，位于名城撒马尔罕附近，是定居的农业地区。[44]帖木儿生于一个巴勒剌思（Barlas）家庭，巴勒剌思人源出蒙古巴鲁剌思部。但是，同其他定居在中亚的蒙古人一样，帖木儿和其他巴勒剌思人都说中亚的突厥语和波斯语，而不说蒙古语。他也不再过游牧的生活，也从未想要去征服草原地区。和当时当地的其他君主、将士一样，他也习惯于生活在城郭之中。[45]

到加兹罕异密遇刺的1357/1358年，帖木儿已经拥有自己的私兵[46]，或许还有另一小股私人武装。[47]1360年初，蒙兀儿斯坦（即东察合台汗国）的蒙兀儿人（即蒙古人）入侵（西）察合台汗国，帖木儿归降蒙兀儿人，并获封为巴勒剌思人之主，领有渴石之地。两年以后，蒙兀儿汗落实了对帖木儿的封赐。这时，他已经重新统一原察合台汗国的领土，并派其子也里牙思火者出镇河中地区。但是帖木儿和其他当地的首领均不满蒙兀儿人的暴虐，纷纷撤离。

加兹罕异密之孙忽辛异密手下兵马更盛于帖木儿，于是帖木儿与忽辛结盟。1364年，二人联手击破蒙兀儿人。后来虽遇挫折，但他们最终将蒙兀儿人的势力逐出中亚西察合台汗国疆域。后来，帖木儿纵横捭阖，收服西察合台汗国域内大小头目，并击败忽辛。到1370年4月9日，帖木儿已经独霸西察合台汗国领土。在其后的十余年间，他全力巩固自己在西察合台汗国的统治。

时人记载帖木儿为英明、宽宏之主，在战场上身先士卒，对乱臣贼子毫不手软。他对那些没有利用价值的人同样心狠手辣。帖木儿堪称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家之一，曾屡次击败数倍于己之敌。在巩固了其在中亚西部和南部的霸业[48]之后，帖木儿从河中本土出师远征。1384/1385年，他挥师攻取伊朗北部和马赞德兰，远征开始。

1385/1386年，金帐汗脱脱迷失派兵突袭帖木儿在阿塞拜疆的重镇大不里士。帖木儿当年曾力助脱脱迷失夺得金帐汗之位。1368年，帖木儿进军伊朗和高加索地区。他在伊朗中部、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确立霸

权，当地首领皆闻风来降。

1387年，脱脱迷失再度兴兵进攻高加索地区，帖木儿派一支军队半路截击，大败之。后来，脱脱迷失又趁帖木儿南征伊朗之际，入寇河中地区，一路南下至阿姆河一线。帖木儿浑然不知腹地受敌，继续带兵远征。他率军先在凡湖附近征讨土库曼黑羊王朝，又过库尔德斯坦直扑法尔斯，收服伊斯法罕和设拉子。后伊斯法罕复叛，帖木儿再度攻城得手，下令尽屠城中百姓。此后，他方知脱脱迷失入寇河中地区之事。

帖木儿立即做出反应。他回师北上，击破当时已属脱脱迷失的花剌子模，并彻底征服该地。1388/1389年，他击退脱脱迷失的进攻。然后在1390年深秋，他决定起兵远征脱脱迷失。1391年6月，两军狭路相逢。帖木儿大破脱脱迷失，攻下金帐汗国都城并洗劫一空，然后继续沿伏尔加河而上追击脱脱迷失。

1392年秋，帖木儿再度远征伊朗。他与诸子在1392年和1393年两度征服伊朗，并在1393年夏天攻下巴格达。他还想收服在伊朗西部和安纳托利亚的土库曼人。

1394年底，他获悉脱脱迷失又入寇高加索地区。于是，他再度起兵远征金帐汗国，大败脱脱迷失，大军深入直抵莫斯科。后来在回师途中，他领兵一路劫掠金帐汗国诸城，当地百姓不胜其扰。金帐汗国百姓当时已经背弃脱脱迷失。金帐汗国自此元气大伤，再未给帖木儿造成任何威胁。

1398年，帖木儿入侵西北印度，于12月攻克德里并洗劫该城。在德里，帖木儿的军士不受约束，烧杀抢夺，造成严重破坏，杀害数千居民。1399年，帖木儿班师回朝。同年秋，他挥师伊朗西部平叛，重夺格鲁吉亚，并重夺巴格达。

同年，他还远征叙利亚马穆鲁克王朝。马穆鲁克王朝曾杀害帖木儿的使臣，窝藏帖木儿王朝的叛臣并拒不移交。[49]1400/1401年间，帖木儿连下阿勒颇、霍姆斯和大马士革数城，但他并未派人在叙利亚留守。1402年7月20日，帖木儿率军在安格拉（即古之Ancyra，今之安卡拉）之战中横扫人数多于己方的奥斯曼大军，生擒奥斯曼帝国苏丹巴耶塞特。[50]帖木儿引军纵横奥斯曼帝国境内，在各主要城市搜刮贡赋，然后撤军。同在叙利亚一样，他也没有派人在安纳托利亚留守。[51]

1404年，帖木儿回到撒马尔罕，接见了各国来使，其中包括卡斯提尔和莱昂王国的国王亨利三世（恩里克三世）的使者罗·哥泽来滋·克拉维约。随后，他着手筹备最重大的一次远征——东征中原。他调集了大批兵马，在1404年深秋开拔东进。大军行进到讹答剌，在此扎营越冬，但此时帖木儿已经身染重病。他于1405年2月17日或18日病故于讹答剌。[52]他的灵柩被运回撒马尔罕，以乌木棺下葬在其华丽的陵墓中。帖木儿墓今天被称为古莱埃米尔，意为“王陵”。

整体而言，帖木儿的征战方式与欧洲、波斯和中原王朝的各朝开国之主一样，没有特殊之处。他既没有使用骑兵长途奔袭闪击对手，也没有发动大规模的海战。在他的军队中确有骑兵，而且屡立战功，但是军队的主力仍是步兵。他的战略目标全是城市，而他本人最善围城攻城。

他接受对手的求降，尤其厚待主动来降者。只要降者保证贡赋不断、忠心不贰，他几乎都会留他们在其位、守其国。[53]他通常在（新征服的地区）最大的城市驻军留守，利用监官税吏从当地征收赋税，并从当地征兵投入后续的征战中。[54]

帖木儿时代标志着中亚农业定居地区在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成为欧亚大陆文化和政治的双重中心。帖木儿一生致力于恢复昔日蒙古帝国的版图，颇有成就。但是，他没能建立起稳定的帝国行政制度，他的诸子[55]也对他的立储安排不满，这些因素为其身后帝国的解体埋下了伏笔。

帖木儿的后人们均对所获封地不满，因此相互攻伐混战，持续将近15年。直到各方相继身死，仅剩他的幼子沙哈鲁（1377/1405-1447年）在世。此时，帝国的版图几乎仅剩河中地区一隅，其他地方大都分崩离析。但帖木儿和帖木儿王朝大力发展艺术，这一时期创造了大量的艺术财富，得以长久留传。

中亚与丝绸之路的巅峰时代

蒙古人建立了（至少是支持了）历史上第一个大范围的国际贸易和税收体系——“斡脱”[56]。斡脱本质上是一个商会或卡特尔，主要由穆斯林商人经营。他们向商队或其他行业放贷，并包揽为统治者征税的业务。因为能够从政府收入中分得红利，他们的利润高得惊人。[57]政府对斡脱的政策取决于当朝大汗的态度，多有变动。比如在窝阔台朝，政府积极参与斡脱的商业活动，对其过度放任，而在蒙哥朝则对其严格管控。[58]蒙古帝国对商业的开明态度，及其对商人和工匠前所未有的保护政策，吸引着各色商人从欧亚大陆的各处来投。以马可·波罗家族为代表的意大利商人往来蒙古帝国内外行商，赚得不菲利润。[59]东方世界高度发达的精神和物质文化也让他们大开眼界。马可·波罗（1254-1324年）于1271年动身前往蒙古汗国，在那里逗留20年，直到1295年才回到故乡威尼斯。他最后将自己的经历口述给小说家比萨人鲁斯蒂谦，由鲁斯蒂谦著书出版。[60]鲁斯蒂谦对马可·波罗旅程[61]的精彩演绎使当时的欧洲人对东方无限神往，并最终引发了欧洲航海家对直达东方的航路的探索。

蒙古人信仰原始宗教，因此，他们接触到的每种系统宗教都试图向他们传教。各派教团被发往蒙古传教。尽管蒙古人对各种教派都兴趣不大（除了后来的藏传佛教），但他们仍然乐此不疲。在传教布道的过程中，教士们将亲眼所见的蒙古人和其他民族的状况记录下来，留下一手资料[62]留传于世，堪称传教活动最大的成果。

蒙古人的扩张是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普遍的观点认为这是一件基础性的大事件，它改变了欧亚大陆的面貌，是欧亚大陆历史的分水岭。[63]然而，这种观点与史实不符。最明显的是，后蒙古帝国时代欧亚大陆各主要语族的分布范围与蒙古帝国时代之前保持一致，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基本没有大的变化。蒙古人扩张的一个公认的结果是中国文化和技术中的一些实用元素被传到了西欧，其中最重要者当属火药和火器。[64]另一个结果则是西欧人对《马可·波罗行纪》中所描绘的神奇东方的无限神往。

历朝伊利汗均大力扶持艺术与科学。他们修建的无数华美的清真寺

和其他各色建筑，大都早已灰飞烟灭。他们最伟大的成就当属开创“波斯”细密画艺术。蒙古人曾带来大批汉族士人协助治理伊利汗国。汉人以毛笔书写，亦以毛笔作画，他们为蒙古人作画，也互相赠送画作。当地穆斯林从汉人处习得中国画的要领，在临摹中国画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混合画法。这种画法将中国画的技法与拜占庭艺术、阿拉伯书法以及传统近东画法等诸多元素结合，最终发展成为世界艺术殿堂中的瑰宝——伊斯兰细密画。另一方面，元朝也从伊斯兰世界引进了占星师、物理学家、医疗知识等等，不一而足。[65]

帖木儿建都于撒马尔罕。他重修当年被蒙古大军损毁的城墙，并在城中新建各色宫殿、花园和宗教建筑，使城市面貌一新。帖木儿一面将四处征战所得的战利品统统运回撒马尔罕来装点他的都城，一面以厚礼招引当时天下第一流的艺术家和建筑师齐聚于此。在他的苦心经营之下，撒马尔罕成为当时世上首屈一指的名城，其华美一时无二。许多帖木儿风格建筑的标志性特征都体现在他生前所建的建筑中，其中最负盛名的便是他在撒马尔罕的陵墓。中亚的帖木儿风格建筑是后来的波斯-莫卧儿风格的前身。帖木儿和他的子孙不但坐拥当世最为华美的建筑和城市景观，还拥有最伟大的波斯诗人哈菲兹（约1320-1389/1390年）。他曾受帖木儿召见，并受到礼遇。

---

[1]Biran（2005:58）。

[2]他的统治到1220年12月或1221年1月结束（Boyle 1968:310）。

[3]参看《导论》一章中关于蒙古以及其他中央欧亚民族起源的所谓的“历史”记载。当然，铁木真之父及其多位先祖为塔塔儿人和金人所杀之事应当是史实。金人是塔塔儿人背后的主使，他们将塔塔儿解送来的对手残忍杀害（Atwood 2004:529）。

[4]Ong是蒙古语音写汉文“王”。12世纪90年代早期，王罕先逃亡至西辽，但当时西辽已无力助他。后来他返回蒙古高原，与铁木真结盟。据《蒙古秘史》记载，王罕也曾有古儿汗之名号（Biran 2005:64-65）。

[5]尽管他和世上其他的开国之君一样（不仅限于草原地区），会将势不两立的死敌赶尽杀绝，但是他通常会接受其他敌人的求降，并将他们收纳为自己的属下，将他们中的勇士征入自己的部队。

[6]Allsen（1994:331-343）。称汗的时机和名号的选择都不是随意而为。此事发生在剿灭塔塔儿部的战役全面胜利以后，恰好在铁木真斩杀其最强劲的敌手札木合之时。札木合的尊号“古儿汗”（世界统治者）被术外尼和术兹扎尼解释为“汗中之汗”（Bosworth 2007）；西辽皇帝同样也加尊号“古儿汗”。关于铁木真的新尊号“成吉思汗”，参看注释83。

[7]乃蛮人很可能是突厥人，而非蒙古人。但其族名“乃蛮”（Naiman）为蒙古语的“八”，应指“八族”或“八姓”，参看Atwood（2004:397）。

[8]Biran（2005:75-78）。

[9]1283年前后，畏兀儿王室迫于察合台汗国的压力，东迁至元朝治下的甘肃（Allsen

1997:41）。——作者注　畏兀儿国（西州回鹘）早在1209年已经归顺成吉思汗，1211年是畏兀儿亦都护觐见成吉思汗的年份。——译者注

[10]Allsen（1994:350）。

[11]契丹人深谙汉人的行政制度，并以此助蒙古人管理在中原地区新征服的领土，以及迅速扩张的整个蒙古帝国。最著名者当属耶律楚材（1189-1243）。他出身契丹皇室，先后辅佐成吉思汗和其子窝阔台（Biran 2005:6）。

[12]Franke（1994:254）。

[13]Boyle（1968:305）。屈出律（Küčlüg或Güčülüg）一名是突厥语，意为“有力的”，是乃蛮部王室成员的名字或称号（de Rachewiltz 2004:699）。哲别战胜屈出律的故事似乎有演绎的成分，事实应当没有这么简单。

[14]Biran（2005:74页起）。西辽人在河中地区负隅顽抗一阵之后，大都归降了蒙古人（Biran 2005:87）。

[15]摩诃末后于1231年为库尔德武装所杀（Allsen 1994:357，370）。

[16]关于从上古到中世纪，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叛变的城市的一般命运，参看《尾声》。

[17]Allsen（1994:359）。

[18]Southern Russia，指俄罗斯欧洲部分极南之地，在高加索北、两海之间。——译者注

[19]术赤的生父并非成吉思汗。这或许是其与诸弟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

[20]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Béla　IV，1235-1270年在位）出逃。蒙古人撤离以后，贝拉四世返国，继续统治匈牙利直到寿终。

[21]Allsen（1994）。

[22]本章所记蒙古人的事迹多依据Allsen（1994）；另参看其对蒙哥汗时代的精彩记叙（1987）。

[23]Allsen（1994:404）。关于哈里发之死有数条记载，均十分有趣。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马可·波罗的记载：蒙古人将哈里发锁在他的宝库之中，告诉他可以以自己的财宝为食。当然，最可信的一条记载还是他们按照蒙古人的惯例将哈里发包在毯子中捂死，因为蒙古人忌讳将统治者的血洒到土地上。

[24]Rossabi（1988:54-55）。

[25]Atwood（2004:320）。参看Petech（1983:181），他称在加拉康（Rgyal Lhakhang）的噶当寺有“500名喇嘛被杀害”。然而，“500”这个数目常在藏传佛教故事中出现，相关故事多为虚构。这里显然也不是真实的数字。因此，整个事件都值得怀疑。

[26]他更为人知的藏语称号是八思巴喇嘛（‘Phagspa blama），意为“圣者喇嘛”。

[27]Atwood（2004:539）。

[28]Atwood（2004:321，539）。

[29]Rossabi（1988:14-17）。

[30]其址在今内蒙古多伦淖尔以西58千米处（Rossabi 1994:418-419）。

[31]Atwood（2004:364）。

[32]数年后，阿里不哥在囚禁中死去（Rossabi 1994:424）。

[33]在突厥语中被称为Khanbalik（汗八里，意为“王都”），马可·波罗记作Cambaluc，源出于此。忽必烈将其夏都定在位于长城以北的上都，即柯勒律治的名篇中的Xanadu。

[34]元朝《建国诰诏》的完整英译，参看Mote（1994:616），Langlois（1981:3-4）。

[35]参看Beckwith（1987b）。

[36]八思巴后来又被封为“帝师”，为整个帝国内的佛教领袖。他曾学习蒙古语和蒙古习俗，并在阔端的封地学到西夏佛学思想。因此，他并不像藏人所期待那样是一个纯粹的西藏人。

[37]参看Coblin（2006）的八思巴文汉语字典。

[38]Atwood（2004:41，610）称疫情始于河南，随后扩散至沿海各省（1345-1346年）。“最后，在1351年，疫情在汉地全面爆发。之后每年都有全国范围的疫情爆发，直到1362年，直接导致人口锐减。”（Atwood 2004:41）参看McNeill（1977:143，263）。

[39]Boyle（1968:412）。

[40]根据现代考古学和流行病学的研究（McNeill 1977:145-146）。

[41]McNeill（1977:147页起）。

[42]McNeill（1977）。

[43]Atwood（2004:609）。

[44]Manz（1989:13）指出：“在帖木儿时代的欧亚政治中，察合台兀鲁思处于一个并不强大却是中心的位置。定居民和游牧民均在此地有着很深厚的传统，而与此地毗邻的既有草原游牧势力，也有定居的农业国家。在欧亚大陆几乎没有哪个重要地区没有跟察合台兀鲁思发生某种联系；其东面连接东察合台汗国以及丝绸之路上的各城镇，北面毗邻术赤系的诸汗国，而南面正对伊朗诸国。”

[45]有观点认为帖木儿以及他崛起时的盟友、对手都是游牧民族，而且这种观点得到许多学者的赞同，包括Manz（1989）。然而此说甚谬。他们未曾有过逐水草、放牛羊的生活，而是生活在中亚的农业城郭地区。连曼茨（Manz）自己也指出“察合台游牧民常常退守到深沟高垒的城中。而且还应当注意，在此后1年到2年，帖木儿控制了察合台兀鲁思，他立即在撒马尔罕城增修防御工事”（Manz 1989:55）。

[46]曼茨经常指称这些“无部落”之人为帖木儿的“私人随从”或者“侍从”，但她并没有提到这是伊斯兰奴隶私兵制，即古拉姆制。

[47]多数伊斯兰史书但凡言及帖木儿必是满纸讥讽。伊斯兰史书称帖木儿只是普通盗贼出身。据说他崛起之前是一伙好勇斗狠的年轻人的头目，当时在中亚这种团伙多如牛毛，他们的事迹大多失传。据传，帖木儿曾在偷羊时中箭，从此跛脚，他的诨名“跛子帖木儿”即由此而来。此说流传甚广，克拉维约也曾提及，却是个谣传。帖木儿的腿伤实际是在1364年出征锡斯坦时所受（Manz　1989:48）。或许这个传说反映了一个已经失传了的民族起源神话故事（一如《导论》中所记种种），这个故事在帖木儿在世时就已经流传。帖木儿青年时代的事迹现在所知甚少。

[48]Manz（1989:58-62，67）。

[49]Manz（2000:511）。

[50]Manz（2000:511）。巴耶塞特苏丹被俘后受帖木儿礼遇，却在数月后亡故。

[51]毫无疑问，这并不是因为帖木儿不想吞并这两地（Manz 1989），而是因为当地政权势力仍很强大，且两地距其中亚本土颇远。

[52]Manz（1989:13）。前文对于帖木儿远征的概述皆参引自Manz（1989:70-73）。

[53]Manz（1989:16）。

[54]Manz（1989:12-13）。

[55]应作“子孙”，因为在其身后夺位内讧者多为其孙辈。——译者注

[56]“斡脱”来自蒙古语ortoγ，借自突厥语ortaq，意为“合伙人”；蒙古人将斡脱制度连同这个词本身一起引进。

[57]Rossabi（1981:275，282-283；1988:122-123）；参看Endicott-West（1989）。这个重要的、强大的制度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58]Allsen（1989）全面讨论了各朝蒙古统治者对于当时的斡脱商人的不同政策，并探讨了对商人的征税。

[59]另外可参看佩戈洛蒂（Pegolotti，活跃于约1340年）所著的丝绸之路西段商人手册——《贸易实务》（La pratica della mercatura，1936）。

[60]此书现有数种不错的英译本，最为精确者为Moule and Pelliot本（1938），最通俗易读者为Latham本（1958）。伯希和对全书有深入精彩的注疏（Pelliot 1959-1963）。

[61]关于马克·波罗旅程的历史信息，见注释84。

[62]有关欧洲的主要记述的英文译文，参见Dawson（1995）。

[63]这种观点在学界占主导地位（参看Di Cosmo 1999:5）。对此观点的简要批判，参看注释85。

[64]现存最早的火炮在中国黑龙江省发现，被确定为1282年蒙古时代遗物（Atwood 2004:354）。

[65]对此点的概论和更多参考文献，参看Allsen（1997:9）。

第九章　从中央欧亚的马上贸易到欧洲人的海上贸易

假如那设拉子美女

有朝一日能对我钟情，

为了她那颗美丽的印度痣，

我不惜把撒马尔罕和布哈拉献奉。[1]

——哈菲兹

第三次区域帝国时代

自15世纪中叶开始，数个大型的帝国相继由中央欧亚民族建立。这些帝国的版图几乎囊括了整个欧亚大陆，包括整个中央欧亚和大部分周边地区，仅西欧、东南亚和日本不在其中。与此同时，葡萄牙人发现了绕过好望角直接到达亚洲的海上航线。西欧各国迅速跟进，全力投入海上贸易。它们将过去业已存在的各条商贸航线进一步发展、连缀，整合成一个全新的经贸圈——海上贸易系统。由此，工业化前夜的世界已经由中央欧亚传统的陆上帝国和新兴的欧洲的海上帝国共同组成。

属于大陆民族的奥斯曼突厥人拉开了中央欧亚民族对欧亚大陆第二波征服[2]的序幕。他们攻灭拜占庭帝国，并恢复了昔日拜占庭帝国在海上的霸权。在伊朗高原，土库曼人在萨法维教团的领导下，建立起一个北抵高加索，南临波斯湾的全新的波斯帝国，重新统一了波斯人的传统领地。与此同时，莫卧儿人南下占领北印度地区，将帖木儿-波斯文化传入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地区。在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的百年间，属于大陆民族的罗斯人先后攻灭继金帐汗国而立的数个小汗国，将其版图一路向东扩张，经西伯利亚直抵太平洋；满洲人南下入主中原；准噶尔人则在中央欧亚当地建立起一个草原帝国。后来，罗斯人在波罗的海之滨建成圣彼得堡，并将帝国首都迁于此地。这标志着俄罗斯此时也成为一个海上强权，其野心已经不止于中央欧亚[3]。

公元1498年，瓦斯科·达·伽马经印度洋成功航行至印度。在随后的半个世纪中，葡萄牙人在亚洲沿海地区建立起一系列贸易站点。这片区域西起波斯湾，经孟加拉湾、马六甲海峡、中国南海，东至日本。在当时，葡萄牙人以及西班牙人的行为模式本质上仍然是中世纪模式；换言之，这种模式与中央欧亚系统的重商行为模式是完全一致的，远承自上古时代奠定丝绸之路经济的斯基泰人和其他早期伊朗人。唯一一点不同在于：在通商谈判遭到拒绝的时候，传统的中央欧亚民族用强弓铁骑打开对方的门户，而此时的欧洲人则已经可以仰仗坚船利炮了。中央欧亚重商主义传统推动着葡萄牙人一路向着东方远航。他们在其航线沿岸地区寻求贸易的许可，有时不惜使用武力打开当地门户。[4]他们在通商地区建立起贸易据点，这些贸易据点后来逐渐发展成城镇堡垒，成为葡萄牙人统治当地的政治前哨。后来，葡萄牙人正是依靠这一系列沿岸据点

发展自己的海外力量，与亚洲大陆的各大势力争锋，与后来的欧洲列强夺利。同中央欧亚的征服者一样，葡萄牙人在亚洲的扩张也严重依赖当地的人才，包括亚洲本地的引航员、绘图师、买办等等。[5]西班牙人则向另一个方向航行，他们依托美洲大陆和菲律宾群岛建立起一个横贯东、西半球的贸易帝国。在大航海时代，西欧人完全掌控了通往东方和美洲的远洋航线。这标志着西欧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逐步统治世界的开始。到19世纪时，英国人几乎垄断了自大航海时代以来由欧洲人建立的海上贸易系统，把控着进出印度和中国的远洋贸易。当然，还从没有任何一个欧洲强国独霸海上贸易，完全将其他强国或当地传统的沿岸航运排除在外。

中央欧亚民族对欧亚大陆的第二波征服

大约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后期同时，数个庞大的封建帝国在欧亚大陆上相继建立。这一波大帝国的建立并非源于之前帖木儿大帝对中央欧亚的征服。凡帖木儿兵锋所到之处，当地的发展大都受到了抑制或破坏。1405年，帖木儿去世，奥斯曼人[6]即刻重整旗鼓，复兴其帝国，重新走上了扩张征服之路。1453年，他们攻灭了日暮穷途的拜占庭帝国。在这一批新兴帝国中，奥斯曼帝国崛起最早，而其他帝国几乎都是在帖木儿死后百年左右方才成形。历史上一个巧合的现象是，每当欧亚大陆西部各地普遍凋敝、百废待兴之时，拜占庭帝国都会迅速发展、一枝独秀。究其原因，显然是其坐拥东部地中海商贸圈的地理之便。如今，奥斯曼帝国几乎复兴了1000年以前东罗马帝国在整个地中海东半部的势力范围，因此得以在群雄中率先崛起。后来，才有土库曼人[7]在波斯建立起萨法维王朝（1501年），以及同时期巴布尔率领着中亚突厥人在阿富汗和印度建立莫卧儿帝国。

在上述大陆帝国创立、发展之际，欧亚大陆的权力局势正在悄然发生着转型。1500年前后，地理大发现和大航海时代开启了全球战略格局的革命：欧洲人掌控着大洋沿岸各地，并以此为根据，逐渐将势力范围向大陆内部投射。欧亚大陆开始从陆权时代走向海权时代。历史学家在评论奥斯曼和莫卧儿两帝国时写道："中心在消融，边缘在崛起。"[8]

即使欧洲本身也在发生着同样的转型。西班牙光复运动就可以被看作上述欧亚局势大转型的一个微观体现。1492年，阿拉伯人在西班牙最后的根据地——都城格拉纳达被西班牙人攻陷。格拉纳达不仅仅是一座内陆城市，而且还被群山环抱。其王宫阿尔罕布拉宫是坐落在山顶的一座堡垒，可以俯瞰四周环绕的谷地。西班牙人对阿拉伯人的胜利可以看成海权对陆权的胜利：基督教西班牙人不但擅长陆上作战，更是海上行船的好手。在后来欧洲列强通过海上进行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先后建立起海上帝国的成功者正是大西洋沿岸的几大强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而瑞典、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等国家则未曾攫得重要的海外殖民地。[9]尽管这些国家也都有出海口和航海传统[10]，但它们的航海传统几乎都是短途的近海航行。因此，他们本质上还是陆权国家，其势力范围维持在大陆上，而前述的那些海权国家则不断扩张

——先在海外发展其势力，再调转炮口与这些陆权国家在欧陆争锋。

奥斯曼帝国复兴

1402年，帖木儿大帝的铁骑横扫奥斯曼人。经此一役，奥斯曼帝国一蹶不振，陷入内战。直到1413年，穆罕默德一世（1403-1421年在位）方才结束内战，统一全境。他励精图治，不但复兴了其曾祖父穆拉德一世在位时帝国的版图，而且还更进一步攻占了巴尔干半岛的部分地区。

及至其孙“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1451-1481年在位）在位时，奥斯曼突厥大军已经兵临君士坦丁堡，将拜占庭帝国残存的一隅围得水泄不通。此时，君士坦丁堡城中仅余2万军民，城墙内则武备废弛，工事楼台早已变作农田。雄伟的城墙兀自挺立。在过往的岁月中，它曾无数次抵挡来犯之敌。遥想拜占庭帝国当年能工巧匠如云，傲视同侪，舰队纵横驰骋，威震爱琴海、黑海。可叹时过境迁，昨日已成过眼云烟。今日之敌偏偏有备而来，装备之精远在拜占庭人之上。奥斯曼军中有来自意大利和欧洲各国的火器专家，他们指挥大军以大炮轰城。火炮成排，烟雾弥漫。1453年5月29日，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在大军拥卫之下进入君士坦丁堡。他下令都迁于此，重新建城，并迁徙人口充实此地。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在历史上是一件震惊西方世界的标志性事件，但在当时却是大势所趋。此前，奥斯曼大军已经攻下拜占庭几乎全部的领土，君士坦丁堡已是孤城一座。[11]而且奥斯曼大军还向着拜占庭业已丢失的领土开进。在穆罕默德二世在位期间，奥斯曼大军连下希腊及巴尔干半岛其他各地，并于1461年扫灭特拉布宗王国[12]，彻底平定安纳托利亚。1473年，他又挥师直指波斯西北方面，击败心腹大患白羊王朝。另一方面，他将帝国的南疆推进到了叙利亚马穆鲁克王朝边界。到冷血塞利姆一世在位期间（1512-1520年），奥斯曼大军终于击败马穆鲁克人，占领库尔德斯坦、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叙利亚和埃及，并沿着阿拉伯半岛的海岸线将帝国的势力范围扩张到麦地那、麦加。冷血塞利姆之后的下一任苏丹则是威震西方世纪的苏莱曼大帝（1520-1566年在位）。他挥师西进，占领匈牙利大部分地区，并围困维也纳城（但未能攻克）。在其治下，奥斯曼帝国的势力已经影响到北非大部分地区，并进入红海。但奥斯曼帝国向西地中海世界扩张的努力却受到来自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合力抵抗。1571年，西欧基督教联军在勒班陀之战中重创奥斯曼帝国海军。尽管如此，奥斯曼帝国还是基本复兴了阿拉伯崛起之前

东罗马帝国在希拉克略时代曾达到的版图。[13]

萨法维王朝

在伊朗高原北部，帖木儿帝国的势力在帖木儿身后土崩瓦解，土库曼人的白羊王朝重新在当地建立统治。白羊王朝对当地的苏非派激进主义教团萨法维教团进行血腥镇压。萨法维教团属伊斯兰教什叶派一支派[14]，成员主要是土库曼人，又被称为“红头”。白羊王朝的屠杀激起了萨法维教团的起义。1473年，奥斯曼帝国大败白羊王朝，使其元气大伤。这为萨法维势力的崛起提供了机会。萨法维教团内部组织森严，成员如同私兵一般忠于教团领袖。[15]正是这种强大的组织性使萨法维教团百折不挠，终于取得最后的胜利。1501年，伊斯玛仪一世（1487年生，1501-1524年在位）的军队击败白羊王朝，攻陷大不里士，建立起波斯萨法维王朝。萨法维王朝将其所信奉的伊斯兰教什叶派信仰定为波斯国教。[16]在其统治的第一个十年中，伊斯玛仪先后攻取伊朗北部和东南部、法尔斯（伊朗中、南部）及伊拉克东部（1508年）。1510年，波斯大军又在梅尔夫大败乌兹别克人，并当场击杀其君主昔班尼汗。但乌兹别克人仍然盘踞在河中地区，萨法维王朝始终未能将其逐出此地。1514年，奥斯曼大军凭借着枪炮等火器之利击败波斯军，将安纳托利亚东部和伊拉克北部重新夺回。此后，波斯人再未能染指此二地。

伊斯玛仪死后，其子塔赫马斯普（1524-1576年在位）继立。他是一位强力君主，在位期间对东边的莫卧儿帝国、西边的奥斯曼帝国连年征战。塔赫马斯普之后继立的两任君主皆软弱无能。在此期间，一方面有奥斯曼帝国蚕食掉波斯大片领土，另一方面有乌兹别克人屡屡攻入伊朗高原东北部劫掠。1588年，阿拔斯大帝（1588-1629年在位）登基，他立即出兵收复失地。在其治下，波斯帝国一扫颓势，将之前失于奥斯曼人、乌兹别克人和葡萄牙人的土地一一光复。

1515年，葡萄牙人在波斯湾中的霍尔木兹岛建起一个殖民贸易据点和海军基地，波斯人当时无力驱赶。一个世纪以后，英国和荷兰逐渐成为波斯湾乃至整个印度洋上的主导力量，阿拔斯决定利用他们的力量驱逐葡萄牙人。为了发展经济、增强政府对经济——尤其是丝绸贸易[17]的控制，他先是批准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伊斯法罕和设拉子分别建立贸易中心，又在1621年批准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波斯湾之滨的阿巴斯港建立贸易中心。次年，在英国舰船的协助下，阿拔斯的军队得以渡海登上霍尔木兹岛。他们击败岛上的葡萄牙人，并将其彻底驱逐。英国人也得到了

在阿巴斯港建立贸易中心的许可。阿巴斯港迅速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港。其后不久，荷兰人击败英国人，取得了其在波斯地区的大部分利益。由此，荷兰人成为17世纪后半叶主导波斯湾地区贸易的海上霸主。但英国人仍将卷土重来，此为后话。

阿拔斯在伊朗高原中南部的伊斯法罕建起一座华丽的新都，将国中文人骚客、能工巧匠一并招揽至此。同时，他又招来大批商人，为新都聚敛财富。阿拔斯大帝英明神武，唯独没能选好合适的继承人。他的诸子或被杀，或被刺瞎双目，皆因为阿拔斯先后怀疑他们谋反作乱。最后，王位只能由其身体孱弱的孙子萨菲（1629-1642年在位）继承。萨菲之后，则是稍有能力的阿拔斯二世（1642-1666年在位）。萨法维王朝的领土日益收缩，实力快速下滑。最终，其都城在1722年被一支阿富汗武装攻破，萨法维王朝灭亡。[18]

莫卧儿帝国

尽管帖木儿的幼子沙哈鲁最终在王位争夺战中获胜，取得帖木儿帝国的王位，但是，在经历了这一番混战之后，帖木儿大帝生前在河中和呼罗珊以外新征服的广阔领土已经丧失殆尽。即使在其中亚本土，分裂战争也此起彼伏，帖木儿帝国的领土渐次沦丧。

费尔干纳地方首领巴布尔（也译“巴卑尔”，1483/1484-1530年）兼有帖木儿王朝皇室和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血统。1504年，他起兵南下侵入今阿富汗地区，攻取喀布尔，并降服加兹尼。1522年，他再攻下坎大哈。后来，德里苏丹国洛迪王朝的王位之争使他有机会进军印度次大陆。1526年，巴布尔率领仅有1.2万人的军队在德里北面的帕尼帕特与数倍于己方的印度大军对垒。印度军方面还得到阿富汗骑兵助阵，军威极盛。但巴布尔的中亚铁骑骁勇善战，以一当十；更兼其阵中还携带有大炮、火枪，为对方所未见。凭此利器，巴布尔以少胜多，大败德里苏丹国的印度大军，并一鼓作气攻下德里。他又顺势挥师夺取阿克拉，并定都于此。到1528年，他已经击溃拉吉普特人的势力，并占领了拉贾斯坦。当1530年巴布尔在阿格拉去世之时，一个地跨阿富汗大部和西北印度的大帝国——莫卧儿帝国已经由他亲手缔造。

巴布尔之子胡马雍（1530-1540年、1555-1556年在位）甫一继位，即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其中包括他的兄弟卡姆兰的竞争。卡姆兰在巴布尔死后分得了阿富汗。胡马雍手中的西北印度后来也告失

守。1540年，他被占据比哈尔和孟加拉等地的阿富汗头领舍尔汗（1540-1545年在位）彻底击败，整个北印度都落入舍尔的手中。舍尔自立为君主，而胡马雍则经拉贾斯坦和信德逃往波斯萨法维王朝。塔赫马斯普二世收留了胡马雍。[19]

欧洲人围绕着欧亚大陆的海上扩张

1498年5月20日，葡萄牙探险家瓦斯科·达·伽马完成了历史上首次从欧洲出发，沿非洲海岸绕过好望角进入亚洲的海上航行，在西南印度马拉巴沿岸的卡利卡特（今印度喀拉拉邦的科泽科德，汉文史料作古里）港附近成功登陆。欧洲人在地理大发现中开辟出了直接通往东方的海上航线，建立起波斯、印度、东南亚与欧洲间直接的贸易联系。这不但对西欧的发展有着革命性的意义，而且对环欧亚大陆海上贸易体系的发展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推动了南亚、东南亚和东亚地区的海上贸易体系的建立。

在返回葡萄牙的途中，达·伽马满载着东方商品的船队几乎被洗劫一空，他本人也是死里逃生。但劫余商品的价值也已经是当初出海集资成本的3000倍[20],堪称一本万利。葡萄牙人的下一次驶往印度的远航由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带队，他们在航行途中还意外发现了巴西。这次，当葡萄牙人到达卡利卡特的时候，他们却受到了当地扎莫林人的强硬抵抗。扎莫林人在马拉巴海岸建有政权，他们是当时控制着印度洋进出卡利卡特港贸易的穆斯林的盟友。在双方的冲突中，许多葡萄牙人被杀。卡布拉尔在盛怒之下指挥舰队击沉港口附近的穆斯林商船，并炮轰卡利卡特城，给当地造成巨大损失。卡布拉尔最终没能达成预想的通商目的，悻悻地返航回葡萄牙。最初从葡萄牙开出的12艘大船仅有6艘得全。[21]

1502年，达·伽马率领全副武装的葡萄牙舰队卷土重来，袭击卡利卡特一带的穆斯林，并以大炮轰击卡利卡特城，几乎将其夷为平地。1510年，葡萄牙人又在阿方索·德·阿尔布开克的率领下夺取穆斯林手中的果阿港，拉开了葡萄牙人在亚洲沿海地区闪电扩张的序幕。1511年，他率舰队夺取马来半岛南端的马六甲。1515年，又下波斯湾门户霍尔木兹岛。他将该岛打造成一个贸易枢纽和海军基地。1518年，葡萄牙人在锡兰岛（今斯里兰卡）的科伦坡建要塞。1535年，他们又通过政治手段在印度西北海岸获得第乌港。同年，中国的明朝政府许可其在澳门靠岸、通商。到1577年，葡萄牙人已经在澳门建立起一个殖民地和贸易中心，设有总长（Captain　Major）实施管理。[22]在1543年之前，葡萄牙人就已经到达日本列岛；1550年，他们到达长崎。至晚从1571年起，葡萄

牙人的船队就每年定期造访长崎，满载着来自澳门的商品前来贸易；有时他们会带来来自印度果阿港，甚至远道从欧洲运来的商品[23]。在16世纪，葡萄牙人不惜用武力迅速开辟出了与亚洲沿海各个地区通商的航路。亚洲各地的地方势力并没有给他们的前进制造太大的阻碍，反而是他们的传教士同胞[24]和后来的其他欧洲列强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早在葡萄牙人第一次远航印度时，他们就时常需要动用武力来通商和护航。从中央欧亚史的视角来观察，这一点儿也不奇怪。丝绸之路上最早的商人——斯基泰人及其文化上的同宗匈奴人就是悍勇的战斗民族。而他们周边的民族——希腊人、罗马人、波斯人、阿拉伯人还有汉人实际上也均是好战的民族，只是这一特点往往被世人忽视。总而言之，中央欧亚民族本就是战斗民族。相对于其重商的传统，中央欧亚民族好战善战的特征更为世人所熟知，而其在历史上建立的帝国也均以武力征服为基础。尽管如此，史料还是明白无误地显示，那些中央欧亚帝国扩张背后的主要动力无一不是商业和税收的利益，而并非劫掠和破坏。突厥帝国、罗斯帝国、蒙古帝国如是，大航海时代欧洲人的海上商业帝国亦如是。

尽管葡萄牙船队最初在争夺阿拉伯海航运权时确实曾频繁地使用武力，但从长期来看，他们却以其“克制”而闻名。[25]欧洲列强在亚洲各地修建港口和要塞大都获得了当地政权的许可。当地政权出于某种考虑——通常是当他们与邻近政权发生摩擦时——会准许，甚至鼓励欧洲人到来。[26]这种模式与中央欧亚民族在大陆上的扩张方式惊人地相似。

那么葡萄牙人为何必须在阿拉伯海地区频繁地使用武力呢？当时的一些事件在叙事史著作和时人的笔记（譬如达·伽马的日记）中都保留有详备的记载。通过研究这些事件可知，葡萄牙人在当地的对手主要有两类：一是已经在从事国际贸易的当地商人；一是口岸所在地的地方政权。在自古以来形成的沿岸点对点贸易线路上，每一个港口都被地方政权牢牢把控着，往来的商人是他们利益的源泉，他们对自由贸易理应持开放的态度。但当地商人的利益受到地方政权的保护，当欧洲人到来时，他们希望用武力驱逐外来的欧洲人，以防欧洲人打破他们对当地贸易的垄断。达·伽马在第一次到达卡利卡特时就意识到了这点。更何况阿拉伯海地区的海上贸易几乎由穆斯林独霸，非穆斯林显然要受到排挤。而葡萄牙人则从不讳言其基督教信仰。这或许也是冲突的一个原因。

[28]

然而达·伽马只是第一个通过海路到达印度的欧洲人，当地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还没有理由担心这个欧洲人会抢占他们的航路或攻夺他们的港口。他们只是排斥外来者的竞争，想通过欺骗、盗窃或是谋杀等手段吓退外人。“当地（穆斯林）商人之间的竞争本来就异常激烈，甚至要见血。单枪匹马闯进来的外人更不可能插足任何一条航道，这些航道几乎都已被垄断。证据显示，当时的海关普遍有猫腻，地方官吏也不检点。还有一个问题。海盗在16世纪初的印度洋上猖狂作案，当地政权对此几乎无所作为。”[29]面对上述种种，初来乍到的欧洲人当然不惜动用武力来解决问题。

当然，武力并不是唯一手段。欧洲人在亚洲的活动主要还是和平的商贸活动。一事可明证之。继葡萄牙人以后，前往亚洲的船队无一不属于私人贸易公司。[30]尽管他们背后都有政府支持，在必要时也能够使用武力，但他们毕竟都是商业公司。这就不难解释，为何在欧洲人掌控海上航线的头两个世纪里，他们在亚洲几乎没有任何政治和文化的影响。[31]

葡萄牙人与后来的欧洲列强、当地的亚洲国家在政府、商人和军队等各个层面都有利益的角逐。这些矛盾最终要诉诸武力解决。葡萄牙人的到来最初并未受到周边大帝国——萨法维波斯帝国、德里苏丹国和莫卧儿帝国的关注，他们面对的挑战首先来自当地的穆斯林商人和地方政权。这些穆斯林控制着从卡利卡特、第乌等印度西岸港口向西和西北往来波斯、阿拉伯和埃及诸港口的航线，以及从印度东南海岸横穿孟加拉湾到达马六甲的航线。这些航线是欧亚之间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要津，有着丰厚的经济利益。海上丝绸之路极东连接日本，沿亚洲海岸，经阿拉伯路桥、地中海，到达南欧沿岸各地。在葡萄牙人发现绕过近东直达东方的航线不久，穆斯林商人——尤其是那些经营欧洲和印度之间贸易的商人——就意识到这将严重威胁到他们的利益。葡萄牙人在与这些穆斯林商人及其背后的政治势力的竞争中，有意地利用其海上优势切断印度和红海之间的航路。马穆鲁克王朝以及其他的穆斯林政权，包括卡利卡特的穆斯林政权，在威尼斯人的支持下，竭力突破葡萄牙人对海上的封锁。马穆鲁克王朝分别在1507年和1509年两次派出庞大舰队出海，决意与葡萄牙人一决雌雄。1509年，在第乌海战中，葡萄牙海军歼灭马穆鲁克舰队，取得决定性胜利。1535年，葡萄牙人占得了第乌港。

对西印度洋贸易霸权的争夺战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此时，葡萄牙人的活动已经触动了奥斯曼帝国的利益。1538年，苏莱曼大帝派出一支庞大舰队远征第乌，但葡萄牙人击退了奥斯曼舰队，并巩固了自己在印度西岸的势力。1546年，奥斯曼帝国攻取伊拉克，得到了面向波斯湾的港口巴士拉。他们得以由此出兵，于1551-1552年围困了霍尔木兹岛。但他们终究没能除掉葡萄牙人，葡萄牙人始终在海上占据优势，并继续扩张。当时的西欧人拥有更加优良的海船和武器，掌握更加高超的航海技术，因此葡萄牙人的胜利合情合理。[32]

到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已经完全掌控了从欧洲一直到日本的海上航线，并在沿线主要港口建立要塞或贸易中转站。此时距离他们第一次出现在印度洋才过去约50年。但葡萄牙人在亚洲的势力仅仅限于沿海地区，他们没有侵入内地，也没对任何亚洲大帝国造成实质性的威胁。他们在当时还没有这般实力。[33]

毫无疑问，穆斯林商人及其意大利盟友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们继续在海上与葡萄牙人斗争。葡萄牙人因此屡受挫折。葡萄牙人自身也没有很好地经营他们新建的海上帝国。在16世纪末，他们的海上商业帝国开始走衰。[34]自从葡萄牙人掌控了从欧洲到东亚的海上航线，欧洲人逐渐将其势力扩张到亚洲沿海地区；当然，他们的势力是随着时间的推进逐渐建立起来的，并非一蹴而就。这期间，欧亚大陆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经近东和威尼斯到达南欧的航运线路——还曾有过短暂的复兴，但这只是昙花一现[35]。欧洲人对远洋航线的控制最终导致过去通过近东、地中海联系亚洲和南欧的传统的香料、丝绸之路彻底衰落。

欧洲人始终觊觎产自东方的丝绸、香料等贵重商品，希望与这些商品的原产地建立起直接的联系。这是他们探索通向东方的海上航线的动力。这些商品在欧洲的售价百倍于其在亚洲原产地的价格，因此是所有商人梦寐以求的奇货。[36]经济史学家常称这些商品为“奢侈品”[37]，但它们其实一直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必需品，千百年以来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进入欧洲。

欧洲人参与亚洲沿海贸易时，会遇到当地势力的抵抗。这时，欧洲人会毫不犹豫地派出海军力量抵达相关海域，甚至侵入大陆沿岸。这种行径通常会受到现代的历史学家道德上的谴责[38]，但是在19世纪以前，欧洲人出兵亚洲大都不是抱着帝国主义扩张的目的。即使是在19世纪，笔者也很难同情从阿拉伯直到日本的这一系列腐败无能的亚洲政府

[39]。

最初，由于亚洲各大帝国的中央政府对海上贸易缺乏兴趣，欧洲人面对的阻力主要来自当地的商人和地方势力。当时的各大帝国对海上及其他各种形式的贸易都毫无兴趣，这有史为证。“萨法维时代伊朗的贸易档案几乎都出自西方公司的代表，而在大多数波斯语史料中则对贸易信息只字不提，既没有本地的贸易记录，也没有国际的贸易记录。”[40]莫卧儿帝国的例子或可解释，为何这些帝国对海上贸易如此冷淡。莫卧儿帝国的全部岁入中，通过海上贸易所得收入仅占百分之五，微不足道。其岁入的绝大多数份额来自土地。[41]“莫卧儿人来自亚洲腹地，他们的开国之君巴布尔（1526-1530年在位）甚至都没见过大海。”与此类似，在同一时期的南印度，各政权之间的争夺也几乎不涉及海权。[42]

后来，欧洲人在海上的霸权逐步确立，他们在沿海地区及其周边逐渐建立起一系列的据点。这时，他们开始直接与各大帝国的地方政府打交道，包括波斯的萨法维王朝、恺伽王朝，印度的莫卧儿王朝、中国的清朝和日本的德川幕府。通过早期欧洲商人、探险家的笔记可知，他们有时感到必须要使用武力去迫使亚洲的统治者学会遵守外交和通商的规矩。比如，肆虐的海盗威胁着欧洲人在海上的核心利益，但许多海盗行为其实都得到了港口当地统治者的默许，甚至还有些地方统治者在背后提供支持。这些当地的统治者在陆地上其实也和海盗一样强取豪夺。在亚洲各港口，地方政府和军队对外来商人吃拿卡要、予取予求，已经约定成俗。但是欧洲商人和中央欧亚的商人一样，背后有政府的支持，腰杆很硬，因此他们根本不理会当地这一套。

简而言之，为了参与到国际贸易中，欧洲商人需要保证他们的航线和沿线港口城市的安全。因此，他们必须要在其航线所经、港口所在的地区占有政治优势地位。这就如同中央欧亚民族在过去2000年中，为确保丝绸之路经济的繁荣，不得不一次次在中央欧亚建立秩序。于是，欧洲人的坚船利炮打败或震慑了亚洲当地的统治者，他们在亚洲的势力不断增长。但当时亚洲各大国尚未衰落，而欧洲在技术上的领先优势也并不明显，因此欧洲人的势力范围仅限于沿海地区。[43]他们参与当地的海上贸易，再沿海岸线建立起设防的贸易中转站，并控制远洋航线。[44]直到19世纪，亚洲大陆各大周边帝国已积弱不堪，欧洲列强才得以乘机将势力渗透至亚洲腹地，填补当地的权力真空。即使在此时，欧洲列强的首要目标依然仅是稳定当地的政治局势，为继续开展贸易活动提

供条件，而绝非建立帝国。这与历史上中央欧亚民族的策略如出一辙。中央欧亚民族从来没有主动进攻过强大、统一的农耕帝国，它们通常也没有机会率先发难，因为这些农耕帝国在对外扩张的时候会率先进攻它们。即使在农耕帝国衰落时，它们相对于中央欧亚政权来说依然体量巨大，难以征服。只有当周边帝国真正积弱不堪，甚至支离破碎之时，中央欧亚民族才会试图去扶立一个新的政权，或亲自介入，以恢复秩序。19世纪和20世纪初，欧洲列强在印度和中国的活动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总之，不论是丝绸之路体系中的中央欧亚民族，还是海上贸易体系中的欧洲列强，它们都是逐渐地卷入了欧亚大陆周边地区的事务中，随着局势发展变化，最终不得已才试图在当地建立直接统治。

欧洲大航海时代的另外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建立起西班牙美洲殖民地与东亚地区直接的贸易联系。西班牙帝国的巨富主要依赖其在新大陆各殖民地所出产的白银。与其他欧洲人一样，西班牙人也对东方的丝绸、香料、瓷器、宝石等贵重商品垂涎欲滴。他们从美洲派出帆船队，横穿太平洋到达马尼拉，再到达中国。在中国，他们在交易中花掉的白银达到了其在美洲所获白银总量的五分之一。西班牙同中国的贸易一方面让西班牙赚得盆满钵盈，支持了西班牙帝国在欧洲的战争，另一方面也向中国输入了难以计数的白银。[45]

最后，欧洲人还带来了他们的宗教。他们自认基督教比亚洲当地流行的各宗教多有高明之处，颇想以种种高明之处震撼他们所遇到的亚洲人。在欧洲人海上扩张的早期，耶稣会士确实给日本和清朝早期的统治者留下了深刻的第一印象。但是后来的传教士良莠不齐，无论文化还是修养都难比之前的耶稣会士，因此建树更少。绝大多数亚洲人都未被基督教感召，因为他们已经信仰了一种世界宗教；如同基督教徒看低其他宗教一样，他们也看不上基督教。在伊斯兰教和佛教世界尤其如此，因为其中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多少通识教义、教理，有感于本教博大精深；只有缺乏教育的底层民众或受欧洲传教士鼓动，因为他们可能对本地的宗教也不太了解。再者，亚洲当地的统治者和宗教领袖当然清楚基督教的流传会增加欧洲人的政治影响力，因此始终保持着警惕。

海上贸易的新篇章

自葡萄牙人开辟西欧直抵亚洲的航线以来，国际贸易在欧洲人的经营之下以惊人的速度迅猛发展。其影响之巨，仍未被世人充分认识。欧洲从此直接通过海路与印度、东南亚、中国和日本相连。[46]

葡萄牙人把布、葡萄酒杯、水晶、镜片、棱镜、钟表等机械制品从欧洲贩来东方。随之而来的还有火器、刀剑等武器。有些商品甚至远销到日本。[47]

葡萄牙商船驶离了其在（印度）果阿的大本营，经马六甲、澳门等远东港口，驶向长崎。约3年以后，商船方回到果阿。葡萄牙商船运来的商品包括生丝、棉布和羊毛布、象牙、珊瑚和糖。其运出的主要是白银，也有铁、折屏等艺术品和东洋刀。进口的商品中偶有稀罕之物，如老虎。[48]

葡萄牙人在航行的途中会与沿途各地进行贸易。他们的商船满载着来自欧洲和印度的商品（如胡椒）抵达澳门。在澳门，他们新购入丝（丝织物、生丝和丝绵）、瓷器、麝香和黄金。他们继续航行至长崎（1571年以后），在那里卖掉船上商品，买入白银、漆器、箱柜、画屏、和服、东洋刀、黄金等等。返航经过澳门时，他们用所得白银购入更多黄金、铜、丝绸、麝香、瓷器、象牙和珍珠，然后满载驶向果阿。

葡萄牙人在亚洲的扩张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中国的闭关锁国。在明朝的海禁政策之下，中国商人与日本人的贸易活动一概被禁止，这使得欧洲人几乎垄断了往来日本的海上贸易。他们的商船满载着产自中国的丝绸、黄金、麝香和瓷器等商品运往长崎，换回白银和铜。“据估计，葡萄牙人承运的丝绸数量占了从中国海运出口丝绸总量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到17世纪30年代，在日本进口的商品中丝绸的地位已经超过了黄金。”[49]

在带来丰厚利润的同时，贸易还拉近了欧亚大陆各地商人们与商品生产者及商品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使之前少见的商品日益常见。一直以来神秘遥远的东方如今也褪去了面纱，似乎触手可及。纷至沓来的欧洲旅行家们留下了大量关于印度、中国、日本及其间各地的详细记录。他们注意到亚洲各地不同的语言，学习并记录之。欧洲人探索世界的兴趣方兴未艾，在亚洲则被推向高潮。如同在科学技术领域的飞速发展，欧洲学界很快也在历史、文学、语言学、人类学各个学科有关亚洲的领域中取得长足进步。在许多方面，他们甚至超过了亚洲本土学者的学术水平。[50]

莫卧儿王朝复辟

胡马雍流亡波斯，寄人篱下。他在萨法维王室的压力之下，只得皈依什叶派。只有如此，萨法维王朝才愿意出兵助他复辟。经过8年苦战，波斯-莫卧儿联军终于重夺坎大哈。1553年，大军攻下喀布尔，胡马雍重夺王位，并刺瞎了他僭位的兄弟。同年，苏尔王朝的伊斯兰（舍尔之子）去世，北印度地区四分五裂；当地偏偏又逢旱灾肆虐，雪上加霜。1554年，胡马雍出兵印度。他的大军在旁遮普遭遇了苏尔人的大军，全歼对手。1555年，胡马雍率大军开进德里，莫卧儿王朝在印度复辟。[51]

数月之后，胡马雍意外失足摔死，他一手重建的帝国由他年轻的儿子阿克巴（Akbar，1556-1605年在位）继承。阿克巴后来成为莫卧儿帝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文治武功，无人出其右。他先后荡平苏尔王朝残余势力，击败其兄弟在喀布尔的割据势力，平定乌兹别克人的叛乱。他将帝国的版图进一步扩大到位于北印度的古吉拉特、克什米尔等地，以及位于南印度的德干高原的北部。阿克巴大力推进伊斯兰教和印度教艺术的融合，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两种宗教在当地的融合。阿克巴一朝的文治武功将莫卧儿帝国推向了经济和文化的巅峰。

阿克巴大帝身后，其子贾汗吉尔（1605-1627年在位）嗣位。其后，再有沙贾汗继立（1628-1658年在位）。这两朝皇帝继承阿克巴大帝的遗志，对外继续开疆拓土，在国内大力发展艺术，尤其是建筑艺术。1657年9月，沙贾汗病重，其诸子为争夺王位展开混战。奥朗则布（1658-1707年在位）最终胜出，得登大宝。后来沙贾汗虽然康复，但奥朗则布彼时已经击败了中央军及其诸兄弟的力量，并一路攻向阿格拉。他攻克阿格拉以后，囚禁其父沙贾汗5年，直至其死去。奥朗则布心胸狭窄，他一改前朝历代君主宗教宽容的政策，大肆镇压印度教教徒，对南印度的印度教诸邦攻伐不止。虽然莫卧儿帝国的疆域在奥朗则布的治下达到其顶峰，但国内人心背离、叛乱迭起，海外贸易又被荷兰、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把控。英国人在1661年从葡萄牙手中得到了孟买岛及其良港。此后，他们与莫卧儿帝国之间爆发了大规模冲突，最终以英国人认输赔款告终。但是英国人在孟买的发展没有停滞，他们在其上修建防御工事。如同英属马德拉斯（Madras）[52]一样，孟买也迅速崛起成印度地区最大的港口之一。此时，英国人的势力越做越大，奥朗则布已经没有能力将他们赶走。奥朗则布死后，在长期受其镇压的地区，起义相继爆发，蔓延半个帝国。莫卧儿帝国从此一蹶不振，英国人乘虚而入，逐渐成为印度次大陆的主导力量。[53]

俄罗斯帝国

当年帖木儿大帝指挥雄师横扫俄罗斯，莫斯科大公必是奉纳了真金白银，才换得帖木儿退兵，使领土未遭涂炭。他们对此讳莫如深，只言有神佑而得保周全。而由术赤系所建的金帐汗国则没有这般好运。金帐汗脱脱迷失不自量力，竟主动进攻帖木儿。帖木儿盛怒之下催动大军自南向北荡平金帐汗国的土地。在15世纪中叶[54]，金帐汗国分裂成数个小汗国：位于伏尔加河-卡马河交汇处的喀山汗国；位于里海之滨、伏尔加河入海口的阿斯特拉罕汗国；占据着乌拉尔山以南中央草原地带的游牧政权失必儿（Sibir）汗国[55]，其势力范围西起伏尔加河东岸，东到西伯利亚的额尔齐斯河流域。

1547年，俄罗斯大公伊凡四世（“伊凡雷帝”，1533-1584年在位）加冕为俄罗斯第一任沙皇[56]。他宣称，俄罗斯人是拜占庭正教的正宗传人，而俄罗斯帝国则继承东罗马帝国的正统。俄罗斯人早年即已介入喀山汗国的内部事务，他们在当地扶立起亲俄政府，打算兵不血刃地控制喀山。但后来喀山又一次发生政权更迭，亲俄的统治者被推翻，俄国人的如意算盘落空。伊凡雷帝于是令沙俄大军包围喀山城。1552年，沙俄占领喀山。[57]1556年，沙俄又攻灭阿斯特拉罕汗国，吞并其领土。

与此同时，诺盖帐的库楚汗于1563年率军击杀失必儿汗国的雅迪格尔汗，占领了乌拉尔山以东的草原地带，成为失必儿汗国的新主人。之前，失必儿汗国在名义上是伊凡雷帝的附庸。库楚汗在得胜之后立即向沙俄遣使纳贡，表示愿意继续称臣。沙皇此时正全力投入利沃尼亚战争，无暇东顾，因此他没有政治干预失必儿汗国的政权更迭。但是，他却授予一个私人家族——斯特罗甘诺夫家族在乌拉尔地区东部建立据点的权力，并准许其雇用哥萨克兵守卫这些据点。后来，斯特罗甘诺夫家族又在西西伯利亚地区发现银矿和铁矿。于是，他们请求继续向东扩展其势力范围，得到了沙皇的批准。斯特罗甘诺夫家族雇用了一队由五六百名哥萨克人组成的佣兵队，委派叶尔马克·季莫费耶维奇统领，开始向西伯利亚地区扩张。1581年9月1日，840名[58]以火枪全副武装的哥萨克人进攻库楚汗，击败他的军队。1583年10月25日，叶尔马克率部攻下失必儿汗国首都失必儿[59]。库楚汗向南撤回到诺盖帐之前驻牧的故地，整饬残部，卷土重来。叶尔马克上书伊凡雷帝，请求增援。伊凡立即做出回应，拨出资金，并派遣500人马前来增援。库楚汗率军北上，与前来应敌的俄军遭遇。库楚汗突袭俄军，俄军大败，叶尔马克被杀。

尽管遭此一败，但前失必儿汗国的土地仍然在俄罗斯人的控制之下。1587年，俄罗斯人在额尔齐斯河流域建起托博尔斯克（就在当时已被毁弃的失必儿城旁近）和塔拉（Tara）城。1598年，俄军出兵击败库楚汗。其后不久，库楚汗被诺盖人杀死。他的汗国最终被沙俄吞并。[60]

灭掉失必儿汗国以后，沙俄扫清了其东进的最大障碍。沙俄向东方扩张的动力主要是巨大的商业利益，尤其是皮毛贸易的厚利。另外，俄罗斯人本是生活在森林中，或森林-草原混交地带的民族，他们向东占领中央欧亚北部的草原地带，可以在本土与强大的草原民族之间建立缓冲地带，避免其本土直接暴露在游牧铁骑的兵锋之下。[61]俄罗斯人充分利用西伯利亚地区密布的大河及其支流，走水路继续向东推进。他们沿勒拿河进入西伯利亚东北部，于1632年在当地建雅库茨克城，然后再转而东进，到达太平洋沿岸地区，于1647年在当地建立第一个俄罗斯人定居点——鄂霍次克城。[62]沙俄还从贝加尔湖一带向东侵入阿穆尔河（黑龙江）流域。在阿穆尔河上游南转河曲地带，当地人建有阿尔巴津城（即雅克萨城）。1651年，俄国人侵入当地，攻陷该城。他们在该城筑建防御工事，并以此为据点殖民。这片地区当时已在清朝的势力范围之内。之前早在1641年和1643年，皇太极就曾两次派兵征服这里。[63]清朝全力阻挡沙俄的东进。在外交交涉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清朝终于在1685年出兵攻下雅克萨。1689年，沙俄与清政府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被迫将雅克萨归还清朝，[64]但获得了与清朝通商贸易的许可，并继续保有其在太平洋沿岸鄂霍次克的殖民据点。

另一方面，沙俄也在往西北方向扩张，侵入波罗的海东岸芬兰语族诸部的领地。1703年，彼得大帝（1672-1725年；1682/1696-1725年在位）[65]在波罗的海之滨击败瑞典人，为沙俄夺取向西面的出海口。他在当地兴建圣彼得堡，并迁都于此。在波罗的海立稳脚跟之后，彼得大帝即下令建造一支庞大的舰队。1714年，沙俄凭借这支舰队击败强大的瑞典海军，获得波罗的海的霸权。[66]1769-1770年，沙俄分别在陆上和海上双线击败奥斯曼帝国，最终在1783年将克里米亚收入版图。[67]由此，沙俄将其边界向南推进到了黑海沿岸。[68]沙俄的黑海舰队应运而生，其基地在第聂伯河入黑海的海口港城赫尔松（Kherson，今属乌克兰）。

至此，俄罗斯人已经在黑海、波罗的海、北冰洋和鄂霍次克海四个方向获得了出海口，他们下一步的扩张将向南转向高加索地区和中央欧

亚草原地带。

清帝国

1616年，女真首领努尔哈赤（1559-1626年）在赫图阿拉建立政权。其国号远承当年女真人所建之金朝，称“金”，史称后金。1618年，后金攻取明朝的辽东。1625年，迁都谋克敦（满语“Mukden”，汉语称“盛京”；今沈阳）。努尔哈赤死后，其子皇太极（1592-1643年）继位。他于1635年下令改族名为“满洲”（Manju）。此名显然是脱自佛教中象征智慧的文殊菩萨之名（Manju）。[69]年，皇太极又下令改国号金为“清”。

另一方面，明朝的统治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同样在1636年，李自成率义军攻陷明朝都城北京。明朝总兵吴三桂向清朝“乞师”平叛，引清军入关。清朝摄政王多尔衮率军于1644年击败义军，克复北京。此刻，他发现明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已经土崩瓦解，于是决定继续用兵关内，逐鹿中原。到1662年，清朝基本统一了中国大陆地区。[70]

清朝入关以后，积极学习中原文化，在治国理政方面尤其如此。这点极像其先祖金朝女真人，而不似元代蒙古人。[71]尽管满洲统治者通常不允许汉族官员在政府中位列最高，但很多汉族官员可以出任总督或巡抚一级的地方最高长官。在元代，元朝治下的“中国”和“整个蒙古汗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清朝也有类似的区分。但与元代不同的是，无论满人还是汉人都将清朝看作整个帝国的统治者。当然，清朝也通过联姻、接受朝贡称臣、宗教整合等手段巩固它们与中央欧亚民族的关系。中央欧亚各民族的领地大都没有被纳入清朝在中原地区的行省制体系中。当然，新疆地区是一个例外，但发生较晚。清朝末年（1884年），中央政府在此设立新疆行省。满、汉两族在清朝迅速、彻底地融合，形成一个强大的满汉政权。[72]

清朝早期英主辈出。在他们的统治下，中国的人口迅速增长。通过对中央欧亚地区的征服，清朝的疆域不断扩大。一如当年经陆路来到元朝的欧洲人一样，在明末清初经海路到达中国的第一批欧洲人也被当时中国繁荣的景象和高度发达的文明震撼。他们深信，当时中国文明的发达程度远超欧洲。实际上，此时欧洲人早已拥有一些远为先进的技术。康熙皇帝不愧是有清一代最圣明的君主，他很快意识到这点，即开始招揽一些欧洲人入朝。尤其是在17、18世纪将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数理天文

学知识引入中国的耶稣会士，更得皇帝青睐。[73]后来，清朝的统治开始衰落之时，正当欧洲列强在亚洲扩张势力之际，清朝不得不面对欧洲列强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威胁。

准噶尔汗国

随着沙皇俄国击溃诺盖帐失必儿汗国，原役属于其下的西蒙古（或称卫拉特[74]）诸部重获独立，并开始进入失必儿汗国故地游牧。1591年，沙俄准许他们在塔拉等沙俄在西伯利亚的城市通商贸易，并免征其税。1606年，即有一些卫拉特人来到塔拉进行贸易。1607-1608年间，一些西部卫拉特部落首领陆续向俄国沙皇正式称臣，请求沙皇出兵对付他们的敌人——哈萨克人和东蒙古人。但从1608-1609年开始，一个卫拉特部落联盟开始成形。准噶尔部首领哈喇忽剌（1634/1635年卒）逐渐在这一新兴的部落联盟中树立威信，成为领袖。他是明代瓦剌部可汗也先（Esen　Taiši，也称“也先太子”，1443-1454年在位，1453-1454年称汗）的后人。也先曾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统一西蒙古诸部。[75]此时，俄国国内正在经历政治动荡，史称“混乱时期”，无力东顾，卫拉特诸部领袖于是不再西向称臣。数年以后，俄国国民议会选立米哈伊尔·罗曼诺夫为新沙皇，开启罗曼诺夫王朝，结束了“混乱时期”。其间，沙俄派出哥萨克部队进攻卫拉特诸部，卫拉特人被迫向南撤退。是岁，严冬苦寒，暴雪为灾，东蒙古人又乘机大肆入侵，吞并大片牧地。卫拉特人不得不再度向沙俄称臣，寻求庇护。但是俄国人却没有出兵助他们抵挡东蒙古人的攻势。于是到1623年，卫拉特诸部已经再度脱离沙俄。当年，卫拉特诸部结成联军，由和硕特部首领拜巴噶斯（Baibaghas）汗领导。卫拉特联军进攻东蒙古，小有胜绩。此时，有土尔扈特部等数部卫拉特人坚决反对建立统一的政权。他们西迁远走，先到达伏尔加河下游一带，再进入北高加索草原游牧。在那里，他们向俄国沙皇称臣纳贡。其余的卫拉特诸部于1628-1629年再度组成联军进攻东蒙古，取得大胜，夺回其先前在准噶尔盆地和天山地区的牧场。

1630年，卫拉特诸部的共主拜巴噶斯汗被杀，同出自和硕特部的固始汗（1655年卒）继立。他将女儿嫁给哈喇忽剌的世子巴图尔珲台吉（Baatur　Khungtaiji，1634-1653年在位），如此两家通过联姻结盟。1634年，哈喇忽剌自立为汗。但因为他并非出自黄金家族，他的这一举动遭到蒙古各部的强烈反对，于次年被杀。[76]哈喇忽剌称汗被杀之事似乎并没有动摇两家的联盟关系。1634-1635年，固始汗[77]还与继哈

喇忽剌而立的巴图尔珲台吉合兵出征哈萨克诸部。[78]但固始汗出身黄金家族，有他在一日，巴图尔珲台吉便难以领导群雄，准噶尔部也无出头之日。林丹汗的后人朝克图台吉（Coghtu Taiji，即却图汗）之前曾进攻多处格鲁派寺庙，今次，他又派其子领大军进攻拉萨。五世达赖喇嘛向固始汗求救。1636年，固始汗率领10万大军远征朝克图台吉，[79]并于1637年初大败之。同年，他遣使觐见清朝皇帝。[80]1642年，五世达赖喇嘛以其护教之功，加冕其为西藏之汗。[81]

1634年林丹汗死后，漠南蒙古各部全部归顺后金。1635年，满洲人在漠南蒙古各部驻牧之地设立旗盟，是为今日内蒙古之前身。[82]但当时满洲人尚未入关。1662年清军消灭南明永历政权之前[83]，清朝的政治重心都在中原内地。而对于中央欧亚，他们几乎在各项事务上都采取绥靖和不干涉的策略。

中央欧亚地区包括跨洲贸易在内的各种经济活动在准噶尔帝国的经营下再度繁荣起来。[84]1641年，巴图尔珲台吉与俄国人修好，获得了在托博尔斯克、塔拉和托木斯克（Tomsk）免税自由贸易的许可。这些城市因为贸易而繁荣，并吸引着来自中亚伊斯兰世界的布哈拉商人前来做转手贸易。[85]巴图尔珲台吉在位于亚梅什（Yamish）湖与额尔齐斯河之间的和布克赛尔（Kubak Zar）修建起一座带有防御工事的小型王宫加寺庙，作为其都城。他还新建了其他几座城市，并从中亚地区迁徙农民到城市附近定居，开荒种田。准噶尔汗国的都城逐渐发展成为一座东西方商人往来交会的商贸中心。马匹、来自中原的商品、奴隶、金属、纺织物、玻璃等各色商品汇集于此交易，再流向四方。亚梅什湖周围一带成为西伯利亚地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一直到1689年恰克图（Kiakhta）被指定为中国边贸中心，这里才逐渐被取代。[86]巴图尔珲台吉一生武功卓绝。他在1653年去世，其子僧格（Sengge）继位。巴图尔珲台吉的其余诸子与僧格之间争斗不断。僧格与沙俄的关系也不断恶化。[87]准噶尔汗国内有兄弟阋墙，外有劲敌环伺，元气大伤。1670年，僧格被其兄杀害。僧格弟噶尔丹本已在西藏的寺庙中出家为僧，闻其兄被杀后，还俗回归本部。他处决了杀害僧格之人。1676年或1677年，他率军击杀和硕特部可汗（同时也是他的岳父）。随后，他又平定了叛乱，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并与沙俄重修于好。[88]至此，准噶尔部统一卫拉特诸部，建立起一个草原帝国。这是在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之后草原地区兴起的第一个大型政权。

贯穿欧亚的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并非仅仅发生在西欧，而是贯穿了整个欧亚大陆。在这期间，中央欧亚的艺术和文化在许多方面都达到了其历史上的顶峰。欧洲人在艺术、建筑和音乐方面取得的成就已广为世人所知，但伊斯兰世界（尤其是中亚西部、波斯和北印度）和佛教世界（尤其是西藏地区）在相应领域中的成就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

伊斯兰世界的文艺复兴开始于帖木儿时代。当时，哈菲兹的作品达到了波斯语诗歌史上的巅峰。比塞特（Bihzad，约1450/1460-约1535年）则是伊斯兰细密画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师。他和赫拉特帖木儿画派的一众画师将伊斯兰细密画的创作推向高潮。伊斯玛仪大力支持艺术事业，尤其是细密画和建筑。1522年，他将比塞特从赫拉特请到大不里士。比塞特带来帖木儿画派的细密画画法，并培养出一代年轻的画师。他们共同创造了一批堪称伊斯兰艺术史上最伟大的细密画的作品。塔赫马斯普同样支持伊斯兰细密画、文学和书籍的创作。阿拔斯大帝治下最伟大的艺术成就则是其在伊朗中南部地区新建的国都伊斯法罕。该城的形制完全仿照帖木儿式城市——以宏伟的公共广场［或称“麦丹”（maidân）］为城市中心，精美的清真寺、巴扎和宫殿环绕四周。

波斯化的帖木儿式建筑风格在伊斯法罕精致的建筑杰作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而奥斯曼人则将伊斯兰和拜占庭两派建筑风格融合，在帝国境内建造出宏伟的清真寺和其他标志性建筑。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修士教团大量涌现。随之而来的则是大量修院或哈纳卡（khânqâ）的兴建。随着托钵云游僧的增多和去往圣人墓朝圣活动的流行，大车店（caravanserais）应运而生，圣人墓也被扩建和翻修。

在莫卧儿帝国，阿克巴大帝曾在德里等一众城市大兴土木，但他最伟大的手笔却在阿格拉。阿格拉是阿克巴漫长的统治生涯中使用过的四大都城之一。后来，它成为莫卧儿帝国的首都。阿克巴及其后继立的君主（贾汗吉尔和沙贾汗）治下所创造的艺术品反映了他致力于将伊斯兰教和印度教艺术融而为一的努力。莫卧儿化帖木儿式建筑（或称波斯-莫卧儿式建筑）艺术在阿克巴之孙沙贾汗时代达到巅峰。沙贾汗为其爱妻穆塔兹·玛哈尔所修建的陵寝——泰姬陵（Taj Mahal，意为“玛哈尔之

冠”）堪称此类建筑中首屈一指的代表作。在许多建筑史学家看来，泰姬陵完美绝伦，堪称世界纪念建筑物（monumental building）中的翘楚。莫卧儿王朝推动了整个北印度地区艺术的繁荣。许多莫卧儿时代的建筑、绘画、文学和音乐作品一直留存至今。

随着藏传佛教格鲁派在中央欧亚东部的西藏、蒙古、突厥和满语诸语族佛教人口中确立主导地位，一场文化上的复兴也随之发生。来自西藏、蒙古、图瓦、中原以及周边地区的佛学大师以古典藏文（Classical Tibetan）创作出大量佛学等题材的文献。当时，藏文之于高地亚洲（High Asia）一如中世纪拉丁语之于欧洲一般重要。西藏的画师创造出独一无二的藏式画法，绘制了一批世间一流的庄严画作[89]。西藏的建筑师们也建起一座座高耸的建筑。其中最著名者当属拉萨的布达拉宫，堪称世间罕有的建筑杰作。

---

[1]汉译引自邢秉顺译《哈菲兹抒情诗十一首》，张鸿年编选《波斯古代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289页。——译者注

[2]中央欧亚民族对欧亚大陆的第一波全面征服由早期印欧人完成，参看本书第一章。

[3]此时，俄罗斯也以奥伦堡（Orenburg）为中心，沿草原地带设置一系列要塞。这些要塞既是军事防御设施，也服务于商业，反映了其与亚洲方面通商的野心，“尤其是与布哈拉汗国”（Levi 2007b，105页起）。

[4]“在多数情况下，葡萄牙人通过与当地政权谈判获得建立贸易据点（factory）或要塞的许可。”但也有例外的情况，最著名的一例发生在印度古吉拉特。葡萄牙人与古吉拉特当地人一直处于敌对状态，直到1535年，葡萄牙人才终于通过武力获得许可，在第乌（Diu）建造一座要塞。（Russel-Wood 1998:21）。

[5]瓦斯科·达·伽马全靠穆斯林引航员阿合马·伊本·马吉德引航，才能成功横渡印度洋（Russel-Wood 1998:18）。

[6]关于奥斯曼人的起源，学界存在很大争议。当下学界主流观点，可参看Kafadar（1995）、Lindner（2005）以及Lowry（2003）。奥斯曼人最初应当是一个中央欧亚型的领主-私兵组织。

[7]土库曼人同样是乌古斯突厥人，在语言和族属上与奥斯曼人相近。

[8]Matthee（1999:10）。

[9]还有其他国家曾零星获得一些海外殖民地。例如，丹麦自17世纪起就在印度东南海岸的特兰奎巴获得殖民地，也曾在美洲和非洲等地短暂获得一些殖民地。这些例子也可以证明笔者的观点。

[10]比如瑞典就曾在历史上通过海路称霸。那里是罗斯维京人的故地。后来瑞典人一直称霸波罗的海沿岸长达数个世纪。

[11]奥斯曼人获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对降人的宽待。尤其他们政治清明的名声使得许多拜占庭治下的民众闻风归降，希望他们能够取代拜占庭暴虐的统治。

[12]1204年，拜占庭皇族的一支在今土耳其特拉布宗建国，割据安纳托利亚黑海南岸一带，史称特拉布宗王国。——译者注

[13]本段内容主要依据Bosworth等（1995）。

[14]据说他们曾公开宣称萨法维教团领袖即为真主，领袖之子为真主之子（Savory et al.1995:767）。

[15]在讨论萨法维势力的三大要素时，萨佛利等人（Savory et al.1995:767）指出："萨法维教团的成员无条件地服从教团领袖的领导，教团领袖就是他们的精神导师。"

[16]这一事件为后来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埋下伏笔，因为在当时的波斯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大部分穆斯林属于逊尼派。

[17]Mathee（1999:7）一文指出，"萨法维王朝的丝绸贸易总是与政府有关……直至灭亡，国家仍在丝绸的收集、销售、国内制造和分销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家控制可以很好地解释波斯经济直到现代的稳步衰退。其文化衰退显然还有其他原因。

[18]Savory et al.（1995）。

[19]本节内容主要依据Richards（1993）。

[20]参看达·伽马的日记，http://www.fordham.edu/halsall/mod/1497degama.html。

[21]葡萄牙历史学家费尔南奥·洛佩斯·德卡斯坦埃达（Fernão Lopes de Castanheda）所著《印度的发现与征服史》的第2卷第6章第3节的大部分篇幅是原文摘引当时葡萄牙探险家用葡萄牙语所记的真实经历，参看http://www.columbia.edu/itc/mealac/pritchett/oogenerallinks/kerr/volo2chapo6secto3.html。此书最初于1552-1554年在科因布拉刊行，并于1582年首次译成英文刊行（http://www.columbia.edu/itc/mealac/pritchett/oogenerallinks/kerr/volo2chapo6secto1.html）。

[22]Wills（1998:343）。

[23]具体贸易之物详见下一节。

[24]例如葡萄牙传教士在日本激进的传教策略最终导致了日本地方统治者对于葡萄牙人的敌对态度。

[25]Russel-Wood（1998:21）。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荷兰、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列强在对待亚洲原住民时表现得相当克制。这与他们之间在亚洲和欧洲本土一言不合便刀枪相向的表现形成鲜明的对比。

[26]Russel-Wood（1998:21）；Pearson（1987:31页起）。后者常将葡萄牙人刻画为肆意开火的侵略者。比如他曾写道："有一个大的港口城市第乌在1535年被（葡萄牙人）强占。"但就在下一段，他又写道："第乌、勃生和达曼三地通过条约获得。"（Pearson 1987:32）——作者注 皮尔森（Pearson）的书写在作者看来前后矛盾，但对于很多亚洲读者来说，似乎并无抵牾之处。西方列强先以武力占地开埠，再签订不平等条约坐实，直至晚近，贯如此。——译者注

[28]读者可以设想这样的场景：艘印度商船在1498年开进了里斯本港，欲与当地葡萄牙人交易杂七杂八的物件；船上的水手毫不避讳自己是穆斯林，并要在当地寻找穆斯林兄弟。这会在当地引起怎样番乱象？

[29]Pearson（1987:29）。

[30]尽管有葡萄牙皇家政府的参与，但葡萄牙船队开往印度主要也为商贸之利所驱使。

[31]马特（Matthee 1999:9）指出："近代早期欧洲在政治和文化上对亚洲的影响微乎其微。在萨法维王朝治下的伊朗如是，在中国和日本亦如是。"

[32]皮尔森（Pearson 1987）认为葡萄牙人的成就在历史上无足轻重，此观点待商榷，参看注释86。

[33]马特（Matthee 1999:9-10）在讨论近代以前的亚洲时写道："印度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

了人们可以从沿海地区各处轻易进入其内地。而伊朗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伊朗没有绵长的海岸线，人们只能从其南岸诸港登陆。而南岸诸港与其都城及腹地之间尚有一片纵深达到1000千米的半荒漠和高山。伊朗的情况与锡兰和东南亚各地也不相同。在这些地方，包括印度尼西亚群岛，众小邦林立，政治分散，欧洲人很容易在当地找到立足点。而伊朗的政权则是中央集权制，或者说，该政权至少有中央权力结构。”葡萄牙人及后来的欧洲列强确实插手当地事务，后来也大都侵占了港口周边的土地。但欧洲列强的势力真正渗入印度内地则已经是在莫卧儿帝国衰落以后了。当时距离葡萄牙人最初在印度沿岸建立贸易据点已经过去了两个世纪。亚洲其他地区的情况皆与印度雷同。

[34]上述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历史主要依据Pearson（1987:30页起）。

[35]这也可能与商业周期有关，因此实际上是经济衰退的迹象，而不是复苏，正如皮尔森（Pearson）所描述的。

[36]皮尔森（Pearson 1987:41）指出，即使算上“缩水、损耗、沉船、运费”以及“在马六甲各地建立据点的成本”，葡萄牙人在里斯本贩出货物的利润仍然高达九成。据其他学者的统计，利润甚至可能高过九成。

[37]关于这种广为流传的谬说（一如将电脑和手机看作现代的“奢侈品”），参看注释87。

[38]譬如上引Pearson（1987）。

[39]这并不是说当时欧洲各国政府要好得多，尽管在亚洲，法律规则常常朝令夕改。

[40]Matthee（1999:6）。

[41]“在16世纪，印度次大陆上各主要政权无一在海上贸易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北印度，正在衰落的德里苏丹国洛迪王朝和新兴的莫卧儿帝国都完全是大陆国家。莫卧儿帝国岁入的大宗是其在土地上征得的税……只有约5%来自海关关税……政府收入的来源显然是土地。”（Pearson 1987:26-27。）

[42]Pearson（1987:26-27）。

[43]Pearson（1987:45页起）。

[44]俄罗斯帝国在陆地上的扩张的过程本质上也如此。他们最初是丝绸之路贸易体系中的一环（如在基辅罗斯汗国时期），后来通过由哥萨克人承担的皮毛贸易转型。他们沿横贯西伯利亚的商路修建城堡，一路修到太平洋之滨。最终，俄罗斯帝国转型成为一个属于海上贸易系统的欧洲列强。

[45]Wakeman（1985，I：2-6）。他同时也指出，大量白银能够涌入中国的一个原因是白银在中国很值钱。

[46]与此同时，欧洲人的商船也将上述亚洲地区彼此联系起来。但奇怪的是，直到近代以前，这些地区间的交流没有因为这种联系的建立而变得更加密切。

[47]Russel-Wood（1998:133）。

[48]http://www.city.nagasaki.nagasaki.jp/dejima/en/history/contents/index001.html.葡萄牙人从何处购得活老虎？日本人买老虎又有何用呢？

[49]Russell-Wood（1998:135）。

[50]关于西方科学在亚洲传播的过程，以及现代主义者反对西方学者研究亚洲的反智主义运动，参看注释88。

[51]Richards（1993）。

[52]即今印度泰米尔邦金奈（Chennai），旧称马德拉斯。——译者注

[53]此节关于莫卧儿王朝历史的内容主要依据Richards（1993）。

[54]Golden（1992:317-330）。

[55]今日也译作西伯利亚汗国。俄语称西伯利亚为Sibir；英文中之Siberia亦源于此词。——译者注

[56]沙皇（Czar）一词源自“恺撒”（Caesar），意即“皇帝”。——译者注

[57]Perdue（2005:81）。

[58]Perdue（2005:86）。

[59]此地古名为失必儿，近代以来又有许多别称。

[60]本节以上内容主要依据Hosking（2001）、Perdue（2005）以及Bergholz（1993）。

[61]Bergholz（1993:27）。

[62]1647年，哥萨克军在当地建起一个冬营；两年后，他们在营地扎寨（GSE 19:116）。关于鄂霍次克的建立时间，其他还有1647年说（Perdue 2005:95）、1648年说（Hosking 2001:143）、1649年说（Perdue 2005:87）以及1650年说（Bergholz 1993:27）。笔者取《苏维埃大百科》（GSE）之1647年说。据Spence（2002:151），涅尔琴斯克（即尼布楚）建于1658年，而阿尔巴津建于1665年。

[63]Bergholz（1993:123-127）。

[64]后来在1860年，中俄签订《北京条约》，沙俄从清政府手中割占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土，其疆域直达朝鲜半岛的东北角（Fletcher 1978:347）。中俄《北京条约》奠定了今日中俄两国从蒙古以东直到太平洋之间的边界线。中国东北以东被沙俄割去领土即今日俄罗斯之滨海边疆区（Primorskiy Kray），或简称“滨海”，参看第十章。

[65]Millar（2003:1168）。

[66]Hosking（2001:186-187）。

[67]此前，克里米亚汗国一直向奥斯曼苏丹称臣，在奥斯曼帝国的势力范围内。——译者注

[68]Hosking（2001:231）。

[69]关于满洲人皈依佛教及其新族名“满洲”，参看注释89。

[70]郑成功1662年（作者作1622年，误）从荷兰人手中夺得台湾。此后，他保明朝皇室一脉割据岛上。其后数十年，郑氏屡屡出兵，“敢向东南争半壁”。1683年，清朝终于收复台湾（Struve 1984:256页注释99）。清政府在台湾岛以满、汉二体勒石记功，立碑数处，至今尚存。

[71]金朝女真人和清朝满洲人对中原文化的积极接受与蒙古语族、突厥语族各民族以及吐蕃（西藏）人对中原文化的排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女真（满洲）人本非草原民族，他们生活在中央欧亚文化的东部边缘。相比上述民族，他们更加依赖农业。这或许可以解释女真人对中原文化的积极接受。

[72]作者用“满汉”（Manchu-Chinese）一词表示清朝的统治阶级。显然，作者认为在满汉相互融合的背景下，清朝的统治民族已不能单以满人来概括，而应是“满汉”——汉化的满人和满化的汉人融合形成的一个新阶层。——译者注

[73]其实早在16世纪的明代，耶稣会士就曾在科学领域对中国产生极大的影响，其中最著名者当属利玛窦（Matteo Ricci）。

[74]Oirat，即西蒙古。元代作斡亦剌惕，明代作瓦剌，清代作卫拉特或厄鲁特。译者将按原文所述时代酌情给出此词对应译名。——译者注

[75]在也先治下，瓦剌部在极盛之时曾控制“东起兀良哈和女真诸部、西到哈密的广大地域”（Perdue 2005:59）。

[76]其先辈也先同样没有黄金家族血统。当年也先称汗之后，也惨遭攻杀。

[77]Ahmed（1970:187）。

[78]本节以上内容主要依据Perdue（2005:101-107）。

[79]Perdue（2005:105）。

[80]Bergholz（1993:48）。

[81]Atwood（2004:550，633）。

[82]Di Cosmo and Bao（2003:14）。最初一个旗有300人，分有牧地和银钱。

[83]Struve（1988:710）。

[84]Gommans（2007:46-47）指出，出自伏尔加河流域土尔扈特部（卡尔梅克）的马最远可以被贩卖到中国北方的呼和浩特。

[85]Perdue（2005:106）注意到，准噶尔人用马、牛、羊皮和皮草来换取布、皮革、丝绸、白银、海象牙以及金属制成的手工制品。

[86]Perdue（2005:106-107）。

[87]Bergholz（1993:60-61）。

[88]Perdue（2005:108-109），Bergholz（1993:66-67）。

[89]这些画作（参看Combs 2006）的艺术性普遍被藏学家们忽视。他们只对其中透露的其他信息感兴趣，却无视作品的美。西藏的音乐和文学也常被如此对待。

第十章　丝绸之路断绝

远离他们。看那悠悠岁月附身

在天的阳台上，穿着过时衣裙；

从水底冒出了笑盈盈的惋惜；

垂死的太阳已在桥拱下睡熟，

仿佛拖在东方的长长的尸衣，

听，亲爱的，听温柔的夜的脚步。

——夏尔·波德莱尔，《沉思》

（*Recueillement*）[1]

周边帝国对中央欧亚的征服与瓜分

中央欧亚草原上最后一个大国——准噶尔汗国在建立伊始，即陷入沙俄、清朝两大强邻的夹击中。1689年中俄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实际上是两国瓜分中央欧亚的协议。1756-1757年，清军将准噶尔部民众屠杀殆尽。准噶尔部作为一个民族的历史至此完结。到18世纪，清朝完成了对中央欧亚东部的征服，将东部草原地带、新疆和西藏先后纳入版图。在19世纪，沙俄先吞并高加索，又征服了中亚地区最后的几大汗国。蒙古和西藏并没有被清朝纳入行省制的体系中，仍保有一定程度的独立。而放眼整个中央欧亚地区，仅有阿富汗王国仍然保持完全的独立。它成为沙俄、清朝和英属印度三方之间的缓冲地带。

英国已成为海上的超级霸主。他们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包括印度大部、非洲许多地区、北美、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由于欧洲本土政治格局风云变幻，即使强大如英国者，也不能在大洋上建立起稳定排他的霸权。

在西欧列强的经营下，亚洲的海上贸易不论在体量上还是在价值上都迅猛增长。这导致人口、文化和技术等各种资源都在向港口城市转移。到19世纪，欧亚大陆的商业、财富和权力已经全面转移到海上贸易系统中；欧洲列强控制下的各港口城市规模不断增长，在经济和政治上也日益重要。即使在沙皇俄国亦如是。尽管沙俄在中央欧亚地区吞并了幅员辽阔的土地，但其首都仍然在波罗的海之滨。19世纪末期，沙俄在战略上最为重要的新城市是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该城濒临日本海，在历史上曾长期依赖海路补给。与沙俄不同，那些由中央欧亚民族建立的周边帝国则没能及时地适应这种转变，最终一个接一个走向覆灭。印度莫卧儿王朝被大英帝国吞并。萨法维王朝被阿富汗人攻灭之后，恺伽王朝又再度统一波斯。但此时波斯已经沦为被英、俄两强瓜分的半殖民地。西方列强也在晚清中国划分出各自的势力范围。欧亚大陆的经济已经从一个以陆上丝绸之路为主，以沿海航运为补充的大陆型经贸系统完全转型为一个纯粹的沿海型经贸系统。中央欧亚走向消亡。

清王朝对中央欧亚的征服

清王朝一心效法其先祖女真人建立金朝之伟业。但金朝最终亡于蒙古之教训历历在目。尽管早已时过境迁，满洲人依然对蒙古人心存忌惮。他们知道欲成霸业，必先要稳住蒙古，若能降服蒙古人则最佳。清王朝对待蒙古的政策是以联盟的形式将蒙古贵族纳入国家统治阶层中，而并非普通的统治-被统治关系。蒙古人彼时刚刚皈依佛教，是达赖喇嘛的狂热信众。满洲人于是也皈依了相同的藏传佛教部派，与蒙古人供奉同样的菩萨和护法神——文殊菩萨和玛哈噶拉（大黑天）。如前所述，他们甚至取“满洲”（Manju，即“文殊”）作本民族的新族名。[2]蒙古人一直尽力摆脱清的控制。但蒙古人各部之间相互攻伐不断，而新近入主中原的清实力极强，更兼清与沙俄又结成联盟，这些因素迫使蒙古人不得不向清就范。

到1679年10月，噶尔丹的准噶尔铁骑已经征服了整个南疆，兵锋直抵青海地区（当时为和硕特部驻牧之地）。噶尔丹致书清朝，扬言收回青海。[3]他还告知清朝皇帝，五世达赖喇嘛为其加尊号“博硕克图汗”（“天命之汗”）。尽管当时还没有将准噶尔部放在眼里，但对于清朝来说，这一称号意味着噶尔丹已经公开与清朝皇帝分庭抗礼。[4]在17世纪80年代，清与沙俄因为在阿穆尔河（黑龙江）流域的纷争几乎爆发大战。清军甚至在1684年和1686年先后两次进攻俄国人在阿穆尔河畔的雅克萨城。他们还要分心蒙古高原，巩固、加强其对蒙古诸部的控制。尽管清军在阿穆尔河一带兵强马壮，并不惧沙俄，但他们也知道准噶尔部已经与沙俄交好。

1687年，噶尔丹之弟因卷入了蒙古高原东蒙古各部的内讧，被喀尔喀部首领土谢图汗诛杀。噶尔丹率准噶尔铁骑出击，为弟复仇。准噶尔军深入蒙古高原，所向披靡，打败喀尔喀部。他们甚至攻入蒙古高原最重要的寺院——额尔德尼召（Erdeni Zuu，位于哈剌和林），并大肆劫掠。该寺住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是土谢图汗之弟，他声称自己与达赖喇嘛平级。噶尔丹曾在西藏寺庙出家，达赖喇嘛当时正是他的师父。或许正是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的言行惹怒了噶尔丹，致使他下令劫掠额尔德尼召。喀尔喀诸部在准噶尔大军的冲击下七零八落，分别向清朝、沙俄和准噶尔部的领地内逃窜。[5]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大破东蒙古之事引

起了清朝的注意，感到其在蒙古高原的势力受到了威胁。

次年，噶尔丹的准噶尔军又一次击败土谢图汗，[6]咄咄逼人。眼看准噶尔人即将入主蒙古高原，效法成吉思汗故事，称雄草原各部，清朝只能转与沙俄联手，扭转乾坤。俄国人也正想与清朝修好：一是因为其在远东地区势力尚弱，二是因为他们刚刚在家门口败给克里米亚鞑靼人。中俄双方一拍即合，皆大欢喜。两国在1689年8月29日签下《中俄尼布楚条约》，划定两国边界，定下严格的国际贸易规矩。[7]《中俄尼布楚条约》奠定了此后一直到19世纪中叶之前中俄两国关系的基础。

清王朝顺利从对俄战争中抽身，并解除了俄国与准噶尔部结盟的后顾之忧。此时，它终于将全部精力投入蒙古方面。土谢图汗及东蒙古诸部当时大都已经归降清朝，清朝开始将他们逐渐纳入旗人体制。[8]康熙帝（1662-1722年在位）正式要求达赖喇嘛调停准噶尔部和喀尔喀诸部之间的冲突。此事当然不会有结果，因为达赖喇嘛早在1682年就已经圆寂。当时西藏的主政者第悉（sdesrid）桑杰嘉措（Sangs-rgyasRgyamtsho，1705年卒）秘不发丧，[9]因此外界尚无人知晓。桑杰嘉措是西藏地区的实际统治者。他支持准噶尔部，希望他们能灭掉蒙古高原的喀尔喀诸部和青海的和硕特部。

此时，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即僧格之子）已长大成人，逐渐威胁到噶尔丹的统治。噶尔丹曾在1688年密谋杀之未遂。当他在蒙古高原远征喀尔喀诸部之时，策妄阿拉布坦出兵突袭哈密。噶尔丹大惊，赶忙引军西还。在1689-1690年，他都驻军在其故地，以防策妄阿拉布坦。但在1690年6月9日，噶尔丹再度带兵东征土谢图汗[10]。策妄阿拉布坦抓住机会控制了北疆地区。尽管噶尔丹的军事实力明显更为强大，但他此时却处在腹背受敌的不利位置。他曾向沙俄借兵求援，但沙俄之前已经与清朝签下合约，选择按兵不动。

尽管噶尔丹根本无意进军中原，且未尝与清朝发生过任何冲突，但当他率军沿克鲁伦河东进，再转东南向热河趋近时，还是被看作意图进攻北京。[11]实际上，噶尔丹的军队距离北京有十万八千里远，其间还隔着大片有清军驻防的满汉民众聚居之地，因此他绝没有进犯北京之野心。而他所处的位置反倒十分不利，极容易受到清军攻击。当时清朝的探子屡屡来报，言说噶尔丹孤军深入、易攻难守。面对这天赐良机，康熙决定出兵。他御驾亲征，率三路大军北上蒙古高原，进攻准噶尔部。显然，清朝出兵并非因为它真正受到了威胁，而是欲抓住机会先下手为

强。但是，康熙的亲征却没能得胜。8月，准噶尔部击败清军。9月，双方再战一场。此时，康熙已经因病先行返回北京。然而清朝却没有撤军，大批的清军还在被陆续派往前线。在清军的压力下，噶尔丹决定退兵。他承诺引军撤离清朝边境。康熙在表面上接受了和议，但心里欲擒杀噶尔丹而后快，在用兵上毫不放松。噶尔丹退兵神速，不及清军再有动作，已经远遁草原深处。康熙这才下令将疲劳远征的清朝大军撤回本部，恨恨作罢。

随后10年间，双方相安无事。然而和平只是一时之计，清朝正暗暗蓄力，决意再战准噶尔。[12]1696年，清政府已经为全线出击准噶尔部做好了战备。康熙皇帝再度御驾亲征，率领大军北上。1696年6月12日，清军的一翼在乌尔噶（Urga，今乌兰巴托）附近的昭莫多（Jao Modo）与准噶尔部遭遇，大破准噶尔部。噶尔丹率残部侥幸脱逃，其妻则在此役中被杀。[13]清朝大军马不停蹄，继续向西一路穷追噶尔丹。噶尔丹已众叛亲离，仅剩少量随从。1697年4月5日，噶尔丹终被杀害。[14]

虽然清朝除掉了噶尔丹，但准噶尔部仍然在中央欧亚称霸。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1697-1727年在位）继承了他的势力范围，统治着准噶尔汗国的核心区域，包括今日新疆之全境。

另一方面，西藏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康熙在征讨噶尔丹的过程中得知，五世达赖喇嘛早在1682年已经圆寂，其后西藏政局一直由桑杰嘉措一手把控。桑杰嘉措一直在背后支持噶尔丹。康熙不禁勃然大怒，但又无可奈何。其实桑杰嘉措早已找到转世灵童，并秘密对其施教。后来，在各方的压力之下，桑杰嘉措终于扶立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1683-1706年）。然而年轻的仓央嘉措擅长创作情歌，或因其天性多情，或因修持密宗之法，他常给外人留下多情放浪之印象。西藏宗教保守派对其作风日益不满。1705年，和硕特部拉藏汗在清廷的支持下率军攻占拉萨，废黜了仓央嘉措，另外扶立一位达赖喇嘛上位。和硕特部新立的达赖获得清朝认可，却遭到西藏人的反对。年轻的仓央嘉措被拉藏汗掳走。1706年，在被送往青海的路上，仓央嘉措离奇身死。同年，在西藏东部的理塘，一个男孩降生。他被认定是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清朝将这位灵童掳走，养在西宁。

与此同时，西藏方面转向准噶尔部求援兵以对付和硕特部。策妄阿拉布坦派其从弟策凌敦多布率军出征。策凌敦多布带领1万名准噶尔部

勇士翻越昆仑山天险，于1717年从西北方向进入青藏高原。后来，准噶尔军击败和硕特军，并击杀拉藏汗。

很明显，准噶尔人自视为达赖喇嘛的护法，[15]但他们对达赖所修的格鲁派过分狂热，甫一占领西藏，就大肆压迫其他教派，引发大规模的反抗。1717年11月30日，当年曾在日喀则出家为僧的策凌敦多布下令洗劫拉萨及其中寺院。1718年9月，清朝从西宁出兵前来救援，但还没靠近拉萨，就被准噶尔军迎头痛击。[16]

1720年春天，清朝再发一支大军开赴西藏。年轻的转世灵童也紧随大军入藏。准噶尔部没有迎战便撤出西藏，这使清军在1720年9月24日兵不血刃地开进拉萨。在清廷的扶立下，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1708-1757年）正式上位。[17]清廷不久后即在拉萨设立驻藏大臣。自此，除准噶尔汗国控制下的今新疆地区以外，清朝掌控了中央欧亚东部的全部地区。

1727年，策妄阿拉布坦去世，其子噶尔丹策零（1727-1745年在位）继立为准噶尔部首领。他励精图治，在1730年和1731年两次尝试将清朝的势力逐出蒙古高原，可惜均功败垂成，不得不在1739年再度与清朝议和。其后，他又剑指西边的哈萨克部，将其版图向西推进，希望与位于哈萨克部以西的土尔扈特部[18]联系上。准噶尔汗国的势力范围在噶尔丹策凌治下向中亚西部大幅度地扩张。

另一方面，准噶尔部在与清朝的和议中获得了通商贸易的许可，他们充分利用这一机会，赚得盆满钵盈。尽管准噶尔部获清朝批准的朝贡贸易使团应是隔年往来一次，但是清朝的边境官员在朝廷的授意下放松管理，因此准噶尔部的商队实际上每年都来。在准噶尔部的商队中，很大一部分商人既不是蒙古人也不是游牧民，而是来自南疆或更西地区的突厥穆斯林。这些商队中“大都是经验丰富的中亚商人。他们沿着丝绸之路古道转运着大宗的商品和货币。比如在1748年，在总共有136人的商队中，46人是蒙古人，而其他90人是缠头回（突厥穆斯林）。商队的4个头领中有3个是突厥人”[19]。至于一次朝贡贸易所涉及的商品数量则在下面的例子中可见一斑：1750年，准噶尔人“运来了有史以来最大宗的一批价值18.6万两白银的商品，带走了价值16.73万两白银的布匹和茶叶，以及银子”[20]。准噶尔人和随其而来的中亚商人们显然因此收获暴利。

如中央欧亚历史上其他的草原霸权一样，准噶尔人也热衷于促进贸易。为此，他们铸造自己的钱币来统一其治下南疆地区各小国五花八门的货币。[21]中央欧亚的经济在准噶尔汗国的治下蒸蒸日上，这种势头至少持续到18世纪中叶。[22]1745年噶尔丹策凌的去世和1750年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尔的去世都曾引发汗国内部的争位之战，但即使这样也没有影响到中央欧亚经济的繁荣。

然而持续的内乱终于让准噶尔汗国走向衰落。天花流行，天灾频降，使衰落的汗国雪上加霜。最终，汗国内部的分裂给了清朝机会。一支准噶尔人的首领阿睦尔撒纳向清朝投诚，言说只要清朝支持其称雄准噶尔部，他便率全体准噶尔人投降。清朝抓住这天赐良机，出两路军夹击准噶尔部。此时，准噶尔人内部已经四分五裂，而其盟友和属部如哈萨克诸部皆不为其所用。1755年，清军顷刻间瓦解准噶尔部，占领北疆地区。[23]其后，阿睦尔撒纳试图复国。他领导一部分准噶尔人起事反清。清朝出动大军，耗时两年也没能抓获他，乾隆帝因此大怒。在1756-1757年的寒冬，他下令屠灭准噶尔部。清军于是对准噶尔部展开血腥屠杀，消灭近半数人口，不分男女老幼。幸存的准噶尔部民众又大部分倒毙在天花或饥馑之下。最后，大约仅有一成人口逃出生天。幸存者多为妇孺，他们与之前已经降清的准部人口一起被迁徙离开准噶尔故地，被安置在其他忠于清朝的部族之中。阿睦尔撒纳势穷力孤，无力回天。1757年9月21日，他在托博尔斯克向沙俄求援的途中死于天花。[24]驻牧在伏尔加河畔的土尔扈特部（卡尔梅克）长期受沙俄的奴役。后来，一部分土尔扈特人摆脱沙俄统治，向东迁徙，归顺清朝。清朝对准噶尔部的屠杀和土尔扈特部（卡尔梅克）的东归标志着西蒙古人（卫拉特）的势力彻底瓦解。至此，草原游牧诸部皆被征服。

南疆地区的各个政权在准噶尔部被屠灭之后，又被笼罩在清朝的势力范围之下。他们曾试图效法准噶尔部，将清朝的势力赶出新疆，但终告失败。1759年，清朝在新疆地区建立起直接的统治。当年，清朝始在叶尔羌铸币，取代此前在新疆地区流通的准噶尔普尔钱。[25]但南疆地区之前蓬勃发展的经济已经出现凋敝。随着中央欧亚彻底被征服，历代草原帝国在过去2000年里苦心经营的经贸体系终将走向衰败。此后，不但新疆地区，甚至包括甘肃等邻近中央欧亚的西北诸省都不得不依靠内地富裕省份的财政收入来支持。[26]中央欧亚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崩坍已经开始。

欧洲从海上统治欧亚

清朝已将中央欧亚东部囊括进其版图中。在随后的一个世纪中，沙俄完成了对中亚西部地区的征服和殖民。另一方面，英国人取代了莫卧儿帝国，成为印度次大陆的主宰。欧亚大陆东部此时三足鼎立，三强之间，壁垒森严，中央欧亚则被彻底割裂。[27]尽管准噶尔汗国的覆灭之于中央欧亚丝绸之路经济不啻为一次沉重的打击，但却绝非致命的一击。彻底扼杀中央欧亚丝绸之路经济的是沙俄和清朝双方以《中俄尼布楚条约》（1689年）和《中俄恰克图界约》（1727年）为基础所建立起来的对国际贸易的严格管控和彻底垄断。

自1689年起，在沙俄或是清朝势力范围内的难民、流民和部民皆不得任意迁徙，须受该国政府管制。政府派人舆地绘图，守卫边境，并对边区部族展开民族调查，划分其族属，控制其流动。两大帝国以此二条约划分势力范围，对外管控跨境的人口流动，对内则镇压不服从政府安排的民众。[28]

两大帝国对边界的封闭、对国际贸易的严格管控以及对中央欧亚各政权的全面清剿使得中央欧亚的经济彻底崩溃。无论各地本地的经济活动，还是其通过丝绸之路与外地进行的经济活动都受到大幅度的影响。[29]这带来的后果就是中央欧亚，尤其是其中心地带——中亚，陷入极度的贫困，并在技术和文化的各个方面急速倒退。

由于周边帝国的经济繁荣也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国际贸易，而且此前它们与外界交往也主要通过陆路经由中央欧亚而实现，因此它们也受到了丝绸之路衰落的影响。但在此时，丝绸之路已经不是它们唯一的选择：一个新型的海上贸易体系正在迅猛发展。虽然清朝本身并不热衷于海上贸易，但它还是在与西班牙人的白银贸易中获益颇丰。俄国更是左右逢源。在西面，它控制了中亚，可以从那里直接获得东方的产品；在东边，它与清签订了贸易条约，因此可以直接获得东亚的商品；其领土四面的出海口则让它可以直接参与到新兴的海上贸易体系中。

亚洲大陆上这些强大的周边国家在海军装备和航海技术上都远逊于欧洲人，因此无法在海上战胜他们。此事倒不足为奇，或可归因于这些

国家起源于中央欧亚并一直以陆权为政治中心。但奇怪的是，它们似乎从未尝试去获得这些技术，甚至没有试着去雇一些欧洲人来帮助掌管它们的海上贸易。显然，这说明它们不单单是对海上贸易没兴趣，而且根本就没有理解海上贸易可能带来的巨大利益，因此它们没能充分利用其在陆上的权力来控制海上贸易并从中获利。[30]因此，西欧的海上强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可以在欧亚大陆东部的沿海地区随心所欲地占得或新开商埠港口、海军基地，从波斯湾沿岸一直到日本列岛。这些港口城市逐渐发展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大都市群。地中海沿岸则依然被意大利人和奥斯曼帝国控制。亚洲沿岸新兴各港和地中海沿岸各地共同构成了欧亚大陆的海上贸易体系。到19世纪，这个海上贸易体系已经成为欧亚大陆国际经贸的唯一形式。

日本·沿海地区全面主导欧亚大陆

在之前约两个世纪的光景中，欧亚大陆沿岸的海上贸易区已经从欧洲西北部扩展到东北亚。这片海上贸易区东扩的终点是日本列岛。在公元前1千纪，一群大陆上的移民由海路到达日本列岛，开始定居于此。他们与东北亚各邻近地区一直保持着贸易往来，尤其与朝鲜半岛的贸易最为频繁。后来，他们终于发展出克服洋流影响航行至中国甚至更远地区的航海技术。

1543年，几个葡萄牙商人随着一艘中国商船来到日本，成为第一批抵达日本的欧洲人。[31]此时的日本文明发达、人口众多，盛产丝绸、名刀等让欧洲人垂涎欲滴的商品。此后，欧洲人从中国带来了大量商品前来贸易，另外还带来了火器等不见于日本本土的稀奇物件。日本人在欧洲人到来以前就一直参与近海的海上贸易，因此他们对海外贸易丝毫不陌生，并乐于与欧洲人贸易。然而，随着欧洲人而来的除了商品以外，还有不太受日本人欢迎的基督教。

在第一批欧洲人来到日本后不久，就有葡萄牙的耶稣会士来日本传教。日本的一些割据势力也渐被基督教吸引。但耶稣会士狂热的传教活动后来却为他们带来了血光之灾。整个16世纪，日本都处在军阀混战的乱世中。16世纪90年代，将军丰臣秀吉再度统一日本的大部分地区。[32]1587年，他即下令打压基督教，勒令岛内的耶稣会士离开。但在当时，这项禁令还没有被严格推行。然而，基督教教士在日本的传教活动却毫不放松，尤其是一批初来乍到的西班牙方济各派教士甚至来到都城京都传教。后来又爆出西班牙政府有意将势力渗透到日本的传闻，这彻底激怒了丰臣秀吉，使他痛下杀手。1597年2月5日，包括方济各派教士、耶稣会士和日本本地信众在内的26位基督教徒被处以极刑。丰臣秀吉颁布法令，在日本禁断基督教。[33]1598年，丰臣秀吉在入侵朝鲜的战争（1592-1598年）中突然病逝。在随后爆发的权力争夺战中，德川家康（1542-1616年）占得了上风。他在1600年的关原之战中一战定江山。其后，分裂运动愈演愈烈，其背后有着基督教势力的强力支持。于是德川家光终于在1639年下令驱逐葡萄牙人，并中断与所有天主教国家的联系。1635年以后，私自出海的日本人可被处以极刑。日本几乎隔绝于世界。

尽管日本当时对欧洲人几乎完全封闭，但在长崎还有一个荷兰人经营的贸易口岸获准继续开放。这个口岸建在出岛之上，出岛正是为了对外贸易而建的一个人工岛。荷兰人是新教徒，因此得以保留此港。正是通过这个对外开放的窗口，欧洲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以及欧洲人对世界其他地方的认识，才得以传入日本。

日本闭关锁国的状态延续了两个多世纪，最终被美国人打破。有美国船只在日本附近沉没，美国欲请日本送还失事船只上的美国船员，但日本方面拒绝交涉；日本甚至连在美国附近海域失事的船只上的日本船员都不管。这种拒不合作的态度激怒了美国人。1853年，美国派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海军舰队杀进江户湾。1854年，日本人被迫与美国人签订不平等条约，向美国开放门户。在1854年和1855年，日本又被迫先后与英国和沙俄签订类似的不平等条约。[34]突然的门户开放使大量欧美人士涌入日本。他们带来新的观念和技术，冲击着日本的社会，由此引发了一场革命运动。1868年1月，一场政变推翻了幕府的统治，天皇再度掌权。德川幕府的大本营江户成为天皇的都城，并被重命名为东京。[35]明治天皇（1867-1912年在位）励精图治，日本开始走上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在短短不到40年的时间里，日本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建立起欧式的陆军和海军。1905年，日本的现代军队在日俄战争中亮剑，大败沙俄，震惊了世界。[36]

日本在19世纪迅速实现现代化、西方化，成为当时世界工业化强国中唯一的亚洲国家。它跻身欧美列强的行列中，与欧美列强一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导着世界的格局。日本能够快速崛起的原因有如下几点。首先，作为一个岛国，日本本身就属于海洋文化，对船只、大海以及海上贸易一直很熟悉。因此，与亚洲大陆上那些由中央欧亚民族建立的帝国不同，日本人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存在很大的障碍阻止他们向欧洲学习并发展其海上力量。其次，日本的识字率异常之高。这或可归因于其“寺院学校”的制度。最后，日本的闭关锁国政策在实践中尚有一个缺口——荷兰人在长崎的贸易口岸。日本人“向荷兰人学习”，翻译其书籍，将欧洲在科学方面取得的重要进步慢慢引入日本。

沿海城市的兴起

欧洲人建立的直达南亚、东南亚和东亚的航线彻底将西南亚洲绕过。波斯和近东各地在过去的2000年里一直控制着国际贸易商路，从中获利。在欧洲人开辟新航路之初，它们并没有太大的损失。在萨法维王朝早期，波斯仍然是一个强国。国际贸易曾经一度在阿巴斯港的英国和荷兰据点上繁荣异常。在1622年波斯联合英国人将葡萄牙人逐出霍尔木兹岛以后，波斯湾畔的弹丸之地阿巴斯港取而代之成为波斯最主要的港口。阿拔斯批准英国人和荷兰人在其上建立贸易据点。[37]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38]，欧洲人在波斯进行贸易并不赚钱。英国人在荷兰人的压力之下，率先撤离了波斯，将其据点转移到位于波斯湾尽头的深水港——巴士拉。巴士拉港由阿拉伯人在7世纪建成。在欧洲人开辟新航路之前，它曾是传统近海贸易线路西端最重要的货运终点之一。17世纪后半叶，荷兰击败英国，摧毁其在巴士拉的据点，完全控制了波斯湾。然而在18世纪初叶，随着萨法维王朝的衰落和波斯湾地区海盗的蜂起，荷兰往来波斯湾的货运也在逐渐减少。[39]

奥斯曼帝国和整个中东地区早已在文化、政治和经济等方面慢慢走向衰落。其南部各港已成一潭死水，只维系着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塞俄比亚和埃及等地区之间古已有之的点对点贸易。承载着巨大贸易体量的新兴海上贸易系统渐渐将经济衰退中的中东遗落。到18世纪末叶，波斯已经积弱不堪。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报告中称："今日之波斯比其往昔，判若云泥，诚可悲可叹。"[40]尽管巴士拉港在中东地区依然维持着其重要的地位，但它终未能发展成一座大型沿海城市。阿巴斯港则一蹶不振，陷入沉寂；波斯地区也没有其他港口兴起，以取代阿巴斯港之前的地位。尽管波斯有着绵长的海岸线，但它依然是一个面向内陆的大陆性国家，并在各个方面维持着保守、反动的特点。[41]

与中东沿海地区的历史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波斯以东的亚洲沿海地区则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波斯湾以东的各大海港城市在16世纪时还无一见于经传，或为后来新建，或本为渔村、小镇。即使是那些在当地传统的沿海贸易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的港口也规模不大。亚洲各帝国根本无暇理会这些港口，因此港口当地的统治者拥有很大程度的自治

权；卡利卡特等许多港口城市几乎都是独立的小王国。这一切在葡萄牙人控制东方航线以后的3个多世纪中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在19世纪末叶以前，亚洲沿海地区新兴的大城市或是由欧洲人新建，或是在欧洲人的影响下由小渔村发展而来，皆受益于日益繁荣的海上贸易，概莫能外。内陆城市日趋保守，成为保守、反动势力盘踞的重镇。而新兴的沿海城市则成为文化、技术交流的窗口，渐成亚洲地区政治、经济的中心。

印度

莫卧儿帝国在内陆的都城德里逐渐被人遗忘，落后于时代。当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总部孟买和后来英属印度的首都加尔各答都已超越德里。直到1911年，英国当局迁都德里，才促使当地复兴。

孟买港是印度次大陆西岸罕有的深水港，但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此地还名不见经传。1534年，葡萄牙人从古吉拉特苏丹手中获得印度西北沿岸从孟买到第乌的大片海岸。1661年，葡萄牙与英国签订条约，孟买作为葡萄牙公主卡特琳娜随嫁嫁妆的一部分，被送给新郎英王查理二世。[42]此后，英国大力发展当地的贸易。孟买城得益于此，后来一举成为西印度洋地区无可匹敌的第一都市。

加尔各答位于恒河三角洲，由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690年建成。10年之后，英国人又在此地筑威廉堡（Fort William）屯兵驻守。加尔各答逐渐成为英国在印度东部的经贸中心。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英国逐渐将其势力范围从沿海地区扩展到整个印度次大陆。1772年，加尔各答成为英属印度政府的首都。后来，它更发展成为印度第一大城市。

缅甸

在英国侵略之前，缅甸的几大都城——蒲甘（Pagán，在伊洛瓦底江畔，在曼德勒西南145千米处）、阿瓦（Ava，在曼德勒南数千米外）和曼德勒都位于缅甸北部，远离沿海地区各港口城市。仰光位于伊洛瓦底江口，此地原本只有孟人（Mon）的聚落。第一次英缅战争（1824-1826年）之后，它被英国占领。[43]1885年，英国人赢得第三次英缅战争的胜利，他们将缅甸首都迁至仰光。[44]尽管最初只是一座小型殖民地城市，但仰光很快就变成了缅甸经济和政治的中心，发展成为一座重要的大都市。

泰国

在东南亚各国中，泰国是唯一未被欧洲列强殖民或渗透的国家。这或许是因为泰国人及时地意识到了其所处的危险环境，并对其政治、经济环境所发生的变化做出了应对。泰国的都城本在大城府（Ayutthaya），距离海岸尚有100千米之遥（尽管此地有河流入海，小舟可通行）。1767年，缅甸人攻入大城府，将此城焚毁。后来，达信击败缅甸，光复泰国，将首都迁至昭披耶河畔的港口城市吞武里。吞武里距离海岸仅有20千米，远比大城府更便于进行海上贸易。[45]达信死后，拉玛一世成为泰国国王（1782-1809年在位）。他又迁都到昭披耶河对岸的曼谷。达信和拉玛一世两代君主及早地将国都迁到了沿海地区，这可能是泰国免于受到欧洲列强殖民最为关键的一步举措。[46]新都曼谷的人口和财富都不断增长，而故都大城府则彻底沦为一座乡间小镇，唯有残垣断壁还诉说着前朝的荣光。

马来半岛

新加坡原是一个仅有1000人的海滨小镇。1819年，英国政府派托马斯·莱福士来到此地，建立新加坡城。新加坡拥有天然良港，地理位置绝佳。它地处马来半岛南端、南中国海南缘，扼着马六甲海峡的入口，是向西通往印度洋的必经之路。[47]在欧洲人控制的航线上，它恰好处在中国和印度两地中间，因此，新加坡很快超越中、印之间的其他城市，成为首屈一指的商埠。

中国

到19世纪末，清朝的都城北京已经将其文化、经济中心的地位拱手让给了沿海地区的贸易港口城市。以“扶清灭洋”为宗旨的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方各地蓬勃发展。义和团被慈禧太后利用，被招引入北京。他们在清军的支持下，进攻外国使馆区。许多洋人和中国的基督教徒死在义和团的刀枪之下。1900年8月，外国列强组成的八国联军击败义和团和清军，一路杀入北京城，给北京城及沿途各地造成极大的破坏。[48]列强迫使清朝缴纳令人咋舌的巨额赔款，进一步加强了它们对中国的控制。各大国际化港口城市一片欣欣向荣，而北京则在官僚腐败、封建旧制和盲目排外中一步步衰落。清朝的都城依然沉睡在昨日，在中央欧亚的旧梦中不愿醒来。

到19世纪末，整个中国沿海地区都处在外国列强的势力范围之中。许多地方沦为外国的租界和殖民地，受某一国的直接管辖。1841-1842

年，英国夺得位于珠江口的香港岛。到世纪末，已有数十座沿海城市被迫向外国人开埠，其中最重要者非上海莫属。自1843年向西方殖民者开埠起，上海从一个乡下小镇逐渐发展成一个国际化大都会。这得益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它位于长江三角洲，正当南起广东，北达天津和日本的绵长海岸线的中间点。[49]列强在上海划定租借地，这些租借地就是其宗主国文化在中国的阵地。随着清朝的衰落，上海的规模和影响力都飞速地扩大。它很快成为中国的商贸和金融中心，并成为当时世界范围内最大的城市之一。中国和海外汉学家普遍认为，欧洲列强入侵中国导致在近代中国发生了权力向沿海地区的转移。此说不谬。但需要强调的是，是他们带来的国际贸易，而非他们的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促使沿海地区发展。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中，已有一批人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点，但他们的大声疾呼根本无法唤醒政府重视海上贸易；清政权对土地的重视根深蒂固，不可撼动。[50]

日本

历史悠久的都城京都坐落在日本西部关西地区，深处群山环抱之中。日本之前的都城也都在关西地区。在葡萄牙人前来日本通商半个世纪之后，德川幕府在位于关东地区的江户建立行政中心。后来，日本进入闭关锁国的时代，天皇所在的都城仍然是京都，但其事实上的行政中心则定在江户。此时，江户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大都市。1867年，就在日本的国门被美国人打开之后不久，德川幕府的统治终结。次年，江户正式成为日本的首都，改称东京。前德川家的城堡被用作天皇的皇宫。[51]京都降为陪都。尽管在规模上远小于东京，但京都在日本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以其丰富的历史遗迹、文化上的保守和政治上的自由而闻名。

俄国

1703年，彼得大帝刚从瑞典人手中夺取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便在当地建起一座新城——圣彼得堡。1712年，他下令迁都圣彼得堡。[52]在击败瑞典之后，俄国开始跻身欧洲海上强国之列。沙俄帝国的东界可达鄂霍次克海。鄂霍次克海因其旁近的港口小镇鄂霍次克得名。虽然此港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被海冰封冻，但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它都是俄国进出太平洋的最主要港口。[53]乌苏里江以东到太平洋的大片土地本在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中划定为中国领土，但沙俄在1858年又从清朝手中夺走这片领土，使之成为俄国之滨海边疆区。[54]1860

年，沙俄在滨海边疆区之最南端海参崴之地始建符拉迪沃斯托克城。其地南临日本海，靠近朝鲜半岛和中国。[55]符拉迪沃斯托克发展迅速，到1880年已经达到市一级规模。在1903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全线贯通之后，它发展成为一个生机勃勃的大城市，成为俄国进出太平洋的门户。[56]

丝绸之路系统与海上贸易系统

在大陆上，基于陆路运输的国际贸易系统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尽管通过海路进行的国际贸易也出现得很早，但在青铜时代以前，这种方式还仅仅限于短途近海贸易。到青铜时代，海上贸易的范围得到扩大，覆盖地中海，并跨越大西洋，远达不列颠群岛。东方世界对海上航线的经营不及西方，因此东方的海上贸易长期处在短途近海贸易的水平。但至迟到古典时代，短途近海贸易已遍布亚洲沿海各个地区。依靠各地之间的短途中转贸易，海上贸易已经可以连接东亚与近东。换言之，在亚洲沿海任意邻近两港之间，会有商船频繁往来贸易，但这些商船通常只经营这两个港口之间的贸易，不会再沿着海岸向下一个港口远航。此两港与其他邻近港口间的贸易自有其他的商船专门经营。当然，有一些商人可能会沿着亚洲沿海一路旅行，利用各地区的短途航线，走完东亚和中东之间的整段航程。史料显示，此事在唐朝时已有发生，当时广州就聚居有大批的阿拉伯、波斯商人。这种地区性的“点对点”的贸易形式在本质上与大陆上的丝绸之路贸易并无二致。

直到近代初期之前，经由陆路进行的国际贸易和经由河运或海运进行的国际贸易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随着中央欧亚被强邻瓜分，该地区作为欧亚大陆经济枢纽的地位消失，陆路贸易和航运贸易之间的差别开始显现。此后，欧亚大陆海路贸易才真正成为一个与丝绸之路系统（此时实际上已经衰亡）等量齐观的存在，可被称为“海上系统”。在此之前，虽然人们一厢情愿地认为陆上丝绸之路贸易路线和海上贸易路线同等重要，实则不然。如果读者随便翻阅一下汉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中世纪（直到丝绸之路断绝之前）的史料，就不难发现，这些史料除了记本国史事之外，无一不在中央欧亚上多着笔墨，留下了大量细致的记录。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沿海地区在这些史料中却较少被提及，有时只能在外国（主要是欧洲的）史料中找到相关记载。[57]这种反差值得深思。

从斯基泰时代起，直到准噶尔汗国灭亡，中央欧亚，尤其是中亚，一直吸引着欧亚大陆周边各大政权的目光；它们投入了大量时间、财富和资源来经营其中央欧亚战略。然而这些大国中却鲜有以同样力度经略沿海贸易者。即使是占尽沿海地利的拜占庭帝国也并非依靠海上贸易立

国。虽然它也从海上贸易中获利颇丰，但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仍是帝国治下各地民众所缴纳的税赋、岁币。同样，尽管莫卧儿帝国治下的印度与近东之间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但莫卧儿帝国财政收入的绝大多数来自国内的税收。虽然中国广州早在汉代就已经参与海上贸易，但及至唐代，此地尚属偏远、落后之边地，城市规模远不及当时中国北方的大城，仅因其居民多为外国人而见著。

从英国起经地中海到埃及，从阿拉伯半岛到日本，古代欧亚大陆沿海贸易线路上各个港口城市的情况大抵如广州一般。尽管各国的都城或大城一般都坐落在大河河畔，距离海港不远，但它们都不是沿海的港口城市。在欧洲，君士坦丁堡是一个特例；伦敦[58]有河道入海，或可算作一座港城。但历史上西欧和东欧各国的都城大都是内陆城市，及至今日也是如此。罗马如是，雅典如是，马德里亦如是。[59]近东历史上重要的都城——开罗、耶路撒冷、大马士革、麦加和巴格达，以及波斯历代的都城［苏萨（Susa）、波斯波利斯、泰西封、伊斯法罕、德黑兰等］，一概是内陆城市。再继续往东，印度的德里，缅甸的蒲甘、东吁（Toungoo）、阿瓦和曼德勒，泰国的大成府，中国的长安（西安）、洛阳和北京，朝鲜半岛的平壤和首尔，以及日本的奈良和京都，全为内陆城市，概莫能外。如果海上贸易自古以来就是这些国家的经济支柱，则这种布局完全无法说通，过去几百年来发生的从内陆向沿海的转移也没法解释。即使雅典这个以商业立国的城邦也建城在内陆。修昔底德早已指出，雅典城和其他古希腊城邦一样，为防范海盗侵袭，而被建在离海港14千米远的内陆地区。在海上系统建立之前，大多数国家因惧怕大海、担心海外居民的入侵而很少大力经营海上贸易。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沿海的贸易已经存在了很久，却通常保持低调——近代以前，它都不太受重视。无论是真实的历史、地理文献，还是虚构的故事，如《一千零一夜》中辛巴达的故事等，都反映出海上贸易确是有厚利可图的行当。但是，欧亚大陆拥有海岸线的国家，不论大小，都未曾在沿海地区兴建大城市。这些国家之人，包括国王，大都热衷于商贸[60]，但在欧洲人的大航海时代开启之前，亚洲地区没有一座在政治上有重要地位的城市建在沿海地区；[61]有些国家（最著名者为莫卧儿帝国）甚至都不屑于对其沿海地区进行直接统治，而放手让名义上从属于它们的地方豪强统治。相反，麦加、大马士革、巴格达、德里和长安等大都会尽管地处内陆，但它们却兼具商贸中心和政治中心两重角色。中央欧亚的各城市也是如此。

欧亚大陆各处的传统国家的核心利益在于对土地的控制。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就要建造带有城墙和防御工事的城市，这种建筑在英文中常作“fort”（关隘）或“fortress”（城堡），皆不准确。在中世纪初期欧亚大陆各语言中通常只有一个专门的词来对应这个概念，比如阿拉伯语的“madîna”、波斯语的“shahristân”、古藏语的“mkhar”、汉文的“城”、古高句丽语的“kuru”等等——明确指称同一种事物：一片有城墙围绕、护卫的城市化地区。为了让这些城控制周围最大面积的土地，发挥其最大的功效，也为了防止它们受到外敌的攻占、侵扰，又为了防止它们脱离控制而独立，它们最好被建在国家领土的内部。各国的边境地区因此在理论上是国家控制力最弱的地方。商人们追求往来贸易的自由、最低程度的干涉和最少的税收，在边境地区贸易，他们可以较少受到管制。

西欧、阿拉伯半岛、东南亚和东北亚的地理条件决定了这些地区很难有大型帝国产生或持续存在。小国林立的局面导致了更多边境地区的产生，促进了地区内部各国间的海上贸易。自古以来，日本和朝鲜半岛之间贸易活动频繁，它们与中国也常有贸易往来。但是，这两地的商船却并不远航至东北亚以外。在南方，从广州到东南亚，再到印度，这又是一片海上贸易区。此后的海上贸易线路则是从孟加拉出发，南下至锡兰和南印度诸港，再沿印度西海岸航行，经过波斯、阿拉伯，到埃及，一直紧贴着大陆。商业在东南亚诸国非常重要，其中，地近苏门答腊岛和马来半岛南端的三佛齐（Srivijaya）王国最为著名。但这些国家的立国之根本似乎还是农业，其财富的重要来源是自然资源（尤其是黄金），而其军事力量的主力则是陆军。这与亚洲其他国家的情况并无二致。在欧洲，波罗的海和北海地区的贸易相当活跃。从中世纪初期开始，大批贸易城镇［town，直到晚近才达到城市（city）的规模］在这片地区雨后春笋般兴起。但是，商船很少从这里向南直航到地中海，这段航程遥远而艰险，堪称畏途。

沿海地区从未出现过大型的海权大国（thalassocracy）。[62]古希腊时代的一些国家或可被视作特例（“海权大国”一词正是产生于此），但它们的规模太小；尽管它们发展商业，并因此致富，但其立国的根本似乎并非商业。[63]铁器时代初期最著名的商业民族腓尼基人曾拓展其贸易远至西班牙地区，但他们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实际的帝国来支持他们的贸易。[64]后来纵横四海的维京人以及控制着印度洋贸易的穆斯林商人也都没能建立起帝国。在贸易中心兴起的政权，其规模往往只是一个地方政权。例如，在诺曼底建立政权的维京人与在不列颠、爱尔兰、俄

罗斯等地建立政权的各支维京人均不相统属。

综上，尽管在大航海时代之前约2000年的历史中，海上贸易线路一直存在，但其在政治和文化上都不重要，因此很少被人关注。直到欧洲人在亚洲沿海地区建立起贸易据点，开始从国际贸易中收获厚利之时，沿海地区才逐渐变得重要。当港口城市（一些为欧洲人新建）规模日渐扩大，经济日益繁荣，沿欧亚大陆进行的海上贸易升级成为一个全新的海上系统。海上系统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使得亚洲的一些周边国家将首都迁到了沿海地区。

与古代的海路贸易一样，欧亚大陆的陆路贸易也肇始于史前时代。关于其出现之初的情况，现存材料不多。到草原游牧民族建立起第一批中央欧亚帝国——斯基泰帝国和匈奴帝国时，欧亚大陆的陆路贸易开始引起世人的注意——斯基泰人和匈奴人都因为这种贸易而获得大量财富。从此以后，中央欧亚草原游牧民族和中央欧亚城市的繁荣与中央欧亚的内部经济密不可分。而国际贸易正是中央欧亚内部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古代海路贸易沿线的港口不同，中央欧亚这个大商圈完全处于大陆上，因此其沿线的城市通常规模很大，地位也很重要。海上贸易主要由短途贸易构成——货物被从一个国家贩运到其邻近的国家；即使在欧洲人控制了沿海地区之后，欧洲的商船取代了亚洲当地的船只，短途贸易为主的情况也没有改变。与此类似，中央欧亚的贸易活动大多也是由小型商队从事的短途贸易。[65]因此，正如沿海地区从未出现一个海权强国，在中央欧亚也未尝有过一个粟特帝国或犹太帝国。粟特地区历史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小邦林立，只有当外来势力攻占粟特地区全境之时，此地才算实现了短暂的统一。但是，粟特地区几乎一直处在某一大国的羁縻之下，比如阿契美尼德王朝、匈奴、贵霜王朝、突厥汗国、阿拉伯帝国。这些大国维持粟特地区的秩序，使贸易可以在各独立的小邦之间有序地进行。帖木儿生于粟特地区的中心城市撒马尔罕附近的一座小城，但他既非伊朗语族出身，也不是商人。或许这是他能以撒马尔罕为中心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的原因。但他的帝国也在其死后立即土崩瓦解。

丝绸之路沿线的大城（至少在上古和中世纪早期如此）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共性——它们都是城邦国家。通常每个小国只有一个主要城市。因此，如果只依靠它们本身的资源，中央欧亚这些城邦的政治与经济肯

定也和沿海的那些小城一样，分散、不重要。这些小国需要一个草原帝国统合、监管，才能实现共同的经济繁荣。在前现代时期，中央欧亚的城市曾有过衰落的时候，而且往往是在中央欧亚缺乏草原帝国统治的时期。没有草原民族的统合和管理，丝绸之路难免衰微。[66]在历史上，每当周边地区的希腊-罗马、波斯和中华帝国崛起，征服或削弱了中央欧亚游牧政权，中亚的经济便会呈现衰退。[67]汉朝击败匈奴，导致中央欧亚各地陷入混乱。尽管后来鲜卑取代匈奴，在东部草原建立霸权，但直到数个世纪之后的突厥汗国时代，中央欧亚的经济才再度繁荣。唐朝的繁荣无可置疑，其治下辽阔的疆域覆盖了中亚的一些地方，但中亚本身的经济却受到了沉重一击。唐与大食联手击败吐蕃与突骑施汗国的势力，并一举攻灭突骑施汗国。这使突骑施治下的中央欧亚地区陷入混乱，严重的经济衰退接踵而来。粟特等商业民族在各地策动一系列叛乱，搅动了整个欧亚大陆的政治秩序。最后，清朝与沙俄瓜分中央欧亚，最后一个游牧帝国——准噶尔汗国被清朝攻灭。中央欧亚的经济由此受到毁灭性的打击，直到2000年千禧之际，也没能恢复元气。所幸当时海上贸易在欧洲人的经营之下已得到充分发展，形成海上贸易系统，在许多方面完全取代了丝绸之路系统，因此欧亚大陆整体的经济没有因为中央欧亚经济的衰败而崩溃。

游牧政权是丝绸之路存在的重要保障，而贸易对游牧政权的存续也至关重要。游牧民和定居的城市居民是任何一个成功的中央欧亚帝国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68]这样的帝国治下应当包括草原游牧民、农耕居民和城市居民。因此，游牧民族也和农耕民族、城市居民一样，参与贸易，支持、推动贸易的发展。这些帝国的统治者往往是游牧民族，但他们对周边帝国发动战争的主要原因却只是为了打开通商的门户。[69]在这一点上，中央欧亚草原民族的所作所为和建立起海上系统的西欧列强如出一辙。草原民族的苦心经营使丝绸之路呈现出繁荣景象，中央欧亚内部和对外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当中央欧亚因其经济繁荣而引起周边帝国的注意之时，它便成了寓言中那只会下金蛋的鹅，周边帝国常常欲行杀鹅取卵之事。尽管周边帝国的统治阶层、文士和史家对中央欧亚有这样或那样论断，但他们从未真正理解中央欧亚。他们在历史上数次尝试夺取中央欧亚，除掉那里的主导力量——游牧民族。只要他们一日未得逞，中央欧亚的经济（丝绸之路）便能继续繁荣；当他们最终得手之时，中央欧亚的经济被扼杀，丝绸之路断绝。[70]

与此同时，西欧列强已开发出直达亚洲的远洋航线，这在本质上和

之前游牧民族经营陆上丝绸之路是一回事。欧洲人同样热衷于贸易，因此他们鼓励贸易、保护贸易并参与其中。他们和游牧民族一样，只为利往。东、西方传统的历史学家一般将中央欧亚游牧政权和近代欧洲殖民者的行为归结于“野蛮人的贪欲”。诚然，他们发动侵略和战争绝不是出于什么高尚的目的，但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于贪欲；这应该是所谓“自私的德性”（virtue of selfishness）。照顾商人的利益为欧洲各国的统治者带来回报。当海上贸易所获的巨大商业利益成为国家收入的重要来源时，这些欧洲国家的舰队自然要驶向远洋，保护其商船通航地区的安全。这与中央欧亚游牧民族在草原上扩张的动机并无区别。于是，一个由欧洲人控制的海上贸易系统发展成形，其范围包括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印度、东南亚和中国沿海地区的各港口及其腹地，以及在日本的一个贸易据点。

尽管海上贸易的体量和价值未必更小，但其在历史上曾长期不如陆上贸易地位重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欧洲人到来之前，沿海地区的贸易活动尚未成为各地方经济的一个基本组成成分。它也没能从中央欧亚大陆经济圈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圈；它完全从属于以中央欧亚（丝绸之路经济）为中心的大陆系统。[71]

因此，古代的海路贸易和陆路贸易之间并无竞争冲突（当然，多一种渠道获得商品可能会使商品的价格降低）。这两种贸易方式并存，实则是同属欧亚大陆贸易体系的不同运输形式。这个贸易体系的核心是丝绸之路，即中央欧亚经济。西南亚地区是两种贸易路线交会之地，二者在此处的互动最为密切。这一地区包括伊朗、伊拉克、埃及、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历史上波斯的霸权与其地所处的战略位置密不可分：其地正当东、西、南三方通路，扼守着陆路、海路交会之处。安纳托利亚和希腊的情况也类似，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先后从这一地区崛起。[72]

在欧洲人主导的海上系统鼎盛之时，欧亚大陆的国际贸易主要通过海路进行。到此时，尚通过陆路进行的只有零星的短途贸易。除了邻近地区间少量低价商品的流通和零星活跃的商队，丝绸之路商业已经衰亡。个中原因在于，周边强国占领了草原地区，征服了当地的中央欧亚政权，并在当地派驻官员。中央欧亚丧失了独立的地位，当地政权受到打压。这导致首领、朝廷、卫队（私兵的后期形式）等政权组成成分大量消失。因此，中央欧亚对于丝绸等高价值商品的需求锐减。沙俄和清

朝设立了官方边贸城市，但其目的是管控两国之间的官方贸易，而将中央欧亚民族排除在外。这样，中央欧亚不但失去了内部经济的发展动力，也被剥夺了参与转手贸易的机会。到19世纪中叶，丝绸之路已然衰微，中央欧亚坠入贫困的深渊。

这个过程影响了中央欧亚各个主要地区，包括蒙古、西藏、阿富汗、中亚西部和新疆。新疆近来多受学界关注，下面以新疆为例，阐释这种影响。

准噶尔汗国几乎与清朝、沙俄和英属印度等周边帝国同时崛起、扩张。但周边帝国最终将“新疆和中央欧亚的其他地区纳入版图，结束了游牧民族草原帝国统治中央欧亚的时代”。准噶尔人曾将中央欧亚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开放时代”[73]，将周边国家的产品和技术引入中央欧亚。但随着准噶尔汗国覆灭，清朝和沙俄征服中亚，形势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地方经济日渐衰退；到19世纪中叶时，受严格管控的国际贸易商品竟然已经包括诸如中国的“茶砖和布”，俄国的“牲口、皮革、皮草以及手工制品”[74]。从清朝统治时起，早在18世纪乾隆年间，“新疆已不能产生足够的税收来支持当地的驻军，每年有数百万盎司的白银被运往新疆作军饷”[75]。19世纪中叶，新疆地区最后一丝国际贸易成分是中转出口中国其他地区的茶叶、白银及其他物件[76]。在19世纪初叶，“俄国的酒、金属制品、纺织品、灯具、陶瓷制品、手表、烟草等在新疆的市场上价格均远低于同类的中国商品”[77]。这些都是单位价值很低的廉价商品。而高价值的奢侈品的消失尤为引人注意：这与上古时代至中世纪末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反差，即使晚到准噶尔汗国盛期也未尝如此。它们的消失正是中央欧亚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的直接证据。

南疆居民终于在1864年揭竿而起，被阿古柏（1865-1877年在位）收入麾下。阿古柏在外交上的策略使得该地区受到国际关注。但清朝不会善罢甘休。清政府在1878年彻底收复新疆，随后于1884年在当地设立新疆行省[78]。到19世纪末叶，仅存的一点商业活动也被俄国和汉人商人掌控。少数外国旅人冲破周边帝国统治者的阻挠，克服沿途的危险，进入南疆地区，记录了当地的情况。他们注意到了当地文化的停滞和落后。[79]战争和清政府长期的管理不善破坏了当地的经济、基础设施等。[80]

随着外界进入中央欧亚的渠道被严格控制，这里在文化上与世隔绝。当时正在影响着世界其他地区的技术等领域的进步无法波及中央欧

亚。尤其是，中央欧亚与工业-商业革命及其伴生的文化变革失之交臂，因此逐渐演变成如一潭死水般原始、贫困的殖民地，再也不复当初作为世界文化中心的荣光，反倒更像中非、亚马孙丛林等地区的境况。

中央欧亚的恶劣情况使俄罗斯人和清朝人逐渐对其丧失了兴趣。当然，他们成功地阻止了欧美人士进入中央欧亚。实际上，由于在阿富汗、西突厥斯坦、新疆、蒙古和西藏等中央欧亚地区旅行都被禁止，外界几乎没有任何关于当地的信息。即使在中央欧亚内部，隔绝与贫困也拉低了当地居民的文化水平，导致他们对自己的领土、历史和文化知之甚少。

丝绸之路的神秘消失恰与新兴的海上贸易系统的出现同时发生，无怪乎历史学家试图在这两种貌似截然不同的商贸系统的兴衰中寻找联系。实际上，由于独立地位的丧失和有贸易头脑的本地首领被废黜，中央欧亚经受了世界历史上最为严重、历时最久的经济萧条。它逐渐沉沦于遗忘的深渊，而欧亚大陆的沿海地区则因有商业头脑的欧洲舰队的滋养而繁荣，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

---

[1]汉译文据夏尔·波德莱尔《恶之花》，郭宏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70页。——译者注

[2]参看注释89。满洲人有意识地选用如此具有佛教意味的新族名，这种做法与拓跋鲜卑的做法惊人地相似。参看Beckwith 2005b。

[3]Perdue（2005:140）。

[4]Perdue（2005:140-141）。

[5]Perdue（2005:148-149），Bergholz（1993:260-261，267-269）。

[6]Perdue（2005:150）。

[7]Perdue（2005:138，161-171）。

[8]Perdue（2005:151）。“八旗制度最初以300男丁为一单位，由国家分发饷钱和土地。”（Liu and Smith 1980:202）

[9]他对外宣称达赖喇嘛正在入定修行。

[10]Perdue（2005:151）。

[11]Spence（2002:154）。

[12]Perdue（2005:152-159）。文章称双方都在积极备战，暗中角力。但没有证据显示准噶尔部采取了任何具体行动。

[13]Spence（2002:155）。噶尔丹之子则被哈密当地统治者擒获，移交给清朝。

[14]Perdue（2005:202）。噶尔丹应是被毒杀（Perdue 2005:202-203）。另据Ahmad（1970:322），噶尔丹在1697年6月3日自杀身死。但此日期肯定有误，此日是康熙获得噶尔丹身死的消息之日（Perdue 2005:202）。

[15]之前的噶尔丹也如此自视。他因东蒙古活佛大喇嘛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对达赖喇嘛不敬的言行而出离愤怒。

[16]Perdue（2005:234-235）。

[17]Perdue（2005:234-235），Hoffmann（1961:178-181）。

[18]土尔扈特部被俄国人称为卡尔梅克，与准噶尔部同属卫拉特人，时在伏尔加河下游一带游牧。

[19]Perdue（2005:263-264）。

[20]Perdue（005:265）。1两比40克稍轻，比1盎司稍重。

[21]Perdue（2005:392-393）。

[22]参看Millward（2007:92-94）。

[23]Perdue（2005:256-265）；Millward（2007:94-95）。

[24]Perdue（2005:275-288）。

[25]之前流通的准噶尔普尔钱也在叶尔羌铸造。——译者注

[26]Perdue（2005:392-393），Millward（2007:103，116）。

[27]尽管英属印度仍然希望与中央欧亚地区进行贸易，但它不屑与当地统治者打交道。比如在1904年，英军直接进入西藏，击溃西藏当地的抵抗，强行与之签订不平等条约。

[28]Perdue（2005:161）。

[29]当然，这里的经济活动不会完全消失。几乎没有任何事物会完全消失。虽然形形色色的商队还一直往来于中央欧亚，直到今日，但丝绸之路经济往日的繁荣已经一去不复返。一些学者依然坚信，丝绸之路经济一直活跃到现代。比如米华健在其大作中所论（Millward 2007:76-77）。但他自己就举出了许多明显的反例，显示在准噶尔汗国覆灭以后，中央欧亚的贸易急剧下滑。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则是，中央欧亚，包括丝绸之路经济的中心——中亚，在20世纪之前很久就已经陷入经济上的贫困和技术上（以及文化和艺术上）的落后。

[30]Millward（2007）。文章指出，尽管曾有清朝的官员提出从内陆转向海洋的倡议，但传统和安全上的担忧使清政府依然将战略重点置于中央欧亚。据史料可知，所谓安全上的担忧完全出于传统考虑，而并非因为当时在中央欧亚确实存在真实的威胁。

[31]Elisonas（1991:302）。

[32]Hall（1991:4）。此时为安土桃山时代，将军的都城仍在关西地区，即丰臣秀吉位于大阪的城堡。

[33]Elisonas（1991:363-364）。

[34]Beasley（1989:270-271）。

[35]东京地在以前的都城京都以东，是为名。

[36]此前在1894-1895年，他们就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击败清朝军队。此役之后，日本从清朝手中夺取朝鲜和台湾。

[37]Savory（1995:772），Matthee（1999:105-106）。

[38]一个原因是萨法维政府控制商业和工业，详见前文。

[39]Savory（1995:772-773）。

[40]Savory（1995:744），引自Issawi（1971:86）。

[41]即使是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也没能救活中东的经济，遑论当地的文化和艺术。自萨法维

王朝覆灭，波斯只在20世纪中期的巴列维时代有过回光返照。而巴列维王朝最终的命运则集中反映了中东地区一直存在至今的问题。

[42]Newitt（2005:245，258）。

[43]Thant Myint-U（2001:18-20）。

[44]Bečka（1995:217）。

[45]Wyatt（2003:124）。

[46]关于早期欧洲人与大城府间的商贸和政治关系，参看Wyatt（2003:95-104）。

[47]Joo-Jock（1991:6，12）。

[48]Hsu（1980:118-125）。

[49]Fairbank（1978:22，237页起）。

[50]Millward（2007:126-127）。他正确地指出，中国对土地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延续至今。

[51]Frédéric（2002:624）；参看Jansen（1989）。

[52]GSE（14:380）。在1712-1728年、1732-1918年，圣彼得堡是俄国的首都。

[53]GSE（19:116）。

[54]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定此地为中、俄共管。到1860年，中俄签订《北京条约》，此地才彻底归入俄国。——译者注

[55]其后不久，在1867年，俄国人便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人，彻底退出其与欧洲列强在美洲大陆的角逐。

[56]GSE（5:539）。

[57]上古时代的史料也如此。

[58]然而，在中世纪早期，主要的盎格鲁-撒克逊王国麦西亚的首都位于内陆。

[59]奇怪的是，尽管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皆以海港城市为都城，但这些国家却并没有在地理大发现和海上贸易系统建立的过程中发挥重大作用。与此相反，葡萄牙的首都、港城里斯本虽非历史上著名的大都会，却因大航海时代和葡萄牙人的海外扩张而名声日盛。

[60]当然，他们很少公开表达这种兴趣——尤其在古代的中国和罗马，商人和商业在社会中受歧视，在文学中也甚少被提及。

[61]作为与丰臣秀吉交易的部分条件，德川家康将其统治中心移到位于关东的江户。1600年家康统一日本以后，江户（即后来之东京）成为日本事实上的都城。虽然江户以养马闻名，但在当时它还只是一个小港。直到今日，东京中部一些地方的地名还跟养马有关。

[62]一些规模较大的东南亚国家，比如著名的三佛齐王国，也被称为“海权大国”，但其含义与本文所指的“海权大国”有不同之处。

[63]古代的雅典“帝国”最接近于一个纯粹的海权大国。

[64]他们的后代迦太基人曾建立起帝国，但与腓尼基本土昌盛之时已经相去甚远。

[65]一些学者认为，大多数的跨国贸易被粟特人、犹太人等“中间商”民族操控，因为这些民族可以跨国活动。因此，保有一些独特的民族标签对这些民族来说是最有利的，这样他们可以被轻易识别，不会被认为与任何政权有关联。但上述观点似不准确，至少粟特人、突厥人和维京人的案例不能证明其正确。参看de la Vaissière（2005a）及de la Vaissière and Trombert（2005）。

[66]此点曾被许多学者从相反的角度指出，比如，米华健（Millward 2007:93-94）写道："准噶尔人的例子充分地证明了商队贸易对内亚游牧政权的重要性。"

[67]有人可能会反对说，阿拉伯人的征服并没有导致中亚经济衰退。这显然是正确的。阿拉伯属于旧的沿海经济带，历史上阿拉伯人始终强烈地支持商业，并且有重要的游牧因素。阿拉伯帝国时期的征服（直到9世纪早期哈里发政权崩溃）在许多方面与草原游牧民族的征服类似。

[68]这或许就是吐蕃帝国崩溃以及后来吐蕃人再也没能建立起一个强大政权的原因。后来西藏被蒙古人征服（确切地说，是西藏归顺蒙古），成为更大的蒙古帝国的一部分。此后一直到准噶尔汗国覆灭，西藏在大多数时间内都在某一支蒙古政权的统治之下，因此得以维持统一。

[69]参看《尾声》一章。

[70]丝绸之路并未衰落的观点最近甚嚣尘上，参看注释90。

[71]这不同于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1998）新造的一对术语"外围欧亚"（Outer Eurasia）、"内陆欧亚"（Inner Eurasia）。鉴于中央欧亚研究术语混乱的现状，笔者实不能赞同他这种新造名词的做法。他后来还造出了"亚非欧地区"（Afro-Eurasian region，Christian 2000:2）。

[72]还可以加入特洛伊王国和赫梯帝国。当然，赫梯帝国发祥之地在安纳托利亚中部。

[73]Millward（2007:79-80）。

[74]Millward（2007:156）。

[75]Millward（2007:102-103）。

[76]Millward（2007:121）。

[77]Millward（2007:158）。

[78]Millward（2007:130-137）。米华健认为中原内地和清帝国其他部分（除西藏外）基本处于相同的政治地位，但事实或非如此。蒙古的地位就与新疆不同，而二者又不同于西藏。新疆正式成为行省是一步经过权衡的政治运作。尽管起初这对当地生活的普通人并无显著的改变，但其巨大的影响在日后逐渐凸显。参看米华健书所列关于新疆的相关评论（Millward 2007:158）以及下一脚注。

[79]Millward（2007:159）。米华健将西方人的观察称为"帝国主义者自以为是的种族主义行径"。应当补充的是，与这些西方人同时代的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自以为是的种族主义行径也为当时的西方人所注意到，他们曾因此高声抱怨，但却未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留有回响。

[80]时至今日，"新疆仍然需要中央政府的补贴"（Millward 2007:103）。苏联的情况亦如此。当中亚各共和国宣布独立时，破产的俄罗斯人并未做出任何挽回的努力；与此形成对比的则是波罗的海三国独立时俄罗斯人努力挽回之举。对俄罗斯人而言，中亚在经济上就是一个无底洞。

第十一章　失重的欧亚

四月最残忍，

从死了的土地滋生丁香。

——艾略特，《荒原》[1]

现代主义·战争·文化衰落

20世纪是现代主义颠覆运动的高潮，它在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和各个角度反对传统、自然律（natural law）和自然本身。其在欧亚大陆为害最大。各种现代主义革命催生了各色民粹主义、极权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暴政政权，导致了空前惨烈的战争和大屠杀。现代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全球性经济衰退“大萧条”从1929年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波及许多国家。灾难性的现代经济政策正是导致这次经济衰退的原因之一。在文化领域，滥用激进的革命手段导致了中央欧亚文化上的浩劫：上万座佛寺、神殿、清真寺、基督教教堂、犹太教堂以及各教教会的附属学校统统被毁，书籍被焚烧，僧侣教士惨遭折磨、杀戮。在现代主义的狂澜之下，中央欧亚所受的冲击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都更为剧烈。

1911年，清王朝覆灭，蒙古、西藏相继独立。数十年之后，新疆的部分地区也随之独立。但“二战”结束后不久，中共在国内战争中获胜，解放全中国。中央政府先后和平解放内蒙古、新疆和西藏（1951年）。上述地区不但有人民解放军进驻，还有大量内地群众迁入支援当地建设。

在“二战”以后，中央欧亚更加与世隔绝。当时，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被一个非欧亚大陆国家——美国控制，地球被划分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两大阵营之间漫长的斗争被称为冷战，因为美苏双方皆不公开向对方直接动用武力。[2]冷战的重中之重是争夺欧亚大陆的控制权。当时最大的两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施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反对市场经济。当时分属苏联和中国的中央欧亚各地尤其贫困、封闭。

海上贸易体系与丝绸之路

在近代，欧亚大陆的国际贸易越来越依赖海上贸易体系。该体系从早期的沿海地区贸易发展而来。早期的沿海地区贸易当然不应被忽视，其规模也不小。有观点认为，亚洲地区的海上贸易要比陆上丝绸之路贸易更为重要。这就言过其实了。持这种观点的人根本没有理解丝绸之路的本质。

沿海地区贸易根本无法跟丝绸之路相提并论。在葡萄牙人发现从欧洲直达亚洲的航线之前，沿海地区的海上贸易系统本质上就是一个商业运输网络，或更确切地说，一个串联各地区运输网络的体系。而丝绸之路则不同。它本质上不是一个单纯的商业运输网络，而是整个中央欧亚经济体，是一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体系。这个体系的繁荣在上古和中古时代分别震惊了时人，辉煌时代所留下的记录和遗存甚至震撼着今天的世人。

在现代，最后一个草原帝国（准噶尔汗国）覆灭，中央欧亚被周边政权瓜分。在此之前，中央欧亚作为一个整体（包括畜牧、农业和城居民族以及武士、工匠、知识分子等各行人口），其社会、经济、政权组织和文化水平均可与同时代欧亚大陆其他主要区域（东亚和东南亚、南亚、西南亚以及欧洲）等量齐观。如第十章所述，中央欧亚在现代初期开始陷入贫困的泥沼，渐被世界遗忘。在整个现代时期，中央欧亚在绝境中越陷越深，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最没有生机、最为贫困的地区之一；在这里甚至连见证往昔辉煌文化的古迹和遗存都所剩无几。这种结局出人意料，其原因值得思考。

这种结局的根源正是现代初期欧洲和亚洲各强国对中央欧亚的侵占和瓜分。在现代，中央欧亚各政权丧失了独立地位，因此中央欧亚各民族成为这些强国的“边疆问题”[3]。在20世纪，这个地区几乎被世界遗忘：它既没有在政治上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也没有在经济上受惠于世界的发展，却遭尽了现代历史中发生的苦难。20世纪中央欧亚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从属于欧亚大陆周边地区的历史，尤其是西欧、俄国和中国的历史。[4]本章即将勾勒出20世纪欧亚大陆的历史发展脉络，内容侧重于对中央欧亚影响重大的事件。到20世纪末，一个全新的帝国时代最终

成形。

激进的现代主义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欧洲人统治的世界中已有一些民粹主义[5]国家采用了共和制的政体，挑战着传统的君主制，但君主制和贵族文化传统仍然是多数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惨烈的“一战”结束以后，君主制在大多数欧洲国家被推翻；少数君主被保留，但实权被剥夺。[6]他们被明显是现代主义的“民主”取代的，而这些“民主”国家至少在表面上都采用共和制政体。这些现代共和制国家实行国民义务教育制度，国民从少年时代就被强制灌输“民主”的意识形态。因此，他们自然不会反对那些为了“民主”或通过“民主”制度获得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反而会由衷地支持他们。

第一次现代主义革命

20世纪第一次重大的现代主义革命是发生在中国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1866-1925年）是一位广东籍知识分子。他少年时随母移居夏威夷，后来又辗转生活在香港（当时为英国殖民地）、日本、英国和美国。[7]革命党人的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他们所谓的“鞑虏”——清朝统治者，无论是文化、语言还是国族认同都与当时的汉人没有任何区别。他们革命的目标显然是受欧洲的影响（确切地说，是受美国的影响）。1911年，他们成功推翻了清朝的统治。蒙古和西藏的当地势力本向清朝称臣，如今清朝覆灭，他们因此即宣布独立。清朝在新疆的驻军被民国政府接收。由于新疆地区多民族杂居，当地势力缺乏统一的政治领导，因此独立没有得逞。[8]

新建立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实力孱弱，各地军阀割据。蒋介石的北伐军夺下首都北京，[9]他本人也确立了在国民党中的绝对领导地位。此后，国民政府的首都即被迁往南京。南京位于长江江畔，可沿长江通航。其地在上海西约300千米。上海是由外国势力主导的国际港口，当时已是中国最大、最繁华的都市。

第一次世界大战

欧洲列强之间的猜忌和矛盾自19世纪延续至20世纪初，进一步酝酿发酵。各国都厉兵秣马、枕戈待旦；欧洲大陆战云密布，一触即发。终于，巴尔干半岛一声枪响，各国间的联盟立即生效，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拉开序幕。参战的双方分为两大阵营——协约国和同盟国。协约国一方最初有英国、法国、塞尔维亚、俄国和日本；在战争过程中，意大利（1915年）、葡萄牙和罗马尼亚（1916年）、希腊和美国（1917年）相继加入。同盟国一方最初有德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后来，保加利亚加入（1915年）。[10]“一战”在欧洲西北部造成的破坏最为严重，多数大战役在那里打响。开战数周之内，已有100万青壮年男性战死沙场。

虽然“一战”的战火也蔓延到奥斯曼帝国的东南部，并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直接导致了奥斯曼帝国的覆灭，但其他直接参战的国家几乎全是欧洲国家。因此，这算不上是一场“世界”大战；主要参战国（欧洲国家）之所以称之为世界大战，是因为欧洲及其旁近的近东是它们眼中的世界中心。[11]

1917年，美国宣布参战。1918年春，美军进入战场。这彻底扭转了战局，协约国立即占据胜势。同年，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战败，“一战”结束。战胜国将战争责任全部推到战败的同盟国头上，对其进行无情的惩罚。双方签订《凡尔赛和约》（1919年），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被肢解。战后，各国为避免大战再度发生，建立了一个国际组织——国联。但美国没有加入国联——因为国会由最无知、最自私的民粹主义者把持着。这极大地削弱了国联的效力。

结束“一战”的《凡尔赛和约》之于欧洲就是一枚定时炸弹，它为后来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伏笔。德国经济对于欧洲经济的重要性在当时还没有被各国充分意识到。“一战”造成的巨大破坏、欧洲各大国因战争而背负的沉重债务以及各国糟糕的经济政策，导致了大萧条的发生。战胜国强加的巨额赔款、惩罚性的条款以及战败的耻辱使得德国和奥地利一定会抓住一切机会重新武装自己。随着“一战”结束，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在几大参战国中爆发，最重大的两起发生在俄国和德



国。

“一战”之后的激进现代主义革命

俄国革命

俄国长期受国内社会-经济问题的困扰，沙俄政府不顾民怨，出兵参与“一战”，更加剧了国内的矛盾。1917年3月爆发的民主革命（即“二月革命”）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12]但新政府并没有退出“一战”。新政权的软弱和战场上持续的伤亡使俄国群众掀起了一场更彻底的革命。1917年11月7日（儒略历10月25日）[13]，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领导者列宁（原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1870-1924年）宣布临时政府倒台。次日，他宣布，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正式建立。然而，列宁也没有立即宣布退出“一战”。其后，德军攻势抬头，俄军损失更重。1918年2月，俄国首都被迫从圣彼得堡迁到位于内陆的故都莫斯科。

就在苏维埃政府宣布成立后不久，俄国内战（1917-1920年）在革命的不同派别间爆发——社会主义者（红军）与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白军）展开激战。列宁一面牢牢掌握政权，一面征召士兵组建一支新的军队与白军和支持白军的欧美势力作战。欧美列强曾多次派出大军入侵俄国，支持白军，进攻红军。最终，社会主义者赢得了内战的胜利。

苏维埃政权彻底地改变了俄国的面貌。俄国境内所有民族都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即使是人口最少的部族也不例外。虽然推广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使群众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但它同时也使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传入北部欧亚、苏联治下的中亚及其卫星国蒙古。

列宁在1924年去世，他的位置由约瑟夫·斯大林（1879-1953年）接替。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原姓朱加什维利（Džugašvil）。到1927年，斯大林一派已经战胜了党内的其他对手。到1929年，斯大林本人已独揽大权，成为党内绝对的领导。在其当权时期，上千万苏联人因其而死：既有大批知识分子遭到清洗、杀害，又有大约1000万农民被饿死。斯大林统治的时代制造了史无前例的恐怖和屠杀。

德国革命

随着“一战”在1918年底结束，一场带有强烈社会主义倾向的民粹主义革命运动在德国爆发。德皇威廉二世（1859-1941年）退位，霍亨索伦王朝的统治终结。革命势力中的温和派和民族主义者压倒了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1919年建立魏玛共和国。但新成立的魏玛政府羸弱不堪，经济发展步履维艰，而欧洲一些国家在战后一直视德国为二等国家。这些因素促使极端民族主义滋生。

德国在经济大萧条中受到沉重打击。激进党派国家社会党（National Socialist Party，即纳粹党）党魁希特勒（1889-1945年）看到了机会。他生于奥地利，曾在10年前发动政变失败被捕。他许诺救德国于水火之中，恢复其往日大国地位。纳粹党在竞选中支持率一路飙升。最后，在1933年，希特勒获得第二多票数，当选德意志共和国总理。纳粹党很快全面掌权，开始将其革命纲领付诸实践。

希特勒新政府的一些措施确实极大地改善了当时德国的境况。一种新型的汽车——大众汽车被设计出来。它技术先进，物美价廉，这使普通德国百姓也有能力购买。[14]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络已开始全面建设，方便国民在国内驾车出行。希特勒违背《凡尔赛和约》，开始秘密地重建军队。在德国的势力足够强大之后，他便停止向战胜国支付战争赔款。德国的科技在当时已经领先世界。在科技的引领下，德国的工业蓬勃发展，德国再度成为一个军事和经济强国。

然而，希特勒的所作所为远不止于此。他具有高超的演讲技巧和雄辩之才，常在大型集会上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蛊惑人心。德国民众每每受其鼓动，对其言听计从。希特勒通过这种方式，建立起无上的个人权威。和当时的欧美各国人士一样，希特勒一派也将国家的困境归咎于国内的少数族裔。在掌权之后，希特勒立即下令执行系统清除犹太人的计划。最初采取的手段是政治上的极端歧视和经济压迫，这导致许多犹太人无力养家糊口，只能背井离乡。大批犹太难民被迫离开德国，逃往其他国家寻求生路。[15]随着“二战”的爆发，德国将清除犹太人计划推行到新占领的土地上，这项计划演变成对犹太人的有组织屠杀。最终，约600万犹太人惨遭灭顶之灾。德国和波兰两国中没有逃亡的犹太人口几乎全部罹难。另外还有一些群体也遭受纳粹政权的清洗灭绝。[16]

土耳其革命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奥斯曼帝国与德国、奥匈帝国联盟，与以英

国为首的协约国为敌。英国不但直接在埃及进攻奥斯曼帝国，还与阿拉伯人等奥斯曼帝国的反叛势力联盟，助其在近东各地与奥斯曼帝国军队作战。

奥斯曼帝国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帝国的领土纷纷沦丧。这种局面为青年土耳其党的崛起铺平了道路。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正是极具个人魅力的民族主义者，后来的“土耳其之父”凯末尔（1881-1938年）。1922年，奥斯曼帝国的时代终结，一个世俗的、“民主的”、西化的土耳其共和国建立。1923年，凯末尔将共和国的首都从君士坦丁堡（他改称为伊斯坦布尔）[17]迁至安格拉，并改新都之名为安卡拉。

英国计划在奥斯曼帝国崩溃之后，将近东地区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到“二战”开始时，英国确实控制着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和埃及。但随着“二战”的进行，大英帝国的实力受到重创，他们被迫放弃大片海外殖民地。1947年，英国势力撤出巴勒斯坦，内战随即爆发，一个激进的犹太民族主义政权（以色列）建立。英国的政策为今日该地区持续的不稳定局面种下祸根。[18]

“一战”之后，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列强将奥斯曼帝国肢解，土耳其人民建立起单一民族的土耳其共和国。这一变化对西南亚的局势产生了一系列恶劣而深远的影响。[19]波斯同样积弱不堪，自古以来西南亚地区东西两强对峙的局面——一极以希腊或君士坦丁堡为中心，另一极以波斯为中心——一去不复返。中东地区的分裂、敌对局势愈演愈烈，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下半叶。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现代中央欧亚

中央欧亚操突厥语各民族的解放运动“扎吉德运动”（Jadidism，直译为“新方法”）[20]在1880年前后肇始于鞑靼斯坦的喀山[21]，并很快传遍其他主要城市。新疆地区的知识分子将现代西方的学校、课程体系以及期刊等现代媒体引进当地；随之一同传入的还有现代民族主义思想。随着革命在中亚各地爆发，一些扎吉德主义者在革命初期加入布尔什维克运动。他们相信布尔什维克运动可以推翻保守的穆斯林反动统治，解放他们的同胞。[22]

第一次世界大战间接促成了共产主义革命于1921年在蒙古取得成功。从此以后，蒙古逐渐受苏俄（联）控制。

20世纪30年代，新疆地区军阀混战，苏联出兵新疆助盛世才确立统治地位。近代新疆第一个分裂政权东突厥斯坦共和国（1933年11月-1934年2月）在喀什建立，旋即被消灭。[23]然而苏联的势力此时已经在新疆不断扩大。

在清朝覆灭之后，西藏已处于事实上独立状态近半个世纪。其东部省份的军阀常进攻西藏。

苏联与大萧条

列宁推行的自由化的“新经济政策”缓解了俄国的经济危机。斯大林上台以后，新经济政策被废止，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被全面推行。1929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执行；次年，农业集体化运动开始。[24]对外贸易也被苏联政府严格限制。约从1926-1928年起，不但在苏联无法进行外币兑换，而且换外币还是一种犯罪。自此，苏联经济严重萎缩，苏联各地——俄罗斯和几乎整个中央欧亚——几乎与外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断绝联系。[25]

“一战”之后，欧洲大陆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德国和奥地利还要承受战胜国的经济惩罚，步履艰难。苏联（俄罗斯加上几乎整个中央欧亚）断绝了对外贸易，这使得欧洲的经济雪上加霜。考虑到这些因素，无怪乎一场史无前例的世纪性经济危机——大萧条在1929年底爆发。[26]无数平民一夜之间倾家荡产，丢掉了他们的积蓄、工作和房屋，陷入赤贫。与之前的经济衰退不同，大萧条在受灾最严重的国家甚至延续了数年之久。经济大萧条加上战后持续的经济制裁直接导致纳粹在德国上台。纳粹政府完完全全是靠“民主”程序选举产生的政府。正是这个新政府的总理希特勒将他的国家和整个欧洲再度引向战争的渊薮。然而，当时像希特勒一样狂热的人还远不止一个。

在20世纪初，西方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普遍认为，为追求或捍卫某一种社会制度而战是值得的。虽然初衷各不相同，但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反对当时世界的社会-政治秩序，向往一种集权体制。这些人中就包括活跃在20世纪初期和中期的一些最伟大的英语作家。[27]其中，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在“二战”期间一直公开支持法西斯和纳粹，直到其被俘受审；[28]庞德的密友艾略特同样深受法国的法西斯思想影响；上述两人加上劳伦斯（D.H.Lawrence）都是公开的反犹太主义者[29]。甚至连叶芝也深受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流行的暴力推翻西欧秩序的观点的影响。和当时许多顶尖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也认为西欧的社会政治秩序已经完全腐朽，全面战争是唯一的解药。这些作家共同的观点是：当时的社会条件已无法产生伟大的艺术，必须采取激进的手段来创造出适合艺术生发的社会土壤。又一场大战在所难免，而且和之前一样，许多人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亚大陆周边地区

尽管欧亚大陆——尤其是欧洲和东亚、东南亚——再度成为大战的主战场，但这次大战却是一次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战。“二战”的战火不但在欧洲、北非、东北亚、东亚、东南亚和大洋洲的土地上燃烧，还蔓延到了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海外领土；“二战”的参战人员则来自世界的各个角落。

在东亚，1931-1932年，日军悍然侵占中国东北，预示着大战将至。中国东北在历史上曾是中央欧亚最东的一个版块，但到彼时已经汉化。1932年，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扶立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登基。驻扎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东部的日本驻军将领对引发东亚战场的战事负有主要责任。他们和其他主战派逐渐控制了日本政府，使军队事实上控制了国家。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39年，日本已经占领中国东南沿海、华北和东北地区。

1939年8月，苏联和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MolotovRibbentrop Pact，又称《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内容包括瓜分波兰。9月，两军入侵波兰，波兰的盟友英国、法国向德国宣战，欧洲战场的战事爆发。1940年夏天，德国空军开始对英国展开空袭，为随后的登陆作战做准备。希特勒与苏联的关系急转直下。1941年6月22日，德军侵入苏联本土。到1941年底，纳粹德国已经占领了欧洲大陆西部的几乎所有地区，其势力向东直达顿河流域、黑海沿岸的西部草原地区。其中没有被德军占领的只剩下保持中立的瑞典、瑞士和西班牙，以及同为轴心国的意大利和法国南部（维希政府）。轴心国还控制着北非的大部分地区。

1941年6月，日军完成了对中南半岛（法属印度支那）的占领。当年夏天，包括美国（当时还保持中立）[30]在内的西方国家冻结了日本人的海外资产，并宣布对日本实施贸易禁运，试图逼日军退出中国。日本军部当时既指挥作战，又控制着政府。日军对外作战和国内所需石油全部依赖海外进口，这时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与控制着亚洲石油供应的美国、英国和荷兰开战。[31]1941年12月7日，日军轰炸美国在殖民地夏威夷[32]设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重创了其太平洋舰队，造成美国2

万多人员伤亡。珍珠港事件促使美国向轴心国宣战。[33]

必须强调的是，日军空袭珍珠港一事绝非如某些观点所说的那样，是孤立的、无计划的鲁莽行为。几乎在空袭珍珠港的同时，日军还进攻了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和马来西亚，并入侵了当时还是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34]到次年5月，日军已经击败驻守美军，夺下菲律宾。[35]在55天之内，日军从北向南打通马来半岛，消灭所有抵抗，占领战略要地——港城新加坡。[36]此外，在珍珠港事件过后仅一个月，即1942年1月，日军入侵英国的殖民地缅甸。到当年3月，日军已攻克仰光；到4月，日军又攻克缅甸中部，切断了中缅公路。自此，盟军与中国之间唯一的陆上交通线被日军掐断。[37]

上述国家和地区在当时都是欧洲人或美国人的殖民地。中国也曾沦为半殖民地，而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所占领的地区主要是欧美列强势力所在的东南沿海地区和东北地区。泰国是当时南亚-东南亚地区唯一独立的、没有受到殖民统治的国家。日军没有武力入侵泰国，而是与其签订同盟条约（1941年12月21日）。整个东方战场实际上是以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曾受欧洲殖民统治或受欧美影响的地区为中心的。

随着美军进入战场，形势逐渐向有利于同盟国的方向逆转。在西线，美、英两国的海军和空军在各个战场上都取得了对德作战的优势。1942年11月，英美联军在法属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登陆。1943年5月，法属突尼斯的轴心国部队投降。1943年7月，盟军从北非进攻意大利。尽管盟军在进攻中掌握着空中优势，但地面作战却异常艰苦，推进缓慢。这一路进攻没有为最终战胜德国贡献很多。

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西线的总攻拉开序幕。[38]登陆作战的盟军由美军、英军、法军和其他被纳粹占领的欧洲国家的军人组成（波兰人最多），还有来自同盟国在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各殖民地的战士。1944年8月5日，美军和法军在法国南部尼斯和马赛之间的海岸登陆，沿罗讷河谷地北进。从诺曼底登陆的盟军在8月25日占领巴黎，9月4日夺下比利时，9月11日夺下卢森堡。[39]

当盟军从西面和南面攻入轴心国本土时，东线的苏联红军死守阵地，顽强地阻挡着德军的进攻。他们先后与德军展开了几场旷日持久的争夺战，伤亡惨重。其中最关键的一役是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进行的斯大林格勒[40]保卫战。此役之后，东线战局扭转，苏军捷报频传。

[41]在美、英两国在军事、工业等方面的援助下，苏联红军一路向西杀入德国。

在“二战”中，盟军方面掌握的两项技术优势大显神威：一是他们成功地破译了德军和日军的无线电密码，截获了其机要情报；[42]二是他们在1940年时已经开发出运行良好的雷达防御系统。这两项技术的成功是盟军后来连战连捷的主要原因。德军曾发起一次强有力的反击，在盟军西线攻势中杀出一个豁口，史称阿登战役（the Battle of the Bulge，1944年12月16-25日）。但到1945年1月底，盟军又将此役中的失地悉数夺回。此后，盟军从东、西两线快速向德国推进，势如破竹。1945年4月28日，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被国内反法西斯力量擒获，在科莫湖畔被枪毙。两天之后，即4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自杀。[43]

在东亚，日本的殖民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覆灭。美军占领了上海等中国沿海城市，并进驻北平和天津。在美军先后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之后，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2日正式签字投降），美军随后占领日本。1945年9月8日，美军占领朝鲜半岛南部，半岛南北分别由美国和苏联管制。[44]西方和苏联分治为半岛此后数十年间发生的悲剧埋下伏笔。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中央欧亚

在中央欧亚东部，苏联和日本在中国内蒙古与蒙古国边境爆发诺门坎（Nomonhan，Khalkhyn　Gol）战役。当时内蒙古在日军占领之下，而蒙古国则是苏联的盟国，驻有约3万苏联红军。自1939年春季起，日、苏两军开始在内外蒙古边界地区不断爆发冲突。到当年7月，冲突升级，全面战争爆发。到8月底，苏军以横扫之势击溃日军。9月16日，双方签订停火协议。1941年5月，苏、日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45]此后，苏、日双方相安无事，直到“二战”结束前最后几个月，两军才再度交手。

“二战”的烽烟也蔓延到了中央欧亚西部。德军在乌克兰、南俄草原一路挺进，向东最远进入伏尔加河流域，向东南则深入高加索地区。1942年底，德军进入卡尔梅克共和国。一部分卡尔梅克人投靠德军，想借此获得独立，摆脱斯大林的统治。少数卡尔梅克人加入了德军，并在德军撤退时为其殿后。苏联收复此地之后，将卡尔梅克自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撤销（1943年12月27日）。卡尔梅克民族全体男女老幼因叛国通敌的罪名被集体迁移至西伯利亚、中亚和萨哈林岛的一些“特别定居点”——实际就是集中营。[46]1944年5月17-18日，苏联从德国手中重新夺回了克里米亚，克里米亚鞑靼人遭遇了与卡尔梅克人相同的命运。他们被牛车集体运往中亚。多达20万鞑靼人倒毙在前往中亚的途中。在苏联军中服役的鞑靼人在战后也被发配到中亚的“特殊定居点”。苏联政府当时计划将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历史、文化、语言和民族认同统统从世上抹去。[47]

在新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分裂政权于1944年成立，受外国势力支持，折腾了一年半后倒台。

西藏处在国民政府和英国的控制之下。中、英两国同属反法西斯阵营，西藏地区并未遭受兵燹之祸。

“二战”后的革命

印度革命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消息震动了全世界。英国因战争消耗而实力锐减。其殖民地印度当地的人民看到了希望，于是加紧了争取独立的步伐。1919年，英国当局赋予印度人一定的自治权限，建立起英国议会制的“民主”政体，受德里的英国殖民政府监管。

在“二战”中，日军攻取了东南亚除泰国以外的各个地区（包括英国的殖民地马来西亚和缅甸），威胁着印度。英国人需要依靠印度军队抵挡日军西进，防止其与北非的德军会师。因此，他们又赋予了印度人更多的自治权。

1946年，英国终于同意印度完全独立。1947年8月15日，印度次大陆被分成两个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次年，缅甸和锡兰也宣告独立。印度从此不再仅仅是一个地理或文化概念，也不只是印度次大陆上的小政权；它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不幸的是，政客们又人为地制造出一个乱局。印度的穆斯林想要成立自己的国家，于是英国将印度次大陆一分为二，划为两个分属不同宗教的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这无疑是极其短视的一步。最糟糕的是，印度穆斯林的国家巴基斯坦的领土竟然被一分为二，东、西两半之间被印度阻隔，相距约2000千米。[48]英国和印度政客们做出的这一系列愚蠢决定是后来该地区爆发战争、民族冲突等事件的导火索。

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1927年，国共内战爆发。后来，日本侵华，国共停战，联合抗日。随着1945年日本投降，“二战”结束，国共内战再度打响。毛泽东领导的人民解放军从中国北方地区投降的日军手中接收了大量先进武器，又收编了投降的国民党部队，收缴了大批先进的美式装备，因此壮大了实力。国民党军队曾在战争初期占据攻势，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最终战胜了国民党军队。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毛泽东一派是激进的革命派（现代主义者），他们接受现代“科学的”共产主义思想。新中国的首都从靠近沿海的南京迁回内陆城市北京，

其重心再度从沿海地区和海外世界转向内陆和中央欧亚。

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前已经解放了内蒙古。1949年12月2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改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1949年底，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疆，新疆解放。

西藏当地的分裂势力面对全国解放的大势忧心忡忡。由于其内部政治斗争激烈，且新扶立的达赖喇嘛年纪尚轻，因此他们也没能采取实质性的行动。

1950年至1951年，人民解放军开进西藏[49]，西藏和平解放。到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之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是当世人数最多、装备最精良、作战经验最为丰富的陆军之一。当时西藏的地方势力断无任何机会阻挡他们解放西藏的步伐。

中央政府在上述3个地区实行少数民族自治体制，表面上是效仿苏联的体制，不久后，推行汉化和现代化政策，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包括推行无神论。这在客观上加速了对中央欧亚原有文化的冲击与变革。

1959年，西藏首府拉萨发生公开叛乱，但被中央政府彻底粉碎。十四世达赖喇嘛在最后时刻逃出拉萨，仅偕少数护卫翻越喜马拉雅山，逃入印度。中央政府于是改组西藏地方政府，成立自治区。

在中央政府平定拉萨暴乱、重新封锁边境之前，已经有大约10万藏民受到达赖宣传的影响，越过喜马拉雅山逃往印度、尼泊尔和其他周边国家。在印度流亡期间，达赖喇嘛及其信众逐渐在世界范围内鼓动了一批支持者。他们向各国政府施压，迫使其有所作为。

1989年，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达赖喇嘛，以示部分外国势力对中国政府持续施压，声援西藏独立。但中国政府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势力的决心未被动摇。

伊朗革命

恺加王朝（1779-1921年）日益腐朽、衰落，在1921年被雷扎沙（Rezâ Shâh，1925-1941年在位）推翻，巴列维王朝建立。在“二战”期间（1941年），雷扎沙被迫逊位，其子穆罕默德·雷扎沙（Mohammed Rezâ Shâh）登基。“二战”之后，这位新君逐渐在伊朗大规模开展自由

化和现代化运动。到20世纪70年代初，伊朗的物质生活水平、社会稳定程度和经济发展速度都远超其周边各国。伊朗与美国及西欧各大国维持着密切的盟友关系，不久便成为主导该地区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区域强国。

但自由化、经济增长和世俗化严重威胁了极端保守的什叶派穆斯林教士的利益。此前，他们对农村地区广大的文盲、半文盲民众几乎拥有无限的支配权。在当时流亡伊拉克的激进原教旨主义者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1902-1989年）的领导下，伊朗掀起了推翻雷扎沙的统治、建立现代"民主政权"的运动。雷扎沙昔日的西方盟友此时也公开支持"民主"运动。在众叛亲离之下，他被迫出走海外。1979年2月1日，霍梅尼回到伊朗。他和他的支持者立即夺取政权。11月5日，新成立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生效。霍梅尼去世之后，"共和国"的总统被任命为"法基赫的统治"（Walî-i Faqîh），即最高领导人。

冷战

在欧洲，"二战"获胜四国美、英、法、苏分区占领德国。[50]位于苏军占领区内的柏林也被四国分区占领。由于苏联在其占领的中欧、东欧各国支持社会主义革命，陆续建立亲苏政府（西方国家称之为"卫星国"），西方各国与苏联之间很快产生裂痕。奉行"资本主义"的西欧、美国、日本等国与奉行"社会主义"的苏联、中国等国之间的关系日趋恶化。但这两大阵营之间的斗争却并没有演化成一场全面战争。一般认为其原因是两大阵营都开发出了核武器，而这种杀伤性武器可以摧毁整个地球。核威胁时刻笼罩在世界的上空，这反而阻止了大战的爆发。这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对抗史称"冷战"。

在冷战中，两大阵营对抗最为激烈的前线在德国，尤其是处在西方占领区和苏联占领区之间的柏林。柏林的西方占领区被苏联占领区环绕，与德国其他的西方占领区隔绝。1948年6月1日，西方三强达成协议，决定合并三国占领区，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苏联方面迅速做出反应，切断了西柏林所有对外联系的陆上、水上交通线。这一举动反而刺激了西方阵营，它们对苏联一方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

美欧各国在苏联封锁西柏林的11个月中（1948年6月24日-1949年5月11日），采取空投物资的方式支援西柏林。1949年5月8日，在西方

国家与苏联谈判取消封锁期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式成立，其首都定在科隆附近的小城波恩，地在前英占区中。3天之后，斯大林解除了对西柏林的封锁[51]；同年，他即在东柏林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与西德对峙。

在西欧各国和美国的支持下，西德很快走出战后的阴霾，最终成为西欧的第一经济强国。东德则和其他东欧国家一样，在战后经济持续低迷，远远落后于西欧国家。东欧各国时而爆发追求政治自由或经济自由的运动，均遭到苏军的镇压。1955年，西德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苏联随后牵头建立华沙条约组织（华约）以应对北约。自此，欧洲被美、苏两国一分为二，两国各自在西欧、东欧建有多个军事基地。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被流放于中亚、西伯利亚等地的卡尔梅克等民族终于有机会获得平反。1957年1月7日，卡尔梅克自治州在卡尔梅克人的故地内重建，卡尔梅克人得以重返其位于伏尔加河三角洲西侧的家园。次年，卡尔梅克自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恢复[52]。而克里米亚鞑靼人和伏尔加日耳曼人则一直没能获得平反。他们无法返回其故地，对他们的压迫贯穿整个苏联时代，甚至延续到苏联解体以后。[53]

苏联中央在战后对中央欧亚各地的支援零星有限，于事无补；中央欧亚持续与世隔绝，加速滑向贫困的深渊。与此同时，俄罗斯的教育体系将科学新知传播到中央欧亚地区，一些出身中央欧亚的领导人得以在苏联的官僚体系中爬升至高位。

中国的共产主义——毛主义，并没有引起美国人的太多关注，因为美国只求将中国封锁在世界体系之外。中国周边的国家深受民粹现代主义的影响。[54]东南亚各国先后陷入恐怖中。在柬埔寨，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革命运动使一两百万柬埔寨人惨遭杀害。在缅甸，民族主义缅甸军人政府上台，大批屠杀国内少数民族。类似的惨剧不断上演，直至21世纪。

20世纪，欧亚大陆还先后爆发了其他战争，造成了大量的伤亡和破坏。其中较为重大者有：西班牙内战（1936-1939年）、朝鲜战争（1950-1953年）、越南战争（1956-1975年）、两伊战争（1980-1988年）、前南斯拉夫解体时爆发的巴尔干战争（1991-1995

年，即波黑战争）。在中央欧亚地区，则有阿富汗内战（1978年起）。这些战争大都被看作内战，但实际上都有外国的军事介入。

欧洲以及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在20世纪频遭战争蹂躏。这使得生发于欧亚大陆的美国文化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霸权，取代了过去欧洲的霸主地位。美国人向外输出他们的现代主义意识形态。他们认为，他们所谓的“民主制度”[55]（共和制政体的一种）是好的，其他形式的政体则一概是恶的。他们积极致力于在世界各地推翻当地合法政府，扶立英-美式（Anglo-American-style）现代共和制政权。到20世纪末，共和制政府已经成为世界的主流。即使在少数尚存的君主国，如尼泊尔，和仅存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英-美式民主之风也日盛。

激进现代主义在中央欧亚

从清朝和沙俄瓜分中央欧亚起，直到20世纪的最后，中央欧亚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区域已经在欧亚大陆的政治版图中消失。中央欧亚被大国吞并，中央欧亚民族对大国政治的任何反抗行为都遭受镇压。激进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横扫欧亚大陆如卷席，各地的文化皆受到影响。中央欧亚民族被迫放弃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服饰、文化等。一些变化是可喜的——卫生的普及、现代教育的兴办以及世俗化政府的建立，等等。这些当然值得大书一笔，但他们遭受的破坏却更多。

20世纪，现代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造成极大破坏；虽然中央欧亚并未直接卷入两次世界大战中，但其文化却受现代主义荼毒最深。这是为何？答案不在中央欧亚本身，而在于主导中央欧亚的那些国家的文化中。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先要理解欧亚大陆整体在20世纪发生的剧变。

这一系列剧变肇始于欧洲和欧洲统治下的海上系统。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开始，这些地区发生了一系列相关的经济、人口、政治和文化的变化。欧亚大陆沿海地区的大城市经历了极端的商业化和密集的工业化（它们最初即因此而兴起），这一过程伴随着爆发式的人口增长。到20世纪初叶，世界上规模最大、工业化程度最高、最富庶和最具影响力的城市都在欧洲、欧亚大陆沿海地区和欧洲各国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在这些汇聚着当时人类最先进文明成果的地方，科学技术每日都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社会面貌日新月异。这使得人们更加确信，“现代的”比“古代的”更好。大众城市文化的领袖们还青睐民粹主义——一种从启蒙运动和革命中发展出来的思想。这两种思想结合其他的思潮共同形成了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后来推动了一系列政治、社会和文化变革的发生，深刻地影响了整个欧亚大陆。[56]

现代主义的核心观点很简单，而且观点本身貌似并无危害：现代的、新的、时尚的事物一定比之前的要好。现代主义在前现代时期还没有对世界产生太大的影响。当时它还只是一种对时尚和技术进步的偏好，而且社会上尚有古典主义（认为旧的事物比新的更好）与之分庭抗礼。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从事现代工业、在城市生活的平民

人口逐渐主导了欧洲、北美乃至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经典”逐渐与“贵族”画上等号，成为“现代”和“平民”的对立面。世上再无经典和非城市的贵族的立锥之地。但现代主义不仅仅是一波兴替——一套新事物（工业的和城市的）代替一套旧事物（贵族的和乡村的）。如果“新的”就是“好的”，那么理论上人们就需要不断地创造“新的”事物。真正的现代主义意味着革命到底：不断地否定传统的或之前的政治、社会、艺术和文化秩序。

革命到底意味着之前发生的一切，包括之前发生的革命及其结果，都是不好的，应被否定。即便是理性精神——自由提问、独立思考、逻辑和质疑——也被看作旧贵族知识分子的旧观念和旧行为。因此，它受到“保守的”宗教领袖、政客和记者无休止的挞伐。这些所谓的“保守派”通常都是最狂热的现代主义者。现代主义所催生的政权形式——法西斯、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义暴政，无一不需要广大群众无条件地服从其领袖所宣扬的激进理念。无怪乎现代主义可以在20世纪通过令人发指的世界大战和大屠杀来达到其成功的顶峰。[57]

随着现代主义者将君主制政体认定为“旧的”政体，民粹主义者[58]先后在欧亚大陆各国建立起各式各样现代的非君主制政体，从极权主义的法西斯政府、独裁政府，到“民主制”共和国。到1951年，现代的非君主制政体已在欧亚大陆上几乎所有国家建立。[59]不管一个政体叫什么，其一切行为都是以“人民”“群众”的名义去做的。

革命性的社会、政治、文化（确切地说，是反智的）、艺术（反艺术的）的现代主义肇始于欧洲的沿海地区。政治现代主义是近现代政治变迁的背后推手，其最近的思想源头可在启蒙运动中找到。启蒙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是卢梭（1712-1778年）。他曾在生活的各个层面提出革命的观点——许多观点都是有益的。但这些观点后来都变成了具有煽动性的观点。法国大革命（1789-1799年）可被视为现代主义对欧洲的第一次冲击。当时的野心家们大肆宣扬启蒙思想家提出的“民主”“自由”等理念，以此蛊惑人心，制造出一个暴力血腥的时代。法国大革命只是一场更大的风暴的前兆。进入19世纪，工业革命的浪潮席卷西欧、北美和日本。这些地区也因此快速实现城市化。军事技术的进步使战争变得异常惨烈，先进的武器可以轻易地在战场上造成大规模的杀伤。工业、城市和军事这三方面的发展使权力从居住在乡下、崇尚高雅文化的传统贵族的手中转移到了城市平民的手中。到19世纪末，现代主义已经

基本奠定胜局；在20世纪，它已在各领域进入全盛时期。

在“一战”中，海上强国——英国、法国及其在欧洲、美国的盟友，以及亚洲的日本——击败并惩罚了陆上强国。其后果并不出人意料——欧亚大陆的陆上大国德国、俄国和中国（1927年中共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等国接二连三地爆发激进的革命。在整个20世纪中，新的科学理论、技术和意识形态层出不穷，取代既有的一切。民粹主义的“民主”政治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使权力集中到了一批无所不用其极的野心家手中。结果便是，欧亚大陆上数以千万的民众死于人祸，而文化现代主义最具破坏性的形式则在中央欧亚泛滥。

现代主义与艺术的毁灭

现代主义生发于欧洲的主要工业城市和欧洲人控制下的沿海地区。现代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城市的、商业的、工业化的沿海文化对精英的、贵族的和依赖于土地的内地文化的一种反动。因此，它不可避免地会对已经丧失独立地位的中央欧亚产生强烈的影响。

在社会主义最为狂热的时代，如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斯大林时代以及1966-1976年中国的“文革”十年浩劫，激进的现代主义横扫中央欧亚。[60]成千上万座承载着中央欧亚民族艺术和建筑传统的修道院、寺庙、基督教堂、清真寺、经学院、圣墓和犹太教堂被关闭或拆毁。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苏联，“有形的宗教事物几乎全被摧毁。沙皇俄国境内到革命前夜尚有5万座东正教堂，此时仅余数百座仍开放”[61]。犹太教堂也曾遍布沙俄境内，但到1966年时，据说在苏联境内“仅余62座”[62]。在1917年，沙俄境内有26279座清真寺；到勃列日涅夫时代（1964-1982年）后期，苏联境内仅存200座。而在阿塞拜疆一地，1917年时约有清真寺2000座；到1990年仅余55座。[63]据中国官方的统计，西藏自治区原有寺庙约2700座，其中80%在1965年以前已被拆毁；又经过“文革”十年浩劫，仅有13座幸存。[64]蒙古在斯大林时代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在这些宗教机构服务的宗教人士中，高僧大德大有人在。他们被逐出寺院教堂，被迫还俗[65]；很多人还被关进监狱，或被送到劳改营，甚至被直接处决。他们的书籍和法器大都被销毁。苏联在中央欧亚地区建立起现代的学校和大学，但其教育质量甚至比不上欧美最小、最不起眼的学院，遑论对学术或科学有什么新的贡献。[66]代表着旧时代精英世俗文化的贵族、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遭遇甚至更为悲惨——要么被关进监狱，要么直接被处决。在文化领域，现代主义对中央欧亚地区的荼毒远超其他地区。

和政治领域一样，艺术领域的现代主义同样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启蒙运动。在20世纪之前，虽然最伟大的艺术家们无不是通过突破传统的限制，甚至打破规则而取得成功，但他们的创作理念尚在传统和现代之间保持着平衡：传统的艺术理念是向上的，要求艺术家在基于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形成的传统规则的框架内，尽可能地创造出接近于完美标准的艺术品，而现代的趋势则是向下的，要求艺术家能够创造出改

变传统或现行规则的艺术品。因为这两种理念在当时尚未分高下，当时的伟大艺术家并没有彻底颠覆规则，而只是扩大了其外延或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修正。及至20世纪初，整个西方的政治和文化氛围乾坤一变，现代主义一统天下。不光君主制被废除，宫殿、公主等所有与旧文化有关的文化符号统统被弃如敝屣，其中当然也包括传统的文化和艺术理念。民粹主义的理念取代了贵族的理念，自然而然地消除了文化典范的观念——正如叶芝所说，这些伟人“披着金衣行走，展示他们热切的心，让俗人感受到他们的灵魂更加伟大”[67]。从此，社会的各个领域都不再有高高在上的典范供人效法。只要足够聪明或狠辣，人人都有机会攫得金钱和权力。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些有权、有钱的“强盗式贵族”（robber baron）取代了老式贵族的地位，但他们和新兴的民粹主义政客们一样，心中只有贪欲，却无半点儿精神追求。老式贵族对下属负责的传统也被丢掉了。这已是封建时代流传下来的贵族文化的最后一丝印记。这种文化的源头可以上溯到中央欧亚文化系统中的主人-私兵关系。“有品位的资助者”或“文化典范”这样的贵族观念统统被摒弃，一如旧秩序下的其他种种；这其中还包括一种观念——曾经有或应当有一套被普遍接受的、基于自然律的规则，而艺术作品的创作则应符合这套规则[68]。

在政治-社会层面，贵族精英的阶级地位被从平民头上剥离，民粹主义制度大行其道，这在思想和艺术上的直接反映便是追求完美的精英与追求一般生活的普通人之间的二元对立消失了。诗原本与散文相对，处于精英地位；现代诗人则将其剥离精英地位，使其不受格律限制，变成一种略有粉饰的散文。这种形式门槛极低，人人可以写，因此取代了真正的诗。绘画几乎不再需要多少训练和审美品位了（实际上，现代主义反而明确提倡对这两者的压制），它只要求绘画者有向画布上洒颜料的能力。在绘画、诗歌和音乐等高级艺术领域，传统的形式被摒弃，而取代了旧有形式的新兴形式也在不断地被抛弃。[69]其后果便是，“艺术”甚至是“美”的意义的沦丧[70]，以及当代艺术被多数精英阶层拒斥——他们转而去保存和发展过去的艺术形式。一种新的流行音乐形式——摇滚乐，因其旋律简单、和弦简单、节奏简单，几乎人人都能弹奏或演唱，于是取代了精英的音乐。[71]除了在博物馆和大学中，现代主义席卷了艺术的各个领域；它扼杀了艺术，也埋葬了死去的精英文化。

画家和其他视觉艺术家大多依靠直接出售他们作品的原作获利。为了赢得客户，从而在艺术市场上获得成功，他们必须想方设法吸引眼

球，而此中最佳的手段便是要敢于比别人更有攻击性。起初，只要艺术家颠覆了某种前现代的艺术手法或传统，就可以轻易达到这种效果；他们通常也并非为了搏出位而故意为之。很快，想要出名就得比以前更加有颠覆性，后来发展到轰动效应（shock value）直接决定出名的程度，甚至是市场价值。并不是说，具象的艺术就一定好，拒斥它的画家就不对。具象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艺术家们公然拒斥这样的观念：美应是大自然的视觉序列的完美组合。[72]现代美学家阿多诺（Adorno）敏锐地指出："自然之美……现在甚至都不再是美学理论的话题了。"自然之美与艺术之美密不可分，"艺术理论不变的前提是要反映自然之美"，甚至艺术创作的实践也应如此。[73]

因为现代主义就像永久革命一般是一种反动的现象（a phenomenon of reaction）[74]，艺术家们需要通过颠覆前人的作品来寻求变化。毕加索（1881-1973年）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现代派画家，他就曾数次变换自己的风格；斯特拉文斯基在音乐领域亦如是。他们这样做出于相同的原因：只有变换风格，才能卓尔不群，甚至要区别于曾经的自我，才能保持"现代"，从而将作品卖出好价钱。毕加索中期的作品在当时曾引起过轰动，但到了20世纪末，则只有其早期的作品还保留较多的艺术价值（这里姑且不论商业价值[75]或历史价值，譬如其最著名的画作《格尔尼卡》）[76]。这些作品是具象的、传统的，并没有明显地尝试靠轰动效应这种本质上非艺术或反艺术的手段来取胜。

历经20世纪，现代主义在艺术领域发展形成一种肤浅的永久革命，它与共和制政府（理论上由选举体系形成的）肤浅的永久革命平行发生。其后果便是永久的平庸。[77]在艺术领域，现代主义者并不真正去回应先前的艺术家的理念或创作技法，而是全盘颠覆他们，用全新的理念和技法取代他们[78]——他们想要另起炉灶。不断地推翻已经建立的标准，这必然导致一种后果——"彻底的贫乏：空洞无力的手势和呐喊"[79]。当基础不断被颠覆、传统的技法消失殆尽之时，仅剩的一种技法就是颠覆基础，这种傻子都能做的事也被视为艺术了。于是，艺术家们必然要去反对同行们之前的作品，也要去反对自己早先的创作，并尝试以完全不同的风格取代它们。这种状态在逻辑上的终极表现就是将整个行业的根基打烂并弃如敝屣：他们拒斥以任何已知的或设想出的定义来限定的艺术。艺术内涵沦丧的后果只能是：这些所谓的"艺术家"创造出来的物件空洞且没有内涵。[80]

诗歌之为诗歌的决定性特征在历史上的任何时候、在世界的多数地区都是一致的：以韵律或重音为基础形成的规则节奏、多种形式的节奏（在一些语言中主要是辅韵和类韵）以及其他的音乐因素。而现代诗人们摒弃了这些诗歌的必要元素，采用自由体。咏唱诗歌的传统在欧洲各国的衰落促进了这种转变。在现代主义滥觞以前，诗歌已经被拿来像散文一样读了。大多数西方现代派诗人从未听过诗歌被以传统形式吟唱，他们的成长环境决定了他们不会理解这样的事实：诗歌，无论是抒情诗还是史诗，都曾是一种写而为唱的语言。现代派诗人为标榜他们的作品是诗歌而采用怪异的断句、词汇和语法，这就是自由体诗歌与散文唯一的区别。现代诗人要以一种自己都感到奇怪的方式才能读出自己的诗作。[81]无怪乎现代派诗人很难再写出一首本质上不是散文的诗歌。艾略特通常被认为是20世纪英语世界最伟大的现代诗人，但如果没有其好友庞德（Ezra Pound，1885-1972年）助其重新编排，他也很难写出名作《荒原》（1922年）。即便如此，《荒原》在艺术方面依然存在重大缺陷。[82]艾略特的作品基本上已被20世纪以其他语言写作的诗人超越，甚至一些以英语写作的诗人也超越了他的水平，譬如爱尔兰诗人叶芝（1865-1939年）和威尔士诗人迪伦·托马斯。当然，他仍是20世纪最受关注的英语诗人。[83]这并非因为他的作品在艺术层面最佳，只是因为在其最初成名之时，其作品展现了巨大的冲击力和颠覆性，因此显得更“现代”。[84]于是，他的作品很早就被现代主义运动奉为圭臬。

尽管现代派作曲家的无调性创作常会产生令人震撼的超音乐的智力因素——本质上是数学、图像、文本或哲学因素，而非听觉因素[85]，但他们创作出来的“音乐”却丧失了在任何文明中音乐之为音乐的要素：节奏、旋律和自然和谐。[86]泛音系统以大自然自身的声学规律为基础，包括人类语言的声学规律。在此之上建立的和谐与旋律线的主导地位受到了音乐家们的颠覆。自然旋律也受到拒斥。无怪乎现代派作曲家在抛弃古典音乐传统的同时，也逐渐被西方艺术音乐的听众抛弃。因为人类听觉系统的结构决定了，无论何种声音，但凡其与自然泛音系统产生过于极端的冲突，必然刺耳。在艺术家需要大批拥趸追随才能生存的年代，现代派音乐家的作品却正在将听众从音乐厅赶走。[87]他们的作品与那些无智的，甚至明显反智的“流行音乐”成为对立面。“流行音乐”顾名思义，正是为了与极其不受欢迎的现代派艺术音乐相区分。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流行音乐甚至已经赢得部分上流社会人士的青睐；这类人在19世纪绝不屑于听流行音乐。很快，听爵士乐也开始变得更摩登、更高级——这显然比强忍着无聊和听觉折磨去装腔作势地听现代派

作曲家们晦涩难懂的作品要愉悦得多。[88]

20世纪公认的最伟大的现代派作曲家、俄罗斯人斯特拉文斯基（1882-1971年）曾数度尝试其他现代派作曲家创造的新风格。其早期作品芭蕾舞剧《春之祭》（*The Rite of Spring*）问世之后曾引起轰动。该剧于1913年在巴黎首演，当场引发骚乱。[89]他后来屡次尝试重现此作的轰动效果，通过采用现代派新风格，彻底割裂了与传统风格的联系，最终取得了成功。到20世纪末叶，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中最广为接受者仍是包括《春之祭》在内的其早期芭蕾舞剧作品[90]。这些作品在广义上仍属于有调性的。专业作曲家对序列音乐的崇尚，公然拒斥建立在自然泛音系统上的和谐，导致许多传统音乐会的听众不再听新式艺术音乐。

现代派艺术的乏味和有意的反审美是整个时代知识贫瘠的直接反映。因为人首先是自然的造物，人反对自然以及对人工产品（尤其是机械）的崇拜必然导致冲突和毁灭。虽然现代主义发轫于启蒙时代，而启蒙时代又以理性为标志，但随着现代主义逐渐与民粹主义合流，知识与理性的原则因其并非大众所具备的特征，竟也逐渐与传统秩序画上等号，它又因此与贵族精英画上等号。于是，理性的理念和传统的艺术理念——秩序与美，一同遭到摒弃。或许这就是学术界中现代主义的后现代变体产生的源头。

事实证明，全然不受自然秩序或基于自然秩序的早期作品影响，凭空创造出一种新风格几无可能。但是，现代主义迫使艺术家公开否认他们自己的作品与上述两者之间的关联。因此，他们无法确定究竟什么是艺术，无法界定艺术家究竟应该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么做。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去定义“艺术”、“音乐”和“诗”这些词汇。

在当下的时代，艺术的概念对艺术作品不再起到任何内在的约束，以至于没人能够判断一件东西到底是不是艺术品。更有甚者，有的东西被视为艺术品，而另外一件类似的东西却不算，因为其差别并不在眼之所见。这当然不是说艺术品的界定是随意而为，只是传统的标准已经不再适用罢了。[91]

在流行艺术家填补现代派反艺术家们制造的空白之初，他们根本就没被看作艺术家。只是在市场价值与艺术价值画上等号之后，这些流行艺术家（主要是音乐家和舞蹈家）才开始被冠以艺术家之名。[92]不论

人们对他们的作品作何评价，至少他们还是以艺术家原初的含义来要求自己的——致力于创造美。这就与绝大多数的现代派艺术家不同，他们拒斥对艺术、美，甚至艺术家的所有定义。

对从事创造性工作的人来说，生活从来不易。但在过去，艺术家和匠人们会有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地位，因为贵族需要他们。虽然在现实中贵族可能会很坏，但贵族实际代表着一种理想，既是被大众所仰视的理想典范，也是贵族们所期待达到的理想状态。仰望星空，他们追求完美，因此他们雇最好的艺术家和匠人来创造完美，而这些艺术家和匠人也会全力以赴去实现。艺术家们要么为了上帝去全力创作，要么为了比他们认为的更“高级”的人去全力创作，虽然教会或贵族实际上都不一定比他们更好。试图颠倒乾坤，将最低劣的人置于其他人之上，这并不能取代旧有的秩序，因为没人会仰视最低劣的人。这样做的结果只会是秩序本身的解体。今天，艺术家和匠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也没有任何东西取代它。艺术的目标大多已经丢失。现代主义的全面胜利意味着有意识地摒弃理性、艺术秩序和美等传统价值。

现代主义并不像全面的世界观一样是一种哲学思想或运动，它适用于生活的所有方面。激进的政治现代主义的胜利，对中央欧亚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深刻影响。

现代主义在中央欧亚和西欧的历史有着鲜明的差别。在欧洲，尽管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且偶有一些现代主义建筑，巴黎仍然以其优美古老的传统建筑为特征，其博物馆和图书馆中也满是古典藏品。现代主义主要是扼杀了新的艺术品的创造。在中央欧亚则不同。到20世纪末，现代主义对中央欧亚的历史遗产的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

---

[1]艾略特的作品从很多方面完美地诠释了20世纪的现代主义以及民粹主义的胜利。

[2]后来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中、苏双方交恶，曾爆发热战，即1969年在乌苏里江爆发的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3]有些学者甚至将中央欧亚研究称为“边疆研究”。他们对中央欧亚语言一无所知，他们的研究视角全部是从其所专长的周边国家（如俄罗斯、中国）出发。

[4]关于目前处理现代历史的资料来源，见注释91。

[5]现代西方民主制也被作者视为一种民粹主义。——译者注

[6]导致这种结局的一个原因是民粹主义政客以君主作为替罪羊；其实各国君主及君主制本身并非“一战”的罪魁。

[7]Dillion（1998:302）。

[8]Millward（2004:4）。

[9]蒋介石的北伐军在1928年6月8日占领北京后，改北京为北平，以示其从首都地位降格；首都改在南京。

[10]Teed（1992:506）。

[11]关于“一战”以及世界史中的欧洲中心论，参看注释92。

[12]最后一位沙皇尼古拉二世在旧俄历1917年2月逊位。他和身在俄国的全部皇室成员，包括其远亲，全部在1918年7月7日被布尔什维克处决（Millar 2003:1298）。

[13]当时俄国使用儒略历，因此这场革命被称为“十月革命”。

[14]但是在“二战”爆发之前，大众汽车并未投入生产。

[15]爱因斯坦等当世顶尖的科学家在这期间逃离德国。后来，他们将自己知识和才能贡献到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事业中，助盟军战胜了德国及其轴心国盟友意大利、日本。

[16]Weiss（2000）。纳粹同样对其他一些族群展开了清洗，比如吉卜赛人。他们还屠杀了大批同性恋、残障人士等。

[17]有关“伊斯坦布尔”一名的来源，见注释93。

[18]英国外交大臣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曾公开承认，英国政府在巴勒斯坦、印度和其他许多西南亚、南亚国家犯下严重的错误（http://news.bbc.co.uk/2/hi/europe/2481371.stm）。

[19]“欧洲介入（中东）所造成的最重大的影响就是‘一战’后奥斯曼帝国的解体。这片土地原本处在一个统一的政权之下；欧洲人在此制造出一个全新的分裂局面，一些政权的出现还是人为安排的结果。这种分裂的局面延续至今，没有改变。”（Stearns 2002:751。）

[20]这场运动的名义也是求新，但与20世纪西方流行的现代主义没有关系。实际上是一场向西方（欧洲）学习的解放运动。

[21]喀山是鞑靼斯坦的首府，在19世纪末是俄国甚至欧洲的文化中心。当时一些顶尖的学者曾在喀山大学任教。

[22]Khalid（2007）。

[23]Millward（2004:4-5）。

[24]虽然这些经济政策的直接后果尚无定论，但在1932-1933年大饥荒中饿死的数百万苏联人肯定与政府的经济政策有直接关系。

[25]Florinsky（1961）。

[26]不知为何，大萧条对北美和澳大利亚的影响也异常严重。关于大萧条爆发的原因，学界至今仍莫衷一是。

[27]Harrison（1966）。

[28]与庞德不同，温德汉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在开战之前便不再支持纳粹，因为“他看到法西斯主义所掀起的全民狂热”，并意识到了纳粹政权“和他称之为民主的体制颇有相似之处”。（Harrison 1966:93-94，103。）

[29]他们三人在这方面的言论好听点儿说是令人作呕的。

[30]虽然当时尚保持中立，但美国一直在援助国民政府抗日，曾派遣一支飞行中队秘密进入中国，打着国民党的旗号与日军作战（即飞虎队）。尽管他们在日军轰炸珍珠港之前没有在中国作战，但美国支援中国抗日的行动，日本应当是知晓的。

[31]Dunnigan and Nofi（1998:164-165）。

[32]1893年1月17日，美国人在夏威夷发动政变，推翻了丽丽沃卡拉妮女王（Queen Liliuokalani）的统治。1894年7月4日，美国人在夏威夷宣布成立“共和国”。1898年，美国吞并夏威夷（Brune 2003）。

[33]关于珍珠港事件阴谋论、袭击的背景以及美国高层领导人事先是否知晓这次袭击，参看注释94。

[34]日军入侵菲律宾时，当地时间已是12月8日，但夏威夷时间尚在12月7日。1898年，美国在美西战争中获胜，从西班牙手中夺取其殖民地菲律宾（Brune 2003）。

[35]Whitman（2001）。

[36]Dunnigan and Nofi（1998:387-388）。

[37]Dunnigan and Nofi（1998:120-121）。

[38]Dear and Foot（1995）。

[39]Brune（2003）。

[40]此城原名察里津（Tsaritsyn），后更名为斯大林格勒，今作伏尔加格勒。——译者注

[41]必须承认的是，苏联在“二战”中付出的牺牲最大，死亡人数约2000万。

[42]Layton（1999:1193）。

[43]Brune（2003）。

[44]Stearns（2002:781）。

[45]Atwood（2004:302）。

[46]Atwood（2004:291-292）。他们平时的生活半径不能超过其所居住的“特别定居点”外5千米。

[47]关于苏联政府对鞑靼人的残酷统治，参看Lazzerini（1966）。其他民族也遭受了野蛮对待，尤其是伏尔加日耳曼族（Hyman 1996）。在“二战”中，美国将日裔美国人囚禁在集中营中；后来，他们又以类似的手段对待美国印第安人。参看Drinnon（1987）。其他的研究也显示，美国的企业和政府曾参与国外的种族灭绝计划；此问题仍需进一步的历史研究。

[48]东巴基斯坦后来独立，成为今日之孟加拉人民共和国。——译者注

[49]当时进藏部队的人数大约相当于（或超过了）西藏全部成年男性的人数。

[50]奥地利也同样被四国分区占领，但在1955年即获得完全独立。

[51]Brune（2003）。

[52]Atwood（2004:291-292）。

[53]接替斯大林掌权的赫鲁晓夫将克里米亚半岛划给了乌克兰，这使得鞑靼人在当地的政治地位更加不确定。此后，还是有很多克里米亚鞑靼人冲破重重艰难险阻，返回故地（Lazzerini 1996）。苏联解体以后，伏尔加日耳曼人大都放弃了重返故地的希望，移民德国（Hyman 1996）。这两个自治共和国再也没能重建。

[54]法国、美国曾先后试图阻止共产主义进入越南，终告失败。

[55]确切说来，美国的政体以前不是，现在也不是民主制，而是共和制。其国内两党分别取名“民主”“共和”纯属偶然，徒有其名。两党的实际主张根本不涉及政府组织形式的“民主制”或“共和制”理念。

[56]关于当代历史地理中的现代主义，参看注释95。

[57]甚至在最可怕的恐怖结束之后，现代主义艺术继续在中央欧亚中传播，特别是通过建

筑，因为外国统治者拆除了传统的中央欧亚风格的建筑，并用现代建筑取而代之。中央欧亚城市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该地区的文化遗产也随之变得贫乏。

[58]“民粹主义”这个词有不同的含义。从这里的讨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对它的用法。它蔓延到中东和其他一些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义地区，形成一种极其有害的现代民粹主义形式。这可不是好兆头。

[59]到20世纪末，民粹主义者已经消灭了所有其他形式的政府。除了少数与世隔绝的小国，世上的每一个国家都自称现代的民主国家。实际上，它们无一实行真正的民主制度，其中甚至鲜有真正的共和国；多数是独裁政治，好一点儿的算是寡头政治。

[60]中国内地同样深受其害。

[61]Walters（1993:16）。许多教堂被改为他用，成为粮仓、货仓等。

[62]Rothenberg（1993:190）。“（据官方材料记载）1917年至1927年，23%（实际是26%）的犹太教堂（总数为1400座）和基督教堂被关闭，但这个数字明显偏低。有些城市就有超过100座犹太教堂，教堂的总数和被征用的数目都应该更高。”1400应是乌克兰一地犹太教堂的总数，因为当地犹太教堂数量“到1927年时减少到1034座”（Levin　　1988:82）。到1980年时，尽管已经去斯大林化，但整个苏联境内也仅余92座犹太教堂（Levin 1988:774）。

[63]Ramet（1993:40）。

[64]Shakya（1999:512）。“在1958年至1960年大跃进期间，内蒙古的寺院基本全被关闭。我推测，到1960年时所有寺院已全部关闭。”（C.Atwood，Per.comm.，2007。）在苏联，“清除佛教的运动于1932年前后在布里亚特展开。到1937年前后，当地寺院已全部关闭。在‘二战’之后，伊沃尔格达仓寺（Ivolga　Datsang）重新开放。在卡尔梅克地区，清除佛教的运动与布里亚特同时进行。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有佛寺重新开放”（C.Atwood，per.comm.，2007）。

[65]还为女性出家人留有一些尼庵，但多数尼姑都住在家中，参看Childs（2001，2008，2015）。蒙古及其周边地区的强制世俗化，参看注释96。

[66]遗憾的是，尽管国外的非政府机构在尽力援助，这些学校至今仍无任何竞争力。

[67]Harrison（1966:47）。

[68]并非艺术家们没有意识到规则的必要性。主要由奥地利作曲家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1874-1951年）发展出的序列的、十二音体系的作曲方法确立了序列作曲的正式规则。但是，这套规则并非源于传统规则。传统规则基于自然的泛音体系。序列作曲的规则是对传统规则及其产生的自然和谐的明确反叛。

[69]被大肆宣扬的后现代主义根本没能取代现代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开始流行，但相应的‘后现代’审美标准并未出现。”（Teed 1992:309。）尽管后现代主义在某些领域（尤其是文学）里有了其他的内涵，但对系统的审美标准的拒斥仍是其基本特征之一。总体而言，它不过是现代主义这种毒瘤的另一种变体——想成为时尚先锋者为区别于既有的现代主义时尚先锋而做出的新尝试。

[70]关于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参看Adorno（1997）。

[71]摇滚乐风靡整个社会的同时，巴洛克音乐也在精英阶层的年青一代中复兴。他们中的大多数也听摇滚乐和民谣。巴洛克音乐有力的节奏和清晰的旋律线常被拿来与摇滚比较。另见注释101。

[72]Adorno（1997）用长篇幅讨论了平面艺术焦点的变化和审丑观念的相对主导地位。

[73]Adorno（1997:61，62，65）。

[74]Botstein（1998:255）。

[75]真正的现代派的观点认为，在市场上价格最高的艺术作品就是“最伟大”的作品。因此，一些艺术品卖出令人咋舌的高价后，便会令人们误以为它们就是杰出的艺术作品。

[76]普遍认为毕加索的名作大都有美学价值，笔者不敢苟同。他的画作即使有美学价值，也应当是一种历史的或学术上的美学价值。《格尔尼卡》就是一幅正统的画作。它也许是学院派正统艺术的现代派表现，因此在艺术史上有重要价值；当然，这不代表它作为艺术品本身有多高的艺术价值。如果不论艺术家的名气而单从艺术本身论，美国抽象派艺术家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的作品较毕加索的作品更能代表现代派艺术，但后者成功地赢得了世人的崇拜，因此奠定了其现代派艺术大师的地位。

[77]参看Adorno（1997:29-30）。

[78]回应会产生对先前艺术理念和技法的改良和进步。

[79]Adorno（1997:30）。

[80]关于现代派的激进主义导致艺术内涵的沦丧，参看注释97。

[81]关于诗歌与音乐的联系在欧洲及其他受现代主义影响的文明中消失的情况，参看注释98。

[82]在庞德对艾略特原作进行重新编排被发现和刊布之前，许多有洞察力的读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些缺陷。一些评论家业已指出：“即使《荒原》也有污点。”（Dyson 1986:627）

[83]尽管有海量的诗人以英语创作，但现代主义的枷锁使他们无法创作出伟大的诗作。作曲界的情况同样如此。

[84]他的首部重要作品《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1915）也是如此，作为诗歌，它在许多方面优于《荒原》，但在美学上可能更令人反感。

[85]甚至在和谐方面较保守的音乐中也有如此情况，譬如理查德·施特劳斯（1864-1949年）的音诗（tone poem）。但理查德·施特劳斯还是有所不同。在创作了大量先锋艺术音乐以后［其创作的歌剧《厄勒克特拉》（Elektra）为其巅峰之作］，他意识到欧洲的艺术音乐正在转向错误的道路，并开始在音乐结构中抵制现代主义“进步”的教条。他持续写出伟大的作品，直到去世。参看注释99。

[86]20世纪下半叶，先锋派作曲家约翰·凯奇将此种风格发挥到其逻辑上的极致，他最著名的作品是《4'33"》，这4分33秒全是静默。（在绘画方面，它可与卡齐米尔·马列维奇的《白色上的白色》《黑色方块》以及20世纪中叶的其他作品媲美。）在其他现代主文实践中，最成功的极简主义，典型的例子是音乐家菲利普·格拉斯的作品，他反对序列主义，创作由少量高音或简单乐句组成的作品，并以最小的变化不断重复。请注意，我所说的“自然和谐”并不是指欧洲、亚洲或其他任何地方特定的传统和声系统，而是指任何基于自然泛音系统的和声。

[87]一些学者认为音乐不受这一规律约束，但这似乎并不准确。参看注释100。

[88]现代派音乐“由于其晦涩难懂的表面形式，客观上促使20世纪晚期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对流行商业音乐重燃热情，认为它们值得得到较高的地位和批评关注”（Batstein 198:251）。“晦涩难懂的表面形式”是一种委婉的表达，旨在使人们的注意力远离事实:“违背了自然和谐的泛音系统的‘音乐’会使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大多数人感到刺耳或痛苦，原因不在于理论、教育和品位，而单纯在于生理原因。”

[89]《春之祭》舞蹈中粗俗的性描写及其音乐本身激起了在场观众的怒火。而这两者都是为了震撼观众而有意设计出来的。关于斯特拉文斯基音乐可能受到的影响，参看注释101。

[90]斯特拉文斯基在其先驱勋伯格去世后，有一段时间采用了序列主义手法，尽管勋伯格曾在他的第28号作品中公开讽刺斯特拉文斯基，称他为“现代斯基”。

[91]Danto（2003:17）。参看Adorno（1997:1），“不言自明，一切与艺术有关之事都不

再是不言自明了，包括它的内在生命、与世界的联系，甚至它存在的权利”。

[92]一些流行艺术家（尤其是音乐家）的作品的市场价值远远高于同时期的现代派艺术家最杰出的作品。现代派艺术家们正在变得越来越学院派。上述作品的市场价值也比绝大多数的前现代的艺术品要高。一些流行音乐家、舞蹈家确实致力于他们的艺术，堪称艺术家。但由于多数作品中缺乏精英元素（譬如优雅、美以及对完美的追求），它们很难跻身“高层次”艺术的行列，从而取代陈列在博物馆里的现代派艺术。

第十二章　中央欧亚重生

当我们策马踏上漫漫征途时我们还是少年；

现在我们的孙儿已跃上马背。

当我们在那艰难长路上策马前进时人数寥寥；

现在我们被称为大商队，在荒原中留下足迹。

足迹踏过荒野，足迹踏过峡谷，足迹踏过山口，还有无数的英雄魂归绝漠。

不要问他们的尸骨何处安放：在春天的黎明，在红柳染红的荒野，蔷薇开满他们的坟上。

但我们的足迹还在，我们的梦想还在，我们的一切就还在，直到远方。

即使风掠过，沙流过，我们的足迹，未曾湮没。

而商队也会一往无前，哪怕马儿再瘦。

这条或那条足迹某天终会再现，就在我们孙儿或重孙的脚下。

——吾提库尔，《足迹》[1]

第四次区域帝国时代

20世纪末，市场经济在中国、印度等传统国家得到迅速发展。随着苏联在1991年解体，冷战的紧张局势似乎已经结束。俄罗斯重组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其他共和国——包括地处中亚西部、高加索地区和黑海草原西部的各共和国——也重新成为独立国家。一夜之间，中央欧亚的许多地区又重新以独立政权的形式出现在世界。

这一时期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当属欧盟的发展。其规模继续扩大，一体化程度逐渐加深，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到2007年，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以西的欧洲国家几乎全部加入欧盟。尽管时常被一些民粹主义政客自私、短视的政策掣肘，但欧盟及其他几个新兴的或实行改革的大国都经历着经济的发展。它们的政治影响力因此而不断提升，在欧亚大陆的周边地区形成新的世界格局。围绕着中央欧亚的所有大型政治体——中国、印度、欧盟和俄罗斯——都在快速地发展壮大。

而中央欧亚则没有这般幸运。尽管半数以上的中央欧亚民族获得独立，但中央欧亚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体，或像欧盟一样的经济-政治联盟，因此贫困、落后和外国势力的控制依然存在。流行波斯语的中亚南部（阿富汗）和西南亚（伊朗和库尔德斯坦）、近东和巴基斯坦仍然受政教合一的民族主义政权统治。这片地区整体的孱弱也造成了邻近的中亚西部（苏联中亚）的孱弱。

俄罗斯境内各中央欧亚民族也没有获得独立，包括卡尔梅克人、图瓦人、阿尔泰人、萨哈人（即雅库特人）、鄂温克人（Evenkis）[2]以及北高加索的车臣人。随着俄罗斯经济的复苏，一个新兴的民粹主义政府重新走上以暴力方式威胁国内外批评的老路。另一方面，中国政府用各种手段维持地区稳定。在这一时期，俄罗斯等国的政策是中央欧亚整体经济复兴失败的原因之一。

同样，中央欧亚的文化也因周边政权长期的压迫而深受摧残；那些曾经或现在仍受激进的现代主义革命影响的地区受害最深。激进的现代主义革命摧毁了当地大部分的传统艺术和科学，却没能有效建立起一套新的体系来代替。随着民族独立和资本主义的引入，官方长期以来在艺

术领域打压西方化的政策终结，艺术领域的现代主义在中央欧亚的多数地区蔓延开来，而各地传统文化早已被荡尽，无力阻挡这股浪潮。另一方面，宗教团体重获新生，许多老基督教堂、清真寺、犹太教堂等未被拆毁的宗教建筑被重新修葺，再度开门纳客；另有许多新的宗教建筑陆续兴建。

欧亚大陆复兴的开端

苏联解体[3]标志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世界范围内开展的冷战以资本主义阵营的获胜而告终。苏联解体部分因为其体制上固有的弊端，部分因为其无力负担当时经济上的重负：一方面，苏联要维持一支规模庞大的常备军，不断开发新的军事技术，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军备竞赛；另一方面，它还要支持日益贫困的中央欧亚各国。1990年，波罗的海三小国率先宣布独立，引发了苏联加盟共和国独立的浪潮。苏联政府本打算压制这一事件，但在1991年8月的一次政变失败之后，越来越多的共和国相继宣布独立。终于，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31年生，1985-1991年在任）在1991年12月21日正式宣布苏联解体。[4]

苏联加盟共和国在一夜之间出人意料地获得了独立，包括位于高加索和中亚西部的各共和国。独立后的俄罗斯从蒙古、中亚和东欧各国将驻军撤走，结束了自二战结束以来对这些地区的武装占领。不幸的是，俄罗斯境内的“二等”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区却一个也没能独立。尽管苏联解体了，但俄罗斯人却绝不轻言放弃其在沙皇俄国时代和苏维埃时代就已占领的土地。资本主义最初在俄罗斯只是流于形式，其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几乎还是苏联时代的原班人马，因此独立的民营企业很难合法经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都采取了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经济模式。

在20世纪，现代主义在政治领域的胜利是压倒性的。到1951年，民粹主义者在欧亚大陆几乎所有国家中都成功地建立起现代的非君主制政府——既有法西斯集权制政府、社会主义政府，也有所谓的自由主义“民主”共和国。到20世纪末，民粹主义几乎取代了所有其他形式的统治模式。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除了个别极小的或与世隔绝的国家）都声称本国是现代民主国家。实际上，它们没一个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大多数甚至算不上共和国，最多算独裁国家或寡头国家。现代主义取得了完胜。

中国经济的复兴

在毛泽东去世后的第二年，1978年，中国的领导集体开始慢慢地引

领中国走向市场经济。最初，中国允许少量外国资本进入，主要是寻求廉价劳动力的外国制造业公司。这一尝试获得了成功，给外国投资者和中国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中国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中国在经济和科学技术领域的急速发展使其从贫穷、欠发达国家的行列中一跃成为世界经济的引导力量，并已拥有强大的空间技术。这一历程仅仅经过不到30年的时间。中国经济的前景一片光明。与苏联的情况不同，中国境内的中央欧亚民族没有独立。中国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打击国内的分裂势力。

印度经济的复兴

尽管不如中国那么耀眼，但到20世纪末时，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已几乎与当时的中国持平，而从人口角度看，印度经济的增长甚至更快。印度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大国地位已逐渐被国际社会接受。但遗憾的是，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还在印度各地流行，威胁着印度政治的稳定，阻碍着印度文化的发展。印度许多农村地区还处在相对原始的阶段，经济依然落后。另外，社会主义在流行印度教的尼泊尔发展壮大。尼泊尔地处喜马拉雅山南坡，这一地区的稳定因此受到影响。无论如何，印度在经济和科技领域的飞速发展预示着它将在21世纪的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俄罗斯经济的复兴

苏联的解体意味着俄罗斯抛下了其周边地区沉重的负担，但它留住了沙皇俄国时代征服的最有价值的那些领土。其中最为关键的地区都已经完成了俄罗斯化，包括：以圣彼得堡[5]为首的波罗的海沿岸各港口城市；索契港等黑海东北沿岸各地及里海北岸各地；以面向太平洋日本海的港城符拉迪沃斯托克为重心的俄罗斯远东地区；北冰洋巴伦支海畔的摩尔曼斯克。

苏联时代终结以后，俄罗斯人着手重振经济。俄罗斯在政治上推行非共产主义“民主”体制，但由于其政府机关多沿用旧体制下的原班人马，改革阻力重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艰难上路。然而，俄罗斯经济在改革初期即遭遇重创。鲍里斯·叶利钦（1931-2007年；1991-1999年任总统）政府的一些成员贪污、挪用本用来稳定俄罗斯货币、启动银行系统的外国援助，数额高达数十亿美元。这直接导致银行系统瘫痪、通货膨胀严重，政府无力给公职人员和数千万国有企业职工发放薪水。在某

些地区，连续数年发生多名居民在寒冬中冻死、饿死的事件，尤以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情况最为严重。这些年中，俄罗斯是世界上人口减少速度最快的国家。

在俄罗斯国内长期存在的如黑市一样的非法经济这时成为俄罗斯经济的希望。这种经济形式在苏联时代就一直存在，并已发展出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形式。在21世纪初，俄罗斯国内存在着诸多政治、社会问题，比如政府迫害商人、黑社会组织猖獗（其实和政府也没什么区别）、极端民族主义泛滥（攻击俄罗斯犹太人、外国人以及所有长相不够像俄罗斯人的人士的事件与日俱增）以及许多苏联时期的外交、军事政策的死灰复燃。尽管如此，新型的俄罗斯经济已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中央欧亚各地重登世界舞台

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独立的浪潮中，高加索三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相继独立。黑海草原西部的乌克兰完全独立，但从黑海草原东部直到亚速海、从北高加索草原直到阿斯特拉罕的区域仍然是俄罗斯的领土。这两片区域中的一些地方已经俄罗斯化，但多数地方在文化上仍然以非俄罗斯文化为主，尤其在北高加索地区，包括位于伏尔加河下游和高加索山之间草原地区的卡尔梅克共和国（说蒙古语）。

在中亚，幅员辽阔、拥有大量俄罗斯人口的哈萨克斯坦独立。与其一同获得独立的还有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中亚五国在经济上尚难独立，在许多方面仍受外国势力的操控。但无论如何，独立带来希望，使它们有机会面向更加广阔的世界。

俄罗斯国内许多非俄罗斯人的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区也在为民族独立而奔走呼号。最为成功的案例是前鞑靼自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前雅库特自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这两个自治共和国幅员辽阔，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它们有足够的资本与俄罗斯人讨价还价。因此，在苏联时代，它们的地位几乎与各加盟共和国相当。苏联解体以后，它们在俄罗斯联邦中获得了半独立的地位。这其实比完全独立的状态更有利，因为它们不必负担沉重的军费等独立国家所需的开支，可以一心一意搞建设。然而，随着俄罗斯经济的复苏，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抬头，威胁着鞑靼人和萨哈人（雅库特人）对本地资源的控制和他们独特的民族文化。

车臣尼亚（Chechnya）的车臣等民族则没能取得同样的成功。前车臣-印古什自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曾在1944年被撤销，全体车臣人被流放他乡。直到1956-1957年，他们才被允许重返家园。邻近的高加索三国相继独立之后，车臣也要求独立。在与俄罗斯的初次冲突结束之后，双方签订协议，承诺车臣在5年以后可以获得独立地位。但其后，俄军进入这个弹丸小国，车臣战争爆发。这场战争历时颇久，造成的破坏巨大。车臣尼亚的许多地区被夷为平地，大量车臣军民死于战火，而车臣军队也杀死了许多俄罗斯士兵和平民。[6]

尽管蒙古国早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作为苏联的盟国和卫星国，大批苏联军队在该国长期驻扎。苏联解体以后，该国依旧挣扎在贫穷和落后中。加上其对中国的恐惧，它始终与俄罗斯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欧盟

这一时期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便是欧盟的形成和快速发展。[7]苏联垮台之际，之前有苏军驻扎的东欧各国重获完全独立的地位。1990年10月3日，两德统一。[8]西德是欧盟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前东德地区自然进入欧盟。2004年，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匈牙利、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塞浦路斯和马耳他加入欧盟。[9]欧盟又在2007年将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发展为新的成员。自此，欧盟几乎囊括了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以西的所有欧洲国家。甚至在没有中央政府的情况下，欧盟已经成为世界格局中的一支主要政治力量。虽然常有各国民粹主义政客为私利煽动群众、掣肘欧洲统一，但欧盟仍在不断发展，其影响力在不断增加。

中央欧亚积贫积弱

尽管许多中央欧亚国家重获政治独立，并逐步恢复其民族文化，但整个中央欧亚地区的极端贫困，加上苏联时代遗留的体制痼疾，使得各政权多为独裁统治——当然，它们全都自称民主共和国。其中一些国家开始挣脱旧有体制，逐渐走上民主、开放的道路。

新疆和西藏仍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政府重视这些地区的安全，加大维稳的力度。无论何时何地，两地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一旦抬头，便会受到政府的严厉打击。中国的多数地区正在经历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物质繁荣，但新疆和西藏部分地区的经济还达不到沿海地区的发达程度。中

国政府因此制定了沿海发达地区对上述地区的对口帮扶政策。

地区性的自由贸易区在世界其他地区陆续出现，却唯独不见于中央欧亚；时至今日，仍然看不到半点儿迹象。个中原因主要有：狂热的原教旨主义作祟（塔利班势力为罪魁），导致阿富汗的局势持续不稳定；俄罗斯和苏联各共和国表面上建立资本主义政体，骨子里还是苏联时代的运作模式；中国新疆、西藏的反分裂斗争任重道远。因此，中央欧亚整体上还处在积贫积弱的状态，经济、文化发展落后，政治气氛紧张。

2001年9月11日，阿富汗塔利班政府公开支持的恐怖组织——基地组织对美国的平民和军事目标发动恐怖袭击，造成数千人不幸遇难。美国政府随即做出反应，发动所谓“反恐战争”，出兵支援阿富汗巴达赫尚省的塔吉克人。巴达赫尚省位于阿富汗东北部，是当时唯一不在塔利班控制之下的省份。在短暂的内战之后，塔利班政权在2001年11月即被推翻，民主政体在阿富汗建立。2002年，卡尔扎伊当选总统。基地组织势力大都被镇压或赶走。遗憾的是，阿富汗仍然在分裂主义的争斗中挣扎，而塔利班很快死灰复燃。塔利班势力越来越多地采取基地组织的恐怖袭击策略，阿富汗难免再度陷入水深火热中。[10]

海上贸易体系和中央欧亚

在新的区域帝国时代之初，传统的沿海国家和大陆上的周边国家之间的分野依然存在。朝鲜半岛一分为二，一边朝向海上国家日本，一边朝向大陆。东南亚继续由一些人口密集的小国占据；阿拉伯海沿岸有数个重商的小型君主国；黎凡特地区依旧四分五裂；英国虽然是欧盟成员国，但在许多方面与欧洲国家不一致，不愿参与合作。[11]整体而言，属于海上贸易体系的各国在新时代之初依然保持着经济上的繁荣，发挥着相应的政治影响力。

环绕着中央欧亚的主要周边势力——印度、中国、俄罗斯和欧盟——同样强大，且发展势头迅猛。唯有西南亚一地缺乏区域大国。这和当地、外国的原教旨主义势力对当地的破坏和压迫有关。

随着中央欧亚许多地区获得独立，准噶尔汗国覆灭之前的欧亚大陆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新获独立的中央欧亚各地主要包括：中亚西部和中部草原（中亚五国）、中亚南部（阿富汗）和东部草原（蒙古国）。它们在政治上还互有纷争，在经济上依然贫困落后，在国际上易

受外部压力左右。它们可以与海上贸易体系的诸小国进行类比，但考虑到它们历史上的经济繁荣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影响力如今早已不在，这种类比已了无意义。

经济、政治的前景

新独立的中央欧亚国家大都拥有一个现代的“民主”政府：由贪婪的独裁者或善于煽动群众的政治强人控制的伪共和制政体。现代民粹主义中危害最大、最具破坏力的一种——政教合一的原教旨主义在这些国家泛滥成风的风险依然很大。当地的观点认为，阻止原教旨主义者上台掌权的唯一途径是沿用苏联的手段对政治、宗教事务进行管制。因此，中央欧亚复兴的前途显得渺茫。

中央欧亚文化系统显然不会因为古代丝绸之路沿线经济带的复兴而重新被唤醒。中亚西部新独立的国家的经济完全依赖石油、天然气、棉花和毒品（阿富汗）等产品。根据经济学原理，毒品显然是一种奢侈品，但反对毒品交易的政治压力当然不会使毒品成为支持丝绸之路地区经济的主要商品。蒙古是中央欧亚东部地区仅有的完全独立的国家，同样深陷贫困。领导蒙古政府的老派官员自私自利，在国家经济现代化方面毫无作为。

简而言之，中央欧亚会重新崛起成为世界格局中的一支力量，还是继续深陷贫困，受原教旨主义绑架，成为恐怖主义的摇篮，因此影响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

因为中央欧亚的三面有三个快速发展的庞大经济体——俄罗斯、中国和印度，这一充满潜力的地区终有可能迎来经济强有力的增长、文化复兴和政治稳定。但这一切发生的前提是一个统一的政治机制在这里建立：不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而是一个类似于当年的游牧帝国一样的监管机构，促进各国间的经济协作，维护政局稳定。

与此类似的是中东地区（主要是伊朗和近东）。只有当中东各民族达成一致，共同建立起一个如欧盟一样的和平、繁荣、安全、文化多元的联盟，中东地区才有可能走上复兴的道路。但目前看来，这种可能微乎其微。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自由主义（起码要在事实上实现政教分离）现在已可见于一些位于阿拉伯世界外围的国家中，表明了希望仍在，但中东的大部分地区仍然被仇恨、原教旨主义和现代性民粹主义的各种形式（包括伊斯兰教的、犹太教的和基督教的）笼罩。

现代主义与当代中央欧亚的艺术

在今日的中央欧亚各城市中不难发现，现代主义是艺术的主流。实际上，传统艺术几乎已被现代主义的浪潮吞噬殆尽，所剩无几。塔什干[12]、乌鲁木齐等主要城市的建筑几乎清一色是现代建筑，而且这些建筑还被当成点亮了城市的“艺术品”。拉萨曾经遍布藏地风格建筑精品，如今，唯有布达拉宫俯瞰着一座钢筋混凝土浇筑的现代城市。在中央欧亚，代表本地传统文化的建筑本就少之又少，而现代建筑宏大的规模和张扬的风格使这些传统建筑反而显得格格不入。年轻的艺术家受教于大学和艺术院校，在那里被现代主义洗礼。而现代主义的精髓正是：新的总比旧的好。

因为中央欧亚在经济上全面落后，在政治和文化上又与世隔绝，所以现代主义尚未完全统治这里。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现代艺术的极端形式被禁止，只有“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风格在此流行。这种风格实际是由一些现代观念与前现代的西欧精英文化的元素结合而成的。因此，现代主义艺术对后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央欧亚而言仍是新鲜事物。虽然现代主义来势凶猛，但各地人民对传统艺术的兴趣还相对较高，尤其在信教的民众中。如果中央欧亚民族能够及时地认识到传统文化的价值，品味到其中历经岁月淬炼的艺术性和美，看透现代主义的本质，那么，挽救艺术还有一线希望。

现代主义艺术的源头是欧洲，通过海上传遍世界。所谓现代主义，本质上是一场已经延续了一个世纪之久的“颠覆”运动。因为本书还要继续谈及现代主义，笔者不得不讨论几个与本书主题本不相关的问题：

为何现代艺术家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颠覆和实验之后，还没有创造出真正的艺术？

为何现代主义“颠覆”的原则一成不变，但其真正的规则却一直不甚明了？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每一代新艺术家都声称其前一代的艺术（即“现代艺术”）为败笔。绝大多数的现代主义风格或运动最多能风靡一小段时间，因为不久就会有下一代的先锋艺术出现，进而取代它们。

目前来看，艺术界的这种恶性循环——现代主义，没有任何要终结的迹象。

现代主义的乱象和艺术的毁灭早在20世纪就被一位激进作家注意到了。他在1954年的著作中指出，在这种无休止地否定前辈的极端行为进行了40年之后，年轻的艺术家将只能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去重复已被前人做过的事情，却认为这是新的作品，鼓吹其原创性。艺术家已沦为“伟大的进步之神的奴隶，而此神常心怀嫉妒”[13]。如今，又过去了53年，这种现象依然没有改变。

为何艺术不能回到从前？为何自20世纪初叶起，艺术一直处在不断颠覆的状态中，并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它将恢复到一种与当代世界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匹配的稳定状态中呢？艺术家要在艺术作品中表达其对社会和政治的感受，又要依靠社会养活自己，使社会认可其艺术，但这两方面不能兼得。全身心拥抱现代主义的艺术世界已经成为永久革命这个恶魔的囚徒——为了保持现代性、前沿、先锋，就必须摒弃之前的一切。对艺术家而言，除了“颠覆”这一恶性循环，再“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14]。“实验性的”先锋艺术家们可能已经把所有创新形式都尝试遍了，艺术本质的东西已经丧失殆尽。“理性的边界早已被逾越——没有什么值得期待。”[15]只有表面的标签还被保留，就像在多数绘画艺术中所见那样：签名（唯一的必要元素）、画框（有时也不需要）和标签（可选）是仅剩的要求。一首艺术诗就是以怪异的断句、一个标题（经常被省略）加上不对称的留白构成的文学作品。艺术音乐就是故意创造一段声音，其和谐、旋律（也可以没有）和节奏与自然中的任何声音都极端不同，遑论与流行之音相比了。“艺术家”的社会地位和行为模式还在，但是他们创造的已经不再是艺术、诗和音乐了，因为这些事物的定义以及重新定义它们的可能都已丧失。视觉艺术家不能定义艺术，诗人不能定义诗歌，作曲家不能定义音乐——连靠它们吃饭的评论家大军也没法定义它们。[16]换言之，专业人士都解释不了艺术、音乐或诗歌对于他们来说究竟是什么。他们解释不了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现代主义不但拒斥以前的各种艺术形式，更拒斥艺术理性——对自然秩序的接受，至少是认可这种秩序的存在。这必然导致了可以创造出纯粹艺术的传统艺术形式的毁灭。

稳定、繁荣以及一些艺术家在经济上获得的支持导致艺术的现代主义已经成为常态：真正的永久革命。这不啻一场灾难。“在很长一段时间

里，大家心知肚明，但都不愿道出真相，形成一种默契的沉默。包括潦倒的艺术家、专业的评论家、画商在内的所有人都在假装一切正常，假装享受着艺术的繁荣。”[17]而实际上，我们正处在一个没有真正的新艺术的时代：永久革命实际意味着停滞。

有关现代主义的批评文字只是明确了，当务之急是要创作真正的艺术——绘画艺术、音乐、诗歌等等。真正的高级艺术已经很久未见新作了，当下也没有新的创作。直到艺术家、音乐家和诗人们意识到这点，并决心致力于创造一套新的高级艺术传统，世界还只能继续依靠过去的艺术家，包括最近的现代主义。他们的作品被学者神化，供在博物馆、音乐厅和图书馆中，被研究和理智化，并被当作更加理智化、僵化的和学术的反艺术的起点。[18]

有观点认为，现代主义是艺术发展的必要一环，“推翻一切”才能促使新事物发展。不管是否必要，它成功了。对美、自然秩序等创造杰出艺术品的基本原则的公然拒斥，并以平庸、丑陋的理念代替之，如此行事一整个世纪，最终在专业艺术家中间根除了前现代艺术的全部合法性。前现代的艺术品现在只是博物馆的展品、收藏家的藏品和投资对象。

专业艺术家在现代性的魔咒下毁灭了艺术，确实颠覆了之前的传统，但现代派先锋却没能建立起新的秩序。他们不停地颠覆，直到今天。[19]

现代主义消灭了所有的阶级，代之以“平等”的观念，这导致了一个“非艺术家”的时代的诞生：人们失去了对美的理解，也没有能力判断何为艺术，何为糟粕。这种危险的运动持续影响着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艺术，持续使大多数的“艺术”变得不值得被体验。等到艺术家和受众意识到他们的生活已经被致力于在世界上消灭美的现代主义者主宰时，除了偶然的情况，世上已经不再产生美。悲莫如斯。[20]

新的精英艺术的缺位导致了意想不到的结果。新的艺术形式出现，取代了旧有形式。除了因为技术创新而产生的全新的艺术形式（如摄影和电影），传统艺术的新形式也出现了。最显著者在音乐领域，一种独特的流行音乐新形式——摇滚乐，于半个世纪之前在美国横空出世。短短10年之间，摇滚乐便席卷了世界多数地区。

到20世纪末，在蒙古、西藏和中央欧亚的其他国家或地区，本土的摇滚或流行摇滚乐队几乎表演着同样的音乐，这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情况一样。流行音乐严重影响了民间音乐，并在中央欧亚城市的日常生活中取而代之。尽管不能称其为“高级”艺术，但至少它还是音乐；或许某天它会发展成为一种精英艺术。[21]

现在艺术的希望在那些未经雕琢的新的流行艺术中。它们没有被受过专业训练的学院派先锋艺术精英引导。这些艺术精英还在现代主义及其各种变体中走火入魔。有必要去认可和理解这些还比较粗糙的新兴艺术，并发展它们，在其中创造新的艺术，而不是消灭其中的艺术。有可能专业的艺术家会采用这种新兴形式并开创一种新的艺术。必须强调的是，这里的“新”是形容词，不能喧宾夺主掩盖它所修饰的名词“艺术”。新的艺术不能完全遵循学院派“艺术家”建立的新规则，而无视自然世界的规律或过去的传统。伟大的艺术家创造艺术，但他们不能无中生有。没人能从真空中创造艺术。旧的传统已经被打破，没有必要再继续破坏了。

艺术家们应当挣脱现代主义的魔咒，再度拥抱他们所挚爱的艺术形式，并通过艺术来实现卓越。随着中央欧亚的文化复兴，其艺术也会重现当年的辉煌吗？如此，堪称一场真正的革命。如果一切成真，世界将再度拥有繁荣的、令人神往的艺术生活。

考古遗迹所见最早的伟大文明——尼罗河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河文明和黄河文明，生发在欧亚大陆肥沃的、适宜农耕的周边地带。但现代世界的文化并不发轫于此。它源自中央欧亚这片充满挑战性的边缘地区。

源出中央欧亚的充满活力的原始印欧人在旧大陆上纵横迁徙，与各地居民交融，建立起希腊、罗马、伊朗、印度和中国的古典文明。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他们的后人与其他的中央欧亚民族一起征服、发现、探索，创建新的世界体系、高级艺术和先进的科学。我们的祖先不是埃及人、苏美尔人或其他人，而是中央欧亚民族。中央欧亚是我们的故园，是我们文明的源泉。

在21世纪伊始，欧亚大陆将要开启一个文化艺术繁荣发展的新纪元。许多严重的问题亟待解决，但曙光已现。政治上最重大的进步当属欧盟，而技术上最大的突破则是互联网，它有着强大的启蒙功能。

中央欧亚、欧洲、俄罗斯、中东、印度和中国的人民会从历史中汲取经验，还是会重蹈覆辙？他们能否从现代主义、原教旨主义和民族-种族主义所制造的灾难中恢复元气、和平崛起且不对世界造成威胁？今日主导着中央欧亚的欧洲人、俄罗斯人、伊朗人和中国人能否最终给予我们共同的腹地以自由，让它再度繁荣？

这取决于他们能否恢复理性，摒弃现代主义的遗毒、民粹主义的蛊惑，以合作的态度而不是以狂热分子或暴政的姿态，坚定地融入世界。

---

[1]文本取自吾提库尔的小说《足迹》（Iz，1985/1986年）的开头，是为此诗首次发表的版本。这与后来流行的版本（Rudelson 1997:174）略有不同。吾提库尔是最伟大的维吾尔族作家之一，上引诗句便是其代表作品之一。——作者注。此处译文据作者所引英文版本翻译。——译者注

[2]在英文中，鄂温克族名常被误作“Evenks”。这种错误甚至出现在语言学著作中。究其原因应是将此词分析成俄语的复数形式。

[3]苏联解体的结局曾被苏联作家安德烈·阿马尔里克（Andrei Amalrik，1938-1980年）预测。他在1969年发表文章《苏联能挺到1984年吗？》（Will the Soviet Union Survive until 1984?）。然而，多数的西方专家无视他的预测，直到苏联宣布解体的前夜，他们依然坚信苏联的经济情况不错。如此冥顽不灵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但凡到过苏联的人都可以看到那里物资的匮乏（笔者曾在1972年到过苏联）。阿马尔里克先是被捕入狱，后在1976年被迫流亡。1991年，苏联解体，距其书标题中给出的年代1984年仅仅过去了7年。此时，阿马尔里克已经过世。

[4]他随后在1991年12月25日辞去总统职务。

[5]1924年，圣彼得堡曾更名列宁格勒（Leningrad），以纪念列宁。1991年6月12日，全城市民投票通过决议，将城市名称改回原名圣彼得堡。

[6]Nichols（2004）。

[7]之前称为“欧洲共同体”（欧共体，European Community，1967年起）；1993年起，改称“欧洲联盟”（欧盟，European Union）。

[8]1991年，柏林成为统一后的德国首都。

[9]McGeveran（2006）。

[10]McGeveran（2006）。

[11]2020年1月31日，英国正式“脱欧”。——编者注

[12]城中大批古建筑在1966年的大地震中毁于一旦。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这些损毁的古建筑大都被现代风格的新建筑取代。

[13]Lewis（1954:40）。他的著作《艺术中的进步之魔》（The Demon of Progress in the Arts）在艺术界毫无影响；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艺术界依然被现代主义的“进步之魔”牢牢统治。除了现代主义所带来的颠覆和变化，一切如故。

[14]Lewis（1954:40）。

[15]Lewis（1954:37）。

[16]除了哲学家，任何人都不应该太在意它到底是什么，但在这一点上，如果艺术家们至

少开始沿着这些思路提出一些问题，那么它几乎不会伤害任何事物。

[17]Lewis（1954:27）。

[18]学者和学院派艺术家对艺术的过度理智化（overintellectualization）几乎体现在阿多诺关于美学的经典著作的每一页当中。当然，笔者与阿多诺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参见注释102。

[19]因为现代主义声称代表新潮，代替过去的一切——它成功地取代了旧事物，还持续如此之久——现代主义本身已经变成了一种旧事物。尽管现代主义尚未终结，但艺术家和艺术史学者已经开始将现代派风格视为过时，应被取代。因此，他们中的一些人宣称摒弃现代派风格，鼓吹后现代主义。但这种超现代主义显然就是现代主义的另一种变体罢了。它作为一种时尚在建筑领域、文艺评论和思想史等与艺术相关的领域最为成功，但在美术领域却并未大获成功。今日的专业艺术家都在大专院校受科班训练，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已经在这些地方被奉为教条，被不加批判地灌输到他们的脑袋里。

[20]现代主义理论对艺术史的延伸，以及随之而来的将一套伪概念投射到过去的艺术上，迫使艺术史学家不得不转而讨论艺术家世界的社会学、心理学、数学之类的学科——除了艺术本身之外的任何事物，艺术本身则从未被探讨。从现代主义者的角度来看，这是未经检验且无法检验的，然而现代主义作为一种现象，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未经检验的。有关现代主义者和反现代主义者紧张关系的讨论，参看注释103。

[21]在现实中，从艺术家、知识分子到商人、劳工，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人们每天都在听这种音乐。等到音乐家意识到音乐发生的变化，决定去做艺术家而非反艺术家，开始接受这种源于摇滚乐的流行音乐世界语言并逐渐将其发展为艺术之时，新的、纯粹的艺术音乐才会在世上出现。关于一些音乐家在此方面的尝试，以及文艺复兴时代的做法，参看注释104。

尾声

蛮族

没了蛮族，我们会怎样？

那些蛮族才是一剂良药。

——卡瓦菲斯，《等待蛮族》

现代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在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开始的印欧人大迁徙。原始印欧人生活在边缘地带，在那里他们发展出一种快速创新的能力，生活在周边地区的各民族无法与之匹敌。当印欧人入侵时，周边各民族无一有能力做出及时的反应，其土地往往沦陷于印欧人之手。印欧人的活力被其他民族直接继承；很多情况下，这种传承就是通过印欧人的征服实现的。如《导论》所述，被征服的中央欧亚民族在役属于印欧人的过程中熟悉了最初的故事，浸染了中央欧亚文化系统。在征服的过程中，印欧人与各地原住民融合，产生出不同的克里奥尔语，即原始印欧语的子语言或印欧语系各支语言的始祖；同时也生成了以原始印欧人的活力为特征的文化。

中央欧亚文化系统的基本特征之一是，豢养私兵武士的政治需求促使统治者以奢侈品为回报赏赐私兵。这就催生了一种极大的经济需求，唯有贸易可以满足。随着游牧帝国的建立，一个将游牧民族、农耕民族和中亚城市居民三者的生产活动联系起来的贸易导向性的中央欧亚经济体宣告成形。尽管流行的叫法“丝绸之路”有误导性，但它仍可被用来指出这种经济体所含有的对外贸易因素。当然，首先要强调的是，丝绸之路经济的动力是中央欧亚内部的贸易，这种贸易基于中央欧亚居民对中央欧亚内部各地商品以及邻近的中央欧亚国家和周边国家商品的需求。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催生了周边国家对中央欧亚民族生产的或经由其手而来的商品的需求。跨地区贸易使这些经济体之间建立联系，形成一种良性的国际商贸关系。丝绸之路系统的核心是中央欧亚政权的贵族统治阶层，他们多出身草原游牧民族。

丝绸之路的毁灭并不神秘，其过程甚至有明确的记载。17世纪末，沙俄与清朝瓜分了中央欧亚。清朝攻灭了最后的游牧帝国——准噶尔汗国，并其土地，几乎夷灭其民族。中央欧亚的其他地区则几乎为俄国人征服、殖民。两强之间竖起一道封闭的藩篱。如此，丝绸之路经济的解体就顺理成章，包括曾经创造出伟大文明的中亚和西藏在内的中央欧亚各民族陷入贫困和落后的渊薮。

曾经主宰中央欧亚历史的民族——斯基泰、匈奴、匈人、突厥、吐蕃、蒙古、准噶尔、满洲等，连同他们的后人一起已经消失在世界历史的主流视野很久了。如今，他们中的一些再度出现，有的已经有了依照现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形式起的新名称。人们至少可以追问："古代中央欧亚民族去哪儿了？"或者以不准确的措辞发问："那些蛮族都去哪儿了？"[1]

“蛮族”的观念

从希罗多德时代至今，关于中央欧亚的历史书写一直被固有观念、意象和偏见主导。这个问题源于根深蒂固的“蛮族”观念以及由此对世界进行“好”与“坏”的二元划分。当然，这只是一概而论，下面将全面分析在讨论到中央欧亚，尤其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帝国时，惯常出现的修辞和主要观点。

游牧民族主宰的中央欧亚国家和非游牧民族主导的周边国家之间本质的区别在于中央欧亚游牧民族生活在草原地带，这里是马的产地，是欧亚大陆上最佳的马场。游牧民族在马背上长大，他们来去如风，可以在短时间内轻松实现远途迁移。他们还熟习复合弓，用以看护畜群和打猎，因此他们也具备作战的技能。上述事实尽人皆知。但是，与此相关的所谓“天生的战士”的理论实在过分。这种理论源自上古和中古时代“环境特征决定生理与心理特质”的观念：因为草原地带气候恶劣，中央欧亚民族不但弓马娴熟，他们还坚韧、勇猛、残忍、好战，“远胜于定居国家由贵族和农民组成的军队”。[2]

中央欧亚民族一般被认为好战、残忍、尚武，此即蛮族观念的核心。他们因此受到无情的鞭挞。在大多数有关中央欧亚的历史书写中，统治者都是通过凶残屠杀、无情谋杀等手段攫得权力。草原帝国建立的过程就是“游牧部落之间邪恶、持久的争斗”[3]的过程，这被称作“血腥的选长制”[4]。不可否认，中央欧亚的统治者们当然在上述过程以及其他的事件中造成了很多伤亡，但我们应当客观公正地看待这个问题。在历史上，中国、波斯和希腊罗马的各个王朝在建立之初无不经历了同样的过程——长期的、血腥的、背信弃义的内战。在帝国建立之时，不论是草原帝国还是周边帝国的统治者都首先被视为英雄的征服者，然后是英明的统治者。欧洲最著名的帝国的建立者罗马人“就其政治之残酷、对待异族和奴隶之无人道而言，并不比蛮族更高尚，甚至还颇有不如”。[5]所有“伟大的”政权的建立都基于“进步的”灵长类动物社会所依赖的准则——雄性社群首领等级制（the alpha malehierarchy）。因此，单说中央欧亚民族并无道理。

尽管阿提拉、成吉思汗或帖木儿的血腥征服仍多为世人不齿，但希

腊-罗马、波斯和中原王朝的帝王们同样沾满鲜血的功业却受到古往今来的史家热情赞颂。非中央欧亚出身的史家从古到今都对自己祖先野蛮、无情的侵略行径视而不见。最有名的（即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当属史家对罗马人的态度。他们不批评罗马人虐待奴隶，也不批评他们为娱乐大众而折磨、残杀无数生命，只是因为他们折磨和杀害了基督徒才批评他们。[6]古代和中世纪史料大量记录了古代“文明”国家侵略、背信弃义和有组织的暴行，但现代历史学家仍旧指责中央欧亚民族为野蛮残暴的一方，而为“文明”国家战胜中央欧亚民族的事迹高唱赞歌。诚然，中央欧亚民族之间以及他们对周边民族确实曾施以武力暴行，事例也不胜枚举，但要跟罗马、波斯、中国及其后继者相比，单以残暴而言，则实在是望尘莫及。

在对最近出版的有关斯基泰考古的两部专著的书评中，作者在评论了斯基泰大墓出土的金器之美后写道：

精英阶层的购买力并不依靠乳酪和羊毛的有序生产提供。这是一个靠武力说话的社会。也有可能，斯基泰社会的真实面目被丰富的文献和考古资料遮蔽。但希腊语文献的记载（尤其是希罗多德和希波克拉底的记载）[7]和考古发现之间惊人的一致基本可以排除这种可能。[8]

这番言论重复了传统的论调，即斯基泰等游牧民族主要通过他们非凡的武力攫取财富，并且肯定了人们对他们的看法是基本正确的。但是，古希腊时代的文献即已显示，斯基泰人的财富大都通过贸易、税收而非战争途径获得。在希罗多德时代4个世纪之后，斯特拉波谈到了游牧民的农产品出口，并提及他们对战争的畏惧：

尽管游牧民是战士而非流寇，但他们只会为了被拖欠的贡赋而去打仗；因为他们会将土地转让给任何愿意耕种的人，只要他们收到他们认为合适的（合理的）贡赋，就会满意。如果租种土地者不缴纳贡赋，游牧民就会出兵……如果贡赋按时缴纳，他们绝不会使用武力。[9]

今日人们对斯基泰等草原民族的误解主要源于被广泛接受的“饥饿的游牧民”理论。据此理论，生活在草原地带的中央欧亚民族自身无法生产足够的生活必需品，必须依赖周边民族生产的农产品、纺织品等产品，并觊觎他们的财富。[10]“先进的”周边帝国并不如此地需要游牧民族可怜的、贫乏的产品，当中央欧亚民族无法通过贩卖其畜牧产品获得其所需要的物资时，他们就会出兵以武力抢夺。这套理论已受到狄宇宙的系

统批判。他指出，无论是历史文献还是考古发现，都没有证据支持这套理论。现在业已证明，中央欧亚民族本身也从事农业，并且以和平的方式向其他民族征税或与之贸易，从而获得他们需要但不生产的物资。当游牧民入侵周边地区时，他们无一例外地掠夺牲畜和人口，而非农产品。[11]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中央欧亚民族，尤其是游牧民族，实际上生产出了超出其所必需的食物。因此，他们通常比周边的农耕民族更加高大和健康。

他们也自己生产日常所需的衣服、首饰、工具、车具、住房、马具、兵器，并且拥有技术纯熟的金属加工工业。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们错将一种生产模式（如农业、金属加工业、商业或游牧畜牧业）与一个政权画等号，即将一个社会中某个群体的主要谋生手段与整个政权或国家的生产方式画上等号。按这种逻辑，政权在哪里都不可能建立。即使在农业社会这种逻辑也无法成立，因为统治者们必须将时间用在治国而非种地上，生产兵器者也不应将其宝贵的时间浪费在不擅长之事上。概言之，错误就在于误认为以中央欧亚草原地带为中心的政权必然由“纯的”游牧民构成，并如此“简单”。诚如此，则“饥饿的游牧民”理论才能成立，因为以这样的生产方式生产的物资绝不可能满足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的全部需求。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从斯基泰到准噶尔，我们所知的所有游牧民族主导的政权都是复杂的。希罗多德详细讨论了斯基泰地区生活的不同种的斯基泰人，这种记载本身就足以说明所谓“非自给自足”“饥饿的游牧民”理论及其危害更大的诸多衍生理论的错误。斯基泰人从事的生产活动不但种类繁多，而且这些生产模式几乎与周边民族的一样，因为这两类地区的政权都会向对方领土内扩张，从事农业和畜牧业生产的民众在两种政权内都有。

中央欧亚政权也是多民族政权，可能正是这种多民族、多文化的性质带来了麻烦，因为这与由同一民族构成的现代民族国家的理想形式相去甚远。现代民族国家是从前现代较小的多民族欧洲国家发展而来的。[12]周边列强将民族国家理念强加在中央欧亚各地，中央欧亚经历着其在前现代任何时候都未尝经历的挑战。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则不能将现代的情况和观念投射到古代。

包括游牧民在内的中央欧亚民族确实觊觎邻国的奇珍异宝、奢侈品，但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欲望与周边民族的欲望有何不同。[13]可能唯一的不同是，中央欧亚民族热衷于通过交易他们的剩余产品或他们在

其他地方的交易所得，来换取他们想要的商品，即使在战争时期也如此。[14]

中世纪阿拉伯地理作家对其所撰述之地生产和销售的物产兴趣浓厚。在中亚这个大市场上交易的商品囊括了当地出产的和从远近各地贩运而来的各种原材料、加工商品和手工制品。其中许多都由草原民族生产。譬如，一则对10世纪从中亚进口的商品的描述如下：

来自花剌子模，紫貂、白鼬皮、白鼬、草原狐皮、貂、狐、河狸、斑点野兔和山羊；蜡、箭、桦树皮、毛皮高帽、鱼胶、鱼牙、蓖麻、琥珀、加工好的马皮、蜂蜜、榛果、隼、剑、盔甲、哈兰只木（khalanj wood）、斯拉夫奴隶[15]、绵羊、牛。所有这些都来自保加尔，但花剌子模还出口葡萄、大量葡萄干、杏仁糕点、芝麻、条纹布料、地毯、毯子布料、贵族礼品的缎面、mulḥam织的覆盖物、锁、 Áranj织物、最强之人才能拉开的硬弓、拉赫本（rakhbīn，一种奶酪）、酵母、鱼、船（后者也从怛蜜出口）。从撒马尔罕出口的有银色的织物（sīmgūn）和撒马尔罕布料（Samarqandī　stuffs）、大型铜制器皿、工艺高脚杯、帐篷、马镫、辔头和皮带。来自迪扎克（Dīzak），细羊毛和羊毛服装。来自别那克忒（Banākath），突厥斯坦的织物。来自赭石（塔什干），马皮制的高马鞍、箭服、帐篷、皮子（从突厥人进口再鞣制）、披风、礼拜毯、皮革制披肩、亚麻籽、精制的弓、粗制的针、出口给突厥人的棉花、剪刀。又是来自撒马尔罕，出口给突厥人的绸缎、以及被称为木马尔贾（mumarjal）的红色织物、锡尼兹（Sīnīzī）布、许多丝和丝绸织物、榛子等坚果。来自费尔干纳和白水城，突厥奴隶[16]、白色织物、兵器、剑、铜、铁。来自怛逻斯，山羊皮；来自沙尔吉（Shalji），白银。突厥斯坦和自骨咄禄（Khuttal）的马和骡子被驱赶到这里。[17]

巴托尔德指出："花剌子模人在与游牧民的贸易中得到了最大的利益，据伊斯塔赫里（Istakhrī）记载，他们的繁荣完全是因为与突厥人的贸易关系。"[18]上引清单中与草原民族（这里是突厥人）有关的商品种类如此丰富，这直接反映了如下事实：理论上，中央欧亚民族生活在三个不同的生态-文化地带，从事三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实际上，他们不仅相互进行贸易，而且已经紧密地结合成了一个经济整体。传统的丝绸之路概念只强调进入各周边国家的异域因素，臆想出这样的情形：出现在丝绸之路两端的贵重商品一定是通过长途贸易商队而来，就像输油管道

一般[19]，而中央欧亚当地除了贫穷的游牧民和零星的绿洲城市之外，再无人烟。即使那些相对客观看待中央欧亚的学者也将其看作一条贸易道路或道路的集合。譬如，大卫·克里斯蒂安将丝绸之路定义为“亚非欧三洲主要地区间物质、观念和人口交换的中长途陆上线路”，一直将丝绸之路称为“一个交流系统”，并强调“丝绸之路是一个涉及多种不同交换的持续变化的路线网络”[20]。这种定位可能比之前的各种定义有所进步，但仍然需要修正。丝绸之路绝非贸易路线网络或者文化交流系统，它是中央欧亚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系统，该系统重视商业贸易（包括对内和对外）。从这层意义讲，“丝绸之路”和“中央欧亚”本质上是指称同一事物的两个术语。从更严格的经济意义上说，丝绸之路就是指中央欧亚的经济。

汉文、希腊文和阿拉伯文史料皆记载草原民族最热衷贸易。中央欧亚民族在征服的过程中所采用的谨慎方式就很说明问题。他们尽量避免冲突，尝试以和平的方式收服城市。只有当该城抵抗或者降而复叛时，才根据当时的规矩施加报复性惩罚，而这种规矩其实在古代欧洲就有。[21]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欧亚征服者通常也不会赶尽杀绝：他们会留下商人、工匠以及其他有生产力的男性，并将女人和孩子收为奴隶。这些史料至少在如下方面是正确的：中央欧亚民族征服扩张中的首要目标是控制贸易线路或商业城市。这样做是为了获得可以征税的领土，以满足统治者的花费。为何这套逻辑听起来和属于定居文明的周边国家的所作所为一样？因为两者其实就是一回事。[22]

传统的游牧民的“掠夺、寄生”模式仍被一些学者提倡，其中最具影响者为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譬如他曾写道：

突厥的崛起跟匈奴一样，依靠的是其军事力量。在他自立之初，突厥就开始从华北的两个敌对王朝北周和北齐那里获取供奉。突厥并不需要入侵中原以对他们施加压力。两个王朝都害怕之前柔然造成的破坏重现以及草原上的征服者。突厥从两个王朝那里都获得了巨额馈礼。有时候，突厥也会派兵协助北周进攻北齐。随着突厥以马易绢，贸易也开始繁盛起来。553年，突厥带着5万匹马来到边界进行贸易。木杆可汗在位期间（553-572年），北周每年给可汗10万匹缣帛，并被迫在都城接纳大批突厥人以表示友好姿态。北齐不久之后也给突厥以大批钱财。……东突厥人从中原获得丝织品，而西突厥人则将之卖到波斯和拜占庭。[23]

引文所见充斥着刻板印象的观点源自对汉文史料中最有偏见性的部分的曲解。作者没有讨论材料所具的倾向性和这些材料之间的矛盾之处，同种史料中就有明显与此相反的、更为可靠的记载。这种观点已经受到中央欧亚史专家的充分批驳。[24]

读者或许会追问，如果游牧民并非强悍的蛮族，如果他们真的只想和热爱和平的“定居”民族开展贸易，那为何定居民族还要被迫去建造城墙等防御工事去抵御中央欧亚民族呢？

在古代，边境的墙大都是周边地区的政权所建。在战国时代的中国，不同政权（多数是汉人所建）建造了规模很大的此类界墙。其最初的目的是巩固从邻国占领的领土，防止人口逃入邻国（与现代的柏林墙有些类似）。秦始皇将各国在北方所建的界墙加固、延伸，成为长城，此举也出于相同的目的——巩固从匈奴手中夺得的大片领土，防止汉人陷入匈奴。在汉武帝“废除”合约以后，匈奴人屡次“劫掠”汉地，这毫不奇怪：汉武帝单方面地打破盟约就意味着向匈奴正式宣战。[25]因此，这些“劫掠”并非尚武的匈奴人的肆意之举，而是在面对更加强大、更加有武力扩张野心的汉朝向他们宣战时绝望的出击。

萨拉斯（Psarras）[26]曾指出，双方都曾因国内政治原因，做出过破坏盟约之事。但是，关于匈奴方面破坏盟约之事，笔者认为应当保持审慎，因为我们没有任何匈奴方面的史料，对汉文史料的记载需要细致阅读和重新理解。已经有学者注意到，当汉文史料充足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发现，匈奴的军事行动往往是防御性的或是对汉朝进攻的反应。[27]与建立起庞大政权的其他中央欧亚民族一样（也与汉以及其他的周边政权一样），匈奴在其政权建立的阶段难免对其邻国造成压力，这种压力可能包括对周边政权的直接入侵。但是后世史料更加充足的例子（譬如准噶尔汗国）表明，草原民族几乎只是相互厮杀，他们尽量避免与危险的周边帝国发生冲突。[28]尽管清朝攻入了准噶尔汗国的领土，但准噶尔部似乎从来未曾入侵中原地区。尽管清朝出离愤怒，义正词严地将所有罪责都推到准噶尔部和部分西藏人、回部人头上，但事实却是：在清朝的任何时候都未尝有准噶尔、西藏或回部人的军队攻入中原地区。这些部族唯一的罪责就是他们坚持不“投降”，并在他们的土地上保留独立的君主。然而，清朝却一直被书写成正义、开化、文明的一方，是中央欧亚蛮族的无辜受害者。

在西方，匈人入侵东罗马帝国是哥特帝国的扩张战争造成的结果，

这似乎已经成为不言自明之事。哥特人先进攻匈人，但为匈人所败。匈人追逐没有归降的哥特人一直进入罗马帝国境内，于是与想收留哥特人作雇佣兵的罗马人发生冲突。罗马本国的史家则记载，罗马人虐待哥特人，后又虐待匈人，因此遭到他们的报复。

通常认为，中央欧亚民族进攻周边民族的起因是贫困和贪婪。[29]但萨拉斯则指出，尽管巴菲尔德“认为，和亲是匈奴想出来的用以勒索汉朝的手段，但他却阐明了，对汉朝而言，和亲的代价远较维持边境守卫的代价要低。果真如此的话，我们不禁要问，为何匈奴要设计收益如此低的‘勒索’”？[30]与此类似，匈人让罗马人交纳的贡赋少得可怜，说明这只是象征性的，并非实质的，完全是合理的。如果中央欧亚民族确是赤贫，需要钱、物等，他们就会索取了。

再者，如果草原生活如此艰难，那里的居民如此贫苦，为何会有周边政权下的农民叛逃到草原去？原因就是，多数游牧民可能很贫苦，但多数农民则比他们更贫苦——面朝黄土背朝天，但求不被饿死。[31]这点不但在逻辑上很合理，在汉文史料中也有明确记载（在罗马帝国的文献中也有同样的记载）。读者可能会对一些逃亡匈奴的汉人的身份感到意外：

在汉朝初期，投降匈奴的中国变节者包括刘信（韩王）、卢绾（燕王）、陈豨（代郡太守）等重要人物。同样值得着重指出的是，汉朝边境将领中有些人以前是商人，因此很可能仍维持着在王朝建立以前便已开始的与匈奴的贸易关系。[32]

早期汉文史料有关匈奴的记载和晚期希腊文史料关于匈人的记载都反映了这样的事实：一些周边地区的居民（尤其是生活在边境地区之人）已经充分意识到，在游牧民统治的国家生活比在周边的农耕国家生活要更加轻松自在，在农耕国家，农民的待遇不比奴隶强多少。[33]塔西佗记载了日耳曼人所享受的相当大的自由以及已为古代西方史家广泛注意到的农民的绝望。

（东哥特国王）托蒂拉（Totila，541-552年在位）不但接收奴隶和佃农进入哥特军队，还通过许以自由和土地的方式招引他们背叛其主子。从3世纪起，就有罗马的下层民众想“变成哥特人”，而托蒂拉的政策使得他们更有理由争相如此，以改善其经济条件。[34]

中原各朝正史也充斥着类似的论调。中原王朝和希腊-罗马的一些史家会故意借异族人之口说出他们自己对政府的批评意见。同样的意见反复出现，而且在中央欧亚民族早期的语文资料（譬如古突厥语碑铭）中也出现了同样的声音，说明这些批评是对真实情况的反映。总而言之，边境防御理论在史料中没有得到支持。

在边境驻军既为了支持这些目的，同时也为了防止汉人攻击无辜的匈奴人，防止汉朝官吏虐待为汉朝服务的当地非汉人居民，等等。避免人口、军力和财富流向中央欧亚的有效办法就是建筑长城，限制边境城市的贸易，尽量多地进攻草原民族，消灭或驱逐他们。只有这样，新征服的领土才能稳固，新征服的人民才能被同化。匈奴的进攻实际上是汉朝最不担心的一点，这在汉朝一件议论北方边塞的官方文件中有明确的体现。[35]史料中甚至提到，长城和边塞对防范游牧民入侵根本没有什么作用。换言之，如果他们的主要目的是防范中央欧亚民族入侵，那么他们早就一触而溃。如果中央欧亚民族真如传说中那么凶悍危险，他们早就直捣中原了，那历史上也就没有什么汉帝国、波斯帝国和罗马帝国了，只剩下囊括了中原、波斯和罗马的中央欧亚帝国。

还有一条证据。位于中国东北南部和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王国也曾建长城抵挡中原王朝，但并没有成功。中原王朝的大军没有为长城所阻。依靠将领身先士卒、部队三军用命，高句丽才击退了隋、唐两朝大军反复的进攻。后来唐朝利用高句丽内部的政治分裂才终于攻灭其国，消灭其民众。长城在防御方面的无用，以及建造长城的民族自己对长城真实用途的表达[36]打碎了中央欧亚神话的又一块基石。

普遍认为，中央欧亚的草原民族对中原王朝、波斯帝国抑或罗马帝国等大一统的政权来说，是纯粹的军事威胁。这种说法在中原王朝各朝正史中被反复宣扬，于是也被现代史家接受。[37]但事实绝非如此。中央欧亚民族从未入侵和征服过这些疆域广袤、人口众多的先进国家，除非它们正陷于大分裂或内战之中；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欧亚民族也很少入侵。以中原王朝为例，中央欧亚民族通常是在上述时期被中原地区的某一支势力引入，这在汉文史料中就有详细的记载。罗马时代哥特人和匈人的故事广为人知，也属同样的情况。这在晚近发生的事件中再清楚不过，因为晚近时期有着最为丰富的史料，有些史料还以中央欧亚语言写就。

譬如，满洲就是被虚弱、腐败的明朝引入中原，助其平叛的。他们

按照明朝的要求入关平叛，并从叛军手中夺取北京。据史书记载，他们被当地人民推立为新的统治者。[38]不知这种说法是否为捏造。满洲确曾长期是明朝的劲敌，双方互有攻伐胜败，并杀戮对方军民。满洲在被招引入关，并完成其所承诺的平叛任务之后留在了中原，建立起了一个新的、强大的王朝取代明朝。

再回溯到几个世纪以前，蒙古人在成吉思汗的英明领导之下，以雷霆之势横扫西方，扬名天下。但成吉思汗最主要的目标还是女真人在华北地区建立的金朝。他们曾扶植蒙古人在蒙古高原上的敌人，并使成吉思汗及其部众俯首称臣。女真人及其在草原上的盟友是蒙古人真正的威胁。尽管蒙古铁骑一向势如破竹，但攻灭金朝在华北和东北等地的势力却花费了他们多年时间。直到成吉思汗死后数十年，蒙古人才终于在金人的领土上建立起稳定的统治，并决定南下灭宋。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南宋此前一直不断地进攻蒙古人，并虐待蒙古使节。

在更早的时候，回鹘也曾进入中原。757年，他们受唐朝之请平定安史之乱。他们在中原地区造成破坏，最著名者当属对东都洛阳的反复劫掠。但这些行为都被唐朝政府批准，是财政紧缺的唐朝政府奖励回鹘靖乱的方式。[39]回鹘在中原地区的其他破坏活动似乎都是由唐朝的背约、欺骗、外交上的无礼和侮辱引发的。

唐代史料和现代的历史学家都在反复强调，游牧民是危险的，中原王朝应对其加以遏制。[40]唐朝对其周边邻近政权的进攻被认为是正当之举，因为他们是危险的；而帮助唐人向外扩张和保有新征服的领土的制度变化则被视为是防御性的：

在遭受7世纪最后几十年和8世纪初的重大挫折后，为维护一个从南满至帕米尔、从内蒙古到越南的已经扩大的帝国，新的制度框架发展起来了。这些变化把唐帝国置于一个与半个世纪前太宗遗留下来的机制迥然不同的基础之上，它成了一个通过历次大征战（一般是胜利的征战）创建的，以及靠王朝无与伦比的威信、外交和仅仅是不牢固的外围防御维系的帝国。这些变化是日益增长的外来军事压力——主要来自复兴的东突厥人、契丹人和吐蕃人——直接造成的。唐在与这些强大且组织良好的邻邦的经常性冲突中，被迫逐步建立永久性的大规模防御体系。但这一体系经过一段时期后获得了充分的进攻能力，这一事实有助于掩盖它开始时的防御性质。

这一发展的根据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民族利益（区别于帝国及其将领们的个人雄心），对此已有人提出疑问。但是批判者往往忽视了基本的战略考虑，即迫使中国人把军事力量扩大到远远超过他们可能定居的范围以外的考虑。只有这样，高度机动的游牧邻族才能被遏制，而不至于迅速和破坏性地渗入内地。[41]

事实上，这种新建立的制度（与拜占庭的“军区”制极其相似）的目的是守住新征服的领土，并以此为基地继续向邻近地区扩张。它从一开始就是纯粹的进攻性的。节度使多以投降的中央欧亚番将充任，不单单是因为他们能征善战，也因为他们比汉人将领更忠诚。[42]

而真相是，唐朝人才是危险的亡命之徒。汉文史料大肆吹捧唐朝的英雄和军队对中央欧亚民族制造的苦难。唐朝初年入侵、击败和征服了除吐蕃以外所有的邻近民族；吐蕃也只是勉强抵挡住了唐朝的攻势。唐军向中央欧亚的扩张甚至远超秦、汉，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负面影响。即使在中央欧亚政权强盛和统一之时，罗马、波斯和中原王朝也有实力入侵并击败它们，并其领土，收其民众；[43]实际上，这些帝国确实经常这么做。蒙古在统一各部后军事实力达到顶峰，但还是花了19年光阴（1215-1234年）才攻灭金朝。及至忽必烈在1279年灭掉宋朝，又过去了45年。这肯定不能算一场闪电战。我们不能忽视导致蒙古最终胜利的这些战役发生之前、之中以及之后的复杂背景。史料明白无误地显示，蒙古人反复尝试通过非战争手段建立和平的贸易关系。一般认为，“蒙古人的目标是摧毁一切胆敢抵抗的国家或城市，而不是占领、管理它们”；这种错误观念使得蒙古人又以野蛮的入侵者的面目出现。[44]但这种形象根本经不起史料的检验：从其统治伊始到结束，蒙古人最重视的便是尽可能地维持和平状态，保证贸易和税收。

从公元前1千纪中叶开始，中央欧亚的领土就一直在收缩；直到晚近，它几乎全部消失。即使强盛的中央欧亚政权也会被强大的周边政权击败，秦、汉两代以及唐代初年的例子证明了这点。即使相对孱弱的周边政权，譬如汉代以后的晋朝和晚期的西罗马帝国，也能够击败强盛的中央欧亚政权。与此相反，尽管偶尔能够成功地袭击或占领周边政权的局部地区，但强盛的中央欧亚政权从未征服一个统一的、强盛的周边政权。

关于中央欧亚的历史书写无不暗示着这样的观念：中央欧亚游牧民是天生的战士，他们坚韧、无畏、从不屈服。这种观念若是正确的，那

么前提是周边国家农民出身的战士是孱弱怯懦的。然而，没有一位罗马的史家称，罗马的农民（也是罗马的士兵）孱弱且不能吃苦。秦皇汉武时代的中原兵士曾为其君主征服许多国家，他们也绝非软骨头。罗马和中原王朝由农民组成的军队为这些大帝国立下汗马功劳，包括无数次击败中央欧亚的军队。如前所述，欧亚大陆传统农业社会的农民像奴隶一样工作，靠很少的物资维持生计。因此，虽然他们体格较小且寿命较短，但他们实际上很强壮，而且能吃苦。一个全副武装、得到充分训练的周边帝国的士兵可能比一个中央欧亚草原游牧民更可怕。诚然，游牧民在战争中很强悍，而且很小就习得在草原作战中有用的技能（主要是骑射）。他们炫耀自己的武力，颂扬自己的战斗英雄，并试图用自己的残暴来震慑周边民族。但是，从希罗多德起，亲眼见过中央欧亚民族的旅人的记载反复地展示了真实的中央欧亚民族正常的和不好战的一面。长时段的历史真相与人们的印象不同：中央欧亚民族虽然曾赢得一些战斗，但却输了整个战役。总体来看，周边民族远比中央欧亚民族要强大、危险、冷酷和残忍得多。

相较于周边的农业帝国，由游牧民统治的中央欧亚政权有一些致命的弱点。[45]有限的游牧人口分散在广袤的土地上。他们无法积蓄畜牧产品以防备牲口倒毙的荒年，因此他们比农民更加依赖天气。除了少数特例以外，游牧政权控制的城市多处于草原地带之外，游牧民在受到攻击时无法将大群的牲口收入城中加以保护。[46]这使得游牧民在面对周边地带来犯之敌处心积虑的进攻时会极其脆弱；入侵者在获胜后会掠走数十万头牛羊，而游牧民即使能骑马脱逃，也不得不面对饿死的下场。

草原上的中央欧亚民族在面对全面战争时也必须异常慎重。因为没有足够的人口去补充伤亡的战士，所以他们根本输不起。因此，他们需要以威慑的手段迫使敌人臣服，而只在必要的时候发动战争。早到有关斯基泰和匈奴的史料，晚至蒙古时代的史料，都对此点有明确的反映。游牧民族军队发动突然袭击旨在制造震慑效果，主要是心理上的影响。这种军队无法攻下设防的城市，而攻下那些深沟高垒的大城才能有最多的收获。如何才能攻下这些重重设防的大城呢？他们得像周边民族一样使用步兵和攻城机械。但问题是，游牧民并没有这种机械。这意味着，他们只能通过全面战争的方式，发动其治下的所有非游牧民藩属步行前进到目标城市，大举攻城。如此，则不会有偷袭的机会了。所谓“突袭-摧毁”的想象只是一种幻觉。此外，军事史的基本常识是，在同

等条件下，步兵总是要比骑兵更为强大。声东击西、小股作战等游击战术是弱势一方在本土抵御强敌进攻的经典战法。[47]这是游牧民抵御步兵入侵的唯一方式，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实力正面抵抗。

中央欧亚民族有理由去畏惧周边民族，因为周边民族屡次入侵、击败他们并侵占他们大片的领土。[48]在东部草原地带发现的古突厥碑铭上有对唐朝灭掉第一突厥汗国后突厥人民命运的回忆："他们的贵族男子成为唐人之奴，他们的贵族女子成为唐人之妾。"[49]

罗马对高卢的征服史也是一例。凯尔特高卢人被击溃，他们的领土被罗马人殖民，残留的凯尔特人最终被罗马人同化。[50]这就是罗马向高卢的扩张。从军事或政治的视角看，这与罗马在建立庞大帝国的过程中，以武力向其他国家扩张的行为别无二致。但有一点不同：在文化上曾是典型的中央欧亚类型的高卢人被地中海化，从此消失在中央欧亚文化版图中。日耳曼尼亚则成功地抵挡住了罗马人的入侵，直到中世纪才地中海化（或曰"欧化"）。

欧亚大陆的周边文明未尝有一地被永久地纳入中央欧亚的文化-经济带。相反，中央欧亚民族先后采用了不同的形式来抵挡周边民族的入侵，但都以失败告终。

历史上真实的图景应当处在两种极端之间。就本章所言，两种极端就是中央欧亚民族暴力、贫困、饥饿、原始落后的形象和汉人、波斯人以及罗马人文明、富足、温饱、开明进步的形象。这两种形象的形成源于多种错误认识，其中一些已在前文涉及。最重要的一种错误认识已在一定程度上被治中央欧亚史的专家们意识到，但还不够彻底。这种错误的观念便是：中央欧亚民族是草原游牧武士，他们的敌人是定居的农民和城市居民。

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都已表明，草原地带确实曾有不少城镇，甚至是一些城市。[51]这点已经被学者广泛接受。这些城市居民的文化，及其附近的农民的文化，与游牧民的文化并无巨大差别。因此，草原帝国的统治者们拥有自己的城市和农业资源，并不需要靠劫掠周边帝国的民众而获得食物[52]和其他必需品（实际上也没有证据显示他们这样做过）。这几乎已成为定论。[53]尽管这已经是对传统观点的一种修正，但它距离还原草原游牧帝国的全面图景还欠缺太多。

中央欧亚民族是由游牧人口、农耕人口和城市定居人口组成的，他们的帝国囊括了大片的非畜牧土地。游牧民当然要大范围迁徙，以避免竭尽草场。但所有已知的中央欧亚帝国都包括了上述三种社会经济因素。因为游牧民本质上就是种植“带蹄子的粮食”的农民[54]，中央欧亚帝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与周边文明并无实质差别。周边文明由三种主要成分构成：城市、农业近郊（生活在城镇近郊的农民，他们满足城镇居民的需求，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非农业经济活动）和农村（离城镇较远的农民）。在中央欧亚，情况有一点明显的不同：那里的城市人口和近郊的农民（农耕民）通常与远郊的农民（游牧民）有着不同的族属。[55]游牧人口比其他人口的流动性更强。这尤其与周边文明的农民形成对比：周边文明的农民是其社会中流动性最弱的群体。除此以外，中央欧亚高级的城市文化与简单的乡村文化（包括农民和游牧民）之间的二元对立与周边文明城乡间的二元对立是一样的。换言之，草原游牧帝国的经济、政治结构与农业帝国的政治、经济结构并无实质的差别。[56]

历史学家将游牧人口从组成其国家的多种要素中剥离出来，制造出一种“纯粹的”游牧民的假象，同时完全忽略城市和农业人口存在的现实。他们还创造出丝绸之路的假象，将之视为从中国通向罗马的道路——除了往来商旅长期受游牧民劫掠以外，这条道路与其所经过的地区没有任何关系。其实，早在希罗多德的时代，构成中央欧亚政权的三种要素就已被注意到。虽然住在城市里的人口与游牧人口并非同一民族，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草原游牧民族统治的帝国总是控制着许多城市（表现为羁縻统治）。斯基泰人以这种形式控制着黑海沿岸等地的城市，其中多数居民系希腊人和色雷斯人。匈奴也以同样的方式控制着丝绸之路沿线的城国。甚至在汉朝军队和都护进驻西域以后，他们仍能影响这些城市。其后，突厥、蒙古和准噶尔帝国皆一仍旧贯。周边地区的远郊农民生活在远离城市的乡下，因此不需要城市。同样，游牧民族也不需要建城市或生活在城市里。游牧民不可能既在草原游牧又在城市定居。这就是为什么游牧民在草原地带几乎没多少城市。但他们的帝国却需要城市。概言之，在中央欧亚帝国中，城市要素和乡村要素不可分割。这与周边帝国中的情形别无二致。

有一点似乎一直被忽视：单方面地设立边界（从原本的边界向外推进）、建设戍堡镇守新的边界（入侵者单方面宣称的“国土”）、封锁边界以及切断与外界的贸易联系，这些做法是公然的战争行为。这些举动的含义再明白不过了。不但中央欧亚民族明白这点，作为入侵者的周边

政权也明白无误。尽管他们的史书很少公开写出这点，但还是会偶有体现，抑或在异见者的声音中体现。

中央欧亚民族对来自周边政权的威胁非常敏锐。当对方在他们的土地上筑起壁垒，调动大军聚集在边境，中断贸易等，他们会立即明白这种敌对的意图。只要周边政权不以这样的方式与中央欧亚民族对立，和平、繁荣的局面就会出现。但和平与繁荣并非帝王的追求。他们的追求是绝对的权力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景象。中央欧亚帝国的君主也会有相同的野心，但这种野心是暂时的。一个中央欧亚帝国存在的目的不只是建立稳定的边界和稳定的内部政治秩序（换言之，和平），还为了支持和促进当地以及国际贸易，以此为各方带来繁荣。

中央欧亚民族对与邻近的周边帝国的城市保持贸易关系的执着，以及他们对于城市明确、谨慎的政策，都显示了城市和贸易关系对于他们的重要性。这也正是边境发生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游牧民需要直接参与贸易，就像周边帝国中的农民需要去集市一样。至少前古典时代以来，中原王朝或罗马帝国与中央欧亚民族的边境地带的主要事务就是游牧民与汉人或罗马人的贸易互市。当周边帝国官方封锁边境城市或终止互市，并在游牧民试图交涉时虐待他们，中央欧亚民族会视这种行径为引战行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奋起一战。这种故意制造冲突的事例到17世纪和18世纪沙俄、清朝瓜分中央欧亚一直都有。[57]

中央欧亚民族对于边境市场自由贸易的执着延续千年，纵横整片中央欧亚大地，不分族属，确实引人注目。记载了这类内容的周边政权的史料充斥着对于中央欧亚民族的恐惧和强烈的反商业的偏见。这不足为奇，因为书写这些史料的作者几乎都出自农业社会的贵族阶层，而非商人阶层。同时，他们还指责中央欧亚民族重商的习性，并以此为借口入侵中央欧亚地区。现代历史学家继承了周边政权史料中对于中央欧亚的负面观点。

谈及16世纪初明朝和蒙古的冲突时，濮德培写道："顽固的保守派认为与残暴的蒙古人贸易或谈判是绝不可能的。"[58]但在一页之后，他又写道："在1551年，皇帝下令禁绝与蒙古的一切贸易，违者处斩。"[59]他补充道：

达延汗之孙俺答汗（1507-1582年）在16世纪中叶掌权，成为中华帝国又一位强大的敌手。他虽然未曾统一蒙古各部，但他率领麾下的12

个万户在陕西、山西北方连续进攻明朝边境，起因是蒙古人朝贡贸易的请求被明朝回拒。这种重复发生的“请求、回拒、劫掠”循环延续40年，直到1570年。[60]

与此同时，明朝朝中也展开了广泛的辩论，权衡与蒙古贸易和战争两害孰轻。“直到下一朝隆庆皇帝（1567-1572年）时，明朝才做出英明的外交决策，与蒙古在边境和谈。”[61]蒙古人在过去数十年间反复表达了他们希望开市贸易的意图，此时明朝方才意识到，“俺答汗想要和平的贸易关系，只是在朝贡不成时他才出兵劫掠”[62]。当边境互市终于再度开放之时，“商人蜂拥至边界，贩售丝绸、皮毛、谷物和瓦釜给蒙古人；官府征收贸易税，并用这笔收入以高价从游牧民手中买劣等马”[63]。不管基于何种史料，最后一句都颇失公允；濮德培在之前还写道：“明朝加固了城墙。他们需要的主要是蒙古人的马匹，以增强守军的机动性。”[64]

上文之论述可以总结如下：中原王朝侵占了中央欧亚的大片土地，并试图通过阻止他们进入市集城镇使其贫困。再加上中原王朝富有攻击性的态度，其后果无疑就是战争。这其中也包括中央欧亚民族主动攻击中原王朝的情况。但中央欧亚民族并不想要战争，他们想要贸易，并不断地寻求与中原王朝建立和平的贸易关系。在中原王朝因战争的消耗和伤亡左支右绌时，它们便重新开启与中央欧亚民族贸易互市的大门。然后，和平和繁荣的景象会在边疆的两侧出现。

因此，蒙古和明朝之间冲突的根源就是明朝蓄意禁绝贸易的做法。此事曾在明朝朝廷公开讨论过。明朝试图以军事行动（消灭蒙古）解决问题，但以失败告终。因此，边禁被解除，双方言和。[65]

同样，准噶尔汗国和清朝之间的唯一矛盾应当就是后者不时地限制甚至禁绝贸易。因为只要这些限制被解除，和平就会恢复。[66]尽管近年来在清史研究领域涌现出颇多优秀成果，但凡言及清朝与准部战争的图景及其原因时，所说几乎都不正确。矛盾的真实原因就是清朝向中央欧亚扩张的野心。当时中央欧亚各部的领袖准噶尔部试图阻止清朝实现其野心，因此清朝不惜一切代价要摧毁准部。每当它的军事行动失败，它便与准部言和并开放边贸。当清朝一有机会攻灭准部，它便立即出兵，于是战火再起。最终的结局是清朝获胜，屠灭准部，占领了准噶尔汗国治下的中央欧亚的大部分地区。因此，尽管多数的历史记录与个人的冲突有关，遮掩了历史事件的进程和原因，但我们现在可以清晰地知

道，正是清朝的扩张主义导致了准部的灭亡。准部从未进攻过清朝，也没有什么所谓的“贪婪野蛮的”商人。诚然，准噶尔人不是天使，他们当然也有错，但从整体而言，这段历史的基本脉络显然如前文所述。

周边政权对草原民族封锁边境城市的做法就如同对本国农民关闭市集，这是蓄意破坏当地经济的行径。这种能力使得周边政权可以将在边境城市开放贸易作为一种政治经济武器，迫使中央欧亚民族为它们的空气和水而谈判。如余英时所写：“尽管汉、匈奴间的私人贸易已经在边境地区开展了很长时间，但直到文帝朝（公元前180-公元前157年）才出现了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的互市活动。”[67]应当注意的是，两个帝国的边境地带正位于中央欧亚的腹地。因此，中央欧亚民族为了贸易而“入侵”的观点纯属无稽之谈。还有观点认为游牧民族进犯边境集市只是因为崇尚暴力或贪图战利品。这种观点不但得不到史料的支持，反而与之颇相抵牾。尽管汤普森和多数研究匈人的学者一样有反匈人的偏见，对匈人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动机都有着根本性的误解，但他还是正确地指出，匈人头领的主要目标是：让罗马的市集“向匈人开放……并一直如此；交易的条件是公平合理的；匈人去市场进行贸易也没有危险”[68]。

斯基泰人在希罗多德的笔下曾被描绘成令人闻风丧胆的武士，但也在他的其他描述中显得非常友善。这颇令人费解。同样，“一战”之后的蒙古人的“生活条件与其13世纪的祖先并无实质性的不同”，在蒙古的美国间谍却将他们视为“不好战的民族”。为解释上述两例中存在的矛盾，学者得出了看似合乎逻辑的结论：希罗多德笔下友善的斯基泰人肯定是另外一个不同的民族；[69]蒙古人则因为长期的和平或受到佛教和中原王朝统治的影响，而逐渐改变了本性。[70]对于吐蕃帝国之后的西藏人，他也有同样的看法。阿提拉和帖木儿是中央欧亚历史上最令人闻风丧胆的勇士，而对他们二人的第一手描述却与上述关于“特殊的”（和平的）中央欧亚人的描述极其相似。他们都被描述成智慧、谦逊、清醒、大方、公正的统治者。

与中央欧亚民族相关的一个话题是所谓的“道德-身体腐化说”。在被周边文明的城市中的奢华物品和舒适生活诱惑时，这群曾经强悍的游牧民的道德和身体就会被腐化，因为他们抛弃了“草原上的艰苦生活，这削弱了他们的尚武精神，导致他们被当地民众或其他未受诱惑的游牧力量推翻”[71]。热衷奢侈品、懒惰、放纵等习性并不符合人们普遍认为的中央欧亚民族的形象。人类学等专业的学者通过对当代中央欧亚游牧民的

亲身考察、研究揭示，游牧民实际上过着相当舒适的生活，一般很懒惰。与邻近的农业国家的农民相比较，他们的吃、穿也更好。这其实不是新鲜事。在古代周边政权出使中央欧亚游牧部落的使臣记录中可以看到，中央欧亚人在谈判时都愿意舒服地坐在马上，而懒得下马。塔西佗论及古日耳曼人时道："在不打仗时，他们会花一定的时间打猎，而他们花在休闲上的时间则要多得多：除了吃饭、睡觉外，什么也不想。"于是，他们"展现出一种奇怪的矛盾——既热爱闲适，又憎恶和平"[72]。同样，今日访问过中央欧亚游牧民的人们也注意到，即使是往来同一个聚落的两个营帐之间，游牧民也要骑马而不愿步行。当然，我们也不应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中央欧亚的游牧民族在什么时候都很弱（尽管他们的社会经济结构确实脆弱）。同等条件下，他们也不比其他社会中的人更懒惰，更好逸恶劳。

关于中央欧亚民族的传统的历史记载主要聚焦在统治者及其他人物的个性上。这些史料记录了很多貌似是统治者一时冲动而发动战争的决定。在我们看来，这些决定背后通常都没有足够的正当理由。相对于周边地区，我们对中央欧亚知之甚少，而且这些有限的知识也大都是周边地区的史家所留下的。因此，中央欧亚民族的行为几乎被统一刻画成为不讲道理的、冲动的、暴力的、贪婪的[73]等等，而没能按照周边政权领袖提出的周到的、审慎的决策行事。概言之，我们就是对中央欧亚民族的历史和心理状态以及可能影响他们的背景情况不够了解，因此没法对他们的行为是否合理做出判断。但当我们有了足够的了解之后，他们的行为通常都可以被理解，而且是正当的。这当然不是说他们总是正义的一方，而是他们和周边政权的行为方式没有实质的不同。开战的决定通常由领袖个人做出，要么出于个人原因，要么出于误判。[74]历史学家也是人，他们不可避免地要透露出自己的倾向，但不应该歪曲整个历史图景。然而，这正是中央欧亚史所面对的问题：不管中央欧亚民族是入侵者还是受害者，他们都已经被妖魔化。当他们明显不是具有侵略性的蛮族，人们便会说这些人不是中央欧亚民族而是另外一群人。

类似的错误观点还有很多，譬如这种广为流传的神话：匈人、蒙古人等中央欧亚民族会在没有缘由的情况下，突然向周边地区无辜的、文明的居民发动进攻。这种说法有一些漏洞。最大的谬误就是，将向邻近国家扩张版图的行为当成中央欧亚民族的专利，而将其邻国当成热爱和平的、无辜的受害者。中原王朝、波斯、希腊罗马的征服者们的侵略行径被全盘遗忘，而中央欧亚民族在人性的驱动下征服邻近民众、建立政

权的过程则被大加批判。史家对中央欧亚地区的政权建立的过分关注不应使我们忘记，周边民族同样从史前时代就开始建立政权，他们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同样要征服邻近的民众。没有任何帝国的形成可以避免对邻近民众的征服，而大量的史料显示，各地王朝的建立者都会以残忍的手段除掉自己的竞争对手。而且，如前所述，中央欧亚民族对周边政权完全没有缘由的进攻行为在史料中极其罕见。

在中央欧亚帝国与周边政权已经处于敌对状态的情况下，但凡有冲突发生都会归咎于中央欧亚民族。关于冲突原因的史料的缺失以及历史记载中常见的偏见使得人们很难去探寻这些原因。在多数情况下，关于中央欧亚民族早期历史及其与周边民族接触的历史的记载根本就没有保存下来，这促进了上述错误观念的延续。但只要有相关的历史记载保存下来，即使它们由非中央欧亚民族书写，我们也经常可以从中发现，中央欧亚民族作战的原因要么是保卫家园，要么是针对周边民族之前的不义行为实施报复。罗马人自己写的史料一次次地记载了罗马人是怎样挑起与中央欧亚民族（包括日耳曼人）的战争的。他们雇用中央欧亚民族为自己作战，然后却极尽欺骗、虐待之能事，使这些人走投无路，不得不反叛。这并不是说中央欧亚民族未尝做过背信弃义之事，笔者想强调的是，不能将中央欧亚民族抑或周边民族任何一方，看成专门作恶或经常作恶的一方。双方都有扩张领土的野心。

扩张的野心并不能为任何一方的杀戮行为提供正当性。正因为双方都有责任，常见的亲周边民族的观点应当被摒弃。没有匈人的史料告诉我们匈人方面的情况，但罗马方面最好的见证者普利斯库斯在其作为罗马使者出使匈人王庭的亲身记录中，以没有歧义的语言清楚地记录了罗马人在很短的时间内针对匈人的种种行径，包括反复背约和试图行刺。在晚近中央欧亚被周边强国瓜分和征服之前，同样的例子也一直见于中央欧亚其他民族的历史中。对现存史料中常见的亲周边民族的观点的质疑是有根据的。当现存史料足够丰富时，它们都会无意地透露出，双方冲突的具体原因是复杂的，但其根源则是周边民族试图向草原地带和绿洲城市扩张，而中央欧亚民族反抗入侵或试图夺回之前失掉的领土。

有关晚唐时期北方边境的历史记载充斥着各部之间的偷袭、进攻和劫掠，汉人往往被描绘成无辜的受害者。但一些细节暴露了这番历史图景的另一方面。

大量事件显示，各部落增加的牲畜吸引着唐朝边将贪婪的目光。他

们通过不平等的互市或者强征等手段豪夺牲畜。作为报复，党项常在吐蕃的帮助下，劫掠夏州、银州一带的边州。对唐朝军队至关重要的畜产和马匹的供应逐渐落入党项人手中；与此同时，唐朝与灵州的交通线也岌岌可危。[75]

不可否认，中央欧亚民族常互相攻掠，也攻掠周边民族。周边民族同样经常互相攻伐，也进攻中央欧亚民族。罗马人吹嘘其在马尔西亚城（Marcianopolis）[76]附近战胜哥特人之事：

许多敌酋和贵族妇女被擒获，罗马各省中满是蛮族奴隶和斯基泰牧人。哥特人成为靠近蛮族的边境的耕农。没一个地区没有哥特奴隶。我们的祖先看见过多少从蛮族那儿抢来的牛羊？我们的祖先见过多少抢来的凯尔特人的牝马，它们如此地有名？[77]

双方都是人，直到非常晚近，战争都是生活中可以被接受的、正常的一部分。和平在局部地区也有发生，但以整个欧亚大陆而言则极为罕见。[78]从原始印欧人的时代起，不论古代还是现代，与盗取他们牲畜的邻邦作战对中央欧亚民族来说都是一种英雄之举。而如前段引文所示，这种行为在周边民族看来也是一种英雄之举。

以战无不胜来定义英雄，这在欧亚大陆各个社会的历史上概莫能外。如果一个希腊人因为杀死敌人而成为英雄，为何一个中央欧亚人不能因为同样的原因成为英雄呢？或者说，他们任何一方为何因此就能成为英雄呢？而且，在欧亚各文化中广泛存在的血亲复仇传统使得大家从不缺少仇人。在中央欧亚民族和周边民族长期相互攻伐的历史中，多数的冲突发生在被周边民族吞并的本属于中央欧亚的土地上，因此，中央欧亚民族对此的态度显而易见。在中央欧亚民族还击的时候，周边民族的愤怒也很明显，譬如他们对对方的贬低性称谓——在希腊-罗马世界所用的“蛮族”[79]以及在汉文世界中所用的“虏”等对异族的一般性的贬低性称谓。[80]但我们今天不应被这些称谓迷惑。

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斯基泰人等中央欧亚民族在战场上一定悍勇异常。如同古代的日耳曼人、匈人以及中世纪的蒙古人一样，这使周边民族谈之色变。塔西佗在谈及东北部的一支苏维汇（Suebi）人时写道：

阿累夷（Harii）人不但勇冠上述各部，而且还懂得在其野蛮天性之外运用诡计和时机。他们将盾牌涂黑，将身体涂色，专挑伸手不见五指

的夜里出战。这支恶煞一样的军队有着荫蔽的、令人生畏的形象，能够制造致命的恐慌，因为没有任何对手敢于直面如此怪异和可憎的形象。战场上甫一照面，对手未战先怯，败局已定。[81]

只要粗略地浏览一番罗马帝国极度血腥的历史（波斯帝国、中华帝国的历史也不遑多让），很快就会发现，周边民族（主要是希腊-罗马人、波斯人和汉人）也同样凶狠，甚至比他们称为“蛮族”的异族人更为残忍和野蛮。人们不禁要问，为何历史上周边民族的“野蛮”似乎被遗忘了？尽管中央欧亚民族偶有大胜，但周边帝国在战场上还是胜多负少；尽管双方表面上都装腔作势，但中央欧亚民族肯定也害怕周边帝国。中央欧亚民族凶狠的印象并非其历史真实的面相。很难想象，汉朝会允许一个匈奴探子在汉地生活、结婚、生子，而不将其正法。然而，匈奴却两次允许汉朝探子张骞进入匈奴领土，并在那里生活、结婚、生子。[82]一般来说，只有在面对属国叛变并杀害监官时，或者面对久攻不下、拒不投降的城市时，[83]中央欧亚民族才会表现出真正凶狠的一面。

罗马的征服仍在被歌颂，而匈人的征服则被谴责。罗马战胜匈人是为正义，而匈人战胜罗马则为不义。自从有了关于匈人详细的历史记载，他们对罗马人所有的进攻几乎都明显是对罗马人入侵、背约等行为的报复。如果匈人得胜，罗马人有时会被迫言和、赔款。在欧亚大陆东部，匈奴和汉朝之间也发生着同样的故事。这样的事不应让今人仍相信，罗马人、波斯人或汉人是“蛮族”入侵行为的无辜受害者。

认为中央欧亚民族天生强悍、好勇斗狠或能征惯战的观念在历史学、考古学或人类学的研究中找不到证据。中央欧亚民族既有城市生活也有乡村生活，既强大也脆弱，既勇猛也温和，既节制也豪饮，既有爱也有恨，有善亦有恶；他们和地球上所有已知的人群没有什么两样。[84]

欧亚大陆东部不存在“蛮族”

在古代和中世纪的欧洲人的观念中，一些人属于“蛮族”，而中央欧亚则是蛮族的故乡。尽管“蛮族”一词在现代的意思已有些微改变，但这种观念一直延续至今，并为现代历史学家在明面或私下所接受。这个词也成为对古汉语中一系列指称外族人的词汇的最常用的对译，但这些汉语词汇实际上都与barbarian（蛮族）的含义无关。古希腊人在与异族遭遇时，尤其是与波斯人遭遇时（尽管与之屡屡兵戎相见，但希腊人崇拜并学习他们）[85]，产生了此种观念。而此观念一直主导着史家对中央欧亚民族的看法，直到今日。

当代的一些历史学家因这个词及相关词汇在语义上明显的不雅，而将其打引号处理。但这并没有匡正错误。古代、中世纪和现代作家都使用这个词，这只能告诉我们谁使用了这个词，而不能告诉我们其他有效的信息。这种情况已经很糟了，而实际可能更为恶劣。尤其是，东亚学家们已经习惯于使用“蛮族”一词，而不愿意弃用。

必须认识到，不论是“蛮族”这个词还是其背后所代表的观念，都与其在历史上和现代所指的人群不一致。这整个观念可以在一些欧美流行的小说、电影中得到全面体现，譬如《野蛮人柯南》（*Conan the Barbarian*）。在现实中，从未有一个民族将自己的民众视为蛮族。即使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西欧诸王国也未有此事。这些新兴的政权仍被现代历史学家称为“蛮族王国”（barbarian kingdoms），尽管时人有时也用“蛮族”来指称异族，但从不以这个词作自称。这点本身就是决定性的。尽管已经普遍承认“蛮族”是一个贬低性词汇，不应被使用，但多数东亚史领域的专家仍在继续使用它。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必须进一步检视。

没人否认，在晚近以前，汉人明显不喜欢异族，并视其文化为低等文化，无怪乎汉人常以带有贬义的汉字来书写一些异族的名字。但必须强调的是，所有这些名字都是对外来名称的音写。这些都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如下方面：

汉人用来指称异族或异族的种类的词汇有许多，在历史上可能先后

有20多个常用的词汇，但其中无一是完全的统称。尽管一些词可能在词源上有其本身的含义，但这些词汇实际上仅仅是对异族的非汉语名称的音写（同一种异族名字可能有不同种写法也可证明此点）。汉人不喜欢异族，与他们选取一个表贬义的汉字来记录其族名的发音，并不直接相关。[86]而且，如上所述，多数的中央欧亚民族（至少是那些我们可以了解到其想法的民族）极其厌恶汉人，轻视汉文化。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等一般都如汉人对他们一样鄙视汉人。这在史料中明确可见。

欧洲文化中“蛮族”一词在英语中的形式是barbarian。它还有形容词形式barbaric等多种派生形式。希腊语原词βάϱβαϱος在早期希腊语中的本意就是不会说希腊语的人（或说得不好的人）[87]，由此派生出barbarism。但在大约2500年以前，希腊人开始与波斯人交战，βάϱβαϱος的词义发生了改变。在希腊人眼中，这群异族人（波斯人）不但不会说希腊语，而且还很强悍、善战；面对敌人很勇猛，有时甚至很残忍；他们还有自己的文化，尽管不如希腊人的文化高级。这一系列概念的组合最终融为一体，由barbar-这个词根来表达。为了表达这种概念，各种欧洲语言都借用了这个词。这个词及概念的传播始于罗马人，他们用这个词指称不说希腊或拉丁语、能征善战、对敌人勇猛无情且有着非希腊-罗马文化的人群。这种词汇-概念的组合沿用至现代。

然而，汉语并没有借入希腊语barbar-。汉语自有的词汇中也没有表示“异族”的词。不论是否带有贬低性，都没有一个词能包含如下观念的集合：不能说汉语、善战、对敌人凶残和不属于汉文化。即使在今日，汉语中也没有一词可趋近此意。除非汉语借入barbarian或其同根词，或者制造一个可以包含这些意思的新词，否则用汉语无法表达“barbarian”这一概念。现代汉语普通话对barbarian的一般译法是“野蛮人”，实际是英文“wild man”“savage”表达的意思。[88]这与barbarian的意思肯定不完全相同。英文词汇“wild man”、“savage”和“barbarian”各有不同含义。概言之，没法将“barbarian”直译作汉语，因为汉语中根本没有这个概念。还需注意的是，至迟从罗马时代起，被称为“蛮族”的外族人在西方世界通常会被美化，尤其是那些战败的英雄人物。这种美化的意味保留在此词中，延续至今，一如其在小说和电影中的用法。小说人物野蛮人柯南几乎足以体现一个“蛮族”的全部意象。迄今为止，汉语仍然缺少这种概念。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会得到几乎同样的结论。如果在汉英词典

中查找那20多个在中国历史上用以指称各种异族的词汇，我们会发现它们多数被解释为“一种蛮族”（a kind of barbarian）。即使在著名的词典编纂家如高本汉（Karlgren）的著作中都是如此。这就如同在查找各种表示植物或鸟的此条时看到“一种草”或“一种鸟”这样的释义。这些词根本就不表示“一种草”或“草”的统称，它们特指某一种类的草，譬如“野麦”，抑或指草的某种特定方面，譬如“干草”。字典编纂者要么不知道它们的确切意思，要么就是懒得去做精确解释。只有表示统称的“草”可与英文表示统称的“grass”对等。这与barbarian的情况雷同，但更加困难，因为汉语中没有一个与之对等的统称，而英文中则没有像古汉语那般多的指称不同异族的词汇，譬如胡、夷、蛮等。[89]

汉人没有如“barbarian”这样统称异族的概念性词汇，这点还可以进一步地阐释。在古代汉语文献中，作者们有时会表达出对异质文化之人的赞许，这通常会给予生活在城市中、有文字的这类人，即“文明的”人。这在文字上会表达为他们在异族中“最类中国”。文献作者将异族文化中特定的方面与汉文化中对应的方面类比。如果这些文化是蛮族的（barbaric），他们怎会将之与汉文化类比？显然，这些文化在文献作者的眼中并非蛮族文化。用以指称这些受赞许的异族人及其文化的汉语词汇正是那些用以指称匈奴等汉人不以为然的中央欧亚民族的词汇。譬如，“胡”字既用以指称来自西方城郭文明的民族，也用以指称匈奴等西方、北方的游牧民族，这个词就不能被对译作“barbarian”。

唐代有一个指称外族或外邦的概括性词汇“番”[90]。与现代字典上的解释“外国的（foreign）、野蛮的（barbarous）”不同，“番”在唐朝的语境下并不含有贬义，大量唐代的文献可以为证。在唐朝语境中，这个词的意味犹如今人所谓“国外的”（abroad），而不指示任何特定的地方。不像其他的贬低性词汇，这个词也被用于双语的外交文书中，譬如821-822年唐朝和吐蕃所订“长庆之盟”的文书。823年立于拉萨的唐蕃会盟碑的碑文在语言上极其礼貌、有分寸。换言之，“番”这个指称异族的词汇可能是历代汉文文献中仅有的一个真正的概括性词汇，它与“夷”“狄”之类的意味相反。它只指“外来的、异族”，不夹带侮辱的意味。

回鹘出兵助唐朝平叛后，唐朝允许其洗劫洛阳作为奖赏。尽管如此，唐人仍然深恨回鹘。这种仇恨一直以不同的方式延续到回鹘汗国破灭。但是，唐人在多数情况下仍然称其为“番”。汉文“虏”通常用以指称

回鹘等给汉人带来麻烦的异族，表达愤恨之情。“虏”的字面意为“囚徒、奴隶、俘虏”[91]，但其所指的异族可能并没有被征服或擒获。它所表达的是“这些贼人应当被囚禁”之类的含义。如果有人认为此词应是汉文中对译西文中“barbarian”之词，那笔者必须指出，此词也经常用以指称国内的盗贼、叛党，即所有“应当被囚禁的贼人”。[92]此词根本就不专用于指称“异族”，何谈对译“barbarian”？

总而言之，“barbarian”一词体现了一种复杂的欧洲文化观念，是指称异族人概括性的、贬低性的称谓。其所指是“属于不文明的、非城市文化的，能征善战且有英雄气概的，但易于诉诸武力和暴行的强大的异族”，而非野蛮人或野人。中国不存在“barbarian”的观念，汉文中从未有与其对应的词汇。遍检汉文史料中所记的指称异族的词汇，其中指称中央欧亚民族的名称涵盖了文明的城邦居民（有时被汉人赞许）、游牧民、渔民（在满洲、南海等地）、居住在村庄的农民等等。其中，没有一个词汇表达了武力超群、非城市非农业的生活方式和不开化文明的含义。这三点恰是欧洲语言中“barbarian”的主要含义。因此，“barbarian”不能与古汉语、中古汉语中任何一个表称异族的词汇画上等号。

可能所有提及汉文史料中所见中央欧亚民族的学者都曾使用英文词汇“barbarian”来指称他们，因此不能将这个错误归咎到某个人。[93]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在公开出版物中被提出。前文解释了这一词为何不适宜翻译汉文史料中的一系列名词，虽然涉及的范围仅限与中央欧亚有关的内容，但这种原则是普适的。詹姆斯（James）写道：“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许多历史学家莫名其妙地推崇衣冠齐整的罗马人，推崇他们强调纪律和铁血的作战理念，而非凯尔特武士的个人英雄主义。这在有着后法西斯主义意识的后殖民主义的世界中更加艰难。”[94]但是，东西方世界关于“barbarian”的学术著作仍层出不穷。

“Barbarian”一词的含义清楚无误。汉文中对外族的称呼几乎都是对非汉语的音写，而词汇本身不含有贬低性意味。用“barbarian”翻译这些汉文词汇，哪怕只是在少数引文中，也是将一种强大的、欧洲独有的概念强加给汉文史料的做法。这给人一种错误印象：汉人对中央欧亚民族有着与欧洲人一样的看法。除了对使用该词或其同源词汇的西方文献的翻译，或对欧洲语言的史料、对使用了该词的学术著作的直接引用，此词都不应再被任何作者当作术语来使用。

中央欧亚民族的宿命

那么，那些被许多人称为“蛮族”的人的命运如何呢？他们大多并没有消失，其中的一些民族在周边民族及其文化的剿杀中成功地保住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生活方式。一些民族再度获得独立，热情饱满地重建他们被摧毁的家园。但多数民族仍然被外族政权压迫统治，并趋于衰亡。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以及一些民族的人口本身，都处于极度危险之境地。

清朝和俄国征服并瓜分中央欧亚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中亚南部（今阿富汗的大部）在过去30年中被连绵不断的内战蹂躏。内战的罪魁则是在阿富汗部分地区根深蒂固的原教旨主义——现代主义的极端形式。

中央欧亚可能会继续贫困，继续沉沦，并变得愈加危险。除非周边的强国给予它生存空间，使它重回作为欧亚大陆中心的历史地位。

---

[1]本章汉文术语的讨论背景，参看注释105。

[2]Di　Cosmo（2002b：4）。这种对中央欧亚民族的看法受众极其广泛，几乎所有的专家和普通读者都持这种观点。

[3]Di Cosmo（2002b：7）。

[4]转引自Di Cosmo（2002a：185）。

[5]James（2001:19）。

[6]并非所有历史学家都支持罗马（譬如吉本），但晚近以来的古典学者大都倾向于反基督教而支持罗马，至少是支持西塞罗。

[7]有关伪托希波克拉底的著作，参看Rolle（1989）的公正批评。

[8]Taylor（2003）。

[9]Jones（1924:242-245）。

[10]对哈萨诺夫（Khazanov 1984）广为接受的观点的批判，参看注释106。

[11]Di　Cosmo（2002a：168-171）。他写道：“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在边界地区的关系充满战争和掠夺，双方都试图侵占对方的民众、经济资源（比如土地和牲畜）或领土。”两者之间的地区“既不是纯粹的游牧区也不是纯粹的定居区，而是混合的形态”。参看Psarras（1994:5）。

[12]参看Tilly（1975，1990）、Hui（2005）。

[13]普遍认为，内亚帝国是游牧民族为了迫使农耕民族交出他们所需的谷物、奢侈品等产品而建立的暴力工具。狄宇宙（Di　Cosmo　2002a：170）准确地指出，在中央欧亚游牧政权内

部存在“农业生产和包括手工业、贸易在内的其他经济活动”，这一事实向基于上述假设产生的诸种理论提出了质疑。狄氏的论证是对此说的有力抨击。

[14]艾尔森（Allsen 1989:92）写道：“据《长春真人西游记》作者李志常记载，其一行人在兴都库什山遇到贩卖珊瑚的商人，随行的蒙古官员以交易的手段购买了他们的东西。断无强取豪夺之态。”——作者注。《长春真人西游记》原文作：“路逢征西人回，多获珊瑚，有从官以白金二镒易之。”艾尔森对汉文原文之理解可谓大谬。作者据此二手文献再做阐发，其谬深矣。——译者注

[15]马格迪西（Maqdisî）原文（de Goeje 1877/1967:325，第3行）作“奴隶”（al-raqîq）。此词指“私产奴隶”（chattel slaves），并不用以指称私兵武士。中世纪阿拉伯语指称各类非自由民的术语亟待研究。各种指称非自由民的阿拉伯语词汇通常被简单翻译作“奴隶”，但它们在中世纪伊斯兰社会中实际有着不同的含义。

[16]马格迪西原文（de Goeje 1877/1967:325，第15行）作“al-raqîq”。

[17]转引自巴托尔德（Barthold 1977:235-236）对马格迪西原文（de Goeje 1877/1967:323-326）的翻译。参看Christian 1998:320-321。巴托尔德指出，所谓“鱼牙”显然是海象牙。

[18]Barthold（1977:237），转引伊斯塔赫里（de Goeje 1870/1967:305）。

[19]参看注释107。

[20]Christian（2000:2-3）。克里斯蒂安强调了丝绸之路的复数形式（Silk Roads）。“丝绸之路”（Silk Road）这个术语本身就够有误导性了，其复数形式不提也罢，因为它强化了这种错误观念，即中央欧亚仅仅是一个贸易路线系统。与此类似，弗兰克和布朗斯通（Franck and Brownstone，1986:7-9）在谈到草原民族与丝绸之路沿线民族之间的贸易等交流时写道：“支线并非仅仅附属于干线，它们可能比干线的历史更悠久，并一直是丝绸之路（Silk Roads）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

[21]譬如，亚历山大大帝的军队在攻克曾经抵抗过的城市之后，就会处决当地所有男性。

[22]狄宇宙（Di Cosmo，2002a：170）准确地指出，在内部经济和政治结构方面，“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之间并没有巨大的鸿沟”。

[23]Barfield（1989:133）。此段引文系从该书中随意选取，类似文段，参看注释108。——作者注。汉译文引自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袁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69页。——译者注

[24]参看Psarras（2003），Di Cosmo（2002a），Noonan（1997）。关于中世纪早期突厥语族与汉地之间的绢马贸易的细致研究，参看Beckwith（1991）。

[25]Psarras（2003:141页起）。

[26]Psarras（2003:141）。

[27]中原王朝发动进攻的原因有多重，但其进攻行为却贯穿中国历史。“我注意到，匈奴自汉代受到重视，并非因为他们对汉朝造成了实质威胁，而是因为他们是与汉朝等量齐观的政治体。正是他们的存在本身使得汉朝感到了威胁。”（Psarras 2003:60。）

[28]包括专家（如Drompp 2005:11-12）在内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中央欧亚民族在军事上占有绝对优势。

[29]巴菲尔德（Barfield，1989）继承了哈萨诺夫（Khazanov，1984）的观点，认为中央欧亚的生活方式之基础在于“勒索”周边的农耕民族。关于此说参看注释109。

[30]Psarras（2003:300），转引Barfield（1989:46-47）。

[31]多数美国人其实很穷，至少不富裕，但这并不影响更穷的人想移民美国讨个更好的生活。

[32]Yü（1986:385）。一些战败的将领怕被杀头，所以逃到匈奴。还有人因为宫廷政治斗争失势逃亡。

[33]这或可以说明为何汉朝和希腊-罗马的官员要宣扬他们的文化高于中央欧亚民族。因为由儒家主导的汉朝政府书写的官方记录是我们今日的唯一史源，历史的真相已经模糊不清。儒家不齿于经商行为。罗马的精英阶层也持同样看法，商人没有资格成为元老。

[34]Wolfram（1988:8）。

[35]《汉书》卷九四下：3803-3804。同样的关切在唐代和其他朝代也有，贯穿现代以前中原王朝与中央欧亚政权的整个交往历史。

[36]大多数统治者修筑长城的首要目的是守住新征服的领土及其上的人口，同时也为了将其军队和民众控制在墙内，参见Di Cosmo 2002a。因此，长城本质上是进攻性而非防御性工事。除上述提到的，拜占庭人、萨珊波斯人以及罗斯人也建造过“长城”。

[37]譬如，Sinor（1990a），Barfield（1989），Drompp（2005）。这种观点被狄宇宙扼要地表达作（Di Cosmo 2002b：7）：他们的劫掠对边境安全、贸易和周边地带的居民聚落都是相当严峻的威胁；如果造成大规模的迁徙，其影响将会波及更大的范围。

[38]作者以上关于清朝入关的知识不准确。——译者注

[39]在唐与回鹘（时称“回纥”）联军收复西京长安的战役打响之前，唐朝曾许诺，“若收复长安，可任回鹘人劫掠”（Mackerras 1972:18-20）。因为东都洛阳仍然在安史叛军手中，唐人请回鹘暂缓劫掠，先收复洛阳。洛阳后来又落入叛军之手，于762年在回鹘人的帮助下被收复，他们因此再次获得同样的奖励。马克林（Mackerras）对唐人的同情和对回鹘人的憎恶反映了汉文史书的态度，却不符合我们从同样的史料中看到的历史事实。

[40]Peterson（1979:467）。这种错误认识被中国大多数历史学家接受，在文献中从未受到质疑。

[41]Peterson（1979:464-465）。

[42]9世纪初期阿拉伯人认为中央欧亚将士比阿拉伯人更忠诚，这与唐人的评价如出一辙。

[43]周边政权对中央欧亚民族的进攻曾被其他学者指出。参看Golden（1987-1991，1991）。

[44]参看Mote（1994:622），其对蒙古人在中原地区的历史处理相对客观，对史料敏锐。

[45]类似问题的讨论，参看Di Cosmo（2002b：5-7）。

[46]尽管游牧政权治下的多数城市位于草原地带之外，但也有些例外——在某些地区和时代分布得尤其多。其中一些城址已经受到考古学研究。草原地带最著名的城址是一座斯基泰城市，参看Rolle（1989）；另见注释58。

[47]参看第二章关于波斯入侵斯基泰的记载。参看Arreguín-Toft（2005）。

[48]这在中国历史上很早就发生了。“中国向北方地区逐渐扩张领土，征服狄人等边疆民族，最终使中国与游牧民族发生了正面的接触，尤其在鄂尔多斯地区。”（Di Cosmo 1999:950-951。）

[49]《阙特勤碑》东面第7行（Tekin 1968:233；其译文见同书264页）。

[50]这一过程与英国殖民者占领北美、吞并印第安人土地的过程完全一致，参看Drinnon（1987）。

[51]Di Cosmo（2002a），Nagrodzka-Majchrzyk（1978）。

[52]但中央欧亚民族对异域食材兴趣浓厚。下文将提到，他们愿意通过贸易获得这些食材。他们处理谷物的一种主要方式是做面条，这种偏好似乎是在与汉人的接触中获得的。参看Golden（1995）。

[53]狄宇宙（Di Cosmo 2002a：169-170）指出："史料中反复提及，游牧民的劫掠队伍（有时可以称为一支军队）掳走的是家畜和人口，而非农产品。"关于"劫掠"，参看注释110。

[54]请注意人类学家Robert Ekvall（1986）为其关于西藏游牧民的著作精选的题目"蹄上的农田"。

[55]参看努南（Noonan，1997）对可萨汗国经济的细致分析。另外请注意塔米姆（Tamîm ibn Baḥr）对回鹘汗国草原地带广泛分布的农业（并不仅仅分布在都城周围）的描写（Minorsky，1942）。这是草原地带或邻近草原地带的中央欧亚城市的一种典型的自然特征。巴菲尔德似乎并未认识到此点（Barfield 1989:157页起）。努南对于可萨汗国经济的研究以及普列特涅瓦的一些研究（Pletneva，1958，1967）显示，可萨汗国拥有着含有农业因素的复杂的混合经济。一些农业因素显然是在前游牧阶段或者半游牧阶段时期发展而来的。

[56]此点早已被博斯沃思（Bosworth，1968:4–5）指出。他强调："游牧民与农民以及河中地区的城市居民一直被认为是两个天然对立的群体。但阿拉伯地理作家所记录的经济事实已然否定了这种假象。来自草原的游牧的突厥人的经济与农业绿洲和城市中的伊朗塔吉克人的经济互补且相互依存。"他还进一步指出："定居民族向游牧民族提供谷物、手工制品和兵器，而游牧民则饲养牲畜，为农民提供奶制品、皮革和皮毛。"他所罗列的双方交易的产品名目并不准确。譬如，草原民族本身生产兵器和其他金属器物。他们广泛地参与商业活动，并非仅为满足自己的日用需求。而且他们并不爱吃谷物。尽管如此，博氏的核心观点是准确的。

[57]笔者的分析显示，所谓的"互市或劫掠"理论不能成立。狄宇宙曾归纳并批评该理论（Di Cosmo 1999b：11页注释32）："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之间周期性的冲突源于中原王朝不愿意互市或纳贡，导致游牧经济得不到补充。这使得游牧民族不得不结队劫掠，利用其军事上的优势来实现互市贸易的经济功能。"尽管（该理论）对双方周期性的合战关系给出了解释，但它没能解释游牧帝国崛起的原因，反而将之视为一种非常状态。

[58]Perdue（2005:63）。

[59]Perdue（2005:64）。

[60]Perdue（2005:64）。

[61]Perdue（2005:65）。

[62]Perdue（2005:65）。

[63]Perdue（2005:66）。

[64]Perdue（2005:65）。这种需求是政策转变的原因。

[65]Perdue（2005:63-66）。

[66]Perdue（2005:256-165）。

[67]Yü（1986:388）。

[68]Thompson（1996:195）。关于此点，他还敏锐地指出，"这使人不禁产生如此印象：匈人帝国的持续存在一定被许多罗马帝国的臣民看成他们致富的关键"（Thompson 1996:194）。

[69]希罗多德记载（Drews 2004:122）："黑海-里海平原的原住民自称Skolotoi，只有希腊人称他们'斯基泰'。但是，这群游牧在黑海北的Skolotoi人和伊朗西部的斯基泰人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Skolotoi人似乎从事畜牧业而非以劫掠为生。黑海北部好客、友善的'斯基泰'与威震近东近一代人之久的真正的斯基泰人不可能是同一种人。"此说令人费解。对中央欧亚游牧民族

的普遍观点就是将游牧民与劫掠者画等号。而希罗多德笔下所记诸事中最不可能者便是，斯基泰人毫无缘由地威胁他人；事实上，这仅仅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出兵的真实原因而已。总之，现在已经清楚，Skolotoi和斯基泰只是同一个名字的两种不同发音，指称同一种人（Szemérenyi 1980）。参看附录二。

[70]Di Cosmo（2002b：9）。但他也提出了对“天生的战士”理论的一些质疑。

[71]Di Cosmo（2002b：8-9）。

[72]Mattingly（1970:114）。

[73]关于“蛮族的贪婪”这一历史话题，参看Sinor（1978）。

[74]在当代，武装冲突仍然常因此而发生。

[75]Dunnell（1994:161）。

[76]马尔西亚城是罗马下摩西亚（Lower Moesia）省的首府，下摩西亚省位于多瑙河下游南岸直到黑海的地区（Vallhé 1910）。该城地在今保加利亚瓦尔纳不远处的代夫尼亚（Devnya）。

[77]《罗马帝王记》（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转引自Burns（1984:17-18）。

[78]布莱斯（Bryce 2002:98）写道：“有史记载以来，只有300多年没有大的战事。换言之，如果我们在过去5000年中任意抽取长度为100年的时段，每一时段中平均有94年至少在地球的一个地方发生着大规模的战争。”

[79]Βάϱβαϱος一词在希腊语中最初并不含有贬义，仅指不会说希腊语之人。虽然希罗多德笔下关于斯基泰人之事耸人听闻，但他本人对斯基泰人并无偏见，使用此词时也不含贬义。此词的贬义主要源自希波战争之后希腊人对波斯人（希腊人也以βάϱβαϱος称波斯人）的憎恶（Liddell et al.1968:306）。譬如，亚里士多德在其《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中写道：“兽性在人类中罕见，而在蛮族中最常见。”（Rackham 1934:376-377。）一种观念的产生也源自希腊人与波斯人的交往：蛮族也有自己的文化，尽管那是一种“不文明的”文化；他们并非野人。

[80]在汉文中并没有可与西方世界“蛮族”一词完全对等的词汇，下文将详论。

[81]《日耳曼尼亚志》第43节（Mattingly 1970:137）。

[82]作者显然误读了汉文史料中张骞被迫羁留匈奴之事。——译者注

[83]在这种情况下，对抵抗者的大屠杀行为几乎见于晚近以前欧亚各民族的历史中。布莱斯（Bryce 2002:98页起）对这类行为的评论，及其关于战争的常态性、和平的稀缺性以及将战争接受为生活的一项正常内容等方面的观点，不但适用于上古时代，也适用于历史的大多数时期。这不是在为任何人的屠杀行为找借口，而只为说明没有任何一个族群有与众不同的道德优越性。

[84]艾尔森（Allsen 1997:4-5）也曾指出，“包括蒙古在内的晚近以前的所有帝国都拥有‘多重人格’”，“他们既有破坏性又有建设性，既残忍又慈爱，既掠夺又施舍，既高压又具有吸引力，既保守又创新”。除了“晚近以前的”这一限定，笔者对于艾氏的评论深以为然。

[85]Miller（1999）。

[86]许多国家的许多民族都会对某些其他民族存在偏见，甚至不愿提到他们的名字。但这一定意味着这些名字本身（指词汇，而非用以转写它们的字）是贬低性的吗？除非这些异族人鄙视自己，或认为他们在道德和文化上比鄙视他们的人更低级，因此给自己起这种名字。这实在令人难以想象。

[87]Liddell et al.（1968:306）。

[88]野蛮人在字面上的含义是“野生的‘蛮’人”。蛮本身（常与“南”结合作“南蛮”）常用于指称生活在中国南方的异族。北方汉人在传统上瞧不起南方人，不限于异族。注意，汉字“蛮”与英文man（人）没有任何关系。在古汉语中应读作*mal或*bal。

[89]对这些术语和其他术语的详细讨论，参看Michael Drompp（2005:172-175）。

[90]亦作“蕃”。

[91]这个词在英文中通常被莫名其妙地译作“caitiff”。这个词已过时，在词源上有“俘虏”之意，但在现在的书面语中作“怯懦的”“卑鄙的”，显然与汉文“虏”不同义。

[92]许多现代的汉学家仍坚定地依靠“barbarian”来翻译那20多个表示异族的汉文词汇，但它们都不能表达“barbarian”之意。这种做法没有忠实于汉文，汉文中从未有过等同于“barbarian”的词汇及其所表达的观念。对汉文、汉文化及其周边民族的文化的表达理应尽可能地准确。

[93]笔者也曾犯过类似的错误，在第一部专著中多次将汉文“虏”译成“barbarian”（Beckwith 1987a/1993:153）。似乎在该书付梓后，笔者才意识到这个问题（Beckwith 1987c）。在准备该书平装版的过程中，笔者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错误。“虏”等贬低性称呼既用于异族也同样用于汉人（尤其是叛党），而指称异族的词汇在语义上也多为中性，这两点参看Drompp（2005，172-175）。

[94]James（2001:19）。还需注意，在纯粹的欧洲语境中，“barbarian”一词通常不含有明显的“种族主义”意味（尽管其在一些老的著作中专指中央欧亚）。但是，在以欧洲语言书写的，与前现代和现代早期东亚有关的文献中（即关于东亚的绝大多数文献），“barbarian”一词经常是对白种欧洲人的贬低性称呼。这使得“barbarian”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种族主义词汇。

附录一　原始印欧人及其离散

有关印欧人的迁徙和印欧语各子语言发展的文献浩如烟海，而这些研究的基础均在于原始印欧语的重构。[1]由于重构原始印欧语音系的传统方法存在一个基本的错误，学者在尝试确定原始印欧语的性质及其向各子语言（譬如日耳曼、意大利、斯拉夫、印度等子语族）发展的过程时，经常得出错误的结论。赫尔曼·格拉斯曼（Hermann　Grassmann）在其1863年发表的论文中首次指出了这个问题，[2]但他还不能将其解决，这主要是因为当时还没发现或创造出音素。

如今所有印欧学家都已经承认这个问题。传统上对原始印欧语阻塞辅音的重构包括一组不送气的清音（如*p、*t、*k）、一组不送气的浊音（如［*b］、*d、*g）以及一组送气的浊音（*bh、*dh、*gh）。这个音系在类型学上不太合理，而且还有其他的重要问题，尤其是起首的*b无法被重构。针对这种重构的修正势在必行。针对这一问题已有一些尝试，这也堪称印欧语言学一个主要的题目。除了塞梅莱涅（Szemerényi）的研究之外，还有甘克烈利泽（Gamkrelidze）和伊万诺夫（Ivanov）出版的关于声门音理论（glottalic　theory）的巨著。[3]然而，这些尝试并未站住脚，没有被多数学者接受，因为它们未能解决问题。一些重要的语言学家接受了甘克烈利泽和伊万诺夫的理论，这不但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将局面弄得更糟。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4]在于（认识到），从所涉及的音位状态看，传统的三组对立的塞音是一种错误的重构。至少在一个世纪以前学界已广泛接受，[5]上述假定的音素并不能随意地出现在所有位置。对这种限制的分析显示，两组浊音（［*b］：*bh，*d：*dh，*g：*gh）呈现互补分布，因此它们实际上是一组浊音（*b，*d，*g）的同位变音。尽管在已知的所有子语言中，这种不自然的音系已经变成自然的二组或四组对立的塞音，但在当时的历史阶段，上述两组浊音还只是同一音位的变音间的区别，后来才在一些子语言中分化成不同的音素。因此，这种区别只能重构到一个暂时的、分化尚不大的群组时期，这时期各语言都拥有三组对立的塞音。三组塞音不能被重构到原始印欧语阶段，原始印欧语应当只有两组对立的塞音，即*p：*b，*t：*d，*k：*g，*b没有丢

失。因为其他的印欧语子语言要么有两组塞音，要么有一组塞音（只有*p、*t、*k），但带有早期两组塞音的痕迹，所有原始印欧语只可能有两组对立的塞音。

显而易见，所有已知的印欧语可以被划分为三个类似于语言联盟（Sprachbund）的群组，分类的依据则是各语族所具有的（或可重构的）塞音系统。A组即第一波语言，虽然显示出曾有过清、浊两组塞音的痕迹，但只具有清塞音。它包括安纳托利亚语和吐火罗语。B组即第二波语言，具有清、浊、送气浊音三组塞音，包括日耳曼语、意大利语（Italic）、希腊语、印度语（Indic）和亚美尼亚语。C组即第三波语言，具有清、浊两组塞音，包括凯尔特语、斯拉夫语、波罗地语、阿尔巴尼亚语和伊朗语。[6]

本书稿的一位匿名评审提出："除了在词首以外，安纳托利亚语仍区分清、浊塞音。"其区别与原始印欧语阶段一致。此言不虚，但关键就在"除了在词首以外"。与安纳托利亚语同属A组的吐火罗语也有一些变体（reflex）显示出两组塞音的对立，但和安纳托利亚语一样，在词首没有浊塞音。换言之，这两种同时代的语言在清、浊塞音间没有音位的区别，在词中保留的区别只是同位变音。这两个语族被划为同一组，一是根据其具有的基本的语言现象，即相同的塞音分布；二是根据考古学证据——这两个语族应当都是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迁离了印欧人的故地。安纳托利亚语和吐火罗语中保存的清、浊音的区别印证了C组中明显可见的清、浊两组塞音的对立，因此可以在原始印欧语中重构同样的两极音系。

阿维斯陀语和吠陀语：一个问题的诸面相

人们已经注意到，已知最古老的伊朗语阿维斯陀语在音系、形态、句法和词汇等方面都与已知最早的印度语吠陀梵语惊人地相似。除了这些语言学特征之外，尽管这两种语言的文献在表面的教义上大相径庭，但其内容和宗教目的在一些方面有着极其相似的，不但可以据此重构一种原始印度-伊朗语，还可以重构一种原始印度-伊朗文化。具体而言，阿维斯陀和吠陀文献的语言被认为是一种早期的原始印度-伊朗语，代表着原始印欧语与原始印度语、原始伊朗语之间的中间阶段。因此，阿维斯陀和吠陀文献分别被认为是对原始伊朗人和原始印度人语言、文化的忠实记录；也可能记录的是一种假定的原始印度-伊朗人的语言、文化。上述文献本身一般被认为是从3500年前以口头形式流传下来的，只有极

少的内容是后世添加的。[7]

但是，上述观点还存在着几个问题。第一，现存阿维斯陀和吠陀文献距今不足1000年。[8]将其形成年代确定在三四千年以前的想法很浪漫，但很难获得足够证据支持。因此，将阿维斯陀和吠陀文献分别称为最早的伊朗语和印度语文献的习惯做法并不准确。最早的阿维斯陀抄本在公元13世纪写成，而其所据文献原型也仅能再往前回溯3个世纪。[9]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古波斯语从公元前1千纪中叶起就有文字记载传世。但是，依据印度-伊朗语的理论，阿维斯陀语又被认为是一种更古老的伊朗语，在年代上应早于古波斯语。[10]因为阿维斯陀是琐罗亚斯德教的“圣经”，它被认为保存了有关印度-伊朗神谱和其他原始印度-伊朗人的信仰和文化习俗的信息。然而，含有伊朗人宗教信仰的最早的文献（包括古波斯语铭文）中并没有关于琐罗亚斯德教的记载。阿维斯陀文献所记载的信仰体系直到古代晚期都没有在文献中发现。

第二，已知最早被记录的伊朗语是保留在亚述和希腊语文献中的北（或“东”）伊朗语和南（或“西”）伊朗语词汇和短语。目前确定的最早以伊朗语写成的文献是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间的古波斯语文献（铭文、泥板和印章）。这些伊朗语与阿维斯陀语言很不同。

第三，阿维斯陀语被称为一种东伊朗语，但将其流行地点以及琐罗亚斯德的故乡置于中亚的普遍说法则很诡异。阿维斯陀文献看似具有东伊朗语的特征，是因为文献在留传过程中受到了一种东伊朗语的影响。[11]现在还很难确定阿维斯陀语在已知的伊朗语世界中的位置，也不能确定它所处的年代；只有它被以中古波斯文记录以后的事情是可以确定的。

第四，非常有趣的是，除了阿维斯陀语以外，伊朗语全体（包括古波斯语等早期形式、中古伊朗语和现代伊朗语各语言）从音系看是确定无疑的C组第三波语言，具有两组对立的塞音。只有阿维斯陀语偶有一些变体，反映出三组塞音的存在，与基于吠陀梵语重构的三组塞音系统一致。而吠陀梵语属于B组语言。

第五，有关阿维斯陀语还有一个大问题，迄今仍未引起重视。对阿维斯陀语语言关系的传统认识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关理论可能因这个问题而被颠覆，或至少因此受到严重质疑。前人已经指出，“阿维斯陀语与梵文关系非常密切”，以至于“我们可将任意一种语言中的任意词汇根据语

音规律转写成另一种语言中的对应词汇”。[12]阿维斯陀语丰富的变格系统和动词变位系统已经不单单是和吠陀梵语相似，而是几乎和它一致。这太奇怪了。为了阐释两者的相似性，印度-伊朗语专家将《阿维斯陀》的章节译成吠陀梵语（或“古印度语”），比如下面这句出自《亚什特》（Yašt 10.6）的句子：

阿维斯陀语	təm amanvantəm yazatəm
古印度语	tám ámanvantam yajatám
原始印度–伊朗语	*tám ámanvantam yaǰatám
汉译	这有力量的神

阿维斯陀语	sūrəm dāmōhu səvištəm
古印度语	śū́ram dhā́masu śáviṣṭham
原始印度–伊朗语	*ću̅́ram dhā́masu ćávištham
汉译	强大的，在众生之中最强大的

阿维斯陀语	miθrəm yazāi zaoθrābyō
古印度语	mitrám yajāi hótrābhyaḥ
原始印度–伊朗语	*mitrám yǎǰāij háutrābhyas
汉译	密特拉，我以酗酒敬之

因为这种难以置信的、前所未见的相近性，印欧学家认为，“印度-伊朗诸语言显然在原始印欧语和最早的伊朗语、印度-雅利安语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它可以被重构作原始印度-伊朗语”[13]。

然而，结合前文提到的几点，阿维斯陀语和吠陀梵语之间惊人的相似性似乎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解释。与其说阿维斯陀语是一种伊朗语，不如说它更像一种在音系上伊朗化了的印度语。[14]关于阿维斯陀语的许多难以解释的问题和阿维斯陀文献所体现的这种文化可以看作伊朗人通过一种古印度方言习得的一种口传宗教文本——与《吠陀本集》相比显然是一种异端。因为印度宗教的实践要求，伊朗信众要准确地背诵阿维斯陀“圣经”。但在实际的诵读过程中，或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说伊朗语的背诵者会按照伊朗语的发音方式来诵读，因此改变了其语音。如前所述，阿维斯陀语只是琐罗亚斯德教的书面用语，没有迹象显示它曾是一种口语；该语文献出现的年代也相当晚近。[15]操伊朗语的传诵者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将一篇古印度语方言文本传承下去，这种假设可以回应有关阿维斯陀语的几乎所有问题。如果阿维斯陀语最终还是被证明是一种纯正的伊朗语（看起来不太可能），那么它自己将构成伊朗语族中独立的一个分支。如果它不是伊朗语，并被移出伊朗语族，那么伊朗语族作为印欧语的子语族就不存在语言学的难解之处了。如果不算上原始印度-伊朗语这个显著的例外，则印欧语系子语族的谱系树（Stammbaum）是一个完全发散的、没有打结的形态。现在看来，原始印度-伊朗语理论及由此衍生的种种皆可以被一并抛弃。尤其是，与所谓的“原始印度-伊朗人”的文化、原始印度人和原始伊朗人迁徙的年代学相关的理论都需要被全面检讨。当然，有关早期印度、伊朗研究的几乎所有方面也都需要被检讨。

印欧语克里奥尔语

每一种印欧语子语言（即现代印欧语各语言的祖先）都保留了印欧语基本词汇的主体和形态变化的大部，但也吸纳了一些当地语言的借词和不同的音系。这就是克里奥尔语的特征。需要说明的是，“克里奥尔语”这个术语并没有严格的限定，它既被用于指称那些吸纳了一些借词的语言，也被用于指称因受其他语言影响而导致语言结构发生重大改变的语言。

在本书中，“克里奥尔语”一词被用以指称在与其他语言融合的过程中发生重大改变的语言。但这种变化并不指结构上的简化，譬如海地混合语就是一种简化的法语。这通常被误认为是克里奥尔语的基本特征。众所周知，将现代印度英语作为母语的人[16]掌握着全套的英语语法和词汇，其语言中只有少量来自印度语言的借词，而其音系结构却更贴近

印度语言，而非英语或其他日耳曼语。尽管一些人认为此现象是英国殖民政策下的特殊产物，[17]但为何英国在北美施行同样的（实际上是更坏的）政策，当地却没有产生一种克里奥尔语呢？姑且不论其中的政治因素，操英语的人在印度成功地使其语言在当地流行，但并没有消灭当地的原住民，这与他们在北美的所作所为不同。英语作为外来语言在世界其他地区也经历了类似的入侵过程，产生了许多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其中一些人的英语具有更多的“克里奥尔化”特征。

根据对现代语言接触的观察和记录，克里奥尔语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的，而非经历成百上千年的时间。口语不可能历经千年而一成不变，但也不可能花上千年去经历变化。印欧学传统的观点认为，印欧语各子语族是历经千年缓慢演化形成的，此点迄今仍被多数印欧学家沿袭。其实不然。现代语言的证据以及对正经历演变的语言的研究共同显示，这种理论在类型学上是没有先例的，因此是不可能的。语言本身确实会在长时段内发生缓慢的内部变化，但是，因为这些变化不能够孤立于外界的影响，不能说缓慢的、长时段内的变化完全是自发而非外部刺激引起的。[18]姑且不论这种变化，主要的语言变化无疑是接触的结果。因此，印欧语各子语言或多或少都属于克里奥尔语，包括很早就留下记录的赫梯语、古印度语和迈锡尼希腊语。这根本不足为奇，不是曾有人说过“所有成熟的语言都是克里奥尔语”[19]吗？

真正奇怪的是这种观念：印欧语与世界其他语言都不相同，它能够保留其原始形态（原始印欧语）数千年之久，然后又在接下来的数千年时光里通过内部缓慢的变化逐渐分裂，最终形成已知的各种子语言，全程没有与其他语言混合。在讨论印欧语子语言发展的问题上，混合化理论被学界公然排斥，[20]完全不顾这样的事实：已知各子语言最早出现的地点互相之间相距甚远，而且都远离原始印欧人的故地。这样的事实说明，操印欧语的人口在已经有其他人类居住的地方定居下来，与当地居民融合，在其原有语言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克里奥尔语。目前获得的各个子语言的语料都是在这种混合发生以后留下的。

此外，传统理论不能解释的另一个事实是，没有一种印欧子语言在它们最早留下记录的地区以外流行过。譬如，早期意大利语不见于意大利以外，希腊语不见于希腊以外，吐火罗语不见于在吐火罗地区（在今新疆）以外，等等[21]。而且，据等语线信息得出的各子语言的空间与它们地理上的空间分布（即它们最早留下记录的地点）是一致的。[22]

传统理论在类型学上是没有先例的，且与现有证据也不相符。

因此，每一种印欧语子语言（即印欧语各语族的原始语言）都是一种克里奥尔语，是印欧移民与当地操不同语言的原住民融合的产物。印欧移民在当地娶妻生子，他们的妻子儿女说所说的印欧语会带有当地的口音和一些语法改变，由此形成一种方言或混合语，其实质就是印欧语在当地的一种有所改变的版本。

传统的比较研究认为，各支印欧语之间存在着惊人的保守性，这奠定了重构原始印欧语形态的基础。然而，一个有力的证据可以推翻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保守性的观点和音系经长时段缓慢变化的观点，那就是赫梯语等安纳托利亚诸语言。传统理论认为，安纳托利亚诸语言在留下记录以前已经在安纳托利亚流行上千年之久。该理论即基于长时段缓慢变化的陈旧观念。但安纳托利亚诸语言和文化已经充斥了当地的非印欧的因素，很难在其中找到印欧人的宗教信仰、社会经济、习俗的痕迹。他们从非印欧人那里吸收了如此多的文化因素，却神奇地保留了一种古老的、“纯净的”印欧语（或如一些学者所称的“印度-赫梯语”“前原始印欧语”），这怎么可能呢？因为重构到原始印欧语的一些复杂的形态音位学特征仅见于B组语言，[23]而原始印欧语的重构主要就是依赖这组语言的早期形式（希腊语、拉丁语、日耳曼诸语言和梵语），这些特征不见于安纳托利亚语族就不足为奇了。原始印欧语形态音位上所谓的保守性恰恰证明了印欧语子语言分化得很晚。可能在操原始安纳托利亚语的人群迁徙之后，它们才发生分化，但操原始安纳托利亚语的人群进入安纳托利亚的时间不应被定在公元前19世纪之前。音系和词汇上的重大改变应当发生在一群印欧人进入流行着非印欧语的地方之时，而这种变化会在一代人、至多两代人的时间内完成；或者发生一群印欧人在语言上受到一群非印欧人的严重影响，恰如B组语言形成时的情形。区分各子语言的主要的结构性变化不可能历经数百年时间缓慢发生。当然，有一些变化在被引发之后，需要经过数百年时间最终定型，但这是另外一回事。对现代语言子语言分化（譬如印度英语）的观察显示，混合化是子语言分化的主要驱动力，[24]与本文所假设的历史情境一样。印欧语变化的复杂性应可以根据迁徙的不同阶段来解释。对于多数（或许全部）的印欧语子语言，其先民至少经历了两个阶段的迁徙：首先，从印欧人共同的故地迁入某个或某几个过渡的地方（譬如B组）；然后，迁入各子语言被首次记录的最终地点。

印欧人，尤其是其中的军事组织，是一个父系特征极其明显的、由男性主导的社会。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及其混血后代在人数上远远少于当地原住民，并最终消融，只在当地留下一些语言的痕迹，例如其国王和神的名号等文化名词（如在米坦尼王国和古代近东各地），或者一些短的铭文（如曾在南欧等地流行的许多语言）。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印欧人则将其语言成功推行，并延续很久，因此留下了较多的记录。上述两种情形都曾一次次发生。对于语言史来讲，第二种过程无疑最为重要，它可以为准确地重构古语言提供充分的资料。[25]

印欧人的迁徙与中央欧亚历史的关系很明确。印欧人从其位于中央欧亚的故地迁徙，前往中央欧亚的其他地方以及欧亚大陆的周边地区。他们融合、吸收了当地的文化因素，也将其自身文化的关键因素传播到当地。如前所述，中央欧亚文化系统的最初形态在此过程中得到广泛传播，在中央欧亚各地生根发芽，成为原始时期和早期历史时期中央欧亚民族的主要文化。

---

[1]参看Mallory（1989）精彩、可读性强的综述。关于各方争鸣的理论，参看Mallory and Adams（1997，2006）。

[2]格拉斯曼的一大贡献（Grassmann 1863）是表明其在格拉斯曼律（Grassmann’s Law，堪称印欧语言学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中论及的现象仅仅适用于希腊语和梵语。它们不能被回溯到原始印欧语阶段。他正式地阐释了在最初的分化发生之后，趋同现象会影响印欧语系下并不同源的语群（subgroup）。笔者提出的印欧人分化的三组或“三波”理论（Beckwith 2007c）便是受格拉斯曼研究的启发。

[3]Szemerényi（1996），Gamkrelidze and Ivanov（1995）。

[4]本附录是对Beckwith（2007c）一文提出的论点和例证的高度概括，详情参见该文。

[5]Szemerényi（1996）。

[6]阿维斯陀语是例外。但下文将给出从阿维斯陀语中复原出的证据，证明伊朗语属于B组。笔者没有考虑语料过于稀缺的语言。

[7]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个别学者间的观点差别极大。有一些学者认为文献的年代还要再晚1000年，而另有一些学者认为其年代要再早几千年。相关争鸣，包括受印度民族主义影响的观点，参看Bryant（2001）。

[8]EIEC，306-307。而且两者都显示，文本中包含了后来加入的成分。伊丽莎伦科娃（T.Y.Elizarenkova）指出一些中古印度-雅利安语（Middle Indo-Aryan）的特征“见于吠陀，而不见于梵语”（转引自Bryant 2001:138），显示了口头流传过程中晚期方言对文献语言的浸染。遗憾的是，后加入的成分不能提供确切的证据判定文献创作的年代或其被记诵的最早年代。

[9]EIEC，307。中古波斯语和其他中古伊朗语现存的语料也都比阿维斯陀文献的年代早，且它们中的一些留有大量文献。关于阿维斯陀语和中古波斯语为何没有大量文献传世，参看注释111。

[10]如果印度-伊朗理论是正确的，那么阿维斯陀语肯定是一种比古波斯语更为古老的伊朗语。但是，阿维斯陀语有可能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内流行很久，因此保留了许多古老的“原始印度-

伊朗语”的结构；后来，琐罗亚斯德教被波斯人接受，阿维斯陀文献才在一般的伊朗语世界中传播开。当然，阿维斯陀最初是否真是一种伊朗语还不确定。

[11]Schmitt（1989:28）。参看Kellens（1989）在同书中发表的洞见。

[12]Remy（1907）最早指出此点，后被广泛重复。参看Bryant（2001:131）。

[13]EIEC，303–304。

[14]早期的印欧学家认为阿维斯陀语是一种古印度语方言；参看第一章的相关讨论及注释。阿维斯陀语可能是一种古印度方言伊朗化后形成的克里奥尔语，即一种曾经被用作口语的语言，但这种可能性很小。还有一种可能，即阿维斯陀语是一种印度化的伊朗语。但这种可能基本被排除，因为该语言中有很多因素是典型的印度语因素，但却从未见于任何一种伊朗语中。

[15]在本书中，笔者沿用这样的观点：《阿维斯陀》中所显示的对吠陀宗教因素的敌视思想反映的是早期印度人和伊朗人之间的族群敌对。但已有学者指出，其中对吠陀因素的妖魔化并非一以贯之。对此的最终解释也要依赖于对《阿维斯陀》和阿维斯陀语性质的重新考察。

[16]另外许多说印度英语的人则是将其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因此说得没有那么好。

[17]参看Hock（1999b：149）的评论和引用。应当注意的是，将北印度的印度-雅利安化和英国殖民时期印度的英化相类比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臆想。英国人是外来的力量，但他们并不是“征服”了印度，至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突然的征服。他们花了数个世纪之久才在印度次大陆占据主导地位，并最终控制那里。

[18]深入的讨论及相关参考文献，参看Beckwith（2006a）。

[19]Haiman（1994:1636）。

[20]关于印欧语年代学的讨论主要仍基于长时段缓慢演化理论；关于各子语言及其人口的定年的激烈争论也基于同样的理论。不论其中的非学术动机为何，多数有关印度-雅利安人迁徙的争论还是建立在对语言学的无知之上。

[21]如前所述，古印度语最早的记录出现在两河上游地区和黎凡特，后来才见于印度，但这是由于操印度语的迁徙人口被操伊朗语的迁徙人口阻隔。

[22]Hock（1999a：13-16）。

[23]Grassmann（1863），Beckwith（2007c）。

[24]参看Lefebvre et al.（2006）。

[25]今天也可以目睹同样的过程，因为印欧语（尤其是英语、西班牙语和俄语）仍然在世界的广大地区继续扩张，浸染着其他语言。今天，在除非洲以外的每一个大陆上，大多数国家都流行印欧语；除东亚和东南亚以外，大多数人都说印欧语。

附录二　中央欧亚古族名考

对中央欧亚古代民族名称的释读常莫衷一是，对这些族群本身的定性因此也经常充满争议。类似的问题不但见于不太知名的古族，也见于一些最著名的帝国。本文即尝试探讨其中一些尚存疑问的古族名称。

羌～*Klānk-“乘双轮车者”

羌人是商朝主要的外敌，其族名“羌”或被认为是一个非汉语词汇的音写，或被认为是一个汉语词汇，表“牧人”之意。后一种解释[1]并不符合汉语的使用情况，因为“羌”字从未被用作一般词汇表示“牧人”，而总是用以指称特定的异族。羌人与中原文明接触的时间非常之早，且他们善驭双轮车作战，而藏缅语族中关于“马”的词汇则大都是较晚借自汉语的词汇。[2]基于上述几点，早期的羌人似乎应是操印欧语的人群，而非普遍观点认为的属于藏缅语族族群。[3]他们的族名“羌”在中古汉语中作*khɨaŋ（Pul.251），在古汉语中作*klaŋ。[4]它可能也是一个印欧语词汇。Klānk-在吐火罗语中作动词“骑、乘车”，[5]有“登上双轮车去打猎”之意，因此，“羌”可能意为“乘双轮车者”。

“姜”，古汉语读*klaŋ，通常被认为与“羌”同源，或就是“羌”之变体。可能周朝禁写“羌”字，因为姜氏是周朝王室的母系，所以“羌”都改写作女字旁的“姜”。[6]

乌孙～*Aśvin“骑士”

据通行的古汉语音构拟方法，“乌孙”一名的中古汉语音可重构作☆ɔswən（Pul.325，297），上古汉语音可重构为*âswin。但是，古汉语音节起首的*s-应在中古汉语中变成☆χ-（Beckwith 2006c）。则此词中的s在中古汉语中也应当变成☆χ-。那么，“乌孙”的现代汉语读音Wu-sun中的/s/音从何而来呢？汉语中有许多词汇是同根词，例如，三（中古音☆sam，Pul.271）以及一系列与三有关的词。沙加尔（Sagart 1999:150）指出，“其词根似乎不可能以s-开头”。“三”的早期上古音不以*s起首，最可能是以辅音组合*tr-或一个塞擦音起首（Sagart 1999:148-152）。“乌孙”中的s可能来自类似*s但又有些不同的音。在充

分考虑各种因素之后，*ś　［ɕ］是最可能的一个选项。如此，“乌孙”可以复原为*Aświn，可看成对古印度语词汇aśvin的完美转写。此词在古印度语中意为“骑马的人”，是一对骑马的神祇的名称。乌孙人在外貌上具有明显的欧罗巴人种特征[7]，很可能是操古印度语的人群。

“昆莫”，中古汉语读☆kwənmɔ或☆kwənmak（Pul.179，220，218）。据《汉书·西域传》对乌孙国的记载可知，[8]这一定是乌孙王的称号，而非人名。在《汉书》中也作“昆弥”，中古汉语音☆kwənmji（Pul.179，212）。在“昆莫”的两种中古音复原中，第二种显然与“昆弥”的读音更接近，因此更可取。此名首音节在汉代应读作*kwin（也可能是*kwil～*kwir或kwēr等），可能是对外来音*kin/*kēn（也可能是*kil/*kēl～*kir/*kēr）或者*kon（也可能是*kol～*kor）的转写。而第二音节“莫”，其声旁（phonetic）是“日”。“日”的读音在晚期古汉语的方言中可以重构为*ñ(r)ēk～*mīk（中原音读*ñīč，变为*ñīt），是由早期古汉语*mē(r)(e)k变来。据现行的重构，中古音☆mɔ一定是从晚期古汉语音*mâh或*meh演变来的，来自*meks。而“弥”的中古音☆mji/mji（Pul.212），反映其晚期上古音为*mē。然而，在汉代早期中古音理论中，☆m-音通常发*mb-，并被用以转写外来的*b-音。这种情况在中古音中也有。则此词第二音节转写的外来音应是*mē～*bē，也可能是*meh～*beh。既然乌孙的族名可能是古印度语词*Aśvin，其王号“昆莫”的词源应当也要在古印度语中寻找。

塞～*Sak～Saka～Śaka～粟特～斯基泰“射手”

塞梅莱涅已经指出，希腊语中出现的族名“斯基泰”（Σκύθας，后作Σκύθης）为伊朗语的转写，其北伊朗语形式可重构为*Skuδa，其原始印度-伊朗语形式为*Skuda，其原始印欧语形式为*skud-o，源自原始印欧语*skeud-o-，意为“射手”。[9]在希罗多德所记斯基泰人的起源传说（详见《导论》）中，后来成为斯基泰人始祖的第三子有两个名字，其一写作Κολάξαϊς（Coláxaïs），应是*Σκολάξαϊ（*Skoláxaïs）脱讹所致，此点已为阿比西特（Abicht）指出。[10]勒格兰（Legrand）没有参引阿比西特的研究，对此名甚为不解，[11]因为文献中称斯基泰人因其国王之名而自称Σκολότα（Scoloti）。Scoloti就是“斯基泰”（Σκύθῆς，Scythês）的晚期形式。而斯基泰更早的形式则是赫西俄德（Hesiod）在公元前700年前后留下的转写Σκύθας（Scythas）。

[12]如塞梅莱涅所说，此词与“粟特”（swγδa～sγwδa“Sugda～Sguda”，在古波斯语中有增音作*Suguda）为同一词。另据希罗多德记载，波斯人称斯基泰人为Saka。此点有古波斯铭文为证。汉文史料则将这种北伊朗人记作“塞”。此名在中古汉语中读作☆sək，应源自*sak（Saka），显示出印度-伊朗语专有名词结尾的短元音a经常脱落的特点。它缺少见于其他名字中由-δ-演化来的-l-。同样的名字还见于其他形式的汉文转写中。例如，塞人的城国“莎车”（*Saγlâ）[13]又如高句丽起源传说所记扶余-高句丽人源出的北方古国“索离”[14]两种汉文转写显然都源自*Sakla。此名显然和希罗多德所记的斯基泰的名称形式*Skula有关。塞梅莱涅指出，这是北伊朗语*Skuδa后来发生的正常的语音变化。[15]如同*Skula一样，Sakla中的软腭音也发清音，*d也变成了l。[16]而在原本起首的双辅音*sk中出现了一个元音增音，这和Sugda（粟特）的情况一样。但和*Sugda不同，这里的增音明显是一个a。*Sugda也是*Skuδa的另一个正常的音变结果，不过其中的软腭音发浊音，齿音尚未变成l。则*Sakla的辅音系统和斯基泰王Σκύλης（Skulēs）的辅音系统是一致的。其词根*Skula又与希罗多德所记斯基泰人的自称Scolóta的词根*Skula勘同。[17]波斯语形式Skudra被塞梅莱涅讨论过，[18]是*Skuδa的又一种形式。遗憾的是，他沿袭陈旧的观点（可能是通俗词源），认为波斯人对斯基泰人的称谓Saka源于波斯语动词sak-（去、流动、跑），由此猜测Saka之意为“游荡者、游牧民”。[19]他关于Skudra的结论是，“它派生自Skuδa，是斯基泰人的名字”。[20]也就是说，*Skuδa的早期形式很早就进入了古波斯语，后来在波斯语中变成了Saka，成为波斯语指称斯基泰人的一般形式。Saka在文献中被称为波斯语对所有斯基泰人的称谓，它并不是一个新词，而是*Skuδa的另一种形式，通过已知的中间形态*Skula演变而来。与上述其他形式的演化过程一样，这种形态也是通过在词首辅音组合中间增加元音a先变成*Sakula。后来，*Sakula又在波斯语中变成Saka，或许中间还经历了一个过渡形态*Sakla或*Sak(u)δa～*Sak(u)ra。[21]很明显，在所有史料中Saka人都等同于斯基泰人（他们又明显等同于*Skula）。尽管波斯语动词sak-的存在加强了Saka可能是波斯语词汇的印象，但它肯定不可能是描述这群人习性的波斯语词汇。在希腊语和波斯语史料中，此词都表示一个具体的族名，而非一般性的术语；所指当然是一支异族，而非波斯人。Saka的较早形式*Sakla在极东部方言中的存留印证了整个草原地带在青铜时代晚期或铁器时代早期被北伊朗人（即“斯基泰人”）全部征服的史实（如第二章所述）。从上古到中古早期的汉文文献中记载了活跃在东部草原地

区、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各地的许多支北伊朗部族，称为“塞人”（*Sak）。塞梅莱涅指出：“最初，草原地带的北伊朗人各部都有一个共同的本族名称Skuδa（射手）。”[22]

月氏～*Tokwar/*Togwar“吐火罗”

在英文等欧洲语言中出现的术语“吐火罗”曾引起广泛热议。尽管还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但专攻早期中央欧亚和中国的语文学家们在关于吐火罗问题的主要方面很早便已经达成共识。然而，吐火罗问题相关的材料以汉文历史、地理文献为主，其中出现的名词必须借由汉语音韵学的路径解决，这对于不熟悉汉语语文学和音韵学的学者来说是一个极有难度的领域。因此，吐火罗人名称的问题的复杂性可以说超过了中央欧亚古代史中出现的其他任何族名。

至少在半个世纪以前，将“真吐火罗人”（Tokharoi）与月氏人勘同便已成定论。但是此结论还只是在研究早期中央欧亚历史、语言和早期中国史、古汉语的学者圈内流行，尚未被外界广泛接受。[23]目前已知，真吐火罗人和吐火罗人就是同一种人，因为曾活跃在巴克特里亚的Tokharoi-Tokhwar-月氏-Tukhâr-和生活在塔里木盆地的TukhârToχar-/Toγar-月氏已经被勘同。主要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24]

（1）在新疆地区出土的摩尼教文献中有“四吐火罗（作twγr，读Toχar或Toγar）[25]之地”这样的表达，指称“从龟兹、焉耆到高昌、北庭”一带。[26]这里正是如今被称为“吐火罗语”的语言当年流行之地。回鹘人从这种语言译出了许多佛经，将其称为“吐火罗语”（twγry tyly）。缪勒将之转写作“Toχrï tili”，译作“吐火罗语”（Tocharisch）。[27]虽然在古突厥语中它应被读作“Toχarï tili”或“Toγarï tili”，[28]但缪勒的比定是准确无误的。但是，一些学者质疑这种比定，理由是巴克特里亚有地名“吐火罗斯坦”（Tokhâristân，“吐火罗人的土地”），此名与真吐火罗人有关，而后来生活在吐火罗斯坦的人使用的巴克特里亚语则是一种伊朗语。但这种反驳并不有力。众所周知，巴克特里亚地区早期的外来征服者如希腊人、突厥人、阿拉伯人等都在入侵后不久，即改用当地流行的伊朗语——巴克特里亚语。因此，数量很少的一部吐火罗人（只是三部联盟中的一部）在征服巴克特里亚之后，几乎不可能继续保持他们的语言；他们甚至可能在进入巴克特里亚之前就已经改说一种伊朗语了。

（2）Toχ^{W}ar～Toχâr与汉文“月氏”在第一音节上对音的困难是两名勘同的最大障碍。在中古汉语阶段已有区分的“月”和“夕”在甲骨文阶段还是同形同音字（homonym），其早期古汉语的读音可以重构为*nokwet。[29]但是，早期古汉语中的起首音*n随后发生音变，在古汉语的中期全部变为*d、*t或者*l。至迟到早期中古汉语阶段，中原音（Central dialects）中的收尾音*t已经变成*r，但在西北方言（在靠近月氏人故地流行）中收尾音*t已经与收尾音*r和*n混合[30]（或者说成为它们的一种变音）。“月”字元音间的*k最终变成*g（后来又变成*ŋ）。因此，在古汉语的一种非常古老的边境方言中，“月”在上古时代可能读作*tokwar或者*togwar。这个古老的名称（“月氏”中的“月”）与巴克特里亚语中的Τοχοαρ（Toχwar～Tuχwar）以及中古时代的Toχar～Toχâr读音勘同并非巧合。“氏”（或“支”）在古汉语中一般被重构为*ke（Sta.567）。这种后缀或结尾的复合成分也见于匈奴贵族的名号中，同样被汉文音写作“氏”（*ke）。[31]匈奴曾役属于月氏，后来击破月氏并取而代之。他们沿用月氏贵族所用过的后缀*ke来表示他们自己的贵族，这很容易理解。总之，“氏”（*ke）字并不是族名的一部分，而“月”字反映的是族名。

（3）在汉文史料中，族名“小月氏”总是被与梵文Tukhâra（表示“吐火罗”和“吐火罗斯坦”的印度语词汇）勘同。而小月氏分布在塔里木盆地东南，正是月氏人的故地。做出上述勘同的人包括高僧鸠摩罗什（Kumârajîva，344-413年）。鸠摩罗什曾到过印度和中原，他出身龟兹，是龟兹公主之子，母语当为龟兹语。他的勘同无疑是最有说服力的。

（4）在楼兰的梵文俗语文书中找到了吐火罗语成分。[32]例如，其中楼兰吐火罗语（吐火罗语C）的kilme就对应东支吐火罗语（焉耆语）的kälyme。而且，这些吐火罗语词汇的形态变化也符合吐火罗语规则。[33]楼兰正在月氏人的故地中，证明这里就是吐火罗人和吐火罗语在欧亚大陆东部的故地。

综上所述，“月氏”一名系*Tok^{W}arke的音写，对应的正是曾活跃在塔里木盆地北缘和东南的操一种独特的印欧语的吐火罗人。一个世纪以前，缪勒将这种语言定为吐火罗语是准确无误的。但“吐火罗”一名的语意尚不明晰，还无法确定这是该民族的自称还是他称（exonym）。

---

[1]譬如Beckwith（1993:5）。

[2]参看Beckwith（2002a：129-133；2007a：145-146）。

[3]这种观点源于汉代以来汉文以此词指称今甘肃、青海一带的早期藏缅语族族群。但是，这不代表在早期古汉语中“羌”字也被用以指称同样的人群，因为古人通常以某地古族的名称指称当时当地的人群，并不顾及两者是否真有关联。

[4]在中古汉语的塞音和塞擦音中存在送气-不送气的区别，其原因迄今不明。但至少在某些词汇中，这是商代晚期一个前缀*s(V)-被加在词根上所造成的（Beckwith，2006c）。

[5]Adams（1999:220）。

[6]关于周朝先世，参看注释44关于妇好、妇子的讨论。

[7]HS（96b：3901）。

[8]HS（96b：3901-3910）。

[9]Szemerényi（1980:16-21）。雅典有斯基泰人组成的卫队，被称为“射手”（οἱ Τοξότα）。在希腊语中用此词解释“斯基泰”，两词意思相同（Szemerényi 1980:19）。

[10]Abicht（1886:8）；参看Macan（1895:4-5页注释6）。

[11]Legrand（1949:50-51注释5）。

[12]Szemerényi（1980:16页起）。

[13]Hill（待刊）。

[14]参看注释13。史载突厥人也源出索国（Saka），详见注释53。

[15]Szemerényi（1980）。

[16]在粟特语中，d后来也发生了变化。“粟弋”，中古汉语读☆suawkjik（Pul.295，369），古汉语应作*soklik~*soglik，即粟特。

[17]Szemerényi（1980:22页注释47）。塞梅莱涅强调，Skolotai中的-ta是否是表复数的词素并不重要。

[18]Szemerényi（1980:23页起）。

[19]Szemerényi（1980:45）。

[20]Szemerényi（1980:46）。

[21]*Sakula变成Saka的过程中明显脱落了-l-或-ul-，这个问题还需要伊朗语专家进一步解释。

[22]Szemerényi（1980:46）。

[23]譬如，一部重要的印欧学著作写道，“将真吐火罗人和吐火罗人勘同的证据尽管不能说完全缺失，但仍嫌贫乏。然而，学界一般也不反对这种比定。因为没有什么更有说服力的方案，这种比定就暂时成为流行的说法”（EIEC 590）。

[24]本节是对于吐火罗问题的一些主要方面的概述。笔者在尚未完成的研究中将进行详细探讨。关于先行研究，参看Hill（待刊）。

[25]自缪勒（Müller）以来，此词通常被读作Toχrï，有时作Toγrï。然而，以粟特文或回鹘文拼写许多词汇都会省略一个或多个元音。在粟特-回鹘文中表示舌背音的字母既可以读作γ又可以读作χ。尽管在古汉语或者原始汉语中，“月”字的读音中含有*-k-，但此音后来在一些词干（etyma）中变为*-g-~*-ŋ-。因此，古汉语将此名转写作“月氏”反映了*g~*γ这类音素，而非*k~*χ。则此名中含有的音素可能是γ而非χ。——作者注新疆地区出土的回鹘语文书中，此名明确写作twqry，并无元音省略，就应当转写作toχrï或toγrï。——译者注

[26]Clark（2000）。

[27]Muller（1907）。在英文学术作品中，此名有两种写法：Tokharian和Tocharian。后者是一种德国式拼法，却广受青睐，实在令人费解。在这里，“kh”或“ch”转写的都是χ［x］,一般在德文中写作“ch”，而在英文中写作“kh”。

[28]现代学者一般遵循缪勒的读法，读“Toχrï tili”。

[29]Beckwith（2006b）。笔者要强调的是，当时对此读音的构拟并非为研究吐火罗名称问题做铺垫。

[30]当时“安息”（Arsak）和“犁轩”（Alexandria）的转音体现了汉文以收尾音-n转写外来音-r和-n，说明这两种舌尖音的混合（参看Beckwith 2005b）。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譬如，“头曼”（*Tumen）和“冒顿”（*Baγtur）的转音就体现了同一种古汉语收尾音（-n）对应外来词中不同的舌尖音（-n和-r）。

[31]这就相当于中古时代西支吐火罗语（龟兹语）中的族属后缀-ke。譬如，Kaṣake意为“喀什的”（Adams 1999:148）。但它主要用于印度-伊朗语借词。此外，西支吐火罗语中的施动者名词（nomen agentis）后缀作-ike（Adams 1999:141），但应与本例无关。

[32]Burrow（1935，1937）。

[33]Mallory and Mair（2000:278-279）。

注释

1.尽管研究上古和中世纪的专家习惯上称贴近当时历史的史书为“原始”史料，但它们实际上都是由上古或中世纪的史家所编写的二手材料，其中已经带有作者的立场和主见。称其为原始史料仅仅是因为它们是现存最早的，甚至可能是仅有的相关史料。汉文的实录、古突厥语碑铭等也都属于这类资料。这同样适用于现代史领域，但现代史确实有着大量的原始史料。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笔者在涉及各个时代的研究中都需要大量依赖二手文献。现代主义者尤其会注意到这一点。但笔者对史料的选择并无年代的偏见，这是因为本书涉及范围极广。当然，笔者也深入探讨了一些细节问题，例如古族名称和现代艺术。在讨论这样的问题时，笔者尽量利用原始资料。譬如，在讨论古族名称时，笔者利用了铭文、手稿以及引述这些原始资料的研究文献；在讨论现代艺术时，笔者利用了艺术品和艺术理论著作。

2.笔者并非提倡人人都接受传统的观点，但一部以编辑-目录学（editorialbibliographic）方法写成的、涉及所有重要论文和著作的中央欧亚通史将会是对中央欧亚史领域的巨大贡献。这种著作中最佳的一例便是塞诺的《中央欧亚研究导论》（Sinor 1963），可惜此书所涵盖的地理、年代、民族和热点问题还太有限。笔者非常期待有此兴趣的方家能着手创作。当然，此类著作定会是百科全书式的多卷本大部头，可能要花费数年甚至数十年完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编的多卷本《中亚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Dani et al.1992-2005）本可成为这样的作品，但很遗憾，书中收录的文章的质量实在参差不齐，作者的立场也不尽客观；全书也缺乏对中央欧亚（即该书的“中亚”）的定义，其参考文献所涉仅堪称最低限度。

3.“中央欧亚”“内亚”“中亚”等指称这个地区的各种概念曾被许多学者讨论过。对此进行全面的学术讨论可能得写成一本篇幅不短的书。笔者只想强调一点，中央欧亚包含中亚。在当代话语中，哈萨克斯坦被认为是一个中亚国家，这种概念是苏联时代的遗产。但事实上，即使是今天，哈萨克斯坦在文化上和生态上都不是一个中亚国家，土库曼斯坦的许多地区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大部分地区也不属于中亚。（但在本书的第

十一、十二章中，笔者仍然使用这种流行的中亚概念，以免引起读者的混乱。）如同蒙古和苏联解体后由俄罗斯继续控制的卡尔梅克、图瓦等共和国一样，上述地区继承的是前现代游牧文明的草原地带。尽管畜牧业仍然是当地的主要生产方式，但传统的游牧生活方式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亡。

4.前人已经认识到，赫梯神话完全是非印欧的（即从其他文明移植而来，而非继承自原始印欧文明）。但马佐业（Mazoyer 2003）指出，赫梯人借用哈梯人的神祇铁列平（Telipinu）及其名称，将其植入了原有的中央欧亚风暴之神的传说中，并赋予了其建国者的地位。马佐业（2003:27）写道，果内（Gonnet 1990）“最早注意到铁列平作为国族建立者的地位”。铁列平从其城市的神庙出奔，因为哈梯最后的国王们不再供奉他，哈梯国后来被赫梯攻灭（Mazoyer 2003:27，111-120，149-150，193-196）。他的建国事迹与阿波罗、卡德摩斯（Cadmus）、罗穆路斯等神话人物的事迹雷同（Mazoyer 2003:156-158），也与周朝的始祖后稷的事迹以及扶余、高句丽和百济等国的始祖朱蒙（*Tümeɴ）等人物的事迹雷同。

5.建国英雄通常也是农业丰收之神（参看扶余-高句丽的传说）。将英雄和丰收之神结合为一体现在建国者身上，一般认为这种做法反映了两个不同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神圣的”法兰克国王们也反映了同样的结合，但这种结合被认为是上古时代遗留的传统。

6.这里讲述的故事是对希罗多德笔下不同版本的起源传说（Godley 1972:202-213）的合并。一种版本所记的天神之子是宙斯之子赫拉克勒斯。而在另一版本中，主人公名叫塔尔吉塔欧斯（Targitáus），是宙斯和第聂伯河伯之女的儿子。记有盗马情节的那一版本的主人公是赫拉克勒斯，与他共寝的则是一条居于洞穴的半人半蛇；她上半身为女子，下半身为蛇。这个人物应是赫斯提亚（Hestia），即斯基泰人的主神塔比提（Tabiti）女神。波斯进攻斯基泰时，斯基泰国王在给大流士的回信中写道：“我所敬者，唯我先祖宙斯与斯基泰之女王赫斯提亚，再无旁人。”（Godley 1972:328-329；参看Rawlinson 1992:347。）希罗多德在别处还写道：“他们只拜这些神：首先是赫斯提亚；其次是宙斯和被他们认为是宙斯之妻的大地之神；再次是阿波罗、天神阿弗洛狄忒、赫拉克勒斯、阿瑞斯。全体斯基泰人将他们奉为神明；他们也为波塞冬献祭。斯基泰人称赫斯提亚为塔比提，称宙斯为帕派乌斯（Papaeus，

即‘众神之父’；见Godley 1972：第257页注释3），称大地之神为阿比（Api），称阿波罗为戈伊托叙洛斯（Goetosyrus），称波塞冬为塔吉玛萨达斯（Thagimasadas）。”（Godley 1972:256-259；参看Legrand 1949:82。）罗林森（Rawlinson 1992:347）将波塞冬的斯基泰名字写作“Thamimasadas”，这显然是沿用阿比西特（Abicht 1886:54页注释5）的说法：“因为Teme＝mare（海），mazdâo＝deus（神）。”

7.该名号在汉文中作“单于”。现代汉语中，不论读“shànyú”还是“chányú”都与其古代汉语读音没有干系。在古代汉语中，“单于”早期应读作*Dar-γa，晚期应读作*Dan-γa。前一种读法让人想到中古时代突厥和蒙古的官号“Daruγači”（达鲁花赤）。可能这个称号在匈奴时代就有了，但即使如此，匈奴人也一定是从其他民族借来的。

8“.冒顿”一名在中古汉语中读☆mək（Pul.217-218）-☆twən^{3}（Pul.84）。虽然没有确证，但一些学者业已指出，其古代汉语的读音可能反映的是一个外来词*baγtur，与后来出现的中央欧亚文化词baγatur（英雄）有关。此词的词源不明，但第一音节很像伊朗语词汇*baγ（神、王），常被用于后世中央欧亚的称号中。在汉文史料保存的故事中，冒顿的角色是建国英雄。他本是匈奴开国之主头曼单于之子。他精于骑射，单于及其幼子欲施诡计杀害他，但冒顿被及时提醒，神奇地逃出生天。他召集了一队勇士，最终攻杀恶王，建立起一个正义和繁荣的国家。

9.《史记》记载冒顿被送往乌孙为质。这不大可能，因为史料大多记载当时匈奴西方的敌人是月氏。正是因为匈奴击败了月氏，月氏才迁徙到了乌孙以西。乌孙的首领后来进攻月氏，以报当年月氏杀父之仇。此一节见于下一个故事中。

10.一些学者将“头曼”一名比定为古突厥语“tümen”（万、万户）。突厥汗国的开国者土门（*Tumïn）之名和“tümen”这个词肯定都是外语借词，因为从形式上看它们都不像突厥语固有词汇。古突厥语数词“tümen”显然与西支吐火罗语词汇“t(u)māne”（万、万户）、东支吐火罗语词汇“tmāṃ”（万、万户），以及来源不明的现代波斯语词汇“tumân”同源（Adams 1999:301）。应当注意的是汉语“万”。其中古汉语音为☆man（Pul.318☆muan^{3}），见有ɦban的读音（Tak.370-371），来自*man。上述这些词的词源及其在各语之间借入的顺序仍不明晰。汉字“万”最早见于周朝的金文，但这未必是其最早出

现的年代。汉字“万”是一个假借字（rebus），其字形所指是一种虫。其作为声旁不但出现在汉字“迈”（古汉语音或为*mrāć～*mrats）、“虿”（古汉语音或为*srhāć～*hrjats）中，还出现在“励”（古汉语音为*rać～*C-rjats）中。学界对上述三个汉字韵尾的重构尤其值得怀疑。而对其声母的重构也好不到哪儿去。

11.狄宇宙（Di Cosmo 2002a：176；176页注释50）注意到冒顿建立了“一支绝对忠诚的卫队”。他总结道：“尽管司马迁的记载中含有传奇和浪漫主义的因素，但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冒顿的上位就是通过建立了一支高效的卫队和杀死其父。”笔者还想将《史记》关于单于葬俗的记载补充于此：“其送死……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Watson 1961，II：164）。可能这则记载将私兵殉葬与其他类型的人殉（妻妾、奴隶等）混在一起，因为汉人在当时并不熟悉私兵制，也可能匈奴人在贵族葬礼中就是将上述两者一起实行的。关于冒顿及其训练私兵的心理调节手段，参看Krueger（1961b）。

12.罗马起源传说中的鸟是一只啄木鸟，而乌孙起源传说中的鸟则被明确记为一只乌鸦。这或许是汉人编造的，用以解释“乌孙”一名，因为“乌孙”的字面意思是“乌鸦的孙子”，但此名显然只是一个音译词。另一方面，罗马起源传说中的啄木鸟则很重要，因为它是战神马尔斯的圣鸟；在普鲁塔克的版本中，马尔斯正是罗穆路斯、雷穆斯两兄弟的父亲。无论如何，这些传说的母题肯定是一种鸟，但究竟是什么鸟还不能确定。

13.索离，晚期古汉语音作*saklai，是斯基泰、粟特和塞人等族名的一种晚期形式，参看附录二。以前，笔者曾依据其他学者对原始文献的错误修订本。此名的首字在多数文献中作“索”（中古汉语音为☆sak），在另一些文献中作“橐”（中古汉语音为☆stak）。此字在学者的修订本中被臆断为“高”（*Ko），从而将“索离”还原作*Koryŏ，以契合高句丽、扶余的起源传说。笔者不应依赖其他学者的修订本，但相关文献迄今没有真正的校勘本可供使用；据笔者所见，所有的汉文文献仅有一种校勘本（Thompson 1979）。19世纪以来，希腊文、拉丁文、阿拉伯文以及其他中世纪西方语文的文献都陆续有校勘本出版。但正如汤普森（Thompson 1979：xvii）所言，汉学家们几乎都不清楚真正的校勘本为何物，那些自认为知道的人却在顽固地反对校勘。在这种令人遗憾的局面改变之前，汉文文献仍是不可靠的，而汉学在这层意义上仍是

一个落后的领域。

14.在一些版本中，王子生为婴孩，而在另一些版本中，王子则生为卵。国王尝试捣毁此卵，未遂，遂放弃。王子后来从卵中孵化。笔者曾提出，卵生版本是更早的版本（Beckwith 2004a：29），但现在笔者认为这两种版本应已相互掺混。故事的本源肯定是一种中央欧亚传统：王子是天神所生的英雄武士。这个故事与其他一些起源传说非常相近，尤其与后稷的传说最贴近。卵生的细节似乎是后加入的一种东亚或东北亚的母题。这在日本民间故事“桃太郎”中可见一斑。桃太郎便是从漂浮在河上的一只大桃子中孵化而生的。该故事在很多方面都与朱蒙的传说相近。其后在中世纪，该故事的朝鲜语版本记邪恶的国王是一只姓金的青蛙。尽管这个细节不见于该故事主要的古代版本中，但应当不是后来添加的。很可能，此传说不但是两种不同传说的融合，还代表着两支不同民族的融合：其中一支的起源传说记其祖先为蛙，有一个卵生英雄儿子。当然，在早期版本中，我们并未见到有关蛙的记载。

15.文献称“朱蒙”在高句丽语中作“善射”之意。其他的高句丽语语料显示，“蒙”所代表的第二音节确有“好、极佳”之意。但考虑到这个词在三个民族的起源传说中重复出现，都用作始祖之名，起到相同的历史作用，则至少其中两个民族应是从外族借来这个词汇。“善射”可能是一种民间词源，用以解释一个不明含义的外来词，可能“朱蒙”（*Tümeɴ）并非扶余-高句丽语。另一方面，斯基泰一名源自北伊朗语*Skuδa（射手），此说现已被普遍接受。扶余-高句丽民族在北方的故地“索离”（*Saklai）之名也是“斯基泰”的一种形式（详见附录二），这暗示朱蒙意为“善射”也可能是扶余-高句丽语对于*Sakla-（射手）的意译。此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关注。

16.今天，扬子鳄是一种濒临灭绝的动物，仅见于中国安徽省境内长江下游地区。但在古代，它可见于黄河流域（Ho 1999）。山东地区属新石器时代的大汶口文化10号墓出土84块扬子鳄骨骼，占据墓中出土动物骨骼的大多数。该墓所出其他动物骨骼包括2颗鹿牙、2具猪头骨、15块猪骨（http://depts.washington.edu/chinaciv/archae/2dwkmain.htm）。1959年，在山西石楼出土一件鳄鱼形状的青铜器，长41.5厘米，定年在商代晚期（Gyllensvärd 1974:48-49）。

17.“土门”，中古汉语音读☆thʊmən（Pul.312、211☆t^{h}ɔ^{2}-mən^{1}），在鄂尔浑古突厥语碑铭中写作Bumïn。现代学者几乎一致认为

这是正确的形式。例如，芮跋辞（Rybatzki 2000:206-208,218）认为，Bumïn是一个印度-伊朗语借词（古波斯语bûmî，意为“土地”；粟特语βwm，意为“世界”；古印度语bhûmi，意为“土地”）。据此说则汉文“土门”可能是半音译半意译，但这不太可能。克里雅施托尔内和利夫希茨（Klyashtornyi and Livshits 1972）称在布古特碑（约582年，是现存突厥汗国最早的文字资料）的粟特文铭文中读出了Bumïn，但吉田丰和森安孝夫在对碑文最新的研究中（Yoshida and Moriyasu 1999）却否定这种可能。笔者也对碑文进行了研究，赞同吉田、森安氏的说法。笔者认为，其古突厥原本形式应是*Tumïn，而非突厥碑铭中所记的Bumïn，理由如下：第一，汉文所记“土门”出现年代早于突厥碑铭中的形式，且以简单、清楚的常用汉字进行转写；第二，如果原作Bumïn的话，则*Tumïn便是一种避讳的形式，汉人不可能去转写避讳形式，而会直接转写原本形式；第三，中央欧亚帝国开国之主几乎不会取类似“土地、世界”之意的名字，而且上述印度-伊朗语中表示“世界、土地”的词在突厥语中增加尾音-n颇为奇怪；第四，匈奴、高句丽的建国传说与突厥的建国传说有着相似的文化因素，尤为引人注意的是三者都提到“先世祖居之窟”。三种建国传说中的始祖名字都相近。因此，突厥民族的始祖之名在古突厥语中应当是Tumïn，而非*Bumïn。至于为何会在突厥碑铭中出现错误的写法Bumïn，笔者尚无圆满的解释。这有可能是对开国之君名字的避讳，也可能是书写的错误。这个笔误出现在两件碑铭上，也可以解释得通，因为两方碑铭上有大段的文字是完全相同的，应是照抄而来。参看Beckwith（2005b）。

18.阿瓦尔人的汉文名称有“柔然”“蠕蠕”“芮芮”等，这些名字还没有与其他任何已知的族名勘同，他们的语言也不明。下面谈谈将柔然与阿瓦尔人勘同的问题。拜占庭人在初次见到这批从东方迁来的部族时称其为“阿瓦尔”（’Aβαϱοι），而突厥人则知道他们就是曾经奴役自己的部族，且深恨其首领在战败之后仍敢继续称可汗。在讨论“假阿瓦尔人”问题时，波尔（Pohl 1988:34）正确地指出阿瓦尔人中一定包含了属于不同语族的其他部落，因此将其整体与东方的某一个部族勘同的做法并不可取。但是，该问题的一个关键的线索似乎还没有引起学者的足够重视——阿瓦尔人的首领带有可汗的头衔。在突厥灭柔然之前，可汗这一头衔仅见于东部草原地带和中国北方。因此，阿瓦尔人的统治者家族肯定是柔然的汗族或其继承者。关于这种勘同的争论，参看Dobrovits（2004）。对于汉文史料中柔然族名的不同转写的细致研究可能为柔然的族属提供新的证据；在此之前，对此问题的猜想都是不成

熟的。

19.萨珊王朝的私兵制及私兵在史料中有一些不同的名称，最主要的有：gyânawspâr（新波斯语作jânsipâr），意为“牺牲性命之人”；adiyârân（或adyâwarân、yârân；新波斯语作ayyârân），意为“朋友、助手”。他们是骁勇善战的精锐骑兵，善用弓箭和长剑。他们与其他军士的区别在于，他们贴身护卫在统治者左右，身戴金饰，尤其是金制的手镯、腰带和耳饰，这标志着他们的等级。这些强悍、骁勇、尚武的战士是统治者的朋友，在宴饮和朝会时就坐在统治者的身旁。波斯私兵是“一群自由的武士，他们通过盟誓自愿效忠于主人，并服从其领导，追随其左右。成为私兵是一种荣誉，拥有特权和地位。形成私兵制的必要条件是：主人本身就是一个成功的勇士，他或许还要有贵族血统，并且要有富足的物质基础。主人及其私兵在一群能够作战的自由武士群体中构成了一个装备精良、随时能战的核心集团”（Zakeri 1995:87）。上述描述几乎就是对经典私兵制的定义。然而，魏义天（de la Vaissière 2005a：143-144）断然否定了萨珊时代存在柘羯或者古拉姆卫队。表面上看，他是对的。扎克利（Zakeri）用以证明以上述两种名称的私兵存在于萨珊时代的证据是年代错乱的，而且其论证确有不足之处。但是，萨珊时代当时的史料及其前代的阿契美尼德时代的史料确实表明：波斯人已经有了私兵制。一些晚期的史料虽然在某些方面不太可靠，甚至用后来的非波斯语名词如“柘羯”或“古拉姆”（而非中古波斯语的gyânawspâr、adiyâr等）来指称萨珊时代的私兵，但这不能否定这些史料所记之事的真实性。

20.早期契丹人的私兵制见于安史之乱的相关史料。关于后来的契丹辽代及其皇家侍卫的详细讨论，参看魏复古和冯家昇的杰出著作（Wittfogel and Fêng 1949）。“每个辽代皇帝都有一个单独的斡耳朵或营帐，有一二万户心腹侍卫……这支卫队是皇帝的私人奴隶，尤其是其中的非契丹人，但他们皇家近卫的身份又使得他们拥有很高的地位。皇帝驾崩以后，他们为皇帝守陵寝，新皇帝则重新组建一个斡耳朵和卫队。”（Atwood 2004:297。）辽代的五京制似乎就是按照“汗与四伯”的理想结构组织形成的。克烈部可汗是铁木真崛起过程中的劲敌，他“坐拥一支由把阿秃儿（ba’atur，意为‘英雄’）组成的精锐部队和一支千人卫队。后来成吉思汗也模仿了这种制度”（Atwood 2004:296），以及这些卫士所居的金帐（斡耳朵）。

21.文献称，这些陪葬者被杀死，“则无人可知其墓中的（二十个）墓穴究竟哪一个是他的”。亲见了阿提拉葬礼的罗马人也留下了类似的记载。陪葬者被杀是为了隐藏墓葬位置的说法很难令人信服——如果外族人都能亲见葬礼的话，墓葬的位置根本就无法保密。史料中坚实的证据可以证明，有私兵制文化的中央欧亚民族会在主人的葬礼上自杀（他们甚至愿意如此）或被杀，为主人陪葬（Beckwith 1984a）。

22.拜占庭的皇家私兵成立于840年前后，被称为Hetaireia。“分为三队，其中一队主要由可萨和费尔干纳（Φαϱγάνοι）的雇佣军组成。”（Golden 2004:283-284。）参看de la Vaissière（2005a：285页注释82）和Dunlop（1954:219）。唐太宗击败东突厥汗国，成为天可汗，将许多突厥武士纳入其皇家卫队。他们并不是一般的中原王朝的禁军，起码这些卫士自己不这么认为。此点的明证便是，两位突厥将领在太宗身后请求自杀陪葬（Beckwith 1984a：33-34）。

23.有文献提到“成吉思汗的行在，尤其是设有怯薛的，［‘斡耳朵帐’（ordo ger）一词］意为‘宫帐’……‘斡耳朵’在突厥语中就是一个重要的术语，后来被借入契丹、蒙古等语言。‘斡耳朵’本意指可汗的精锐骑兵卫队（即私兵）的营地，可汗的营帐就在其最中心”（de Rachewiltz 2004:453-454）。

24.基辅罗斯语družinniki（朋友们，参看Christian 1998:390）源自družina，即斯拉夫语“私兵”。此词与共同日耳曼语词汇*druhtiz（私兵）同源，源自原始印欧语*dhereugh（Lindow 1976:17-18），即原始印欧语*dereug。古英语中的gedryht在《贝奥武甫》中被用以表示“私兵”（也常用weored~weorod~werod来表示），在晚期的古英语中逐渐发展出泛指意味，表示“军队”，或仅仅表示“一队人”（Lindow 1975:24-26）。

25.救了他的这支私兵（*TCTC* 220:7047）被称作“曳落河”。“曳落河者，胡言壮士也。”（*TCTC* 216:6905）此词在中古汉语古老的北方方言中读*yerlakχa，可对应蒙古语erlik qaghan（阴间的统治者）。此词借自突厥语，在古突厥语中作ärklig khan，直译为“强有力的君主”，专指阴间的统治者（Clauson 1967:224）。至于用“河（*χa，参看Takata 1988:304）”来对*qa（即kha，“汗”），可能对应的是一种契丹语（蒙古语）形式。在中古蒙古语中，“汗”有作qa的形式（参看de Rachewiltz 2004:457，521，及其所引文献）。“胡”字在唐代汉文语境中通常被用

以指称“印欧人”。它并非如多数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仅指“来自中亚的伊朗人”（Pulleyblank 1991:126-127），甚至也被用以指称印度人。但是，“胡”也指回鹘、蒙古和其他的北方部族（更早时候指匈奴及东胡）。因此，“胡言”一词可以指代契丹语、古突厥语、粟特语或者另外一种在当时当地流行的语言。森部丰似乎忽略了前人的讨论，因此将“曳落河”误解作族名（Moribe 2005:244），否则其对安史之乱中中原地区的柘羯的讨论将更有价值。安史叛军也被叫作柘羯，即châkar（de la Vaissière 2003），参看魏义天关于在中原地区的粟特柘羯军的论文（de la Vaissière 2005c）。魏义天还通过相当篇幅来论证，中央欧亚其他民族中所见的私兵制案例要么与粟特人有关，要么与粟特柘羯制无关。粟特人的制度一定不会与同时代的突厥人、日耳曼人或者吐蕃人的制度在实践和目的上完全相同。即使在同一个语族内部，我们也不应期待找到完全同质的文化因素。法兰克、吐蕃、蒙古等民族的制度与粟特的柘羯制皆不相同，但它们都不过是中央欧亚文化系统的核心要素——私兵制的不同变种而已。遗憾的是，笔者在本书书稿完成之后才获悉其专著已经出版，只能匆匆浏览后，在此处和另一处留下两条扼要的评论。希望笔者没有曲解他的观点。

26.汉文正史记载，唐玄宗在位时，一匹马只值一匹丝。这被当时的史家和后世的学者一概当成事实。笔者认为，当时真实的绢马交易比价信息已经被清除。史官故意写低马匹的价格，是为给玄宗歌功颂德，同时也为了维持这种假象：自玄宗朝起，游牧民族的马匹已经羸弱不堪，他们强迫唐朝购买马匹，而唐朝则以优质丝绸换他们的劣马。然而，仍有一些真实的交易数据保存至今，参看Beckwith（1991）。事实恰恰相反，唐朝拿来换马的丝绸似乎大都是劣质丝绸（当然并非全部）。当时汉人确实垄断着许多种丝绸的生产工艺。

27.艾尔森（Allsen 1997）等人所援引的蒙古人掳获工匠和财物作为战利品的例子几乎发生在上古和中世纪整个欧亚大陆的各种战争中，绝非中央欧亚民族的专利。尽管在边境市场的实际贸易过程中似乎并不存在明显的强迫行为，但对贸易权利的争取通常是外交活动的重要议题，并伴有武力威胁，一如今日的情形。再者，所有的政权，无论是否为游牧民族所主导，都或通过武力，或通过威胁使用武力、监禁的手段，确保从被其统治的部众中征得税收和贡赋，一如今日的强权。

28.魏义天（de la Vaissière 2005a：283页注释73）正确地指出，

没有证据证明该宫殿规划受到佛教建筑影响。据阿拉伯、波斯和汉文史料可知，纳缚僧伽蓝最初是一座伊朗式的皇家宫殿城市，此点笔者曾在一篇论文的末尾一段中指出（Beckwith 1984b：150-151）。笔者在文章的补记中指出，可能佛教因素也直接影响了纳缚僧伽蓝的设计（因此也间接影响了巴格达城）。这种可能性不能被排除。在该文即将刊出之际，笔者才注意到《世界境域志》中相关的章节，当时文章的主体已经无法改动，幸获编辑部慨允，才得以添加此补记于文末。笔者之前将伊本·法齐赫（Ibn al-Faqîh）手稿中所记高耸的、有穹顶的中央建筑之名解读为al-Ašbat（Beckwith 1984b：148）。此说有误，应当修正。此名显然是对stûpa一词的一种地方变体的转写，最早由哈茨菲尔德在1921年指出（Beckwith 1984b：159页注释64）；因此应当读作alIstub。尽管一些佛塔很大，且有佛教雕像于其上，一如此例所示，但这些大塔及其所处的建筑群原本可能也是伊朗系统的宫殿建筑，与佛教并无瓜葛。29.中原王朝对中央欧亚民族作战得胜的每一次记录几乎都记载了其所获的战利品，但现代历史学家通常对此视而不见；不论他们同情谁，他们通常只统计中央欧亚民族“劫掠”中原王朝的数字，例如林俊雄（Hayashi，1984:86-92）所作《匈奴劫掠事件年表》。他认为匈奴的劫掠是草原帝国获得农业人口的主要途径。而他文中所引史料以及他的论证显示，逃出中原地区的汉人要么是自己逃跑的，要么是趁匈奴劫掠时逃跑的。参看Di Cosmo（2002a：202，204）。

30.应该认识到，在电信通信方式出现之前，单一的语言只能通过其使用者之间连续的直接交流保存。有些学者认为，各种印欧语子语言都是其首次留下记录的地区的原生语言。例如，Van de Mieroop（2004:112-113）写道：

19世纪的陈旧观点认为，在印度北方的某地有一个印欧人故地。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学者们致力于寻找印欧人进入安纳托利亚的时间、地点及其入侵该地的证据。然而这种努力只是徒劳。认为操印欧语的人群并非安纳托利亚原住民的观点并无道理。我们也不能说，到公元前2千纪的时候他们已经成为一个特征明显的语族。

这种说法在语言学和历史学上都属无稽之谈。

31.文中呈现的场景基于传统的印度-伊朗语观点。这种观点的根基是认为阿维斯陀语是一种最古老的伊朗语。然而，这种观点现在在我看来已不正确。有趣的是，一些早期的印欧学家并不认为阿维斯陀语是一

种伊朗语。“一些人认为阿维斯陀语就是梵语的一种方言，因为两者太相似了。”（Mallory and Adams 2006:6-7。）如果阿维斯陀语的传统分类地位是错误的话，那么极其独特的印度-伊朗语族、琐罗亚斯德的年代、早期印度-伊朗共有宗教信仰习俗的假说等等推论将不能成立。上述现象将都是印度语族本身的内容。当然，音系学的问题刚被发现。在语言学家深入研究此问题之前，对传统观点的批评本身还存有争议。因此，笔者在正文中仍遵从传统观点。详细的讨论参见附录一。

32.流行的观点认为，原始印欧人的故地所处的范围在北方以乌拉尔山南部和伏尔加河中段为界，在南方以北高加索与黑海为界。然而，印欧语诸子语言共有词汇*mori（湖、海）（Mallory and Adams 1997:503-504；2006:127）说明，此词应是在原始印欧人首次扩张时获得的。这意味着他们最初应当生活在靠近乌拉尔山和伏尔加河中段一带。这一带被许多人认为是印欧人故地。

33.该文化在研究文献中一般被称为巴克特里亚-玛尔吉亚那考古文化群（Bactria-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或BMAC）。Witzel（2003）讨论了“在最古老的印度语和伊朗语文献中所见的两语之间大量的借词”，指出“这反映了前印度-伊朗语在伊朗北部和阿富汗北部（即巴克特里亚-玛尔吉亚那考古文化群所在）流行”。“这些借词涉及农业、农村和城镇生活、动植物、宗教仪式等方面。”如前所述，本文呈现的场景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普遍接受的印度-伊朗语假说，尤其是对阿维斯陀语的认识和对琐罗亚斯德教的断代。学者曾普遍认为，琐罗亚斯德教将印度因素妖魔化，这种观点现在看来也疑点重重。如果这种假说是错的，那么本文所呈现的场景就需要被修正。

34.普遍认为，家马是由印欧人传入早期华夏文明地区（pre-Chinese area）西部的。主要依据有二：一是在前中原地区的早期遗址中不见家马骨；二是现代家马的基因构成中没有东欧亚野马（普氏野马）的因素。下文将论述，可能是吐火罗人将马传入的。当时吐火罗人养马可能主要是为了肉食。第二波印欧人的迁徙则传来了双轮车、拉战车的马以及其他的文化创新。

35.直到这一时间点之前，古代近东语言的记录中从未提及印欧人，也没有包含印欧语词汇。如前所述，塔里木盆地东部出土的干尸应是操原始吐火罗语方言的印欧人，其最早的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而原始安纳托利亚方言和原始吐火罗方言一样同属于印欧语的A组。考虑到

这两点，则这两支印欧人应当是在同一时间开始迁徙的。他们就是第一波迁徙的印欧人，他们的语言存活得足够久，留下了记录。必须强调的是，三组印欧语的分类并不代表着基因的分组。譬如，B组的印度语和C组的伊朗语就被普遍认为属于一个基因组。当然，这种普遍认识还值得商榷，参看附录一。

36.现存最早的关于赫梯人的名称是Nesili（写作Nešili），是赫梯人在赫梯语中的自称。但此词实际源于亚述人的殖民城市卡内什之名，本意为“卡内什之人”。梅尔谢特（Melchert）正确地指出：“从各个方面看，赫梯语都明白无误地是一种印欧语。”但是他又写道：“先前的观点认为，赫梯语曾受到非印欧语严重的底层影响，此观点有夸大其词之嫌。”（Melchert 1995:2152）问题是，原始印欧语本身是不可见的，而所有的印欧语子语言不但与原始印欧语大不相同，而且相互之间也大相径庭。对这些语言之间存在的巨大不同的最佳解释就是，它们是一种语言分别与不同的语言混合后的产物。这种解释符合从古至今留下历史记录的语言变化的情况。参看Garett（1999，2006）、Beckwith（2006a）以及附录一。

37.米坦尼王国中操古印度语的双轮车武士马里颜努人（maryannu，写作ma-riia-an-nu）之名源自古印度语词汇márya，意为“年轻的武士”（加上胡里安语表复数的词尾-nnu）。而古印度语表示“双轮车武士”的词汇是marut。二者都与马和双轮车有关（*EIEC* 277）。指称这些武士的词汇在古波斯语中有一个同源词marīka（源自原始印度-伊朗语*mariyaka），意为“随从中的一员”（*EIEC* 630）。所谓“随从”应指跟随君主的一队武士。“古印度语márya，即‘青年男子’被用以指称吠陀中因陀罗或楼陀罗（Rudra）率领的骁勇战队（即marut）。尽管此词的印度-伊朗语形式通常源自一个在其他印欧语中有同源词的第一音节元音为e的词汇*mer o-（Mayrhofer 1986-2000:329-330），但麦孔指出，其隐含的形式很可能以o为第一音节元音（*mor os），和古爱尔兰语的muire（首领）同源。”（*EIEC* 31。）这些形式之间的关联暗示，来自原始印欧语零元音词根*m-和o元音词根*mor（均表示死、死亡、青年）的指称“年轻武士”的词汇与指称“马”的词汇*marko（*EIEC* 274*márkos；Pok.700*marko-；Wat.38*marko-）有关。该词只见于凯尔特语和日耳曼语，表“马”，是现代英语mare的词源，则其本意应当指“双轮车武士的马”。

38.由于一直没有第一批古印度人出现在该地区的明确考古断代，问题始终无法得到解答：是否正如《梨俱吠陀》所记，古印度双轮车武士导致了印度河谷文明的崩溃？李安敦（Barbieri-Low 2000:7）写道："随着哈拉帕文明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崩溃，所谓的雅利安人从北方涌入。这个操印欧语的人群的传统和文化在名为《梨俱吠陀》的史诗中流传下来。《梨俱吠陀》记载，雅利安人使用不同种类的车具，而他们最为青睐者，当属马拉的双轮车。"关于印度河谷文明毁灭的时间或原因，学界迄今没有公论，但如果不是古印度人毁灭了印度河谷文明，那么《吠陀》中所描述的、在公元前2千纪中叶被非城居的古印度双轮车武士们攻灭的、位于西北印度的非印欧城市文明又是什么文明呢？这个问题不容回避。此问题及其他与古印度人进入印度次大陆有关的问题的争论背后多有政治因素。关于此问题的争论，参看Bryant（2001）、Bryant and Patton（2005），Hock（1999a，1999b）尤其有价值。此外，近来关于印欧人的综合性著作（Mallory 1989；Gamkrelidze and Ivanov 1995；Mallory and Adams 1997，2006）也包含与此争论相关的重要材料。

39.迈锡尼所出一枚印章戒指（Drews 1988:161）的图像为一名射手驾双轮车狩猎。迈锡尼的画像在年代上较竖穴式墓葬文化晚几个世纪，大多描绘手持长矛的战士，而非射手。关于迈锡尼的双轮车还有很多其他资料。一些学者在过去数十年中先后出版大量论著（例如Littauer and Crouwel 2002；Raulwing 2000），不懈地去反驳这种观点，即迈锡尼人是操印欧语的入侵者，他们带来了双轮车，并将其用于作战。对这些学者来说，典型的外来文化竖穴式墓葬文化也不是外来民族的证据，只是"当地部落酋长强势崛起"的表现（Littauer and Crouwel 2002:70）。他们还认为，双轮车主要用于"引人注目的展示"，且是"作为更大军队的附属品"，而不像在安纳托利亚及与其邻近的近东地区那样，是当时军队的关键武器。此外，他们认为，尽管双轮车"并非由征服者带入迈锡尼"，但它可能是后来作为古代近东政权的"礼物"被送到希腊的。他们认为，最早的车就是在近东被发明的，最早的双轮车原型也出土于近东。在确凿的证据面前，譬如前述迈锡尼印章戒指上带有驭手和射手的双轮车图像，他们仍主张："在希腊，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作战用的双轮车与弓箭有关联，这与文献有明确记载的近东、埃及等地的情况截然不同。而双轮车的用途在于运送战士，这些战士并不乘车作战，而是使用近身作战的兵器徒步作战。"（Littauer and Crouwel 2002:70-71。）用双轮车狩猎如同用其作战。他们还忽略了一样证据，

即“碟片状马镳颊革”。“它在公元前1600年出现在迈锡尼，在更早的时候便见于草原地带”（*EIEC* 245），是证明竖穴式墓葬文化与高加索北部草原墓葬文化之间存在关联的证据之一。从历史学角度看，上述观点并不能成立，因为其与下列证据相矛盾：有关双轮车最早的考古学证据出现在伏尔加-乌拉尔地区，可以定在公元前20世纪，而最早的图像学证据出现在近东地区的卡内什（Littauer and Crouwel 2002:45–46，figure 1），其所在的卡内什卡伦二号（Karum II）遗址定年在公元前1950-公元前1850年（*EIEC* 245）。该遗址也是迄今年代最早的印欧语——赫梯语的存在证据被发现之地，而赫梯人又是已知最早在战争中使用双轮车的民族，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7世纪。迈锡尼希腊人可能并未发明双轮车，他们也不是从草原上驾驭着战车进入希腊的，但他们迁徙进入希腊的必经之路高加索地区很早就有了双轮车。他们应是在此地习得了驾驭双轮车的技能。考古学的证据足以驳斥迈锡尼文明为本地突然生发的观点。德鲁斯（Drews 1988:176）指出，迈锡尼的竖穴式墓葬在希腊没有先例，“将竖穴式墓葬解释为原住民统治阶级发育的结果是一种循环论证，因为用以证明原住民统治阶级发育的例子仅有竖穴式墓葬本身”。德鲁斯还修正了早先其关于如何在战争中使用双轮车的观点。关于家马和双轮车的起源、传播和使用，多数近东中心论的观点都与实际证据不符，应受到驳斥。

40.一般认为，用“China”指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的东亚任何政权都是一种年代错乱，因为“China”一词的词源正是“秦”。那些后来被扩张的华夏族同化的其他族群至迟到公元前1千纪还保留着各自不同的语言。还有学者认为，商、周的统治阶层是否操汉语甚至都不是定论。尽管“China”一名不应被用于秦朝统一六国以前，但在华夏文明的摇篮——黄河流域很早以前就已经出现过统一的国家。在秦、汉帝国之前，以该地区为中心已先后出现商、周王朝。认为商、周人的语言非汉语的观点也不正确。建于公元前1046年或公元前1045年的周朝与其所取代的商朝一样，都是统一的政权，并以汉语作为官方的书面语。尚无法确知，分别建立起商、周两朝的征服者的母语是否与其征服之地所流行的语言不同。但据“奥卡姆剃刀”（Ockham’s razor）原理，它们应当是不同种的语言。在语言学上很重要的一点是，商、周时期的铭文本质上反映的是同一种语言，尽管这种语言在某些方面显示出方言和年代的微小差异。这种语言就是现代汉语的祖先。因此，“China”一名可以被应用到操汉语民族占据的土地的任何历史阶段，从商代一直到今天（但请牢记商朝所占据的只是很小一块领土）。但是汉语的来源至今仍

不明确，从类型学角度看，它在其“故地”明显是一种侵入的语言。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应是印欧人侵入该地区的产物。不能确定汉语究竟是一种最低限度维持的印欧语还是一种被印欧语影响的当地语言。此问题迄今一直被学界忽视，应受到关注。对此问题的探讨，参看Beckwith（2002a，2004b，2006a）。

41.当前学界的共识受到李安敦（Barbieri-Low 2000:8-9页及以下）的挑战。他认为，“如果之前没有大量使用车具的经验，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如此顺利地接受和改进像马拉双轮车这样复杂的机械组合”。但是，在中原地区从未出土过任何更早的车具。“实际上，除了双轮车外，安阳并没有出土任何车具。”（Barbieri-Low 2000:48。）而且，汽车和飞机的现代历史表明，要将一种完全陌生的先进技术传入某个社会，只需外来人口带入、使用这种技术并为当地人口提供学习使用它的机会。这无疑就是公元前2千纪双轮车技术和文化被传播到中央欧亚以外各地的过程，包括其传入中国的过程。李氏所援引的考古学等证据（Barbieri-Low 2000:14-17）含混不清，进一步削弱了其理论。他本身就承认（Barbieri-Low 2000:37），完全成形的双轮车是在商代相当突然地被传入中原地区，“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的武丁朝”。他还在别处提示了一个更可能的时间点，比武丁朝早了100年，因为将双轮车部件本土化制造技术和处理工艺在当时已经出现（Barbieri-Low 2000：第19页注释40），而且商人当时正在与拥有双轮车的异族作战。一件早期古汉语铭文记载“从敌人处掳获两驾双轮车以及其他兵器和人口”（Barbieri-Low 2000:47）。皮格特（Piggott 1992:65）认为：“中国的双轮车是出现在黄河流域的‘中国制造’。当地人基于基本的驾驭马和双轮车的原理，偶然发明了该技术。它与闪米特或印欧文化系统没有联系。”这种惊人的观点忽视了尽人皆知的一个事实：习得这种技术需要受到广泛的、长期的训练。训练他们的人应说另一种语言，肯定是一种西方的语言。皮格特本身就知道这点，他也承认，掌握双轮车“就要掌握一整套技术环节……不但包括工具，还包括人”（Piggott 1992:45-47）。

42.这些兵器包括大量的青铜箭镞，这就与认为双轮车是和矛或戟配套的一般观点相矛盾。在这些兵器中还有“一种半月形的刀，其顶部为环状或为一个完整的动物雕像。与商代主流的青铜器装饰母题比较可见，这些刀应是外来器物。这些动物形象的艺术风格在直到安阳以北、以西的北方地区非常常见。谈到技术，其中一些刀的形状和纹理暗示，它们是以失蜡法铸成的。而商代青铜器通常以陶范铸造（piece-mold

casting）的方法铸造。因此，这些刀可能属于商代双轮车驭手所用的一套物件，这套物件应起源于草原地带而非中原地区”（Barbieri-Low 2000:42-43）。事实上，这类刀具是在中国北方及更西的草原地带常见的、典型的器物，它作为一种在中原出现的著名的北方外来因素已被多次强调和讨论过（Bagley 1999:222-226；参看Di Cosmo 1999a：893-894）。

43.引人注意的是，最早的汉字形式甲骨文的结构与同时代近东地区的典型文字极其相似。它们大都是派生的象形字（或称zodiographic）、假借字、形声字等，而非简单的象形字。更加精确的术语和分析，参看Boltz（1994）。人们可能认为，毫无关联的文字系统应当在结构上完全不同，而据博尔茨（Boltz）的研究，甲骨文并非如此。但博氏认为，中国人是在毫无外界影响的情况下创造出的甲骨文字。他写道：“迄今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显示……汉字是受任何自中国以外传入的因素的刺激而产生的。”（Boltz 1994:34。）但是，完整的汉字系统直到公元前13世纪才出现，时在西方文字系统出现后的两千纪，而其出现的时间又恰与完整双轮车的出现一致，双轮车也是很早以前在西方被发明的。人类的模仿远多于创造。中原地区在此之前并无车具。西北方面的异族将完整的双轮车带入中原，被华夏族采用。与此类似，汉字的观念可能最早也是这样被传入中国的。有理论认为，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出现的多种符号就是汉字系统的前身。博尔茨的著作（Boltz 1994:35页起）事实上反驳了该理论。

44.在商代和周代早期的传统中，与女性有关的词汇在书写时一般要加上表示女性的偏旁，有时还要加上表示男人或人的偏旁。一个极佳的案例及相关阐释是柴尔兹-约翰逊（Elizabeth Childs-Johnson）有关妇好（妇子）的论文（Elizabeth Childs-Johnson 2003）。在本例中，“姜”字带有“女”字，而不像“羌”字带有“人”字。很可能“姜”是一种避讳的形式。真正的族名“羌”在周代不能被写出，因为周天子的母系就出自羌。因为这种不规则的形式只出现在周朝，这两个族名“姜”和“羌”应当可以勘同。有人将这两族名视为汉语，将词义解作“牧人”。但这似乎不太可能，因为它们从未表示过“牧人”之意，而只用作族名。关于此族名一种可能的印欧语词源，参看附录二。

45.“马”在古汉语音中有两种方音形式：一是*mraγ，来自更早的*mraga；一是*mraŋ，来自更早的*mraŋa。前者是现代汉语“马”读音的

来源，后者则是借入古缅甸语作mraŋ，借入古藏语作rmaŋ，借入原始日本-琉球语作*mmaŋ（Beckwith 2007a：145-146）。后一种读音在汉语中的证据还见于汉字“冯”的读音：其中古汉语音作☆biŋ（Pul.240），源自古汉语方音*mbrəŋ（Sta.589：*brəŋ），源自*mraŋ。这两种方音形式都是从更古的形式*mraga规则地派生而来，源自早期古汉语或原始汉语*marka，参看Beckwith（2002a）。需要注意的是，此词的末位元音并不确定，但它肯定不是一个高位元音；它很可能是一个*a。关于其在古汉语和中古汉语中从鼻音开头转化为鼻音辅音组合（prenasalized）开头，参看Beckwith（2002a：121-127；2006c：186-188）。

46.汉字“车”本是象形字。其在中古汉语中有两种读音，☆tʃa和☆kü。后者在古汉语中可以重构为*klâ或*krâ，则其早期古汉语音理论上应为*kelé～*kolé～*karé～*kore等。一般认为早期古汉语的*o音和*we～*wa音后来融合，因此早期古汉语中复原作*kolé的音可能读*kwelé。如果是*kwelé的话，则和印欧语表轮子的词相近。轮子是作为双轮车的一部分传入中原的，而在古汉语中，“车”既表车，又表“轮”，因此*kolé～*kwelé应是该词在其古汉语中的正确读音。古藏语表“轮、圈”的词ɦkorlo应源自前古藏语*kwerlwe～*kewrlew～*kwerlo～*korlew。前古藏语也无法区分*o 音和*we～*wa音。上述形式中，*kwerlo与原始印欧语表轮子的词*kweklo最为契合，但藏语对应原始印欧语的第二个*k的音是r。这种异常情况可能是因为古汉语的中介。在古汉语的某个阶段中，音节尾的*γ在读音上明显接近于/ʁ/（即标准法语和德语中的小舌音），因为操日本-高句丽共同语（Common Japanese-Koguryoic）的人群在借入古汉语词汇“鸟”时将其音记作*tewr（Beckwith 2007a：138；原文中的*tawr应改作*tewr），类似的例子不止于此。因此，古藏语的形式暗示其所本的古汉语形式为*kweʁlo，演变自*kweγlo，源于早期古汉语*kweklo（车）。“车”的两种读音都为平声而非上声，而上声是对古汉语音节尾的*γ的反映。这表明，在古汉语中原音中，该词的两个音节都应被分析作开音节，*γ仍将被看作第二音节（*γlo）的起首，而非首音节的收尾。但是在来源方言（donor dialect）中*γ被当作首音节的收尾（*kweγ），后来变为*kweʁ，于是被原始藏人听作*kwer。还有一种可能是，藏人直接从早期操印欧语的部族处借来此词，据藏语动词词根√kor（转、旋转；其使动态√ skor，指转、包围）改变其首音节读音。此藏语动词可以与原始印欧语动词*(s)ker（转、弯；Wat.78）的o音变形

式相对应。总之，原始汉语词“车”肯定是一个印欧语借词，应可被重构为*kweγlwe～*kweγlo，源自原始印欧语*kweklo。当然，此问题仍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47.汉语语言学家普遍接受这样的观点：华夏文明是在野兽和蛮夷环绕的孤岛中独立发展而来的。考古学家现在已经不持这种观点，不再那么狭隘。唯一被承认的外来影响来自南方：关于苗语和原始苗-瑶语对早期汉语的影响已有大量讨论。不论其语言是何种面貌，华夏文明在当时绝对是东亚地区最先进的文明。因此，从苗-瑶语言向汉语输入借词就不太可能。这一点似乎一直没有引起注意。除了蒲立本之外，当代的汉语语言学家只接受了一个来自印欧语的借词：来自吐火罗语的“蜜”。他们枉顾今日已无争议的考古学证据，不将其与语言学证据联系，着实让人费解。

48.“混合语”这一概念被用以指称高度混合以致无法析清其基因系谱的语言。它与克里奥尔语不同，后者的系谱是清楚的。混合语言学说又一次受到批评（Beckwith 2007a：195-213；Mous 1996）。马阿语（Ma’a）或姆布谷语（Mbugu）被托马森和考夫曼（Thomason and Kaufman 1988）认为是一种混合语，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例被推测为混合语的案例。慕斯在关于此语言的专著（Mous 2003）中继续推进此说。他提出，操姆布谷语的人口并非单纯地将马阿语当成一种暗语（code）使用。操英语的罗姆人（English Romani，即吉卜赛人）平时说英语，但为了保密和保持族群的独立，也会用大量罗姆语表记英语。慕斯认为操姆布谷语的人并非如此，他们实际上说两种语言——马阿语和姆布谷语，而这两种语言共用一种语法。他现在的这种观点是一种倒退。在其更早的论文（Mous 1996）中可见关于姆布谷语和马阿语的简单明了、未加修饰的真相——马阿语不应被视作一种语言，而只是用来表记姆布谷语的一种方式。

49.曾有人提出，因为属于辛塔什塔-彼得罗夫卡文化的双轮车似乎是一个用于宗教仪式的模型，真正使用的话可能并不稳定，所以它应是中央欧亚人对近东战车的仿制品，因此马拉的双轮车应起源于近东而非中央欧亚。但是，此说的两大立论基础都很有问题：首先，此说认为，早期双轮车是因为其“声望价值”而非其实战价值被发展和传播；第二，此说认为，古代近东留下的由无法识别的动物牵引的双轮车的粗糙画像就是双轮车（Littauer and Crouwel 2002:45-52）。关于辛塔什塔-彼得

罗夫卡文化的双轮车，相反的逻辑过程似乎更加合理：用于陪葬的仪式性物品应当源于该文化实际生活中长期使用的物品，不管它是否源于本土；相反，来自异域的新鲜物品如果用于陪葬，则应是该物品本身（譬如安阳墓葬出土的双轮车），而不应是其仪式性形态。当然，此问题最终应由考古学家解决。

50.希罗多德称“居住在亚洲的游牧斯基泰人在马萨格泰人的战争压力下渡过阿拉斯河，逃入辛梅里安人之地（此地现为斯基泰人所据，但据说过去曾长期属于辛梅里安人）……现在，在斯基泰地区有辛梅里安长城、辛梅里安渡口，还有一个国家叫辛梅利亚，有一个海峡叫辛梅里安。此外，辛梅里安人在斯基泰人的压力下逃入小亚细亚。其间，他们曾在今希腊城市锡诺普（Sinope）所在的半岛也建立了一个殖民点。很明显，斯基泰人追逐着辛梅里安人进入米底，搞错了方向。因为辛梅里安人一直沿着海岸逃遁，而斯基泰人沿高加索山脉追逐进入米底之地，此后就进入了内陆。”（Godley 1972:210-213；参看Rawlinson 1992:299-300。）高德利（Godley 1972：第213页注释1）谈及辛梅利亚时写道，“克里米亚（Crimea）一名即源于此”，所谓“叫辛梅利亚的海峡”即“辛梅里安博斯普鲁斯”（Cimmerian Bosphoros）。尽管希罗多德的记载部分依据的是较晚的波斯传闻，但考古学的证据很大程度上印证了他的记载。

51.本文写作时，笔者尚未读到魏义天的论文（de la Vaissière，2005d）。他强烈质疑了中央欧亚学家已达成的共识，即匈人与匈奴没有任何关联。匈奴曾被比定为伊朗语族（Bailey，1985:25页起）、愒语族（Ket，Pulleyblank，2000；Vovin 2000）等。他们至少在文化上曾受到过北伊朗人的东支——塞人的强烈影响。很可能，“匈奴”一名就是汉文对古代北伊朗语族名*skuδa的转写。当然，无论是证明还是推翻这种假说，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古代汉语语音的重构。尽管魏义天对匈人-匈奴的比定做出了迄今最为有力的论证，但他仍然没有解决一些重要的问题。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他没有讨论汉文转写的语音。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古代汉语转写体现出起首是一个辅音组合。但是，由于魏义天的论文中利用了一些未曾被讨论过的新史料，其论文值得深入讨论。另见注释52。

52.普遍认为，至少一些以辅音组合*sC（C）-开头的音节至迟在早期中古汉语阶段已经简化为*χ-开头。可能在中原音中，所有*sC（C）-

开头的音节都简化为*χ-开头，甚至以单辅音*s-开头的音节也变成了*χ-开头（至少一些例子确实如此）。这种变化在中古汉语阶段已经在中原各方音中完成，但*s仍在公元元年后最初的几个世纪中见于汉语词汇的一些位置中，这在汉文转写印度语术语中可见端倪（Pulleyblank 1984）。因此，古代汉语的*s音可能仍然在西汉早期保存。从“匈奴”一词的语音看，其起首辅音应是*s；第一音节起首的形态应当是*sV-或*sCV-。因为西汉的都城在长安，当时汉语的正音可能带有口语化的鼻音（oralized nasal），恰如“冒顿”转写的是*Baγtur，而非*Maγtur。因此，“匈奴”一词或可还原为*Soγdâ、*Soγlâ、*Sak(a)dâ，甚至*Skla(C)da等。参看附录二。

53.Saka在汉文中最广为人知的音写是“塞”，中古汉语读☆sək（Pul.271）。此词在其他地方还反映出不同的读音（此点被高本汉忽视），据其梵文俗语读音Śak（源自Śâka~Saka），或可将其重构为以*ś-开头的词。族名塞-斯基泰还保留在古地名“莎车”（*Saklâ~*Śaklâ）中。但因其出现年代较晚，这种音写形式实际反映的首辅音有可能是*s-而非*ś-。究竟是*s-还是*ś-仍需进一步的研究。关于古地名“莎车”，参看Hill（待刊）。关于匈奴与塞人之间可能的关联，应当注意《周书》对突厥起源的记载。《周书》记载了两种版本的起源传说：一种称突厥为匈奴之别种；另一种称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CS* 50:907-908；参看Sinor 1990a：287-288）。“索”的中古汉语音为sak（Pul.1990:298）。尽管学界对“索国”的含义还提出了一些相当新奇的解说，但“索”字最有可能的含义就是对族名“塞”的音写。同样的记载还见于弥南的希腊文著作（Blockley 1985:116-117）中：“突厥人，早先曾被称为塞人（Sacae，即Saka）……”鉴于此系完全独立的另一种史料，应可印证《周书》中“索国”的记载。

54.达契亚即达契人（Daci，或称Gatae，即“盖塔人”）之地。他们属于色雷斯人或弗里吉亚人的一支。在公元前1世纪初期，达契亚是今罗马尼亚和摩尔多瓦一带强大的地方政权。当时达契亚的势力向东扩张到黑海草原，恺撒欲攻之。一般认为，这是因为达契亚被罗马视为威胁，但实际上更可能是罗马觊觎他们的金矿（在今特兰西瓦尼亚）。罗马与达契亚之间时战时和。直到图拉真朝，罗马人才终于在101-107年征服达契亚，将其并入帝国版图，同时迁移大量罗马人口进入当地。现代罗马尼亚人是当年操拉丁语的罗马殖民者的直系后代。达契亚行省后来被哥特人占领。参看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x、xliii、xlvi节

（Mattingly 1970:101，136-137，140）。

55.这半行在写本中就有，而并非如多比（Dobbie 1953）所言，是其校勘的结果。本书所引的片段，即多比整理本的81b-90a行，是据笔者早先的解读（Beckwith 2003）翻译的。在该文中，笔者讨论了其他的读法，并指出这半行文字的通行校勘和解读是错误的。此处给出的译文反映了笔者对原文要表达的内容的猜测。至于对古英语原文的重构则是另一个问题。

56.一些历史学家将曾活跃在西部草原和东欧一带的匈人与曾活跃在中亚的嚈哒人（或“白匈人”）勘同。嚈哒曾在5世纪击败萨珊波斯，占据巴克特里亚和河中的大片地区。但嚈哒人明显不是匈人，将其称为“白匈人”要么是错误，要么是将“匈人”用作一般泛指。新出土的属于嚈哒统治时代的巴克特里亚语文书称嚈哒为“嚈哒”（ηβοδαλο），而非“匈人”（de la Vaissière 2005d：19）。在沙普尔二世时代（309-379年）活跃在萨珊波斯东部边境的神秘民族匈尼特人也被一些学者认为是匈人，或与匈人有关联（譬如，Frye 1983:137；Bivar 1983:211-212）。沙普尔二世曾在356-357年出兵进攻他们。但他们明显也不是匈人。有学者曾论证匈尼特人是伊朗语族。他们认为其名称在婆罗钵文中的形式Hyon应源自阿维斯陀语Hyaona（Felix 1992:485）。但此说业已被魏义天驳倒（de la Vaissière 2005d：5-10）。因此匈尼特人的族属仍不明确。

57.普利斯库斯还在别处提到了贸易集市（Blockley 1983 II：230，243）。其中一条材料记载，匈人进攻了一个罗马人的集市。罗马派出使者交涉，匈人回应说这是对罗马人严重侵犯的报复：罗马在马古斯（Margus，今塞尔维亚波扎雷瓦茨）的主教曾进入匈人领地，并盗掘匈人贵族的墓葬。尽管普利斯库斯及其后的多数史家都不屑于匈人的说辞，但后来该主教向匈人投降请罪的行为暗示了匈人最初确是受害者。这个结论也完全符合罗马帝国边境的当权者对待中央欧亚民族的一贯行为，也符合从西到东整个中央欧亚边境经常发生的事件。

58.包括拓跋（*Taghbač）在内已知的鲜卑各部都操蒙古语。据汉文史料记载，柔然（阿瓦尔人）并不属于鲜卑部落联盟，但役属于鲜卑。汉文史料显示了对柔然的偏见，表明其应是与柔然敌对一方所撰，但它强烈暗示了柔然人是与鲜卑不同的民族，操一种不同的语言。尽管一些柔然人名和称号确实看似蒙古语，但人名和称号往往是借词（一如

匈人有许多哥特语名字，早期突厥人有许多印度或伊朗语名字）。柔然末代可汗阿那瓌（*Anagai，*CS* 50:908）的名字也见于弥南的记载（Blockley 1985:172-173,178-179）：在西方，可能操突厥语的兀惕鹘人（Utigur）的首领名作’Ανάγαιος（Anagai，参看Chavannes 1903:240）。多数柔然人名和称号从语音上判断似乎明显不是蒙古语。关于柔然的最大问题还不是其相对缺乏的史料，而是学者研究的匮乏；这个题目已经很久没有学者关注了。另需注意的一点是，在利用中古汉语音还原外来语人名（如“阿那瓌”）时，汉语音节中的☆w往往不对应源语言中的任何一个音。

59.关于韩国、朝鲜、日本历史早期族属问题仍有着广泛的争议，究其原因有三：一是政治因素，包括韩朝两国的民族主义（参看Pai 2000）；二是韩、日以及其他国家的学者对于主要史料和研究著作的忽略；三是东亚研究领域对历史语言学和语文学等科学方法的误解与排斥。相关资料和问题的讨论，参看Beckwith（2005a，2006e，2007a；Kiyose and Beckwith 2006）。

60.这一时期被定为“日本”文化在日本本土的开始，一般被认为始于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近年来，一些学者依据碳-14定年，将这一时间大幅度提前。问题是，众所周知碳-14定年的方法对这一历史阶段并不可靠。弥生时代的准确定年只有在朝鲜半岛和日本公元前1千纪至公元1千纪前半段的准确的树轮年代学次序建立以后，才能成为可能。参看Kiyose and Beckwith（2008）。

61.民族迁徙对欧亚大陆周边文明的表面影响一直是世界史学界的关注重点，尤其是对西罗马帝国的影响。相比之下，对其原因的关注则少了很多。人们提出过一些可能的原因，但这些原因背后的逻辑都是一致的：中央欧亚民族饥饿、寒冷、贫穷，而他们又好勇斗狠、精力充沛、来之能战。他们抓住机会劫掠南方软弱的农耕民族，取得意想不到的胜利，得以进入当地建立政权。将这段历史如此书写至少是有误导性的。这种书写或多或少基于一种错误的观念：中央欧亚民族在其自己的土地上一直受饥饿、贫穷等问题困扰。因此，即使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他们也被认为有入侵周边地区的动机。此问题详见本书《尾声》的讨论。人性使然，中央欧亚民族无疑曾进攻过其敌国，一如其邻国曾进攻过他们。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我们并不知道民族大迁徙发生的真正原因。当然，在周边文明中发生的史事都有记载，或许可以借此进

一步探究民族大迁徙发生的原因。

62.阿拉伯对内对外贸易、穆罕默德以及早期伊斯兰扩张等历史仍是极具争议的领域。参看各家不同的论说：Shaban（1970，1971，1976）、Crone（1987）和Peters（1994）。本文主要遵从沙班（Shaban）的观点，也部分地参考了科隆（Crone）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她对阿拉伯帝国向半岛之外扩张的主要动因的研究结论。她用排除法论证，假想的阿拉伯人之间天然的交战状态（参看注释63）不能解释伊斯兰教形成的独特历史及其后续的征服过程，因此其原因只能是有“外部势力进入”阿拉伯（Crone 1987:245-250）。“穆罕默德的阿拉伯曾受到异族控制，其程度甚至超过今日。”（Crone 1987:246。）关于早期征服，另见Donner（1981）。

63.科隆（Crone 1987:243-245）等学者认为，阿拉伯人是贪得无厌的征服者：“部落国家必须通过征服去生存。凶狠的部落民通常更愿意作战而非隐忍。”（Crone 1987:243。）在她看来，穆斯林也有着同样的性格：“穆罕默德必须去征服，他的信众热衷于征服，而他的神也告诉他去征服：‘我们需要更多吗？’”（Crone 1987:244。）这些观点似乎没有客观证据。这与本书《尾声》论及的对中央欧亚民族的普遍认识何其相似！这并非偶然。参看笔者对伊斯兰私兵制的讨论（Beckwith 1984a）。

64.一般认为，阿拉伯人捣毁“泰西封的大图书馆”导致了以中古波斯语等新波斯语以前的波斯书面语写成的书籍传世甚少。但事实上，这类书籍传世甚少的原因仅仅是波斯人写的书很少，至少以早期波斯语写的书很少；直到他们皈依伊斯兰教，才从阿拉伯人那里浸染了写书的传统。在9世纪初，阿拉伯帝国开始解体，一种高度阿拉伯化的书面语言——新波斯语形成。波斯人从此开始如阿拉伯人一般大量写书。这似乎就是与阿拉伯语、新波斯语海量的书籍相比，中古波斯语书籍显得稀少的原因。还有说法称，是阿拉伯人摧毁了亚历山大城的大图书馆，同属无稽之谈。在阿拉伯征服前的几个世纪，此事已然发生。

65.有史记载以来，中亚的西部和南部曾数次被波斯帝国征服，但从未被其长期直接占领。从语言和文化的角度来看，当地居民也非波斯人。他们操完全不同的语言（巴克特里亚语、粟特语等）。尽管这些语言与波斯语同属伊朗语族，但分属不同的语支。这种误解一定程度上源于“伊朗”这一名称。它本身跟今天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前为波斯）

无关。它是指称语族和操这一族语言的人口的学术概念。和波斯人一样，阿拉伯人也很快攻下中亚西部和南部，但他们也没能牢固地控制该地。中原王朝在中亚东部也遇到类似的困难，难以在当地建立稳定的统治。

66.玄奘在巴尔赫（缚喝国）的纳缚僧伽蓝停留一个月，学习《大毗婆沙论》（Mahāvibhāṣaśāstra）。此经是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的重要经典（*TSFC* 2:33），是“佛教哲学的百科全书，对古代和当时的一些不同学派的哲学都有详细记载和讨论”（Ch’en 1992：第95页注释9）。幸运的是，他带了一部抄本回中原，译成汉文，传世至今。而其他语言的版本今俱不存。近来涌现出一些与此经相关的优秀研究成果（Takeda and Cox 待刊；Willemen et al.1998）。

67.在新兴的阿拉伯帝国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Uthmân，644-656年在位）遇刺之后，内战爆发。尽管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弟阿里（‘Alî，656-661年在位）继位成为哈里发，但对奥斯曼政策的不满和奥斯曼的堂弟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为奥斯曼报仇的念头引发了内战。阿里的长子哈桑（al-Ḥasan）继位，但很快让位于穆阿维叶。在阿拉伯第一次征服呼罗珊不久后，当地即爆发起义。尽管阿拉伯曾数次出兵平乱，但大都无功而返。直到内战结束之后，才在呼罗珊建立稳定统治（Shaban 1970:26-27）。

68.“悉勃野”这一头衔一般被解为“悉勃（Spu）之主”（Beckwith 1993）。但这可能是一种误译。尽管“悉勃”似乎有可能是吐蕃早期王朝的名字，“悉勃野”的头衔也出现在吐蕃帝国时代的文献中，但“悉勃野”的含义实际上还不清楚。近来，一些西藏人和藏学家开始使用“悉勃野国”指称“吐蕃帝国”。这不太符合历史事实，因为汉文-藏文双语史料明确称其为Bod chen（大蕃），与汉文“大唐”的用法相对应。这个问题应引起学界的重视。

69.通常依据吐蕃帝国之后的文献记载，文成公主［在《吐蕃大事纪年》中作“Mun caŋ koŋco”］下嫁给弃宗弄赞［Khri Srong Rtsan，即松赞干布（Srong Btsan Sgampo）］。但这与《吐蕃大事纪年》开头所写以及其他关于8世纪与唐朝和亲的历史记载不符。有两种可能的情况。一是文成公主下嫁的可能是太子贡松贡赞（Gung Srong Gung Brtsan）。他登基在位6年后去世，于是松赞干布再度登基，并按照中央欧亚收继婚制娶文成公主为妻。这种说法的证据是《吐蕃大事纪年》残

存的开头部分明确记载松赞干布在去世前“与文成公主共居3年”。但是，同书两次将松赞干布称为“赞普皇兄”（btsanpo gcen），与其皇弟（gcung）赞松（Btsan Srong）并列。尽管贡松贡赞仍有可能在现已不存的部分中被提及，但基于残存内容判断，这种可能微乎其微。则松赞干布之弟赞松可能是文成公主的驸马。《吐蕃历史纪年》同样提到了这种双王制，松赞干布之父在位时便实行此种制度。同书还记载，8世纪初叶唐朝和亲的金城公主应是下嫁给被称为“赞普皇兄逻”（btsanpo gcen lha）的赞普，而绝不是要嫁给赤德祖赞（Khri Lde Gtsug Brtsan），因为在议金城公主和亲之事时，赤德祖赞甚至还不是储君（Beckwith 1993:69-70）。在中央欧亚各地广泛存在的双王制值得深入研究。

70.法兰克人在公元800年圣诞日采用拉丁文头衔“皇帝”（imperator）似乎是他们与教皇交恶的开始，双方的斗争贯穿法兰克人的史料。法兰克人之前已经有两个指称其最高统治者的名词：拉丁文的“rex”和与英文“king”同源的法兰克语形式。它们与邻近的拜占庭、阿拉伯的最高统治者称号不同。到查理曼的时代，皇帝头衔已经不仅限用于帝国。小国阿瓦尔的国君便有相当于皇帝的“可汗”称号，这是其在东部草原时的传统。791年，查理曼的大军攻灭阿瓦尔汗国。

71.弥南记载突厥汗族族名为Arsilas（Blockley 1985:172-173）。汉文文献中作“阿史那”，其中古汉语的方音作☆Aşinas，明显可以对应一个外来音*Aršinas～*Aršilas。尾音*s后来在标准中古汉语音中演变成去声。据其他一些早期的汉文转写外来词的例子可知，在中古汉语早期阶段，尾音*s还是存在的（Pulleyblank 1984）。现代汉语的n音在当时读作n、l或d。希腊文不存在上述混乱，但却不区分s和ś，而这两音素可在汉文中明辨。这样，汉文转写和希腊文转写对勘后可复原阿史那的突厥语读音形式*Aršilas。尽管此词的词源尚不明晰，但已经可以否定一些学者的猜想，即它与碑铭所见的古突厥语词汇kök（蓝天）有关，这个词指天神腾格里所处之处，即突厥可汗降生之源头。突厥碑文（译文据Sinor 1990a：297）写道：“在头上的蓝天和脚下的大地被创造之时，天地之间造出人类之子。”碑铭作者所指，显然是天神腾格里和大地女神乌迈。因此，蓝突厥（Kök Türk）可能指“像天空一样蓝的突厥人”，此说在学界一直流行。尽管魏义天（de la Vaissière2007:199-200）称，“我们知道突厥汗族族名在粟特文中作‘’šn’s……明显读作Ashinās’，但笔者在他提到的两种铭文中并没有找

到这种形式（Beckwith 2005b）。他没有看到希腊文对“阿史那”的转写，也没有回应我在一篇附录中关于突厥汗族族名的讨论［《论突厥汗族》（“On the Royal Clan of the Turks”），Beckwith 1987a/1993:206-208］，只是提到，“诚如白桂思所言，这不是一个称号，而是部族名”。而他指出的该词可能的吐火罗语来源业已由笔者更早指出。

72.克里雅施托尔内（klyashtornyi，1994:445-448）等学者提出，此名来自于阗语āṣṣeiṇa（蓝色的）或吐火罗语âśna，对应古突厥语的kök（蓝色的）。而在鄂尔浑碑铭中常常出现Kök Türk（蓝突厥）字样。尽管一些突厥学家接受了克氏等人的理论，但此说仍存在着无法回避的难题。将“阿史那”解作“蓝色的”忽略了这样的事实：汗族的名称一定得是名词（一些学者认为突厥语中没有形容词，他们只是无视语法规则而已）。如果说阿史那在意思上对应突厥语“kök”，而它又用作名词的话，那么“Kök Türk”岂不是意为“蓝色和突厥”了？这与碑铭的语境和突厥历史都不相符。将“阿史那”与“蓝色的”相联系，完全基于该词现代汉语的读音，而忽略了对其中古汉语音的还原。此说还忽视了“阿史那”在希腊文中的清楚的转写，作Aršilas，与“阿史那”的中古汉语音吻合。而这种形态并不能与于阗语āṣṣeiṇa勘同。此说还没有解释与阿史那氏并列为突厥贵种的阿史德氏的名称，这两个名称在词源上显然是有关联的。一些学者称在古突厥语或粟特语文献中找到了“阿史那”的对应形态，但均已被笔者证伪（Beckwith 2005b）。最后，学者曾试图将Aršilas比定为突厥语、阿拉伯语等文献中出现的一些读音相近的名称，这些结论都大为可疑。和早期突厥人的多数名号一样，此词也在语音上大异突厥语。“在汉文史料中所记的50个突厥可汗的名号中，只有一小部分能找到突厥语的对应词，其中更少一部分是纯正的突厥语”（Sinor 1990a：290）。突厥人在发Aršilas这个音时肯定会遇到困难，这就是为何在后来会出现许多种与之类似的读音。其中许多应是受到了外来词汇和名称的影响（Beckwith 1993:206-208）。

73.关于吐蕃帝国发生在755年的内乱的相关记载大都年代较晚且充满混乱，但它们似乎反映了一些被官修的《吐蕃大事纪年》掩盖的信息。遇刺的赞普的后妃中包括唐朝的金城公主。但在内乱之时，她已经过世很久。在该赞普的祖父的后妃中有一位出身阿史那氏的西突厥公主。关于她的信息只有其古突厥语的称号“可敦”（王后）。该赞普在孩童时被墀玛蕾扶立。而墀玛蕾可能就是推翻那位被称为“皇兄”的赞普逻

（Lha）的主谋。关于此次内乱的详情，参看Beckwith（1983）。

74.常有记载称某位大师或者译者从某某外国来到吐蕃。尽管这种情况在历史上肯定有发生，但多数的案例应当发生在吐蕃帝国将该国囊括在其版图下之时，即这种人员交流多发生在吐蕃帝国的版图之内。著名的莲花生（Padmasambhava）大师的事迹大部分为虚构。他本人从乌苌那（Udyâna）入藏，当时乌苌那应是吐蕃帝国的朝贡国。中亚佛教或“大食”（Tazig）佛教先传入西藏西部的原象雄王国，后来在当地获得“苯教”之名（此过程貌似不符合历史），关于此种假说，参看Beckwith（待刊）。如果此种假说确是事实，那么该过程肯定也符合本注所说的模式，即当时吐蕃帝国的势力扩张到了东吐火罗斯坦地区（今阿富汗东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和塔吉克斯坦），而佛教在当地极盛。

75.740年这个年份在犹大·哈雷维（Jehuda Halevi）的希伯来语著述（写于1140年穆斯林治下的西班牙）中有明确记载。然而，此事的年代仍颇有争议。它可能发生在8世纪晚些时候——马苏第在其《黄金草原》中将可萨人皈依犹太教之事系在哈伦（Hârûn al-Rashîd）统治时代（786-809年）。而根据“摩西币”（Moses coins，年代在837-838年）提供的证据，此事甚至可能发生在9世纪。当然，摩西币出现在哈伦死后约30年，这也不能说明可萨人就在哈伦治下皈依犹太教，因为他们可能在837-838年前的任何时候皈依（Kovalev,2005）。再者，可萨人改宗是一件大事，非有大变故不足以引发此事。如前人所指出的，这一大变故定然是8世纪30年代阿拉伯人对可萨人的肉体摧残、宗教压迫和羞辱（Dunlop 1954:86）。如前文所述，中央欧亚的主要政权在8世纪中叶都不约而同地皈依某种世界宗教。综上，可萨人的改宗也应发生在这一时段。对各种史料和观点更为细致的讨论，参看Golden（2007），但他支持可萨人改宗年代为9世纪初的观点。

76.“伊斯兰受印度影响的半个世纪”这种说法是由一位早期研究伊斯兰文化史的学者创造的。遗憾的是，笔者已不记得这位语出惊人的学者的名字。在大量检索之后，笔者没能找到这种说法的出处。（笔者也曾询问过早期伊斯兰研究领域的许多知名专家，但也没人记得此说的出处。）据笔者所知，只有这位学者认为，阿拔斯王朝在其最初的半个世纪中深受印度文化的影响。这一阶段恰在许多方面都是伊斯兰文化形成的时期。他的研究成果显然已被学界完全忽视或遗忘，而任何认为中亚或印度文明曾在伊斯兰文明形成阶段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观点都受到伊斯

兰学家们的强烈抵制。这两件事或许说明他的思路是正确的。如前所述，古代近东学界和汉学界对于外部世界对其研究对象的影响有着类似的态度。

77.法赫里（Fakhry 1983:34）写道："到5世纪，佛教的两部派说一切有部（Vaibhashika）和经量部（Sautrantika）、婆罗门教的两派正理派（Nyaya）和胜论派（Vaishashika）以及耆那教都已经发展出一种原子理论，这种理论显然并非受希腊影响，而是独立发展出来的。该理论阐释了物质、时间和空间是由原子组成的特征，强调世间万物衰亡的本质是原子组合的变化。"尽管法赫里在其研究中已经提到了佛教部派，但学界在讨论上述问题时依旧只谈印度教派。唐僧玄奘在7世纪中叶前往印度取经的途中路经中亚，记录下当地高度繁荣的佛教文明。到7世纪末叶，阿拉伯人入侵、征服中亚大部，他们开始与当地的佛教文明发生频繁、密切的接触。这点一直为学界所忽视。同样的结论应当还适用于解释苏非派中独特的、神秘的"非伊斯兰因素"的来源。这些因素由出身西呼罗珊的中亚人比斯塔米（AbûYazîd　al-Bisṭâmî，卒于875年）创制，而比斯塔米的师父信迪（Abû　'Alîal-Sindî）是一位非穆斯林。从其名字看，其家族应来自信德（Fakhry 1983:241，243-244）。

78.关于早期阿拉伯文法学家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印度的影响，学界尚未达成共识。相关领域最权威的专家卡特（M.G.Carter）在与其等身的著作中都只强调叙利亚的影响（譬如Carter 1997）。然而，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似乎就是阿拉伯文借用了叙利亚文的标示元音的方法。这种影响毋容置疑，但它仅仅是正字法层面的，与伊斯兰教圣书中所见的、印度式的处理音系的方法性质不同。早期的文法学家中并无叙利亚人，这点应引起注意。已知籍贯的文法学家几乎都不是阿拉伯人，而该文献的作者就来自中亚的佛学中心巴尔赫。这个问题需要兼通印度、阿拉伯文法传统的学者再做检讨。

79.Bon（苯）这个词在苯教文献中就等于chos（吹，梵语dharma）。如此看来，该词的词源显然不在藏语中，目前尚不能确定。还需注意的是，尽管人们一直相信在吐蕃帝国曾流行一种非佛教的宗教苯教，但此观点仍缺乏证据。苯教及其信众存在的第一件文献证据出现在吐蕃帝国以后。尽管苯教在某些方面与佛教各部派皆不相同，但它肯定是一种佛教。参看Beckwith（待刊）。

80.杜希德和提茨（Twitchett and Tietze 1994:45-46）曾表达出对

契丹语的族属的不确定，但学界早已普遍接受，契丹人操一种蒙古语。随着对契丹文的解读，这一结论被进一步确定。最近，一个非语言学的新术语“蒙古语姐妹语”（Para-Mongolic，Janhunen 2003:391-402）被用以指称契丹语和其他一些早期蒙古语，类似的术语也被用于指称周边的其他语言。这表现了学界对这些语言之间的关系的不确定，反映了长期困扰欧亚大陆东部诸语言研究的一大问题。笔者曾经反复论证，世上并无“混合语言”一说，契丹语要么是蒙古语，要么不是蒙古语（Beckwith 2007a：195-213）。

81.最近有观点称，包括哲学思想在内的伊斯兰文明的黄金时代从未终结或衰落，而一直延续至今，参看纳斯尔（Nasr，2006）对伊斯兰世界压迫哲学（falsafa）这一观点的反驳。然而，其论说中就举出了这种压迫的证据，与其观点自相矛盾。他自始至终在强调，哲学的一些因素部分地保留在什叶派中，在一心解释教义的神学家等宗教保守势力的堡垒中传承。他的这种论述只能愈加证明，现代以前的伊斯兰世界中完全没有思想自由。西方的影响（即其所谓“现代思想”）才重新给伊斯兰世界注入了一些自由思想，而这反而是他批判的对象（Nasr　2006:259页起）。

82.奇怪的是，尽管西夏语与藏语有着亲缘关系，但党项人却没有采用简易的藏文字母作为其文字。党项人或其他民族偶尔用藏文来音写西夏语。或许他们是出于政治目的选择创造一种全新的、类似汉字的文字系统，但更需注意的是，他们的佛教经典也是译自汉文而非藏文佛经。西夏语的音系因此成为一个充满问题的领域。自涅夫斯基的研究成果（Nevsky　1926）问世以来，关于此问题的多数论著都拒绝利用行间夹写的藏文音写来协助破解西夏人据汉文韵书所创制的复杂的韵书系统。在西夏语学界，西夏文和汉文韵书传统仍被视为准绳，而散见的转写和普通语言学知识则不被重视。

83.“成吉思汗”这一称号的含义被认为是“海洋（天下）之主”。兰司铁（Ramstedt）、伯希和（Pelliot）皆从此说（转引自de　Rachewiltz 2004:460）。伯希和认为，“成吉思”（čiŋgis）是一个借词，源自突厥语词汇teŋiz（海洋，在中古蒙古语中作teŋgis，见于《蒙古秘史》）或其某种方言形式。该词的首音节显示，突厥语的元音-e-在这种蒙古语方言中变成了-i-。这就像突厥语词汇tegin（音“特勤”，指王子）在蒙古语中变成了čigin[1]。还有一种可能是，在这种突厥语中，teŋiz的首音节

辅音已经是-i-了。选择此词作为称号，成吉思汗必然仔细考虑了当时及以前各个对手的称号。最近有人提出，“成吉思”是一个形容词，意为“凶狠的、强硬的”，“成吉思汗”意为“凶狠的王”。此说得到一些权威学者的支持，相关讨论和参考文献见de Rachewiltz（2004:460）。但笔者难以苟同。传统的中央欧亚的称号会涉及上天所生、天命所在、天下之主之类的含义。如前所述，铁木真的对手札木合的称号“古儿汗”（Gür Khan）意为“世界统治者”。铁木真的另一位对手屈出律在篡夺了中亚的西辽政权之后，也采用了这个称号（参看Biran　2005），此称号此前一直为西辽统治者所采用。铁木真的野心显然不止于成为下一个札木合或者屈出律，因此他应该不可能取一个逊于他们的称号。后来蒙古人改宗藏传佛教格鲁派，他们尊称格鲁派首领为“达赖喇嘛”（海洋喇嘛），意即“天下喇嘛”。这也可佐证称号中的“海洋”即指“天下”。再者，蒙古人的起源传说众所周知，他们的祖先为一对苍狼白鹿，它们渡海（“腾汲思水”，大泽）到达不儿罕山，诞下第一个蒙古人。因此，“成吉思汗”这一称号将铁木真与蒙古民族的起源联系起来。

84.一代又一代学者在试图论证马可·波罗从未到过中国或欧亚大陆东部的其他地方，但他们的立论都基于一个完全错误的假设，即《马可·波罗行纪》（*Il Milione*）就是马可·波罗本人真实、准确的叙述。此书的作者并非马可·波罗，而该书最终出版的定本可能也并非由马可本人所决定。还可以确定的是，该书的实际作者比萨人鲁斯蒂谦是一个有名的小说家。由此可以推想，他肯定想尽量多地卖他的书。前人已详细论说，他书中的大部分内容是他自己的创作，包括取材于他的小说中的“整段整段的描写”（Latham　1958:17）。总而言之，今天我们根本无法分析书中哪些内容出自马可·波罗之口，哪些内容是鲁斯蒂谦所创；在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分辨书中的错误信息究竟源出于谁。此外，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口述的内容很难被精准地记录；事实上，它们更容易被曲解。在如此情况下，出于鲁斯蒂谦之手的作品中仍保留有大量的准确信息，这不但令人震惊，更证明了马可·波罗本人的叙述肯定是真实的、准确的。《马可·波罗行纪》保存的关于中国和东方的细节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前无古人的：当时西方世界根本没有任何文献材料可为马可·波罗或鲁斯蒂谦提供关于中国如此细致的信息以及那些具体的历史人物、地点的名字。直到此书出版后很久，才有同样分量的著述在西方出现。此书在出版后的几个世纪里都未曾被超越。柯立夫的著作（Cleaves　1976）以及后来杨志玖的《元史三论》有力地证明了马可·波罗在忽必烈汗在位时身在蒙古汗国。

85.尽管学者们对历史分期的具体方式存在着争议，但他们大都认同在世界历史上存在着不同的阶段。这说明，不同的历史时期间存在着分水岭或界线。然而，历史的进程曲折变幻，一切并非匀速发生。相互关联的重大历史事件可能在很短的时间段内接踵发生。最佳的例子就在8世纪中叶，内乱、王朝更迭等大事件在整个欧亚大陆各地此起彼伏。这样的时间段可以被视为历史分期的分水岭，但它们本身也是一个历史时期。因此，一些历史时期就比其他的时期更短；其间，重大变革发生得更密集。蒙古征服本身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值得学界研究，但除去促进了知识在东西方之间的传播以外，它并没有给欧亚大陆带来根本性的变化。

86.皮尔森（Pearson 1987:14）认为："我们不能将葡萄牙看作18世纪起称雄世界的欧洲列强的先行者。欧洲列强称雄的原因是工业革命及随之而来的科学、技术进步。这些进步必然导致欧洲至少在一定时期内称霸世界。而葡萄牙人在此前两个半世纪绕过好望角的航行并不必然导致他们能够称霸世界。葡萄牙人在15世纪航海的成功应被视为一项壮举（tour de force）。"

这种说法并不正确。欧洲人在18世纪工业革命以前就已经统治了世界，因为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在全球航行，并在各地建立起贸易据点和殖民地。他们的霸权得以建立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和船只；实践导向的科学传统使他们出现在各地时能够充分利用机会；他们对探索世界有着无穷的欲望。欧洲霸权向全球的扩张肇始于哥伦布、达·伽马等人的远航。或许应该一问，如果没有大航海时代，18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还能否发生？1405-1433年，明朝派出穆斯林官员郑和下西洋，最远航行至非洲东海岸。1434年郑和死后，明朝再没有派出船队。两个世纪以后，明朝被清朝取代。尽管中国当时的文化、技术已经很发达，但"工业革命"直到20世纪前都没有在那里发生。

87.奢侈品被认为是每单位数量或质量含有相对较高价值的成本。奢侈品贸易与大宗商品贸易相对，后者每单位数量或质量含有相对较低的成本，譬如谷物、木材或普通棉布（例如Pearson　1987:24-25）。对奢侈品的公开定性是：这类商品并非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因此这类商品交易并非"真实的商业"的反映。而对这类商品隐含的定性则是，这类商品是不太道德的。今天，电脑、手机、汽车、喷气式飞机等奢侈品主导着国际贸易和财政，但这并没有使经济史学家摒弃那套自古以来就存在的

陈旧的道德评判标准。皮尔森讨论“粗布”贸易的例子时写道：“正是用这些布交换了东南亚的许多香料。”（Pearson 1987:25。）实际上，在16世纪葡萄牙人与其供应方签订的一些协议中，香料的价格是以布来衡量的，而非以钱来衡量。似乎这种布实际就是一种作为货币的标准化商品，这种做法在中国已有悠久历史（Beckwith 1991）。

88.17世纪，西方的天文学和数学即被引入中国。但这仅仅是个开始。又过了很久，直到19世纪末，亚洲人才意识到他们在技术上已经落后于西方。实际上，当时他们不但在技术上，而且几乎在知识的各个领域都已经全面落后于西方。即使在今天许多人仍不明白，亚洲的人文学术仍然在许多方面远远落后，而且这种情况越往东越严重。对古代文献材料应当做出科学的校勘本（critical edition），这种观念在中东以及在欧洲的中东学界已经广为人知，并被同行专家普遍接受。在印度以及印度之外的印度学家当中，校勘本的概念也被接受，但尚处在一种较低的层面。在东亚以及东亚之外的东亚学家当中，科学的校勘本这一概念几乎没人知道（另见注释13，即该注释中的“校勘本”）。在20世纪后期，以记者萨义德（Edward Said 1978）为首的一些作家批评西方学者在研究亚洲各民族文化的同时，“窃取”了他们的文化。这种极端的反智主义观点已经受到学者充分批判（Lewis 1982）。很遗憾，许多东方学家莫名其妙地接受了萨义德的观点，将“东方学家”一词视为贬义，弃之不用。按他们的观点，所有纯粹的学者都是恶的，因为他们在追求真理、启蒙世界。

89.到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1627-1643年在位，后金的第一位汗或“皇帝”，1636年改国号为“清”）在位时，满洲人已经皈依藏传佛教。这主要是蒙古人和畏兀儿人的功劳，他们在蒙古帝国时代就已经皈依藏传佛教。满洲人所信为改革的藏传格鲁（善律）派。格鲁派的领袖为达赖喇嘛。在东、西蒙古人的帮助下，达赖喇嘛已经形成转世世系，有着重要的政治地位。清朝之“清”字显然与位于山西的圣山清凉山（五台山）有关。满洲、蒙古、畏兀儿、藏传和汉传佛教徒皆认为文殊菩萨曾居于此地。成为佛教转轮王（cakravartin）或法王（dharmarâja）将赋予清朝君主统治的合法性，使其获得非汉族部族的巨大支持。参看Grupper（1980）、Farquhar（1978）。关于“满洲”这一名称的词源还有其他颇有道理的说法（例如Stary 1990），很可能满洲人在面对其治下不同族群时会以不同的方式解释其族名“满洲”。但对于满洲人自己来说，作为新近皈依佛教的狂热信徒，他们肯定认为其族名来自大智菩萨

之名“文殊”。

90.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丝绸之路并未真正衰落。他们指出，贸易路线并未全部中断，只是路线的方向发生了改变。参看Levi（2002，2007c）。这一派新兴观点重点关注16-19世纪从印度到中亚、俄国的贸易路线和商人活动的增加，为欧亚大陆史的研究别开生面，值得关注。然而，如本书所论，贸易路线和参与贸易的商人本身并不是关键。而且，在帖木儿帝国后中亚没有衰落的论点也为如下事实所驳：中亚城市规模和人口数量减少（Levi　2007b：110；诚然，如文献所说，人口的波动并未发生，而一些城市只是迁移到了邻近的地点）；在科学、技术、艺术、文学和哲学（已经被偏执所取代，见前文）等领域的创新全面中止；中亚在技术等人类进步的各个方面全面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诚然，中亚各汗国在19世纪对沙俄帝国的扩张奋起抵抗，但由于当地的落后和贫困，它们在军事实力等方面跟沙俄不在一个量级。俄国对中亚西部的全面征服和清朝对中亚东部的征服、殖民对中亚和中央欧亚的其他地区的经济、文化不啻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中央欧亚从此陷入“严重的衰落”（Markovits　2007:144），导致了从19世纪末直到20世纪末的一系列众所周知的悲惨局面。传统观点认为，大陆贸易衰落的原因是西欧人在欧亚之间开通了直接的海上航线，但此观点已经受到一些挑战（例如Levi 2007a；Gommans 2007）；关于此问题，参看正文中的讨论。

91.如前所述，本书尝试对有关中央欧亚及其邻近地区历史的普遍被接受的观点做出修正。第十一章侧重于笔者所认为的现代最主要的问题。在大量的历史事件中，本章只采撷了其中的一小部分叙述，只求能将全书历史叙述的线索从古代贯穿至当代，并为作者的论说提供证据。在历史书写中，现代史占据着其中的大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现代史留有更大量的详细记载（至少在笔者这样研究前现代历史的专家眼中是这样的。笔者已习惯利用在数量上较少、在质量上多有争议的资料从事研究工作）。为避免淹没在浩如烟海的现代史史料和相关研究著作中，笔者在论说基本事实时主要依赖一些最常被引用的研究论著。例如，关于“二战”史的问题，笔者主要依靠：Sandler（2001）、Dear and Foot（1995）、Dunnigan and Nofi（1998）、Goralski（1981）、Mowat（1968）。但笔者通常只在直接引用原文或主要依据其研究立论时才给出注释。涉及一些通常不为人所提及的事件时，笔者主要利用了Stearns（2002）、Alexander et al.（1998）、Cook and Stevenson（1998）以及参考文献中所列的其他一些专著。关

于后现代主义者对于史实的拒斥和对于批判思维（critical thought）的摒弃，参看本书《前言》。

92.几乎所有世界史的作者，不管他来自哪个国家，都以欧洲为中心，这或许是因为有这样一种观念：统一的“世界史”就从欧洲开始，且以欧洲为中心。伊利汗国伟大的学者、该国的维齐尔拉施都丁将其著作命名为《史集》（*Jâmi‘ al-tawârîk*），显然他并不认为有统一的世界史。不管世界史作者们的观念有多么偏颇，我们也不应当被误导去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次世界大战。这是一场欧洲大战（Vyvyan 1968:140；Teed 1992:506），只是战火波及了邻近的奥斯曼帝国的近东和欧洲海外殖民地而已。更准确、清楚的叫法应该是“大战”（the Great War）。以前曾经叫它“欧洲大战”（the Great European War）。第二次世界大战应该被称为“世界大战”。为不引起歧义，本文遵循现下流行的叫法。

93.希腊语地名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olis）在历经几个世纪的变化之后被缩短并发生音变，产生出一系列不同的口语读音。其中一些读音近似“伊斯坦布尔”（Istanbul）。一些学者提出，伊斯坦布尔之名源于一个毫不相关的希腊语短语“进入城中”（İnalcik 1997:224）。此说非常流行，但并不正确。这个希腊语短语显然是为解释此名的口语音变而产生的一种民间词源（folk etymology）。

94.持阴谋论者认为，有“明显的间接证据”（Heidenreich 2003:579–582）证明，美国政府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已经得到情报。这种观点经不起推敲。他们对这种证据的解读本身就有误。其他一些事实也与这种证据相矛盾。更重要的是，美国当局哪有如此头脑去一步步策划和执行如此复杂的阴谋？与美国历史上历次事件一样，这次事件的性质其实很简单：事件当天发生的一系列灾难性的错误主要是因为美国各级领导的愚蠢、无知和自大，包括民政和军事的领导、地方和中央的领导，而当天美国人员没有被全歼的功劳则可归于基层指挥官和海、陆、空三军战士的英勇无畏。一个被普遍忽视的事实是，美国的盟友们当时已经在欧洲和轴心国开战。石油是一个现代国家的命脉，而日本并非产油国。当它们宣布对日实施包括石油在内的贸易制裁，这无异于正式宣战。请注意，1990-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的爆发就是因为伊拉克占领科威特及其油田。笔者当然不是为日本突袭珍珠港之事开脱罪责，但我们确实应当从上述角度审视此事件。日本向美国开战只是时间的问

题，美国的领导层本应对此做好充分准备。

95.现代主义可能是世界史中最为人忽视和误解的现象之一。不理解现代主义，就不可能理解现代史。本节中，作者尝试对20世纪所发生的事件进行解释，并解释类似事件仍在发生的原因。这类事件持续发生至今，在笔者看来已是一种历史问题。笔者希望能引发读者关于此问题的思考，或许解决此问题的方法会因此产生。总的来说，历史学家对于现代主义非常宽容。他们着眼于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技术上的胜利，对科学的进步总体上给予积极的评价。但这种评价绝不适用于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现代主义——它在现代史上的影响大多是负面的。正如思想史专家经常强调的那样，（现代主义中）进步的信仰、哲学实证主义（positivism）等因素在一些时期的确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但我们绝不能因为思想史学界整体上对于现代主义的正面评价就忽视其负面的本质。斯科特（Scott 1988:4-5）对于现代主义的通常观点做了精彩的、富有见地的调查，他将其称为“高级现代主义者的意识形态”（high-modernist ideology）。他提出：“最好将其视为一种强大的，甚至可以说是过分膨胀的自信。这种自信展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科技进步、扩大生产、不断满足人类的需求、征服自然（和人性）以及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基于对‘自然律’的科学理解来理性地设计与之相匹配的社会秩序。”他将这种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联系起来：现代主义者需要国家的支持来实施他们的计划，譬如建设“大坝、集中的通信和交通枢纽、大型的工厂和农场、网格城市（grid city）”等。这些项目“既符合高级现代主义者的观念，又符合他们作为政府官员的政治利益”。这种“高级现代主义”的中心人物是“设计师、工程师、建筑师、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作为新秩序的设计者，他们的技术和地位受到推崇。高级现代主义理想超越了传统的政治边界。它可见于政治光谱中从左翼到右翼的不同派别，尤其常见于那些希望利用国家权力在人民的劳动习惯、生活方式、道德行为和世界观上引发巨大的、乌托邦式的改变的派别中”。最后，他还指出：“这种乌托邦的设想本身并不危险。当它在一个自由的议会民主制社会激发了一些设想，提出这些设想的人就要先与公民协商，于是便会引发改革。”但如果一个专制国家采用了“高级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愿意并能够充分利用其强制力来贯彻实施这些高级现代主义方案”，那么“这种结合便可能产生致命的危险”。

96.在中央欧亚东部，“多数喇嘛被强制还俗，但墓葬和历史记录显示，在蒙古也有喇嘛惨遭集体屠杀。可能同样的事件也发生在布里亚特

和卡尔梅克，但我对此并不那么熟悉。当地的基础设施在20世纪30年代遭受严重的破坏（因为抵抗运动），但对其全面的清除则发生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此据2007年Christopher Atwood与笔者的通信）。

97.阿多诺（Adorno 1997:29）写道：“激进主义自身如果不再激进，就要付出代价……今日的艺术可以打破昨日建立的范式，明日的艺术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取代它。”失去流行性并不要紧，依赖早先的艺术传统也没关系。伟大的艺术家可以在任何传统下创造出杰出的艺术品，不论是抽象主义、表现主义抑或其他。但是，如果艺术本身被消灭了，那么无论什么风格的艺术家都没有办法创造出艺术品了。

98.当代大多数按欧洲传统进行诗歌创作的非欧洲诗人都抛弃了诗与音乐的联系，这种联系或在其本民族文化中仍然存在。例如，现在常见到读起来像散文的汉语新诗，诚无美感。过去纯正的汉语诗歌是被咏唱的，今天仍有少数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延续着这种做法。波斯语和日语诗歌有着同样的传统。在古典诗歌中这种传统得到保留，但是现代诗作却只能被朗读，听觉如英语现代诗一样令人遗憾。大多数现代诗就应该像读散文一样朗读——它们实际上就是散文。如此说来，我们的时代其实没有纯正的诗歌。朗读诗歌的做法已经被应用到了前现代社会的诗作中，导致这些文化中一直保留的传统艺术形式被摧毁。如果一些诗人就愿意假诗歌之名写散文，也没有办法，但我们还是期望其他诗人会注意到这个问题，重新开始创作和咏唱纯正的诗歌来填补今日诗歌的空白。一些现代诗人如埃兹拉·庞德、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曾鼓吹用歌唱或吟咏的方式表达诗歌，甚至尝试组织这种表演活动，但结局尴尬。这类活动与笔者所提倡的不是一回事。现代诗歌已经完完全全与音乐传统脱离，不论他们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联系。

99.在施特劳斯从迈向无调音乐的道路上退出以后，他创作出其最伟大的歌剧作品《玫瑰骑士》（*Der Rosenkavalier*）。塞格迪-马赛克（Szegedy-Maszák，2001:250）正确地指出：“颠覆还是保守取决于观察的角度。《埃莱克特拉》的作曲者是一个先锋音乐家，而《最后四首歌》（*Vier letzte Lieder*）的作曲者则是一个保守的艺术家。”当然，从“大画面”（big picture）的视角看，《埃莱克特拉》和《玫瑰骑士》所反映的风格是进步的抑或保守的，这并不重要，因为二者都极大地展现出了音乐上的创新和施特劳斯独特的、天才的声音。引人注意的是，他注意到并抵制了现代主义本身。正是这种运动在他生活的年代中摧毁

了西方艺术和音乐的传统，达到顶峰。施特劳斯对现代主义的抵制是他能够在20世纪写出伟大音乐作品的原因。

100.“与其在其他公众领域的成功相比，现代主义在音乐领域的失败显得很独特。与建筑、绘画和文学领域中的现代主义风潮不同，音乐的现代主义没有在大众文化中引发流行或模仿，因为它未能将高级文化的传统受众抢来。”（Botstein 1998:259。）这种说法并不适用于家庭建筑。一般来说，家庭建筑只经历了风格的简化和对旧有形式的更加机械的模仿。此外，现代主义在绘画和文学中的成功也并非简单地通过模仿达成，只有少数作品在产生之后即被奉为圭臬，例如艾略特的《荒原》。

101.值得注意的是，《春之祭》的音乐和编排似乎部分地模仿了一部当时被遗忘了的芭蕾舞曲《元素》（*The Elements*）。该舞曲由巴洛克作曲家让-费雷·雷贝尔创作，开场一幕《混乱》（*Chaos*）以高度不和谐的复合和弦为主。该舞剧曾在雷贝尔走红之时在俄罗斯演出。斯特拉文斯基对于巴洛克音乐文学兴趣浓厚，很可能知道这部作品。20世纪后半叶艺术音乐领域最重要的发展之一竟然是巴洛克音乐的流行，这点颇为讽刺。

102.尽管阿多诺的书中有许多闪光的洞见，但也包含一些这样的观点：“那些自称高级的现代艺术很遗憾地流于口号。要表现得高级就需要装腔作势，摆造型，伪装成自己达不到的样子。但自从瓦格纳艺术宗教（Wagnerian art religion）绝望地妥协，现代艺术的严肃性使其不能再伪装。严肃的声音会斥艺术作品为荒诞……激进艺术在今天已经与黑暗艺术成为同义词，其主色调即为黑色。多数现代艺术产品与此无关，因为它们并未注意到此点，并孩童般运用鲜活的色彩……所有欢快艺术（cheerful art），尤其是娱乐业，所造成的不公，可能都是对逝者的不公，对日积月累、无以言表的痛苦的不公。”（Adorno 1997:39-40。）阿多诺旨在从艺术中提炼出美，这与他对艺术的热情一样可贵。但这与艺术产品本身无关。根本的问题还是现代主义，从未改变。

103.迄今对现代主义的唯一检讨来自其内部——现代主义者或秘密现代主义者（crypto-Modernist）对于现代主义的分析。这种检讨显然不会有什么意义，但除此以外更无他者。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批评和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超现代主义，对其进行的检讨甚至更少。古今之争（conflict between the Ancients and the Moderns）的传统由来已久，

在文学和评论作品中可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但本书所提的观点应与此种争论相区分。“威廉·奥卡姆的著作只是中世纪的思想和文化危机中的一个方面，在思想界表现为现代路线（via moderna）对托马斯派（Thomist）、司各脱派（Scotist）等共同代表的古代路线（via antiqua）的全面胜利。”（Fairweather 1970:372。）与此类似，“斯威夫特将古典派比作蜜蜂，将现代派比作蜘蛛。以蜜蜂之创造性和蜘蛛之寄生性展现两者在原创性上的差别。他甚至在其1704年发表的文章中提出，‘现代派在两者中反而更古老一点儿’。该文的题目为《上周五圣詹姆士图书馆古典书与现代书之间的战斗详记》（“A Full and True Account of the Battel Fought last Friday，Between the Ancient and the Modern Books in St.James’s Library”）”（Szegedy-Maszák 2001:61）。上引文字所见两种思潮之争对于艺术创作是有利的。艺术家在目标上是一致的：为了艺术和美的理想（尽管对其定义不同）。他们的分歧仅在于如何实现艺术和美。

104.一些摇滚音乐人曾为提升其音乐的艺术水准而做出令人称道的努力，但重拾老套的前现代主义模式，抑或尝试将消极的现代主义模式变为一种积极的模式，都未能奏效。将现代主义因素应用到音乐作品的艺术家中最著名者或许是弗兰克·扎帕（Frank Zappa）。许多专业的音乐家都对他的作品评价甚高。然而，尽管其作品中透露着幽默和智慧，但其现代主义的和弦和旋律线都将许多听众拒于千里之外。如果他在这个方向上继续走远，他也许会丢掉所有的听众，一如其他现代主义艺术家。接受新的音乐和艺术品应从逐渐提升其本身做起，妄图将它们改造成其他东西必然会遗失其本质，一如古典音乐的遭遇。艺术家的创造性需要缓慢地培养，应伴随着修养和品味的提高而释放。在提高摇滚乐或流行音乐的艺术水准的同时，应当继续遵循其规则和传统。文艺复兴的音乐家们正是按照这样的方式，采用流行的舞曲和歌曲，以更加艺术的方式演奏，将文艺复兴的复调音乐应用其中。如此去芜存菁，稍加改良，于是便有古典音乐应运而生。

105.《尾声》一章中关于汉文术语的部分主要是重复笔者1987年在波士顿亚洲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举办的一次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在中国史学和西方汉学中的“蛮族”概念：对内亚第四世界国家的修辞和创造》（“The Concept of the ‘Barbarian’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Western Sinology:Rhetoric and the Creation of Fourth World Nations in Inner Asia”）。大会很早就计划出版论文集，

但一直未能兑现。等到确定不出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研究其他问题了。不幸的是，当时论文是在一台“青铜时代”的电脑上写的，在写的时候我就没有留下底稿，但其他人都有。（论文稿一开始就被私自复制流传。尽管初稿上明白写着“未经作者允许请勿引用”，但还是被引用了。）我已在本文中重新论述了自己的观点。

106.哈萨诺夫（Khazanov 1984）的理论被包括专家在内的许多人接受（例如Drompp 2005:10-12；Di Cosmo 1999a），并被一些非专业人士大肆发挥，譬如巴菲尔德（Barfield 1989）。艾尔森（Allsen 1989:83）继承哈萨诺夫理论，写道：“游牧民族的经济不能自给自足，过分依赖畜牧生产，以至于许多必需品都缺乏。”他更为具体地写道：“游牧民不能通过国内资源满足他们所有的需求……他们需要定期从定居世界获得必要的经济资源，侵夺定居文化的各个方面。”（Allsen 1997:101。）哈萨诺夫认为，从事畜牧生产的人口也得擅长另一种生产方式，否则他们就无法自给自足。按他的标准，几乎任何一个社会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实现自己自足，包括罗马和中原王朝的农民、城市居民等等。这让人怀疑，除了狩猎-采集者之外，何时何地出现过真正能自给自足的人。巴菲尔德进一步发挥，甚至提出这样的观点：“匈奴的中央政府的首要目的是从汉朝攫取资源，要么通过战利品和岁币的形式，要么强迫对方按照对己方有利的方式进行贸易。”（Barfield 1989:83。）

107.艾尔森（Allsen 1997:106）正确地指出：“草原诸民族并非古代的联邦快递公司，尽职尽责地在各大文明中心之间往来运送货物。要理解东西之间的重要交往，我们必须全面地研究草原民族的历史及其利益关切。”他在书中总结道：“从远古到现代，许多成功穿越欧亚大陆的商品和观念之所以能够跨越这迢迢万里，正是因为那些‘住着毡房’、富裕的时候能穿金戴银的中间人在他们自己的文化观念下觉得这些商品和观念有价值。”

108.兹就巴菲尔德的研究方法再举一例。他提到，唐高祖之子李世民“亲手杀死自己的两位兄弟，因为他们曾试图毒害他。他又逼其父退位”（Barfield 1989:142）。他似乎要往正确的方向论述了，但继续读下去却会发现，他其实并非要论证汉人和突厥人一样冷血，而是话锋一转，写道：“唐朝为后世津津乐道的宫廷文化并不能掩饰这样的事实，即早期唐朝精英在西北与边疆的突厥民族关系密切，在许多方面浸染胡风，因此李世民可以凭本色成为突厥人的可汗。”不难看出文句背后所隐

含的观点。

109.“游牧帝国联盟只在有可能将其自身与中原经济相联系时才能存在。游牧民族采用一种敲诈战略以从中原获取贸易权与奉金。他们对边疆地区大肆掳掠并最后与中原王朝签订和约。中原王朝宁愿给游牧民族金钱以让他们离去，因为这较之与来去无踪的民族交战更合算。”（Barfield 1989:9。）塞诺（Sinor，1987，1990b：4页起）强调游牧民族的贪婪，另见Biran（2005:14），Drompp（2005:10页起）等。巴菲尔德（1989:11）注意到蒙古人是个例外，他对起源于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和起源于东北的游牧民族做了有趣的区分。前者“建立起草原帝国，成功地与中原王朝分治边疆数百年”；后者“在中原地区建立王朝，但从未在草原地区建立起强大的帝国”。然而，源出东北地区的民族大多不是游牧民族。

110.在有充足史料记载的事例中，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军队。狄宇宙早期的观点认为（Di Cosmo 1999b：第23页起），尽管游牧帝国控制的资源极其有限，但有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可以以劫掠和强迫进贡的方式从周边政权攫取财富。这种观点显然是因袭自哈萨诺夫（Khazanov 1984）。在战争中被中央欧亚或周边政权俘获之人一般会被送往远离故土的奴隶市场，有些也在当地被蓄为奴隶。中央欧亚的奴隶制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111.引入注意的是，据说世上曾有数千卷、数百万篇可能以阿维斯陀语写成的琐罗亚斯德教文献，但由于某次异族入侵，波斯王的图书馆被毁，这些书籍全部不知所踪。对于文献年代的讨论极具争议，但从文献学的角度说，早于文献学能提供的确凿证据之前的定年都是假说。

---

[1]作者此例并不恰当。突厥语tegin首音节元音为合口中位元音，而teŋiz的首音节元音则为开口低位元音，在以e表示前者的研究文献中，通常以ä表示后者，而在以e表示后者的研究文献中，通常以é表示后者。在出现tegin的研究文献中，teŋiz应作täŋiz，而在出现teŋiz的研究文献中，tegin应作tégin。一些学者认为古突厥语中并无合口中位元音e，该音位属于高位元音i。作者应是混淆了不同研究文献中的e所表示的音位。——译者注

参考文献

Abicht,Karl Ernst 1886.*Herodotos,für den Schulgebrauch*.Zweiter Band.Zweites Heft:Buch IV.Dritte verbesserte Auflage.Leipzig:Teubner.

Adams,Douglas Q.1999.*A Dictionary of Tocharian B*.Amsterdam:Rodopi.

Adorno,Theodor,et al.,1997.*Aesthetic Theory*.Trans.Robert Hullot-Kentor.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Ahmad,Zahiruddin 1970.*Sino-Tibetan Relation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Rome: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Alexander,Fran,et al.,eds.1998.*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llsen,Thomas T.1987.*Mongol Imperialism:The Policies of the Grand Qan Mongke in China,Russia,and the Islamic Lands,1251–1259*.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89.Mongolian Princes and Their Merchant Partners,1200–1260.*Asia Major*,3rd ser.,2.2:83–126.

—— 1994.The Rise of the Mongolian Empire and Mongolian Rule in North China.In 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6:*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907–1368*,321–413.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7.*Commodity and Exchange in the Mongol Empire:A Cultural History of Islamic Textil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6.*The Royal Hunt in Eurasian History*.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Anderson,Graham 2004.*King Arthur in Antiquity*.London:Routledge.

Anonymous 1990.Җанˌhр:хаЛьмг баатрЛг эпос (=Джангар:каЛ мыцкии героическии эпос).Moscow:Glavnaja redakcija vostočnoj literatury.

Arkenberg,J.S.,ed.1998.*The* Karnamik-i-Ardashir*,or* The Records of Ardashir.Fordham University.http://www.fordham.edu/halsall/ancient/ardashir.html.

Arreguín-Toft,Ivan 2005.*How the Weak Win Wars:A Theory of Asymmetric Con-flict.*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sao,Naohiro 1991.The Sixteenth-Century Unification.Trans.Bernard Susser.In John W.Hall,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vol.4:*Early Modern Japan,* 40–95.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twood,Christopher P.2004.*Encyclopedia of Mongolia and the Mongol Empire*.New York:Facts on File.

Audi,Robert,ed.1999.*The Cambridge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2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bcock,Michael A.2005.*The Night Attila Died:Solving the Murder of Attila the Hun.*New York:Berkley Books.

Bachrach,Bernard S.1973.*A History of the Alans in the West:From Their First Appearance in the Sources of Classical Antiquity through the Early Middle Ages.*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1977.*Early Medieval Jewish Policy in Western Europ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Bagley,Robert 1999.Shang Archaeology.In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Shaughnessy,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124–23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iley,H.W.1985.*Indo-Scythian Studies,Being Khotanese Texts,VII.*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rber,Elizabeth Wayland 1999.*The Mummies of Ürümchi*.New York:W.W.Norton.Barbieri-Low,Anthony J.2000.*Wheeled Vehicles in the Chinese Bronze Age (c.2000–741 B.C.)*.Sino-Platonic Papers No.99.Philadelphia:Department of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Barfield,Thomas J.1989.*The Perilous Frontier: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Cambridge,Mass.:Basil Blackwell.

Barthold,W.W.1977.*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Trans.T.Minorsky.4th ed.London:E.J.W.Gibb Memorial Trust.

Baxter,William H.1992.*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Berlin:Mouton de Gruyter.

Beasley,W.G.1989.The Foreign Threat and the Opening of the Ports.In Marius B.Jansen,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vol.5:*The Nineteenth Century*,259–30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čka,Jan 1995.*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Myanmar*.London:Scarecrow Press.Beckwith,Christopher I.1983.The Revolt of 755 in Tibet.*Wiener Studien zur Tibetolo-gie und Buddhismuskunde* 10:1–16.

—— 1984a.Aspects of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Central Asian Guard Corps in Is- lam.*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4:29–43.

—— 1984b.The Plan of the City of Peace:Central Asian Iranian Factors in Early‘Abbâsid *Design.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38:143–164.

—— 1987a.*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A History of the Struggle for Great Power among Tibetans,Turks,Arabs,and Chinese dur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eckwith 1987a/1993).

—— 1987b.The Tibetans in the Ordos and North China:Considerations on the Role of the Tibetan Empire in World History.In C.I.Beckwith,ed.,*Silver on Lapis*,3–11.Bloomington:Tibet Society.

—— 1987c.The Concept of the ‘Barbarian’ i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Western Sinology:Rhetoric and the Creation of Fourth World Nations in Inner Asia.Paper presented at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nnual meeting,Boston.

——,ed.1987d.*Silver on Lapis*.Bloomington:Tibet Society.

—— 1989.The Location and Population of Tibet According to Early Islamic Sources.*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43:163–170.

—— 1991.The Impact of the Horse and Silk Trade on the Economies of T’ang China and the Uighur Empire:On the Importanc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 ent* 34:183–198.

—— 1993.*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A History of the Struggle for Great Power among Tibetans,Turks,Arabs,and Chinese dur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Paperback edition,slightly revised,with a new afterwor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eckwith 1987a/1993).

—— 1996.The Morphological Argument for the Existence of Sino-Tibetan.*PanAsiatic Linguistics,* vol.3,812–826.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January 8–10.Bangkok:Mahidol University at Salaya.

—— 2002a.The Sino-Tibetan Problem.In C.I.Beckwith,ed.,*Medieval TibetoBurman Languages,* 113–157.Leiden:Brill.

——,ed.2002b.*Medieval Tibeto-Burman Languages*.Leiden:Brill.

—— 2003.Introducing Grendel.In R.Aczel and P.Nemes,eds.,*The Finer Grain:Essays in Honor of Mihály Szegedy-Maszák*,301–311.Uralic and Altaic Series,vol.169.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 2004a.*Koguryo,the Language of Japan's Continental Relatives: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ical-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Japanese-Koguryoic Languages,with a Preliminary Description of Archaic Northeastern Middle Chinese*.Lei- den:Brill.(2nd ed.,Leiden:Brill,2007.)

—— 2004b.Old Chinese.In Philipp Strazny,ed.,*Encyclopedia of Linguistics*,vol.2,771–774.New York:Fitzroy Dearborn.

—— 2005a.The Ethnolinguistic History of the Early Korean Peninsula Region:Japanese-Koguryoic and Other Languages in the Koguryo,Paekche,and Silla Kingdoms.*Journal of Inner and East Asian Studies* 2.2:34–64.

—— 2005b.On the Chinese Names for Tibet,Tabghatch,and the Turks.*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14:7–22.

—— 2006a.Introduction:Toward a Tibeto-Burman Theory.In C.I.Beckwith,ed.,*Medieval Tibeto-Burman Languages II*,1–38.Leiden:Brill,2006.

—— 2006b.The Sonority Sequencing Principle and Old Tibetan Syllable Margins.In C.I.Beckwith,ed.,*Medieval Tibeto-Burman Languages II*,45–55.Leiden:Brill,2006.

—— 2006c.Old Tibetan and the Dialects and Periodization of Old Chinese.In C.I.Beckwith,ed.,*Medieval Tibeto-Burman Languages II*,179–200.Leiden:Brill,2006.

—— 2006d.Comparative Morphology and Japanese-Koguryoic History:Toward an Ethnolinguistic Solution of the Altaic Problem.In Motoki Nakajima,ed.,*Arutaigo kenkyû-Altaistic Studies*,121–137.Tokyo:Daito Bunka University.

—— 2006e.Methodological Observations on Some Recent Studies of the Early Ethnolinguistic History of Korea and Vicinity.*Altai Hakpo* 16:199–234.

——,ed.2006f.*Medieval Tibeto-Burman Languages II*.Leiden:Brill.

—— 2007a.*Koguryo,the Language of Japan's Continental Relatives: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ical-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Japanese-Koguryoic Languages,with a Preliminary Description of Archaic Northeastern Middle Chinese*.2nd ed.Leiden:Brill.(1st edition,Leiden:Brill,2004.)

—— 2007b.*Phoronyms:Classifiers,Class Nouns,and the Pseudopartitive Construction.* New York:Peter Lang.

—— 2007c.On the Proto-Indo-European Obstruent System.*Historische Sprachforschung* 120:1–19.

—— forthcoming-a.The Frankish Name of the King of the Turks.*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 forthcoming-b.A Note on the Name and Identity of the Junghars.*Mongolian Studies*.

—— forthcoming-c.On Zhangzhung and Bon.In Henk Blezer,ed.,*Emerging Bon*.Halle:IITBS GmbH.

Benedict,Paul 1972.*Sino-Tibetan:A Conspectu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enjamin,Craig 2003.The Yuezhi Migration and Sogdia.In Matteo Compareti,Paola Raffetta,and Gianroberto Scarcia,eds.,*Erān ud Anērān:Studies Pre- sented to Boris Ilich Marshak on the Occasion of His 70th Birthday*.http://www.transoxiana.org/Eran/ (= *Erān ud Anērān.Studies Presented to Boris Il'ic Marsak on the Occasion of His 70th Birthday*.Venice:Libreria Editrice Cafos- carina,2006).

Bergh,Simon van den,trans.1954.Averroës,*Tahâfut al-Tahâfut* (*The Incoherence of the Incoherence*).London:Luzac.http://

www.muslimphilosophy.com/ir/tt/ index.html.

Bergholz,Fred W.1993.*The Partition of the Steppe:The Struggle of the Russians,Manchus,and the Zunghar Mongols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1619–1758*.New York:Peter Lang.

Bilimoria,Purushottama 1998.Kaut.ilya (*fl.c*.321–*c*.296 bc).In Edward Craig,ed.,*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220–222.London:Routledge.

Biran,Michal 2005.*The Empire of the Qara Khitai in Eurasian History:Between China and the Islamic Worl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ivar,A.D.H.1983a.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Iran under the Arsacids.In Ehsan Yarshater,ed.,*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3:*The Seleucid,Parthian and Sasanian Periods,Part 1,* 21–99.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3b.The History of Eastern Iran.In Ehsan Yarshater,ed.,*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3:*The Seleucid,Parthian and Sasanian Periods,Part 1,* 181–23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lair,Peter Hunter 2003.*An Introduction to Anglo-Saxon England*.3rd ed.Cam- 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lockley,R.C.,trans.1983.*The Fragmentary Classicising Historian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Eunapius,Olympiodorus,Priscus and Malchus*.2 vols.Liverpool:Cairns.

——,ed.and transl.1985.*The History of Menander the Guardsman*.Liverpool:Francis Cairns.

Boltz,William G.1994.*The Origin and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New Haven: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Bosworth,C.E.1968.The Political and Dynastic History of the Iranian World (a.d.1000–1217).In John A.Boyle,ed.,*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5:*The Saljuq and Mongol Periods*,1–20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4.Abū Hafs‘Umar al-Kirmānī and the Rise of the Barmakids.*Bulletin o.f the.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57.2:262–282.

——1997.Khwārazm.*E.I.2* IV:1060–1065.

—— 2007.Karā Khitāy.In P.Bearman,Th.Bianquis,C.E.Bosworth,E.van Donzel..,and W.P.Heinrichs,eds.,*Encyclopaedia of Islam*.Online edition.Leiden:Brill.

Bosworth,Clifford Edmund,et al.1995.‘Othmānlī.*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New*Edition,vol.8,120–231.Leiden:Brill.

Botstein,Leon 1998.Modern Music.In Michael Kelly,ed.,*Encyclopedia of Aesthet- ics*,vol.3,254–259.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ovingdon,Gardner 2004.*Autonomy in Xinjiang:Han Nationalist Imperatives and Uyghur Discontent*.Washington,D.C.:East-West Center Washington.

Bovingdon,Gardner,and Nebijan Tursun 2004.Contested Histories.In S.F.Starr,ed.,Xinjiang:China’s Muslim Frontier,353–374.Armonk:M.E.Sharpe.

Boyle,John Andrew 1968.Dynastic and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Il-Khans.In John Andrew Boyle,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5:*The Saljuq and Mongol periods*,303–42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ooks,E.Bruce 1999.*Alexandrian Motifs in Chinese Texts*.Sino-Platonic Papers,No.96.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Brulet,Raymond 1997.La tombe de Childéric et la topographie funéraire de Tournai à lafin du Ve siècle.In Michel Rouche,ed.,*Clovis:histoire & mémoire*,59–78.Paris: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Sorbonne.

Brune,Lester H.2003.*Chronological History of U.S.Foreign Relations.* New York:Routledge.

Bryant,Edwin F.1999.Linguistic Substrata and the Indigenous Aryan Debate.In Johannes Bronkhorst and Madhav M.Deshpande,eds.,*Aryan and Non-Aryan in South Asia:Evidence,Interpretation and Ideology*,59–83.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Aryan and Non-Aryan in South Asia,University of Michigan,Ann Arbor,25–27 October 1996.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Sanskrit and Indian Studies.

—— 2001.*The Quest for the Origins of Vedic Culture:The Indo-Aryan Migration Debat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ryant,Edwin F.,and Laurie L.Patton 2005.*The Indo-Aryan Controversy:Evidence and Inference in Indian History.* London:Routledge.

Bryce,Trevor 2002.*Life and Society in the Hittite World.*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5.*The Kingdom of the Hittites*.New e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Buck,David D.2002.Chinese Civil War of 1945–1949.In David Levinson and Karen Christensen,eds.,*Encyclopedia of Modern Asia*,29–31.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

Buell,Paul 2002.Chinese Communist Party.In David Levinson and Karen Chris- tensen,eds.,*Encyclopedia of Modern Asia*,31–32.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

Burney,Charles 2004.*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Hittites.* Lanham,Md.:Scare- crow Press.

Burrow,Thomas 1935.Tokharian Elements in the Kharosthi Documents from Chi- nese Turkestan.*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5:665–675.

—— 1937.*The Language of the Kharos.t.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urns,Thomas S.1980.*The Ostrogoths:Kingship and Society*.Wiesbaden:F.Steiner.

Byington,Mark E.2003.A History of the Puyo State,Its People,and Its Legacy.Ph.D.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

Calmard,J.1993.Mudjtahid.*E.I.2* VII:295–304.

Cancik,Hubert,and Helmuth Schneider,eds.1996.*Der Neue Pauly:Enzyklopädie der Antike.Altertum.Band I.* Stuttgart:Metzler.

Carter,M.G.1997.S ī bawayhi.*E.I.2* IX:524–531.

Chadwick,John 1958.*The Decipherment of Linear B*.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avannes,Édouard 1903.*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St.Petersburg:Commissionnaires de l'Académie impériale des sciences; repr.Taipei:Ch'eng-wen,1969.

Ch'en,Mei-Chin 1992.The Eminent Chinese Monk Hsuan-Tsang:His Contribu- tions to Buddhist Scripture Translation and to the Propagation of Buddhism in China.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Childs-Johnson,Elizabeth 2003.Fu zi 婦子（好）the Shang 商 Woman Warrior.Paper presented at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Paleogra- phy,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October 15–17.

Christian,David 1998.*A History of Russia,Central Asia and Mongolia*,vol.1:*Inner Eurasia from Prehistory to the Mongol Empire*.Oxford:Blackwell.

—— 2000.Silk Roads or Steppe Roads? The Silk Roads in World History.*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2.1:1–26.

Clark,Larry V.1998a.Chuvash.In Lars Johanson and Éva Á.Csató,eds.,*The Turkic Languages*,434–452.London:Routledge.

—— 1998b.*Turkmen Reference Grammar*.Wiesbaden:Harrassowitz.

—— 2000.The Conversion of Bügü Khan to Manichaeism.In Ronald E.Emmerick,Werner Sundermann,and Peter Zieme,eds.,*Studia Manichaica.IV.Internationaler Kongress zum Manichäismus,Berlin,14.–18.Juli 1997*,83–123.Berlin:Akademie Verlag.

Clauson,Gerard 1967.*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 Century Turk- ish*.Oxford:Clarendon Press.

Cleaves,Francis Woodman 1976.A Chinese Source Bearing on Marco Polo's Departure from China and His Arrival in Persi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6:181–203.

Coblin,W.South 2006.*A Handbook of 'Phags-pa Chinese*.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Colarusso,John 2002.*Nart Sagas from the Caucasus:Myths and Legends from the Circassians,Abazas,Abkhaz,and Ubykh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ombs,Kristie 2006.A Study of Merit and Power in Tibetan Thangka Painting.M.A.thesis,Indiana University,Bloomington.

Conlon,Frank F.1985.Caste,Community and Colonialism:Elements of Population Recruitment and Rule in British Bombay,1665–1830.*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11:181–208.

Conquest,Robert 1968.*The Great Terror:Stalin's Purge of the Thirties*.New York:Macmillan.

—— 1986.*The Harvest of Sorrow:Soviet Collectivization and the Terror-Famin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90.*The Great Terror:A Reassessment.*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ok,Chris,and John Stevenson 1998.*The Longman Handbook of Modern Euro- pean History,1763–1997*.3rd ed.London:Longman.

Coward,Harold G.,and K.Kunjunni Raja 1990.*Encyclopedia of Indian Philoso- phies:The Philosophy of the Grammarians*.Delhi:Motilal Banarsidass.

Crone,Patricia 1987.*Meccan Trade and the Rise of Islam.*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Čunakovskij,O.M.,ed.and trans.1987.Книга деянии Ардашира сына Папака.Moscow:Nauka.

Czeglédy,K.1983.From East to West:The Age of Nomadic Migrations in Eurasia.Trans.P.Golden.*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3:25–125.

Dalby,Michael T.1979.Court Politics in Late T'ang Times.In Denis Twitchett,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3:*Sui and T'ang China,589–906,Part 1*,561–68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ani,Ahmad Hasan,et al.,eds.1992–2005.*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Paris:Unesco.

Daniel,Elton L.1979.*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Khurasan under Abbasid Rule,747–820.* Minneapolis:Bibliotheca Islamica.

Danto,Arthur C.2003.*The Abuse of Beauty:Aesthetics and the Concept of Art*.Chicago:Open Court.

Dawson,Christopher,ed.1955.*The Mongol Mission:Narratives and Letters of the Franciscan Missionaries in Mongolia and China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 teenth Centuries.* London:Sheed and Ward.

Dear,I.C.B.,and M.R.D.Foot,eds.1995.*The Oxford Companion to World War II*.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e Goeje,M.J.ed.1870.Abû Ish.âq al-Fârisî al Is.t.akhrî,*masâlik al-*

mamâlik).Repr.,Leiden:Brill,1967. كتاب مسالك الممالك (*Kitâb*

—— 1877.Muh.ammad b.Ah.mad al-Maqdisî, كتاب احسن التقاسيم فى معرفة الاقاليم (*Kitâb*'ah.san al-taqâsim,fi ma'rifat al-'aqâlim).Repr.,Leiden:Brill,1967.

de la Vaissière,Étienne 2003.Sogdians in China:A Short History and Some New Discoveries.*The Silk Road Foundation Newsletter* 1.2.http://www.silk-road.com/newsletter/december/ new_discoveries.htm.

—— 2005a.*Sogdian Traders:A History*.Trans.James Ward.Leiden:Brill.

—— 2005b.Châkars d'Asie centrale:à propos d'ouvrages récents.*Studia Iranica* 34:139–149.

—— 2005c.Čākar sogdiens en Chine.In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and Éric Trom- bert,eds.,*Les Sogdiens en Chine*,255–256.Paris: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 Orient.—— 2005d.Huns et Xiongnu.*Central Asiatic Journal* 49.1:3–26.

—— 2007.*Samarcande et Samarra:Élites d'Asie centrale dans l'empire abbasside*.Paris:Association pour l'avancement des études iraniennes.

de la Vaissière,Étienne,and Éric Trombert,eds.2005.*Les Sogdiens en Chine*.Paris: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Demiéville,Paul 1952.*Le concile de Lhasa:une controverse sur le quiétisme entre bouddhistes de l'Inde et de la Chine au VIIIe siècle de l'ère chrétienne.* Bibliothèque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vol.7.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 de France.Denifle,Henricus 1899.*Chartularium Universitatis Parisiensis*.Paris; repr.,Brus- sels:Culture et Civilisation,1964.

de Rachewiltz,Igor 2004.*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A Mongolian Epic Chronic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Translated with a Historical and Philological Commentary*.Leiden:Brill.

Des Rotours,Robert 1962.*Histoire de Ngan Lou-chan (Ngan Lou-chan che tsi)*.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Dewing,H.B.,ed.and trans.1954.*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Di Cosmo,Nicola 1999.The Northern Frontier in Pre-imperial China.In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Shaughnessy,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885–966.Cambridge: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9b.State Formation and Periodization in Inner Asian History.*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0.1:1–40.

—— 2002a.*Ancient China and Its Enemies:The Rise of Nomadic Power in East Asian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d.2002b.*Warfare in Inner Asian History (500–1800)*.Leiden:Brill.

Di Cosmo,Nicola,and Dalizhabu Bao 2003.*Manchu-Mongol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Qing Conquest:A Documentary History*. Leiden:Brill.

Dillon,Michael,ed.1998.*China:A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Dictionary*.Richmond,Surrey:Curzon.

Dobbie,Elliot van Kirk,ed.1953.*Beowulf and Judith*.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Dobrovits,Mihály 2004.“They called themselves Avar”-Considering the PseudoAvar Question in the Work of Theophylaktos.In Matteo Compareti,Paola Raffetta,Gianroberto Scarcia,eds.,*E¯rān ud Anērān:Webfestschrift Marshak 2003.Studies Presented to Boris Ilich Marshak on the Occasion of His 70th Birthday.*http://www.transoxiana.org/Eran/Articles/dobrovits.html (= *Erān ud Anērān.*

Studies Presented to Boris Il’ic Marsak on the Occasion of His

70th Birthday.Venice:Libreria Editrice Cafoscarina,2006).

Donner,F.1981.*The Early Islamic Conquest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rabble,Margaret,ed.2006.*The Oxford Companion to English Literature.* 6th ed.,rev.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Drews,Robert 1988.*The Coming of the Greeks:Indo-European Conquests in the Aegean and the Ancient Near East.*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1993.*The End of the Bronze Age:Changes in Warfare and the Catastrophe,ca.1200* b.c.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2004.*Early Riders:The Beginnings of Mounted Warfare in Asia and Europe.*London:Routledge.

Drinnon,Richard 1987.*Keeper of Concentration Camps:Dillon S.Myer and Ameri- can Racis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Drompp,Michael R.2005.*Tang China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Uighur Empire:A Documentary History.* Leiden:Brill.

Dunlop,D.M.1954.*The History of the Jewish Khazar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Dunnell,Ruth 1994.The Hsi Hsia.In 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eds.,*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6:*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907–1368*,154–214.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6.*The Great State of White and High:Buddhism and State Formation in Eleventh-Century Xi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Dunnigan,James F.,and Albert A.Nofi 1998.*The Pacific War Encyclopedi*.New York:Facts on File.

Dyson,A.E.1968.Literature,1895–1939.In C.L.Mowat,ed.,*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XII:*The Shifting Balance of World Forces,1898–1945*; 2nd ed.,vol.XII:*The Era of Violence*,613–643.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astman,Lloyd E.1986.Nationalist China during the Nanking Decade,1927–1937.In John K.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eds.,*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3:*Republican China,1912–1942,Part 2*,116–16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brey,Patricia Buckley 2001.*A Visual Sourcebook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http:// depts.washington.edu/chinaciv/tindex.htm.

Edwards,I.E.S.,C.J.Gadd,and N.G.L.Hammond,eds.1971.*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I,part 2:*Early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3r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dwards,I.E.S.,C.J.Gadd,N.G.L.Hammond,and E.Sollberger,eds.1973.*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II,part 1:*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and the Aegean Region,c.1800–1380* b.c.3r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gami,Namio 1964.The Formation of the People and the Origin of the State in Ja- pan.*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23:35–70.

Ekvall,Robert B.1968.*Fields on the Hoof:Nexus of Tibetan Nomadic Pastoralism.*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

Elisonas,Jurgis 1991.Christianity and the Daimyo.In John Whitney Hall,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vol.4:*Early Modern Japan*,301–37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llis,Eric 2007.Iran's Cola War.*Fortune*,February 6,2007.http:// money.cnn.com/magazines/fortune/ fortune_archive/2007/02/19/8400167/index.htm.

Endicott-West,Elizabeth 1989.Merchant Associations in Yüan

China:The *Ortoγ*.*Asia Major,* 3rd ser.,2.2:127–154.

Enoki,K.,G.A.Koshelenko,and Z.Haidary 1994.The Yüeh-chih and Their Migrations.In János Harmatta,ed.,*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vol.II:*The Development of Sedentary and Nomadic Civilizations,700 b.c.to a.d.250,* 171–189.Paris:Unesco.

Ewig,Eugen 1997.Le myth troyen et l'histoire des Francs.In Michel Rouche,ed.,*Clovis:histoire & mémoire,* 817–847.Paris:Presses de l'Université de ParisSorbonne.

Fairbank,John K.1978.The Creation of the Treaty System.In John K.Fairbank,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0:*Late Ch'ing,1800–1911,Part 1,* 213–263.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airweather,Eugene R.1970.*A Scholastic Miscellany:Anselm to Ockham*.New York:Macmillan.

Fakhry,Majid 1983.*A History of Islamic Philosophy*. 2nd e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Fan Yeh 1965.後漢書 *(Hou Han shu)*. Peking:Chung-hua shu-chü.

Farquhar,David 1978.Emperor as Bodhisattva in the Governance of the Ch'ing Empir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8.1:5–34.

Farris,William Wayne *1995.Heavenly Warriors:The Evolution of Japan's Military*,500–1300.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Felix,Wolfgang 1992.Chionites.In Ehsan Yarshater,ed.*,Encyclopaedia Iranica,5.*Costa Mesa:Mazda Publishers.

Fletcher,Joseph 1978.Sino-Russian Relations,1800–62.In John K.Fairbank,ed.,*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0:*Late Ch'ing,1800–1911,Part 1,* 318–35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lorinsky,Michael T.,ed.1961.*The McGraw-Hill Encyclopedia of Russia and the Soviet Union*.New York:McGraw-Hill.

Foster,B.O.,trans.1988.*Livy. Vol. 1:Books I and II.* 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owler,H.W.and F.G.Fowler 1905.*The Works of Lucian of Samosata.* Oxford:Clarendon Press.

Franck,I.M.,and D.M.Brownstone 1986.*The Silk Road:A History.* New York:Facts on File.

Franke,Herbert 1994.The Chin Dynasty.In 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eds.,*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6:*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907–1368,*215–32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ranke,Herbert,and Denis Twitchett 1994.Introduction.In 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eds.,*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6:*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907–1368,* 1–4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rédéric,Louis 2002.*Japan Encyclopedia.* Trans.Käthe Roth.Cambridge: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rendo,Joseph D.1975.*Agathias:The Histories.* Berlin:Walter de Gruyter.

Freu,Jacques 2003.*Histoire du Mitanni.* Paris:L'Harmattan.

Frye,R.N.1983.*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Iran under the Sasanians.* In Ehsan Yar- shater,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3:*The Seleucid,Parthian and Sasanian Periods,Part 1,* 116–18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5.*Ibn Fadlan's Journey to Russia.* Princeton:Markus Wiener.

Gamkrelidze,Thomas V.,and Vjaceslav V.Ivanov 1995.*Indo-European and the IndoEuropeans:A Reconstruction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of a Proto-Language and a Proto-Culture.* Trans.Johanna Nichols.Berlin:Mouton de Gruyter.

Garrett,Andrew 1999.A New Model of Indo-European Subgrouping and Dispersal.In Steve S.Chang,Lily Liaw,and Josef Ruppenhofer,eds.,*Proceedings of the TwentyFif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February 12–15,1999,*146–156 (=http://socrates.berkeley.edu/~garrett/BLS1999.pdf).

—— 2006.Convergence in the Formation of Indo-European Subgroups:Phylog- eny and Chronology.In Peter Forster and Colin Renfrew,eds.,*Phylogenetic Methods and the Prehistory of Languages*,139–151.Cambridge:McDonald Insti- 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Gerberding,Richard A.1987.*The Rise of the Carolingians and the Liber Historiae Francorum.* Oxford:Clarendon.

Gernet,Jacques 1996.*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Trans.J.R.Foster and Charles Hartman.2nd e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ershevitch,Ilya,ed.1985.*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2:*The Median and Achaemenian Period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ibb,H.A.R.,et al.,eds.1960–2002.*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New ed.Leiden:Brill.

Godley,A.D.,trans.1972.*Herodotu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olden,Peter 1980.*Khazar Studies*.Budapest:Akadémiai Kiadó

—— 1982.The Question of the Rus' Qağanate.*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2:77–97.

—— 1987–1991.Nomads and Their Sedentary Neighbors in Pre-Činggisid Eurasia.*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7:41–81.

—— 1991.Aspects of the Nomadic Factor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Ki- evan Rus.In I.S.Koropeckyj,ed.,*Ukrainian Economic History:Interpreta- tive Essays*,58–101.Cambridge,Mass.Harvard

Ukrainian Research Insti- tute.

—— 1992.*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Ethnogenesis and State-Formation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asia and the Middle East*.Wiesbaden:Harrassowitz.

—— 1995.Chopsticks and Pasta in Medieval Turkic Cuisine.*Rocznik Orientalistyczny* 49.2:73–82.

—— 2001.Some Notes on the Comitatus in Medieval Eurasi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Khazars.*Russian History/Histoire Russe* 28.1–4:153–170.

—— 2002.War and Warfare in the Pre-Chinggisid Western Steppes of Eurasia.In Nicola di Cosmo,ed.,*Warfare in Inner Asian History (500–1800),* 105–172.Leiden:Brill.

—— 2002–2003.Khazar Turkic ghulâms in Caliphal Service:Onomastic Notes.*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12:15–27.

—— 2004.Khazar Turkic ghulâms in Caliphal Service.*Journal Asiatique* 292.1–2:279–309.

—— 2006.Some Thoughts on the Origins of the Turks and the Shaping of the Turkic Peoples.In Victor H Mair,ed.,*Contact and Exchange in the Ancient World*,136–157.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2007.The Conversion of the Khazars to Judaism.In Peter B.Golden,H.BenShammai,and A.Róna-Tas,eds.,*The World of the Khazars:New Perspec- tives*,123–162.Leiden:Brill.

Gommans,Jos 2007.Mughal India and Central Asia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An Introduction to a Wider Perspective.In Scott C.Levi,ed.,*India and Cen- tral Asia.Commerce and Culture,1500–1800*,39–63.New Delhi:Oxford Uni- versity Press.Gonnet,H.1990.Telibinu et l'organisation de l'espace chez les Hittites.In *Tracés de fondation,Bib.EPHE* XCIII:51–57.(Cited in Mazoyer

2003:27.)

Goralski,Robert 1981.*World War II Almanac:1931–1945; A Political and Military Record.* New York:G.P.Putnam's Sons.

Gowing,Lawrence,ed.1983.*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Artists*.New York:Facts on File.

Grant,Edward,ed.1974.*A Source Book in Medieval Scienc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rassmann,Hermann 1863.Ueber die Aspiraten und ihr gleichzeitiges Vorhanden- sein im An- und Auslaute der Wurzeln.*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Sprach- forschung auf dem Gebiete des Deutschen,Griechischen und Lateinischen* 12.2:81–138.(Partial translation,"Concerning the Aspirates and Their Simultaneous Presence in the Initial and Final of Roots," in Lehmann 1967:109–131.)

Grenet,Frantz 2003.*La geste d'Ardashir fils de Pâba*.Die:Editions A Die.

—— 2005.The Self-Image of the Sogdians.In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and Éric Trombert,eds.,*Les Sogdiens en Chine*,123–140.Paris: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Grupper,Samuel M.1980.The Manchu Imperial Cult of the Early Ch'ing Dynasty:Texts and Studies on the Tantric Sanctuary of Mahākāla at Mukden.Ph.D.dissertation,Indiana University,Bloomington.

Guterbock,Hans G.,and Theo P.J.van den Hout 1991.*The Hittite Instruction for the Royal Bodyguard.* Assyriological Studies No.24.Chicago: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Gyllensvärd,Bo,ed.1974.*Arkeologiska Fynd från Folkrepubliken Kina*.Katalog 19.Stockholm:Östasiatiska Museet.

Haiman,J.1994.Iconicity and Syntactic Change.In

R.E.Asher,ed.,*The Encyclope- dia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1633–1637.Oxford:Pergamon.

Hall,John Whitney 1991.Introduction.In John Whitney Hall,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vol.4:*Early Modern Japan,* 1–39.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Hambly,Gavin R.G.1991.Āghā Muh.ammad Khā 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Qājār Dynasty.In Peter Avery et al.,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7:*From Nadir Shah to the Islamic Republic*,104–143.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rrison,John R.1966.*The Reactionaries:A Study of the Anti-democratic Intelligentsia*.New York:Schocken.

Hayashi,Toshio 1984.Agriculture and Settlements in the Hsiung-nu.*Bulletin of the Ancient Orient Museum* 6:51–92.

Heidenreich,Donald E.,Jr.2003.Pearl Harbor.In Peter Knight,ed.,*Conspiracy Theories in American History,* 579–582.Santa Barbara:ABC-CLIO.

Hicks,Robert Drew,trans.1980.*Diogenes Laertiu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ildinger,Erik 2001.*Warriors of the Steppe:A Military History of Central Asia,500 B.C.to 1700 a.d.* Cambridge,Mass.:Da Capo.

Hill,John E.2003.The Western Regions according to the *Hou Hanshu*:The *Xiyu juan*“Chapter on the Western Regions” from *Hou Hanshu* 88,2nd ed.http:// depts.washington.edu/uwch/silkroad/texts/hhshu/hou_han_shu.html#sec8.

—— forthcoming.*Through the Jade Gate to Rome:A Study of the Silk Routes dur*

ing the Later Han Dynasty,1st to 2nd Centuries ce.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Chapter on the“Western Regions” from the Hou Hanshu.

Ho,Yeh-huan 1999.揚子鰐在黃河中下游的地理分布及其南移的原因 (Yang-tzu o tsai Huang Ho chung-hsia you-te ti-li fen-pu chi ch'i nan-i-te yüan-yin).*Li- shih tili* 15:125–131.

Hock,Hans Heinrich 1999a.Out of India? The Linguistic Evidence.In Johannes Bronkhorst and Madhav M.Deshpande,eds.,*Aryan and Non-Aryan in South Asia:Evidence,Interpretation and Ideology*,1–18.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 tional Seminar on Aryan and Non-Aryan in South Asia,University of Michi- gan,Ann Arbor,25–27 October 1996.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Sanskrit and Indian Studies.

—— 1999b.Through a Glass Darkly:Modern"Racial" Interpretations vs.Textual and General Prehistoric Evidence on *ārya* and *dāsa/dasyu* in Vedic Society.In Johannes Bronkhorst and Madhav M.Deshpande,eds.,*Aryan and Non-Aryan in South Asia:Evidence,Interpretation and Ideology*,145–174.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Aryan and Non-Aryan in South Asia,University of Michigan,Ann Arbor,25–27 October 1996.Cambridge,Mass.:Harvard Uni- versity Department of Sanskrit and Indian Studies.

Hoffmann,Helmut 1961.*The Religions of Tibet*.New York:Macmillan.

Holmes,Richard,ed.2001.*The Oxford Companion to Military Histo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rnblower,Simon,and Antony Spawforth,eds.2003.*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3rd ed.,rev.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rne,Charles F.,ed.1917.*The Sacred Books and Early Literature of the East,* vol.VII:*Ancient Persia*.New York:Parke,Austin,& Lipscomb.

Hosking,Geoffrey 2001.*Russia and the Russians:A History*.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owarth,Patrick 1994.*Attila,King of the Huns:Man and Myth*.London:Con- stable.

Hsu,Immanuel C.Y.1980.Late Ch’ing Foreign Relations,1866–1905.In John K.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eds.,*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1:*Late Ch’ing,1800–1911,Part 2*,70–14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udson,Mark J.1999.*Ruins of Identity:Ethnogenesis in the Japanese Islands*.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Hui Li 2000.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 (*Ta tz’u en ssu San Tsang fa shih chuan*).Ed.Sun Yü-t’ang and Hsieh Fang.Peking:Chung-hua shu-chü.

Hui,Victoria Tin-bor 2005.*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utton,M.1970.Tacitus.In M.Hutton et al.,*Tacitus:Agricola,Germania,Dialogus*,127–215.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yman,Anthony 1996.Volga Germans.In Graham Smith,ed.,*The Nationalities Question in the Post-Soviet States*,462–476.London:Longman.

İnalcik,H.1997.Istanbul.*E.I.2* IV:224–248.

Issawi,Charles Philip 1971.*The Economic History of Iran,1800–1914.*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agchid,Sechin,and Van Jay Symons 1989.*Peace,War,and Trade along the Great Wall:Nomadic-Chinese Interaction through Two Millennia*.Bloomington:In- diana University Press.

James,Edward 2001.*Britain in the First Millenniu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anhunen,Juha,ed.2003.*The Mongolic Languages*.London:Routledge.

Jansen,Marius B.1989.The Meiji Restoration.In Marius B.Jansen,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vol 5:*The Nineteenth Century*,308–366.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ansen,Thomas,Peter Forster,Marsha A.Levine,Hardy Oelke,Matthew Hurles,Colin Renfrew,Jurgen Weber,and Klaus Olek 2002.Mitochondrial DN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Domestic Horse.*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 ences* 99.16:10905–10910.

Johanson,Lars,and Éva Á.Csató,eds.1998.*The Turkic Languages*.London:Routledge.

Jones,Horace Leonard 1924.*The Geography of Strabo*.Vol.3.London:William Heinemann.

Joo-Jock,Arthur Lim 1991.Geographical Setting.In Ernest C.T.Chew and Edwin Lee,eds.*A History of Singapore*,3–14.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afadar,Cemal 1995.*Between Two Worlds:The Construction of the Ottoman Stat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azanski,Michel 2000.L'or des princes barbares.*Archéologia*,No.371 (October):20–31.

Keightley,David N.1999.The Shang:China's First Historical Dynasty.In Michael Loewe and Edward L.Shaughnessy,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From the Origins of Civilization to 221 B.C.,* 232–291.Cambridge: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ellens,Jean 1989.Avestique.In Rüdiger Schmitt,ed.,*Compendium Linguarum Iranicarum*,32–55.Wiesbaden:Dr.Ludwig Reichert Verlag.

Keydell,Rudolf,ed.1967.*Agathiae Myrinaei historiarum libri quinque*.Corpus fontium historiae Byzantinae,vol.II.Berlin:Walter de Gruyter.

Khalid,Adeeb 2007.*Islam after Communism: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Central Asi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Khazanov,Anatoly M.1984.*Nomads and the Outside Worl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ing,Anya H.2007.The Musk Trade and the Near East in the Early Medieval Pe- riod.Ph.D.dissertation.Indiana University,Bloomington.

Kiyose,Gisaburo N.1977.*A Study of the Jurchen Language and Script:Reconstruction and Decipherment*.Kyoto:Horitsubunka-sha.

Kiyose,Gisaburo N.,and Christopher I.Beckwith 2006.The Silla Word for 'Walled City' and the Ancestor of Modern Korean.*Arutaigo kenkyû- Altaistic Studies* 1:1–10.

—— 2008.The Origin of the Old Japanese Twelve Animal Cycle.*Arutaigo kenkyû-Altaistic Studies* 2:1–18.

Klyashtornyi,S.G.1994.The Royal Clan of the Turks and the Problem of Early TurkicIranian Contacts.*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47.3:445–448.

Klyashtornyi,S.G.,and B.A.Livshits 1972.The Sogdian Inscription of Bugut Revised.*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26:69–102.

Kochnev,B.D.1996.The Origins of the Karakhanids:A Reconsideration.*Der Islam* 73:352–357.

Kohl,Philip L.1995.Central Asia and the Caucasus in the Bronze Age.In Jack M.Sasson,ed.,*Civilization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2:1051–1065.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

Kovalev,R.K.2005.Creating Khazar Identity through Coins:The Special Issue Dirhams of 837/8.In F.Curta,ed.,*East Central Europe in the Early Middle Ages*,220–253.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Kramers,J.H.,and M.Morony 1991.Marzpān.*E.I.2* VI:633–634.

Krause,Wolfgang,and Werner Thomas 1960–1964.*Tocharisches Elementarbuch*.Heidelberg:C.Winter.

Krueger,John R.1961a.*Chuvash Manual*.Uralic and Altaic Series,vol.7.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 1961b.An Early Instance of Conditioning from the Chinese Dynastic Histo- ries.*Psychological Reports* 9:117.

Kyzlasov,I.L.1994.Рунические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евразиских степеи.Moscow:Vostočnaja literatura.

Labov,William 1982.*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English in New York Cit*.Washington,D.C.:Center for Applied Linguistics.

Langlois,John D.,Jr.1981.Introduction.In John D.Langlois Jr.,ed.,*China under Mongol Rul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atham,Ronald,trans.1958.*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Harmondsworth:Penguin.

Lattimore,Steven,trans.1998.*Thucydides:The Peloponnesian War*.Indianapolis:Hackett.

Layton,Ronald V.,Jr.1999.Cryptography.In David T.Zabecki et al.,eds.,*World War II in Europe:An Encyclopedia*,1192–1194.New York:Garland.

Lazzerini,Edward J.1996.Crimean Tatars.In Graham Smith,ed.,*The Nationalities Question in the Post-Soviet States*,412–435.London:Longman.

Ledyard,Gari 1975.Galloping Along with the Horseriders:Looking for the Found- ers of Japan.*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1.2:217–254.

Lefebvre,Claire,Lydia White,and Christine Jourdan,eds.2006.*L2 Acquisition and Creole Genesis:Dialogues*.Amsterdam:Benjamins.

Legge,James,ed.and trans.1935.*The Chinese Classics,with a Translation,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Prolegomena,and Copious Indexes,* vol.IV:*The She King.*Second edition with minor text corrections and a table of concordances.Shang- hai;repr.,Taipei:Wen-hsing shu-tien,1966.

Legrand,Ph.-E.,ed.and trans.1949.*Hérodote:histoires,livre IV,Melpomène*.Paris:Société d'édition"les belles lettres"

.

Lehmann,Clayton M.2006.Dacia.http://www.usd.edu/~clehmann/pir/dacia.htm.Lehmann,Winfred P.,ed.1967.*A Reader in Nineteenth Century Historical IndoEuropean Linguistic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1973.*Historical Linguistics:An Introduction*.2nd ed.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

—— 1993.*Theoretical Bases of Indo-European Linguistics*.London:Routledge.Levi,Scott C.2002.*The Indian Diaspora in Central Asia and Its Trade,1550–1900*.Leiden:Brill.

——,ed.2007a.Introduction.In Scott C.Levi,ed.,*India and Central Asia:Commerce and Culture,1500–1800,*1–36.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d.2007b.India,Russia,and the Eighteenth-Century Transformation of the Central Asian Caravan Trade.In Scott C.Levi,ed.,*India and Central Asia:Commerce and Culture,1500–1800,*93–122.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ed.2007c.*India and Central Asia:Commerce and Culture,1500–1800*.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vin,Nora 1988.*The Jews in the Soviet Union since 1917:Paradox of Survival*.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Lewis,Bernard 1982.The Question of Orientalism.*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9.11(June 24):49–56.

Lewis,Wyndham 1954.*The Demon of Progress in the Arts*.London:Methuen.

Li,Rongxi,trans.1995.*A Biography of the Tripit.aka Master of the Great Ci'en Monastery of the Great Tang Dynasty*.Berkeley:Numata Center for Buddhist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Liddell,Henry George,Robert Scott,and Henry Stuart Jones 1968.*A Greek-English Lexicon*.Oxford:Clarendon Press.

Lincoln,Bruce 1991.*Death,War,and Sacrifice:Studies in Ideology and Practic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indner,Rudi Paul 1981.Nomadism,Horses and Huns.*Past and Present* 92:3–19.

—— 1982.What Was a Nomadic Trib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 tory* 24.4:689–711.

—— 2005.*Explorations in Ottoman Prehistory*.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 gan Press.

Lindow,John 1976.*Comitatus,Individual and Honor:Studies in North Germanic Institutional Vocabula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ing-hu Te-fen 1971.周書 (*Chou shu*).Peking:Chung-hua shu-chü.

Littauer,Mary Aiken,and Joost H.Crouwel 2002.*Selected Writings on Chariots and Other Early Vehicles,Riding and Harness.* Ed.Peter Raulwing.Leiden:Brill.

Littleton,C.Scott,and Linda A.Malcor 1994.*From Scythia to Camelot:A Radical Reassessment of the Legends of King Arthur,the Knights of the Round Table,and the Holy Grail.* New York:Garland.

Litvinsky,Boris A.,and Tamara I.Zeimal 1971.Аджина-

Тепа.Moscow:Iskusstvo.

Liu Hsü et al.1975.舊唐書 (*Chiu T'ang shu*).Peking:Chung-hua shu-chü.

Liu Kwang-ching and Richard J.Smith 1980.The Military Challenge:The North-west and the Coast.In John K.Fairbank and Kwang-ching Liu,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1:*Late Ch'ing,1800–1911,Part 2*,202–273.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iu Yingsheng 1989.Zur Urheimat und Umsiedlung der Toba.*Central Asiatic Jour- nal* 33.1–2:86–107.

Loewe,Michael 1986.The Former Han Dynasty.In Denis Crispin Twitchett and Michael Loewe,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The Ch'in and Han Empires,221 B.C.–A.D.220*,103–22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owry,Heath W.2003.*The Nature of the Early Ottoman State*.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Lyon,Bryce D.1972.*The Origins of the Middle Ages:Pirenne's Challenge to Gibbon*.New York:Norton.

Macan,Reginald Walter 1895.*Herodotus.The Fourth,Fifth,and Sixth Books.* Vol.I,*Introduction,Text with Notes.* London:Macmillan.

Mackerras,Colin 1972.*The Uighur Empire According to the T'ang Dynastic Histories:A Study in Sino-Uighur Relations,744–840.* 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 1990.The Uighurs.In Denis Sinor,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317–34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ir,Victor,ed.1998.*The Bronze Age and Early Iron Age Peoples of Eastern Central Asia.* Philadelphia: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Man.

Makdisi,George 1981.*The Rise of Colleges:Institutions of Learning in*

Islam and the West.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Mallory,J.P.1989.*In Search of the Indo-Europeans:Language,Archaeology and Myth.*London:Thames & Hudson.

Mallory,J.P.,and D.Q.Adams,eds.1997.*Encyclopedia of Indo-European Culture.*London:Fitzroy Dearborn.

—— 2006.*The Oxford Introduction to Proto-Indo-European and the Proto- IndoEuropean Worl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llory,J.P.,and Victor Mair 2000.*The Tarim Mummies:Ancient China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arliest Peoples from the West*.New York:Thames & Hudson.

Manz,Beatrice Forbes 1989.*The Rise and Rule of Tamerlane*.Cambridge: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00.Tīmūr Lang.*E.I.*2 X:510–513.

Markovits,Claude 2007.Indian Merchants in Central Asia:The Debate.In Scott C.Levi,ed.,*India and Central Asia:Commerce and Culture,1500–1800,* 123–151.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athews,R.H.1943.*Mathew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Rev.American ed.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tthee,Rudoloph P.1999.*The Politics of Trade in Safavid Iran:Silk for Silver,1600–173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ttingly,H.,trans.1970.*Tacitus:The Agricola and the Germania.* Rev.S.A.Handford.Harmondsworth:Penguin.

Mayrhofer,M.1986–2000.*Etymologisches Worterbuch des Altindoarischen.* Heidelberg:Carl Winter.

Mazoyer,Michel 2003.*Télipinu,le dieu au marécage:Essai sur les mythes fondateurs du royaume hittite.* Paris:L'Harmattan,Association Kubaba.

McGeveran,William A.,Jr.2006.*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2006*.New York:World Almanac Books.

McNeill,William H.1977.*Plagues and Peoples*.New York:Anchor Books.

Melchert,H.Craig 1995.Indo-European Languages of Anatolia.In Jack M.Sasson,ed.,*Civilization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4:2151–2159.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

Melyukova,A.I.1990.The Scythians and Sarmatians.In Denis Sinor,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97–11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illar,James R.,ed.2003.*Encyclopedia of Russian History.* Indianapolis:Mac- millan USA.

Miller,Margaret C.1999.*Athens and Persia in the Fifth Century bc:A Study in Cultural Receptivit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illward,James A.2004.*Violent Separatism in Xinjiang:A Critical Assessment.*Washington,D.C.:East-West Center Washington.

—— 2007.*Eurasian Crossroads:A History of Xinjiang*.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inorsky,Vladimir 1942.*Sharaf al-Zamān T.āhir Marvazī on China,the Turks and India:Arabic Text (circa* a.d.*1120)*.London:Royal Asiatic Society.

—— 1948.Tam ī m ibn Bah.r's Journey to the Uyghurs.*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 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 12.2:275–305.

Molè,Gabriella 1970.*The T'u-yü-hun from the Northern Wei to the Time of the Five Dynasties*.Serie Orientale Roma,vol.41.Rome: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Moribe,Yutaka 2005.Military Officers of Sogdian Origin from the

Late T'ang Dynasty to the Period of the Five Dynasties.In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and Éric Trombert,eds.,*Les Sogdiens en Chine,* 243–254.Paris: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Mote,Frederick W.1994.Chinese Society under Mongol Rule,1215–1388.In 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6:*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907–1368,* 616–664.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oule,A.C.,and Paul Pelliot 1938.*Marco Polo: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London:Routledge.

Mous,Maarten 1996.Was There Ever a Southern Cushitic Language (Pre-) Ma'a?In Catherine Griefenow-Mewis and Rainer M.Voigt,eds.,*Cushitic and Omotic Languages,* 201–211.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Ber- lin,March 17–19,1994.Cologne:Rüdiger Köppe.

—— 2003.*The Making of a Mixed Language:The Case of Ma'a/ Mbugu.* Amsterdam:Benjamins.

Mowat,C.L.,ed.1968.*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vol.XII:*The Shifting Balance of World Forces,1898–1945; 2nd ed.,* vol.XII:*The Era of Violenc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üller,F.Max 1891.*Vedic Hymns.* Vol.1.Oxford:Clarendon Press.

Müller,F.W.K.1907.Beitrag zur genaueren Bestimmung der unbekannten Sprachen Mittelasiens.*Sitzun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 19:958–960.

Nagrodzka-Majchrzyk,Teresa.1978.*Geneza miast u dawnych ludów tureckich (VII– XII w.).* Wrocław:Zaklad Narodowy im.Ossolinskich.

Nasr,Seyyed Hossein 2006.*Islamic Philosophy from Its Origin to the Present:Philosophy in the Land of Prophecy.* 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Nevsky,Nicolas 1926.*A Brief Manual of the Si-hia Characters with Tibetan Transcriptions*.Osaka:Osaka Oriental Society.

Newitt,M.D.D.2005.*A History of Portuguese Overseas Expansion,1400–1668.* London:Routledge.

Nichols,Johanna 1997a.The Epicentre of the Indo-European Linguistic Spread.In Roger Blench and Matthew Spriggs,eds.,*Archaeology and Language I: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Orientations,* 122–148.London:Routledge.

—— 1997b.Modeling Ancient Population Structures and Movement in Linguis- tics.*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6:359–384.

—— 2004.Chechnya and Chechens.In James R.Millar,ed.,*Encyclopedia of Russian History,* 232–235.New York:Macmillan Reference.

Noonan,Thomas S.1981.Ninth-Century Dirham Hoards from European Russia:A Preliminary Analysis.In M.A.S.Blackburn and D.M.Metcalf,eds.,*Viking Age Coinage in the Northern Lands,* 47–117.The Sixth Oxford Symposium on Coinage and Monetary History.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International Series 122.Oxford:B.A.R. (Reprinted in Noonan 1998.)

—— 1997.The Khazar Economy.*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9:253–318.

—— 1998.*The Islamic World,Russia and the Vikings,750–900*.Aldershot,Hampshire:Ashgate Variorum.

Northedge,A.1995.Sāmarrā’.*E.I.2* VIII:1039–1041.

Oren,Eliezer D.,ed.2000.*The Sea Peoples and Their World:A Reassessment*.Philadelphia:University Museum,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Ötkur,Abdurehim 1985.(*Iz*).Ürümchi:Shinjang Khälq Näshriyati. (3rd print- ing,1986.)

Ou-yang Hsiu and Sung Ch'i 1975.新唐書 (*Hsin T'ang shu*).Peking:Chung-hua shuchü.

Owen,Stephen 1981.*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The High T'ang.*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Pai,Hyung Il 2000.*Constructing"Korean" Origins.A Critical Review of Archaeol- ogy,Historiography,and Racial Myth in Korean State-Formation Theori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Pan Ku et al.1962.漢書 (*Han shu*).Peking:Chung-hua shu-chü.

Pearson,M.N.1987.*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I,1:*The Portuguese in Indi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edersen,J.,George Makdisi,Munibur Rahman,and R.Hillenbrand 1986.Ma- drasa.*E.I.2* V:1123–1154.

Pegolotti,Francesco Balducci 1936.*La pratica della mercatura*.Ed.Allan Evans.Cambridge:Medieval Academy of America.

Pelliot,Paul 1961.*Histoire ancienne du Tibet*.Paris:Maisonneuve.

—— 1959–1963.*Notes on Marco Polo*.Paris:Maisonneuve.

Perdue,Peter C.2005.*China Marches West: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errin,Bernadotte,trans.1998.*Plutarch's Lives.* Vol.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etech,Luciano 1952.*I missionari italiani nel Tibet e nel Nepal.* Parte II.Rome:Libreria dello Stato.

—— 1954.*I missionari italiani nel Tibet e nel Nepal*.Parte V.Rome:Libreria dello Stato.

—— 1955.*I missionari italiani nel Tibet e nel Nepal*.Parte

VI.Rome:Libreria dello Stato.

—— 1983.Tibetan Relations with Sung China and with the Mongols.In Morris Rossabi,ed.,*China among Equals: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10th–14th Centuries,173–203*.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eters,F.E.1994.*Muhammad and the Origins of Islam*.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Peterson,C.A.1979.Court and Province in Mid- and Late T'ang.In Denis Twitch- ett,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3:*Sui and T'ang China,589–906,Part 1*,464–56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icken,Laurence,et al.1981.*Music from the Tang Court.* Vol.1.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5–2000.*Music from the T'ang Court.* Vols.2–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iggott,Stuart 1992.*Wagon,Chariot and Carriage:Symbol and Status in the History of Transport.* London:Thames and Hudson.

Pirenne,Henri 1939.*Mohammed and Charlemagne*.London:Allen & Unwin.

Pletneva,S.A.1958.Печенеги,Торки и Погговцы в южнорусских степях.*Trudy Volgo-Donskoi Arkheologicheskoi Ekspeditsii*,*Materialy i issledovaniia po arkheologii SSSR* 62:151–226.

—— 1967.От кочевии к городам; салтово-маяцкая кугтьтура.Moscow:Nauka.

Pohl,Walter 1988.*Die Awaren:Ein Steppenvolk im Mitteleuropa,567–822 n.Chr.*Munich:Beck.

Pokorny,Julius 1959.*Indogermanisches etymologisches Worterbuch.* I.Band.Bern:Francke Verlag.

Psarras,Sophia-Karin 1994.Exploring the North:Non-Chinese Cultures of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and Han.*Monumenta Serica* 42:1–125.

—— 2003.Han and Xiongnu:A Reexamination of Cultural and Political Rela- tions (I).*Monumenta Serica* 51:55–236.

—— 2004.Han and Xiongnu:A Reexamination of Cultural and Political Rela- tions(II).*Monumenta Serica* 52:95–112.

Pulleyblank,Edwin G.1955.*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4.*Middle Chinese:A Study in Historical Phonology*.Vancouver: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 1991.*Lexicon of Reconstructed Pronunciation in Early Middle Chinese,Late Middle Chinese,and Early Mandarin.* Vancouver:UBC Press.

—— 1995.The Historical and Prehistorical Relationships of Chinese.In William

Y.Wang,ed.,*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China,* 145–194.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No.8.

—— 1996.Early Contacts between Indo-Europeans and Chinese.*International Review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1:1–25.

—— 2000.The Hsiung-nu.In Hans Robert Roemer,ed.,*Philologiae et Historiae Turcicae Fundamenta*,vol.3,52–75.Berlin:Klaus Schwartz Verlag.

Rackham,H.,ed.and trans.1934.*Aristotle:The Nicomachean Ethic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Ramet,Sabrina Petra 1993.Religious Policy in the Era of Gorbachev.In Sabrina P.Ramet,ed.,*Religious Policy in the Soviet*

Union,31–5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astorgueva,V.S.,and D.I.Ėdel'man 2000.ЭтимоЛогическии сгговарь иранских языков,I–II.Moscow:Vostočnaja literatura.

Raulwing,Peter 2000.*Horses,Chariots,and Indo-Europeans:Foundations and Methods of Chariotry Research from the Viewpoint of Comparative Indo- European Linguistics.* Budapest:Archaeolingua.

Rawlinson,George,trans.1992.*Herodotus:The Histories.* London:J.M.Dent & Sons.Remy,Arthur F.J.1907.The Avesta.*The Catholic Encylopedia*,vol.II.New York:Robert Appleton.Online edition,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02151b.htm.

Richards,John F.1993.*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I,5:*The Mughal Empir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lle,Renate 1989.*The World of the Scythians*.Trans.F.G.Wall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Róna-Tas,András,and S.Fodor 1973*Epigraphica Bulgarica*.Szeged:Studia UraloAltaica.

Rossa,Jesse 2006.*Ezra Pound in His Time and Beyond:The Influence of Ezra Pound on Twentieth-Century Poetry*.Newark:University of Delaware Library.

Rossabi,Morris 1981.The Muslims in the Early Yüan Dynasty.In John D.Langlois Jr.,ed.,*China under Mongol Rule*,257–295.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ed.1983.*China among Equals: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10th–14th Centuri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88.*Khubilai Khan:His Life and Tim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4.The Reign of Khubilai Khan.In 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eds.,*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6:*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907–1368*,414–489.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thenberg,Joshua 1978.Jewish Religion in the Soviet Union.In Lionel Kochan,ed.,*The Jews in Soviet Russia since 1917*,168–196.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Rudelson,Justin J.1997.*Oasis Identities:Uyghur Nationalism along China's Silk Road.*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Russell-Wood,A.J.R.1998.*The Portuguese Empire,1415–1808:A World on the Move.*Baltimore:Johns Hopkins Press.

Rybatzki,Volker 2000.Titles of Türk and Uigur Rulers in the Old Turkic Inscrip- tions.*Central Asiatic Journal* 44.2:205–292.

Sadie,Stanley,and John Tyrell,eds.2001.*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2nd ed.London:Macmillan.

Sagart,Laurent 1999.*The Roots of Old Chinese*.Amsterdam:John Benjamins.

Said,Edward 1978.*Orientalism*.New York:Pantheon Books.

Sandler,Stanley,ed.2001.*World War II in the Pacific:An Encyclopedia.* New York:Garland.

Sasson,Jack M.,ed.1995.*Civilization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

Savory,R.M.,et al.1995.S.afawids.*E.I.2* VIII:765–793.

Schamiloglu,Uli 1984a.The *Qaraçi* Beys of the Later Golden Horde:Notes on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Mongol World Empire.*Archivum Eurasiae Medii Aevi* 4:283–297.

—— 1984b.The Name of the Pechenegs in Ibn H.ayyân's *Al-Muqtabas*.*Journal of Turkish Studies* 8:215–222.

—— 1991.The End of Volga Bulgarian.In *Varia Eurasiatica:Festschrift für Professor András Róna-Tas*,157–163.Szeged:Department of Altaic Studies.

Scherman,Katharine 1987.*The Birth of France:Warriors,Bishops,and Long-Haired Kings*.New York:Random House.

Schmitt,Rüdiger 1989.*Altiranische Sprachen im Überblick*.In Rüdiger Schmitt,ed.,*Compendium Linguarum Iranicarum*,25–31.Wiesbaden:Dr.Ludwig Reichert Verlag.

Shcherbak,A.M.2001.Тюркская руника.St.Petersburg:Nauka.

Scott,James C.1998.*Seeing Like a State: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Sezgin,Fuat 1978.*Geschichte des Arabischen Schrifttums,Band VI.Astronomie,bis ca.430 H.* Leiden:Brill.

—— 1984.*Geschichte des Arabischen Schrifttums,Band IX.Grammatik,bis ca.430 H.* Leiden:Brill.

Shaban,M.A.1970.*The ʻAbbāsid Revolu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71.*Islamic History:A New Interpretation,I.*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76.*Islamic History:A New Interpretation,II.*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haked,Shaul 2004.*Le satrape de Bactriane et son gouverneur:documents araméens du IV* e *s.avant notre ère provenant de Bactriane.* Paris:De Boccard.

Shakya,Tsering 1999.*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Shaughnessy,Edward L.1988.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hariot into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8.1:189–237.

Shiba,Yoshinobu 1983.Sung Foreign Trade:Its Scope and Organization.In Morris Rossabi,ed.,*China among Equals: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10th–14th Centuries*,89–115.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Sieg,Emil,Wilhelm Siegling,and Werner Thomas 1953.*Tocharische Sprachreste,Sprache B.Heft 2:Fragmente Nr.71-633*.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

Sinor,Denis 1959.*History of Hungary*.New York:Praeger.

—— 1963.*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 l'Eurasie centrale.* Wiesbaden:Harrassowitz.

—— 1978.The Greed of the Northern Barbarians.In Larry V.Clark and Paul A.Draghi,eds.,*Aspects of Altaic Civilizations II*,171–182.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 1982.The Legendary Origin of the Turks.In E.V.Žygas and P.Voorheis,eds.,

Folklorica:Festschrift for Felix J.Oinas,223–257.Uralic and Altaic Series,vol.

141.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 1990a.The Establishment and Dissolution of the Türk Empire.In Denis Sinor,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285–316.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90b.Introduction:The Concept of Inner Asia.In Denis Sinor,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1–18.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d.1990c.*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Cambridge: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omers,Robert M.1979.The End of the T'ang.In Denis Crispin Twitchett,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3:*Sui and T'ang China,589–906,Part 1*,682–789.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peck,Paul 1981.*Artabasdos,der rechtgläubige Vorkämpfer der gottlichen Lehren:Untersuchungen zur Revolte des Artabasdos und ihrer Darstellung in der byzantinischen Historiographie.* Bonn:Habelt.

Spence,Jonathan 2002.The K'ang-hsi Reign.In Willard J.Peterson,ed.,*The Cam*

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9:The Ch'ing Empire to 1800,Part 1,120–18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su-ma Kuang 1956.資治通鑑 (*Tzu chih t'ung chien*).Hong Kong:Chung-hua shu-chü.Starostin,Sergei A.1989.Реконструкция ревнекитаиской фоноЛогическои системы.Moscow:Nauka.

Stary,Giovanni 1990.The Meaning of the Word 'Manchu':A New Solution to an Old Problem.*Central Asiatic Journal* 34.1–2:109–119.

Stearns,Peter N.,ed.2002.*The Encyclopedia of World History:Ancient,Medieval,and Modern,Chronologically Arranged.* Sixth ed.A completely revised and updated edition of the classic reference work originally compiled and edited by William L.Langer.Boston:Houghton Mifflin.

Struve,Lynn A.1984.*The Southern Ming,1644–1662*.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The Southern Ming,1644–1662.In Frederick W.Mote and Denis Twitchett,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7:*The Ming Dynasty,1368–1644,Part 1*,641–725.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ullivan,Alan,and Timothy Murphy,trans.2004.*Beowulf*.New

York:Pearson/Longman.

Szádeczky-Kardoss,Samuel 1990.The Avars.In Denis Sinor,ed.,*The Cam- 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206–228.Cambridge:Cambridge Uni- versity Press.

Szegedy-Maszák,Mihály 2001.*Literary Canons: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Budapest:Akadémiai Kiado.

Szerb,János 1983.A Note on the Tibetan-Uighur Treaty of 822/823 A.D..In Ernst Steinkellner and Helmut Tauscher,eds.,*Proceedings of the Csoma de Ko˝rös Memorial Symposium Held at Velm-Vienna,Austria,13–19 September 1981,*vol.1,375–387.Vienna:Arbeitskreis fü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n,Universität Wien.

Szemerényi,Oswald J.L.1980.*Four Old Iranian Ethnic Names:Scythian- Skudra-Sogdian-Saka.*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PhilosophischHistorische Klasse,Sitzungsberichte,371 Band.Vienna: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 1996.*Introduction to Indo-European Linguistic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yme,Ronald 1939.*The Roman Revolu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تاريخ الرسل و الملوكabarî:Abû Ja‘far Muh.ammad b.Jarîr al-T.abarî 1879–1901.*al-rusul wa al-mulûk*).Ed.M.J.de Goeje et al.Repr.,Leiden:E.J.Brill,1964–1965.Takakusu Junjirô,Ono Genmyô,ed.1932–1934.大正新修大藏經 (*Taishô shinshûdaizôkyô*).Tokyo:Daizô Shuppan.(*Ta’rikh*Takata,Tokio 1988.敦煌資料による中國語史の研究 :九·十世紀の河西方言,(*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Based on Dunhuang Materials*).Tokyo:Sôbunsha.

Takeda,Hiromichi,and Collett Cox,trans.forthcoming.Existence in the Three Time Periods*Abhidharmamahāvibhās.āśāstra* (T.1545 pp.393a9–396b23).

Takeuchi,Tsuguhito 2002.The Old Zhangzhung Manuscript Stein Or 8212/ 188.In C.I.Beckwith,ed.,*Medieval Tibeto-Burman Languages*,1–11.Leiden:Brill.

Taylor,Timothy 2003.A Platform for Studying the Scythians.*Antiquity* 77.296:413–415.

Teed,Peter 1992.*A Dictionary of Twentieth Century History,1914–199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ekin,Talat 1968.*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Uralic and Altaic Series,vol.69.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Thant Myint-U 2001.*The Making of Modern Burma.*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omas,F.W.1948.*Nam:An Ancient Language of the Sino-Tibetan Borderland.*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omason,Sarah Grey,and Terrence Kaufman 1988.*Language Contact,Creoliza-tion,and Genetic Linguistic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hompson,E.A.1996.*The Huns.* Revised and with an afterword by Peter Heather.Oxford:Blackwell.

Thompson,P.M.1979.*The* Shen Tzu *Fragment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illy,Charles 1975.Reflection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State-Making.In Charles Tilly,ed.,*The Formation of the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3–83.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Coercion,Capital,and European States,AD 990–1990.* Cambridge,Mass.:Basil Blackwell.

Treadgold,Warren 1997.*A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and Socie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Tu Yu 1988.通典 (*T'ung tien*).Peking:Chung-hua shu-chü.

Turnbull,Stephen R.2003.*Samurai:The World of the Warrior*. Oxford:Osprey.http://www.ospreysamurai.com/samurai_death02.htm.

Turner,Jane,ed.1996.*The Dictionary of Art*.London:Macmillan.

Twitchett,Denis,and Michael Loewe,eds.1986.*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The Ch'in and Han Empires,221 b.c.–a.d.22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witchett,Denis,and Frederick W.Mote,eds.1988.*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7:*The Ming Dynasty,1368–1644,Part 1.*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witchett,Denis,and Klaus-Peter Tietze 1994.The Liao.In 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eds.,*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6:*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907–1368*,43–153.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witchett,Denis,and Howard J.Wechsler 1979.Kao-tsung (reign 649–83) and the Empress Wu:The Inheritor and the Usurper.In Denis Crispin Twitchett,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3:*Sui and T'ang China,589–906,Part 1*,242–289.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ray,Géza 1960.The Four Horns of Tibet.According to the Royal Annals.*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Hungaricae* 10:31–57.

—— 1961.Notes on a Tibetan Military Document from Tun-huang.*Acta Orienta- lia Academiae Hungaricae* 12:223–230.

Valentino,Benjamin A.2004.*Final Solutions:Mass Killing and Genocide in the 20th Century.*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Vallé,S.1910.Marcianopolis.*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Vol.IX.New York:Robert Appleton.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09645b.htm.

Van de Mieroop,Marc 2004.*A Histor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ca.3000–323* bc.Oxford:Blackwell.

Van Walt van Praag,Michael C.1987.*The Status of Tibet:History,Rights,and Prospects in International Law.* Boulder:Westview Press.

Vernet,J.1997.Al-Khwārazmī.*E.I.2* IV:1070–1071.

Vladimirtsov,B.I.1948.*Le régime social des Mongols:le féodalisme nomade*.Paris:

Maisonneuve.

—— 2002.Работы по истории и этнографии монгольских народов.Moscow:Vostočnaja literatura.

Vovin,Alexander 2000.Did the Xiong-nu Speak a Yeniseian Language?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44.1:87–104.

Vyvyan,J.M.K.1968.The Approach of the War of 1914.In C.L.Mowat,ed.*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XII:*The Shifting Balance of World Forces,1898–1945,2nd ed.,* vol.XII:*The Era of Violence,* 140–170.Cambridge:Cam- 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keman,Frederic,Jr.1978.The Canton Trade and the Opium War.In John K.Fairbank,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0:*Late Ch'ing,1800–1911,Part 1,* 163–21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5.*The Great Enterprise:The Manchu Reconstruction of Imperial Ord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alter,Michael forthcoming.*Buddhism and Politics in the Tibetan Empire.*

Walters,Philip 1993.A Survey of Soviet Religious Policy.In Sabrina P.Ramet,ed.,*Religious Policy in the Soviet Union*,3–

3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ng Ch’in-jo et al.,eds.1960.册府元龜(*Ts’e fu yüan kuei*).Hong Kong:Chung-hua shu-chü.

Watkins,Calvert 1995.*How to Kill a Dragon:Aspects of Indo-European Poetic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0.*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of Indo-European Roots.* 2nd ed.Boston:Houghton Mifflin.

Watson,Burton 1961.*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Translated from the* Shih chi *of Ssu-ma Ch’ien*.2 vol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att,W.Montgomery 1991.Al-Ghaz ālī.*E.I.2*,II:1038–1041.

Wechsler,Howard J.1979a.The Founding of the T’ang Dynasty:Kao-tsu (reign 618–26).In Denis Twitchett,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3:*Sui and T’ang China,589–906,Part 1*,150–18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79b.T’ai-tsung (reign 626–49) the Consolidator.In Denis Twitchett,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3:*Sui and T’ang China,589–906,Part 1*,188–24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instein,Stanley 1987.*Buddhism under the T’ang.*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iss,Aharon 2000.The Destruction of European Jewry,1933–1945.In Robert Rozett and Shmuel Spector,eds.,*Encyclopedia of the Holocaust,* 46–55.New York:Facts on File.

Whitman,John W.2001.Fall of the Philippines.In Stanley Sandler,ed.,*World War II in the Pacific:An Encyclopedia,*478–483.New York:Garland.

Willemen,Charles,Bart Dessein,and Collett Cox 1998.*Sarvāstivāda*

Buddhist Scholasticism.Leiden:Brill.

Wills,John E.,Jr.1998.Relations with Maritime Europeans,1514–1662.In Denis Twitchett and Frederick W.Mote,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8:*The Ming Dynasty,1368–1644,Part 2,* 333–375.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ittfogel,Karl,and Chia-shêng Fêng 1949.*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907–1125*.Philadelphia: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Witzel,Michael 2001.Autochthonous Aryans? The Evidence from Old Indian and Iranian Texts.*Electronic Journal of Vedic Studies* 7.3:1–115.

—— 2003.*Linguistic Evidence for Cultural Exchange in Prehistoric Western Cen-tral Asia*.Sino-Platonic Papers No.129.Philadelphia.

Wolfram,Herwig 1988.*History of the Goths*.Trans.Thomas J.Dunlap.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ood,Ian 1994.*The Merovingian Kingdoms,450–751*.London:Longman.

Wyatt,David K.2003.*Thailand:A Short History*.2nd ed.New Haven:Yale Univer- sity Press.

Wylie,Turrell V.1964.Mar-pa’s Tower:Notes on Local Hegemons in Tibet.*History of Religions* 3:278–291.

Yakubovskii,A.Y.,and C.E.Bosworth 1991.Marw al-Shāhidj ā n.*E.I.2* VI:618–621.Yamada Katsumi,ed.and trans.1976.王充.論衡,上 (Wang Ch’ung,‘*Lun heng,*Part I’) Shinshaku Kanbun taikei 68.Tokyo:Meiji shoin.

Yang Chih-chiu 1985.元史三論 (*Yüan shih san lun*).Peking:Jen-min ch’u-pan she.

Yang Po-chün,ed.1990.春秋佐傳注 (*Ch’un ch’iu tso chuan chu*).2nd rev.ed.Pe-king:Chung-hua shu chü.

Yarshater,Ehsan,ed.1983.*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vol.3:*The Seleucid,Parthian and Sasanian Periods.* 2 vol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Yoshida,Yutaka,and Takao Moriyasu 1999.ブグト碑文 (Bugut Inscription).In T.Moriyasu and A.Ochir,eds.,モンゴル国現存遺蹟·碑文調査研究報告(*Provisional Report of Researches on Historical Sites and Inscriptions in Mongo-lia from 1996 to 1998*),122–125.Osaka:Society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Yü Ying-shih 1967.*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Relation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1990.The Hsiung-nu.In Denis Sinor,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118–149.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986.Han Foreign Relations.In Denis Crispin Twitchett and Michael Loewe,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1:*The Ch'in and Han Empires,221 b.c.–a.d.220,* 377–46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Zabecki,David T.,et al.,eds.1999.*World War II in Europe:An Encyclopedia.* New York:Garland.

Zakeri,Mohsen 1995.*Sāsānid Soldiers in Early Muslim Society:The Origins of ʻAyyārān and Futuwwa*.Wiesbaden:Harrassowitz.

Zlatkin,I.Ja.1983.ИсторияДжунгарского ханства,1635–1758.Издание второе.

Moscow:Nauka.

Zuckerman,Constantine 1997.Two Notes o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Thema* of Cherson.*Byzantine and Modern Greek Studies* 21:210–222.